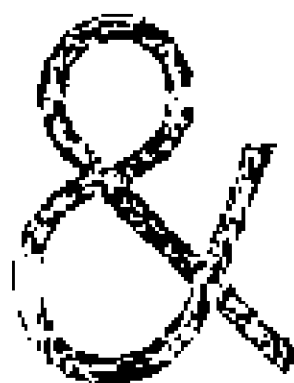


21 世纪新闻传播学系列教材

中国新闻传播史

JOURNALISM & COMMUNICATION

方汉奇 主编 方汉奇 丁淦林 黄瑚 薛飞 著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策划编辑 司马兰
责任编辑 刘 荆
王立新
封面设计 季 芳
版式设计 兰坤杰



ISBN 7-300-04356-2



9 787300 043562 >

ISBN 7-300-04356-2
定价: 35.00元

21 世纪新闻传播学系列教材

中国新闻传播史

方汉奇	主编	
方汉奇	丁淦林	著
黄 瑚	薛 飞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新闻传播史/方汉奇主编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
(21 世纪新闻传播学系列教材)

ISBN 7-300-04356-9/D·692

I. 中…

II. 方…

III. 新闻事业史—中国—高等学校—教材

IV. G219.2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2) 第 067887 号

21 世纪新闻传播学系列教材

中国新闻传播史

方汉奇 主编

方汉奇 丁淦林

黄 瑚 薛 飞 著

出版发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北京中关村大街 31 号 邮编 100080)

邮购部:62515351 门市部:62514148

总编室:62511242 出版部:62511239

本社网址:www.crup.com.cn

人大教研网:www.ttrnet.com

经 销:新华书店

印 刷:三河市新世纪印刷厂

开本:787×965 毫米 1/16 印张:34

2002 年 11 月第 1 版 2002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字数:619 000

定价:35.00 元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21 世纪新闻传播学系列教材》编委会

主 编 方汉奇

副主编 (按姓氏笔划排列)

丁淦林 何梓华

郑兴东 周瑞金

赵玉明 郭庆光

童 兵



总 序

20 世纪以来的 100 年，是世界新闻传播事业飞速发展的 100 年。这 100 年来，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继报纸、期刊、通讯社之后，广播、电视和互联网相继问世，新闻传播的媒介日趋多元化，新闻传播的手段日趋现代化，“地球村”变得越来越小，新闻传播事业对世界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影响则变得越来越大。

这 100 年，也是中国新闻事业飞速发展的 100 年。其中最后的 20 年，即改革开放以来的 20 年，发展得尤为迅猛。综合有关部门发表的统计数字，截至 20 世纪的最后一年，全国已有公开发行的报纸 2 100 种，通讯社 2 家，广播电台 1 200 座，有线和无线电视台 3 000 多座。其中，报纸年出版总数达到 195 亿份，广播人口覆盖率达到 88.2%，电视人口覆盖率达到 89%，电视受众超过 9 亿。与此同时，全国各类新闻从业人员的总数也已超过 55 万人。这样大的发展规模，这样快的发展速度，在世界和中国新闻事业史上都是空前的。回顾既往，展望未来，新闻传播事业在 21 世纪还将会保持着旺盛的发展势头。新闻传播，作为上层建筑、意识形态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全面准确地宣传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和基本方针以及各项决策，反映人民群众的伟大业绩和精神风貌，以及推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等方面，必将继续发挥着重要的导向作用。

与新闻传播事业的发展相配合，这 100 年来，为中国的新闻战线培养和输送人才的中国新闻教育，也有了相应的发展。中国的新闻教育起始于 20 世纪初叶，有 80 多年的历史。新中国成立前的 30 年，虽然先后在个别院校中设立了新闻系

或新闻专科，但规模都不大，设备也不够完善，在校学生的人数，最多的时候不超过400人，30年间累计培养出来的毕业生人数还不到3000人。新中国成立后，为了为新中国的新闻事业培养人才，新闻教育继续有所发展，但到60年代中期为止，全国的新闻教育机构也还只有14家。当时全国共有343家报社、78座广播电台和13家电视台，新闻系和新闻专业的学生统招统分，勉强能够满足中央和省市以上新闻单位人才方面的需求。“文化大革命”爆发后，这一发展被迫中断。中国的新闻教育得以重振旗鼓并得到空前迅猛的发展，主要还是改革开放以来20多年间的事情。这20多年来，中国新闻教育的发展和新闻事业的发展完全同步。截至1999年，全国设有新闻学类院、系、专业的高校已由改革开放之初的两三所增加到60所以上，专业点已超过100个。专业教育体系已从单一的本科教育，发展到博士生、硕士生、本科生、大专生、成人教育等多层次的格局。改革开放之初，全国在校的新闻系科学生总共只有500来人，现在仅本科生就有6000人，加上大专生和研究生接近10000人。20年间累计向新闻单位输送毕业生超过30000人。办学层次、办学规模、办学水平都有了很大的提高。在21世纪，随着新闻传播事业的加速发展，随着新闻战线人才需求的不断增加，中国的新闻教育肯定还将会有更大幅度的发展。

一般说来，新闻教育质量的高低，起决定作用的，主要是两个因素：一个是师资，一个是教材。两者之间，教材的作用更大。这是因为，师资的多少和良窳，往往受办学主客观条件的限制，而教材一旦完成，就可以直接嘉惠于学子，风行四海，无远弗届。进一步说，一部好的教材，不仅可以满足教学的需要，培养出一大批人才，而且还可以同时拥有很高的学术含量，推动新闻学研究的发展。1919年出版的徐宝璜的《新闻学》，1927年出版的戈公振的《中国报学史》，就是这方面的很好的例子。两书都是作者在高等学校从事新闻学和新闻史教学时作为教材编写出来的，出版之后，立即引起世人的关注和推崇，几十年来一再重版，历久不衰，至今仍然是公认的新闻学和新闻史方面的传世之作。正因为这样，新闻教育的前辈们，历来十分重视教材的建设。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十来年，坊间出版的新闻学方面的书籍，绝大部分都是教材。改革开放以后，新闻学研究空前繁荣，新闻学方面的书籍大量问世，但教材仍然在其中占了很大的比重。这些教材，覆盖了新闻学的方方面面，经过出版家和众多作者们的长期努力，门类和品种基本配套齐全，曾经为同时期的新闻教学做出过重要的贡献。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新闻工作实际的飞速发展，这些教材的体例日显陈旧，观点和内容也亟待调整和更新。一些属于学科前沿和科技含量较高的新开课程的教材尚付阙如，使现有的教材出现了不少缺口。步入21世纪，集聚力量，重新编写出一套

体系完整的、能够为新世纪的新闻教育和新闻人才培养服务的新闻传播学的系列教材，已经成为人们的共识。

呈现在读者面前的就是这样的一套系列教材，她将涵盖新闻学、传播学两个学科和新闻学、广播电视、广告三个专业。负责编写工作的，是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北京广播学院等校长期从事新闻传播学方面教学与研究工作的教授、副教授，其中有相当大的一部分人都是相关学科的学术带头人，堪称一时之选。收入系列的教材中有国家级重点教材，有部级重点教材，其他也都是经过严格筛选的精品，所以，这套系列教材的质量是有保证的，她的权威性也将会得到社会的认同。

21 世纪是一个高度信息化的时代，是信息经济和知识经济占主导地位的时代。信息经济和知识经济有两大支柱，一是以高新科技为代表的传播技术产业，二是从事新闻和信息产品生产的媒体产业。新闻传播学作为将这两大领域有机联结的桥梁，在今后的国家建设和社会发展中必将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经过精心策划，隆重推出这套系列教材，是具有高度的前瞻性和战略眼光的。在这里，我谨代表编委会和全体作者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表示由衷的感谢。

21 世纪，中国的新闻传播事业和新闻教育事业都将有一个大的发展。这批系列教材的问世，将会为新闻传播事业和新闻教育事业的发展和繁荣、为新世纪新闻传播人才的培养做出她应有的贡献。这是出版者和全体作者共同的一点希望。是为序。

方汉奇

于中国人民大学



目 录

CONTENTS

第一章 中国古代的新闻传播活动	1
第一节 中国传播活动溯源	1
第二节 唐代的新闻传播与早期的官报	6
第三节 宋代官办的“邸报”和流行于民间的“小报”	11
第四节 元代的新闻传播活动	20
第五节 明代的新闻传播事业	22
第六节 清代早期和中期的新闻传播活动	33
第二章 中国近代报刊的产生与初步发展	44
第一节 中国近代报业的开端	44
第二节 鸦片战争后香港报业的兴起与商业性报纸的崛起	51
第三节 上海报业的崛起	56
第四节 在华外报网的形成与外报的历史作用	70
第三章 国人办报活动的兴起与在维新运动中报业的大发展	78
第一节 国人办报活动的兴起	78
第二节 维新变法运动与第一次国人办报高潮	86
第三节 海外华文报刊的出现与初步发展	105

第四章 辛亥革命时期的新闻事业	111
第一节 资产阶级革命派报刊在境外的兴起与发展	111
第二节 清末新闻法制的建设与第二次国人办报高潮	121
第三节 辛亥革命时期新闻理论与业务的发展	140
第五章 民国初年的新闻事业	147
第一节 新闻事业的短暂繁荣	147
第二节 袁世凯与北洋军阀统治下的新闻事业	155
第三节 新闻事业在逆境中的发展	166
第六章 “五四”时期的新闻事业	174
第一节 《新青年》与新文化运动	174
第二节 新的报刊宣传阵线的形成	182
第三节 中国无产阶级新闻事业的诞生	187
第四节 新闻工作改革、新闻研究与新闻教育	191
第七章 中国共产党成立和大革命时期的新闻事业	197
第一节 中国共产党的报刊	197
第二节 国共合作后的新闻事业	203
第三节 北洋军阀统治地区的新闻事业	210
第四节 北伐战争中的革命报刊	215
第八章 十年内战时期的新闻事业	218
第一节 国民党统治区的新闻事业	219
第二节 革命根据地的新闻事业	226
第三节 抗日救亡运动中的新闻事业	232
第四节 新闻研究和新闻教育事业的发展	244
第九章 抗日战争时期的新闻事业	249
第一节 延安等抗日民主根据地的新闻事业	249
第二节 国统区新闻事业与境外抗日宣传活动	262
第三节 沦陷区的新闻事业	271
第十章 人民解放战争时期的新闻事业	288
第一节 国统区国民党新闻统制的重建与新闻界的抗争	288
第二节 解放区新闻事业的发展与新闻工作中两条战线的斗争	308
第三节 中国新闻事业的划时代巨变	320
第十一章 基本完成社会主义改造时期的新闻事业	331
第一节 社会主义新闻事业的创建与初步发展	331

第二节	社会主义新闻工作与新闻业务的探索与改进·····	340
第三节	新闻宣传报道的成就与过失·····	350
第四节	1956 年社会主义新闻工作改革 ·····	359
第十二章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的新闻传播事业·····	371
第一节	新闻传播事业发展的主要背景·····	371
第二节	新闻事业的发展与调整·····	373
第三节	从反右派斗争到“大跃进”运动中的新闻事业·····	383
第四节	60 年代初期新闻工作的主要经验和教训 ·····	392
第五节	主要新闻思想评价·····	398
第十三章	“文化大革命”时期的新闻传播事业·····	403
第一节	新闻事业的艰难发展·····	403
第二节	“文化大革命”时期新闻事业的主要特点·····	411
第十四章	改革开放以来新闻传播事业的总体变化（上）·····	419
第一节	新闻传播观念的变化·····	419
第二节	传播者的角色变化与传播内容的相应改变·····	427
第三节	受众的变化·····	438
第四节	制约因素与传播体制的变化·····	443
第十五章	改革开放以来新闻传播事业的总体变化（下）·····	456
第五节	各部类新闻事业的发展状况·····	456
第六节	新闻学术研究与新闻教育·····	489
第十六章	1949 年以来的台湾、香港、澳门新闻传播事业 ·····	498
第一节	1949 年以来的台湾新闻传播事业 ·····	498
第二节	香港的新闻传播事业·····	512
第三节	澳门的新闻传播事业·····	523
学习参考书目·····		527
后记·····		529



第一章

中国古代的新闻传播活动

第一节 中国传播活动溯源

一、中国古代的信息传播

传播活动起源于远古人类的群居时代。远古的人们结群而居，共同生活，共同劳动，有了信息，需要互相沟通，因此也就有了传播活动。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情况如此，中国的情况也如此。北京周口店发现的山顶洞人使用过的经过加工的海蚶壳，青海民和县阳山遗址出土的新石器时代的陶制喇叭筒，都是远古时代中国的先民们进行社交和传播活动的物证。

古代的传播手段是十分原始的。最早的和最常用的是口头传播，即口耳之间的传播。谣谚就是其中的一种。这种传播，受交通条件的限制，难以做到无远弗届，也很容易因为传闻异辞而失实。在有文字以前，作为口头传播的辅助手段的，还有结绳、图画、雕刻、标识、烽烟、旗鼓等。其中的最后两项，通常用于军事。烽烟主要用于报警，《史记·魏公子传》和《史记·周本纪》中就有信陵君和周幽王使用烽烟报警的记载。旗鼓主要用于指挥进退。《孙子兵法》中所说的“言不相闻，故为金鼓；视不相见，故为旌旗”指的就是这种旗鼓，旨在用它们来传递军事号令。

中国古代的传播活动中，还有一种特殊的媒介，就是木铎。这是别的国家的传播史上所没有的。据《左传·襄公十四年》师旷引《尚书·夏书》称：“每岁孟春，道人以木铎徇于路。”据杜预注：“道人，行令之官也。木铎，木舌金铃。徇于路，求路谣之言也。”据说早在夏商周时期，就曾经有这样一种被称为道人的政府官员，摇动木铎，巡行于各地，既以宣达政令，又进行必要的采风。这些都与新闻的发布和采集活动相近。前人之所以一度把木铎当做新闻事业的象征，近代的个别报纸之所以曾经以“木铎”作为自己的注册商标，都是这个缘故。

以上这些传播活动，大多见于文字出现以前。有了文字以后，古代的传播活动渠道更多，手段也更为多样化。

最早的带有文字的传播载体是甲骨、金属铸件和岩石。甲骨文大多刻在龟甲或牛羊的肩胛骨上。据古文字学专家统计，目前已发掘出来的带有文字的甲骨近11万片，其中常见的甲骨文约2000字，经考订可辨识的仅1400余字。记载的大多是殷商时期的事情。所谓的金属铸件，主要是铜器。刻铸在铜器上的文字，通称金文。金文刻铸之风盛行于周，传世的带有金文的铜器铸件，多为周代的产物，著名的毛公鼎、虢季子白盘，就是其中的代表，上面都有不少金文。在岩石上刻字，主要盛行于周以后。上述的这些传播载体，从内容来看，甲骨除少量纪事外，多用于祭祀和占卜；金器多用于记录帝王诏书或国家常法；岩刻多用于颂德和纪功。垂之久远和传于后世的考虑较多，现实的传播作用和传播的时效性还不算太大。

春秋战国时代，群雄割据，处士横议。各个地区性小国的统治者需要发布政令，通报政情军情；参与合纵连横活动的政客，需要游说诸侯，宣扬自己的政治主张；诸子百家需要聚徒讲学，弘扬自己的学说；老百姓需要在乡校之类的公众场所聚会议事和交换意见；加上各国都设有驿站和传舍，以方便信使往来，及时递送信息，传播活动因而更为频繁。

《墨子·明鬼》中所记的“杜伯乘白马素车，朱衣冠，执朱弓，挟朱矢，追周宣王，射之车上。中心，折脊，殪车中，伏弔而死。当是之时，周人从者莫不见之，远者莫不闻”。《吕氏春秋·节丧》中所记的“国弥大，家弥富，葬弥厚，含珠鳞施，夫玩好货宝，钟鼎壶滥，舆马衣被戈剑，不可胜其数……奸人闻之，传以相告”。《左传·郑伯克段于鄢》中所记的“大叔完聚，缮甲兵，具卒乘，将袭郑……公闻其期”。《左传·晋城濮之战》中所记的“卫侯闻楚师败”等。这些都是有关这一时期信息传播活动的记载。其中所传播的有政情有军情，也有其他方面的情况，都是最新的信息。因此，也都可以算是早期的广义的新闻传播。

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后，采取了修筑驰道、统一文字、统一货币、统一度量衡

制度等一系列措施，为社会传播的畅通提供了更为有利的条件。

值得提出的是，早在3 000年以前的上古时代，我国就已经出现了集市贸易，同时也就产生了最初的经济广告。《诗经·周颂·有瞽》有句云“箫管备举”，据郑玄注：“箫，编小竹管，如今卖饧者所吹也”。《楚辞·天问》中则有“师望在肆……鼓刀扬声”的描写。这些都是有关口头广告和音响广告的记载，所记的同样属于早期的传播活动。

正因为古代中国有着频繁的传播活动，因此在中国的古代典籍中可以找到大量的有关传播活动的记载。而且远在春秋战国时代，就有不少杰出的学者和思想家从事传播理论与实践的研究。保存至今的儒家、法家、墨家、道家、纵横家及其他诸子百家的著作中，就有不少关于传播功能、传播效果、传播心理、传播技巧、传播道德乃至受众需求等方面的分析和论述。

二、两汉和三国魏晋时代的传播活动

汉代以后，邮驿制度有了进一步的发展，每30里设驿，驿各有传，传置车，称传车，负责官文书和信息的传递工作。首都长安设有供地方官员和周边属国“通奏报，待朝宿”的“邸”，中央政府部门设有负责接待和通报工作的主官“大鸿胪”和属官“郡邸长丞”，此外还设“公车司马令”一人，“主受章奏”，设“御史”若干人，充当皇帝的秘书，负责接受官员们的报告和皇帝诏书的制颁等事宜。封建政府内部的信息传播体制日趋完善。

面向全国臣民的政令发布工作也日趋经常化和规范化。《史记·高祖本纪》有关汉高祖入关前和百姓们“约法三章”的记载，《汉书·萧何传》有关汉武帝元狩中“下诏御史，以酆户二千四百封何曾孙庆为酆侯，布告天下，令明知朕报萧相国德也”的记载，都说明这类将法令和皇帝的诏旨公诸于众广而告之的官方传播活动，在当时已经十分普遍。

两汉时代已经进入了以文字传播为主的时期。文字传播的载体，早期以竹、木制造的简和绢帛为主。有关的信息直接用笔墨书写在竹简、木简或绢帛上。造纸术发明以后，才逐渐发展到写在纸上。造纸术的发明，是中国对世界文明的一大贡献，也是人类传播史上的一件大事。它肇始于西汉中后期，完善于东汉和帝元兴年间，完善后制造出来的纸，时称“蔡侯纸”。它的发明人蔡伦，并不是第一个试验造纸的人，而是早期造纸术由探索到完善的集大成者。由于造纸术当时还处在草创的阶段，掌握技术的工匠还不够多，产量还不够高，使用还不够普及，两汉时代的传播载体，仍以竹简、木简和绢帛为主。

汉代是否已经出现了类似唐以后的“邸报”一类的官报？目前在新闻史研究

者中还有不同的看法。美国新闻学者白瑞华、日本学者楚人冠、英国学者安东尼斯密斯都有过中国“邸报”起始于汉朝的说法，但没有提出什么论据。中国著名新闻史学者戈公振在他的名著《中国报学史》中首先提出了“汉有邸报”的说法，但说的不十分肯定，后来在一些学术演讲中才逐渐趋向于肯定。其根据主要有两点：一是汉已经有了唐以后负责发行“邸报”的“邸”；二是《汉书》中有燕王旦在封地获知首都御林军调动情况的记载，推测燕王旦有可能是从当时的“邸报”上得到了这一消息。当代新闻史研究者中，也有一些人支持汉朝已有官报的说法，代表人物是姚福申和张涛。他们对近年在居延烽燧遗址和敦煌马圈湾烽燧遗址出土的简牍进行了研究，发现其中抄录了不少皇帝的制书和大臣们的奏记，在这些制书和奏记中，有不少来自朝廷的涉及国内政治军事方面情况的信息。他们由此认为这些简牍具有官报的性质，张涛还径称之为“木简报”。但多数新闻史研究者仍然认为汉代还没有建立发布官报的体制。汉代的“邸”，还不具备发布官报的职能。汉代的文献资料中，迄今还没有发现过类似“邸报”的记载。上述的简牍，具有更多的官文书的性质。

三国魏晋时代历时近两百年，是军阀割据，战乱频仍，时局纷争扰攘，居民辗转流徙，“国”际间的政治、军事、经济上的交往错综复杂的时代，也是新闻信息的传播与交流和社会輿情十分活跃、旺盛、发达的时代。

三国时代魏蜀吴三方的政治家们，都十分重视新闻传播，都具有比较强烈的信息需求，都十分关注对方辖区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和人事变动情况等方面的动态，都十分注意搜集敌友我三方的相关的新闻和情报。先秦时代就已经出现的“消息”一词，在这一时期被广泛使用。据尹韵公在《三国时代的新闻信息传播》一文中所作的统计，仅《三国志》一书中，就有近二十段提到“消息”一词的文字，内容包括政治、军事方面的信息，也包括社会輿论对时局趋向和动态的议论和分析。在三国时代，信息的有无和正确与否，往往能够决定战役的成败。曹操在官渡之战、诸葛亮和周瑜在赤壁之战中之所以能够取胜，就和他们事先掌握了大量对方的信息有关。

为了能及时获得信息和加快信息传递的速度，魏蜀吴三国都十分重视驿传活动。刘备为了伐魏和伐吴，曾在成都到汉中和成都经白帝到夷陵一线修了不少驿站。孙权为了联蜀伐魏，也在境内广设驿站，史称“东之与西，驿使往来，冠盖相集”。三国中，以曹魏的驿传制度最为周全。曹魏曾经在境内建立起一个四通八达的驿传网络，并专门制定过一个称为《邮驿令》的单行法。其境内的驿传速度可以达到一日 300 公里，并设有一种用双马牵引的称为“急锋车”的轻便小车，来急召军政要员和传递重要的信息。

三国和魏晋南北朝时代的主要传播媒介是布告和露布。布告就是《三国志》和《三国会要》中所经常提到的用以“布告天下”的那种政府文告，内容主要是皇帝的诏书和各级政府制颁的行政法令，以在固定地点悬挂或张贴为主。露布则是一种以流动的方式“露而宣布，欲四方速知”的传播载体，主要用帛，也有用木板的，因此也被称为露板，主要用于军事方面，特别是用来传播战争胜利的消息。如封演在《封氏闻见录》卷四中所说的：“露布，捷书之别名也。诸军破贼，则以帛书建诸竿上，兵部谓之露布。”但有的时候露布也被用来发布政治性的檄文。檄文这种文体，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已经出现过，通常用来张扬和炫耀自己，打击和声讨对方。三国时代经常用它来配合军事行动，力图不战而屈人之兵，做到先声夺人，“传檄而定”。魏晋到南北朝这一段时期，露布仍然是主要的传播媒体。宋高承《事物纪原》云：“晋代桓温北伐，须露布文，唤袁宏。宏倚马濡染不辍笔，俄得七纸。”又云：“后魏每征战克捷，欲天下闻知，乃帛建于漆竿之上，名曰露布。”前一段文字讲的是晋朝的事情，后一段文字讲的是南北朝时代的事情，说明露布的运用在当时仍然十分普遍。其中有关袁宏的那一段故事，后来还被概括为“倚马可待”这样一个成语，用以形容行文的敏捷。从上述引文看，袁宏所起草的准备转录到露布上的那篇文字，就是一篇政治性的檄文。

为了及时传递军事信息，烽燧这种传统的报警手段继续被沿用，并且有了进一步的发展。曹魏为了防备西北地区少数民族武装的侵扰，曾经在凉州地区广泛建筑烽火台，使有关的信息能够及时传到指挥机关。孙吴为了防备魏国的入侵，曾经沿长江设置烽火台达数千里之遥，每15公里至25公里一个。传递的速度也是惊人的。据《三国志·孙权传》称：“寇至则举以相告，一夕可行万里。”又称：“暮举火于西陵（今湖北宜昌），鼓三，竟达吴郡南沙（今江苏常熟）。”宜昌到常熟相距一千多公里，三通鼓罢，就能把信息传到。在现代化的电讯交通手段发明以前，能有这样高的传播效率和速度，是十分令人惊叹的。

三国魏晋南北朝时期，作为社会上传播手段被普遍采用的则有童谣和谣言。前者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的社会舆情和民心的向背，其影响有正面的，也有负面的。后者在当时又被称为伪言、妖言或诽谤，往往出自政治上的敌对方面，因此往往遭到当局的严厉查禁。

三国魏晋时代传播信息的载体是多元化的。既有包括木简、竹简、木牍在内的简牍，也有帛和纸。从存世的文献资料和地下出土的文物看，三国时代社会上通行的用于书写和传播信息的载体，最多的还是简牍，其次才是纸，最后是帛。这是因为帛是丝织品，成本最高，而纸由于当时掌握制造工艺的工匠还不够多，产品的数量一时还难以充分满足社会上的需要。直到公元403年东晋桓玄下令废

简用纸以后，才开始了纸张在传播载体中独占鳌头的历史。孙毓修在《中国雕版源流考》一书中所说的“竹帛废而纸大行，当在魏晋间矣”，反映的就是这一历史情况。

三国魏晋南北朝时期还没有建立发行官报的体制。有关这一时期的文献资料中也还没有找到相关的记载。国外的传播史研究者曾经有过“公元363年（东晋哀帝兴宁元年）在中国开始出现‘邸报’”的说法，但是没有举出任何根据，因而是不可信的。

第二节 唐代的新闻传播与早期的官报

一、早期政府官报的出现和唐代官报的发行制度

中国的报纸开始出现于唐代。最早的报纸是在封建官僚机构内部发行的政府官报。

迄今为止，还没有发现唐代初期有官报的记载。唐代官报的孕育和发展，是从唐代中期开始的，是和唐代藩镇制度的发展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唐代中叶以后，开始在一些边远地区建立藩镇，设置节度使，到了9世纪初，全国节度使已经发展到四十几个。随着藩镇势力的日益发展，各节度使纷纷在首都长安设立办事机构，开始称邸，后改称上都留后院，或上都邸务留后院，代宗大历十二年（公元777年）后，又改称上都知进奏院，简称进奏院，有时也被简称为留邸或邸。进奏院的负责人最初叫上都邸务留后使，后改称上都知进奏官，简称进奏官，有时也被社会上泛称为邸使或邸吏。唐代的进奏官是由地方派遣的，因此只对派遣他们的藩镇长官负责，不受朝廷的管辖。这些进奏官们既为所代表的地方藩镇呈递章奏，接受和代转朝廷下达的文书，办理需要和政府各部门请示汇报联系交涉的各项事宜，也及时地向地方通报他们所搜集到的来自首都的各项朝廷政治消息。

经由进奏官传发给各藩镇、用来介绍朝廷政事动态和各项消息的书面报告，就是最早的官报的雏形。这种雏形状态的官报，在当时并没有固定的名称。有称为“进奏院状”的，见《李义山文集》卷一《为濮阳公论皇太子表》；有称为“状报”的，见刘禹锡代杜佑作的《谢男师损等官表》；有称“报状”的，见李德裕《会昌一品集》卷十七《论幽州事宜状》；有称“上都留后状”的，见田神玉的《谢兄神功于京兆府界择葬地表》；有称为“留邸状报”的，见孟棨《本事诗》所记有关韩被贺除官的故事；有称为“邸吏状”的，见《旧唐书·李师古传》；有径称为“报”的，见杜牧《樊川集》卷十二《与友人论谏书》。所有这些名目，

称呼虽然不同，但指的都是同一样东西，即由长驻首都的进奏官们传发到地方的原始状态的报纸。其性质接近于后来的“邸报”。

需要指出的是，“状”、“报状”、“状报”等称呼，在当时也被用来泛指某些官文书，报状有时还被用来泛指私人书信。因此，不能把见于唐人文集中的所有的状、状报、报状都看成是官报，只有经由进奏官们向地方传发的那些状、状报和报状才具有官报的性质。

经由进奏院传发的这些报状，主要涉及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即：皇帝的起居活动，皇帝的诏旨，官吏任免事项，臣僚们的章奏，其他军事政治方面的重要信息。此外，这些报状还有以下一些特点，即：（1）它是不定期地由派驻首都的进奏院向地方传发的，其读者主要是地方的藩镇和诸道长官。（2）它在行文上还保留有某种官文书的痕迹，但不同于一般的官文书，它所提供的官方信息，往往早于正式的官文书。（3）它所提供的信息，绝大多数属于朝廷的政事活动，有的和收阅者有直接关系，有的并无直接关系。（4）它所提供的信息，有一些是进奏官们自行采集的，有一些则是从他们获得的朝廷动态消息中筛选出来的。他们所着重传报的，往往是他们的主官们相对关注的那一部分内容。

由此可见，唐代驻首都的各地进奏院发布的，被当时人称为“进奏院状”、“状报”、“报状”、“上都留后状”、“留邸状报”、“邸吏状”、“报”的这一类东西，已经具有一定的报纸的性质。它是一种在当时的政府机构内部发行和传递的官报，是一种原始状态的报纸。

二、“开元杂报”和“敦煌进奏院状”

最早的有关唐代官报的文字记载，见于孙樵《经纬集》卷三所收的《读开元杂报》一文。摘引其中的部分文字如下：

“樵曩于襄汉间，得数十幅书，系日条事，不立首末。其略曰：某日皇帝亲耕籍田，行九推礼。某日百僚行大射礼于安福楼南。某日安北奏诸蕃君长请扈从封禅。某日皇帝自东封还，赏赐有差。某日宣政门宰相与百僚廷争一刻罢。如此，凡数十百条。樵当时未知何等书，徒以为朝廷近所行事。有自长安来者，出其书示之，则曰：‘吾居长安中，新天子嗣国及穷虏自溃，则见行南郊礼，安有籍田事乎？况九推非天子礼耶？又尝入太学，见丛髻负土而起若堂皇者，就视得石刻，乃射堂旧地，则射堂废已久矣。国家安能行大射礼耶？自关以东，水不败田，则旱败苗，百姓入常赋不足，至有卖子为豪家役者。吾尝背华走洛，遇西戍还兵千人，县给一食，力屈不支。国家安能东封？……武皇帝御史以窃议宰相事，望岭南走者四人……安有廷争事耶？’语未及终，有知书者自外来，曰：‘此

皆开元政事，盖当时条报于外者。’樵后得《开元录》验之，条条可复。然尚以为前朝所行，不当尽为坠典。及来长安，日见条报朝廷事者，徒曰今日除某官，明日授某官，今日幸于某，明日畋于某，诚不类数十幅书。樵恨不生为太平男子，及睹开元中书，如奋臂出其间。因取其书帛而漫志其末。凡补缺文者十二，改讹文者十一。是岁大中五年也。”

孙樵字可之，又字隐之，关东人，大约生活在唐宪宗到唐僖宗这一段时期，是韩愈的再传弟子。中过进士，担任过宣宗时期的中书舍人和僖宗时期的职方郎中。他的这篇文章作于唐宣宗大中五年即公元851年。当时他还没有到长安去当京官，正在湖北一带活动。文中所记载的被他称为“开元杂报”的数十幅书，就是他在湖北北部的襄汉一带闲居时看到的。这篇文章对“开元杂报”的外观和内容都作了详细的描述。关于它的外观，文中有两处记载，即“数十幅书”和“系日条事，不立首末”。关于它的内容，文中列举了五项，即“某日皇帝亲耕籍田，行九推礼”；“某日百僚行大射礼于安福楼南”；“某日安北奏诸蕃君长请扈从封禅”；“某日皇帝自东封还，赏赐有差”；“某日宣政门宰相与百僚廷争一刻罢”。这些都是开元十二年至开元二十三年（公元724年至公元735年）在首都长安曾经发生过的重大事件。相关的记载，在记录这一时期史事的《资治通鉴》上都可以查到。这是唐代人详细记述唐代报纸情况的惟一的一篇文献。

从孙樵在《读开元杂报》一文中提供的情况看，他当年在襄汉地区所看到过的那几十页“杂报”，很可能就是开元年间流布于外的官报。唐时的襄汉地区隶属山南道，那几十页“杂报”，很可能就是开元年间长驻首都的山南道的邸吏们，根据当时中枢部门“条布于外”的材料，传发给山南道地方长官的“报状”或“留邸报状”的残件或抄件。孙樵在前面的引文中所作的描述，为我们了解唐代这一类官报的情况提供了很好的旁证。

但是，孙樵所看到的这“数十幅书”，并没有任何款识和名称。“开元杂报”云云，只是孙樵在记述其事时为了行文的方便而随意使用的称呼，意为有关开元时期政事消息的杂乱报道。它虽然被称为“报”，但并没有固定的刊期和报头。对于它的性质，新闻史学界还有不同的看法。但多数的学者，包括国外的一些对中国新闻史有研究的学者，都认为它是一种报纸，是一种近似于“进奏院状”、“邸吏报状”之类的报纸。它说明，中国开始有报纸的时间不会晚于唐玄宗开元年间（公元713年至公元741年）。

“开元杂报”的原件早已失存。清末人孙毓修在《中国雕版源流考》一书中所说的“近有江陵杨氏藏‘开元杂报’七页”，纯属传闻之词，并无根据。现在还保留下来的仅存的两份唐代的官报，是1900年在敦煌莫高窟出土的两张

“进奏院状”的残页。这两份“进奏院状”，都是唐僖宗时期由驻地在沙州的归义军节度使张淮深派驻朝廷的进奏官发回沙州的。因为沙州在今敦煌地区，两份“进奏院状”均属敦煌文物，所以被新闻史学者定名为“敦煌进奏院状”。

这两份“进奏院状”是1907年前后，先后被英籍匈牙利考古学家斯坦因和法国汉学家伯希和从敦煌取走，分别收藏于英国伦敦大英图书馆东方及印度部和法国巴黎国立图书馆的。

藏于伦敦大英图书馆东方及印度部的那一份，是唐僖宗光启三年（公元887年）前后长驻首都的归义军节度使进奏官张夷则发回给归义军节度使张淮深的“进奏院状报”。当时，唐僖宗受到李克用的沙陀兵和河中节度使王重荣的威胁，被迫流亡到兴元（今陕西汉中），这份进奏院状，实际上是那位进奏官在随僖宗从兴元返回长安的途中，从凤翔一带发回沙州的。这份进奏院状是一张长97厘米宽28.5厘米的横条卷，文字自上而下用毛笔书写，全状的开头部分较完整，有“进奏院状上当道”等字样。后半部分已佚，只残存了60行，没有结尾。从时间看，它所报道的主要是光启三年二月十七至三月二十三日这一个多月发生的事情。从内容看，它所报道的主要是归义军节度使张淮深派往朝廷的三批专使们为代张向僖宗求旌节而在兴元、凤翔两地活动的情况，包括他们是什么时候到的兴元，什么时候见的皇帝，什么时候开始就代张求旌节的问题和朝廷大员进行的交涉，交涉的经过情况如何，碰到过什么困难，他们内部在代主官求旌节的问题上有过什么分歧，哪些人比较乐观，哪些人比较消极，如此等等。

藏于巴黎国立图书馆的那一份，是唐僖宗乾符五年（公元878年）前后派驻首都复姓南宫的归义军进奏官从长安发回给归义军节度使张淮深的进奏院状。这份进奏院状首尾完整，共47行，用“上都进奏院状上当道”开头，用“年月日谨状”结束。从时间看，它所报道的主要是乾符四年十二月二十七日至乾符五年四月十一日这一段时间内的事情。从内容看，它所报道的主要是归义军节度使张淮深派遣的贺正专使阴信均等一行29人在首都长安活动的情况。“贺正”即贺新年元旦，是例行的庆祝活动。藩镇派遣贺正专使赴朝廷，除了“贺正”之外，往往还兼办一些别的事情。这一次也是这样。专使们除了“贺正”之外，还进奉表函，拜见皇帝和大臣，代主官提出求旌节等问题。这是先于上面那份“进奏院状”11年的一次求旌节活动。可见张淮深对“旌节”这一待遇的热衷。但两次都没有成功。

这两份“敦煌进奏院状”的价值，在于为我们提供了一批研究唐代进奏院状的实物。由于“开元杂报”已经无存，它们实际上已经成为我国，同时也是世界上仅存的年份最早的两份原始状态的报纸了。

这两份“敦煌进奏院状”还证实了唐代进奏院状的以下一些特点，即：（1）没有报头，开端和结尾部分还保留着官文书的痕迹。（2）发报方式是由各藩镇派驻朝廷的进奏官们直接发给他们的“当道”，即他们的主官。（3）所有的信息，都是进奏官们自行采集的，内容主要是发生在朝廷的大事，特别是和他们的地区有关的大事。

从以上的情况可以看出，以“开元杂报”和“敦煌进奏院状”为代表的唐代的报状，是一种从官文书游离出来的传播媒体，是一种和后来的邸报相类似的新闻传播工具。它以传报来自朝廷的信息为主要内容，由地方一级军政单位在首都的派驻机构向地方传发，因而带有一定的官方的性质，但还不是中央政府统一审定发布的正式官报，与宋以后的“邸报”还有很大的差别。这些报状还残留有某些官文书的痕迹，但已不同于官文书，而属于一种由官文书向官报转化过程中的传播工具。从某种意义来说，它十分近似于16世纪诞生于欧洲的“新闻信”，但比作为西方近代报纸远祖的欧洲的“新闻信”早诞生约八百年。

三、唐代的其他传播活动

唐代疆域辽阔，以驿路、驿站、驿卒、驿马组成的驿传系统覆盖全国（据《唐六典》所载，盛唐时期，“天下驿凡一千六百三十九”，其中水驿260，陆驿1297，水陆兼驿86），为唐代的公私传播活动提供了便利的条件。

唐代官方的传播活动，除了上述由各地进奏官传发的“报状”、“进奏院状”之类的官报外，还有烽燧、露布、檄文、榜文和告示等。这些传播手段，唐以前就已经被广泛使用，唐朝时期仍然被继续沿用。其中，烽燧、露布和檄文主要用于军事方面，用以传递军事信息和声讨敌人。告示和榜文主要用于行政和科举方面，用以宣传政令和公布中举人选。这在当时都是人们政治社会生活中关注的焦点。

唐代非官方的传播活动主要有士人之间的传播活动和民间的传播活动。

所谓的士人传播活动，指的是发生于士人之间的人际交往与信息传播活动。所谓的士人，通常泛指以读书为业的文化人群体。其中，有一些是开科取士之后取得一定的功名，逐渐步入仕途的；也有一些是没有功名或无意于功名的一般读书人。他们之间的传播手段，在当时主要有书信、著述、赋诗等。以诗的传播范围最广，受众最多，影响最大。据近人所作的统计，存世的唐诗在55000首以上，有姓名可考的唐代诗作者不下3600人。唐诗除了数量多、质量高之外，内容也十分丰富。其中既有作者对时事对重大政治事件的记述、评论和咏叹，也有他们对各种社会现象、社会问题的观察与思考。其中蕴涵着大量的军事、政治、

经济、文化等方面的信息。唐代的士人们非常擅长于用寄赠、抄传、唱和等方式来交换诗作，沟通和传播信息。在众多的交换手段中，题壁是最常用的一种。把自己写的诗题于壁上，公之于众，传播于社会，是当时士人们常用的交流手段。题诗的“壁”，通常选在士子们经常来往的中书省、秘书省、郡斋、府县厅衙等行政公廨，城关、桥柱、旅舍、酒肆、寺院、驿亭等公共场所。以公廨、寺院、驿亭为最多。通过题壁来传播和获取信息，进行相互间的沟通，已经成为唐代士人们的一种习惯。所以才留下了“每到驿亭先下马，循墙绕柱觅君诗”这一类形象的描述。

民间的传播活动，主要是流传于贩夫走卒野老牧童之间，口耳相接的歌谣谚语，街谈巷议，以及俗讲、变文等民间说唱文学作品。在官报只局限于士大夫阶层和官僚机构内部，面向公众的民间报纸还没有出现的情况下，上述这些，也就是平头百姓们交流信息的主要方式了。

印刷术是中国发明的。中国最早的印刷品出现在隋唐之际。中国的印刷术在中唐时期已经达到了很高的水平。但当时主要用来印刷佛经，还没有用来传递新闻信息。唐代还没有印刷的报纸。“开元杂报”和“进奏院状”都还不是印刷的。所谓“‘开元杂报’是中国第一份印刷报纸”的说法是不确切的。

第三节 宋代官办的“邸报”和 流行于民间的“小报”

一、宋代官办的“邸报”和“邸报”的发行制度

到了宋代，由各进奏院进奏官自发地向地方藩镇传发“报状”和“进奏院状”的体制有了重大的改变，开始出现了在政府中枢部门统一管理下统一发布的正式官报：“邸报”。负责“邸报”发布工作的机构是都进奏院。

北宋初期，沿用了唐、五代的旧制，由各路州郡在首都东京汴梁各自设置进奏院，归各州自行管辖，最多的时候曾经达到二百多个。太宗太平兴国六年（公元981年）起，对散处于首都各坊巷的各州进奏院进行整顿，设立了都进奏院，对各进奏院的业务活动实行统一管理。新成立的都进奏院，由门下省的给事中负责领导，其职责主要是收受和传递官文书，在封建官僚机构内部传播信息。

在都进奏院的管辖下，负责信息采集和传报工作的是进奏官。进奏官有时也被称为进奏吏或邸吏，一般由地方委派，但由中枢部门的门下省统一管理，多的时候曾经达到二百多人，少的时候只有六十多人。经由进奏官们传发出去的封建政府官报，就是“邸报”。《宋会要辑稿》第166册中所说的“国朝置进奏院于京

师，而诸路州郡亦各有进奏吏，凡朝廷已行之命令，已定之差除，皆以达于四方，谓之邸报”，讲的就是这种官报。这是对宋代官报发行体制的一个经典性的概括。

宋代“邸报”的发报制度，以太宗太平兴国六年为界，前后有所不同。前此由地方诸路州郡设在首都的进奏院和进奏官们自行采集编发，没有统一的章程。这以后，由中枢有关部门实行集中管理，统一发报，和前一阶段的进奏院状报比较起来，权威性有所加强，作为中央政府官报的性质也更为明显。

实行统一管理以后，“邸报”的发报工作仍由各州进奏院和进奏官们负责，稿件的采集、编辑、整理、审定等环节，则逐步由中枢部门接管。其中的审定工作，开始由枢密院负责。神宗以后，改由分求中书门下两省的检正检详两类官员负责。高宗以后和整个南宋时期，则由门下省的给事中负责。

和唐代的进奏院状比较起来，宋代的“邸报”具有更多的报纸的特征和封建政府官报的色彩。

首先，它已经不像唐代进奏院状那样，只是一种由派驻首都的进奏官们向自己的藩镇长官们报告朝廷信息的新闻信，而是一种在封建中枢部门统一管理下，按一定制度，统一编发给诸路州郡，向地方官员们传报朝廷信息的中央一级官报。

其次，它已经完全从官文书中分离了出来，成为一种官方的新闻传播工具，成为当时社会上传播朝廷政事信息的重要载体。它的读者已经不像唐代的进奏院状那样，仅限于少数藩镇长官，而是逐渐扩展到京朝官、地方各级行政官员和广大的士大夫知识分子。

再次，它已经由不定期发行转为定期发行。前后的刊期不完全一致，有时为“每日”，有时为“每五日”，有时为“逐旬”，有时为“每月”。刊期的每一次调整，都基本上做到按期连续发行。信息量逐渐加大，新闻的时效性也有所加强。

“邸报”之所以能够在宋王朝开国不久就成为封建中枢部门掌握下的政府官报，和宋朝是一个高度集权于中央的封建王朝有关。这种官报从它问世的第一天起，就是为在封建官僚机构内部传播经主管部门核定允许传播的信息、巩固封建统治秩序、维护封建统治阶级的利益服务的。

“邸报”这一名称最早出现于宋朝，是古人对封建官报最经常最习惯使用的一种称呼。现存的宋人文集和被记录下来的宋人书信中，最先提到“邸报”这两个字的，是范仲淹在陕北戍边时写给秦凤经略安抚招讨使韩琦的一封信：“顷接邸报，某有恩命改职增秩，诚为光宠。第朝廷本欲吾辈来了边事，今泾原全师败没，无应援之效，而特进爵，天下岂无深议？”其中所说的“改职增秩”，指的是他和韩琦等人同时被晋升为观察使一事（见《宋史·韩琦传》），时间是仁宗庆历

二年（1042年），上距北宋开国仅82年。这是宋代公私文献中关于“邸报”的最早的记载。

这以后，到北宋末年，不少当时人的诗文中，都曾提到“邸报”。《王荆文公诗》中收有王安石写的《读镇南邸报诗》。《温国文正司马公集》中收有司马光写的提到“邸报”的一封信。《苏轼诗集》收有他所写的诗：“坐观邸报谈迂叟，闲说滁山忆醉翁。”南渡以后，“邸报”一词在当时人的诗文集和书信中出现的次数更多。汪应辰的《文定集》、洪迈的《夷坚志》、杨万里的《诚斋集》、魏了翁的《鹤山全集》等文集中，都有不少处提到“邸报”的文字。说明从北宋初年起，“邸报”这一名称已经为朝野人士所接受，成为社会上对封建官报的一种习惯性的称呼。

上引诗文中提到的“邸报”，其实指的就是进奏院报状。邸是进奏院的别称，报是报状的省称，“邸”和“报”两个字合起来，也就自然地成为进奏院报状的别称或省称。它们实际上是同一事物的两种不同的称呼。

除了兼有进奏院报状、进奏院状报和与之相近的进奏官报、进奏报等名称外，“邸报”还兼有邸状、邸吏状、邸吏状报、朝报等别称。其中在南宋时期使用频率最高的是朝报。如理宗时期赵升在《朝野类要》一书中所说：“朝报，日出事宜也。每日由门下后省编定，请给事判报，方行下都进奏院报行天下。”度宗时期周密在《志雅堂杂钞》一书中记载：“（耻堂家有）理宗朝报一摺。”之所以有这么多的别称，是因为由进奏院下发的这种封建官报，并没有固定的报头和名称，可以这样称呼，也可以那样称呼，既然都为当时人所认可，又不会发生误解，也就没有人专门出来为它正名了。

“邸报”的内容，据《宋会要辑稿》职官二之五一所记，主要有“朝廷政事设施、号令、赏罚、书诏、章表、辞见、朝谢、差除、注拟”等几项。从实际传报情况看，恐怕还不止这些。见于宋人记载的，至少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1）皇帝的诏旨。如《东坡奏议》卷七所载龙图阁学士左朝奉知杭州苏轼状奏：“臣近者伏读邸报，以诸路旱灾，内出手诏两道。”这是排在邸报首位的内容。

（2）皇帝的起居。如宋祁《景文集》卷八五所载：“今月八日得进奏院状报，圣体康复，已于二月二十三日御延和殿，亲见群臣者。”

（3）官吏的任免。如《宋史》卷三三二《李师中传》：“师中始仕州县，邸状报包拯参知政事。”

（4）臣僚的章奏。如朱胜非《秀水闲居录》云：“是月地震，手诏求言，胜非欲以三事应诏而敢遽上……后数日，邸报论地震疏云应天以实不以文。”

(5) 军事情报。如陆佃《陶山集》卷八所记神宗时期和西夏作战情况：“伏睹进奏院报，泾原路城西安州毕功者。灵旗所指，一方尽平……张军势之十倍，收战功之众多，社庙交忻，寰宇称庆。”

(6) 刑罚。如王明清《挥麈后录》卷二所载：“大观中自南京教授差作试官，回次朱仙镇，阅邸报，吴侔兄弟以左道伏诛。”

此外，还有新近制颁的法令条例，三省枢密、六曹、寺、监、司的宣札符牒，以及根据皇帝或宰辅的意见要求条布报行的有关材料。

“邸报”的稿件，大部分是进奏官从门下省的给事中司等政府部门抄录来的。抄录的过程也是选择和采集的过程。就这一部分工作来说，进奏官带有官报记者的性质。

除进奏官外，宋代宫内的女官内夫人和相当于汉代左右史的门下省的起居郎及中书省的起居舍人，也负有采集、记录和向有关方面提供皇帝起居言行等动态信息的信息。他们有点近似于官报的御用记者。

“邸报”的编辑审定工作，自太宗时期成立都进奏院起，即由中书省、门下省的检正、检详官负责，后来又增加了由门下省的给事中负责“判报”这一环节。他们的任务，主要是决定发报稿件的取舍。皇帝和负责传报活动的进奏官，有时也部分地参与这项活动。皇帝的参与，主要表现在对哪些消息应该传报直接下达指示。进奏官的参与，主要表现在传报的环节上。经审定允许传报的稿件，到了进奏官手里，还会作一些筛选和删节。

“邸报”编定后，经由驿递传之四方。宋代的驿递分步递、马递、急脚递、水运步递等几种。南渡以后，为适应军事上的需要，又创设了摆铺制度，有金字牌、急速文字牌等名目，这些都属于快递，用于传递紧急文书。“邸报”属于常程邮件，使用的是一般的步马水递，路上耽搁的时间较长。例如从当时的首都临安（今杭州市）发往安徽广德就需要六天，发往四川则需要一个月。“邸报”发出后，允许传抄和复制，并允许这些复制件以朝报或邸报的名义在社会上公开发售。

宋代的“邸报”是否印刷，没有明确的记载。但至少有一部分“邸报”或“邸报”中的一部分材料是用雕版印刷的。

宋代“邸报”的读者，主要是政府官员和一般士大夫知识分子。现存的宋代文献资料中，还保存有不少这些人阅读“邸报”的记载。

为了巩固皇权和维护封建统治秩序，宋代各时期都很注意对“邸报”传报工作的管理。对涉及灾异、军情及朝廷机密等方面的信息和未经批准公布的臣僚章疏，都限制发布。

为了加强“邸报”传报活动的管理，使有关限制传报的禁令得到贯彻，宋代

还实行过“定本”制度。所谓“定本”，指的是根据进奏官采集来的各种发报材料，经本院监官编好，送请枢密院或当权的宰相审查通过后产生的“邸报”样本。进奏官们必须根据这一样本进行发报。宋代的“定本”制度起始于真宗咸平二年（公元999年），当时的规定是：“进奏院所供报状每五日一写，上枢密院定本供报。”^① 这以后，这一制度曾两次取消，一次在神宗熙宁四年（1071年），一次在高宗绍兴二十六年（1156年），都没有多久就重新恢复。光宗时期又规定“门下省定本，经由宰执始可报行”^②，由此一直沿用到宋末。

定本制度的制定和执行，加强了当局对“邸报”的控制，迫使进奏官们只能按照当局允许发布的内容进行传报活动，使“邸报”能够更好地贯彻皇帝和当权派宰辅们的意图，为巩固他们的统治秩序服务。

二、宋代的“小报”和官方对“小报”的查禁

“小报”始见于宋代，是中国历史上最早出现的非官方报纸。和“邸报”一样，“小报”并没有固定的报头和名称。流行于社会上的“小报”也并非出于一人一家之手。“小报”云云，只是当时人对这种类型的非官方报纸的习惯性称呼。

“小报”起始的确切时间已经难以查考。从宋人习惯于把“小报”和“邸报”对举，以“邸报”为常，以“小报”为非常；以“邸报”为合法，以“小报”为非法这一点来看，它可能在北宋初年都进奏院成立以后不久就已经出现了，是以和政府有关部门编发的封建官报相对的民间报纸的面目出现的。

目前能够找到的有关“小报”的最早的记载，是《宋会要辑稿》一书中的以下两段文字：

真宗大中祥符元年诏：“不得非时供报朝廷事宜。令进奏官五人为保，犯者科违制之罪。”^③

仁宗天圣九年闰十月十五日诏：“如闻诸路进奏官报状之外，别录单状，三司开封府在京诸司亦有探报，妄传除改，至惑中外。”^④

① 《宋会要辑稿》，第59册，2394页，北京，中华书局，1957。

② 《宋会要辑稿》，第166册，6558页。

③ 《宋会要辑稿》，第59册，2394页。

④ 《宋会要辑稿》，第166册，6504页。

其中所说的“非时供报朝廷事宜”和进奏官们在官方的报状之外“别录”成“单状”传发于外的物事，指的很可能就是后来的“小报”。

这以后，直到北宋末年，还可以找到不少类似的记载。其中提到的“肆毁时政，摇动众情”，“传播差除皆出伪妄”，“撰造浮言，诳惑群听，乱有传播”，以及“妄作朝报”叫卖于都市，以“内探录”的名义流传于缙绅士夫之家的物事，指的很可能就是后来的“小报”。这些记载说明，早在北宋真宗、仁宗时期，首都开封就已经出现了类似“小报”的物事。到了北宋末年，抄传小报已经逐步形成一种职业，只是还没有出现“小报”这一称呼而已。

南宋以后，“小报”有了较大的发展，“小报”这一称呼也开始流行。南宋各朝的公私文献中，都有不少关于“小报”的记载。其中介绍得比较详尽的有以下几段文字：

方陛下颁诏旨，布命令，雷厉风行之时，不无小人踊张之说，眩惑众听，无所不至。如前日所谓旧臣之召用者，浮言胥动，莫知从来。臣尝究其然，此皆私得之小报。小报出于进奏院，盖邸吏辈为之也。比年事之有疑似者，中外未知，邸吏辈必争以小纸书之，飞报远近，谓之小报。如今日某人召，某人罢去，某人迁除，往往以虚为实，以无为有。但朝士闻之，则曰：“已有小报矣！”州郡间得之，则曰：“小报已到！”他日验之，其说或然或不然。使其然焉，则事涉不密；其不然焉，则何以取信？此于害治，虽若甚微，其实不可不查。臣愚欲望陛下深诏有司，严立罪赏，痛行禁止。^①

这是有关高宗时期“小报”流行情况的描述。

比来，有司防禁不严，遂有命令未行，差除未定，即时誉播，谓之小报。始自都下，传之四方。甚至凿空撰造，以无为有，流布远近，疑悟群听。且常程小事，传之不实，犹未害也；倘事干国体，或涉边防，妄有流传，为害非细。乞申明有司严行约束，应妄传小报，许人告首，根究得实，断罪追赏，务在必行。又言：朝报逐日自有门下后省定本，经由宰执始可执行。近年有所谓小报者，或者朝报未报之事，或是官员陈乞未曾施行之事，先传于外，固已不可。至有撰造命令，妄传事端，朝廷之差除，台谏百官之章奏，以无为有，传播于外。访闻有一使臣及阁门院子，专以探报此等事为

^① 周麟之：《海陵集》卷三。

生。或得之于省院之漏泄，或得之于街市之剽闻，又或意见之撰造，日书一纸，以出局之后，省部寺监知杂司及进奏官悉皆传授，坐获不貲之利。以先得者为功，一以传十，十以传百，以至遍达于州郡监司。人情喜新而好奇，皆以小报为先，而以朝报为常，真伪亦不复辨也。^①

这是有关光宗时期“小报”流行情况的描述。

其有所谓内探、省探、衙探之类，皆私衷小报，率有泄漏之禁，故隐而号之曰新闻。^②

这是有关理宗时期“小报”流行情况的描述。

上引的三段文字中，第一段对“小报”在社会上风行的情况描述得十分生动；第二段对“小报”传发的过程和发行人的情况介绍得十分具体；第三段字数虽然不多，但提出了“小报”和所谓“内探”、“省探”、“衙探”的关系，并且第一次把报纸和新闻这两个名词联系了起来，都很值得注意。

根据以上的引文和宋人的有关记载，可以把“小报”的基本情况归结为以下几点：

(1) “小报”是一种以刊载新闻和时事性政治材料为主的不定期的非官方报纸。没有固定的报头和固定的名称。“小报”和“新闻”都是当时读者对它的习惯性称呼，用以区别于正式的官报。

(2) “小报”肇始于北宋，盛行于南宋。北宋以前的“小报”只是偶而以“别录单状”、“妄作朝报”之类的方式出现，还没有专业化。徽宗时期以后，才逐渐形成一种职业，社会上开始有了一些“专以探报此事为生”的人。

(3) “小报”的发行人包括邸吏（进奏官）、使臣（地方各州郡临时派驻首都的官员）、在省寺监司等政府机关内工作的中下级官员和从事书籍印售工作的“书肆之家”。应“小报”发行者的请托，在各处访录朝廷信息的，有所谓的“内探”、“省探”和“衙探”。“内”指的是大内，即皇帝居住和处理政事的地方。“省”指的是尚书省、中书省、门下省等中央一级的政府机关。“衙”指的是寺监司等省以下的一般政府机关。此外，出入宫禁的“师尼之辈”、“国亲之臣”和“诸路割探人”也是“小报”新闻的重要提供者。

① 《宋会要辑稿》，第166册，6558页

② 赵升：《朝野类要》卷四。

(4)“小报”的内容主要是：“今日某人被召”之类的朝廷动态报道；“某人罢去，某人迁除”之类的官吏任免消息；皇帝的谕旨诏令；“朝廷大臣之奏议，台谏之章疏，内外之封事”等时事性政治材料。和官报比较起来，“小报”的内容有两个特点：第一，信息比较灵通，新闻的时效性较强。当时人说它“以先得者为功”，“命令未行，差除未定，即时誊播”，“每遇批旨差除，朝殿未退已传播”。第二，所发表的大多是中枢部门还没有公开的“朝廷机事”。其中，或是“朝报未报之事”，即官报还没有发表的消息；“或是官员陈乞未曾施行之事”，即朝廷方面还没有认可执行的官员们的建议。由于“小报”的消息往往得之于“寺院之泄漏”和“街市之剽闻”，经常“以虚为实，以无为有”，传报时又从不认真核实，因此难以做到十分准确。在一些“小报”中，还出现过“撰造”、“妄传”和“伪撰”等现象。

(5)“小报”有手写的，也有印刷的。宋代文献中就有不少关于“小报”“印卖都市”；“镂板鬻卖，流布于外”；“京城印行，绕街叫卖”的记载。北宋以后，社会上对“小报”的需求越来越大，“小报”的发行量不断增加，“小报”的专业化和商品化的程度不断提高，在此情况下，部分“小报”采取印刷手段进行复制，乃是其发展的必然趋势。“小报”的发行者中就有掌握印刷设备的“书肆之家”，因此，采用雕版印刷的方式来复制一定数量的“小报”是完全可能的。大抵进奏官和使臣们所发的“小报”，以誊写的为多，其余的则以印刷的为多。

(6)“小报”的读者范围很广。有京官，也有地方官和一般的士大夫知识分子。皇室成员和社会上关心朝廷政事的人，也有不少是“小报”的热心读者。

从以上归纳的情况可以看出，“小报”是一种从11世纪初叶起就风行社会的非官方的报纸。这种报纸为读者提供了不少官报所不载的和官方禁止发表的文件和新闻，满足了他们对朝廷人事变动和政事活动消息的需求，成为“邸报”的一个重要的补充。在传报一般消息的同时，“小报”也经常被政府官员中的在野的一派所利用，刊载一些对当权者不利的消息和时事性政治材料。在民族矛盾尖锐的时候，“小报”还常常被主战派官员和各阶层的爱国人士利用来刊载一些呼吁抵御外侮、要求惩治汉奸的大臣奏疏和有关前方克敌制胜的消息。

“小报”本身并没有言论，只是通过它所选刊的文件和消息来表示它的倾向。“小报”之所以受到重视和欢迎，是因为它突破了官方对新闻传播的垄断和封锁，打破了官方“邸报”的一统天下，满足了一部分士大夫知识分子对朝廷政事信息的需求。

“小报”的出版，触犯了封建统治者的议论朝政之禁和新闻泄漏之禁。“小报”对封建统治集团内外政策及其当权人物所进行的指责和攻讦，更使他们难以

容忍。因此，“小报”的发行人自始就被指为“奸人”、“无图之辈”和“不逞之徒”。“小报”也一直被指为“造言欺众”、“乱有传播”、“骇惑听闻”、“疑悟群听”和非法出版物，受到各时期封建政府和当权派官员的查禁。

宋代封建统治者为了查禁“小报”，曾经颁布过很多诰旨和法令。北宋时期还没有制定出专门的条例，但已经有了不少限制“小报”出版和查缉惩治“小报”发行人的规定。如仁宗时“听人告捉，勘罪决停，告者量与酬赏”^①。徽宗时“令开封府立赏一百贯，许人告捕，仍以违制论”^②。南宋以后，由于“小报”发展迅速，社会上“以‘小报’为先，以朝报为常”，引起了当局的注意，这才加强了对“小报”的限制，并陆续颁布了有关“小报”的禁令。孝宗、光宗、宁宗等朝，都颁布过不少限禁“小报”的条款。对“小报”的惩治越来越重。由一般的“听人告捉”、“密切根捉”，发展为“当重决配”和“重作施行”。由一般的“当议编配”，发展到“编管五百里”乃至“流二千五百里”，而且增加了杖刑，赏格也有所提高。

在查禁“小报”的同时，宋代的封建统治者还加强了对进奏官和使臣们的管理和监督。禁止各地进奏官“伺察朝政”、“听探事宜”，及“将不系合报行事辄擅报行，及录与诸劄探人传报”，并对进奏官实行五人联保互相监督的制度，以限制“小报”的发行。但终宋之世，“小报”始终没有被完全禁绝。这说明“小报”能够满足一定的社会需求，它的发行得到了社会的支持，因而是有一定的生命力的。

三、宋代的其他传播活动

两宋时期社会上的各种传播活动，由于交通便利，印刷术的普及和发达，也十分活跃。被誊写或印刷复制后广泛传播于社会的，除官办的“邸报”和民办的“小报”外，还有榜文、檄文、诏书、大臣章疏、边报、传单、名人诗文、科举范文，出自名家的书信、制词、行状、碑传、铭志，出自临安、福建、四川等地书肆的各种版本的书籍。其中所传播的，既有政治和军事方面的信息，也有大量的文化方面的信息。

在上述的各项传播活动中，最值得注意的、影响最大的是所谓的“榜”。“榜”是一种由政府部门发布的、以张贴的方式公布信息的新闻传播手段，其形式类似唐以前的布告。但宋代的“榜”，其提供信息之及时，使用频率和受百姓

① 《宋会要辑稿》，第165册，6504页。

② 同上书，6519页。

关注程度之高，都远超汉唐。和汉唐时代的布告一样，宋代的“榜”通常是用来公布法令的，但也经常用来公布希望公众尽快知道的诏旨、章奏和赏功罚罪等方面的事宜。非常时期，也用来及时向公众公布战讯和群众关心的朝廷政事消息。“榜”的张贴地点视读者的对象而异，大多在居住密集、过往人等较多的内外城门口和市镇的商业繁华地区，即所谓的“州县城郭乡村要会处”^①。在北宋时代的首都开封，多数张贴在皇城的东西垛楼和宣德门外。当时，上自皇帝及省寺监司等中央部门，下至开封府属下的四厢都巡检衙门，都经常有“榜”在那一带张贴。在南渡以后的临安，则多数“揭于通衢”，或张贴于接近宫廷和中枢部门的朱雀门外。

北宋末年，在金军兵临城下、首都开封被围的那一段紧急时刻，“榜”曾经被当局用来作为一种紧急公布战况、传播和沟通信息的重要媒体。据台湾新闻史学者朱传誉在《宋代新闻史》一书中所作的统计，从钦宗靖康元年（1126年）一月一日到靖康二年（1127年）四月二十四日，在金兵两次围攻开封的不到一年半的这一段时间内，中枢和开封府等部门，共在开封城内出榜130余次，平均每两天出榜一次。情况紧急的时候，还有过一天连续出榜数次的纪录。

从《三朝北盟会编》、《靖康要录》等宋人文集和《续资治通鉴》、《宋史》等书中保存下来的大量的“榜”文中可以看出，“榜”文内的新闻信息量是比较大的，时效性也是比较强的。其中有不少涉及金兵犯境和各地抵御金兵情况的消息，也有不少金兵包围开封，以钦宗为人质和宋方进行谈判，迫使后者接受城下之盟等方面的消息。这些，都曾在当时的士民中引起强烈的关注和反响。“榜”成为发行面较小的“邸报”和“小报”的重要补充。

第四节 元代的新闻传播活动

一、元代官方的信息传播

元代的国祚很短，从灭南宋到被推翻，只有不到九十年时间。还没有来得及建立全国性的官报发行体制。

元代的政权得之于马上，加以疆域十分辽阔，因此驿传制度非常发达。设有站赤和急递铺之属。据《元史》记载，“每十里或十五里二十五里则设一铺”，“每铺置铺丁五人”，“遇有转递文字，当传铺所即注名件到铺时刻及所辖转递人

^① 《宋会要辑稿》，第165册，6537页。

姓名置簿，令转送人取正铺押字交取时刻还铺”^①。这一制度为军情和官文书的及时传送提供了保证。

但是，迄今为止，还没有看到过元代官报的实物，公私文献中也没有找到有关发行官报的记载。元代的中枢部门实行三省合一，只有中书省，没有门下省。虽然保留了给事中这一官职，但只管记录各部门的奏闻诸事，并无“判报”任务。和唐宋时代的进奏院名称相近的，有一个通政院，隶属于军事部门，也只负责驿传等事宜，没有将朝廷政事“报行天下”的职责。官方的新闻传播活动主要集中于中书省。中书省设有一名正八品的低级官员，负责“出纳四方文移”，即负责官文书的收发工作。有关的政事信息，大部分汇集于中书省，由主管官员上达于最高统治者。地方官员主要通过下行的官文书获知朝廷的信息。没有单独发行的官报。

戈公振在他写的《中国报学史》中曾有元朝有“邸报”的记载，并引周密《癸辛杂识》一书的“邸报既行”一语为证。但周密主要生活在宋末，书中所说的“邸报既行”指的是宋理宗、度宗时期的事，与元无关，不能作为元朝有“邸报”的证据。

二、元代的民间新闻传播媒体“小本”

流行于元代民间的新闻传播媒体主要是“小本”。这种“小本”由民间私自雕印发卖，内容主要是来自朝廷方面的政事消息。《元史》刑法四所载的禁止“但降诏旨条画民间辄刻小本卖于市”^②的条例，所限禁的就是这一类“小本”。从内容、形式和发行的方式来看，这种“小本”很可能就是宋代“小报”的延续。

和宋代比较起来，元代的言禁更严。据《元史·世祖本纪》、《元史·英宗本纪》及《元史·刑法志》记载：“讹言惑众”有禁，“妄言时政”有禁，“诽谤朝政”有禁，“诸人臣口传圣旨行事者”有禁。太宗时期还曾经有过“诸公事非当言而言者，拳其耳，再犯笞，三犯杖，四犯论死”^③的禁令。说明类似宋代“小报”的这种以传报朝廷政事信息为主的“小本”，其编印和发行都是私下进行的，是不会太顺利的。

① 《元史》卷一〇一，2596页，北京，中华书局，1976。

② 《元史》卷一〇五，2680页。

③ 《元史》卷一，33页。

三、元代社会上的其他传播活动

中国的印刷术发展到元代，已经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利用印刷和其他手段来传播信息的活动十分普遍。

属于学术思想信息方面的，有大量出自杭州、建阳、平水等地的各种版本的书籍。这些书籍，有雕版印刷的，也有活字版印刷的，字体扁方圆活，使用单色或朱墨两种套色，印刷十分精美。保存至今的这一类元版书籍，早已成为公私图书馆中的珍本和善本。

属于科举信息方面的，有印刷发卖新科进士名录和登门报录之类的活动。前者见于记载的，有元人陶宗仪《辍耕录》中的“各行省乡试则有人取发解进士姓名……钹梓印行，以图少利”一段话。后者屡见于关汉卿等人所作的元杂剧，称为报登科，是一种及时向事主通报中举消息的报录活动。

属于经济信息方面的，则有大量印刷散发的商品广告。1985年湖南省文物工作者在沅陵县城郊双桥村一号元墓中发掘出来的一张商品广告，就是其中的一个例子。这是一张由生产匙筋和油漆的作坊印发的广告，旨在介绍作坊的地址和产品的质量，以广招徕。广告中提到的作坊在潭州，即今长沙。广告的出土地在沅陵。两地相距250公里以上。可见这一类印刷广告作为一种传播媒介，确实能够起到跨地宣传无远弗届的作用。

上面的情况说明，元代虽然没有发行官报的体制，但类似宋代“小报”的出版物仍然得到延续，民间的传播活动还是大量存在的。

第五节 明代的新闻传播事业

一、明代官报的抄传和发行制度

明代的官报由封建中央政府统一安排发布和抄传等事宜。发自首都的官报，仍被习惯地称为“邸报”。

明代“邸报”的抄传和发行工作主要通过三个环节。

首先是通政司。通政司始设于明太祖洪武十年（1377年），以通政使为主官，官级为正三品，相当于各部的侍郎。通政司的任务，据《明史·职官志》的记载，是“掌受内外章疏敷奏封驳之事……凡在外之题本、奏本，在京之奏本，并受之，于早朝汇而进之”^①。来自地方和在京臣僚们的章奏，除极少数由内臣和鸿臚寺的官员代收外，绝大部分必须经过通政司。对通政司主官通政使的人

^① 《明史》卷七二，1780页，北京，中华书局，1974。

选，明王朝的各个皇帝和各时期的当权派都十分慎重，往往由皇帝直接任命。英宗以后各朝的通政使这一职务，大多为当权的首相或宦官所把持，以控制臣僚章奏呈留出纳这一环节。可见在中央政府中，这是一个至关重要的环节，是朝廷政事信息的总汇。

其次是六科。六科始设于明太祖洪武六年（1373年），包括吏、户、礼、兵、刑、工等六科，共设七品的给事中十二人。原隶通政司，成祖以后才成为独立的机构。六科的职能是“掌侍从、规谏、补阙、拾遗、稽查六部百司之事。凡制敕宣行，大事复奏，小事署而颁之……凡日朝，六科轮一人立殿下，珥笔记旨……凡大事廷议，大臣廷推，大狱廷鞠，六掌科皆预焉”^①。可见六科官员的级别虽然不高，但管的事很多，对六部百司的工作都有权稽查，而且经常参与朝廷的各项重大政事活动。

在六科的众多职掌中，和“邸报”的抄传活动关系密切的有两点。其一是将皇帝看过的、作了批示的、同意发布的臣僚们的章奏公开发抄，供在京各衙门互相传报，供“邸报”抄传。其二是负责记录皇帝接见大臣时的谈话和指示。经由“邸报”发布出去的皇帝谕旨，有很大一部分即来源于此。从某种意义上说，六科的官员们还承担了采集、记录和为“邸报”提供皇帝谕旨的工作。

再次是提塘。明制，各省都派有提塘官长驻京师，担任军情和各项文报的呈递下达等任务。提塘还有一项任务，就是抄传“邸报”。沈德符在《野获编》一书中所说的“今天下一家……巡抚及总兵官俱有提塘官在京师专司‘邸报’”^②，是关于明代提塘官从事“邸报”抄传活动的最早记载。明代不设进奏院，没有进奏官，提塘官就其所从事的工作而言十分接近于唐宋时代的邸吏或进奏吏。由于没有类似进奏院这样的机构，明初的提塘官们居无定所，经常住在旅店或租用民房。明代中叶以后，一些提塘官们才开始在京师购置房产或自建馆舍，作为居住和办公的地点。提塘的办公地点通称提塘报房，简称报房。

经由提塘报房发出的官报通称“邸报”。“邸报”的各项内容，是提塘官们从六科发抄的各项谕旨和章奏中摘抄出来的。摘抄出来以后，还要经过以下几个步骤，才能传发到各地读者的手里，即：（1）复制由在京各提塘报房分头进行；（2）通过塘马和驿站传送到各省城和总兵官驻地，分送给省城或驻地的主要军政官员；（3）由省城的有关人员复制后，分送给省城各衙门的一般官员；（4）由省城负责抄报活动的专业人员抄出，经驿传分送各地方府县衙门，转给府县长官。

^① 《明史》卷七四，1805～1807页。

^② 沈德符：《野获编》卷二四，《会馆》。

明代政府机关的省以下各级在职官员们，就是通过以上的这些环节分别看到“邸报”的。“邸报”抄传到府县以后，除供府县衙门内的官员们传看外，还可能被辗转抄录，供一般官员们阅览。

通政司汇集各类章奏和地方上报的消息；六科收集和发布有关的诏旨和章奏；提塘将这些诏旨和章奏从六科抄出，经过筛选和复制，传发到省，再传到府县，通过辗转抄录，在官绅中传阅。这就是明代“邸报”抄传活动的全过程。

二、有关明代“邸报”的几个问题

明代的“邸报”和唐宋时代的“邸报”一样，也有很多别名。这些别名都是当时人对“邸报”的异称。它们之间相互通用，并存于明人著作和明代的公私文献之中。常见的有以下几种：

“邸抄”。有时写作“邸钞”。由“邸抄”派生出来的，还有“钞报”、“科抄”、“阁钞”等名目。同属“邸报”的别名。大量见于明代各朝档案和《李东阳集》等私人著作。

“朝报”。屡见于明人所著的《瞿式耜集》等文集和《牡丹亭》等文学作品。明末人王士禛在《池北偶谈》中所说的“今之朝报，或曰邸报”^①，也说明了这两种名称在当时是通用的。

“除目”。除，拜官授职；目，条目。两个字合起来，可以解释为任命官吏的名单目录。这是“邸报”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热衷仕途的朝野官绅们最关注的部分。因而“邸报”也被当时人别称为“除目”。

“京报”。因为发自首都，所以也被别称为“京报”。见于俞正燮的《癸巳存稿》和明人所写的传奇作品《鸣凤记》。

明代“邸报”之所以有这么多的别称，主要的一个原因，是这种“邸报”并没有固定的报头，因此在称呼上不免发生歧异。但有一点是明确的，即发自中枢的官报只有一家，即“邸报”，其他的称呼都是它的别名，不可能是性质不同的另类报纸。

明代的“邸报”大体上包括以下这样一些内容：

皇帝的谕旨。既有皇帝为某人某事直接发布的谕旨，也有皇帝以批答章奏的方式发布的谕旨。

皇帝的起居言行和有关皇家的各类消息。

官吏的任免。这方面的消息在“邸报”中占有一定的篇幅，而且最受朝野人

^① 王士禛：《池北偶谈》卷四，《朝报》。

士的重视。除任免消息外，“邸报”上还经常刊有官员们应皇帝之召入宫觐见的消息。

臣僚们的章奏。这是“邸报”中所占篇幅最多、信息含量最大的一部分内容。

军事信息。明英宗土木之变以后，外有瓦剌、后金的侵扰，内有宸濠之乱和邓茂七、刘六、刘七、李自成、张献忠的起义，后来又有清军的入侵。军事方面的信息因此占了越来越多的比重。

社会新闻。据明人文集所载，当时人曾经从“邸报”上看到不少诸如“女子生髭”，“（妇女）化为男子”，“（某地民妇）生二女，一女一眼一耳四齿”，“（某农家圈养的牛生下的牛犊）一身两颈两头四眼四耳两口”等之类的社会新闻。

此外，“邸报”中还附有“鼎甲单”，及时报道有关科举方面的最新信息。

“邸报”提供给读者的以上这些信息，主要来自六科发抄的谕旨和章奏。上引社会新闻中的大部分，恐怕都是从地方官员的章奏中摘引出来的。

明代的“邸报”基本上每日发行。和“邸报”抄传有关的一些活动是逐日进行的。京都和外地的读者接阅“邸报”，也是以日为单位来计算的。明代“邸报”的外观如书册，每期出一小册，页数不定，时有增减。字数通常在三五千之间。每期的总发行数约为5 000到10 000册。明代中叶以前的“邸报”，大多是由各级抄报人用手写的方式辗转抄传的。中叶以后，部分“邸报”开始使用印刷。明思宗崇祯末年，才开始有部分“邸报”使用活字版。但直到明王朝终结，“邸报”的复制手段始终是多元的，既有抄写的，也有印刷的，两种复制手段并存。正因为明代的“邸报”长时期大部分是非印刷品，所以在辗转抄传的过程中，很容易被抄传者有意识地增损和作伪。《明史·李三才传》、《明史·顾宪成传》和顾亭林的《亭林文集》中，都有关于当时“邸报”对所刊文字随意增损的记载。

明代“邸报”的读者主要是政府官员和士大夫知识分子，“邸报”是他们获知朝政和了解国家大事的重要手段。不少士大夫知识分子还注意收藏报纸，作为修史和从事文学创作的参考资料。

三、明代的民间报房和抄报行

明代中叶以后，首都北京等地的民间新闻传播活动日趋活跃，开始出现了民间的报房和从事抄报工作的专门行业。

这一情况见于明人的以下一些文字：

其一：“近日都下邸报有留中未下先已发钞者，边塞机宜有未经奏闻先有传

者，——又如外夷情形，边方警急，传闻过当，动摇人心，误事大矣。报房贾儿博锱铢之利，不顾缓急。当事大臣，利害所关，何不力禁？”^①这段话见于于慎行的《谷山笔麈》卷十一的《筹边》一文。其中的“报房贾儿博锱铢之利”这句话特别值得重视。它说明：（1）当时报房已经很时兴；（2）这些报房是民间办的；（3）这些报房是以赢利为目的的；（4）这些报房是公开活动的。于慎行的这篇文章写于万历十九年（1591年），所记的当是万历年间的事。

其二：“何甥来，云送邸报为业。余乃送之至李子木，令其服役焉。”^②这段话见于祁佳彪的日记。祁佳彪是明末著名的抗清大臣，当时在北京担任御史，是个京官。何甥，据同月十七日日记，是祁佳彪姐姐的儿子，名光烨。这段日记说明当时已有人以“送邸报为业”。姓名也保存了下来。这是中国新闻史上第一个有姓名可考的和“邸报”发行活动有关的人。

其三：“劝廉须养廉。国朝制较前朝稍薄，京秩官视外吏最冷，凡就列鸳行，爵不论崇卑，总不能无车马衣服之具，薪水班皂之需，俯仰蓄事之供，舍馆邸钞之费。”^③这段记载见于崇祯九年《兵部为恭陈六要等事》题奏稿，是吏部都给事中颜继祖的一段话。其中把“邸钞之费”列为京官们的日常开支项目之一，说明当时已经有了一批收费的报房和付费订阅“邸报”的读者。

其四：“今查得宛大二县原编一百三十二行，除本多利重如典当等项一百多行，仍行照旧纳银，如遇逃故消乏，许其告首，查实豁免外，将……豆粉行、杂菜行、豆腐行、抄报行……共三十二行，仰祈皇上特赐宽恤。”^④这段记载见于担任过宛平县地方官的沈榜的《宛署杂记》，出自万历十年（1582年）四月户部尚书张学颜的一份题奏。从中可以看出，抄报行当时已是京师所属宛平大兴两县辖区内的132行之一，而且是利薄的行业，在税收上得到过一定的减免待遇。同时也说明抄送“邸报”，最晚在万历年间就已经是一项公开的社会行业了。

有人以经营报房“博锱铢之利”，有人以“送邸报为业”，有人定期向送报人支付“邸钞之费”，社会出现了“抄报行”这一公开的行业，并因利薄而受到官方的减免税费的待遇。这就是以上引文所透露出来的信息。这些信息为明代已有民间经营的新闻事业提供了充分的证明。

明代早期的民办报房很可能是从官方的提塘报房分离出来的。民办报房问世后，它的官方消息仍然得自六科，或间接得自提塘报房。因此两类报房所抄发的

① 《明史资料丛刊》，第3辑，91页，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80。

② 《祁忠敏公日记》，崇祯五年三月初一日。

③ 郑天挺编：《明末农民起义史料》，120页，北京，中华书局，1954。

④ 沈榜：《宛署杂记》卷一三，96页，北京，北京出版社，1961。

官方消息内容大致相同。它们所发行的报纸，都被称为“邸报”。官报的那些别称，也通用于民间报房所出的那些报纸。

除抄传和发行“邸报”外，民间报房还从事报录、印卖缙绅录、鼎甲单，出版临时编印的时事小本等类的活动。通过这些活动，为受众提供信息服务，增加收入。

民间报房所发行的“邸报”和报帖，最初都是手抄的，所以才有“抄报人”、“抄报行”和“邸报抄传”等说法。但不排除个别发行量比较大的时事性政治材料使用印刷手段。万历到天启这一段时间，估计仍是手抄和雕版印刷两种方式并存，崇祯末年才出现了活版印刷的报纸。

北京是当时民间报房最集中的地方。此外，不少省会和大一点的府县如江陵、苏州、杭州、绍兴等地，也出现过民间抄报人所办的报房。明代民间新闻事业的发展 and 萌芽状态的明代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有一定的联系。民间报房和抄报活动比较活跃的地区，往往也是商品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但明代的民间报房和它们所发行的报纸并没有为商品经济的发展提供更多的经济方面的信息，本身的商品化程度也不高。这些报房所发行的报纸仍然是在为封建的经济基础服务。这也许正是当时的封建统治者容许它们公开存在并在税费上给以“宽恤”的一个原因。

四、《万历邸钞》、《天变邸钞》和《急选报》

明代“邸报”的原件已经无存。被保存下来的，只有当时人的摘抄本和被某些明人书籍当做附录保存下来的当时“邸报”的翻印件。前者为现存台北的《万历邸钞》，后者为被收入《钦定四库全书》等书的《天变邸钞》。

明抄本《万历邸钞》共 32 册，现为台北“中央图书馆”收藏。北京国家图书馆藏有它的传抄本 18 册。台北收藏的那部分，1969 年由台北正中书局影印，分三册出版，目前流行较广的就是这一影印本。

这部抄本是将万历一朝的“邸报”按照时间的先后顺序摘录而成的。抄录者在摘录的过程中做了一些编辑整理的工作，包括删节，增加了一些“摘由”，增加了一些注释性的说明，并适当地作了一些综合。这部抄本确实保存了大量当年“邸报”的原文，但并不全都是原文。因此，它只是部分地反映了当年“邸报”的面貌。

明代的士大夫知识分子当中，有不少人是有抄录“邸报”习惯的，目的在于了解朝政和积累材料。顾炎武的嗣祖顾绍芾就是其中的一个。从万历四十八年（1620 年）到崇祯七年（1634 年），他一共抄了 14 年的“邸报”，后来分订成 25

册，留在家中。抄录的方法，据顾炎武的回忆是：“阅邸报，辄手录成帙。”又说：“手录邸报，止纪大事，其迁除月日，多有未详。”^①可见当时的每一个“邸报”的抄录者，都是根据自己的兴趣和需要来抄报的。各人抄的详略程度不同，而且都必然有所取舍。《万历邸钞》的原抄录者大约也是这样。

《天变邸钞》是一份专门报道发生在北京的一次特大灾异事件的报纸。

所谓“天变”，指的就是发生在北京内城西南隅，以王恭厂火药库附近一带为中心，波及到周围近百里地区的这次特大灾异事件^②。时间是明熹宗天启六年五月初六日（1626年5月30日）。《明史》、《明实录》、《国榷》、《天府广记》等书均有记载，但十分简略。“天变”这一提法，始见于明熹宗就此事件发的一则“上谕”，后来被广泛沿用，并把报道这一事件的“邸报”称为《天变邸钞》。“天变”这两个字，很可能是传抄时根据这份报纸的内容加上去的。

报道这次事件的“邸报”，当时曾在社会上广泛流传。不少京内外人士都是通过阅读这份报纸才了解这次事件的详细情况的。由于年代久远，《天变邸钞》的原件已经无存。它的全文，是被当时人和稍后一些时候的人根据原件或传抄件，以附录方式辑入私人文集或丛刻，间接保存下来的。

《天变邸钞》全文约两千字。开头部分是这样写的：

“天启丙寅五月初六日巳时，天色皎洁，忽有声如吼，从东北方渐至京城西南角，灰气涌起，屋室动荡，须臾大震一声，天崩地塌，昏黑如夜，万室平沉。东自顺城门大街，北至刑部街，长三四里，周围十三里，尽为齑粉，屋以数万计，人以万计。王恭厂一带糜烂尤甚，僵尸重叠，秽气熏天。瓦砾盈空而下，无从辨别，街道门户伤心惨目笔所难述。震声来自河西务，东自通州，北自密云昌平，告变相同。城中即不被害者，屋宇无不震烈。狂奔肆行之状，举国如狂……此真天变，大可畏也。”^③

这一段文字对这次所谓“天变”的面上的情况作了概括性的描述，有点像一般新闻中的导语。以下的文字，依次为“天变”发生那一刹那各方面情况的介绍，“天变”当天各方面情况的介绍，以及“天变”前十天内发生的有关“天变”各种征兆的介绍。时间和地区由近及远。很有点类似今天常用的“倒金字塔”的

① 《顾亭林诗文集》，155、444页，转引自尹韵公：《中国明代新闻传播史》，166页，重庆，重庆出版社，1990。

② 1986年5月30日至6月1日，北京自然科学工作者和新闻史研究者曾联合举办过一次名为“1626年北京地区特大灾异综合研究”的学术讨论会。参加讨论的专家学者对这次灾异事件的性质看法不一，多数学者倾向于认为这一灾难事件是一次由地震引起的火药库爆炸。

③ 金日升：《颂天牖笔》卷八。

写法。

这篇报道涉及的时间跨度近一个月；涉及的地区方圆六七百里；涉及的人物，上自皇帝，中及钦天监、部院长僚、知府、总兵官等政府官员，下至吏目、蒙师、内侍、一般士绅及太监、庙祝、道士、赤脚僧、巡更逻卒、长班、轿夫、卖棺者等社会各阶层人士；可见编写者在编写前，曾经做过大量的采访和情况汇集方面的工作，是下了番功夫的。

《天变邸钞》关于北京这次灾异事件的报道，并非官方发布的，而是抄报人自己编写的。从这一点看，它出于官方的提塘报房的可能性较小，出于民间报房的可能性较大。它属于临时发刊、大量复印出售、广为传播的那一类民间报房出版的报纸。“邸钞”云云，只是社会上对它的一种泛称而已。

以上两份“报纸”，或为明人的摘抄本，或作为附录被收入明人的文集，都不是当时报纸的原件。保存至今的惟一一份明代报纸的原件是《急选报》。

这份《急选报》出版于万历八年四月二十二日（即1580年5月5日），距今422年。现存北京国家图书馆。已故明史专家谢国桢教授早在20世纪60年代就曾经对它作过考察，说“盖此即为邸报之一种，草草版刷，以供传阅者”。但并未引起新闻史研究者的注意。直到90年代初，经明代新闻传播史学者尹韵公专文介绍后，才受到广泛重视。

这份《急选报》是用雕版印刷的，长宽为24.6×14.4厘米，作“小本”状，共六页，以黄纸为封面，左上端印有加黑框的报头，内含“急选报”三个大字和“四月份”三个小字。正文部分以“吏部一本急选官员事，奉圣旨，计开”打头，以下分四栏，逐个刊出被选中的162名官员的名单，包括姓名、籍贯和被任命的官职。纸张和印刷的质量都不高，说明是为了抢时间草草印出来的。

这份《急选报》没有注明出版单位和编辑发行人的姓名，但估计很可能是民间报房的产物，是民间报房所出的“邸报”之外的众多的“报儿”中的一种。有可能单独发行，也有可能作为附件随“邸报”一并发行。它的被发现，说明中国至晚在万历八年就已经有了民办的雕版印刷的报纸了。

被保存下来的以上三份“邸报”抄件和民办报纸的原件，虽然还不能反映明代新闻出版事业的全貌，但已经可以帮助我们窥见明代报纸之一斑，加深我们对明代报业的了解。特别是那份《急选报》，由于是全世界现存的最早的自称为“报”的印刷品，并且为我们提供了一份实实在在的明代“报儿”的实物，因此弥足珍贵。

五、明王朝对“邸报”抄传活动的限禁

明代的言论出版之禁历来很严。对新闻传播活动虽然没有专门的法规，但也有很多限制。《明会典》中规定：“若近侍官员漏泄机密重事于人者，斩。常事杖一百”。“若边将报到军情重事而漏泄者，杖一百，徒一年”。“探听抚按题奏副封传报消息者，缉事衙门巡城御史访拿究问，斩首示众”^①。这些禁令都适用于新闻传播活动。

对“邸报”，明代的封建统治者主要抓的是抄传这个环节。《明史·王应熊传》中所说的“故事，奏章非发钞，外人无由知；非奉旨，邸报不许抄传”指的就是这一点。由于臣僚章奏在“邸报”中占有很大的比重，控制了这个环节，也就基本上控制住了“邸报”的内容。

对“邸报”抄传环节的控制，明代各朝的宽严程度并不完全一致。如宪宗成化年间西厂太监汪直掌权时期，主管方面往往以“泄漏机密”为名，诸多约束，对“邸报”抄传活动的控制就比较严。相对而言，万历年间控制的就比较松一些。由于万历皇帝长期不见大臣，不理朝政，大量的章奏被留中不发，科臣们只好把一些未经皇帝阅览批示的章奏直接发抄，曾因此受到禁止，但时禁时弛，并未穷究。天启以后，由于内忧外患严重，明王朝的形势岌岌可危，对抄传环节的控制又明显的加紧。

从保存下来的明代文献资料中可以看出，天启以后各朝禁止在“邸报”上抄传的主要是涉及军事、刑狱和朝廷机密等方面的材料，尤以涉及军事方面的文件限制最多。其结果是“凡涉边事，邸报一概不敢抄传，满城人皆以边事为讳”^②。此外，和皇帝及当权大臣观点相悖，公布出去足以涣散人心、动摇统治者权力地位的材料，也在限制之列。

严厉限制“邸报”抄传活动，使很多章奏都不能发抄，使广大依靠“邸报”获知朝政和国家大事的官员和在野的士绅们耳目闭塞，信息不灵，既封锁了敌人，也封锁了自己。

六、明代的其他新闻传播活动

除了“邸报”和报房出版的各种抄印件外，明代还曾经出现过不少其他的新闻传播媒体。其中，属于官方的有塘报和告示；属于官方体制以外的，则有竹筹、揭帖、旗报和牌报等。

^① 《明会典》卷一六二、卷二一〇。

^② 文秉：《烈皇小识》卷六，163页，上海，神州国光社，1946。

塘报是一种由下到上、由地方向中央逐级汇报军情的文报。是有关军事信息的重要传播工具。塘报这一名称中的塘，带有早和快的意思。塘报因此可以解释为有关军事信息的快报。塘报和“邸报”的相同之处，在于它们都是官方的新闻传播工具。不同之处，在于一个是上行，一个是下行；一个供上级特别是中枢部门参考，一个供臣僚们周知。

塘报的前身，是早在汉宋时代就已经出现的边报。明代的塘报发白塘。塘是负责军事侦察和军文书传送工作的基层军事组织。塘之间的距离约为十里。在塘内服役的士兵称塘兵或铺兵，管理塘兵提辖塘务的军官称提塘或提塘官。明末塘站遍于全国，塘兵们除向上级呈送塘报外，还负责一般官文书和“邸报”的传送工作。

经塘兵探访和下级官员们整理后上报的军事情报，即称塘报。明代的塘报无定期，有时数日一发，有时一日数发。篇幅也无定，时多时少。一切视军情的缓急和内容的多少而定。

塘报传报的内容主要是军事信息。除军情外，个别塘报上还有关于邻国情况的报道。由于塘报在传报军事信息方面具有重要作用，明代的朝野人士对塘报都很重视。负责刺探情况监督文武官员行事的东厂特务们，每天都派人到兵部查看有无新到的塘报。也正因为这样，明末的农民起义军每到一处，都首先“烧驿舍，杀塘卒”，以破坏官方的塘报系统，造成“东西消息中断”^①，使官方信息闭塞，耳目失灵。

告示是一种由上而下、由中央到地方、逐级向公众公布信息的官方的新闻传播载体。有时称榜，有时称为告示。告示的发布单位是中枢部门以下的各级政府机关。皇帝和各级政府长官有时也以个人的名义发布告示。发布的目的，是为了把那些希望庶民们尽快知道的信息及时地直接传播到他们当中去。

告示的内容十分庞杂。包括皇帝及皇室的动态，新制定的各项政策法令，大臣受惩治的情况和重大刑事案件的判决，对百姓们的安抚，以及有关科举考试方面的信息。告示用纸的颜色、纸张的大小、公布的地点，都有一定的规定，不可逾越。其中有一些告示是印刷的。

明代的告示，就其性质来说，是一种以官方名义发布的公报。发布的目的在于维护政体和稳定民心。它能为公众提供一定的信息，因而具有新闻传播媒体的性质。从某种意义来说，它是“邸报”的一个补充。

竹筹、揭帖、旗报和牌报主要流行于明代的农民起义队伍中，是他们的重要

^① 《明史》卷二五二，6520页。

新闻传播手段。

竹筹大约是一种写有各种紧急信息的竹签。万历年间白莲教在畿辅和山东、山西、河南、陕西、四川等地发动起义时曾经使用过。《明史》中就有当时的白莲教领导人“飞竹筹，报机事，一日数百里”的记载。

揭帖的形制近似于近代的小字报或传单。有手写的，也有印刷的。在明末松江地区农民反对当地官僚地主董其昌的斗争中曾经使用过，在明末起义农民反抗官军围剿的斗争中运用得更为灵活。李自成、张献忠发布的谴责明王朝的政治檄文，就有一些是以揭帖的方式传播于社会的。张献忠部每到一处，都用揭帖公布政策，并在揭帖上公布赃官和土豪劣绅的名单，鼓励老百姓对他们提出控诉。张献忠派往敌后进行侦察活动的人员，也经常利用揭帖进行瓦解敌人军心的宣传。例如崇祯十三年（1640年）十一月，明兵部尚书杨嗣昌率兵进驻重庆后，曾散发和张贴大量“招抚谕帖”缉拿张献忠，宣布“有能擒斩者，赏万金，爵通侯”。第二天一早，发现自己住所的大堂、厨房、厕所等地，到处都贴满了张献忠派人张贴的揭帖：“有斩阁部（指杨嗣昌）来者，赏银三钱。”^①杨嗣昌竟因此被吓得精神失常，绝食而死。

旗报渊源于古代的露布。旗报通常由专人扛着，骑在马上，在敌前敌后奔驰传送，供沿途的军民人等阅览。上面除了一般的鼓动口号外，还写有起义军的捷报和文告。在鼓舞士气动摇敌军等方面都起过很大作用。明代驻陕西的三边总督杨鹤在写给皇帝的报告中所说的“贼复欲反，遣人手执红旗二面，大书飞报军情”^②，指的就是这种旗报。

牌报是一种写在木牌上的新闻传播工具。它的形状大小和书写形式没有统一的规定。从现存的明代档案和明史著作中，还可以找到不少有关明末起义农民所发牌报的记载。如：

“知会乡村人民，不必惊惶。如我兵到，俱公平交易，断不淫污抢掠。”^③

这是崇祯十七年三月十六日（1644年4月22日）李自成部起义军自昌平发往北京附近各州县的牌报。

从目前能够找到的有关文献资料看，牌报是由农民起义军的营、镇、各军都督府和大顺政权的地方行政机构等各级军政部门分别发出的。传报的范围遍及陕西、山西、河南、直隶、湖北、江苏等省。牌报的内容十分庞杂，包括起义军的

^① 冯甦：《见闻随笔》卷上；《明史》卷二五二，6518页。

^② 《陕西三边总督杨鹤题为微臣万苦堪事疏》，《杨鹤奏议》卷二四。此疏写于崇祯四年，贼指农民起义军神一魁部。

^③ 计六奇：《明季北略》卷二〇。

战报、政策法令和声讨明王朝的政治檄文。既为读者提供新闻信息，又在他们当中进行宣传鼓动。目的在于通报情况，壮大声势，安定民心，瓦解敌人。在传播有利于自己的信息和对敌斗争方面都曾发挥过很大的作用。

此外，流行于明代社会借以传播信息的载体，还有具有揭发、诋毁、煽情性质的匿名揭帖；以报帖、招子、招牌、榜文、报条形式出现的各种各样的民间广告；刻意创作编造出来的政治歌谣；公开和私自刊印的大量书籍等等。这些载体于散布政治和商业信息之余，也往往表达了一定的民意，起了一定的社会舆情宣泄的作用。

第六节 清代早期和中期的新闻传播活动

一、清代的官报和官方的新闻传播活动

清朝入关后，参考明代官报发行体制，继续在全国范围发行“邸报”。清初的顺治、康熙、雍正三朝的公私文献中，都有不少关于当时“邸报”的记载。清代官报的发布方式、发行渠道和明代的十分接近，即经由通政使司、六科、提塘三个环节。

通政使司是收受臣僚章奏的机关。它的职责据《清史稿·职官志》的记载是：“掌受各省题本，校阅送阅。”^①“邸报”刊发的大量章奏就来源于此。和明代不同的是，清代通政使司的主官通政使，由满汉官员各一人担任。由于通政司的地位重要，担任通政使的官员，特别是其中的满员，历来是皇帝宠信的大臣。《红楼梦》作者曹雪芹的祖父曹寅，就曾经担任过康熙时代的通政使。

六科是发抄皇帝谕旨和臣僚章奏的机关。清初沿明制，六科自为一署，设吏、户、礼、兵、刑、工等六科掌印给事中，每科满汉各一人。雍正以后隶都察院，成为院属机关。它的最主要的任务就是负责谕旨章奏的发抄工作。经由六科发抄的主要是明降谕旨和允许发抄的臣僚章奏，称为科抄。

提塘主要负责官报的抄传发行工作。六科发抄的明降谕旨和应发章奏，是由各驻京提塘官抄录传送到地方的。《历代职官表》卷二一所说的“国朝定制……谕旨及奏疏下阁者，许提塘官誊录事目，传示四方，谓之邸抄”^②，指的就是这一情况。清代没有设置类似宋代上都进奏院那样的统一管理进奏官的专门机构。

清代是皇权高度集中的王朝。官报的抄传发行工作，包括谕旨和臣僚章奏哪

^① 《清史稿》卷一一五，3307页，北京，中华书局，1976。

^② 《历代职官表》为清代永裕等著。引文中的国朝指清朝。

些应发抄，哪些不宜发抄，往往由皇帝作最后决定。一般说来，非明降的谕旨，直接发给地方重臣的“廷寄”，以及未经皇帝审阅批示同意公布的臣僚章奏，是不发抄的。由于呈递上来的章奏很多，能够批红下阁经过六科、提塘以“邸报”方式抄传出去的只是其中较少的一部分，估计不到全部章奏的三分之一。

清代的谕旨和章奏的发抄活动是逐日进行的。官报的发行活动也是逐日进行的。经由提塘传发到各省的官报，有手抄的，也有印刷的。随着发行数量的不断提高，印刷部分的比重也逐渐加大。

清代官报的内容，基本上由宫门抄、上谕、臣僚章奏三部分组成。其中，宫门抄部分主要报道皇帝起居、大臣陛见陛辞以及礼宾祭祀赏赐等朝廷动态消息。臣僚章奏部分只选刊少量折件原文，大部分折件只刊出目录，供阅者参考。所有这些材料，大多来自六科。

清代的官报通常被称为“邸报”，有时也被习惯地别称为邸抄（抄或作钞）、阁抄、科抄、京抄、朝报或京报。几种异称长期并存，互相串用。王士禛《池北偶谈》卷四“朝报”条所说的“今之朝报，或曰邸报”，就是两种称谓相互串用的一个例子。

清代官报的读者主要是各级政府官员。上自中枢大员，下至知府、县令乃至各级衙门中的小吏，都依靠官报获知朝政，了解京内外各方面的信息。一般的平头百姓则与官报无缘。即使能够看到，也往往受到干涉。清初就有禁止“胥役市贩”阅读官报的记载。可见清朝的官报主要在官僚机构内部流通，是为官员们明悉朝政、维护治体服务的。

二、清代的提塘报房和提塘报房出版的小报

清代的提塘分京塘、省塘两种。

京塘指各省设在北京的提塘。长驻北京的提塘共 16 人。这些提塘多为各省的武进士和候选候补守备，由各省负责遴选，由兵部负责管理，和地方及中央政府都保持一定的联系，具有双重领导性质。

在京提塘一般都在自己的寓所设立办事机构，处理日常塘务工作。这些办事机构大多位于北京城南前门大街以西、宣武门大街以东、西河沿以南、南横街以北的这一小片街区内。这里是清代北京经济、文化活动的中心，是会馆、商店、剧场、茶楼、酒肆和书店密集的地方。离负责发抄的六科等政府部门也不算太远。大量的塘务办事机构设在这里，既方便工作，也使这一带逐渐发展成为清代北京新闻传播活动的中心。

京塘的任务主要有以下几项，即：（1）收受和转呈地方上报中央的各类公

文，包括地方政府上报中央各部院的文书和地方大员写给皇帝的奏折；(2)收受和下达中央各部院发给本省的一般公文，皇帝发给本省官员的一般谕旨和赏赐品；(3)发行邸报。协助京塘完成上述文书邸报传递工作的是散处于重要邮路干线上的塘兵。

省塘是指驻在各省省会的提塘。这一部分提塘由兵部在所属车驾司、捷报处两衙门中遴选差官担任，分驻直隶、江南、山东、山西、河南、陕甘、浙江、福建、江西、湖北、湖南、广东、广西、四川、云南等省会及黄河运河沿线，共16人。担任省塘的都是高级武官，专门负责京省之间官文书和官报的传递工作。

在提塘的各项日常工作中，抄传发行官报即“邸报”占有重要的地位。从清初到清末，驻京提塘向基层官员发行“邸报”这一体制没有变化，传发“邸报”始终是驻京各省提塘的一项重要任务。

为了及时处理“邸报”的誊录发行等工作，从清代初年起，就出现了提塘自设的报房。早期的报房是提塘为了便利“邸报”发行工作自行建立起来的，虽然得到官方的默许，但没有被正式批准，直到乾隆年间才取得合法地位。其根据是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议准的以下一项规定：“嗣后令各提塘公设报房。其应抄事件，亲赴六科抄录，刷印转发各省。所有在京各衙门钞报，总由公报房钞发。”^①《清朝会典》也有类似的记载：“各省提塘官设报房，凡钦奉谕旨及题奏等事件，亲赴六科钞录刊刷转发。”^②可见提塘的报房是奉朝廷之命成立的，因而具有官方的性质。但从报房的业务工作相对独立、报房的工作人员并无一官半职、体制上和各省督抚及兵部均无关系、只对提塘个人负责等方面来看，又似乎并非官方机构。说它具有半官方的性质，属于半官方的机构，也许更符合它的实际。提塘所办的这些报房，有时也被称为抄房。

提塘通过报房发行到各省的“邸报”，抄写和印刷两种方式都曾经采用过。清初抄写的比重也许还多一点。雍正、乾隆以后，经提塘及其报房发行到地方的“邸报”，已经大部分是印刷的了。

除发行“邸报”，把六科公开发抄的谕旨章奏和宫门抄之类的朝廷动态消息传报给地方外，清代的提塘官们还曾经发行过一种小报。小报又称小抄，所刊载的主要是提塘官们和提塘报房的工作人员自行采录的消息，目的在为有关省份的官员们提供更多的朝廷消息。

清代的提塘小报，主要见于清初的顺、康、雍、乾四朝。顺治十六年（1659

^① 《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七〇三。

^② 《清朝会典》卷五一。

年)直隶山东河南总督张玄锡在奏疏中所引钦差大臣麻勒吉责怪他的一段话(“前日我们往湖广去时,尔在山东岂不见小报?何为不来迎接?”^①)是有关清初小报的最早的记载。康熙五十三年(1714年)三月左都御史揆叙在奏疏中所说的“近闻各省提塘及刷写报文者,除科钞外,将大小事件采取写录,名曰小报”^②,则说明了这种小报和提塘的关系。小报在清朝初年是公开存在的,并没有被当局视为非法。在一般官员们的心目中,它被视为以科抄为主要内容的正式官报的一种补充。

提塘小报受到当局的注意和限制,起始于康熙末年。当时曾经以上谕的方式禁止小报的发行,但没有效果。直到雍正乾隆两朝一再查处以后,才被完全禁止。

提塘小报之所以受到当局的限制,是因为出现了以下三种情况:(1)先于部文到达地方,泄露了司法机密,影响了对获罪官员的惩处;(2)刊发了严重不实的信息;(3)刊发了未经六科发抄的章奏。

属于第一种情况的典型事例,是雍正五年(1727年)发生的四川按察使程如丝畏罪自杀事件。程如丝因事被参,奉旨著即处斩。部文是雍正五年十月二十九日(12月11日)到达成都的,而刊有程如丝著即处斩的上谕的小抄先于部文五天即十月二十四日(12月6日)即已到达,省城的官员们都已知道,结果还没等部文送到,程就先期自缢而死了。这件事发生后,引起了当局对提塘小报的注意,四川巡抚宪德为此曾上疏雍正,建议“将提塘一项尽行革除”。雍正没有完全采纳,只是强调了一下今后要设法加以防范,“俾紧要事件不至先期漏泄”^③。

属于第二种情况的典型事例,是雍正四年(1726年)发生的报道雍正游园活动失实事件。这一年的五月初五日(6月4日),雍正曾召住在圆明园内的王大臣十余人,在园内勤政殿侧的四宜堂会面,并请他们吃了过节的粽子,“逾时而散”。对这次活动,提塘小报作了如下的报道:“初五日,王大臣等赴圆明园叩节毕,皇上出宫登龙舟,命王大臣等登舟,共数十只,俱作乐,上赐蒲酒,由东海至西海,驾于申时回宫。”^④其中的登舟、作乐、赐酒、游园等细节全属虚构,时间也说得完全不对头,属于严重失实。当时雍正正在和王室内的政敌进行权力斗争,对提塘小报的这一失实报道十分敏感,认为与政敌们的流言构陷有关,立

① 王先谦:《东华录》,顺治十六年六月。

② 蒋良骐:《东华录》,康熙五十三年三月。

③ 《硃批谕旨》,第34册;王先谦:《东华录》,雍正六年二月。

④ 《清世宗实录》卷四四;王先谦:《东华录》,雍正四年五月庚子。

即批交兵刑二部查办，最后以“捏造小抄，刊刻散播，以无为有”^①的罪名，将发行这一小抄的何遇恩、邵南山两人判处斩刑，于同年秋后处决。这是中国新闻史上因办报获罪被杀的有姓名可考的最早的两个人。

属于第三种情况的事例较多。康雍乾三朝都有这方面的禁令，如康熙五十三年（1714年）公布的“各省提塘除传递公文本章并奉旨科抄事件外，其余一应小抄，概行禁止”^②；雍正六年公布的“其虽非密封，但未经御览批发之本章，一概严禁，不许刊刻传播”^③等，都旨在限制这一类小抄即小报的刊布。和第二种情况比较起来，这一种情况的处分似乎轻一点。

对提塘报房所出的小报、小抄，清朝当局并没有采取一律禁止的做法，只是对它们的传报活动加以约束和限制，禁止它们传报未经批发的章奏，禁止它们擅自探听和写录科抄以外的时事政治材料，禁止它们编造不实的报道。其目的在于加强对官报发行工作的控制，堵塞泄漏朝廷机密的渠道，避免不利于统治者的信息得到传播。

清代的康雍乾三朝，是文字狱十分严酷的时代，对提塘报房小报的限禁是在这一历史背景下进行的。这其实也是文字狱的一种。经过康雍乾三朝的严厉查处，提塘报房发行小报的活动基本上被禁绝，这以后，直到清末，已很少看到有关提塘报房小报的记载了。

三、清代的民间报房与京报

清代的民间报房主要集中在北京。早在清代初年，北京城内就有以私人名义从事抄报活动的人。他们多数是衙门中的低级胥吏，本职工作之余，以刊刻抄发邸报作为自己的副业。见于文献记载的顺治年间的书办茅万懋就是其中的一个。顺治十三年（1656年）他因冯应京伪造御批案受到牵连在刑部受审时，曾自称“是刻报营生之人”，并且说他做的是“刻发报生意”^④。可见当时确已有人以刻发报纸为营生。他们所刻发的报纸主要刊载一般的谕旨和章奏，因而也被混称为“邸报”，但显然带有一定的私营性质，并非官报。他们的办报活动是清代民间报房活动的先声。

由于雍正和乾隆初年都曾禁止胥役市贩买阅“邸报”和私抄“邸报”，获准

① 《清世宗实录》卷四四。

② 蒋良骥：《东华录》，康熙五十三年三月。

③ 《大清会典事例》卷一〇一七。

④ 转引自苏同炳：《伪造邸报——记明清两代新闻史特出事件》，载《中央日报》（台北），1969-04-10、1969-04-11。

公开发行“邸报”的仅限于提塘及其所设报房，因此清代民间报房的出现和盛行，很可能是乾隆中叶以后的事情。保存下来的清代民间报房的报纸均出于乾隆中叶以后，也证明了这一点。

清代的民间报房是怎么诞生和发展起来的？目前还有不同的说法。其中一种说法认为是从提塘报房中分离出来的。由提塘及其所设报房垄断“邸报”的抄录刊刻发行活动，到一部分人分离出来，以刻报为营生，进而设立自办的报房，刊刻抄报，这也许就是清代民间报房诞生的历史轨迹。

根据有关方面的记载和保存至今的实物，清代的民间报房以公慎堂为最早。国内收藏家收藏的乾隆三十五年（1770年）的邸报和日本国会图书馆收藏的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至嘉庆六年（1801年）的邸报，都是这家报房出版的。乾隆三十五年至嘉庆六年恰为30年，说明这家报房至少有30年以上的历史，是乾嘉时代最有影响的一家报房。这以后直到清末，见于记载和有原报可查的北京民间报房不下十余家。它们的名号是聚兴、聚升、合成、杜记、集文、同顺、天华、公兴、聚恒、洪兴、永兴、同文、信义、连升等。其中以聚兴、公兴两家开业最早，都创于咸丰年间。两家报房中又以聚兴报房的历史为最长。从乾嘉到光宣，各时期的报房数量时有消长。多的时候有五六家，少的时候只剩下两三家。它们之间还有类似明代抄报行那样的行业组织，共同维护同业的利益，协调同业间经营管理和资源分配等方面的一些问题。大部分报房都设在正阳门外大街西侧的一些小胡同里，如同顺报房在百顺胡同，聚兴报房在铁老鹳庙胡同（今铁鸟胡同）。以设在铁老鹳庙胡同附近的为最多。铁老鹳庙那一带因此成为清末民间报房报纸发行活动的中心。

北京民间报房所出的报纸，通称京报。这些报房因而也被称为京报房。它们所出的京报，在部分读者中有时也被混称为邸抄或邸报。

早期民间报房所出报纸，一般没有报头，没有封面，每天一期，每期一册，每册4至10页不等，每页长宽约为24×18厘米，每册的第一页和最后一页都印有报房的堂名。同治以后各朝民间报房所出的报纸，在形式上有了明显变化。其一，是普遍加上了封面，大部分封面使用黄色连史纸，因而被称为黄皮京报。其二，是普遍有了报头。报头通常为“京报”两个字。用木戳蘸上红色的颜料，盖在封面的左上角，非常醒目。封面的右下角则通常盖有□□报房的名戳，也用红色颜料，同样很醒目。也有一些报房的京报不用黄纸，改用白纸做封面，上面加印“一品当朝”、“天官赐福”等各种红色的图案，也很醒目。

民间报房所出的京报，自乾隆以后，基本上都是印刷的。其中一部分用活字印刷，一部分用泥版印刷。用活字印刷的也不完全一样，有用木活字的，也有用

胶泥活字的。光绪末年以后才陆续开始采用铅印。报房出版的这些京报全部为竖排，每期的页数和字数不等，多的时候可以达到十几页三五千字，少的时候也许只有三五页千把字。

京报的内容基本上是宫门抄、皇帝谕旨和臣僚章奏三大部分。

宫门抄部分所发表的主要是当天上午或前一天的朝廷重大政事活动。包括皇帝召见某官、某王公、某贝勒、某贝子，官员们觐见、请安、请假、请训、奏事、销差、谢恩、谢赏，各部门奏事，皇帝参加的祭祀、出巡、驻园、出宫、还宫，以及某衙门值日，某日起换季换穿衣帽，早年得雨几寸，各旗派员看箭等等。内容庞杂，但文字极为简略。基本上是一句话新闻。

上谕部分主要照发皇帝的某些谕旨。以任免、申斥、褒奖、赏赐之类的居多。发表在这一部分的主要是单发的谕旨。批在臣僚章奏后面的谕旨则一般仍放在章奏后面，随章奏一道发表。

章奏部分所发表的主要是京内外官员们的题奏。这些题奏都是经过皇帝同意后下阁发抄的，只是全部题奏中的很少一部分。章奏后面的皇帝批示也照登不误。多数章奏都在一期内刊完。内容较重要篇幅又较长的，有时也会刊于两期，未完的部分，在稿末加注“此稿未完”等四个字，以资识别。

除上述三部分外，京报上偶尔还刊登过文选单、武选单、鼎甲单和朝审犯人勾到单之类的稿件，为读者提供铨叙、科举和司法等方面的信息。

京报的全部稿件都来自内阁和科抄，没有报房自己采写的新闻，也没有任何评论。编辑工作很简单，把收到的宫门抄、上谕、章奏大体分一下类，照发就行了。无须标点，也不加任何标题。各报房所出的京报因而大同小异。所异的，仅在上谕和章奏的选择上。选哪些，不选哪些，各报房不尽一致，因而各家报房京报的内容稍稍有所不同。这也是那么多的报房京报能够并存的一个原因。

在近代化报纸产生以前，民间报房出版的这种京报，是臣民们获知朝政和国家大事的主要消息来源。读者可以从京报所提供的宫门抄、上谕、臣僚章奏和皇帝的批示中，寻找自己所需要的、所关心的和感兴趣的各种信息。

报房出版京报，旨在赢利。报费是他们的主要进项。每月的报费，在以手抄为主的时期，约为一两二钱。实行大量刻印以后，每月报费仅需两钱，后来又调整为300文，即每份10文。各家报房京报的总发行数字，手抄时期大约只有数百本。实行刻印以后数量激增，最多的时候估计能达到一万份左右。京报出版后，即由各报房雇用的送报人直接送给订户。从事这项工作的多为山东人，这与早期的报房多为山东人创办有关。全行业职工的总人数约二百人。城内的订户，通常在上午10时左右就能收到前一天印好的报纸。外地的读者，视路途的远近，

大约要几天乃至一个多月才能收到。

报房京报的读者，在清代的早期和中期，绝大部分是朝野的官绅和士大夫知识分子。市井小民中订阅京报的只是少数。

清代早期和中期的民间报房，是从一部分提塘报房中分离出来的。开始和提塘及其报房还有一定的牵连，后来逐渐脱离关系，成为完全独立的民间自设的报房和纯粹民营的“私家报纸”。在经营的过程中，它的商品化程度不断提高，但是内容没有多大变化，和提塘传发的那些官报没有太大的区别，基本上是官报的翻版。在运作过程中，它们严格自律，严格遵守当局的禁令，不越雷池一步。这也是清朝当局对它们的出版采取宽容的态度、没有加以限制的一个原因。

四、清代的地方新闻传播活动和辕门抄

在清代的地方新闻传播活动中，各地的提塘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清代各省的提塘通称省塘，驻地在各省的省会。除省会外，省内的一些大的州府如江苏的江宁、苏州、松江等，也都设有府一级的提塘。这两部分提塘，在兵部和地方抚宪的双重领导下，负责辖区内的塘务工作，是官报在当地发行工作的主要承担者。

各省的提塘，除按规定向各衙门发送官文书和官报外，也在省会内就地设立报房，翻印京报向当地的官绅出售。北京和上海的一些大图书馆内，至今还收藏有河南、四川、湖北、江西等省提塘自设报房或塘报局所出的这类京报。这些翻印的京报公开出售，带有一定的营业性质，已不同于政府机构内部发行的官报。其母本，最初是各省提塘从北京发来的官报。道光咸丰以后，多数改用民间信局从北京附近的良乡发出的京报。后一种京报，比经由塘务系统下达的京报传递速度快，比北京报人直接送阅的京报发行面广，因而曾经风行一时，被称为良乡报。光绪年间上海《申报》在社论中云：“道咸之间，有所谓良乡报者，盖有信局特设于顺天之良乡，例发之京报出京后，由良按站雇人接递，省中官宪自出资以购之，而塘饷或裁或减各省不同，要之恶其迟延以示惩罚耳。然良乡报价贵，不易得阅，至有月需三五千钱者，于是省中之提塘又买良乡报而翻印售卖矣。”^①这是对这种报纸出版发行情况的较为详尽的介绍。

除提塘外，地方各省会从清初起，就有一些人以个人名义从事新闻传播活动。乾隆三十九年十二月（1775年1月）江苏巡抚萨载在奏折中提到的“卖新闻人杨世荣”和“刊卖告示及捏写谕旨报单之人”胡老八、王添盛等，就属于这

^① 《论京报贵速不贵迟》，载《申报》，1882-03-04。

一类人。^① 其中的杨世荣活动于安徽的安庆府，胡、王等人活动于江苏的江宁、上元两县。这一部分人有自己的本职工作，抄日报只是他们的一项副业。另外也有一些人，则可能以此为主要的谋生手段。北京以外各地出现的报房，如天津城内的“永济”、“福兴公”、“协成信”、“义兴”、“福昌”、“天顺”等报房，很可能就是由这些人创办起来的。

在地方报房和“抄日报”人所办的各类报纸中，最受官绅们注意的是辕门抄。辕门抄是一种以报道地方官场消息为主的非官方的报纸，出版于各省省和一些重要的府城，由熟悉当地官场情况的抄报人和报房采写编印发行。

各地辕门抄的出版情况大同小异，广州地区的情况，据美国传教士裨治文在一篇文章中的描述是：“蜡板，单面印刷，字迹模糊，每日出版一张。刊载内容无需政府检查。每日黄昏时节，报房派员至督抚衙门，向值班的执事人取得辕门抄，内中列述当日总督大人接见宾客及拜会活动。翌日清晨辕门抄便行出版。”^② 其他各省会所出的辕门抄也大同小异。以苏州出版的一种最为典型。这种辕门抄每两三天或四五天才出一期，每期一个单页，用连史纸木活字印刷。纸高23厘米，纸宽自20厘米至70余厘米不等，以每期篇幅的多少为定。直行竖排，每行24个字。篇幅少的一期仅15行，约360字；篇幅多的一期可达50余行，约1200字。末署出版人的姓名，出版人自编的期号和报房的堂号。但无报头及年号。内容包括上谕、江藩牌示和出版者自行采写的官场消息。上谕部分所占比重极小，也不是每期都有，主要是人事任免之类的谕旨。江藩牌示部分，一般照发牌示的原文，内容主要是省内官员们的差委任免。官场消息部分比较庞杂，包括省内官员们的请假、转假、销假、禀到、辞行、就医、丁忧、起复，某某官衔命到某地公干，中枢或外省某某长官因公或因私抵达省内某地，省籍京官的升黜，省内候补官员的月考期，以及预告某某官员及某某官太太们的寿辰等各方面的消息。有一些消息很明显是抄报人从有关方面采访得来的。面有关官员和官太太们寿辰的消息，则既有抄报人探访得来的，也有那些官员们主动提供的。

类似上述广州、苏州两地辕门抄一类的报纸，其他各省的省会也有，它们和在当地的京报相配合，一个提供中央信息，一个提供地方信息，成为当地官绅了解政情的两个重要渠道。

除翻印京报和出版辕门抄外，清代中叶以后，在一些城市还曾经出现过一些

^① 参见乾隆三十九年十二月江苏巡抚萨载奏折，转引自朱传誉：《清代压迫舆论研究》，载《报学》（台北），第5卷，第7期。

^② 转引自潘贤模：《清初的舆论与抄报》，载《新闻研究资料》，第8辑，北京，新华出版社，1981。

随时出版的单页小报。这类小报没有报名，没有标题，没有固定的刊期，内容往往是政治、军事方面的突发性新闻和有关地震、水旱等自然灾害方面的消息。一事一报，印成单页后公开发售，其中一些还配有插图。这类小报为读者提供了不少信息，有较强的新闻性，虽然还没有定期出版，还不完全具备报纸的条件，但已突破了旧式官报的模式和京报、辕门抄一类报纸垄断当时报业的格局，受到了读者的欢迎。

五、清代早期和中期的其他传播活动

除利用官报外，清朝的封建统治者还广泛地使用过榜、帖示、告示等传播媒介来发布官方消息。《海东逸史》一书中提到过“南郡亡，北兵至杭……北帅使人以榜至。颢执之，焚其榜”^①。《明季北略》中提到的“（多铎于各城门帖示云）剃头一事，本国相沿成俗，今大兵所到，剃武不剃文，剃兵不剃民，尔等毋得不遵法度，自行剃之……特示”^②。这些都是有关榜和告示的记载。说明这些传播媒介从清军入关初期起就曾经被广泛使用。从顺治五年所颁上谕中提到的命内三院将降将姜瓖之罪“刊刻告示，晓谕山西各处”^③，光绪年间所颁上谕中提到的命各省将民欠钱粮征收办法“刊刻誊黄遍行晓谕，城乡村镇，咸使闻之”^④等情节，可以了解到不少官方的告示也是以印刷的方式大量发布的。这些都是报纸之外的面向普通百姓的官方传播媒介。

这一时期的民间报房，除出版发行京报外，也附带出版和发售一些其他的出版物。其中，有的是以传播新闻信息为主的，如《谕折汇存》、《阁钞汇编》、《上谕奏折》、《邸报全览》、《邸抄汇编》、《时事采新汇编》等，内容大多取材于京报，是报房京报的汇总和延伸。有的则是以传播文学艺术信息为主的，如以单册的形式出版的唱本和小说等。

此外，由于传统的雕版和活版印刷技术的发展，清初到清中叶这一段时期的书籍、年画、历书、商业传单、商品包装纸等出版印刷品，作为文化和经济信息的载体，也大量问世，为清代中叶以后商品广告的发展作了铺垫。

中国古代的“邸报”有1200年左右的历史，“小报”有近千年的历史，民间报房出版的邸抄、京报有近400年的历史。它们从诞生到结束，持续的时间都不

① 海东逸老：《海东逸史》卷一八，《遭民传于颢》。

② 计六奇：《明季北略》卷九。

③ 史松：《清史编年》，第1卷，210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5。

④ 《上谕恭录》，载《申报》，1884-09-30。

算短，但从形式到内容都没有多大变化。它们之所以发展缓慢，固然受封建君主专制制度的影响，但最根本的原因还在于封建自然经济这一基础的制约。鸦片战争爆发以后，中国的封建自然经济瓦解，封建政府的闭关锁国政策被迫取消，已存在1 200年的中国古代报纸才逐渐地为近代化的新型报纸所取代，从而退出了历史舞台，宣告了自己的终结。

【学习思考题】

1. 中国的新闻传播事业起始于什么时代？中国的古代报纸是怎么诞生的？
2. 前报纸时代的中国新闻传播活动都有哪些特点？
3. 唐代官报的编辑发行工作通过哪些环节？由哪些部门负责？
4. “开元杂报”和“敦煌进奏院状”的性质如何？为什么称它们是中国最早的报纸？
5. 宋代“邸报”的发行制度有哪些特点？进奏官在“邸报”编发工作中处于什么样的地位？
6. 宋代“小报”具有哪些特点？为什么屡禁不绝？
7. 明代官报的发行制度和宋代比较起来有哪些不同？
8. “急选报”和“天变邸钞”是一种什么性质的新闻传播媒体？
9. 清代官报的发行制度有哪些特点？
10. 清代的提塘、提塘报房和民间报房之间的关系如何？为什么说报房办的“京报”不是政府官报？



第二章

中国近代报刊的产生与初步发展

第一节 中国近代报业的开端

一、《察世俗每月统记传》的创办及其时代背景

18 世纪 60 年代后，英国随着对华贸易量的日益增长，因而比其他国家更迫切地企图中华帝国打开紧闭的大门，曾多次向清政府提出放宽限制、扩大贸易交流等要求。为了打破清政府闭关自守的局面，抢占广阔的中国市场，英国率先采用传教、办学、行医以及出版书报等方法进行文化和意识形态的渗透，以配合其经济侵略。

1807 年，英国传教士罗伯特·马礼逊（Robert Morrison，1782—1834）向其所属的英国海外传教组织伦敦布道会（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提出去中国传教的请求。马礼逊来华之初，倾其全力学习中文，在不到三年的时间内，就学会了一口流利的中国官话和粤语。在传教过程中，马礼逊还发现，中国地方大、方言多，而文字则是统一的，因而印刷品宣传比口头宣传更易于为各地民众所接受，出版书刊是在华传教的一个好方式。而且，中国人当时对外国教士怀有敌意，很难直接作口头宣传，而散发中文书刊则比较方便一些。但是，马礼逊出版传教书刊的设想有悖中国封建政府的文化政策。当时，清政府严禁外国人在中国

境内从事传教及出版活动。1810年，清嘉庆皇帝发布谕旨：“如有洋人秘密印刷书籍，或设立传教机关，希图惑众，及有满汉人等受洋人委派传扬其教，及改称名字，扰乱治安者，应严为防范，为首者立斩。”^①因此，马礼逊在完成了翻译《圣经》、编纂《华英辞典》以及编写宣传基督教义的小册子等任务后，不得不冒着杀头的危险，以重金诱使蔡高、梁发（又名梁亚发）等中国刻工印刷《圣经新约》和其他宣传教义的小册子。

1813年，正当马礼逊的传教活动取得一定进展的时候，英国伦敦布道会又派来了一位名叫威廉·米怜（William Milne, 1785—1822）的年轻传教士，协助马礼逊从事传教工作。米怜于7月3日抵达澳门，1814年初受马礼逊委派去南洋群岛华人聚居地散发中文《新约》等传教小册子，受到了当地官绅的礼遇。经过8个月的考察，米怜向马礼逊建议将出版基地设在马来半岛的马六甲（Malacca），因为马六甲与中国很近，周围地区居住着大量华人，和广州往来方便，将中文宣传品从马六甲运到中国并非难事，荷兰殖民当局又十分支持基督教在当地的传教活动。在得到马礼逊的同意后，米怜于1815年重返马六甲，创建近代出版机构英华书院以及印刷所，并在此基础上办起了一份中文月刊，作为他传教的主要工具。这份中文月刊，就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份近代化报刊《察世俗每月统记传》（Chinese Monthly Magazine），1815年8月5日在马六甲正式创刊。《察世俗每月统记传》的创办，揭开了近代中国新闻事业发展史的第一页。米怜作为该刊的创办人，自创刊后一直担任主编。英国传教士麦都思（Walter Henry Medhurst, 1796—1856）为主要撰稿人，并一度代理过主编职务。中国刻工梁发是米怜办报的主要助手，后受洗入教，成为最早的中国籍传教士。

《察世俗每月统记传》每月出版一期，每期5页，每面8行，每行20字，木刻竹纸印，全年合订一卷，还印有全年目录、序文和封面，便于读者保存。文句右旁有圈点，并有木刻插图。封面正中标报名，左下角署有“博爱者纂”（“博爱者”是米怜的笔名）。该刊月印500册，3年后增至1000册，最高发行数字达2000册，为非卖品，主要在东南亚华侨居住地区散发，每逢广东省县府乡试时还被运回国内与宗教书籍一起分送。

作为一份宗教宣传性质的期刊，《察世俗每月统记传》以“阐发基督教义为根本要务”，先后共发表文章244篇，其中直接宣传教义的206篇，占总数的84.5%，关于科学文化方面的文章29篇，占11.9%，有关办义务学校、办济

^① 转引自麦洁恩：《中华最早的布道者梁发》，载《近代史资料》，1979（2），147页，北京，中华书局，1979。

困会等告白、章程共9篇，占3.6%。即使是那些举办善事和介绍天文、地理、医学以及其他文化方面知识的文章，大多也与传教有关，目的也都是为了宣扬上帝的全德全能。但也有一些宣传西方文化与近代科技知识的文字，如介绍蒸汽机、农业技术、急救方法等。这些介绍，确为当时中国社会所需要，也有助于改变中国人对西方文化的看法。至于时事政治问题，《察世俗每月统记传》的前5卷概未涉及，自第6卷起，始增设《全地各国纪略》栏目，简要介绍世界各国概况，同时发表时事评论性文章，如评价法国大革命、支持波旁王朝等。有的文章还提出涉及发展中英贸易乃至鸦片贸易等现实问题。关于新闻报道方面的内容则更少，除了一篇预报性新闻《月食》外，还有一篇记述清道光元年四月初九日（1821年5月10日）出现在马六甲东街蚶地区祭祀痘娘娘活动的报道，并以西方宗教的观点对这一东方巫术作了批评。值得一提的是，这篇文章还附有一幅插图《事痘娘娘悬人环运图》，把当时祭祀痘神时银钩吊人回旋转动的场面形象地记录下来。这幅插图是我国报刊史上最早发表的新闻图画。后期《察世俗每月统记传》还辟有《儿童页》，其中一部分文字为英华书院的中国学生所写。

在宣传策略上，《察世俗每月统记传》处处“附会儒学”，将基督教义与孔孟之道相比附，每期封面上必印有孔子语录一行：“子曰：多闻，择其善者而从之。”为了适合中国人的阅读习惯，《察世俗每月统记传》采用中国书本式，雕版印刷，形状就像一本中国线装书。

1821年12月，《察世俗每月统记传》因主编米怜病重无力主持编务而停刊，共出7卷70多期，累计574页。翌年6月2日，米怜在马六甲去世，年仅37岁。

《察世俗每月统记传》终刊后，正在巴达维亚（Batavia，今雅加达）设立布道中心从事传教活动的英国传教士麦都思，决心继承米怜开创的事业，于1823年7月在巴达维亚创办起《特选撮要每月纪传》并自任主编。该刊每月一期，每年一卷，每期8页，木刻竹纸印，内容为宗教、时事、历史及杂俎等。《特选撮要每月纪传》出至1826年停刊，共出四卷。

1828年，英国伦敦布道会系统出版的第三份中文月刊《天下新闻》（Universal Gazette）在马六甲创刊，主持该刊编务的是该布道会传教士纪德（Samuel Kidd, 1799—1843）。该刊用白报纸活版印刷，虽然是一份宗教性刊物，但其内容包括中外新闻、科学、历史和宗教等各个方面，并以欧洲和中国的新闻报道居多，宗教与道德方面的文章已退居次要地位。这一点，似与《天下新闻》由两名英国商人资助出版的背景不无关系。1829年，《天下新闻》停刊。

在1827至1828年间，还有一份中、英文对照的报刊《依泾杂说》在当时为

葡萄牙所占据的澳门出版。该刊创刊于1827年，木版刻印，由葡萄牙人罗主办。因掲載官府陋规，为清政府所严禁。

二、《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及其他宗教性中文报刊

1833年后，外国传教士创办的近代中文报刊闯进了中国的国门，将外国传教士在中国的办报活动推向了一个新的阶段。

1833年8月1日，《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①（Eastern Western Monthly Magazine）在广州创刊，是为在中国境内出版的第一份近代中文报刊。该刊虽是一份宗教性报刊，但其所刊载的内容已包括宗教、政治、经济、科学文化知识、新闻和杂俎等各个方面，并以时事政治为主，宗教已退居次要地位，不再刊载解释教义的专文，言论主要用来宣传中外人士之间的行为准则，如中国人不要称外国人为“蛮夷”，中国人和外国人做生意要公平、诚实，中国应学习各国的长处等等。在科学文化知识的引进上，《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除了介绍西方的情况之外，还大量介绍东南亚各国和印度的情况，旨在打破中国人闭关自守的观念，美化英国殖民统治。就新闻信息的传播而言，《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每期必有一定数量的新闻，绝大部分译自外报，少数为广州、澳门的地方新闻，后期也摘录一些《京报》上的材料。1834年1月，《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发表《新闻纸略论》一文，全长331字，叙述了报纸的起源、新闻自由和当前西方一些国家的报纸出版情形。这是我国中文报刊上刊载的第一篇新闻学专文。《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还比较重视贸易活动，后期曾多次刊登中外贸易进出口的物价表。在编辑业务上，《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文字通俗、文风简短，长文分期连载，每期还刊有目录以便于阅读，栏目也比较固定。在宣传策略上，《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也注意附会儒学，尽可能与中国传统文化相吻合。每期约十二三页，楷书木刻，连史纸印，中国线装书本形式。封面上也印有中国传统格言，多录自四书，如创刊号上印的格言是“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左下角注有“爱汉者纂”四字。但是，该刊虽然打算以中国读者为对象，在当时仍“甚少华人出资订购”。

《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的创办人和主编是普鲁士传教士郭士立（一译郭实腊，Karl Friedrich August Gutzlaff，1803—1851），因而有“郭士立的杂志”之称。郭士立最初受荷兰布道会派遣于1824年到暹罗传教，曾多次在中国沿海各地游历，后脱离了荷兰布道会，与英国传教士、商人和外交官建立了联系，并在

^① 刊名《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有时标作《东西洋考每月统纪传》，其中的“记”字标作“纪”字。

1831年间来到中国。郭士立不仅精通中文，能讲普通话及闽粤方言，还十分了解中国传统文化与习俗，他创办《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旨在宣扬西方文化的优越，征服中国人骄傲自大的排外心理。郭士立曾说：“这个月刊是为维护广州和澳门的外国公众的利益而开办的。它的出版意图，就是要使中国人认识我们的工艺、科学和道义，从而清除他们那种高傲和排外观念。刊物不必谈论政治，也不要任何方面使用粗鲁的语言去激怒他们。这里有一个较为巧妙的表明我们并非‘蛮夷’的途径，这就是编者采用摆事实的方法，让中国人确信，他们需要向我们学习的东西还是很多的。”^① 值得深思的是，在清朝政府三令五申严禁洋人秘密印刷书籍的情况下，《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居然能在广州公开出版两年之久而未遭查禁，不能不令人感叹清朝政府官员的腐败和郭士立的奸猾。

《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创刊号原印600份，后再版300份，出版12期后暂时停刊，已出的各期刊物由“在华实用知识传播会”并为2卷，重印1000册，在新加坡、马六甲、巴达维亚、槟榔屿等华侨聚居地区广为发行。1835年2月，《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在广州复刊，但出版6期后再度停刊，1837年2月后改由“在华实用知识传播会”（The Society for the Diffusion of Useful Knowledge）接办，由郭士立、小马礼逊（John Robert Morrison）等主编，在广州编辑后寄至新加坡，由在新加坡的麦都思交付印刷发行。1838年10月，《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停刊。

紧接着《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之后，《各国消息》于1838年10月在广州创刊。该刊也是一份中文月刊，每期3至8页不等，连史纸石印，创办人和主编为麦都思，助理编辑为麦都思的女婿奚礼尔（Charles Batlen Hillier, ?—1856）。该刊的办报方针和内容同《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基本相似，只是宗教性的内容已不复存在，主要刊登各国和广州新闻，以及航运消息、物价行情等。但是，该刊刊载的各国新闻并非真正的新闻，实为各国的历史、地理知识的介绍，其本意是改变中国人思想闭塞状况和宣扬英国统治殖民地的威力与德政。1839年5月中英关系紧张，《各国消息》也随之停刊，最多出过8期，目前仅见第1、第2期。

综上所述，自1815年后外国传教士在中国境内和南洋出版的中文报刊共6种，出版时间最长的是6年，即《察世俗每月统记传》；在中国境内出版的中文报刊时间最长的是2年，即《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这些报刊，本质上都是宗教性报刊，其创办人都与伦敦布道会有一定关系，其基本内容一是阐发教义，二

^① 转引自宁树藩：《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评述》，载《新闻大学》，1982（5）。

是宣传西方文化。后随着社会形势的变化，这些报刊的宗教色彩渐趋淡薄，而政治、经济色彩则日益浓厚。特别是对新闻信息传播的日益重视，使这些报刊的新闻传播性质日益凸现。

三、《蜜蜂华报》等外文报刊的出版

在外国人运用出版中文书报的方法对中国进行文化和意识形态的渗透之时，他们还创办起了一批外文报刊，作为其交流信息、观点的工具。这些外文报刊，其种数、出版时间和规模都远远超过同期出版的中文报刊。截至1839年，外国人在中国境内出版的外文报刊有17种左右，出版时间有的长达十几年或二十年之久，但出版地点则局限于澳门与广州两地。

澳门是最先出现外文报刊的中国领土。1822年9月12日，葡萄牙文周刊《蜜蜂华报》(A Abelha da China)创刊，为澳门出版的、也是中国境内出版的第一家外文报纸。该报是当时的葡萄牙执政党在澳门创办的政府机关报，1823年12月26日，由于葡萄牙执政党被推翻而被查封，仅出版了一年多时间。

1824年1月3日，第二份葡萄牙文报纸《澳门报》(Gazeta de Macao，一译《澳门钞报》)问世，以宣传葡萄牙国内保守派的主张为主要内容，1826年12月因财政问题而停刊。

19世纪30年代后，葡文报刊在澳门成批出现。如《澳门钞报》(Chronica de Macao，又译《澳门编年报》)、《帝国澳门人》(O Macaista Imperial)、《真爱国者》(O Verdadiers Patrial)、《澳门政府公报》(The Boletim Official de Governo de Macao)等，共有8种。这些葡文报刊，由于澳门当局的专制政治和葡国内部党争激烈，再加上经济上的困难，因而出版时间大多很短。它们所报道的内容，也大多是葡萄牙本国和澳门问题，对中国事务很少有兴趣，因而对中国社会的影响不大。鸦片战争爆发后，这些葡文报刊一般都持中立态度，但也有少数持亲华立场。

这一时期，对中国社会产生重大影响的外文报刊，则是英、美等国人士在广州等地出版的英文报刊。

19世纪20年代后期，英文报刊首先在广州问世。1827年11月8日，第一份英文报纸《广州纪录报》(Canton Register，又译作《广东纪事报》)创刊，双周刊，第2期起改名为“The Canton Register”，中文译名不变，1834年后改为周刊，逢星期四出版。该报由英国鸦片商马地臣(James Matheson，1796—1878)出资创办，美国商人伍德(William. W. Wood)为第一任编辑，撰稿人有马礼逊、施赖德(John Slade)等。不久后，伍德因与马地臣意见不合而离去，

改由马地臣和马礼逊担任编辑。《广州纪录报》是一张商业性报纸，货价行情、航运消息占主要篇幅，1833年还出版过广告商情附刊《广州行情周报》（Canton General Price Current，一译《广州市价表》），但也广泛刊登政治时事新闻和评论，有强烈的政治色彩。由于对中国问题十分关心，因而《广州纪录报》上关于中国的新闻和材料占相当多的篇幅。曾竭力为鸦片贸易辩护，攻击中国官员对外国人傲慢无礼、无视外商利益，主张英国政府对中国持强硬政策。该报在当时影响很大，读者远及南洋、印度及英美一些主要商埠，自1835年起还开始接受华人订户。

进入30年代后，英文报刊在广州大批创刊，不仅英国人继续在华办报，美国人也开始加入了办报的行列。其中英国人创办的报刊主要有《广州杂志》（The Canton Miscellany）、《广州周报》（Canton Press）等。《广州杂志》创刊于1831年，月刊，东印度公司主办，由该公司澳门印刷厂承印，仅出版了5期即告停刊。《广州周报》创刊于1835年9月12日，周刊，每星期六发行，篇幅较《广州纪录报》为多，为另一家颇有影响的英文报纸。该刊为反对东印度公司垄断对华贸易的英国自由贸易派商人所主办，在经济上受到颠地洋行的支持，曾不断对东印度公司进行抨击，并与亲东印度公司的《广州纪录报》展开过激烈的争论。但是，该报在鸦片贸易等问题上与《广州纪录报》并无二致，对中国问题的关注甚至超过前者，林则徐在禁烟运动期间组织翻译的“澳门新闻纸”，其内容大多译自《广州周报》。

美国人在广州创办的报刊，主要有《中国差报与广州钞报》（Chinese Courier and Canton Gazette）、《中国丛报》（Chinese Repository，一译《中国文库》）等。《中国差报与广州钞报》是美国人在华创办的第一份报纸，于1831年7月28日创刊，美国商人伍德创办并任编辑。1832年4月14日改用简称《中国差报》（Chinese Courier）出版，1833年10月停刊。《中国丛报》创刊于1835年5月，英文月刊，由美国第一个来华的传教士裨治文（Elijah Coleman Bridgman，1801—1861）创办并担任第一任主编，参加编辑和撰稿工作的有美国人巴驾（Peter Park）、卫三畏（S. W. Williams）以及郭士立、马礼逊等。《中国丛报》还得到了西方在华各界人士的通力合作，“广州基督教联合会”予以资助，在广州的美国巨商奥立芬（D. W. C. Olyphant，？—1851）免费提供一座楼房供该报编辑和印刷之用。尽管美国公理会指示裨治文把在中国人中间推广福音为首要任务，但该报却以提供“有关中国及其邻邦最可靠、最有价值的情报”为宗旨，内容“多为英人在华的商务报告，对于中国文字及华人生活，有极精密之研

究”^①，大量地、详尽地报道与评述中国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外交、地理、历史、风俗等各方面的情况，甚至连中国官员贪赃枉法的手法、道光皇帝懦弱的性格也都在其报道与评述之列，有关宗教的文章很少。此外，还报道西方传教士、商人在中国和亚洲其他地方活动的情况，经常讨论对华政策问题，甚至提供奖金。为了引起讨论，该刊也发表一些不同意见，但其一贯的舆论导向，则是鼓吹对中国采取强硬手段乃至鼓吹武力侵华。该刊的撰稿人都是些文化素养和社会地位较高的在华西方人士，因而其舆论颇为西方社会所重视，对英国和美国政府的决策有明显影响。由于该刊所刊载的资料十分丰富，因而至今仍为中外学术界所高度重视。该刊每期约 50 页，销数最高时为 1 000 册以上。

除广州外，英文报刊还在澳门纷纷创刊。1828 年，澳门的第一份英文报刊《澳门杂文编》（The Evangelist and Misellanea Sinica）创刊，由亚本印刷厂用刚从英国运来的平版印刷机承印，是我国继《广州纪录报》后的第二份英文报刊。该刊是英国传教士马礼逊（Robert Morrison）创办的宗教性英文周刊，每期还刊有一篇中英文对照的短稿，以外籍基督教新教传教士为读者对象。该刊仅出 4 期即因含有反对天主教（葡萄牙国教）的成分而被葡萄牙当局查封。1839 年中英关系紧张、战争一触即发之时，在广州出版的外报向澳门迁移。1839 年 5 月，英文《中国丛报》自广州迁至澳门出版。接着，《广州纪录报》和《广州周报》在英国商务监督义律（C. Elliot）拒绝缴烟、下令所有英商撤离广州声中，也先后从广州迁至澳门出版，对中国政府的禁烟措施持敌对立场。《广州周报》还增出商情附刊《商品市价表》（Commercial Price Current）。鸦片战争爆发后，《中国丛报》销数顿减。鸦片战争结束后，《中国丛报》、《广州纪录报》先后迁香港出版，《广州周报》则在澳门出版到 1844 年 3 月停刊。

作为外国侵略者的舆论工具，这些在中国出版的外文报刊，一般都以提供情报和新闻信息为主。但是，就其新闻业务而言，采、写、编、评各方面的水平都较高，达到了当时出版的近代报刊应具有的水准。

第二节 鸦片战争后香港报业的兴起 与商业性报纸的崛起

一、英文商业报纸的纷纷出版

1841 年 1 月，清钦差大臣琦善擅自与英军议订《穿鼻草约》，香港为英国侵

^① 戈公振：《中国报学史》，70 页，北京，中国新闻出版社，1985。

略者所占据。此后，由于大量英国移民涌入香港，使该地区的外国侨民跃居全国首位，为报刊发展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因此，鸦片战争后，香港报业率先勃兴，并成为外国人在华办报的第一个重要基地。自1841年至1850年的10年间，香港先后出版过9种英文报刊，而在其他地区出版的只有1种（在上海）。又，自1841年至1860年的20年间，据初步统计，香港先后出版的英文报刊有17种，加上中文报刊的数目，超过同期包括上海在内的全国其他地区出版报刊的总和。1861年后，香港报刊发展开始日趋落后。以外文报刊为例，无论从报纸的数量还是其实际影响考察，香港都已不及上海而退居第二了。

1841年5月1日，《香港钞报》（一译《香港公报》，Hongkong Gazette）创刊，为第一份在香港出版的英文报刊。1842年鸦片战争以中国的失败而结束后，大批英文报刊先后问世，其中影响较大的有《中国之友》（The Friend of China）、《香港纪录报》（Hongkong Register）、《德臣报》（China Mail）、《孖刺报》（Daily Press）、《香港电讯报》（Hongkong Telegraph）等。

1842年3月17日，《中国之友》创刊，周二刊，小马礼逊等担任主笔。自1842年3月24日出版的第2期起，该报与《香港钞报》合并，改名《中国之友与香港钞报》，1844年恢复本名单独发行。该报最初持支持香港政府的立场，1850年8月台仁特（William Tarrant）购得产权并担任主编后改持反对政府的立场。虽然台仁特曾因此于1859年被控诽谤罪入狱，《中国之友》却也赢得了敢言的美名。该报特别重视中国新闻，对太平天国作过系统报道，并对太平军持同情态度，这在香港外文报刊中是少见的，曾引起舆论界的广泛注意。1860年，台仁特出狱后将报纸迁往广州出版，1863年1月再迁上海，1869年停刊。

1843年，《广州纪录报》由澳门迁至香港出版，并改名为《香港纪录报》。该报持反对香港政府的态度，十分重视刊登有关中国的材料，曾将《三国演义》译成英文在报上连载。至1858年停刊。

1845年2月20日，《德臣报》创刊。该报又名《德臣西报》、《中国邮报》，初为周刊，1862年2月1日起改为日报，直到1974年8月才停刊，历时129年，是香港历史上出版时间最长、影响最大的英文报纸。《德臣报》的创办人兼主笔为英国出版商肖德锐（Andrew Shortrede），英商德臣（Andrew Dixon）也参加创办事宜，后独家拥有该报产权。在政治上，该报持亲政府态度，曾获得刊印香港政府公报的合同，成为官方出版机构。1847年，该报曾资助容闳、黄胜、黄宽等3名学生赴美留学，其中黄胜回国后在该报担任印刷、管理等方面的工作。孙中山创立兴中会时，该报主笔黎德曾参加起草兴中会的英文对外宣言。第一次广州起义期间，该报曾发表文章支持革命活动。1876年2月1日，《德臣报》与

《香港晚邮报与船期录》(Hongkong Evening Mail and Shipping List)^①合并,改为日报,用《德臣报》的名义继续出版。

1857年10月1日,《孖刺报》创刊,为香港最早出版的英文日报。该报在政治上对港英政府基本上持批评态度,创办人和第一任主编是美国人赖登(George M. Ryden)。翌年,因该报所刊评论攻击怡和洋行,赖登被香港法院以诽谤罪判处有期徒刑6个月,其主编一职改由莫罗(Yorick J. Murrow)继任。莫罗的粤语音译为“孖刺”,因而当时港人把这份英文日报称为《孖刺报》,一直出版到1941年日军侵占香港后才停刊。

1881年6月15日,《香港电讯报》创刊,每晚出版,星期日休刊,美国人约瑟夫·诺贝尔为创办人,士蔑斯(R. F. Smith)担任主编,因而该报有《士蔑西报》之称。继任主编的有英国人亚尔腓列德·希克司等。该报每期销数约4 400份。

这一时期在香港出版的其他英文报刊还有:《东方地球报》(Eastern Globe),周刊,1843年创刊;《中国丛报》(Chinese Repository),1844年10月从澳门迁至香港出版。《中国之外友》(The Overland Friend of China),1845年8月30日创刊;《狄克逊氏香港纪事报》(Dixons Hongkong Recorder),1850年6月17日创刊,简称《香港纪事报》(The Hongkong Recorder),1859年1月14日停刊;《香港政府公报》(The Hongkong Government Gazette),1853年9月24日创刊,每周1册,由香港政府编辑出版,以刊载香港政府的法令、公告、通告等官文书为主,俗称“宪报”,不在一般报摊上公开出售;《香港航运录》(Hongkong Shipping List),1855年8月1日创刊,1858年停刊;《中国杂志》(The Chinese Magazine),1868年3月7日创刊;《每日广告报》(The Daily Advertiser,一译《香港广告报》),1869年11月1日创刊,1873年5月1日易名为《香港时报》(The Hongkong Times)继续出版,1876年停刊;《远东》(The Far East),1876年7月创刊,月刊,布莱克(J. R. Black)担任编辑,该刊图画甚丰,在香港、上海及东京3处发行,1877年停刊;《香港天主教纪录报》(The Hongkong Catholic Register),1877年创刊,半月刊,为天主教教会组织在我国出版的最早的定期刊物。

二、《遐迩贯珍》的问世

19世纪50年代后,近代中文报业开始在香港出现,最早问世的是英国传教士创办的《遐迩贯珍》(Chinese Serial)。

^① 《香港晚邮报及船期录》,日报,1864年由苏格兰人尼古拉·但尼士主办。

1853年8月1日,《遐迩贯珍》创刊,每月1日出版,16开本,沿用线装书的装帧形式,每期12页至24页不等,竹纸铅印,因而它不仅是香港最早出版的中文刊物,也是最早使用铅印的中文报刊。该刊由鸦片战争后迁至香港的英国伦敦布道会下属的对华文化教育机关马礼逊教育会出版、英华书院印刷,英国传教士麦都思为创办人和首任主编。该刊每期“以印三千本为额”,每册售价15文。除在香港发行外,还发行到广州、厦门、宁波、上海、福州等地。1856年5月停刊,前后共出33期。

《遐迩贯珍》虽为传教士所办,但实际上是以新闻为主的刊物,在内容上以时事新闻为重点,所占篇幅最多的是反映当前时事的新闻报道和评论,既有报道中国和中外关系的新闻,也有反映欧美、日本和东南亚的新闻。《遐迩贯珍》在政治上无疑是站在英国殖民主义者的立场上的,但在报道中国内部消息时,因其不必顾忌清政府的干涉而能比较客观、公正地反映事情的真实面貌。例如,1854年12月出版的《遐迩贯珍》第一次刊出《时论》,评论清军攻打上海小刀会事件,对清军将领的谎报军情和夸大战功作了揭露。该刊还注重对文化知识的介绍,曾广泛介绍西方政治、历史、地理和科学知识,尽管明显地有炫耀西方文明、为英国殖民政策辩护的用意,但对中国人还是很有启迪和借鉴的作用,对中国人开阔视野、了解中国与世界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该刊宗教宣传所占的比重很小,这可能是因为基督教在香港地区完全可以直接向市民传播,不必借助宗教报刊作为主要宣传工具。在新闻报道业务方面,《遐迩贯珍》也有长足的进步,消息、短讯、通讯、评论等近代新闻体裁都已初具雏形,还出现了连续报道等新的形式。1855年,《遐迩贯珍》增出附刊《布告篇》,随报发行,每期4页,专载商情及船期。值得进一步说明的是,《布告篇》率先在我国中文报刊上推出广告收费举措:凡刊登各类广告,初次每50字收费银半元,50字以上每字加1先令。如果再次刊登同一广告,收费减半。此外,该刊还刊有中英对照目录。

三、中文商业报纸的崛起

鸦片战争原是为抢夺中国市场而引起,因而战后立即出现了一个大量舶来品向五大通商口岸倾销的局面。香港是英国殖民主义者直接控制的地区,又是海外与内地的重要中转站,因而中外贸易率先发展起来并迅速走向繁荣。商品经济的迅速发展,孕育了中文商业报纸这一不可或缺的新闻信息传播媒介。

香港最早出现的中文商业报纸,大都是从早已成熟的英文商业报纸中孕育的。1857年11月3日,由孖刺报馆创办的《香港船头货价纸》创刊,周三刊,

每周二、四、六发行，实为英文《孖刺报》的中文版。该报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份中文商业报纸、最早的经济类报纸和最早的以单页报纸形式两面印刷的中文报纸，所刊内容以船期、商品价格、商业行情、商业信息和广告为主，主要读者对象为商店职员。1864至1865年前后，《香港船头货价纸》改名《香港中外新报》继续出版，继续以报道商业行情为主，但所刊新闻进一步增多，设有《京报全录》、《羊城新闻》、《中外新闻》等栏目，因而发行对象也从最初的商人扩大为一般市民。1872年5月4日后，该报每日另出《行情纸》，为读者提供市场信息。1873年，《香港中外新报》改版为日报，之后又脱离《孖刺报》，成为中国人自己办的报纸，出至1919年才停刊。该报早期的主要编辑是广东人黄胜，字平甫，是我国第一批留美学生之一，因病提前返港后在德臣报馆和英华书院印刷所从事印刷出版业务，是香港报业的老前辈。

孖刺报馆创办中文商业性报纸后，德臣报馆也紧紧跟上，于1861年8月10日创办中文附刊《香港新闻》，以报道船期、货价为主要内容，也曾刊登过一些关于太平天国的新闻，出至8卷停刊。1871年3月18日，德臣报馆又创办中文版《中外新闻七日报》，逢星期六出版，由广东人陈霭廷主持，以报道中外新闻为主，也有一些评论。1872年4月，德臣报馆决定《中外新闻七日报》停刊，改出独立发行的《香港华字日报》。4月17日，《香港华字日报》创刊，由陈霭廷担任主编，独立负责编务。陈氏是一个精通国学的爱国文人，原来在德臣报馆任翻译，有感于香港割让给英国后不少华人以争当买办、翻译为荣，而视祖国文化为陈腐的偏见，遂决心办报以“开通民智”。《香港华字日报》初创时每隔两日出8开4版1张，10年后改为日刊，自备铅字，利用香港德臣报馆的印刷机印刷。该报自称其惟一的宗旨是“以世界知识灌输于国人，以国内政务报告于侨胞，使民智日开，而益奋其爱国之念”。所刊内容以翻译外报和转载京报为主。《香港华字日报》创刊后，与《香港中外新报》对垒而立，逐渐发展成为香港地区最重要的两份中文日报。数年后，陈霭廷被清政府任命为驻美使馆参赞和驻古巴总领事，《香港华字日报》由其子陈斗垣接办，一直出至1941年12月25日日军占领香港后停刊，先后出版69年，是香港近代出版时间最长的中文报纸。

除《香港华字日报》、《香港中外新报》外，1864年间还有一家中文报纸《近事编录》在香港创刊。这家中文商业报纸据说也与德臣报馆有点关系，由英国传教士罗郎也（Noronha）创办，为国内最早的中文日报之一。该报除刊登行情、船期和广告外，还大量刊登新闻，是当时所有中文报刊中最早报道巴黎公社起义消息的报纸，其新闻还经常被当时上海的《上海新报》所转载，因而在国内其他地区也有一定影响。著名政论家王韬一度担任主编，并在该报上刊出过不少

他的早期政论。1883年，西人罗郎也将《近事编录》的产权转移给华人，该报每年订费也由5元减至4元，但不久后因报纸销路不佳而停刊。

商业报纸的崛起，促进了新闻时效性观念的提高。原来的中文报刊均为月刊、周刊，而中文商业报纸则多为周三刊、周二刊和日刊。由于刊期缩短和信息时间要求的加快，通讯手段也得到进一步改进和加强，印刷条件日趋先进，从而也进一步促进了新闻编采工作水平的提高。为了争取快速出版，中文商业报纸摆脱了以往的书本形式，形成近代报纸散页出版物的模式，从而使报纸的版面编排更加丰富多彩。商业报纸要求信息量大，及时、真实，一些消闲性的志怪传奇之作逐渐被排除，使报纸的新闻特性更为凸现。香港中文商业报纸的发展，还有力地推动了中国新闻事业的发展，并成为全国的样板。上海《申报》在其创办之初，曾派人专程到香港学习。

此外，这一时期在香港出版的值得一提的中文报刊还有：《香港政府公报》中文版，1860年创刊，周刊，由香港政府主办；《邹报》，1880年创刊，由基督教徒主办，出版仅月余即停刊。

第三节 上海报业的崛起

一、上海外文报刊的发展

鸦片战争后，上海等五个沿海城市被迫对外开放。由于上海地理位置最为优越，坐落在东海之滨，地处全国最富庶的江浙地区，又有广阔的长江流域腹地，因而立即成为外国侵略者的青睐之地。至1865年，全国对外贸易商品的一半通过上海集散，使上海逐步取代香港而成为全国的外贸中心。随着上海地位的日渐上升，上海的报业也开始崛起并迅速发展成为全国报业中心。

19世纪50年代后，上海报业发展开始起步。与香港报业的发展道路一样，上海也是先出现外文报纸，在时间上比香港晚了8年，且发展程度也赶不上香港，至1860年仅出版了4种英文报纸。但是，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后，情况发生了变化。上海后来居上，至19世纪90年代时已成为全国最繁荣的报业中心。以英文报刊为例，在1861年至1895年间，上海新出了31种，而香港同期仅出了8种，上海几乎是香港的4倍。

1850年8月3日，上海出版的第一份英文报刊《北华捷报》（North China Herald）创刊，周刊，逢星期六出版，每期对开一张4页（版），由英国商人亨利·奚安门（Henry Shearman）创办并担任主编，后由英商字林洋行发行。由于当时上海已成为中国最重要的外贸城市之一，因而《北华捷报》初创时主要刊登

广告、行情、船期等商业性材料。该报创刊号不仅刊有大量广告，还将当时侨居上海的 59 个西方人及其家庭成员的名字全部刊诸报端。1856 年后，随着商业广告的日益增多，北华捷报馆开始增出英文广告日刊《每日航运新闻》（Daily Shipping News），1862 年更名为《每日航运与商业新闻》（Daily Shipping and Commercial News，一译《航务商业日报》），此外还出版过英文《北华和日本市场报》（North - China and Japan Market Report）等。该报新闻不多，言论则反映英国在华商人的利益。自 1859 年起，该报被英国驻沪领事馆指定为公署文告发布机关，得到上海工部局的资助和优先刊载工部局文告和付费广告的特权，因而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英国政府的观点，被视为“英国官报”（Official British Organ）。

1864 年 7 月 1 日，北华捷报馆将《每日航运与商业新闻》改组为综合性日报独立出版。这时，报馆组织已改组为字林洋行，故名曰《字林西报》（North China Daily News）。之后，《北华捷报》转而成为《字林西报》的星期附刊继续出版，其地位与影响日益下降，1867 年 4 月 8 日后增加商情并易名为《北华捷报与市场报道》（North China Herald and Market Report）继续出版。1870 年 1 月 4 日，《北华捷报与市场报道》增出期刊《最高法庭与领事公报》（The Supreme Court and Consular），不久后两报合并，改名《北华捷报及最高法庭与领事馆杂志》（North China Herald and Supreme Court and Consular Gazette）继续出版。《字林西报》在创刊后虽仍大量刊载航务、商业等方面的文字，但开始重视并日益加强新闻报道工作。该报在中国边远地区都聘有自己的通讯员，还曾一度独享刊登英国路透社电讯的特权。对言论也十分重视，经常对中国政局与中外关系发表意见，但其基本态度是为英美侵华活动辩护，反对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事业。从总体上说，《字林西报》因其报道面广、信息及时、内容丰富而受到中外人士的重视，社会影响也日渐扩大，后发展成为近代中国历史最长、影响最大的英文报纸。

除《北华捷报》和《字林西报》外，这一时期在上海出版的英文报刊中值得一提的还有：《中国之友》（The Friend of China），1866 年由广州迁至上海并改为晚报继续出版，为上海的第一份晚报，1869 年改名《中国之友及船期杂志》（The friend of China and Shipping Gazette）继续出版，不久停刊；《上海差报》（The Shanghai Courier，一译《晋源报》），1868 年 10 月 1 日创刊，休·朗格（Hugh Long）任主编，该报评论也大多是其手笔；《华洋通闻》（The Celestial Empire），1874 年创刊，葡萄牙人陆芮罗（Pedro Loureiro）创办，出版后不久即由巴尔福继任主编，曾发表《远东浪游》（Waifs and Strays from the Far East）

一书的主要内容；《文汇报》（The Shanghai Mercury），1879年4月17日创刊，晚刊，英人克拉克（J. D. Clark，旧译开乐凯）、布莱克、里文顿（C. Rivington）等主编，为上海主要晚报之一，也是国内最先使用煤气引擎轮转机印报的报纸，后并入美国人主办的《大美晚报》，该报对中国问题的报道与评论无所顾忌，为清廷所不满，1884年6月4日，“洋务委员”邝其照发表公开信，斥责《文汇报》“肆意妄撰，捏造谣言”，“以言语欺侮华人”，“力劝法廷，为难中国”。至90年代，上海形成了《字林西报》、《华洋通闻》和《文汇报》三足鼎立的局面。

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法国、德国、日本、葡萄牙等也开始在上海办起了本国文字的报纸。

法国人自70年代起开始在上海办报。法文报刊在上海的影响与势力仅次于英文报刊，但各报之间态度对立、斗争激烈，出版时间一般都不长。1870年12月5日，法文周刊《上海新闻》（La Nouvelliste de Shanghai，一译《法国七日报》）创刊，是上海出版的第一份、也是国内出版的第一份法文报刊，法商比尔（H. A. Beer）创办并任主笔。该刊的创办得到了法租界公董局的支持，法租界公董局会议记录摘要和有关通告均授权该报公布。该刊出版三个月后，又一份法文周刊《进步》（Le Progres）于1871年3月21日创刊。两份周刊激烈竞争，结果两败俱伤，《上海新闻》出至1872年12月31日第182期后停刊，《进步》也出版不满1年即在1872年间停刊。1873年1月16日，第三份法文周刊《上海信使》（Le Courrier de Shanghai）创刊，由原《上海新闻》工作人员弗迈德瑞主持，但仅出了3期即告停刊。十多年后，法文报刊才重新在上海出现，如《上海回声报》（L'Echo de Shanghai）、《远东信使报》（Courrier L'Extreme Orient）、《中法汇报》（L'Echo de Chine）等。

19世纪80年代中期，德国人在上海开始办报。第一家德文报纸是《德文新报》（Der Ostasialische Lloyd），1886年10月1日创刊，初为日刊，后改为周刊，由纳瓦拉（B. R. A. Navarra）主编，为德国在华的言论机关。该报也是国内出版的第一份德文报纸，出至1917年我国对德宣战后停刊，共出版了31年之久，但因上海德国侨民不多而影响有限。

日本人在上海的办报活动较晚，始于19世纪90年代。在中日甲午战争之前，日本人在上海一共办过三种日文报刊和一种华文报纸，但这些报刊出版时间都不长。1890年6月5日，日文《上海新报》创刊，周报，为国内出版的最早的日文报纸。该周刊由修文书馆发行，松野平三郎主编，出版不满1年即停刊。之后又有《上海时报》、《上海周报》等先后创刊。

至于葡萄牙人在上海出版的葡文报刊，早在19世纪60年代后期就在上海出现，但主要为该国内部政治派系斗争作宣传，寿命都很短，影响甚微。

在19世纪后期，还有一件值得一提的大事是：1872年间，英国路透社派遣柯林斯（Henry W. Collins）来到上海，不久建立起该社的远东分社，是为这一世界著名的老牌通讯社在中国活动的开始。上海英文《字林西报》因其与路透社同为英国人所办，首先被允许采用该社的电讯稿。

二、《六合丛谈》、《万国公报》等中文宗教性报刊

上海中文报刊的出版，其头功属于外国传教士。正是这些外国传教士率先来到上海创办中文宗教性报刊。

最早问世的是《六合丛谈》（Shanghai Serial），1857年1月26日创刊，比香港战后第一份中文报刊《遐迩贯珍》仅晚了3年零3个月，对中国社会发展的影响则因上海地理位置之重要而比《遐迩贯珍》更大。该刊月出16开本16页1册，每册售价12文，由英国伦敦布道会传教士伟烈亚力主编，墨海书馆印行。除主编伟烈亚力外，主要撰稿人还有英国传教士慕维廉、艾约瑟等。王韬曾参加过编辑工作，为这位中国早期杰出报人从事报刊活动之始。

在内容上，《六合丛谈》刊有宗教、科学、文学、新闻等。与同期其他传教士办的宗教性报刊一样，该刊已不再纯粹宣传基督教义，而是一份综合性的新闻性期刊。主编伟烈亚力在创刊词中阐述其办刊主旨说：“今予著《六合丛谈》一书，亦欲通中外之情，载远近之事，尽古今之变。见闻所逮，命笔志之，月各一编，罔拘成例。务使穹苍之大，若在指掌；瀛海之遥，如同衽席。”可见，伟烈亚力的本意似乎想把它办成一种新闻性刊物，但主要执笔者都是伦敦会的在华传教士，因而宗教宣传方面的内容为数也不少。由于这些外国传教士想通过介绍西方科技知识来提高自己在中国人心目中的地位，因而该刊还刊有大量天文、地理等方面的知识。此外，由于上海是最重要的外贸集散地之一，“水脚单”、“进出口之货价与交易单”等商情也必然要在该刊上有所反映。于是，《六合丛谈》几乎成了大杂烩，宗教宣传、自然科学、商业行情、中外新闻无所不包。

《六合丛谈》虽在上海出版，但主编伟烈亚力的目标是发行到五个通商口岸乃至全国所有地区，使所有的中国人都成为自己的读者对象。结果是事与愿违，在办报实践中很不理想，实际发行量非常有限，而且仅出版了一年多即告停刊。

19世纪60年代后，中文宗教性报刊在上海继续扩展，其中最有影响的是《万国公报》。该刊的前身是《中国教会新报》，1868年9月5日创刊，周刊，美国监理会传教士林乐知（Young John Allen）集资创办并担任主笔，慕威廉

(William Muirhead)、艾约瑟 (Joseph Edking) 等协助林乐知担任编辑工作。该刊每年出 50 期，逢阴历年终和年初休刊 2 次，每期发行 1 000 册。用毛太纸印刷，大小如官版书 (25 开本)，每期 4 张 8 面，约六七千字，1870 年后调整篇幅，每期由 4 张增加为 8 张。1872 年 8 月 31 日，《中国教会新报》自第 201 期起改名为《教会新报》，并更改体例，设立政事、教务、中外、杂事、格致五栏，分别刊载有关稿件。1874 年 9 月 5 日，该报自第 301 期起再次改名为《万国公报》(Chinese Globe Magazine)，仍为周刊，篇幅略有增加，1875 年后由每期 8 页扩充至 16 页。1876 年，《万国公报》每期发行数达到 1 800 份，增出期刊《益智新录》(A Miscellany of Useful Knowledge)，作为其专言科学的姐妹刊物。1883 年 7 月 28 日，《万国公报》出至第 750 期，以经费困难及主编人忙于创建中西书院、无力兼顾报务而暂时休刊。1889 年 1 月 31 日，《万国公报》在休刊 6 年后恢复出版，另起编号，刊期也由周刊改为月刊，由 1887 年在华英美传教士联合主办的基督教书报出版机关同文书会 (后改称广学会) 主办，主编仍为林乐知，协助担任编辑工作的有中国人有沈毓桂、蔡尔康、范岷、袁康、伍廷旭等。复刊后的《万国公报》是英美传教士控制下的重要舆论工具。1892 年，主编林乐知回国休假，李提摩太代林主持编辑工作。林乐知在美期间，曾经受到共和党当选总统赫立逊的接见，其在中国的办报活动得到美国舆论的高度评价，称赞他为在中国“传播种子的人”。

《万国公报》(包括其前身《中国教会新报》)自创刊至第 300 期，所刊内容以宣传宗教为主，间刊一些中外史地、科学常识等方面的稿件，以及有关中国教育方面的消息。1874 年自第 301 期改名《万国公报》后，其内容也改以时事政治为主，经常发表时事评论、重要法令、条约及外报译文，大量介绍西方政治模式和西方科技知识，减少了有关宗教教义的宣传，但对于与宗教有关的事情则详加记载。对中国时政的评论尤为加强，并极力宣传英美等国的通商、传教活动之有益于中国。这些代表西方殖民势力的传教士，希望中国的社会变革沿着西方列强所期望的发展道路前进，因而以传播西方知识的行家自居，企图通过西方政治模式和科技知识的介绍影响中国社会改革的发展方向。例如，1896 年 4 月出版的《万国公报》第 87 期全文刊出英籍传教士李提摩太于 1895 年 11 月 11 日撰写的《新政策》一文，企图引导清廷当局按照他们的规划进行改良。文章列举了九项“中国目下应办之事”，其中之一就是设“国家日报”，认为“欲使中国官民皆知新政之益，非广行日报不为功”；“非得通达时务之人，主持报事以开耳目，则行之者一，泥之者百矣，何以速济？则报馆其首务也”。并建议由英人傅兰雅、美人李佳白“总管报事”，以及“派中国熟悉中西情势之人为之主笔”，企图由外

国人和他们所培养的买办知识分子掌握中国的宣传大权。自 1875 年起, 该刊刊载的中国人文章的数量日益增多。例如, 1876 年 9 月 30 日, 该刊刊载的杨鉴堂所做《总论新闻纸有十益说》, 鼓吹办报之益。又如, 1894 年 10 月, 该刊第 69 期、第 70 期连载孙中山撰写的上李鸿章书, 发表时标题为《上李傅相书》, 下署“广东香山来稿”。孙中山在这篇长达八千余字的文章中, 向当时掌握清廷军政外交大权的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李鸿章提出了一系列富国强民的主张, 反映了这位中国民主革命先行者的早期政治改革思想。

从《中国教会新报》到《万国公报》的变化, 使该刊的读者对象也由基督教徒扩展为社会各界人士, 该刊也逐渐发展成为上海乃至全国影响最大的宗教性报刊, 其发行量在维新变法运动期间增加到 38 400 份。

除《万国公报》外, 这一时期出版的英美基督教会或传教士主办的重要报刊还有: 《格致汇编》(Chinese Scientific Magazine), 1876 年 2 月 17 日创刊, 英人傅兰雅(John Fryer)主持, 月刊, 所刊文字对数、理、化、生物、医学都有所介绍, 是我国最早的科学杂志, 该刊一再重印, 重印时往往补入一部分新内容, 1882 年 1 月下旬出至第 4 年第 12 卷后停刊; 《成童画报》, 1889 年 1 月创刊, 墨海书局发行, 后改名《福幼报》, 隶属广学会, 为该会对中国儿童进行宣传的刊物之一, 也是中国最早出版的儿童刊物之一, 该画报图画与文字并列, 所刊铅版多为国外教会书刊用过的旧物; 《中西教会报》(Missionary Review), 1891 年 2 月创刊, 由同文书会发行, 林乐知任主编, 内容以报道教会方面的消息和宣传教义为主, 是《万国公报》的姊妹刊物, 1893 年 12 月出至第 35 期后因销路不畅暂时停刊, 1895 年 1 月恢复出版, 编号另起, 先后担任主编的有美国传教士卫理(E. T. Williams)等; 《小孩月报》(The Child's Paper), 1875 年 5 月 5 日自广州迁至上海出版, 改名《小孩月报志异》, 由上海基督教清心书馆发行, 美国长老会传教士范约翰(J. M. W. Farnham)任主编, 用连史纸印刷, 设有诗歌、故事、名人传记、博物、科学等栏目, 文字浅近易读, 经常刊出国外英美教会出版机关用过的废旧铜版和黄杨木版插图, 每期销约 2 000 份, 1876 年改名《小孩月报》, 1881 年改名《月报》, 1914 年改名《开风报》, 同年夏因欧战爆发自行停刊, 先后出版 40 年。

由法国人在华创办的天主教会出版的中文报刊, 主要有《益闻录》、《圣心报》等。其中有些报刊出版时间较长, 在上海市民中有一定的影响。《益闻录》创刊于 1878 年 12 月 16 日, 连续 6 次试刊后定为半月刊, 由天主教会主办, 李秋任主编。李秋(1840—1911), 南汇人, 字问渔, 洗名老楞佐, 别署大木斋主, 上海耶稣会神父, 先后担任《益闻录》等天主教报刊主编达 32 年, 著译书刊凡

57种，是天主教系统有影响的办报人之一。1879年，《益闻录》改名《格致益闻汇报》继续出版，后改为周刊，成为天主教会在上海创办的主要机关刊物。1908年，《格致益闻汇报》改名简称为《汇报》，至1938年停刊。《圣心报》创刊于1887年7月21日，月刊，为天主教会主办的刊物，先后担任主编的有李秋、徐元希等，出至1949年上海解放后才停刊。

三、《申报》等中文商业性报刊的迅猛发展

鸦片战争后，随着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商品的大量倾销，作为中外贸易主要集散地的上海，迫切需要有一种中文报刊为外商的产品做广告。于是，由外商创办的中文商业性报刊应运而生。这些中文商业性报刊发展势头十分迅猛，刚兴起不久就成为上海报业的主流。其中问世最早的是《上海新报》（英文译名是The Chinese Shipping List & Advertiser），影响最大的是《申报》以及《字林沪报》、《新闻报》等。

《上海新报》创刊于1861年11月19日，由北华捷报馆创办、字林洋行出版。初为周刊，自1862年5月7日起由周刊改为周三刊，每星期二、四、六出版。1868年2月1日，《上海新报》革新版式，重新编号。即日出的报纸称新式第1号。革新后的报纸每期1张，高45.72厘米，宽60.96厘米，两面印刷，共4版。该报样式已接近现代日报，用白报纸两面印制，是国内最先用白报纸印刷的报纸。订价每份铜钱30文，每月银洋半元，每年银洋4元。初创时日销约300份。1872年7月改为日刊。该刊的主笔先后是伍德（M. F. Wood）、傅兰雅（J. Fryer）、林乐知（Y. J. Allen）等，都是英美来华的传教士，其中伍德、林乐知是美国监理公会派遣来华的传教士，傅兰雅是英国教会的差士。另有一名中国助编董明甫。

《上海新报》创刊号上刊有发刊词，宣称其编辑方针是：“大凡商贾贸易，贵乎信息流通。本行印此新报，所有一切国政军情，市俗利弊，生意价值，船货往来，无所不载。”该报初创时为两个版面，第1版为商业信息和新闻，第2版全部为商业性内容，将商业信息放在首要地位。1868年2月，该报扩为4版，第1版广告，第2版中外新闻，第3版广告、船期及行情表，第4版论说及杂著，其中广告、船期、行情等商业信息仍占多数。《上海新报》所刊载的新闻，大多译自沪、港等地出版的外文报纸，如香港的《近事编录》、《香港中外新报》，广州的《中外新闻七日报》，上海的《中国教会新报》等，有时也摘登一些《京报》信息。另辟有《苏省日报》专栏，刊登“辕门抄”发布的江苏政界消息。《上海新报》初创时，正值太平军席卷江南、意欲进军上海之际。为了满足上海市民、

特别是慑于太平天国革命运动的威力而纷纷逃入上海租界避难的江南一带的财主、乡绅了解太平天国最近动态的需求，该报刊登了许多有关太平天国的报道，经常通过外国侨民及教会团体，探得官军及太平军双方的消息，很受读者重视。偶尔也刊登一点有关言论，持反对太平天国革命的政治态度，曾长篇连载吹捧镇压太平天国革命的外国雇佣军“常胜军”“功绩”的文章，并为清政府最终消灭太平军出谋划策。在编辑业务上，《上海新报》自1870年3月24日起率先在每条新闻上加标简明题目，用头号字排标题，4号字排正文。在此之前，国内各报都没有专门介绍新闻内容的标题，只有《中外新闻》、《选录某报》等栏题。

1872年，即《上海新报》出版10年之后，一个强有力的竞争对手在上海报坛崛起。是年4月30日，《申报》（初名《申江新报》）创刊，两日刊，出至第5期起改为日刊，星期日休刊，用毛太纸单面印刷，日出8版，每版高26厘米、宽23厘米，标题、正文均用4号字，广告、价目表、船期表则用5号字。1874年9月11日，《申报》开始增加篇幅，更换纸张，改用赛连纸印刷，虽仍为4版，但篇幅加大，每版高约30厘米，宽约26厘米，售价不变。1877年6月20日，《申报》再次拓宽版面，使每期报纸的容量增加1500字。7月2日起《申报》改用5号小字排印次要新闻，重要新闻及评论仍用4号字排印，以引起读者注意。1884年，《申报》业务上有不少改进。加强了新闻报道，扩充了篇幅，纸张也有所改进，很受读者欢迎，广告为之激增。自1879年4月27日起，《申报》取消每周休刊一天的办法，星期日照常出报。该报创办人是英国商人安纳斯脱·美查（Ernest Major）。1871年5月19日，美查和伍德沃德（C. Woodward）、普赖尔（W. B. Pryer）、约翰·瓦其洛（John Wackillop）4人订立合同，集股1600两（每人400两），由美查负责创办一份中文日报，即《申报》。

美查创办《申报》的目的完全是为了赚钱，因而十分重视办报质量。在创办《申报》前，美查曾派钱昕伯去香港对商业性中文报纸进行实地考察。《申报》创刊后，美查又毫不犹豫地将编辑大权交给了蒋芷湘、钱昕伯等中国文人，由赵逸如任买办（即经理），蒋芷湘任主笔，何桂笙、钱昕伯、吴子让等沪上名流协助蒋担任编辑撰稿工作，以冀为中国读者所欢迎。在外国人所办的报刊中，一直由中国人主持笔政的，《申报》是第一家。在美查的精心策划下，《申报》发行量不断上升。1874年10月15日，该报发表启事称：“近三月来，销路加添，每日新增有六百余张。”1876年，《申报》随着业务的发展，日销数增至2000份。1877年2月10日，《申报》发表《论本馆销数》一文，声称该报发行数字已接近1万份。同年6月20日，《申报》刊出告白，正式宣布该报每日销数约为八九千份。1884年8月，《申报》首任主笔蒋芷湘中进士离职，改由钱昕伯继任。1889年

10月15日,《申报》创办人美查将所营事业改组为美查兄弟有限公司(Major Bros. Ltd),收回原本2 000股(约白银10万两)后返国。新成立的美查有限公司总计资本银30万两,设董事会,由董事4人、经理1人主持,其性质已由外国人独资创办的报纸转为中外合资经营的报纸,但由于外资所占比重较大,公司大权仍然掌握在外国董事手中。

《申报》的办报方针,其创刊号上刊登的《发刊辞》、《本馆条例》及《申江新报缘起》宣称:“凡国家之政治、风俗之变迁,中外交涉之要务,商贾贸易之利弊,与夫一切可惊可愕可喜之事,足以新人听闻者,靡不毕载”,还向社会征求“天下各名区竹枝词及长歌纪事”等各类稿件。在新闻业务上,《申报》将新闻报道工作放在首位。1872年5月28日,《申报》发表《采访新闻启》,征求各方面稿件。1874年7月9日,《申报》发表征稿告白,宣布对送刊的稿件“概不取值”,并向作者赠送报纸数张,以为酬谢。1875年7月5日,《申报》发表《搜访新闻告白》,宣布“本馆立志欲将中国境内各紧要消息采录无遗”,要求各地读者惠寄新闻、评论以实篇幅。至是年7月止,该报已在北京、南京、苏州、杭州、武昌、汉口、宁波、扬州等城市聘定特约记者,以报道当地新闻。其余无特约记者的城市,则要求当地读者“发于楮墨,而惠寄刊列”,发表后付给稿酬。1882年9月6日,《申报》发表《招延访事》启事,决定在江宁、镇江、芜湖、九江、长沙、沙市、宜昌、成都、重庆、贵阳等19个城市聘请记者以采访新闻,“俾十八省之民风土俗,轶事奇文,均得罗列报中,以供诸君披阅”。

对新闻的真实性问题,该报有正确的认识。1874年6月,日本借口侨民被杀,派兵侵入台湾。《申报》特派一位记者去前线进行实地采访。自7月22日起,在报上刊出大量有关日军侵台的新闻和评论,读者争先阅读,日销数较前增加600份。1882年9月9日,朝鲜爆发政变,《申报》特派该报原驻横滨及烟台记者前往汉城一带进行实地采访。所写报道自是日起以《高事近耗》、《高丽形势》等为题,在报上连续刊出,成为国内惟一派记者采写朝鲜“壬午政变”新闻的报纸,为读者所瞩目。在1883年法国人侵越南并由此而引发中法战争期间,《申报》为取得可靠资料,特地雇用俄国访员,深入越南法国军营采访,坚持报道真实信息,为自己赢得了声誉。1884年2月6日,《申报》开始在欧洲及香港两地约聘外籍记者采访有关“法越交涉事件”新闻。1885年3月,法舰侵犯我东南沿海,《申报》特派记者前往宁波前线采访,写成战讯在报上发表,以记载翔实受到欢迎,销数为之激增。

为了提高新闻的时效性,《申报》在国内报纸中最早使用电报传送新闻稿。1874年1月30日,《申报》刊出经由丹商大北电报公司海底线路拍来的有关英

内阁改组的伦敦电讯，为国内报纸刊出的第一条电报新闻。全长1400公里的津沪电报线路于1881年12月24日交付使用后，《申报》立刻利用这条电报线路传递南北各报新闻。1882年1月16日，《申报》刊出该报记者从天津发来的新闻专电，全文摘录了有关清廷给欠解铜款的云南按察使衔候补道张承颐以“摘去顶戴”处分的上谕，为国内报纸上出现的第一条国内新闻电讯，开辟了我国报纸利用电报在国内传递新闻的新路。1882年10月25日，顺天乡试在北京发榜，《申报》驻京记者连夜用快马将江浙皖三省士子中式名单送往天津，电传上海，于当日见报，上距发榜时间仅24小时，为国内报纸第一次用电报传递有关科举考试的消息。1884年8月22日，《申报》驻京记者开始使用有线电报从北京直接向上海拍发新闻专电。《申报》还在国内报纸中最早发布号外。1884年8月6日晚7时，《申报》出版单张号外，报道福州最近情况，以澄清上海市面有关中法两国海军已在闽江口外开火的谣传。此前，仅上海英文《字林西报》曾出过关于越南抗法战争进展情况的英文号外。

《申报》还不断拓宽新闻的报道面，大量报道社会新闻。自1874年4月18日起，《申报》开始报道杨乃武被诬与葛华氏通奸并唆使后者谋杀亲夫一案的有关消息，至1877年4月11日连续报道3年之久，使之成为当时家喻户晓的一大社会新闻。1878年7月19日，《申报》发表新闻《星使驻英近事》，介绍清驻英大使郭嵩焘在英画像事，以“笔涉诙谐”为郭所不满，迭次要求更正和追查责任，反复交涉至第二年郭任满离职后始告结束，也是当时轰动社会的新闻之一。此外，《申报》还最早刊登国际旅行通讯。1876年6月7日，《申报》开始在新闻后连载署名“环游地球客”所写的长篇通讯《东行日记》，为国内报纸上刊登的第一篇国际旅行通讯。“环游地球客”名叫李圭，字小池，江苏江宁人，海关职员，1876年5月13日奉派离沪赴美参加纪念美国建国100周年的世界博览会，还顺便访问了旧金山、华盛顿、纽约、费城等地，后又渡过大西洋，顺道访问了伦敦、巴黎，经地中海、印度洋和南洋群岛，于1877年1月17日返回上海，历时8个多月，行程四万余公里。《东行日记》是李圭应《申报》的约请，记载沿途见闻，陆续寄回国内发表的旅行通讯。

《申报》还加强报纸言论工作。美查声称，“利”和“义”并不完全对立，办报为了赢利，并不排斥在必要时仗义执言，报纸的言论要“上关皇朝经济之需，下知小民稼穡之苦”^①。1875年10月11日，《申报》发表社论《论本馆作报本意》，鼓吹该报“大抵以行业营生为计”，宣传“所卖之报张皆属卖与华人，故依

^① 《本馆条例》，载《申报》，1872-04-30。

恃者惟华人”，否认在言论上“一味夸助西人，以轻藐华人”，标榜自己“谋利而兼仗义”、立论“公道”。不管怎样，《申报》的言论，或为中国富强献计献策，或对陋规苛政口诛笔伐，就其启迪民智而言，都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申报》还广开言路，发表读者来信来论。1875年3月13日，《申报》发表读者来信《与申报馆论申报纸格式鄙见》，建议该报增辟《文章策问》专栏，发表范文，“以资观摩”。

重视发表副刊性文字，也是《申报》在新闻业务上的一大创造性举措。该报公开征集竹枝词等文艺类作品，并在版面上特辟文艺类作品的篇幅，以满足当时主要读者群——旧式文人的兴趣与爱好。这一创举为后起的《字林沪报》、《新闻报》所仿效，开我国报纸副刊之先河。1872年6月4日，《申报》在第2版本埠新闻后发表未署撰稿人的《戏园琐谈》一文，对正在演出的京戏进行评论，为我国报纸上刊出的第一篇剧评。

1876年后，《申报》开始使用新闻图片。是年8月18日，《申报》在其发表的题为《拿获九龙山匪党》的新闻中，插刊了用木版雕刻的“九龙山匪党”的臂章图样，为《申报》刊出的第一张新闻图片。1879年5月24日，美前总统格兰特访问上海，《申报》于当日石印格氏画像1万张，随报分送读者，为国内报纸刊载新闻人物画像之始。1884年中法战争期间，《申报》于4月29日石印单张《越南东京地图》一种，随报附送，供读者阅读有关战报时参考。

申报馆除了出版《申报》外，还利用其人力和物力资源的优势，经营其他出版事业，也取得了很大的成功。一是出版发行各类期刊。1872年11月11日，申报馆出版发行我国最早的文艺期刊《瀛寰琐记》，月出1册，每册24页，用4号字排印。每期销数达2000册，先后共出28期。所刊内容除诗词、骈文、散文、小说、翻译稿等文艺作品外，也有少量时事政论、史料和知识小品等。日本名著《江户繁昌记》、英国小说《听夕闲谈》，都曾在该刊连载。1875年2月，《瀛寰琐记》出至28期后改名为《四溟琐记》，仍为月刊，性质与《瀛寰琐记》相同，但版面缩小，改为巾箱本，“庶舟车携览更形简便”，页数则增加到32页，每期仍售80文，所刊内容减少小说，增多笔记类作品。1876年3月9日，《四溟琐记》出至第12期后改名《寰宇琐记》，仍为月刊，内容以诗词、笔记、杂著为主，式样与《四溟琐记》相同，出版时不署年月，每册售价80文，出至1877年1月停刊，先后共出12期。

此外，申报馆还在国内率先出版以图画为主的刊物。1877年6月6日，《寰瀛画报》创刊，系《申报》附出的图画增刊，为我国出版的第一种以图画为主的刊物。该刊不定期出版，每期十余页，售价1角至2角不等。该报图画部分由英

国画师绘制，中文文字说明部分则由蔡尔康执笔，创刊号刊有英国皇宫、英太子出游时乘坐的火轮船、印度土王之陵、英国时装图样、“火轮客车”在隧道中行驶情形、日本仕女服装、中国天坛的祭祀巨典等图片。但是，《寰瀛画报》因脱离中国社会实际而不为读者欢迎，1880年间停刊，仅出5卷（期）。1884年5月8日，《申报》又创办起《点石斋画报》，由著名风俗画家吴友如主编，参加编绘工作的有金蟬香、张志瀛、贾醒卿、顾月洲、田子琳、马子明、吴子美、张琪、李焕奎等。该刊每旬出1本，每本8图，售洋5分，连史纸石印，内容以新闻时事画为主，兼刊人物及风俗画和铜版照片，绘印精美，为同时期出版的其他画报所不及，先后出版近13年之久。

还值得一提的是，1876年3月30日，申报馆发刊我国最早使用白话文和标点符号的报纸《民报》。该报为周三刊，每星期二、四、六出版一张，月取费65文，旨在“俾女流、童稚、贩夫、工匠辈皆得随时循览，以扩知识而增见闻”^①。由于当时中国下层民众绝大多数都是文盲，因而《民报》创刊没多久即自行停刊。

二是兼营书籍出版业务。1872年10月16日，《申报》公开发售本馆刊印的《王洪绪先生外科证治全生集》一书。该书是申报馆出版的第一本书，也是所谓“美查版”的第一本书。之后，申报馆出版了一套铅印的《聚珍版丛书》，由《申报》总编辑钱昕伯任主编，先后刊行160多种，大多是一些颇有价值而濒临灭绝的孤本名著，为保存中国传统文化做出了贡献。1876年，《申报》创办人美查创办起点石斋石印局，并在《申报》上刊出告白，为该局征求书稿。1878年12月30日，《申报》为自办的点石斋印书局装备了进口石印机器，即日起刊出告白，公开出售该局出版的石印书报字画。1885年后，《申报》设立上海图书集成局，开始着手用铅活字翻印大部头丛书《古今图书集成》。1888年，用扁体铅活字排印的《古今图书集成》大功告成，全书共1万卷，分订1628册，有“康熙百科全书美查版”之称，对保存中国古代文化遗产卓有贡献。

在发行、广告等报业经营业务上，《申报》也有不少成功的经验。在创刊的第一年内，《申报》采用廉价销售的营销策略，售价本埠每张8文，外埠10文，趸售6文。自7月17日起，开始雇用报童在街头叫卖报纸。出版不满半年，销数已达3000份以上，并从上海渗入江浙等地区。据该报9月9日发表的《本馆自叙》称：“现在本馆申报日见畅行于本处上洋地方，每日约计可销三千张。他如苏州、杭州、汉口、宁波等处，始则未经入目，销路寥寥，继则逐渐通行，发

^① 《劝看民报》，载《申报》，1876-05-16。

售日盛一日。”1873年,《申报》进一步加强外埠发行工作,先后在杭州、福州、广州、北京、长沙、沙市、宜昌等城市设立分销处,聘请经理人负责该报在当地的发行事宜。对一些没有设置分销处地区的读者,则委托信局代寄,邮费另加。

《申报》还向读者招刊广告(即告白),广告收费50字起碼,每天收费250文,字数多、刊期长的,费用递减。为了宣传广告的作用、鼓励各界人士踊跃刊登,《申报》于1872年5月7日刊载《招刊告白引》一文,内云:“尝游通都大邑,见中国一城一邑,一岁一市之中,有怀一端之事思告白于人而无由遍诉者,常贴墙阴屋角间,罗而致之,不可枚举。然多旋贴旋扯,往往十无一三经人之眼者,其故有由来也。盖人徒知事之可以告白,而不知所以善其告白之术,既知告白之大有可恃,而不思可久可广之策,以传其告白之方,甚至我有事以白之人,而彼亦因我之事以曲为直而别白之,则我前所白之人者已隐,而人之曲直不彰,后起而别白之反显矣。是何术以善之,非思夫可久可广之策,无以遐布而远闻也。盖告白一事,西人各国行之历有年所。事无大小,莫不通晓,遍谕四达,而天下共知。至如华人,往往即通衢大道之中贴于墙上,然多囿于乡邑,未能家喻户晓。始则诧为异闻,继且隐而未见。而高车驱马者不顾焉,杜门不出者不知焉。是我欲告白于人,历时未久,有后起者出,反至墨白未分,是非混淆,而后来居上矣。西人之为民下者亦尝患此久矣,思夫善其术以出之。盖有新闻纸出,而民之情不至拥于上闻矣。”1874年1月2日,《申报》发表声明,宣布广告版截稿时间为每晚7时。逾此,则“版已告竣,不能列入,须候翌日刊矣”。

《申报》的创办与飞速发展,标志着我国中文商业性报纸发展到了成熟阶段,《申报》成了我国商业性报纸的一个成功典范。在上海,《申报》创刊后,先于《申报》出版的《上海新报》立刻陷人生存危机之中,并被迫邯郸学步。例如,《申报》为日报,《上海新报》为了在时效上与之竞争,也于7月2日起改为日报。又如,《上海新报》使用价格很贵的瑞典进口白报纸,每份报纸的售价是制钱30文,而《申报》采用廉价营销手法,定价为8文,该报也不得不将售价降为8文,以争取读者。由于不胜亏损,《上海新报》被迫于1872年12月31日宣告停刊。但是,《申报》的成功,不能不令人看好报业这块市场,使上海商业性报纸在19世纪80年代后出现大发展的局面,在《字林沪报》、《新闻报》创刊后,形成了“申”、“新”、“沪”三报鼎立的格局。

《字林沪报》创刊于1882年。是年,字林洋行(即英文字林西报馆)在停刊《上海新报》近十年后重振旗鼓,于5月18日发刊中文《沪报》,同年8月10日改名《字林沪报》,日出对开4张,星期天不出报,单面印刷,聘请戴谱笙、蔡尔康等担任主笔。为便于同《申报》进行竞争,该报创刊号刊有《本馆告白》,

除说明原定四月初一日（5月17日）创刊、以该天为“日蚀之期……似非所宜，用特改择初二吉日为始”外，还宣告“自创刊日起送报七天，不取分文”。《本馆告白》还对广告费收费标准作了规定：第一天每字取钱5文；第二天至第七天，按日取钱3文；第八天以后每字取钱2文；若论年月，到馆面议。该报的主要内容及版面安排，“首列上谕，尊君也；次列论议，以见心想；次列出译电西报，俾共稔知中外时事；次列外埠及本埠诸新闻，事取其详，文取其富；次列诗文杂作，以供文士之消遣；次列邸抄、辕门抄，务求其速；次列各种告白及钱洋市价、轮船进出等类，以便贸易场中及往来仕商阅看”^①。该报所刊新闻，最初大半译自《字林西报》。1885年5月20日，《字林沪报》刊出征稿启事，加强新闻报道。为了吸引读者，《字林沪报》曾连载长篇小说《野叟曝言》，并于1897年11月24日创办我国报纸的第一个副刊《消闲报》，此外还刊有《花团锦簇楼诗》等杂著。1895年，《字林沪报》出版晚刊《夜报》，为中国最早的中文晚报之一，但不数日即停刊。1900年春，由于销路不好，英文字林西报馆将《字林西报》转售给日本东亚同文会，后者将其改名为《同文沪报》继续出版。

《新闻报》创刊于1893年2月17日，初创时日出对开1张。该报初为中外合资性质，由华商张叔和、英商华盛纺织厂董事丹福士（A. W. Danforth）及斐礼思（F. F. Ferris）等合组公司主办，公推丹福士为总董、斐礼思为总理。后公司逐渐解体，全部股权归英商丹福士所有。著名报人蔡尔康任主笔，专撰该报论说达半年之久，后因办事意见不合而离去。1899年11月4日，丹福士因经济拮据宣告破产，时任上海南洋公学校长的美国人福开森（John C. Ferguson）买下《新闻报》，聘汪汉溪任总理，金煦生为总编辑。《新闻报》一创刊，就同已经出版了二十多年的《申报》展开竞争。该报采取低于《申报》价格的推销办法，报费每日售价铜钱7枚，较《申报》便宜1枚。在广告业务上，《新闻报》出版之初，上海各剧场海报都只登于《申报》一家，《新闻报》派人前往主动兜揽，遭到拒绝，乃故意乱排海报，以假乱真，造成混乱，迫使各剧场主动送刊广告。1893年12月，《新闻报》开始出版画报单页，用随报附送石印画报的办法争取读者，开我国日报定期附送画页的先例，每月还加送总目1张，以便读者装订。正是在此基础上，《新闻报》于1894年4月创刊《新闻报馆画报》。1894年，即《新闻报》出版一年后，发行数字已由初创时的300份增加到3000份，仅次于《申报》而位居第二。

至19世纪90年代，无论是中文报刊还是外文报刊，上海都已超过香港、广

^① 《本馆告白》，载《沪报》，1882-05-08。

州、澳门等中国近代报业的发源地，取代香港成为全国报业的中心。

第四节 在华外报网的形成与外报的历史作用

一、在华外报网的形成

鸦片战争后，除香港、上海外，来华的外国传教士、商人以及其他各界人士，还在广州、宁波、福州、厦门等通商口岸积极从事办报宣传活动，办起了一批近代报刊。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汉口、九江、南京、镇江、天津、烟台、潮州（后改汕头）等地成为通商口岸，外国人在华的办报活动也开始从东南沿海逐渐扩展到中原腹地。

值得注意的是，各地出现的第一份报刊大多是在华的外国传教士创办的，宗教性报刊仍是在华外报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仅据 1890 年美国传教士法罕在在华新教传教士本年度的年会上宣布的不完全统计，自 1860 年至 1890 年，基督教系统在中国发行的报刊累计已达 76 种，其中宗教性质的 40 种，“世俗”的即所谓“文化”性质的 36 种。1895 年，李提摩太在天津《时报》上发表《中国各报馆始末》一文，公布了教会方面关于我国报纸出版情况的统计数字：自 1815 至 1894 年，除《京报》外，全国先后出版的中文近代化报纸共有 76 种，计香港 6 种，粤东 6 种，台湾、厦门、汕头共 5 种，福州 3 种，宁波 2 种，上海 32 种，汉口 5 种，九江 1 种，天津 1 种，北京 1 种等。以刊期计，月报为 36 种，周报为 8 种，日报为 21 种，旬刊、二日刊与三日刊各为 1 种。其中 60% 为教会方面所主办。仍在出报的，仅《循环日报》、《申报》等 28 种，其中教会方面主办的为 15 种，占 54%。

在办有外报的城市和地区中，广州是仅次于香港、上海的重要基地。鸦片战争后广州出现的第一份近代报刊是《广州探报》(Reports from Canton)，1843 年创刊，用竹纸手抄，每期 20 页，内容均为当地新闻，主要供澳门英商阅览，但在中国人中毫无影响。1845 年后，早在 1835 年在广州创刊的著名英文报纸《中国丛报》重新迁回广州出版，但影响不大，至 1851 年时只有 300 家订户，年底自行停刊，从 1835 年算起共出版 20 年之久。1859 年，台仁特主编的《中国之友》从香港迁往广州，为鸦片战争后广州出现的第三份近代报刊。60 年代广州出版的外报，除 1860 年从香港迁广州出版的英文《中国之友》外，还有 1865 年创刊的中文《中外新闻七日报》（英文译名是：Chinese and Foreign Weekly News）和《广州新报》。《中外新闻七日报》创刊于 1865 年 2 月 2 日，由约翰·查美斯（John Chalmers）主编，中文周刊，所刊内容有新闻、科学、宗教、杂俎

等，先后出版 152 期。《广州新报》创刊于 1865 年，周刊，出版 6 年后停刊。70 年代后，广州报业较大规模地发展起来，举其要者有：《小孩月报》（英文译名是：The Child's Paper）、《西医新报》、《纪南报》等。但是，广州在鸦片战争前的报业龙头老大的地位则一去不复返了。

宁波也是最早出现外报的城市之一。1854 年，《中外新报》（英文译名是：Chinese and foreign Gazette）创刊，为外国传教士主办的宗教性报刊，美国浸礼会传教士玛高温（D. J. MacGowan）、应思礼（E. B. Inslee）等先后担任主编，内容分宗教、科学、文学、新闻等类，“以圣经之要旨为宗旨”，出自 1861 年停刊。当时，上海虽然已有外报，但尚无中文报刊，因而就中文报刊的出现而言，宁波还早于上海。1870 年，《宁波日报》创刊，由外国传教士主办，福特莱尔任主编，不久即停刊。1881 年 2 月，《甬报》创刊，由英国牧师阚斐迪邀李小池等合办。

在福州，最早出现的是《福州信使报》（Foochow - foo Courier，又称《福州府差报》），1858 年 10 月 12 日创刊，由英国人主办。继之而出版的有《福州广告报》（Foochow Advertiser）、《福州每日广告与航运报》（Foochow Daily Advertiser and Shipping Gazette）、《福州捷报》（Foochow Herald）、《福州每日回声报》（The Foochow Daily Echo）、《中国纪录报》（Chinese Recorder）等英文报刊。最早在福州出版的中文报刊是《教会使者报》（英文译名是：Church Messenger），1860 年创刊，月刊，是一份用方言拉丁文拼音的教会刊物。其他中文报刊还有《中国读者》、《小孩月刊》、《邹山使者报》、《闻见录》、《闽省会报》等。

厦门虽然也是 1842 年《南京条约》签订后第一批对外开放的通商口岸，但外人的办报活动则迟至 70 年代才出现。第一份近代报纸是英文《厦门航运报道》（Amoy Shipping Report），1872 年创刊。1886 年，《厦门新报》创刊，为当地出版的第一家中文月刊，由英国传教士布德（C. Budd）主办，用闽语方言写作，内容以一般新闻及教务方面信息为主。1888 年，《漳泉公会报》创刊，月刊，为一份用闽南方言编写的基督教教会刊物。1889 年，《厦门画报》创刊，为教会方面主办的儿童画报，不久停刊。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开放的通商口岸，数汉口和天津两地的报业最为发达。

在长江中游重镇汉口，1866 年后报业开始起步。是年 1 月 6 日，英文商业报纸《汉口时报》（Hankow Times）创刊，为武汉地区出版的第一份近代报刊，由美人汤普生（F. W. Thomson）主编，日出对开 1 张，专供在汉口的外国侨民阅读，至 1868 年停刊。1874 年，英文《汉皋日报》在汉口创刊，创办人为罗底斯（P. Rhodes），不久停刊。1888 年 5 月，英文《中国传教士》创刊，季刊，由基督教文华书院主办，以外侨及传教士为读者对象。汉口中文报刊的创办，则

始于《谈道新编》，1872年创刊，月刊，为英国伦敦布道会教士所办，沈子星、杨鉴堂主编，出至1876年停刊。1875年，中文《开风报》创刊，由外国传教士主办，字阿鲁主编，最高发行数字曾达3 000份。1880年，中文《昭文日报》、《新民报》先后创刊，均为基督教会主办。1883年5月，《武汉近事编》创刊，周刊，汉口基督教伦敦会传教士主办。1887年2月，《益文月报》创刊，为外人主办的中文月刊，内容以自然科学方面的报道为主，首先是天文、地理、物理，其次是各种“新机新法”的介绍，另以部分篇幅报道“各省近事”，末录诗词歌赋及医学。1893年3月23日，英商主办的《字林汉报》创刊，日刊，社址在汉口英租界一码头后，姚文藻、梅问羹任主编。该报以上海《字林沪报》为后援，有英国方面的背景。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英、美、法等国先后在天津设立租界，天津成为中国北方的外贸交易中心。外国人在天津积极开展办报活动，是因为天津密迩朝廷所在地北京。1880年，天津第一家近代报刊《北方邮报》(Northern Post)创刊。这是一家非时事政治性报刊，主要刊登海关贸易统计之类的材料，社会影响很小。1886年，天津海关税务司德璀琳(S. Detring)与怡和洋行总理笪臣等集资创建时报馆，同时出版中文《时报》和英文《中国时报》(The China Times)。中文《时报》创刊于1886年11月6日，日刊，报头横书，以海上日出为背景图案，报名上有“在明明德”四篆文。该报广登京津地区新闻，具有鲜明的地方色彩，得到直隶总督李鸿章的支持。1890年7月，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 1845—1919)应李鸿章之邀出任《时报》主笔，每日著论一篇，每七日登一插图，宣传中国应仿照西方，实行“新法”。由于中国知识分子中酝酿着变法维新的思潮，因而《时报》的这些有关变法的言论在中国政界和知识界引起巨大反响，使该报与南方《万国公报》一样，成为当时在华外人主办的最有影响的政论性报刊。1890年8月23日，李提摩太还创办起《时报》周刊，选载《时报》一周中重要谕旨、论说与新闻，向外地发行。英文《中国时报》创刊于1886年11月，周刊，其特色与中文《时报》相仿，主笔为亚历山大·梅基(Alexander Michie)，被认为是“在华外国报纸中最有才能的一位编辑”，曾撰有《在华英人》(The Englishman in China)一书。经常在该报发表文章的还有玛丁(W. Martin)、英诺森(P. Innocent)、亚瑟·斯密斯(A. Smith)及李提摩太等，多数是当时所谓的“中国通”。1891年6月，中文《时报》停刊。同年，英文《中国时报》因主笔梅基退休而宣告停刊，其产权为英商天津印刷公司(Tientsin Press Ltd.)购得。1894年3月，英文《京津泰晤士报》(Peking and Tientsin Times)创刊，由英商天津印刷公司创办，初为周刊，后改日刊，英国

人贝林汉姆(W. Bellingham)主编。该报是一份反映天津英租界工部局观点的报纸,重视京津和北方新闻,经常评论时政、发表政见,但其标榜的办报目的是:“把西方的文化介绍于中国,并应用西方批评的标准,激动中国根本之变革。”在旅华的外侨中,该报有“外人在华北的圣经”之称,日销约1200份。1895年1月26日,《直报》在天津创刊。德国人汉纳根主办,主编杨荫庭。该报日出4版1张,星期日无报,设有上谕恭录、评论、新闻等栏目,创刊初期曾刊载过严复所写的《论世变之亟》《原强》、《辟韩》等政论文章。

在其他通商口岸,外报出现得较早的有潮州、九江、烟台等地。1889年,《潮惠会报》在汕头创刊,是一份以潮汕方言编写的基督教教会刊物。1890年,《护教者》(The Church Advocate)在江西九江创刊,月刊,白话文言合刊,为基督教会主办。1894年,英文《芝罘快邮》(Chefoo Express)在山东烟台创刊,周刊,由德商沙泰公司发行,1900年停刊,1901年更名《快报》(Express)复刊,日俄战争时期由美国人麦克米德接办,并得到沙俄政府的支持。

北京作为中国的首都,虽然不是通商口岸,但在第二次鸦片战争后也成了外国人觊觎的办报之地。1871年9月,在北京的英、美等国传教士发起成立“在华实用知识传播会”,以帮助华人“增广见闻,扩充智虑”为名,集议倡办报刊。1872年2月,正是这些外国传教士在北京创办起《中西闻见录》月刊,由美国传教士丁韪良(William Alexander Parsons Martin)、英国传教士艾约瑟(Joseph Edkins)和包尔腾(John Burdon)等人任主编。丁韪良为美国长老会传教士,曾受清廷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之聘,担任京师同文馆总教习,与官场高层人士往来密切,为他在京都办报提供了便利条件。《中西闻见录》作为“在华实用知识传播会”的机关刊物,为北京乃至华北地区最早的近代化报纸,自称“系仿照西国新闻纸而作”,每期发行千余份,多数为免费散发。该刊杂录各国新闻近事,以及天文、地理、格致之学,对科技知识的介绍比较多,既详细又实用,曾刊有介绍电报、瓦斯工业、铁工业、照相水和蒸汽机用途等方面的文章,其中艾约瑟翻译的《泰西河防》一文,对防治河患很有参考价值,为时论所称道。郑观应《盛世危言》中的部分篇章也曾在此刊发表,郑在该书的《自序》中说明道:“蒙向与中外达人哲士游,每于酒酣耳热之余,侧闻绪论,多关安危大计,且时阅中外日报所论安内攘外之道,有触于怀,随笔札记。历年既久,积若干篇,犹虑择焉不精,语焉未详,待质高明以定去取。而朋好见辄持去,猥付报馆及《中西闻见录》中。”^①该刊也刊有新闻,但以各国科技新闻为多,对时事政治问题和国内

① 夏东元编:《郑观应集》七册,235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

新闻很少涉及。《中西闻见录》在北京的出版，突破了外人从事在华办报活动的最后一个禁区。1875年8月，《中西闻见录》出至第36期后停刊。1891年，《华北新闻》创刊，为基督教华北公理会主办的中文刊物，由美国传教士梅子明（William Scott Ament）主编，每期发行约500份。

澳门作为中国近代报业的发源地之一，其报业虽然在鸦片战争后对中国社会的影响已日渐衰减，但仍有所发展。自1842年至1894年间，澳门出版的葡萄牙文报刊有《大西洋国》（Ta-Ssi-Yang-Kuo）等17种。由于当时中国人中懂葡萄牙文者为数甚少，且这些葡文报刊所刊内容以葡萄牙政情为主，因而其对中国社会的影响力也十分有限。第一份对中国社会发展产生较大影响的是1893年7月18日创刊的《镜海丛报》。该报为周刊，分葡文、中文两版，发行地区遍及香港、石岐、佛山、广州、福州、厦门、上海、汉口、新加坡、菲律宾、旧金山等，刊有各类新闻、言论等内容，“东主兼督印人”是葡籍印刷商法·连斯哥·飞南第（Francisco H. Fernandes）。该报与孙中山关系密切，曾刊有孙中山所写的《农学会序》等宣传资产阶级革命民主思想的文章，第1版所刊的针砭时事、鼓吹反清革命思想的文章，据说都是孙先生的手笔，第5、6版还刊有孙中山的《医药问答》、经孙中山治愈的病人刊登的鸣谢和赞扬孙中山医道的广告等，由此而有人认为该报的实际主持者及编辑者是孙中山。《镜海丛报》出版两年后，其中文版于1895年1月23日停刊，葡文版于1895年6月10日停刊。

二、在华外报的历史作用

在华外报的历史作用，即在华外报对中国近代社会发展的影响，可归纳为以下三点：

（一）外人在华办报活动是一种殖民主义文化侵略活动

在华外报的出现以及由东南沿海向中原腹地步步深入，是与西方殖民势力的入侵和扩张同步进行的。应该看到，鸦片战争前后来华的外国人情况相当复杂，确有许多怀着侵略野心的，也有一些纯粹出于传教的目的，更多的也许是想寻找发财的机会。但是有一点是共同的，他们企图打开中国封闭的大门，他们宣传基督教和西方文明，企图以西方模式改变中国人的头脑。这种做法实际上就是将中国逐步推向殖民地的道路。

从在华外报的政治倾向来看，鸦片战争之前，大多数外报，特别是英文报刊，都积极为英国倾销鸦片政策辩护，鼓吹对中国实施武装侵略。鸦片战争以后，又为新的侵略扩张行为制造舆论，为助纣为虐的“洋枪队”屠杀太平军大唱赞歌。一些外报特别赞扬西方殖民主义统治下的印度，鼓吹中国应走印度的道

路，其殖民主义的立场是十分明显的。许多在华外报的主持人，更是直接投入到侵华活动中去。如郭士立就曾为英国侵略军充当向导，在英军侵占舟山时，还直接担任当地的行政长官。麦都思曾担任英国侵略军的翻译，成为上海工部局董事会董事。裨治文则担任过侵华美军司令的翻译，参与签订《望厦条约》的活动。像这样的人物，他们所办的报刊自然是为西方殖民主义者侵略中国的总目标服务的。

我们还应看到，同样是外国人办的报纸，英文报纸要比中文报纸的侵略性更强、反华的叫嚣更露骨；葡文报纸与英文报纸也不一样，葡文报纸对中国事务较少注意，一般能保持中立。即使同是英国人办的英文报纸，也有的对中国持友好态度，如英商台仁特主持的《中国之友》报，始终同情太平天国革命，并敢于揭穿英国政府为挑起第二次鸦片战争，借口中国士兵撕下“亚罗”号船上英国旗的谎言。但是这样的英文报纸毕竟是凤毛麟角，为数极少。

（二）外报的出版客观上促进了中西文化交流

西方国家在 18 世纪以后科学技术得到突飞猛进的发展，中国则停滞不前，明显落后于西方。清朝政府为了遏制西方殖民势力的入侵，采取闭关自守的政策，禁止传教、严格限制通商，致使中外文化交流隔绝，也阻碍了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传入中国。自我封闭的结果，只能使中国越来越落后，越来越弱。所以闭关政策被打破，中西文化交流得以恢复，对中国来说也并非坏事。在华外报所作的科学文化知识的介绍客观上促进了中西文化的交流。

从《察世俗每月统记传》开始，外国人办的中文报刊就已经把自然科学知识，诸如日蚀、月蚀、地球运转等等向中国读者作了通俗化的介绍。随着洋务运动的兴起，实用科技方面的介绍越来越多，如治河、防火、炼钢、探矿、造纸、织布等等。还介绍一些新的科技发明，如轮船、火车、电灯、电话、电报、照相、千里镜、显微镜等。这些都使中国读者大开眼界。尽管办报的西方人士刊登这些科技知识有其多种用意，如显示西方文化优越，以取得中国人对他们的尊重；或表示对中国人的友好，将知识传播给读者；或作为一种手段，吸引中国人入教。但是，将西方有益有用的科学知识和先进技术介绍到中国来，通过东西方文化交流使中国固有文化提高一步，毕竟是一件好事。

外报中还大量介绍世界各国的地理、历史和现状，宣扬英美等国政治开明、社会繁荣，介绍西方的富强之道，诸如开矿、筑路、办厂、兴学、通商、理财等等办法。他们为了对抗中国传统的封建文化，从 19 世纪 70 年代以后，断断续续地介绍了西方的政治制度、经济制度和社会制度，于是中国人才知道市场经济、议会政治、出版自由、男女平等、民主法制等等思想。自由、平等、博爱等资产

阶级革命的口号在中国也逐渐深入人心。实际上外报所宣传的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方面的知识，其对中国社会的影响大大超过自然科学技术方面的介绍。它对长期处于封建思想禁锢下的中国读者具有深刻的启蒙作用。

（三）外报的实践有助于中国民族报业的发展

近代报刊为资本主义社会的产物，它与封建邸报不同之处是有独立撰稿权，记者和编辑可以自行采写新闻，发表评论。正是这一点，近代报刊体现了民主主义观念，也正因为这一点，它不能为专制独裁的封建统治者所容忍。所以如果不是西方殖民者在强行进入中国之时将近代报刊也带来中国的话，在严厉的封建统治之下是不可能产生近代报刊的。

西方各国早在 16 世纪末和 17 世纪初就已经有了印刷报纸，到 17 世纪后半叶日报也已问世，所以传教士在 19 世纪初来到中国时，他们所掌握的办报技术已经相当成熟，在华出版的外文报刊在形式上与欧美最先进的报刊并没有多少区别。外国人办的中文报刊，为了适应中国人的传统习惯，采取线装书的形式。但是当 1827 年第三种中文报刊《天下新闻》问世时，已改为散张形式，更接近于一张近代报纸了。

鸦片战争以后，对外国人办报活动的限制已经解除，他们可以像在本土一样自由自在地进行采访、编辑、出版，并且雇用中国文人当助手。通过外报的办报实践，西方的新闻采访与编辑业务、新闻事业的管理方法和发行、广告、印刷等技术也陆续为中国人所掌握。西方的办报经验为中国报业发展开辟了一条捷径，外报也为中国培养了第一代新闻工作者。当时著名的报人王韬、钱昕伯、蔡尔康、何桂笙、高太痴等等，无一不是在外报的办报实践中成长起来的。

石印和铅印技术也是随着外国人的办报活动传入我国的。1827 年广州出版的《广州纪录报》便是用英文铅字印刷机印制的。鸦片战争后，英华书院于 1844 年从马六甲迁来香港，成了中国第一家拥有中文铅字设备的印刷机构。1853 年创刊的《遐迩贯珍》，便是由英华书院铅印设备印刷的。

石印技术在鸦片战争前夕引入我国，1838 年创刊的《各国消息》便是石印出版的，当时在广州已有石印机 3 架。1874 年上海天主教土山湾印书馆设立石印部，已有中国石印技师，《点石斋画报》便是聘请中国石印技师印刷的。铅印和石印技术的引进为国人自办报刊创造了有利条件。

【学习思考题】

1. 中国近代报刊是在什么历史背景下诞生的？

2. 《察世俗每月统记传》是怎样办起来的？它的宗旨和特点是什么？
3. 《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是怎样办起来的？它的宗旨和特点是什么？
4. 简述鸦片战争后外报在香港的发展情况。
5. 简述鸦片战争后外报在上海的发展情况。
6. 在华外报的历史作用有哪些？



第三章

国人办报活动的兴起与在维新运动中报业的大发展

第一节 国人办报活动的兴起

一、国人办报活动的先声

鸦片战争前后，随着外国传教士在中国办报活动的开展，西方新闻思想开始逐渐传入中国。

最早接受西方新闻思想的人是林则徐和魏源。1838年3月，林则徐以钦差大臣的身份到广东禁烟。林有鉴于各级官吏不谙外情、处处受制于人的情况，提出了“探访夷情，知其虚实，始可以定控制之方”的主张，并组织专人翻译外报，将这一主张付诸实践。之后，魏源又顺着林则徐的这一思路发展，提出了“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主张。从林、魏二人的主张中，可以看到他们对报刊沟通信息的功能已经有了初步的认识。

1859年，太平天国后期将领洪仁玕在其向天王洪秀全进呈的《资政新篇》中，从整个国家政权结构的宏观角度着眼，高度评价了报纸（“新闻篇”）在社会结构中的重要地位，提出了设立新闻馆、设置新闻官、“准卖新闻篇”（即报纸）等新闻主张。洪仁玕说：“设新闻馆以收民心公议，及各省郡县货价低昂，事势常变。上览之，得以资治术；士览之，得以识变通；农商览之，得以通有无。昭

法律，别善恶，励廉耻，表忠孝，皆借以行其教也。教行则法著，法著则知恩，于是民相劝戒，才德日生，风俗日厚矣。”而新闻馆应“准富民纳饷禀明而设”。他还说：“兴各省新闻官。其官有职无权，性品诚实不阿者。官职不受众官节制，亦不节制众官，即赏罪亦不准众官褒贬。专收十八省及万方新闻篇有招牌图记者，以资圣鉴。则好者股栗存诚，忠者清心可表，于是一念之善，一念之恶，难逃人心公议矣。”洪秀全对于上述建议，有的完全同意，硃批：“此策是也。”有的则并不完全同意，如准卖新闻篇和设置新闻官两条，硃批：“此策现不可行，恐招妖魔乘机反间，俟杀绝残妖后行，未迟也。”^① 综而言之，洪仁玕的主要新闻观点，可归纳为以下四条：（1）报纸是维系中央政权、加强集中统一领导的有力工具，可以通过报纸去“禁朋党之弊”，以消除种种弱本强末的离心力量；（2）办报是实现民主政治的手段，可以通过报纸这一桥梁，沟通太平天国领导集团和民众之间的公议；（3）报纸具有教育民众、移风易俗的作用；（4）报纸具有监督政府的作用。但是，太平天国在洪仁玕提出上述主张后不久即覆灭，因而洪仁玕的办报主张在当时并未有实施的机会。

继洪仁玕之后发表比较系统的办报主张的是王韬和郑观应。王韬是我国最早的报纸之一《循环日报》的创办人，他在《倡设日报小引》、《本局日报通告》、《论日报渐行于中土》、《论各省会城宜设新报馆》和《论中国自设西文日报之利》等文章中，论述了以下几个重要问题：

（1）论述了办报的目的与意义。王韬曾在其《上潘伟如中丞》书中阐述了他在香港主办《循环日报》的目的：“韬虽身在南天，而心乎北阙，每思熟刺外事，宣扬国威。日报立言，义切尊王，纪事载笔，情殷敌忾，强中以攘外，讴远以师长，区区素志，如是而已。”^② 简言之，王韬要借日报立言，通过报纸来宣传其变法自强的政治主张。之后，“办报立言”发展成为我国早期国人自办报刊的主要传统之一。

（2）论述了报纸的功能和作用。王韬认为：第一，报纸可以使“民隐得以上达”，只要在各省省会设立报馆，就可以“一知地方机宜”，“二知讼狱曲直”，“三辅教化之不及”，使报纸成为“博采舆论”的工具。第二，报纸可以使“君惠得以下逮”，报纸宣扬君王的恩德，传播朝廷的政令，使“君民上下互相联络”，消除隔阂，国家才能长治久安。第三，报纸可以“达内事于外”，他主张创办外

^① 《太平天国史料》，31～34页，上海，开明书局，1951。

^② 王韬：《弢园尺牋》，206页，转引自胡太春：《中国近代新闻思想史》，36页，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1997。

文报纸,开展对外宣传。第四,报纸可以“通外情于内”。王韬十分强调创办报刊介绍西方的国政民情,以便师其所长,避其所短。因此他建议设立翻译外报的专门机构,“汇观各处日报而撷取要略,译以华文,寄呈总理衙门”,使朝廷随时掌握外国情况,“即遇交涉之事,胸中自具成竹”^①。

(3) 论述了新闻自由的思想。王韬最早在国内提出了言论自由的要求,呼吁朝廷放宽言禁,允许民间创办报纸,允许报纸“指陈时事,无所忌讳”,“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戒”。

(4) 论述了报纸的文风。王韬认为,报纸的文风应该是直抒胸臆,词达而已。他说:“知文章所贵,在乎纪事述情,直抒胸臆。俾人人知其命意之所在,而一如我怀之所欲吐,斯即佳文。至其工拙,抑末也。”^②他甚至愤慨地说:“时文不废,天下不治。”时文是指当时盛行于文坛的桐城派古文。

(5) 论述了报纸编辑人员的条件。王韬认为,报纸的编辑人员应该是知识广博的“通材”,“不可不慎加遴选”,报纸的主笔“非绝伦超群者不得预其列”,他们应该品德高尚,持论公平,不得“挟私讪人,自快其忿”^③。

王韬的这些办报主张,在当时不失为出类拔萃的远见卓识,对于后世也有很大影响。

郑观应的新闻思想,主要见之于其撰写的专著《盛世危言》的《日报》等文章中。郑观应的主要新闻观点,可归纳为以下几点:(1)日报是“通民隐,达民情”的有力工具,“欲通之达之,则莫如广设日报矣”^④。郑观应还认为,广设日报是西方国家实行民主政治的枢纽。(2)创办报纸是中国变法自强的重要手段。他说:“今如欲变法自强,宜令国中各省、各府、各州、各县设报馆”,“其日报馆每日所出新闻,必以一纸寄京师,上呈御览……不准地方官恃势恫喝,闭塞言路”,“如是,则国势之隆无不蒸蒸日上”^⑤。(3)应该维护民族尊严,允许国人办报。郑观应对清政府只准外人而不准国人办报的愚蠢政策表示强烈的不满:“中国通商各口,如上海、天津、汉口、香港等处,开设报馆,主之者皆西人,每遇中外交涉,间有诋毁当轴,蛊惑民心者。”^⑥“奈何掩聪塞明,钳口结舌,坐使敌国怀覬觎之志,外人操笔削之权,泰然自安,庞然自大,施施然甘受他人之

① 转引自徐培汀等:《中国新闻传播学说史》,142~143页,重庆,重庆出版社,1994。

② 王韬:《弢园文录外编》,1页,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

③ 同上书,171~172页。

④ 夏东元编:《郑观应集》上册,345页。

⑤ 同上书,350页。

⑥ 同上书,346页。

凌侮也。”^① 建议“今宜于沿海各省，次第仿行，概用华人秉笔，而西人报馆止准用西字报章”^②。他呼吁清政府明令允许并支持中国人创办自己的报纸。(4) 制定报律来规范报业。郑观应明确提出了新闻立法的建议，要求清廷制定与颁行法律以保护人民的言论出版自由权利：“我各省当道，亦宜妥订章程，设法保护，札饬有体面之绅士倡办，以开风气。”^③ “无事之时，官吏设法保护，俾于劝善惩恶，兴利除弊……大、小官员苟有过失，必直言无讳，不准各官与报馆为难。”^④ “有事之际，官吏立法稽查：于本国之兵机，不宜轻泄；于敌人之虚实，不厌详明。”^⑤

二、上海、广州等地国人自办报刊的出现

早期国人自办报刊之滥觞，可追溯至禁烟运动期间林则徐的译报活动。但是，直至 19 世纪 70 年代后，随着中国内部要求社会变革的思潮的兴起和对外交往的日益频繁，中国人创办与出版近代报刊的活动才开始发展起来。

1839 年，林则徐作为钦差大臣到广东禁烟备战。为了“探访夷情”以制定“控制之方”，他派人到澳门搜集外国人出版的报刊，并在府中组织了翻译班子，将其中有关鸦片贸易和其他方面的消息、言论翻译成中文，提供给两广总督、广东巡抚、海关监督和军方，并抄报朝廷，作为制定对外政策的参考。这种翻译材料，先是零散的，并无名称，后来汇集成册，被称为《澳门新闻纸》。它是我国最早的译报，但还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报纸，只是内部传抄的新闻资料而不是公开发行的报刊。与其说它是大众传播工具，倒不如说它是情报工具。《澳门新闻纸》选译的外报主要是《广州周报》和《广州纪事报》。这两家英文周报原来都在广州出版，1839 年迁往澳门。此外，还有购自澳门的新加坡、孟买、加尔各答、伦敦、悉尼等地出版的报纸。林则徐当时聘用的翻译人员主要有四人，即梁进德、袁德辉、亚林和亚孟（音译）。其中林则徐最为赏识的是梁进德，他是参与编印《察世俗每月统记传》的中国人梁发的儿子。《澳门新闻纸》的重点是禁烟和兵事。在禁烟方面，选译了外报有关英国政府纵容和支持鸦片贸易、英国人民谴责鸦片贸易、支持中国禁烟和英国政府准备发动侵华战争的报道等。在兵事方面，选译了外报有关英国备战以及中国军备、水师、兵勇等情况，有关九龙、厦门战役的报道和评论等。另外，林则徐在译抄《澳门新闻纸》的基础上，又选择

① 夏东元编：《郑观应集》上册，348 页。

② ③⑤ 同上书，347 页。

④ 同上书，346 页。

其中的部分内容，按不同性质的问题，亲自加工、润色，编为《澳门月报》5辑，后来被魏源收入《海国图志》之中，署名“林则徐译”。林则徐组织译编的《澳门新闻纸》，在当时就受到一些外报的赞赏，称他是“聪明人”，对后世的影响则更大，梁启超、严复等人也曾“广译五洲近事”。

19世纪70年代后，中国人开始登上了已经被在华外人垄断的报坛，在神州大地上创办起了一批国人自办的近代报刊。

第一份国人自办的报纸，一说是1872年在广州出版的《采新实录》（又名《羊城采新实录》）。但是，这份报纸由于早已失传，具体情况又不可考，因而并不为新闻史学界所认同。因此，不少新闻事业史著仍把《昭文新报》视作中国人自办报刊之第一。《昭文新报》，1873年8月8日在汉口创刊，艾小梅创办，初为日报，装订如书册状，用白鹿纸印刷，三个月后以阅者较少而改为五日刊，内容以奇闻轶事、诗词杂作为主。继《昭文新报》之后，上海也出现了国人自办的近代报刊，后与广州一起成为早期国人自办报刊的两大基地。

上海自从开辟为对外通商口岸以后，凭借其优越的地理位置，很快就成为国内贸易的枢纽和对外贸易的中心，为国人在这里办报提供了良好条件。1874年6月16日创刊的《汇报》，是国人在上海办的第一家中文日报。创办人容闳，广东香山（今珠海市）人，少年就读于澳门马礼逊学校，后与黄胜、黄宽赴美国留学。回国后曾参与洋务派办企业、办教育，后又参与改良派、革命派的许多政治活动。1872年，容闳以留美学生副监督的身份赴美，次年回国筹办《汇报》，共集资白银1万两，投资者多为粤人，广东籍上海知县叶廷眷、招商局总办唐景星也曾予以支持。由于股东们担心办报惹祸，特聘英国人葛理（Grey）任名义上的总主笔，而实际上主持报务的是广东人邝其照。《汇报》一创刊就公开宣言：“本局为中华日报，自宜求有益于中华之事而言之。故于有裨中国者，无不直陈，而不必为西人讳。”为了维护民族利益，该报曾多次同外商办的《申报》和《字林西报》进行笔战，并在消息和评论中常涉及政事，遭到官府非议。部分股东因此要求退股。9月1日，该报进行改组并改名《彙报》，由葛理出面承顶并任发行人，以求得政治上的庇护，实际产权未变，主笔改由管才叔继任。出版未及一年，又因种种困难而再次改组，聘朱莲生为主笔，并于1875年7月16日更名为《益报》，以示报纸对官府有益而无害，但仍受到官府的的限制和《申报》的攻击，勉强维持至年底，朱莲生辞职，《益报》停刊。从《汇报》一年半的出版历程，可见当时中国人办报之艰难。

1876年11月23日，上海又出现了一份取名《新报》的国人自办报纸，日出对开1张，以各省商帮的名义发行，但实际上的主办人是上海道台冯俊光，经

费也全部出自道库，主笔由袁祖志担任。初创时中英文合刊，翌年6月11日起改为纯中文报纸。《新报》的办报宗旨，其创刊号上发表的《本馆告白》宣称：“窃以入仕经商，所贵周知夫时事；居无易有，必当博采夫世情。如朝廷之政教维新，京外之升迁调补，暨列国政令之变置，各货居积之所宜，以及岁时收成厚薄，货物行销利钝，价值高下，船只往来，或时事，或异闻，皆为仕商之切要，要经营之不可少也。”据此宗旨，该报所刊内容，除转录京报和苏省辕门抄外，还刊有本埠新闻、各地新闻及国际新闻，涉及政治、军事、外交、商情等方面，且“于京省各报，则求速而且详；于西字诸报，则求译而无误；时事则查访的实，货价则探听确真。”^①由于该报为上海道台所控制，因而还明确宣布“国政则不可议也”，规定凡“疾世愤时”之作一律不予发表。1882年7月14日，《新报》并入上海机器制造局，转为该局机关报，旋停刊。

此外，这一时期在上海出版的其他国人自办报刊还有《侯鲭新录》、《词林书画报》、《飞影阁画报》、《华洋日报集成》、《中西文报》、《艺林报》、《告白日报》、《海上奇书》。

在广州，中国人私自刊刻的“新闻纸”的出现可能不会晚于1883年。1883年12月间，广东南海、番禺两县曾为此而出告示禁止私刊“新闻纸”类印刷品：“南海县正堂卢、番禺县正堂张为出示晓谕事：照得中国与西洋各国通商和好有年，允宜受约相安，共享权利。访闻近有不法之辈，伪造谣言，并私自刊刻新闻纸等项，沿街售卖。本月初五、六两日，竟有一二匪徒意欲聚众至礼拜堂滋扰，借端生事。实属愍不畏法。除飭差严密查拿外，合行出示晓谕。为此示谕属内军民人等一体遵照：尔等须知前项情弊，均属有干禁令。现在中外各国和好，本无异心。倘经此次示谕之后，尔等仍复有伪造谣言刊卖新闻纸，及聚众滋扰各节，即以谣言滋事之罪按律惩办，决不姑宽。各宜凛遵毋违。特示。”^②

但是，目前已知的第一份在广州出版的国人自办报纸是《述报》，创刊于1884年4月18日，由广州海墨楼石印书局印刷发行，每日出版4页（版），内容有中外新闻和评论、西方书报译稿、商业行情、轮船班期和广告等。该报创刊之日，正逢中法战争爆发，因而其版面的70%都是有关中法战争的消息、电讯、评论、译论和来论等，连续、详尽地报道了这次战争的发展过程、战役实况以及官方态度、社会舆论等，并发表了许多颇有见解的评论，主张对法作战，反对“输金议和”，表现出该报鲜明的爱国立场。该报还积极支持省港两地人民的抗法

^① 《本馆告白》，载《新报》，1876-11-23。

^② 转引自《新闻研究资料》，第9辑，213页，北京，新华出版社，1981。

斗争，报道了不少有关刘永福黑旗军和法国侵略军作战的消息，称赞刘永福为“今之人杰”，对清廷当局的妥协活动则明确表示强烈不满。值得一提的是，《述报》在业务上十分重视图像新闻的报道，自创刊之日起，每期都刊登一幅或多幅新闻纪实图画，与文字新闻穿插编排，力求做到图文并茂。《述报》出版一年左右后停刊。

继《述报》后，《广报》于1886年6月24日在广州创刊，日刊，邝其照为创办人。该报设有宫门抄、辕门抄、上谕、著论、新闻等栏目，形式与《申报》略同，除中外新闻外，也刊登一些匡正时弊的文章。该报的发行面很广，除广东各地和香港、澳门、上海外，还发行到新加坡、西贡、小吕宋、旧金山等地，颇受海外侨胞欢迎。1891年，该报发表了一条某政府要员被参的消息，触怒两广总督兼署粤抚李瀚章，被李下令封禁。封禁令指责该报“辩言乱政”、“妄谈时事，淆乱是非，胆大妄为”，并责成番禺、南海两县“严行查禁”。于是，邝其照等人只得将馆址迁至沙面租界，由英商必文出面，改名为《中西日报》继续出版，主笔政者有劳亦渔、武子韬、陶檀庵等。由于《中西日报》借用洋人的名义，又栖身于租界，因此“渐肆议论，指摘政治，官无如何”。该报后又迁回广州城内，1900年因刊登义和团战胜八国联军的消息，被英、法等国殖民者勾结广东地方当局查封。是年冬，邝其照等人又将报纸改名《越峤纪闻》继续出版，因发行受阻，不久停刊。

在1891年《广报》改组为《中西日报》之时，国人自办的《岭南日报》（英文译名是：The Southern Times）在广州问世，劳保胜、武子韬、朱鹤等主办，日出8开8版，主要栏目有上谕电传、督宪牌示、论说、本省新闻、中外新闻、来稿照登、西报汇译、京报照录、各行告白、货价行情等，编辑方针与《广报》、《中西日报》相同，出至1897年停刊。

除上海、广州两地外，汉口在这一时期也出现过一份国人自办报刊。1889年间，《公论报》在汉口创刊，李涵秋主编，后由江汉关职员宦海之接办。该报言论倾向于官方，有“官报”之称。1907年后改名为《公论新报》继续出版，为辛亥革命前在武汉地区出版的重要报纸之一。

三、《循环日报》与早期香港国人自办报刊

这一时期，由于香港已为英国所割据，清朝封建统治势力鞭长莫及，因而中国人在香港出版的近代报刊办得最为成功。王韬主办的《循环日报》，是早期国人自办报刊中最出色的一份。

1874年2月4日，《循环日报》在香港创刊。我国早期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

想家王韬是该报的创办人和第一任主笔。王韬（1828—1897），初名利宾，后易名瀚，字懒今，江苏甫里（今苏州角直）人，自幼资赋聪敏，八九岁时已“通说部”、“毕读群经”，18岁考取秀才。1849年，王韬应邀去上海，在外国传教士麦都思主办的墨海书馆任中文编校工作。1861年冬，因老母病危，王韬回家乡探亲，据说曾化名“黄畹”上书太平军苏州地方长官献计献策，回上海不久后因此事为清政府所通缉，1862年8月流亡香港，更名韬，字仲弢，一字紫诠，自号弢园老民、天南遁叟等。王韬到香港后，受到英华书院院长理雅各的赏识，协助理雅各翻译中国典籍，并一度主编《近事编录》，在1867年至1870年间还随理雅各到英国“佐译经籍”，又两度游法，对西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了直接考察。这一切，使王韬深感中国落后，认识到必须顺应历史潮流、奋起直追，才能使中国走上富强之途。1870年后，王韬与友人黄平甫集资购得英华书院的印刷设备，组成中华印务总局，接着又创办起《循环日报》，自任主笔，主持该报笔政有10年之久。1884年，王韬回上海定居，曾担任上海格致书院院长，创办弢园书局，并尽其余力从事撰作，著有《弢园文录》、《瓮牖余谈》、《弢园文录外编》等，1897年病逝。

在王韬的主持下，《循环日报》以“强中以攘外，诚远以师长，变法以自强”为办报宗旨，是我国近代第一份宣传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想、公开鼓吹变法的报纸之一。该报取名“循环”，是因为其创办人王韬是循环论的信奉者。王韬认为，“弱即强之机，强即弱之渐，此乃循环之道然也”。正是利用《循环日报》这一舆论阵地，王韬先后在该报上发表了数以百计的政论文章，评论时事政治，鼓吹变法自强。他指出：“穷则变，变则通。知天下事，未有久而不变者也。”他主张在政治上建立一个君民共治的国家，使“民隐得以上达，君惠得以下逮”；在经济上大力开发矿藏，修筑铁路，扶持民族工商业，以实现国家富强；在外交上维护国家主权和独立，反对列强对中国的侵略。

在业务上，《循环日报》对我国近代报业发展的最大贡献，就是首创一种以政论为灵魂的报纸。这种报纸，既有别于以传抄上谕、刊发奏章为主要内容的我国古代报纸，又有别于以传播教义、刊载商情为主要内容的近代外报，而是以“立言”为目的，利用报纸纵论中外形势，指陈时弊，褒贬得失，提出建议，使人耳目一新。作为一份政论报刊，《循环日报》还大胆改革文体，建设报刊政论文体。王韬为《循环日报》撰写的政论，立场鲜明，短小精悍，深入浅出，通俗易懂，而且富于感情，后来发展成为一种新的报章文体，对当时的文坛和以后的维新派报人有很大影响。王韬的政论文章，后汇编为《弢园文录外编》，于1883年5月在香港出版，被称为我国最早的一部报刊政论文集。此

外，王韬还为《香港华字日报》等报刊撰写政论文章，极力鼓吹变法，后也收入《弢园文录外编》一书中。此外，《循环日报》的新闻约占三分之一篇幅，分为三栏：首录《京报》，次为“羊城新闻”，又次为“中外新闻”。因消息不足，常登载野语稗史以资补白。该报的新闻部分用白报纸印刷，船期部分用土纸（南山贝）印刷。1875年，《循环日报》增出月报一种，择重要时事汇为1册，因销路不畅出版不满一年即停刊。1878年，《循环日报》为争取读者起见，特将每晨出版的日报提前于头一天傍晚印好送出，成为香港最早的汉文晚刊日报，1882年后又取消每晚提前出版第二天日报的办法，恢复每晨出报。该报的编撰人员，除主笔王韬外，协助编辑、撰稿工作的还有钱昕伯、冯翰臣、洪孝充、黄子葵、刘凌洲、黄辉墀、李石樵、郭赞生、周重生、胡礼垣、吴琼波、温俊臣、潘蕙畴、何冰甫等。

继《循环日报》之后，又有《维新日报》、《粤报》等国人自办报刊陆续出版。1879年（一说1880年），《维新日报》创刊，由陆骥纯独资创办并担任发行人，继陆骥纯之后主办该报的还有陆健康、黄道生等，1908年刘少云接办，次年改名为《国民日报》。该报是一份维新派报纸，在19世纪末宣扬君主立宪思想，在当时闭塞的中国社会中具有启蒙作用，因而颇受读者欢迎。但在孙中山倡导的民主革命学说逐步深入人心以后，该报也就逐渐为读者所摒弃，出至1912年停刊。1885年，《粤报》（又名《香港粤报》）创刊，创办人为罗鹤朋，曾任香港英商汇丰银行买办。1886年，该报为卢敬之购得，此后担任过督印人的还有黄子葵、黄南庐、温俊臣等。粤报馆除出版日报外，还兼营印刷业务，4年后报纸停刊。1889年，《日报特选》（Extracts from Newspapers）创刊，由中华印务总局发行。该刊为文摘性期刊，刊期不详，每期20页，毛边纸铅印。内容分京报、中外新报、广报、海防日报及中外新闻等栏。此外，1883年间，英国人罗郎也将其创办的中文日报《近事编录》产权转移给在港国人，使该报成为一份国人自办报刊，每年订费也由5元减至4元，但不久因销路不佳而停刊。

第二节 维新变法运动与第一次国人办报高潮

一、《中外纪闻》、《时务报》等维新派报刊的创办

19世纪90年代中期，中国资产阶级改良派发动的变法维新运动席卷神州大地。与此同时，一个国人办报高潮在全国范围内兴起。据不完全统计，从1895年至1898年的三年间，全国出版的报刊有120种左右，其中80%以上是中国人

办的，它们遍及全国的许多城市，推动了维新运动的发展，并且打破了外报在华的优势，成为中国社会舆论的主要力量。康有为、梁启超、严复等人以及他们办的报刊在这次高潮中发挥了积极作用。

康有为（1858—1927），字广厦，号长素，广东南海人，出身于诗书继世的官宦之家，从小受到严格的传统教育和较好的文化熏陶。11岁那年，他在祖父的官舍“频阅邸报，览知朝事”。22岁那年他第一次游历香港，对这个英国殖民地进行考察，“始知西人治国有法度，不得以古旧之夷狄视之”。25岁那年，他赴京考试落第后途经上海，看到“上海之繁盛，益知西人治术之有本”。在香港和上海，他收集了大量西学书籍和报刊带回广东学习研究，其中对他影响最大的是外国传教士在上海办的《万国公报》，以至他后来创办的第一份报刊也袭用了这个名字。1891年，他在广州创办长兴学舍，收徒讲学，培养了一批维新骨干，其中最有名的是梁启超。1895年5月2日，在甲午战败的危急形势刺激下，正在北京参加会试的康有为联合全国18省参加会试的举人1300人，举行了闻名中外的“公车上书”，要求朝廷变法维新。在“公车上书”中，康有为提出“纵民开设”报馆的建议，把办报视作维新变法的重要内容之一。接着，康有为、梁启超、陈炽等在北京着手筹办报纸和学会。康有为认为，要开通风气，“非合大群不可”，而要合大群，“非开会不可”^①。梁启超也认为：“欲开会，非有报馆不可。报馆之议论既浸渍于人心，则风气之成不远矣。”他们在这里所说的“开会”，指的是组织社会团体。梁启超还函告友人：“顷拟在都设一新闻馆，略有端绪”，“此举有成，其于重心力量颇大也”^②。

不久后，我国资产阶级改良派出版的第一份报刊《万国公报》于1895年8月17日在北京创刊，康有为、陈炽等负责筹募经费，康有为的两大弟子梁启超、麦孟华担任编辑。当时北京没有铅印机器，该报只好委托民间报房用木板雕印，《万国公报》两天出版一期，不署出版时间及地点，由各报房的报贩在递送《京报》时免费附送在京的“王公大臣”及“士夫贵人”等各级官绅阅读，起初每期送出千余份，以后最多送出三千份左右。同月，康有为、梁启超、文廷式、陈炽等联络部分官僚士大夫和知识分子，在北京成立强学会，推陈炽为会长，梁启超任书记员，每十天聚会一次，并创办强学书局，讲论“中国自强之学”。袁世凯、孙家鼐、张之洞，英国驻华公使欧格纳，英美传教士李提摩太、李佳白、林乐知、毕德格等都参加了该会的活动。强学会成立后，《万国公报》转为该会的机

①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第4册，133页，上海，神州国光社，1953。

② 转引自丁文江等编：《梁启超年谱长编》，40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

关报。该报所刊内容以讲论洋务为主，每期刊载文章一至三篇，题目有工商、铁路、邮政、兵制、学校、报馆等，其中必有梁启超所撰论说，其余大多选自广学会出版的书籍。《万国公报》的出版在京师引起强烈反响。虽然“守旧者疑谤亦渐起”，但却受到具有维新思想的士大夫的欢迎。正如康有为所说：“报开两月，舆论渐明。初则骇之，继而渐知新法之益。吾复挟书游说，日出与士大夫讲辩，并告以开会之故，明者日众。”^①

1895年12月16日，强学会主办的《万国公报》改名为《中外纪闻》，继续在北京出版，康有为亲自题写报名。该刊仍为两日刊，署有出版月日，不编期号，每册10页，共4000多字，木活字印刷，由强学书局刊行，发行地点在北京宣武门外后孙公园，仍由梁启超、汪大燮主编。作为强学会的机关报，《中外纪闻》的经费比《万国公报》雄厚得多，不再仅靠康有为独立支撑，而是大量接受了袁世凯等达官贵人的捐款。从内容上看，《中外纪闻》除论说外，增加了外电、外报选译和国内各报摘录等内容，还有上谕等。康有为在该报上发表的《开会主义书》（即《强学会序》），陈述了中国的危急形势，接着又以印度、土耳其、安南、朝鲜的亡国遭遇为例，沉痛地勾画出中国亡国以后的“惨烈之状”；最后号召士大夫和知识分子以德国、日本为榜样，开展变法维新运动，以挽救中国的危亡。文章写得慷慨激昂，扣人心弦，是一篇重要的维新派政治宣言。《中外纪闻》的出版，受到了倾向于维新变革的政府官员及士大夫知识分子的欢迎，也使更多的中国人“渐知新法之益”，“识议一变”。

1896年初，上海也出现了一份维新派报刊。1月12日，《强学报》创刊。该报的出版，是康有为南下宣传维新变法主张的结果。1895年10月间，康有为有鉴于他领导创建的《万国公报》和京师强学会的活动已引起封建顽固派的注意，大学士徐桐等人打算上书弹劾的情势，决定离京去南方继续发动。10月17日，康有为离开北京，先去南京，游说两江总督张之洞，获张的许可和捐银1500两。之后，康有为到上海，与梁鼎芬、黄遵宪、汪康年、张謇等人共同发起，于11月下旬建立上海强学会，康有为亲自草拟的《上海强学会章程》宣称：“本会专为中国自强而立”，并提出了学会应做的四件“要事”，其中一项就是“刊布报刊”。经过短时间的筹备，上海强学会办起了自己的机关报《强学报》。该报由康有为的弟子徐勤、何树龄主编，五日一出，铅字印刷，页数不等，免费派送，其政治色彩较《万国公报》和《中外纪闻》更为浓厚，旗帜鲜明地倡导变法维新，发出了“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不变则不能久矣”的警告，明确提出了“明

^①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第4册，133页。

定国是”、“开设议院”等政治主张。该刊发表的《开设报馆议》一文，阐述了报纸在维新运动中的作用，即“广人才，保疆土，助变法，增学问，除舞弊，达民隐”。这几句话，实际上就是《强学报》的办报宗旨。《强学报》还不用大清年号而用孔子纪年，借以“托古改制”。这些激进的表现，当然为张之洞不满。张怀疑康托古改制是图谋不轨，要求该报取消孔子纪年，并打算对《强学报》进行改组。徐勤将此消息报告康后，康有为明确指示说：“彼有不办之心，我有必办之意”，要求徐勤等人“忍辱负重”，坚持把报纸办下去。

维新派组织学会、创办报刊的活动，当然要引起封建顽固派的极度恐慌。在北京，先是“谣逐蜂起”，以至《中外纪闻》“送至各家门者，辄怒以目，驯至送报人惧祸及，悬重赏亦不肯代送矣”。1896年1月20日，御史杨崇伊秉承内阁大臣、文华殿大学士李鸿章旨意，参劾强学会植党营私，刊印《中外纪闻》，“按户销售，犹复藉口公费，函索外省大员，以毁誉为要挟”，请饬严禁。清廷即据折命都察院“查明封禁”。于是，《中外纪闻》被迫停刊，共出18期。强学书局于1月29日改为官书局。先此，张之洞指责康有为“并不公商，遽先刊报”，于1月25日下令解散上海强学会，停办《强学报》。《强学报》只存在了14天，出版了3期，但目前仅见两期，因第3期印好后未来得及发行。京、沪两地的强学会及其机关报《中外纪闻》和《强学报》虽然被封建顽固派和洋务派扼杀了，但它们的影响是扼杀不了的。强学会的成立，标志着酝酿了几十年的变法维新，已由思想宣传转变为有组织政治活动。《万国公报》、《中外纪闻》和《强学报》的出版，冲破了封建“言禁”，为即将到来的国人办报高潮拉开了序幕。更重要的是，这些活动培养和锻炼了维新派的办报骨干，为维新派报刊宣传活动的全面展开打下了基础，使变法维新成为不可阻挡的时代潮流。

1896年夏，随着维新活动的重新崛起，维新派报刊也纷纷创刊，将维新派的办报活动推向高潮。1896年8月9日，《时务报》在上海创刊，打响了维新运动东山再起的第一炮。该报的筹备工作，是在黄遵宪带头下进行的。黄遵宪（1848—1905），字公度，广东梅县人，曾任清政府驻日、英使馆参赞和驻旧金山、新加坡总领事，是清末著名的维新派官员。上海强学会被查封后，他“愤学会之停散，谋再振之，亦以报馆为倡始”，并带头“捐金一千元为开办费”，其余经费来自上海强学会余款和其他人的捐赠。《时务报》创刊后，由梁启超任总撰述，汪康年任总经理。梁启超（1873—1929），字卓如，号任公，广东新会人。曾用笔名有饮冰室主人、哀时客、少年中国之少年、中国之新民等四十余个，是清末影响较大的资产阶级报刊宣传家之一。他自小熟读经史，17岁中举人，18岁晋京会试，落榜而归，遂拜康有为为师，学习今文经学，并大量阅读西方书籍

和传教士在中国所办报刊。1895年他和康有为晋京会试期间参加了“公车上书”，尔后主编《万国公报》和《中外纪闻》，开始在舆论界初露锋芒。《中外纪闻》被迫停刊后，他的衣服、用具、书籍均被没收，“流浪于萧寺中数月”而“办报之心益切”。这时，黄遵宪等人在上海筹办《时务报》，邀他南下办报，他便毅然来到上海，主持《时务报》笔政。1897年10月，梁启超在主持《时务报》笔政一年零三个月后，因忍受不了张、汪的排挤，接受了湖南时务学堂的邀请，愤然离职赴湖南长沙就任时务学堂总教习，并参与《湘报》的筹办事宜。1898年“百日维新”期间，他积极参与各项新政活动，并受命筹办京师大学堂和译书局。戊戌政变后，梁启超逃亡海外，先后在日本创办《清议报》、《新民丛报》、《新小说》、《政论》、《国风报》，在檀香山创办《新中国报》，大力介绍西方资产阶级的社会政治学说，鼓吹保皇立宪，被誉为“言论界之骄子”。辛亥革命后，梁启超回国，曾任袁世凯政府的司法总长、段祺瑞政府的财政总长，也参加过反袁斗争，主编过《庸言》、《大中华》、《改造》等杂志，晚年在清华大学讲学并担任北京图书馆馆长，1929年病逝北京。回顾梁启超的一生，其办报生涯自1895年在北京主编《万国公报》起至1922年脱离报界，前后共有27年，亲自创办和积极支持过的报刊有17家，撰写各类文字1400万言，其办报实践对我国近代新闻事业的发展具有重要贡献，其新闻思想对当时的报界产生过很大的影响。

《时务报》每期约3万字，所刊内容有政论、谕折、京外近事、域外报译、西电照译等。创刊初期，梁启超一人担负全部编撰工作，每天除撰写四千多字的评论外，还要撰写、修改两万多字的文稿。他在《时务报》上发表的数十篇政论，最为著名、也最有影响的是《变法通议》。这篇长文，自创刊号起在报上连载了43期，涉及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各个方面的问题，第一次全面系统地阐明了维新派的变法主张。梁启超在创刊号上发表的《论报馆有益于国事》一文，大力鼓吹多办报纸，主张报刊应“广译五洲近事”、“详录各省新政”、“博搜交涉要案”、“旁载政治学术要书”，以启民智，以开风气，以助变法。梁启超认为：“去塞求通，厥道非一，而报馆其导端也”；“其有助耳目喉舌之用而起天下之废疾者，则报馆之为也”；“阅报愈多者其人愈智，报馆愈多者其国愈强”。《时务报》大胆而新颖的言论使朝野大为震动，所译外报文章又使读者大开眼界，因而“举国趋之，如饮狂泉”。尤其是梁启超撰写的文章，更是风靡一时，以至于“上自通都大邑，下至僻壤穷陬，无不知有新会梁氏者”。1896年9月，湖广总督张之洞向其湖北属吏推广《时务报》，指示善后局每年拨款定购该报288份，“全省文武大小各衙门，文职至各州县各学止，武职至实缺都司止，每衙门俱行

按期寄送一本，各局各书院各学堂分别多寡分送”^①。1897年2月，湖南巡抚陈宝箴决定以部院公款订购《时务报》并分发全省各书院，供诸生“次第传观，悉心推究”。先此，浙江巡抚廖寿丰也指令各地方官以公款订购《时务报》，分发所属各书院。此外，两江总督刘坤一、山西巡抚胡聘之、安徽巡抚邓华熙、江苏学政龙洪霖、贵州学政严修、江西布政使翁曾桂等督抚也曾通札各属及书院诸生悉行阅看《时务报》。正是由于读者的欢迎和官府的提倡，《时务报》的发行量与日俱增：创刊时发行3 000多份，半年后增至7 000多份，一年后增至12 000多份，而最高发行量则达到17 000份，创造了当时报刊发行量的最新纪录，成为维新派最重要的、影响最大的机关报。

《时务报》赢得了要求变革的爱国臣民的支持和称许，也遭到封建顽固派和洋务派的反对和嫉妒。一些后党大臣纷纷上书，指责维新派的变法宣传“以笔舌倾动人主”、“藉报章鼓簧天下”，诬蔑办报人是“混迹报馆”的“无赖者”，要求朝廷查禁。洋务派首领张之洞见此情形，虽然半年前曾称赞《时务报》“识见正大，议论切要”，“实为中国创始第一种有益之报”，但这时立刻收帆转舵，以梁启超、徐勤、欧榘甲等人的言论“太悖谬”为由横加干涉，企图将《时务报》的言论纳入其设定的轨道。由于梁启超等维新派人上意志坚定，继续大声呐喊，张之洞后又通过他在《时务报》的代理人汪康年竭力排挤梁启超，从内部进行劫夺。汪康年（1860—1911），字穰卿，杭州人，曾任张之洞的家庭塾师及幕僚，深得其信任。1895年上海强学会成立时张曾捐银1 500两作为活动经费。不久强学会解散，这笔钱尚有剩余，即由汪康年收存，转为《时务报》的创办经费。这样，张之洞便以该报的大股东自居，汪成了他的代理人。创刊初期，笔政由梁启超主持，汪康年只管行政事务，不干预编务，后来在张之洞的指使下，大权独揽，视梁启超为雇员，甚而擅自修改梁的文章。梁启超曾愤愤不平地说：“虽总办之尊，东家之阔，亦何至如斯乎！”1897年10月，梁启超因饱受排挤而离职他去，其他维新派激进人士也先后离去，使《时务报》落入汪康年手中，变成洋务派的喉舌。

二、第一次国人办报高潮的出现

1897年后，随着维新运动的深入，各地维新志士以极大的热情创办报刊。1898年“百日维新”期间，光绪皇帝发布准许官民办报的诏书，更进一步促进了各地报刊的飞速发展。自70年代兴起的国人办报活动，在维新变法运动中走

^① 《时务报》，第6期，1896-09-27。

向高潮，打破了外报在中国新闻舆论界的垄断地位，使中国人的报刊成为社会舆论的中心。因此，维新变法运动期间的国人办报活动，史称第一次国人办报高潮。

第一次国人办报高潮的特点，一是报刊数量大。近代中国人自办的报刊，自1873年至1895年的20余年中，总共为30种左右。维新运动兴起后，特别是在“百日维新”期间，各地维新志士以极大的热情创办报刊，自1896年8月《时务报》创刊到1898年9月戊戌政变发生的两年零一个月的时间内，全国各地创办的报刊达70余种，为70年代以来国人自办报刊总数的两倍多。二是办报地区广。外报绝大部分是在上海、天津、广州、香港等沿海城市，而国人自办的报刊则不仅在上海等外报基地发展，还深入到长沙等内地中小城市。三是报刊品种多。除了以政论性见长的综合性报刊继续迅速发展外，还出现了专业性报刊、纯商业性报刊、文艺娱乐性报刊，以及以青年、妇女、儿童等各类社会群体为对象的报刊、图画报刊、白话报刊，其中不少是我国新闻事业史上第一次出现的报刊类型。例如，1896年清末著名小说家李伯元在上海创办的《指南报》，是我国最早的消闲性小报；1897年罗振玉等在上海创办的《农学报》、黄源澄在上海主编的《算学报》，是我国最早的专业性科技报刊；1898年康同薇、李蕙仙等在上海创办的《女学报》，是我国最早的由妇女主持编务、以妇女为读者对象的报刊。

这次高潮的主流，则始终是维新派主办的、以宣传变法维新为主旋律的政论性报刊，如澳门《知新报》，湖南长沙《湘学新报》与《湘报》，天津《国闻报》，上海《蒙学报》、《译书公会报》，广州《博闻报》、《岭学报》、《岭海报》、《时敏报》，广西《广仁报》，四川《渝报》、《蜀学报》，江苏《无锡白话报》，等等。这些政论性报刊的办报人员大多是维新派人上。各地维新派报刊的主编，往往就是当地维新运动的领导、核心人物。这些办报人员，有的是康有为的弟子，有的是康、梁的亲友，有的是参加过“公车上书”的举人，形成了一支奉康有为为领袖、由康有为统一指挥的宣传队伍。从办报方式来看，维新派从“开民智”、“育人才”的总体思想出发，把办报同办学会、办学堂紧密联系起来，形成“三位一体”的组织形式。例如，湖南的南学会、时务学堂和《湘学新报》，广西的圣学会、广仁学堂和《广仁报》，广东的时敏书局、时敏学堂和《时敏报》，上海的女学会、女学堂和《女学报》，等等。在这种三位一体的组织里，报刊的编辑同时又是学会的骨干和学堂的教师，学会（或书局）为报刊的出版和学堂的开办提供各种条件，学堂为报刊、学会培养和输送人才。这种三位一体的组织形式，在康、梁流亡海外期间也长期袭用。

这一时期出现的维新派主办的政论性报刊，以《知新报》、《国闻报》、《湘学

新报》和《湘报》影响最大。

《知新报》是维新派在华南地区的重要舆论阵地，1897年2月22日在澳门创刊。这份创办较早、出版时间最长的维新派报刊，是在康有为亲自策划下创办起来的。《时务报》在上海创办后，康有为想在华南地区再创办一份报刊，并于1896年11月经香港去澳门游说，得到了澳门巨商何廷光的大力支持。11月初，返粤省亲的梁启超也专程赴澳门进行筹划，康有为又调集了一些弟子前来协助筹备。康有为之所以选择澳门作为维新派的办报基地，其原因一是澳门是葡萄牙的租借地，为清朝政府势力所不及，比在内地办报少受一些限制；二是想在华南地区建立一个舆论阵地，与上海《时务报》南北呼应，为维新运动造声势。《知新报》创刊之初，曾取名《广时务报》，含“推广时务报”和“广东的时务报”两层意思，后为避免与《时务报》重名，且此时新加坡已另有一家《广时务报》，故更名为《知新报》。该报初创时为五日刊，后改为周刊、半月刊，由何廷光、康广仁任总理。《知新报》与《时务报》的编辑方针基本相同，但在宣传报道上更为大胆，敢言《时务报》所不敢言者，曾刊载过康有为在“百日维新”期间上光绪皇帝的许多奏折的全文、梁启超在保国会成立大会上的演说等重要文件，以及揭露各地贿赂公行，戳穿日、俄侵华阴谋的报道。《知新报》的历史意义，不仅在于它是维新派在华南地区的重要舆论阵地，更重要的是自政变发生到1898年12月横滨《清议报》创刊之前的三个多月的时间里，国内各地维新派报刊扫地以尽，惟独《知新报》能继续出版，歌颂为变法死难的烈士，谴责发动政变的后党，指名道姓地痛骂慈禧太后和荣禄等人是“逆贼”、“奸党”，竭力为光绪皇帝和康有为辩诬等等，成为同封建顽固派做斗争的惟一报刊。《知新报》一直出版到1901年1月20日才自动停刊，总共出了133期。

《国闻报》是戊戌变法时期维新派在华北的重要舆论阵地，也是维新派创办的第一份日报，1897年10月26日创刊于天津，主要创办人是我国近代启蒙思想家、报刊活动家和翻译家严复。严复（1854—1921），字又陵，福建侯官（今闽侯县）人，出生于名医世家，幼年受到严格的中国传统文化教育。1866年考入马江船政学堂，毕业后在军舰上工作，1877年被选派到英国格林尼次海军大学留学，回国后受聘于天津水师学堂任教习，历时20年，直至升任该校总办。甲午海战失败后，作为中国海军成员的严复感到痛心疾首，连续在天津《直报》上发表《论世变之亟》、《原强》、《辟韩》、《救亡决论》等文章，猛烈抨击列强的侵略行径，揭露封建专制制度的弊端，提出了“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的主张。这些文章发表在康有为“公车上书”之前，在当时的思想界有很大影响。1897年夏，在维新派办报热潮的推动下，严复与北洋学堂总办王修植、育

才学堂总办夏曾佑、内阁中书杭慎修（辛斋）等人，集资创办了《国闻报》和《国闻汇编》，大力鼓吹变法维新。然而，严复并不赞成维新派倡民权、开议院的主张，属于维新派中的右翼，且很少与康、梁交往，故戊戌政变后未被追究。以后的十年间，他潜心于翻译工作，思想渐趋保守。他反对辛亥革命，1915年列名筹安会拥护复辟帝制，1919年又反对五四新文化运动。这位“先进的中国人”成了时代的落伍者，1921年在家乡病逝。

《国闻报》日出对开1张，另《京报》附页4开2张，设有电传、上谕恭录、制台辕门抄、路透电讯、论说、国闻录要、本埠新闻、国内新闻、国外新闻、广告等栏，社论大部分出于严复之手。尤注重外报选译和新闻采访工作，在国内各地及国外伦敦、巴黎、柏林、彼得堡、纽约、华盛顿等城市设有特约记者。同时还出版旬刊《国闻汇编》。该报在当时出版的维新派报刊中独树一帜，“以通外情为要务”，创刊号上刊载的《国闻报缘起》强调其办报目的是“通上下之情”、“通中外之故”，帮助读者学习西方的“民主”和“西学”，以求中国的富强。因此，国闻报馆不惜重金聘请懂得英、法、德、日文字的翻译人员，大量译载西方资产阶级的社会政治学说和自然科学知识，以及外电、外报的消息和评论。而最杰出的翻译人员则是严复本人。在译文中加入许多自己的见解，是严复翻译的特点，也是其译文脍炙人口的原因之所在。在《国闻汇编》上，严复发表了他翻译的《斯宾塞尔劝学篇》和赫胥黎《天演论》（原名《进化论与伦理学》）两部未完书稿。特别是《天演论》的发表，在当时起到了巨大的思想启蒙作用。该报所刊消息“确而速，又极多极详”，且颇具地方特色，以来自华北各省为多，其中社会新闻约占一半。创刊之初，其报馆章程曾规定除京、津、华北地区的新闻外，东南各省新闻“一概不述”。《国闻报》还曾用大量篇幅报道康有为等人在北京成立保国会的消息，发表了康、梁在成立大会上的演说，并配发评论为其叫好。“百日维新”期间光绪皇帝发布的全部诏书和维新派大臣的各项条陈，也都全文发表。

由于《国闻报》的出版地点毗邻京都，加上几个主持者都是朝廷命官，一言一行都会受到封建顽固派的注意。为了保住维新派这个重要的舆论阵地，严复等人不得不采用一套特殊的斗争策略。他们把报馆的地址设在天津租界里，推出一个不知名的福建人李志成充当“馆主”。1898年3月后，该报又宣称因“销行不广，资本折阙”，将报馆盘给日本人西村博，并在报上加印“明治”年号。而且，严复等该报的实际主持人从未踏进报馆大门，有事均在王修植家中商议，发表文章也从不署名。“百日维新”期间，光绪皇帝在召见严复时曾问他是否担任《国闻报》主笔，他立刻矢口否认。正因为采取了特殊的斗争策略，《国闻报》才得

以坚持出版下去。尤其难能可贵的是，在政变发生以后，该报借助日商招牌，顶住压力，在缙绅四出的恐怖环境中大胆地揭露事件真相，仗义执言，向读者报道了谭嗣同等“戊戌六君子”殉难的过程，为中国近代史留下了珍贵史料。1899年2月后，该报真正开始由日本人主办，至1900年还在出版。

《湘学新报》和《湘报》是戊戌变法时期维新派在华中地区的重要舆论阵地。《湘学新报》1897年4月22日创刊于长沙，是一份以讲求实学、新学为主的旬刊，以倡新学、开民智、育人才、图富强为宗旨，设有掌故学（后改为时务学）、史学、舆地学、算学、商学、交涉学六个固定栏目，每个栏目均由专人编辑，每期装订成册。从第21册起改名为《湘学报》，共出45册，于1898年8月28日停刊。江标、黄遵宪、徐仁铸先后督办，唐才常、陈为镒先后担任主编。唐才常（1867—1900），字绂丞，湖南浏阳人，是戊戌时期著名的政治活动家和宣传家，与谭嗣同合称“浏阳二杰”。1897年到长沙，成为南学会的骨干，并主编《湘学新报》。戊戌政变后亡命日本，旋回国在上海召开“国会”，成立自立军，发动武装勤王活动。1900年7月自立军起义失败，在汉口被捕遇害。《湘学新报》的出版，他出力最多，一人兼任史学、时务、交涉三个栏目的编撰，发表了大量文章，向读者宣传“天下非一人之天下”的资产阶级民权思想，鼓吹在中国实行君主立宪制度，发展民族工商业，走资本主义道路。他属于维新运动中的左翼，在湖南知识界有很大影响。《湘学新报》的出版受到读者热烈欢迎。仅“长沙一城，销千数百份”，并在上海等地设立了分销处，湖广总督张之洞也令湖北官署订阅。

1898年2月，湖南维新派人士在长沙成立南学会，实际上成为湖南维新运动的领导机关。1898年初，南学会有鉴于《湘学新报》十日一出，周期太长，且偏重于学术，文字较深，已不能满足日益高涨的维新运动的需要，决定创办一份比较通俗的日报，于是《湘报》于1898年3月7日在长沙应运而生。该报“专以开风气、拓见闻为主旨”，由唐才常任主编，设有论说、奏疏、电旨、公牍、本省新闻、各国时事、商务、新书选录、答读者问等栏目，已粗具近代综合性报纸的规模，发行对象主要是南学会各州县分会和新式学堂，“按日送报，不取报资”，并以部分报纸张贴于通衢要道供读者阅览。《湘报》除报道各地维新运动的动态外，还发表了大量政论，对封建专制制度进行猛烈抨击，对民权、平等学说进行热烈鼓吹，明确提出了变法维新的一系列主张，如开议院、伸民权等，进行了慷慨激昂、有声有色的宣传，其激进程度超过《时务报》、《知新报》和《湘学报》。《湘报》的主要撰稿人之一谭嗣同（1865—1898），字复生，号壮飞，是这一时期重要的政治活动家和报刊政论家。甲午战后，他在家乡浏阳倡立学社，后游历北京、上海，吸收新学知识，所著《仁学》一书是中国近代反对封建

伦理纲常的名著。1897年回湘，积极参与湖南的各项新政活动。他是南学会的主要组织者，又是《湘报》的核心领导人物。1898年8月被荐入京，任四品军机章京，协助光绪实施变法。9月政变发生后，与康广仁等人同时遇害。谭嗣同在《湘报》工作的半年间，发表了25篇政论文章，内容涉及政治、经济、法律、教育等各个方面。

《湘报》的激进言论，使湖广总督张之洞和湖南守旧势力惊恐不安。于是，围绕着《湘报》存废问题引发了斗争。1898年5月，张之洞致电陈宝箴、黄遵宪，申饬：“新出《湘报》，其偏尤甚……亟宜谕导阻止，设法更正。”接着，长期把持湖南政、学两界的守旧派湘绅王先谦、叶德辉等人联名向陈宝箴递送《湘绅公呈》，诬蔑《湘报》文章是“率天下而乱”的“邪说”，造成了“灭圣经”、“乱成宪”、“堕纲常”、“无君上”的严重后果，要求陈宝箴下令停办《湘报》。《湘报》同仁也不示弱，联名在报上公开发表《上陈中丞书》，怒斥王、叶等人党同伐异，破坏新政，表示将不惜“以性命从事，杀身成仁”。王、叶等人气急败坏，便煽动流氓打手到南学会哄闹，捣毁湘报馆，殴打编辑人员，他们还联名致函在京任职的湘籍大吏，要求上书光绪皇帝控告陈宝箴。夹在中间的陈宝箴十分为难，不得不令《湘报》从7月19日起停刊。但是，到了8月2日，《湘报》宣布“已改订章程，专归商办”而自行复刊。政变发生后，《湘报》勉强坚持出版至10月15日被迫停刊，共出177期。

在1898年“百日维新”期间，康有为还试图夺回《时务报》，并展开过一场激烈的斗争。7月17日，康有为通过御史宋伯鲁上疏光绪皇帝，建议清廷将上海《时务报》改为官报，由梁启超主办。清廷准奏，命管理大学堂大臣孙家鼐“酌核妥议，奏明办理”。最后，光绪批准将《时务报》改为《时务官报》，迁至北京出版，并责成康有为督办此事。但是，汪康年仗着张之洞这个后台，抗旨不交，并抢先于1898年8月将《时务报》改名为《昌言报》继续在上海出版。随后，光绪派黄遵宪去上海调查处理这场纠纷。黄遵宪到达上海不久，戊戌政变就发生了，康、梁逃亡海外，黄遵宪称病不出，调查之事不了了之。围绕着《时务报》的这场斗争遂以维新派的失败而告终。这场争夺舆论阵地的斗争说明，报纸在任何时候都是进行政治斗争的重要工具，是各个阶级、各个政治集团争夺的对象。梁启超被挤出《时务报》以后，康有为曾写信给汪康年，希望他把《时务报》总理的名义“让与”梁启超；汪康年抗旨不交《时务报》，康有为又写信给汪，想要拉他“合作”。中国资产阶级的软弱性于此可见一斑。

三、近代新闻立法的有益尝试

在这场维新变法运动中,康有为等维新志士不仅继王韬等早期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想家之后,再次公开提出废止封建文化专制主义的法律制度、建立以言论出版自由为本的近代新闻法律制度的要求,而且在得到光绪皇帝的认可后还一度被付诸实践,揭开了中国近代新闻法制建设的第一页。

冲破“言禁”、“报禁”的藩篱,争取言论出版的自由权利,是中国近代新闻法制建设的第一步,也是最为关键的一步。中国人要求办报的呼声虽由来已久,但清政府却一直充耳不闻,顽固地执行其“言禁”、“报禁”的一贯政策。中日甲午战争惨败后,康有为等维新志士将这一呼声传达到庙堂之上。1895年5月2日,康有为在其发起的“公车上书”中,建议“纵民开设”报馆:“《周官》诵方训方,皆考四方之慝。《诗》之《国风》、《小雅》,欲知民俗之情。近开报馆,名曰新闻,政俗备存,文学兼述。小之可观物价,琐之可见土风。清议时存,等于乡校。见闻日辟,可通时务。外国农业、商学、天文、地质、教会、政律、格致、武备,各有专门,以为新报,尤足以开拓心思,发越聪明,与铁路开通,实相表里。宜纵民开设,并加奖励,庶裨政教。”^①接着,康有为中进士并被授予工部主事。之后,他又以工部主事的身份于5月29日、6月30日连续上书光绪帝,“言变法下手之方,先后缓急之序,专主开民智,通下情,合天下人之聪明才力,以治天下之事”^②。康有为在6月30日的上书(史称“上清帝第四书”)中再次提出办报、阅报的建议:“四曰设报达聪。《周官》训方诵方,掌诵方慝方志,庶周知天下,意美法良。宜令直省要郡各开报馆,州县乡镇亦令续开,日月进呈,并备数十副本发各衙门公览,虽乡校或非宵旰寡暇,而民隐咸达,官慝皆知。中国百弊,皆由蔽隔,解弊之方,莫良于是。”^③他还建议光绪帝“其有燕暇,随意阅报,但使得备乙览,已可风化肃然,吏不怀奸,人皆自励矣”^④。与此同时,其他维新志士甚至外国人也极力倡言办报以求通上下中外之情。英国人李提摩太也在其撰写的《新政策》中向清政府提出创办官报的建议,把创办官报列入九件“中国目前应办之事”之中,认为“国家日报,关系安危”,并推荐英国人傅兰雅和美国人李佳白“总管报事”^⑤。

康有为等维新志士的部分办报建议,得到了清廷的采纳。1896年2月4日,

① 翦伯赞主编:《中国通史参考资料·近代部分》下册,20页,北京,中华书局,1965。

② 梁启超:《戊戌政变记》,114页,北京,中华书局,1954。

③ 同上书,123页。

④ 同上书,125页。

⑤ 戈公振:《中国报学史》,37页。

御史胡孚宸上《书局有益人才请饬筹议以裨时局折》，奏请将强学书局改归官办，除“选刻中西各种图籍”外，“并将总署所购洋报选译印行，以扩见闻”。清廷交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议奏。2月5日，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在《奏复书局有益人才请饬筹议以裨时局折》中建议：“拟照八旗官学之例，建立官书局”、“聘定通晓中西学问之洋人为教习”，负责有关书籍和“各国新报”的选译印售工作。3月4日（丙申年正月二十一日），清廷派工部尚书孙家鼐为管理官书局大臣，负责该局开办事宜。官书局成立后，除印行新书外，还出版《官书局报》和《官书局汇报》两种。《官书局报》、《官书局汇报》的创办，是清政府公开发行新式官报之始，也是清末新闻法制建设起步的标志。这两种新式官报，形式同《京报》，内容除奏折上谕外，还有“路透电新闻”、“西国近事”、“本国新闻”等，其出版章程明确规定：“印送各路电报，只选择有用者照原文抄录，不加议论，凡有关涉时政，臧否人物者，概不登载。”^①因此，康有为在代宋伯鲁拟就的《奏改时务报为官报折》中批评这两种官报实“未能悉用西国体例”，“多所忌讳，无有论说”，“所译西报，半多删节，平淡无奇”，“视各国官报，规模相去远甚，非所以崇国体、广民智也”^②。强学会被封禁但旋被改建为官报局，无疑是清廷“报禁”政策有所改变的一个暗示，因面对当时的维新志士继续开展办报活动起了一定的鼓舞作用。

在这一情势下，清王朝政府虽然仍未公开表态支持官绅士民的办报活动，但在经济上推出了一项扶助报业发展的举措，即减低报纸的邮寄费用。清廷创办国家邮政始于1896年3月20日，当时规定的报纸邮费标准为中文报纸每张5厘，外文报纸每张1分。1897年3月，御史徐道焜奏请修改邮局章程，减低新闻纸邮费。1898年4月，清廷接受了这一请求，决定报纸按“货样”标准纳费投寄，邮费略低于普通信件。1898年6月至9月的“百日维新”开始后，光绪帝多次发布具有法律效力的上谕，正式承认官报、民报均具有合法的地位，“报禁”、“言禁”的藩篱被冲倒，官绅士民破天荒第一次得到了办报的自由权利。在“百日维新”期间，光绪皇帝还多次应臣僚的奏请而发布新的有关上谕，不仅充分肯定“凡臣工有所陈”，而且在每一条上谕中“必有增人之语”^③，在精神与物质两个方面支持、扶助与鼓励官办或民办报业的发展，体现了光绪帝对报刊及其社会功能的深刻认识，他对报业的支持与重视决非一时应景之为。

① 戈公振：《中国报学史》，38页。

② 汤志钧编：《康有为政论集》上册，323页，北京，中华书局，1981。

③ 梁启超：《戊戌政变记》，53页。

7月26日，光绪帝就孙家鼐奏遵议上海时务报改为官报一折发布上谕：“报馆之设，所以宣国是而达民情，必应官为倡办。该大臣所拟章程三条，似尚周妥，著照所请，将《时务报》改为官报，派康有为督办其事，所出各报，随时呈进。其天津、上海、湖北、广东等处报馆，凡有报章，著该督抚咨送都察院及大学堂各一份。择其有关时务者，由大学堂一律呈览。至各报体例，自应以胪陈利弊，开扩见闻为主，中外时事，均许据实昌言，不必意存忌讳，用副朝廷明目达聪，勤求治理之至意。所筹官报经费，即依议行。”^①这一上谕，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公开宣告开放“报禁”的法令。^②它的基本精神有二：

一是开办中央政府机关报，具体举措是将上海《时务报》改组为官报，迁北京出版。这一举措源于7月17日康有为代御史宋伯鲁拟就的《奏改时务报为官报折》，在这封上书中，康有为首先极言开办报馆之益：“大抵报馆愈多者其民愈智，其国愈富且强。”“昔日本维新之始，遣伊藤博文等游历欧美，讨论变法次第，及归则首请设官报局于东京，报章一依西例，而伊藤自著笔记，乃至举西人一切富强之原，皆归功于报馆。”然后考察了当时中国报业的落后状况，要求光绪帝“明降谕旨，将上海《时务报》改为《时务官报》”，“移设京都，以上海为分局”，“梁启超仍飭往来京沪，总持其事”，“量拨官款，以资经费”。康有为还对由时务报馆改组而成的时务官报局的任务作了说明：一方面出版作为中央机关报的时务官报，“每出报一本，皆先进呈御览，然后印行，仍请旨飭各省督抚通札各属文武实缺候补各员一律购阅。依张之洞所定原例，其报费先由各善后局垫出，令各员随后归还。其京官及各学堂诸生，亦皆须购阅，以增闻见”。另一方面，审查各省所办报刊，“至各省民间设立之报馆，言论或有可观，体律有未尽善，且间有议论悖谬，记载不实者，皆先送官报局，责令梁启超悉心稽核，撮其精善进呈，以备圣览”，“其有悖谬不实，并令纠禁”^③。光绪皇帝收到这一奏折后，当日即命总理大学堂大臣孙家鼐“酌核妥议，奏明办理”。7月26日，孙家鼐上《奏遵议上海时务报改为官报折》，虽然不得不接受宋伯鲁改《时务报》为官报的建议，但暗中耍弄了两手诡计，一是建议由康有为督办此事；二是以“无庸另筹经费”为借口，建议《时务报》仍留在上海出版：“惟创设之始，需费必

① 梁启超：《戊戌政变记》，35页。

② 1898年6月19日（五月初一日），即“百日维新”开始后的第九天，光绪帝就发布了一个有关报纸的上谕：“所有官书局译印各报，著自五月初一起，每五日汇订一册，即按逢五逢十日期，封送军机处呈递。”这一上谕虽未明确宣布开放“报禁”，但光绪帝对报业的重视已粲然可见。

③ 汤志钧编：《康有为政论集》上册，322～324页。

在数千金，若在上海开办，或由上海道代为设法，可令该员自行筹商。”^① 孙家鼐的议复，虽暗怀诡计，但在呈送光绪皇帝的当天即得到批准。^②

二是公开承认各地报馆的合法地位，并准许报刊“据实昌言”。近代报刊虽然早在1815年即由外国人引进到中国，但真正对中国社会产生巨大影响是在鸦片战争之后。这时，清王朝封建统治者虽不敢对外国人主办的报刊妄加干涉，但一直持不承认的态度。19世纪70年代中国人自办的报刊出现后，清封建统治者则实行严加限禁的政策，致使中国人自办报刊只能倚托洋人或租界以求生。这种状况，至维新运动兴起后才有所变化。先是康有为、黄遵宪等勇闯禁区，办起了《中外纪闻》、《强学报》，但旋遭查封。紧接着，梁启超等再闯禁区，在上海出版《时务报》。最后，办报活动随着维新运动的深入发展而蔚然成风，朝野上下要求开放“报禁”的呼声此起彼伏，但是清廷对此状况仍迟迟未作明确的表态。因此，在这一上谕发布的前三天，光绪帝还收到一封要求推广报馆的上书。7月23日，出使美国、日国、秘国大臣伍廷芳还上书光绪皇帝，奏请推广报馆。可见，这一上谕是清廷第一次对报业问题表态。梁启超曾对此评论说：“专制之国家，最恶报馆。此不独中国惟然，而中国尤甚者也。往者各省报馆，多禁发刊。故各报皆借西人为护符，而报章也罕有佳者。乙未和议成后，康有为、黄遵宪等开强学会，刊《强学报》，旋被封禁……各国民智之开，皆由报馆，故于维新之始，首注意于是也……各处报章，悉令进呈，并命胪陈利弊，据实昌言，毋存忌讳，虽古圣之悬戮设铎，岂能比之哉？虽泰西立宪政治之国，亦不过是也。”^③在这里还需要进一步说明的是，清廷颁布的这一开放“报禁”的上谕，在表面上看是光绪帝应孙家鼐《奏遵议上海时务报改为官报折》之请，但实际上孙家鼐的本意是为了通过全面开放“报禁”这一举措来抑制《时务官报》地位的上升之势。孙家鼐在《奏折》中说：“泰西报馆林立，人人阅报，其报能上达于君，主亦不问可知。今《时务报》改为官报，仅一处官报得以进呈，尚恐见闻不广。现在天津、上海、湖北、广东等处，皆有报馆，拟请飭各省督抚飭下各处报馆，凡有报单，均呈送都察院一份，大学堂一份，择其有关时事、无甚背谬者，均一律录呈御览，庶几收兼听之明，无偏听之蔽。”“官书局虽有汇报，系遵总理衙门奏定章程，不准议论时政，不准臧否人物，专译外国之事，俾阅者略知各国情形。今新开官报，既得随时进呈，胪陈利弊，将来官书局报亦请开除禁忌，仿陈诗之观

① 戈公振：《中国报学史》，39页。

② 《时务官报》的计划初因汪康年的抵制，后因变法失败而未果。

③ 梁启超：《戊戌政变记》，35—36页。

风，准乡校之议政。”^①

此后，光绪帝还发布过多道上谕，进一步扶植、鼓励官绅士民创办近代报刊。8月9日，光绪帝应康有为《恭谢天恩条陈办报事宜折》中所请发布上谕，命官报局所需经费，照官书局之例，由两江总督按月筹拨银1 000两，另拨开办经费银6 000两。康有为的这一要求，是对孙毓汶议复时务官报事时提出的有关经费问题的建议的驳斥。康有为所据的理由是：“今既改为官报，自无捐助……《时务报》向来售价仅四元……官报原为开风气而广见闻，只可仍旧每年收报费四元，是千数百州县全出报资，为数亦属甚微，不敷开销远甚。且臣亦无由令其阅看。既无补助，又无拨款，办理实难，无从措手。夫商报可以开闭随时，官报岂可令诏书中废。”因此，他建议：“京师官书局，每月拨经费一千两。官报局与官书局事同一律，伏乞谕旨飭下两江督臣，按月由洋务局拨交官报局经费一千两，以资办理。”他还请求光绪帝“明降谕旨，飭下各省督抚臣通核全省文武衙门、差局书院学堂，应阅报单数目，移送官报局，然后官报局按期由驿站照数移送。其阅报价值，即依两湖督臣张之洞旧例，先由善后局垫解，每分每岁照旧出价四元”^②。8月16日，光绪帝就总理衙门代奏工部主事康有为条陈、请兴农殖民以富国本一折发布上谕，内有鼓励臣民创办农报之语：“其各省府州县，皆立农务学堂，广开农会，刊农报，讲农器。由绅富之有田业者试办，以为之率。”^③8月26日，光绪帝就孙家鼐奏举人梁启超请设立编译学堂准予学生出身、并书籍报纸恩免纳税一折发布上谕：“……书籍报纸，一律免税。均着照请行。”^④对书籍报纸实行免税、加快中国民族报业发展步子的优惠政策，是光绪帝应梁启超之请而做出的一项非常难能可贵的进步举措。即使在当时资产阶级统治的国家，对报业免税以扶助其发展者也不多见。9月12日，光绪帝就翰林院侍讲学士瑞洵奏请遍设报馆实力劝办一折发布上谕：“报馆之设，原期开风气而扩见闻。该学士所称现商约同志于京城，创设报馆，翻译新报，为上海官报之续等语，即著瑞洵创办以为之倡。此外官绅士民，并著顺天府五城御史切实劝谕，以期一律举行。”^⑤这一上谕，不仅批准了瑞洵的办报请求，还进一步劝谕其他官绅士民踊跃办报。

更为可喜的是，新闻法（当时称报律）的制定也第一次被提上了议事日程，新闻立法工作开始起步。1898年8月9日，康有为在上光绪帝《恭谢天恩条陈

① 戈公振：《中国报学史》，39页。

② 汤志钧编：《康有为政论集》上册，333页。

③ 梁启超：《戊戌政变记》，38页。

④ 同上书，39页。

⑤ 同上书，53页。

办报事宜折》的同时上了一个附片《请定中国报律折》，在中国首次提出了报律的制定问题。康有为之所以提出制定报律问题，是有鉴于当时封建顽固派极为敌视报业的事实。他在上书中指出：“惟是当开新守旧并立相轧之时，是非黑白未有定论。臣以疏邈卑微，忧时迫切，昌言变法，久为守旧者所嫉，谤议纷纭……然他日或有深文罗织，诬以颠倒混淆之罪，臣岂能当此重咎。”^①康有为的担心绝不是多余的。无须待到“他日”，就是在“百日维新”期间，封建顽固派捣毁报馆、迫害报人的事件也时有发生。《湘报》撰述樊锥竟被其家乡邵阳的封建士绅扣上“乱民”的罪名而开除乡籍。当时正受光绪帝重用的康有为、梁启超，也是那些封建顽固派必欲杀之而后快的“眼中钉”。约在9月8日、9日间，湖南封建顽固派举人曾廉上书请杀康有为、梁启超。他在上书中摘录梁启超在《时务报》的论说及湖南时务学堂的讲义中阐释民权自由的内容，指为大逆不道。光绪帝为保全康、梁，乃令谭嗣同将曾廉的上书按条驳斥，然后才呈送慈禧太后。^②因此，他在上书中向光绪帝提出的对策性建议是制定报律：“臣查西国律例中，皆有报律一门，可否由臣将其书译出，凡报单中所载，如何为合例，如何为不合例，酌采外国通行之法，参以中国情形，定为中国报律。缮写进呈御览，审定后，即遵依办理。”康有为的这一建议当即被光绪帝所答允。光绪帝在康有为上书的当日（即8月9日）就发布了有关制定报律的上谕：“泰西律例，专有报律一门，应由康有为详细译出，参以中国情形，定为报律，送交孙家鼐呈览。”^③

但是，变法未几即告失败，这个指定由康有为草拟的报律未及问世便胎死腹中，在维新变法运动中取得的其他新闻法制成果也毁于一旦。9月26日，清廷发布上谕，宣布废官报局，停办《时务官报》。10月9日，清廷又发布上谕，命各地督抚查禁报馆、严拿报馆主笔。10月11日，清廷更进一步发布禁立会社、严拿会员的上谕，对出版报刊最力的各种社会团体一律予以严禁。1900年2月14日，清廷发布上谕，缉捕康有为、梁启超，查禁“康党”所设报馆，并对购阅“康党”报纸的读者“一体严拿惩办”。

总之，在“百日维新”期间，中国近代新闻法制的建设，以皇帝发布具有法律效力的上谕为主要方式，终于迈出了具有历史意义的第一步。“报禁”一度被解除了，“言禁”一度被放宽了，新闻法的制定也一度被正式提上清廷的议事日

① 汤志钧编：《康有为政论集》上册，334页。

② 参见梁启超：《戊戌政变记》，20页。

③ 《戊戌变法文献汇编》，第2册，51页，台北，鼎文书局，1973。

程。当然，这次中国近代新闻法制建设的实践活动为时过短，而且最后以流产而告终，但仍不失为一次极为有益的尝试，具有十分重要的历史意义。

四、维新派报刊的历史作用与对中国报业的贡献

（一）资产阶级维新派的办报活动在中国近代史上发挥的进步作用

第一，向读者进行了资产阶级思想启蒙的教育。19世纪70年代以来，王韬、康有为、梁启超、严复等向西方寻求真理的“先进的中国人”，陆续将西方资产阶级的哲学、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知识，通过他们所办的报刊介绍到中国来。许多报刊都聘请翻译人员，专门负责翻译外国书报上的文章，在报刊上设置专栏加以刊登。这些新知新学“振动了已冻之脑官”，使众多知识分子从埋头经史、醉心八股的桎梏中解放出来，出现了“智慧骤开，如万流腾沸，不可遏抑”的生动局面。他们以新知新学为武器，同传统的封建意识进行斗争，对以后半个多世纪的中国社会生活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第二，向读者进行了救亡图存的爱国主义教育。在传播新知识的同时，维新派报刊用大量篇幅向读者陈述了中华民族面临的严重危机，谴责了列强侵略中国的罪行，发出了“叱咤英俄，鞭笞欧美，振我夏声，昌吾华种”的怒吼，从而唤醒了一部分士大夫和知识分子的梦寐，激发了他们的热情，促使他们积极投身于救亡图存的爱国运动之中。

第三，推动了维新运动的发展，促成了变法的实现。在维新派报刊的大力宣传鼓吹下，变法、维新成了不可抗拒的社会潮流。在一些地方（如湖南），还进行了“新政”的试验。

（二）维新派的办报活动对我国近代新闻事业的发展做出的贡献

第一，冲破了封建统治者的言禁。中国历代统治者为了维护其专制统治，一贯控制和垄断新闻媒介，禁止言论、出版自由。而清朝的言禁更加厉害：“凡造讠纬妖书妖言及传用惑众者，皆斩”，“捏造言语录报各处者，系官革职，军民杖百，流亡千里”。早在维新运动兴起之前，王韬等人就发出过要求解除言禁、允许私人办报的呼吁，清廷未予理睬。1895年康有为在“公车上书”中又提出“纵民开设报馆”的要求，也未得到皇帝的首肯。直至1896年《时务报》创刊后，各地维新派报刊如雨后春笋一般出现，这才在实际上冲破了封建统治者的言禁。这些维新派报刊在宣传变法维新的同时，猛烈抨击“禁著私书，禁谈国事，禁上直言，禁倡清议”和“严巷议之诛，立腹诽之律”的政策，要求给予资产阶级以出版报刊和发表言论的自由权利。

“百日维新”期间，康有为和一些维新派大臣又纷纷上书皇帝要求允许设立

报馆，广开言路，终于促使光绪皇帝颁布了准许“官绅士民”办报的诏书，允许报纸“据实昌言，不必意存忌讳”，并要求各地政府给办报以免税的奖励。光绪的这份诏书，与其说是对民办报纸的提倡，毋宁说是对办报事实的认可。这是维新派多年来争取报刊出版自由权利取得的重大胜利，也是他们对中国新闻事业的发展做出的重要贡献。

第二，开政治家办报的先河，提高了报人、报业的社会地位。在康、梁办报以前，中国的知识分子大多醉心于科举，迷恋于仕途，从事报刊活动的多半是一些科场失意的落魄文人。他们办报的目的，或者是为养家糊口，或者是借以抒发其抑郁之情。所以，当时的报刊“大抵‘沪滨冠盖’、‘瀛眷南来’、‘祝融肆虐’、‘图窃不成’、‘惊散鸳鸯’、‘甘为情死’等字样填满纸面，千篇一律”^①。因此，一般士大夫和知识分子视办报为不务正业，视报纸为文坛垃圾。然而，自从康有为、梁启超、严复等人办报后，社会上对报人、报纸的看法为之一变。因为这些人都是变法维新的领袖，是思想敏锐、学识渊博、笔锋犀利、声名彪炳的政治活动家。他们出来办报，一扫落魄文人的陈腐习气，开我国政治家办报的先河，从而使报人、报业的社会地位大大提高。

第三，创造了报章新文体，影响了一代文风。所谓“报章文体”，是指出现于报刊之上、不同于桐城派古文的一种比较通俗浅近的文体。这种文体首先是王韬在《循环日报》上运用，但没有形成气候。所以在康、梁办报前，我国多数报刊上流行的仍然是桐城派古文。甲午战后，中国社会酝酿着大变革。这种束缚人们思想的旧文体，已经无法表达维新派要求变革的激情；同时西方的新思想、新知识、新名词大量涌进，旧体文言文已经不能适应介绍新知、新学的需要。于是一种新的报章文体应运而生。这种新文体的特点是：半文半白，平易畅达，笔锋常带感情，有时还夹以口语和外来语。这种新的报章文体，以梁启超在《时务报》上运用得最好，故被人们称为“时务文体”；后来梁启超在《新民丛报》上运用得更加成熟，又被称为“新民文体”。梁启超曾在其所著《清代学术概论》中对这一文体的产生及其特点作过精辟的阐释：“启超夙不喜桐城派古文，幼年为文，学晚汉、魏、晋，颇尚矜炼，至是自解放，务为平易畅达，时杂以俚语韵语及外国语法，纵笔所至不检束，学者竞效之，号新文体。老辈则痛恨，诋为野狐。然其文条理明晰，笔锋常带情感，对于读者别有一种魔力焉。”这种新文体出现后，风行一时，成为文言文与白话文之间的一种过渡文体，为“五四”白话文运动开了先河。

^① 《清议报》，第100期，1901-12-21。

第三节 海外华文报刊的出现与初步发展

一、海外华文报刊的出现

在国人自办报刊在神州大地兴起的前后，海外华文报刊也开始在华人华侨旅居之地诞生与发展。

19世纪40年代后期，金矿在加利福尼亚被发现。由于急需大批采金的劳工，而当地的黑人矿工远远不敷所用，因而矿主们纷纷来到中国南方沿海地区，诱拐走大批“契约华工”去充当苦力。加利福尼亚的华人人口猛增，1848年尚不满800人，但1852年时已高达25 000人。以华人华侨为读者对象的华文报刊，也于50年代在太平洋彼岸的美国加利福尼亚地区应运而生。第一份以华人华侨为读者对象的华文报刊是《金山日新录》(Golden Hill News)，于1854年4月22日在华工比较集中的加利福尼亚旧金山创刊，周刊，由美国基督教会主办，发行人为威廉·霍华德(William Howard)。该报内容有新闻、中西商业广告、国内外船期和货物行情等。自1854年6月起刊登英文言论，讨论诸如人权、政治、宗教等问题，如《在加州的中国人是没有帮助的吗?》、《七月四日与中国种族》等，但所占版面不足十分之一。可见，《金山日新录》虽为教会所办，但本质上是一份以报道新闻、反映舆论为主的新闻综合性报纸，具有浓重的新闻性和商业色彩。在形式上，《金山日新录》完全具备现代报纸的各种特征，其版式与西方报刊无异，呈对折式，其分栏方法也比较科学，各版从上到下分为三栏或四栏。就发行方式而言，该报不再免费赠送，而是明码标价，公开发行。广告价格，25个字以下1元，50个字以下2元，逾50字者按字数计，每字3美分。该报还设有邮局，并代办翻译、领牌照等业务。《金山日新录》仅出了几个月即告停刊。继《金山日新录》之后，又一份华文报纸《东涯新录》(Tung-Ngai Sanluk 或 Oriental)于1855年1月4日在旧金山创刊，由基督教长老会牧师威廉·斯卑尔(William Speer)创办，中国留美学生李根(Lee Kan的译音)担任华文编辑。李氏是第一批旅居美国的华侨知识分子，曾经在澳门马礼逊学校读书，与容闳同学，被称为“美国第一位华人编辑”。《东涯新录》初为双日刊，每星期出版三次，前两次用中文，后一次中英文合刊，几个月后改为中英文合刊的周报，其内容、形式与《金山日新录》十分接近，出至1856年末停刊。

《金山日新录》和《东涯新录》，虽然是为旅美华侨服务的报纸，但其创办人都是美国教会人士。在美国出版的第一份由旅美华侨自己创办的华文报纸，则是1856年12月创刊的《沙架免度新录》(Chinese Daily News)。该报由旅美华侨、

广东四邑人司徒源创办并任主编，在加利福尼亚首府萨克拉门托（Sacramento，当时译为沙架免度）出版。司徒源毕业于教会学校，到美国后曾任翻译，并在华人中教授英语，又在萨克拉门托市开设兴泰衣馆。有鉴于《金山日新录》和《东涯新录》两份华文报刊都是美国人创办的，不可能无条件为华人说话，于是他集资创办起了这份报纸。沙架免度（即萨克拉门托）是在美国西部淘金热中发展起来的一座城市，为当时旅美华侨聚居地之一。《沙架免度新录》初为日报，不久后改为周二刊，以刊登与华人社会有关的新闻为主，出至1858年停刊，出版时间不满两年。《沙架免度新录》之所以在中国新闻事业史上具有较高的地位，是因为它是第一份中国人在海外创办的华文报纸，也可能是世界上出版的第一份华文日报。

总而言之，《金山日新录》、《东涯新录》和《沙架免度新录》这三份报纸的出版，翻开了海外华文报刊史的第一页。这三份出现于19世纪50年代美国西海岸的华文报纸，虽然是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以及华人社会信息需求量的增加而产生的，具有明显的时代特征，但终究因华侨人数尚少、市场不大而无法长期生存与发展。1858年《沙架免度新录》停刊后，海外华文报刊进入了一个长达16年的沉寂时期。

二、海外华文报刊的初步发展

19世纪70年代以后，海外华文报刊摆脱沉寂，重新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这一时期出版的华文报刊，绝大多数诞生在美国和南洋地区。

鸦片战争前，清廷严禁华民出洋，所有的内地劳工都是秘密招募、非法出口的，人数并不很多。19世纪60年代后，清政府被迫解除了禁止华工出国的法令，在其分别与英、法、美签订的《北京条约》、《蒲安臣条约》中，外国人招募华工和华工出国得以合法化。华工出洋人数由此激增并形成高潮。除华工之外，远涉重洋的还有一批商人和知识分子，他们成为日后华人社会的中坚力量。此后，侨民的文化水平逐渐提高，对各种信息的需求量也越来越大，这就为海外华文报刊的崛起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此外，中国境内出现的一批影响较大的中文报刊，也为海外华文报刊的创办提供了更为直接的样板，并成为其设备、人员和稿件来源的坚实的后方。

19世纪70年代，海外华文报业首先在美国旧金山复苏。1874年7月14日（一说15日），《旧金山唐人新闻纸》（San Francisco China News）创刊。该报由美国人主办，旅美华侨主编，周刊，声称以“欲华人多闻广见”为办报宗旨，分各货行情、来往船期、上海新闻、花旗新闻、大埠新闻、羊城杂报新闻等栏。

1875年9月11日,《唐番公报》(Oriental or Tang Fan Kung Pao)创刊,周刊,由旅美华侨黄卓(Chock Wong的译音)与美国人霍夫曼(J. Hoffman)联合创办,翌年旅美华侨林赞(Lim Danc的译音)接办后改名为《华番汇报》。接着,林赞又通过向华人集资,从美国人手中买下了印刷设备并学习印刷技术,使该报成为完全由华人经营的报纸,后几经更名,出至1903年左右停刊,是19世纪在美国出版时间最长的一份华文报纸。1876年,《文记唐番新报》(San Francisco Chinese News)、《华人记录》和《金山新报》等三份华文报刊先后创刊。1878年,《中外新报》(The Weekly Occidental)创刊,后改名为《翰香报》,1900年改为日刊并再次改名为《翰香捷报》。1883年,《华西申报》(San Francisco Chinese Daily News)、《萃记华美新报》(Sueikoe American and Chinese Commercial News)、《中外新闻》等创刊。1888年,《文兴报》(Mon Hing Po)创刊,后更名为《宪政报》、《世界日报》,出至1969年停刊。此外,在旧金山出版的华文报刊还有1899年由旅美华侨主办的《宝文报》、1892年创刊的《文兴报》等。

80年代后,旅美华侨在美国出版的华文报刊不仅在旧金山等西部日趋繁荣,还扩展到美国中部和东部乃至远离美国本土的夏威夷檀香山地区。1883年,《华美新报》在纽约创刊,由留美华侨黄清福创办,为在纽约出版的第一家中文报纸。1888年,《华英经报》在纽约创刊,月刊,中英文合刊,是一份以旅美华侨为读者对象的基督教教会刊物。1890年,旅美华侨黄清福又在芝加哥创办《华美新报》,为在芝加哥出版的第一份中文报纸。1891年,《瑞香华洋新报》(Chinese Monthly News)在波士顿创刊,月刊,由旅美华侨主办。1892年,《华美字报》(Chinese American Advocate)在费城创刊,周刊,中英文合刊,由旅美华侨主办。1899年5月10日,《华美新报》在洛杉矶创刊,由旅美华侨主办,主办人为伍盘照,1900年迁至旧金山出版。在夏威夷檀香山出版的华文报刊,最早问世的是《檀山新报》(The Hawaiian Chinese News),1883年3月16日创刊,社址在檀香山更街(King Street),初为石印周刊,后改铅印,1899年后改为周二刊,逢星期三、六出版,先后主持报务的有程蔚南、何宽、许直臣、张泽黎等。该报内容以当地各业行情为主,酌刊有关中国的消息。该报为隆记公司接办后,曾在报头中加标“隆记”字样,故又被简称为“隆记报”。1894年,孙中山在檀香山从事革命活动,并成立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派的第一个团体兴中会,在他的影响下,“隆记报”一度倾向革命,成为兴中会的言论机关。1896年3月前后,孙中山在檀香山“隆记报”馆设立据点,联络同志,筹募经费,并组织兴中会员进行军事操练。除《檀山新报》外,其他在檀香山出版的华文报刊还有:1893年创刊的《华夏报》,1895年前后创刊的《丽记报》,均由当地华侨主办。

这一时期，海外华文报刊发展得比较繁荣的地区，除美国外，要数新加坡等南洋诸国。早在 1858 年，据说有一份名叫《日升报》的华文周报在新加坡出版。但是，由于原报已佚，因而这份华文周报的性质、内容以及创刊日期均已无从考据，仅知该报的创办人是汤姆森·威廉·史密斯（Thompson William Smith）。为人们所认同的“南洋第一报”，则是 1881 年 12 月 10 日在新加坡创刊的《叻报》。报以“叻”名，是因为“叻”是马来语“Selat”（即海湾）的译音字，早期华侨称新加坡为“石叻坡”。《叻报》之所以成为“南洋第一报”，与当时新加坡的政治、经济发展状况有着密切的关系。19 世纪中期以后，新加坡的华人社会逐渐成长、壮大，华人人口增长很快，其中大部分是商人、手工业者和垦殖者，在新加坡总人口中所占比重越来越高。临近 19 世纪末期，随着华人经济实力的不断增长，出现了一批华人富商，从而为报纸的创办与出版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而且，在这一时期，新加坡逐渐发展成为亚洲最大的转口贸易港，中西交往日益频繁，新加坡华商亟欲了解与商业有关的各方面的知识与信息，以便有效地从事经济、贸易活动。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叻报》应运而生。

《叻报》的创办人是薛有礼（1851—1906），祖籍福建漳州府，为新加坡华人富商之一。薛有礼出生于新加坡，幼年接受的是英文教育，因而较早接触西方文化，同时也与中国文人学士保持着联系，从而使他有机会接触中国传统文化。毕业后，薛有礼曾任新加坡汇丰银行买办，后有感于当时当地其他民族特别是欧籍人士的办报活动十分活跃，于是决定辞去薪酬优厚的职位，创办华文报纸以开启华人社会风气、推广文化活动。主笔一职则由原任职于香港《中外新报》的叶季允担任。叶氏主持《叻报》笔政后，以“惺噩生”为笔名，先后撰写过数百篇社论和评论，文笔流畅，立论新颖，开华侨风气之先，因而有“南洋第一报人”之誉。在政治上，《叻报》持保守态度。例如，在辛亥革命酝酿和发动的整个过程中，该报始终站在清廷的立场上。武昌起义爆发后，《叻报》在一个星期后（1911 年 10 月 17 日）才开始报道辛亥革命的消息，但把革命形容为“乱事”，把革命党称为“乱党”。直到民国建立已成定局，该报才转向拥护民国政府的立场，造起了“弃清兴汉”的舆论。《叻报》尽管言论保守，但还是比较全面地反映了新加坡早期华人社会的面貌，为后人提供了大量有价值的史料。该报所刊内容包括社论、国内外新闻、政府公报和广告等，销量在 19 世纪末期前最高为 500 份、最低为 160 份，可见当时读者不多。《叻报》是新加坡乃至整个东南亚地区出现最早、寿命最长的华文日报，一直出版到 1932 年停刊，历史长达 51 年，在海外华文报刊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其影响远远超过此前在美国出现的华文报纸。

继《叻报》之后，在新加坡出版的华文报刊，影响较大的有《星报》、《日新报》、《天南新报》。《星报》于1890年由林衡南创办，是一份商业性的华文日报，内容包括“清廷谕旨”、“谕旨恭录”、中外新闻、社会新闻、经济信息及广告等。1899年，参与戊戌变法活动的福州人黄乃裳流亡新加坡后，受聘担任该报主编，宣传民主主义思想，言论激进，不久后即与报馆主办人发生矛盾而辞职，《星报》也随之停刊。紧接着，新加坡著名医生及侨商林文庆利用《星报》的印刷设备，于1899年创办起《日新报》，在内容上增加国际新闻，并以较大篇幅介绍西方科学技术知识，在政治上主张变法，发表过一系列支持康梁、拥护光绪、反对慈禧太后的社论及评论。光绪帝被废黜后，该报又大量转载香港、上海的维新派报纸的文章，表现了对变法维新的同情和支持。《日新报》后因经济困难而停刊。《天南新报》于1898年5月26日创刊，著名侨商、文人邱菽园创办并自任出版人、总理和总主笔，是维新派在东南亚地区的第一份机关报和在海外的重要舆论阵地。戊戌政变发生后，康有为了1900年流亡新加坡，在当地成立保皇会分会，邱出任分会长，该报的维新变法及保皇立场更加坚定，连续发表反对慈禧太后的社评，认为光绪是圣明之君，清朝家法无太后垂帘之制，抗议慈禧太后通过查禁报馆压制舆论的做法。自立军失败后，邱宣布与康梁脱离关系，并于1901年底辞去《天南新报》的一切职务，将该报股权转让给阮添筹。1903年3月，该报再度易主，由许山河承办。1905年4月29日，《天南新报》出版了最后一期后停刊，先后出版七年之久。除上述三报外，新加坡的华文报刊还有《海峡华人杂志》等。

在菲律宾出版的华文报刊，影响较大的有《华报》、《岷报》和《益友新报》。《华报》是菲律宾最早出版的华文报纸，1888年在马尼拉创刊，由闽籍华侨商人杨维洪（汇溪）独资创办并自任社长兼编辑及翻译。杨氏通晓中文、英文及西班牙文，华侨称他为“三支笔都会写”的人。由于当时华侨中识字者少，能读报者更寥寥无几，因而该报销量很少，出版不到一年即停刊。《华报》停刊后，其主持人杨维洪和陆伯州决心东山再起，于1890年又创办起《岷报》，由杨维洪等主编，在内容、版式等方面均与《华报》大致相同，出版不及数月，就因销量少、无人登广告而自行停刊。《益友新报》于1899年由粤侨、菲律宾保皇会领袖潘庶蕃在马尼拉创办，为保皇会在菲律宾出版的机关报，宣传康、梁维新保皇主张，拥护光绪皇帝，开办一年多后改名为《岷益报》，不久停刊。

在马来亚出版的华文报刊，影响较大的有《檳城新报》（Penang Sin Poe），1895年8月8日在马来半岛檳榔嶼市创刊，由马来亚华侨主办，创办人为点石斋印字馆主人林花簪及林成辉。该报初为石印周二刊，后改铅印，1896年7月

21 日改为日报，是马来半岛的重要中文报纸。在世界各地，这一时期出版的华文报刊还有：《华字新报》，1876 年在日本东京创刊，在旅日华侨中发行。《中英商工机器时报》（又名《清韩英实业杂志》），1894 年 10 月在伦敦创刊，伦敦白来公司（Pelham Press）发行，为一份面向中国、朝鲜发行的中文期刊。该刊为季刊，洋纸铅字印刷，文字十分古雅，目的在推销机器，内容以介绍机器用途为主，并附刊大量广告。《日闻》，1895 年在德国勃力门创刊，为德国人创办的中文报刊。《日新报》，1899 年 10 月 5 日在加拿大温哥华创刊，为保皇派在加拿大的言论机关。《东华新报》，1899 年在澳大利亚悉尼创刊，由旅澳华侨主办，言论倾向保皇派。

【学习思考题】

1. 简要评述王韬对中国新闻事业的贡献。
2. 维新派办的第一份报刊是什么？它的出版有何意义？
3. 简要评述梁启超及《时务报》。
4. 试述《国闻报》的宣传特色。
5. 戊戌变法期间的新闻立法活动有何意义？
6. 报章文体是怎样形成的？有何特点？
7. 最早的海外华文报刊在何地诞生？



第四章

辛亥革命时期的新闻事业

第一节 资产阶级革命派报刊在境外的兴起与发展

一、《中国日报》的创刊与革命派报刊的兴起

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自 1894 年在檀香山成立兴中会、举起反清革命的旗帜起，就开始了他们的宣传活动。但在最初的几年里，兴中会没有重视报刊这一重量级的宣传武器，也没有创办自己的机关报。但是，孙中山领导的反清革命屡遭挫折，而且孙中山还看到康有为、梁启超在横滨办的《清议报》使许多海外侨胞受其宣传的影响而纷纷退出兴中会、加入保皇会。这一切，使孙中山认识到报刊宣传的巨大作用，并下决心拿起报刊这一武器，宣传革命主张，以与保皇会相抗衡。自 1900 年后，革命派在宣传民主革命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为辛亥革命打下了坚实的思想基础，他们所创办与出版的报刊，为中国新闻事业的现代化也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中国日报》是兴中会创办的第一份机关报，也是中国最早宣传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报纸，1900 年 1 月 5 日创刊于香港。选择香港作为办报基地，是考虑到香港靠近华南武装起义地区，又为清廷势力所不及。《中国日报》从经费筹集、设备采购到人员选定，都是孙中山亲自操办的。该报的名称也是孙中山亲自确定

的，取“中国者中国人之中国也”之意。由于港英当局禁止孙中山入境，因而该报的具体筹备工作由孙中山委派的陈少白主持。陈少白（1869—1934），原名闻韶，广东新会人，是资产阶级革命派早期重要的报刊活动家。他于1889年在香港结识孙中山，后加入兴中会。1895年革命派发动的广州起义失败后，他随孙中山流亡日本。1899年冬，陈少白奉孙中山之命，用“服部次郎”的日文化名潜回香港筹办《中国日报》。报纸创刊后，陈少白担任第一任社长兼总编辑。之后，陈少白长期在香港从事革命活动，1905年同盟会成立后，被正式推举为香港分会会长。辛亥革命后，陈少白一度出任广东都督府外交司长，不久脱离政界，兴办实业。1925年孙中山逝世后，他回到新会外海乡担任乡长，热心于家乡建设，并创办了以移风易俗为宗旨的《外海杂志》，为我国最早的乡报，1934年病逝于北平。

《中国日报》创刊后，其主要宣传内容，一是揭露清政府的腐败无能和卖国罪行，宣传反清革命和资产阶级民权思想。二是与保皇派报刊进行论战。中国日报馆除出版日报外，还出版《中国旬报》，主要刊登译稿和长篇论说，同时发表许多讴歌革命的文艺作品。《中国旬报》设有“杂俎”专栏，利用广东民间喜闻乐见的粤讴、南音、班本等文艺体裁，讽刺昏庸腐朽的清朝官吏。《中国旬报》停刊后，“杂俎”专栏移入日报，改名《鼓吹录》，成为中国报纸最早的文艺副刊之一。《中国日报》不仅是革命党人的宣传舆论阵地，也是他们的重要活动据点。多次武装起义的策划、组织和联络工作，都是在该报馆内进行的。这种既是舆论机关又是联络机关的组织形式，以后被多家革命派报馆继承。辛亥革命后，《中国日报》迁至广州出版，1913年8月被袁世凯在广东的代理人龙济光查封，共存在了13年零8个月。

继《中国日报》之后，郑贯公创办的《世界公益报》、《广东日报》、《有所谓报》等革命派报刊先后在香港出版。郑贯公（1880—1906），名道，字贯一，广东香山人，出身于贫苦农民家庭。16岁辍学随乡亲到日本谋生，先在太古洋行横滨支店做佣工，业余时间为《清议报》撰稿而受知于梁启超，准许他免费进入横滨大同学校学习。在此期间，他结识了孙中山、蔡锷、唐才常等人，并发起出版中国留日学生创办的第一个具有革命思想倾向的刊物《开智录》，一度应梁启超之聘任《清议报》助理编辑。1901年春，郑贯公经孙中山介绍赴香港，任《中国日报》记者。他利用这一讲坛大胆鼓吹革命，发表了许多激进言论，使该报面貌焕然一新。但是到1903年春，他因与陈少白意见不合而脱离《中国日报》。

1903年12月29日，郑贯公与黄世仲、崔通约等集资在香港创办《世界公

益报》，郑贯公自任主编。由于言论过于激烈，引起股东们担心，要求他改变办报宗旨。郑贯公与股东们力争，希望他们不要干涉报纸的言论，但毫无结果，乃自行告退。接着，郑贯公重新集资，于1904年8月31日另创《广东日报》，自任督印人兼总编辑。他还事先与股东们约定，后者不得干涉言论。由于受到无政府主义思潮的影响，该报曾发表《炸药之二十世纪》、《暗杀主义说》等文章，鼓吹用暗杀手段来推进革命。1905年6月4日，郑贯公又在香港创办《唯一趣报有所谓》，简称《有所谓报》，自任发行人兼总编辑，主要执笔者有陈树人、胡子晋等。该报取名“有所谓”，是因为郑贯公等人看到“故国濒危”，决定要“抒救时之策，鸣警世之钟”，再不能“无所谓”了。该报创刊之时，正值反对美国华工禁约运动的高潮，遂全力投入这一斗争，无情揭露美国残害华工的暴行，大力宣传抵制美货，销量跃居香港报纸的首位。正当郑贯公的事业如日中天的时候，一场瘟疫在香港流行。1906年夏天，他不幸染疾而亡，终年只有26岁。

在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派报刊的发展初期，留日学生创办的报刊是当时革命派报刊的一支重要力量。这些留日学生报刊鼓吹民主革命，介绍西方社会政治学说，为资产阶级革命运动推波助澜。1900年11月1日，留日学生团体开智会创办起自己的机关刊物《开智录》，为中国留日学生创办的第一份刊物，由郑贯公主编。郑贯公、冯樊龙、冯斯栾三位创办人，分别用“自立”、“自由”、“自强”的笔名，在该刊上发表宣传西方资产阶级自由民主思想的文章，人称“三自”。1900年，梁启超聘请郑贯公担任《清议报》助理编辑，《开智录》也由《清议报》报馆代印代发。郑贯公等人充分利用这一机会，在《开智录》上倡言“排满革命”，企图使华侨脱离保皇派的影响。不久，《开智录》的革命倾向被保皇派发觉，郑贯公被解职，《开智录》也随之停刊。继《开智录》之后，又有两份留日学生创办的报刊先后问世。1900年12月6日，杨廷栋、杨荫杭、雷奋等人在东京创办《译书汇编》，专门转载西方资产阶级学者的名著，如卢梭的《民约论》、孟德斯鸠的《万法公理》、斯宾塞的《政治哲学》等。1901年5月10日，秦力山、沈翔云、戡元丞、王宠惠等人在东京创办《国民报》月刊，革命倾向十分明显。该刊第4期上发表章太炎撰写的《正仇满论》，驳斥了梁启超“保皇扶满”的言论，是革命派从正面批驳保皇派的第一篇文章，说明它已经同保皇派划清了界限。该报的出版曾得到过孙中山的支持，但只出了4期，即因经费困难而停刊。

1903年前后，随着留日学生人数的日益增多，留日学生的办报活动也日益活跃。这一时期的留日学生报刊，大多以同乡会的名义出版。1902年12月14日，由湖南留日学生同乡会主办的《游学译编》月刊在东京创刊，主编是杨毓

麟，参与编撰工作的有黄兴、陈天华、杨度、樊锥等。该刊“全以译述为主”，设有学术、教育、军事、历史、地理、时论、外论、实业、小说等栏目，是第一个以留日学生同乡会名义创办的刊物。创刊之初带有明显的改良主义色彩，但自“苏报案”后，表现出明显的革命倾向。1903年1月29日，由湖北留日学生主办的《湖北学生界》月刊在东京创刊，编辑有刘成禺、蓝天蔚等。该刊从第5期起改名为《汉声》，反满情绪日益激烈，曾发表岳飞、文天祥、夏完淳等人的爱国诗词，以唤起汉族人民“驱逐鞑虏，恢复中华”的民族革命意识，出版至1903年9月第7、8两期合刊后停刊。1903年2月13日，由直隶（今为河北）留日学生主办的《直说》月刊在东京创刊，主编是杜义。该刊命名“直说”，含“直隶人所说”和“直言不讳”两重意义，只出了两期。1903年2月17日，由浙江留日学生同乡会主办的《浙江潮》月刊在东京创刊，主编是孙翼中，参加编撰工作的有蒋方震、许寿裳等人，鲁迅的第一篇小说《斯巴达之魂》就是在此刊上发表的。《浙江潮》注意揭露清政府的腐败和列强的侵华罪行，但更为明确地提出了“革命造反”的主张。该刊的销量为留日学生报刊之冠，每期达到5 000份以上，最初几期还多次重印。1903年4月27日，由江苏旅日同乡会主办的《江苏》月刊在东京创刊，主编是秦毓璠，参与编撰工作的有黄宗仰、陈去病、丁文江等。秦毓璠是个激进派革命党人，故该刊自第3期起就不用光绪年号而改用黄帝纪元，曾发表孙中山的来稿《支那保全分割合论》。据《中国近代报刊名录》载，清末中国人在日本创办的报刊共109种，其中革命报刊65种。

二、《民报》的创刊与革命派报刊的大发展

1905年，随着中国革命形势的日益高涨，各革命团体的分散活动已不能适应革命发展的需要。孙中山领导的兴中会和华兴会、光复会等其他革命组织决定联合起来，共举革命大业。8月20日，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派的联合组织——中国同盟会在日本东京举行成立大会。同盟会成立后，革命派报刊在海外蓬勃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中国同盟会机关报《民报》的创刊，是这一时期革命派报刊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的主要标志。在中国同盟会成立大会上，根据黄兴的提议，中国同盟会决定将留日学生创办的革命刊物《二十世纪之支那》改组为自己的机关报。《二十世纪之支那》是各省留日学生联合创办的革命刊物，1905年6月3日在日本东京创刊，宋教仁、田桐、程家桢、黄瀛元、白逾桓、陈天华等主办，程家桢任总编辑。创刊号印有黄帝、华盛顿肖像，并用黄帝纪元纪年。然而，就在同盟会准备接办之际，《二十世纪之支那》第2期发表了揭露日本侵华野心的文章《日本

政客之经营中国谈》，立刻被日本东京警视厅以“妨害安宁秩序”为由全部没收，并勒令停刊。于是，同盟会决定即将出版的该会机关报不再袭用《二十世纪之支那》，另取名曰《民报》。1905年11月26日，《民报》在日本东京创刊。该刊是一份大型时事性政论月刊，设有论说、时评、谈丛、纪事、译丛等栏目，每期6万至8万字。先后参与编撰工作的有胡汉民、汪精卫、陈天华、朱执信、廖仲恺、汪东、章太炎、刘师培、黄侃、苏曼殊、马君武、陶成章、田桐等。《民报》的主编，第1至5期为胡汉民，第6至24期为章太炎（其中第19至22期由陶成章代理主编），在东京秘密编发的第25、26期由汪精卫任主编。

宣传“三民主义”的政治纲领，是《民报》的办刊宗旨。在《民报》创刊号上，孙中山亲自撰写的该报《发刊辞》中，第一次将其革命主张概括为民族主义、民权主义和民生主义，后被简称为“三民主义”。根据民族主义、民权主义和民生主义这一政治纲领，《民报》的宣传内容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宣传以排满为中心的民族主义；二是宣传以建立共和政体为中心的民权主义；此外，《民报》还对世界各国的资产阶级革命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对西方的新文化和新思潮，其中包括社会主义思潮和无政府主义思潮，都作了大量的报道与介绍。

《民报》的出版与宣传活动，受到国内外同盟会员和同情革命的知识分子的热烈欢迎。它的创刊号再版了7次，第2、3期再版了5次，仍然供不应求，最高发行量达到17 000份，其中半数以上是在国内秘密发行的。与之同时，《民报》也日益受到清廷的嫉恨与日本政府的关注。据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收藏的资料《民报有关杂纂》载，清政府因《民报》问题而同日本政府的磋商始于1907年。日本驻中国临时代理公使阿部守太郎在1907年10月17日写给外务大臣林熏的信中就有关于《民报》问题的讨论。阿部在信中写道，从清政府说，以《民报》为主的杂志是清国乱党在日本出版的，而它主张在于发动革命，捣乱清国安宁与秩序，按照日本的法律及考虑两国的友谊，清国政府请日本官方查禁这些出版物。阿部接着叙述道，最近在清国发生的意图颠覆政府的恐怖行为使清国政府很敏感，“看着这些煽动政情不安的杂志出版于日本，出口到清国去，我不胜忧虑。如默许这些煽动人心的清国人报刊出版于我国帝都，使邻国越来越不安，将不利于我们的对清政策。我们一定要避免让清国觉得日本像革命党匪窟一样。那么，不管这些出版物的报告有没有法令上的问题，一定要行政上酌量处理而禁止这些出版物……一定要消灭不稳的报告”^①。1908年10月，《民报》第24期发表汤增璧撰写的论文《革命之心理》。日本政府以“扰乱秩序”、“破坏治安”为由下令

^① 《关于民报杂纂》（1907—1909），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藏。

禁售《民报》第24期，并对《民报》及其主编章太炎提出起诉。1908年11月26日，日本东京地方法院对这一案件进行公审，被告人章太炎被控以三项罪状，一是上述《民报》刊载的《革命之心理》一文“冒渎皇室的尊严、变坏政体或紊乱朝宪的论说”，二是《民报》未呈报编辑人、发行人与发行所，三是《本社简章》内容不妥，均违犯了《报纸条例》。在公审中，章太炎为自己辩解说，《革命之心理》一文所叙述的“意图恶劣政府的颠覆”，不是针对日本政府的，而是针对清政府的，因而与《报纸条例》第32条无涉。但是，日本法院还是在12月12日宣布了认定章太炎及《民报》有罪并罚款的判决，迫使《民报》决定暂时休刊。日本当局之所以无视事实真相，强行判处章太炎及《民报》有罪，完全是因为考虑到日本对清政府的外交利益。之后，《民报》曾在东京秘密编发过两期，1910年2月终刊。

除《民报》外，革命派人士在日本创办的报刊还有十数家之多，影响较大的有：李叔同等人主办的《醒狮》，柳亚子等人主办的《复报》，四川留学生主办的《鹃声》和《四川》，山西留学生主办的《晋话报》，云南留学生主办的《云南》和《滇话报》，河南留学生主办的《河南》，湖南留学生主办的《洞庭波》，陕西留学生主办的《秦陇》和《夏声》，广西留学生主办的《粤西》，江西留学生主办的《江西》等。

同盟会成立后，为了宣传革命思想，清除保皇派的消极影响，革命派人士还在海外其他地区办起了一批革命报刊。在新加坡出版的《图南日报》、《中兴日报》、《星洲晨报》和《南侨日报》，在槟榔屿出版的《槟城日报》和《光华日报》，在吉隆坡出版的《吉隆坡日报》和《四州日报》，在印尼出版的《泗滨日报》、《民铎报》、《苏门答腊报》，在西贡出版的《美南日报》、《湄南日报》、《华暹日报》和《同侨报》，在仰光出版的《光华报》、《进化报》和《全缅公报》，在马尼拉出版的《公理报》，在檀香山出版的《民生日报》、《自由新报》和《启智报》，在旧金山出版的《大同日报》和《少年中国晨报》，在温哥华出版的《华美日报》、《大汉报》，在秘鲁出版的《民醒日报》，在墨尔本出版的《警东日报》，在悉尼出版的《民国报》，等等。据不完全统计，在辛亥革命前十年间，资产阶级革命派在海外创办的中文报刊总数在四十家以上。

三、改良派在境外的办报活动

戊戌政变后，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派人士逃亡日本。他们在海外除了创立保救大清皇帝会（简称保皇会）外，还以梁启超挂帅，积极开展办报活动，办起了一大批报刊，大张旗鼓地宣传、报道保皇立宪的思想与活动。在康、梁流亡海

外以前，海外出版的中文报刊为数甚少。然而，自从保皇会在海外成立后，日本、美洲、澳大利亚、南洋以及我国的港澳等地，陆续创办了一批宣传保皇立宪的报刊，使海外中文报刊获得很大的发展。自 1898 年至 1911 年辛亥革命前夕，保皇派在海外创办和控制的报刊有三十多家。

在这些保皇派报刊中，最有影响的是《清议报》和《新民丛报》。《清议报》是戊戌政变后保皇会在海外办的第一个机关报，旬刊，1898 年 12 月 23 日在日本横滨创刊，经费由旅日华侨冯镜如、冯紫珊、林北泉等负责筹集，主编为梁启超，协助梁启超从事编撰工作的有麦孟华、欧榘甲等。为自我保护计，该报的发行编辑人署“英国人冯镜如”，印刷人署“日本人铃木鹤太郎”。《清议报》的办报宗旨是“主持清议、开发民智”。所谓“主持清议”，就是猛烈抨击慈禧、荣禄等“逆后贼臣”及其把持的朝政，拥护“明君圣主”光绪皇帝复位；所谓“开发民智”，就是大量介绍西方资产阶级的社会政治学说和文化科学知识。在此期间，梁启超频繁与孙中山、陈少白等革命党人接触，在思想上受其影响。为了适应时代潮流，梁启超、欧榘甲在《清议报》上发表了一些谈民权、谈自由、谈破坏、谈革命的文章，赢得了不少读者。然而，思想比较保守的麦孟华却向康有为告密，说梁启超“渐入行者（指孙中山）圈套”。于是，康有为下令在保皇会的报刊上不得出现“革命”、“民权”、“自由”、“独立”等字样，并将梁启超、欧榘甲分别派往檀香山和旧金山去进行保皇活动。1901 年 12 月 21 日，当《清议报》出版了第 100 册后，一场大火焚毁了报馆，报纸因此而停刊。

一个多月后，梁启超在旅日华侨的大力支持下，于 1902 年 2 月 8 日在横滨又创办起了一份保皇派报刊，即《新民丛报》。该报是梁启超仿效西方大型综合性杂志创办的一份半月刊，主编仍是梁启超，编辑有蒋智由、马君武、麦孟华等。梁启超宣称，要把《新民丛报》办成“中国报界前此未有”、“足与东西各报相颉颃”的报刊。的确，该报一创刊，即以崭新面孔与读者见面：封面是一幅彩色的中国地图，内容分设 25 个栏目，社会科学、自然科学无所不包，古今中外无所不谈。其内容之丰富，编辑之严谨，印刷之精美，确实是“中国报界前此未有”过的。《新民丛报》的命名，取意于《大学》：“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在梁启超看来，中国积弱的根本原因，不是列强的侵略，也不是清朝政府的腐败，而是国民素质低下，缺乏“公德”和“私德”，缺乏国家思想、义务思想和权利思想，缺乏进取、冒险、自由、自治、自尊、合群、尚武等精神。只有通过教育手段来提高国民素质，造就一代“新民”，中国才能富强，国家才有希望。为此，《新民丛报》用大量篇幅介绍西方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军事、法律、宗教、教育、文化等各方面的学说，其中包括马克思主义学说。在

政治上,《新民丛报》总的倾向是鼓吹保皇立宪,但前期的《新民丛报》与后期的《新民丛报》有所区别。1903年以前的《新民丛报》适应时代潮流,发表了许多高谈革命的文章,引起保皇派的不满,就连曾经赞扬梁启超的文章“惊心动魄,一字千金”的黄遵宪,也劝他勿作“危险激烈之言”。然而正因为如此,《新民丛报》大受读者欢迎,销量达14 000份,在国内外设立了97个代销处,可谓盛极一时。1903年底梁启超赴美洲游历考察以后,公开宣布不再谈革命,与共和告别。从此,《新民丛报》的言论变得“柔声缓语,形同妇妾,梦绕大清,心恋小丑”,在读者中的威信江河日下。后来又在与《民报》的笔战中惨败,不得不于1907年8月悄然停刊。

此外,保皇派还在香港、澳门以及海外各地创办了一批自己的报刊,并设法夺取和控制各地原有的华侨报刊,把它们变成自己的宣传工具。在香港,当地保皇会除利用《华字日报》、《循环日报》、《维新日报》等老牌报纸进行保皇立宪的宣传外,还于1903年创办《实报》、1904年创办《香港商报》,以作为自己的喉舌。在澳门,除《知新报》继续出版外,保皇派又利用《镜海丛报》和创办《濠镜报》等报刊,以充当宣传保皇立宪的工具。在美国,徐勤于1899年在旧金山主持《文兴日报》,1902年欧榭甲在旧金山主持《大同日报》,1903年汤铭山在纽约创办《维新报》。其中《大同日报》原来是旧金山华侨团体洪门致公堂创办的报纸,保皇党人欧榭甲以自己年轻时曾参加过洪门组织的关系,加入《大同日报》,担任总编辑,使它成了一张宣传保皇立宪的报纸。在檀香山,梁启超于1900年创办《新中国报》。在加拿大,梁启超于1900年在温哥华支持华侨创办《日新报》。在澳大利亚,唐才质于1902年在悉尼创办《东华报》。在新加坡,徐勤帮助当地保皇会于1899年创办《天南新报》,1906年又将当地华侨办的《南洋总汇报》变成了保皇会的宣传工具。在印尼,康有为于1903年亲自在爪哇岛创办《泗水日报》,1904年又支持苏门答腊保皇会创办《苏岛日报》。在缅甸,仰光保皇会于1904年创办《仰光新报》,1906年又创办《商务报》。在墨西哥,当地保皇会于1905年创办《墨西哥朝报》。在菲律宾,康有为派潘遮蕃于1900年在马尼拉创办《益友新报》。在日本,梁启超1902年在横滨创办《新小说》报。在泰国,徐勤、梁伯鸣于1907年在曼谷创办《启南日报》。

四、《民报》与《新民丛报》的论战

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派与改良派(时称保皇派)的报刊大论战,在辛亥革命时期新闻事业史上写下了灿烂的一页。

《民报》创刊前,资产阶级革命派报刊和保皇派报刊之间已经有过一些小规

模的笔战。1901年8月,《国民报》发表章太炎撰写的《正仇满论》,是资产阶级革命派射向保皇派的第一箭。1902年,保皇派在广州出版的《岭海报》发表文章攻击革命派策划的广州起义,在香港出版的《中国日报》立即撰文予以批驳。这是革命派和保皇派报刊第一次对阵交锋,双方笔战逾月。1903年后,两派报刊的论战日趋频繁。康有为发表反对革命的政见书后,《中国日报》刊出黄世仲撰写的《辩康有为政见书》,《苏报》刊出章太炎撰写的《康有为与觉罗君之关系》,严词驳斥康有为的反动观点。上海《中外日报》在6月8日刊登《革命驳议》,恣意攻击正在兴起的革命宣传,《苏报》立时发表《驳革命驳议》予以还击。1903年12月和翌年1月,孙中山在檀香山出版的《檀山新报》上先后发表《敬告同乡书》、《驳保皇报》两篇文章,亲自发起对当地保皇派机关报《新中国报》的笔战。1904年,《中国日报》同《商报》在香港展开论战。但是,这些论战还只是零星的、分散的,还没有从政治上、理论上进行系统的辩驳和清算。

《民报》创刊后,清醒地认识到自己担负着一项重大的历史使命,即清除保皇派的思想影响,扫除革命发展的障碍,扩大革命阵营。因此,《民报》一创刊,就以“主帅”的身份,率先同最有影响的保皇派报刊《新民丛报》展开论战。在《民报》创刊号上,汪精卫的《民族的国民》、陈天华的《论中国宜改创民主政体》和朱执信的《论满洲虽欲立宪而不能》三篇文章,指名道姓地批判君主立宪的主张。对此,《新民丛报》立即起而应战。1906年春,《新民丛报》将其旨在反对民主革命、鼓吹君主立宪的《开明专制论》、《申论种族革命与政治革命之得失》等文章,汇编成《中国存亡一大问题》的小册子,广为散发。接着,《民报》开始把论战的矛头直指《新民丛报》。4月,《民报》第3期发表汪精卫撰写的长篇政论《希望满洲立宪者曷听诸——附驳〈新民丛报〉》,列举了《新民丛报》文章的观点,逐条予以批驳。这篇政论是《民报》刊登的第一篇系统批判《新民丛报》的文章,洋洋数万言,第3期仅发表了文章的前一部分,后一部分在第5期上续载。《民报》第3期还以《号外》的形式,公布了胡汉民撰写的《〈民报〉与〈新民丛报〉辩驳之纲领》,将《民报》与《新民丛报》的重大分歧问题归纳为12条,宣称“自第四期以下,分类辩驳”。两报之间的大论战由此全面展开。

论战甫始,《新民丛报》因其主将梁启超是一位百炼成钢的政论家而气势颇盛。梁启超单骑奋战,四面出击,下笔动辄数万言,且对一些具体问题的观察确实也比较细致深刻,常常抓住《民报》在论战中的一些弱点穷追猛打。但是,随着论战的深入,梁启超越来越感到力不能持,往日对于读者的“魔力”日渐消失。而《民报》阵营中的一批年轻小将,真理在手,越战越勇。自第7期起,章太炎接编《民报》,并开始充任《民报》论战阵营的主将。章太炎先后在《民报》

上发表了《革命之道德》、《箴新党论》、《中华民国解》、《排满平议》等13篇论文和多篇杂文，博征经史，评鹭时政，豪气逼人，但失在文词过于古奥，索解为难。

《民报》与《新民丛报》的大论战，主要围绕着以下四个问题展开：第一，要不要进行民族革命、推翻“满清”统治。《新民丛报》否认“满清”政府实行民族压迫政策，认为满人早已同化于汉人，排满必然会引起民族仇杀，造成天下大乱，主张拥戴光绪皇帝，推动清廷进行自上而下的改革。《民报》则认为，满族统治者不仅对内实行民族压迫，而且对外奉行卖国政策，已经成为帝国主义的“守土长官”，所以要想救国就必须进行民族革命，用武力推翻清政府。第二，要不要进行民权革命、建立共和政体。《新民丛报》认为，中国民众素质低下，还不具备共和国公民的资格，因此只能在中国实行君主立宪或开明专制。《民报》则认为在君主专制制度下国家秩序和人民权利均无保证，指出中国人民完全有民权立宪之能力，主张废除君主，建立民主共和国，顺应历史发展的大趋势。第三，要不要实行土地国有、平均地权。《新民丛报》认为，中国不存在土地贫富不均的现象，没有必要平均地权，实行土地国有对农业生产不利。《民报》则用事实驳斥说，中国确实存在“豪右”和“细民”的差别，只有实行平均地权和土地国有，生产才能发展，民生问题才能解决。第四，革命会不会引起帝国主义干涉，使中国招致瓜分。《新民丛报》认为，革命是暴烈的行动，必然引起社会动乱，帝国主义乘虚而入，中国就会被瓜分。《民报》则认为，革命只是推翻清朝政府，并不排外，因此不会引起社会动乱和帝国主义干涉。如果不革命，中国越来越弱，才会招致瓜分。

这场大论战持续到1907年冬《新民丛报》停刊，为时一年半，以《民报》的大获全胜而告终。《民报》之所以能够击败《新民丛报》，首先是因为《民报》所坚持的革命道路比《新民丛报》所坚持的改良道路更加符合当时人民的愿望和要求。其次是因为《民报》一方论战力量雄厚，由孙中山挂帅，参与论战的有二十多人；而《新民丛报》一方应战者只有梁启超一人，尽管他是驰骋文坛的老将，但毕竟势单力薄，交战几个回合后就有招架不住之感。第三是因为《民报》立论以事实为依据，列举清朝政府的腐败、立宪的虚伪等读者看得见的事实，结论是只有推翻清政府才能救中国，令人信服；《新民丛报》认为革命必然引起社会动乱，必然招致帝国主义干涉等等，只是主观推测，难以说服读者。

在《民报》与《新民丛报》展开大论战的同时，革命派与改良派在香港、檀香山、温哥华、旧金山、新加坡、曼谷、仰光、广州、印尼等地的报刊之间也展开论战。投入论战的两派报刊，在香港是革命派的《中国日报》与保皇派的《商

报》，在檀香山是革命派的《自由新报》与保皇派的《新中国报》，在温哥华是革命派的《大汉日报》与保皇派的《日新报》，在旧金山是革命派的《美洲少年》与保皇派的《世界报》，在新加坡是革命派的《中兴日报》与保皇派的《南洋总汇报》，在曼谷是革命派的《华暹新报》与保皇派的《启南新报》，在仰光是革命派的《光华报》与保皇派的《商务报》，等等。这些报刊的论战十分激烈，有的一直持续到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才以革命派报刊的最后胜利而告终。孙中山十分关心《中兴日报》与《南洋总汇报》的论战，不仅亲自组织论战队伍，制定了以“攻心为先”、“至理服人”的论战方针，还以“南洋小学生”的笔名发表了《论惧革命召瓜分者乃不识时务者也》等三篇文章，直接参加笔战。

《民报》与《新民丛报》的大论战，以及继之而起的两派报刊在各地的思想论战，不仅使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得到广泛传播，使孙中山的三民主义逐渐深入人心，而且还为辛亥革命做了组织上的准备，许多原来支持改良派的人转变了立场，纷纷退出保皇会而加入同盟会。此外，《民报》与《新民丛报》的大论战也促进了革命派报刊的发展。

第二节 清末新闻法制的建设与第二次国人办报高潮

一、从“报禁”开放到近代新闻法制的初步建成

1900年八国联军的人侵，使清政府不得不改弦易辙，以维持其摇摇欲坠的封建专制统治。1901年1月，清廷宣布实行“新政”。1902年5月，清王朝政府特谕内阁，派沈家本、伍廷芳等修订法律。在这一历史背景下，朝野上下要求新闻法制的呼声重新响起。清王朝也决定顺应历史潮流，着手进行近代新闻法制的建设。

有限度地开放“报禁”、“言禁”，予人民以创办报刊的自由权利，是清末近代新闻法制建设迈出的第一步。在“新政”全面展开后，清政府允许民间办报，在事实上承认了近代报刊这一资本主义文明的表现形式的合法地位。与此同时，清廷还正式允许朝政信息的公开传布，部分开放了“言禁”。1903年，御史高昌生请刊谕旨阁钞，旨令朝事发交报房刊行。同年，四川学政吴郁生奏请将内阁各部议复折件及各省办事诸章程大量编入报房所办报纸，以便官学人员阅读：“简易办法，莫如广刻邸钞。故大学士陈宏谋、曾国藩等，均以点读邸钞为课程。近来报房所录，大抵各省例折，而于在京各衙门折件，仅千百之十一，实属无从取裁。外务部为洋务总汇之区，六部为天下政事根本，庚子定乱以后，朝廷励精图治，迭经谕令中外，删定旧例，举行新政。所有各该部议复折件及各省办事各章

程，时愈近则事愈详，益有裨于实用。”对于这一建议，政务处大臣奕劻、孙家鼐等在奉旨议复时予以全盘接受：“嗣后，凡有内外各衙门奏定各折件，拟由军机处抄送政务处。其非事关慎密，即发交报房刊行日出一编，月成一册，传观既速，最易流通。则现行政策，外间均可周知。”^① 1904年，御史黄昌年上折要求清王朝政府各部处重要文件及时在“阁钞”上公布：“各衙具奏奉旨准驳各件，须令各衙门皆知。重要则明发谕旨；次要则编发阁钞。拟请政务处妥议办法，凡政务处、练兵处、学务处及银行、铁路、矿务、电报一切举行要政，或揭署前，或发阁钞，或刊刻告示。”这一建议也同样得到了清政府的认可，政务处在奉旨议复时明白宣示：“嗣后具奏折件，除事关慎密及通例核复之件毋庸钞送外，所有创改章程及决定事件，皆于奉旨后咨送政务处，陆续发刊，以广传布。凡军机处于京外折件，向系明发谕旨及有办法者，概交发钞。”^②

然而，新报业虽因“报禁”、“言禁”的逐步开放而大大向前迈进了一步，一时出现了数以千计的报刊，但旧的文化专制主义的法律制度仍未被废止，危害清王朝政治统治的报刊及其宣传报道仍将受到清廷的严厉制裁，“造妖书妖言”罪仍是惩处报刊宣传的主要法律依据。^③ 1905年，出使各国考察政治大臣载泽等在《奏请以五年为期改行立宪政体折》中提出迅速制定集会、言论、出版三项法律：“集会、言论、出版三者，诸国所许民间之自由，而民间亦以得自由为幸福。然集会受警察之稽查，报章听官吏之检视，实有种种防维之法。非若我国空悬禁令，转得法外之自由。与其漫无限制，益生厉阶，何如勒以章程，咸纳轨物。宜采取英、德、日本诸君立国现行条例，编集会律、言论律、出版律，迅即颁行，以一趋向而定民志。”^④ 1906年9月清廷宣布实行预备立宪后，随着清廷修律活动的加速，新闻立法工作也正式起步。自1906年至1911年的五年时间内，清政府有关部门先后制定了一大批专门适用于新闻事业的、或与新闻事业有关的、或含有调整与规范新闻事业条款的法律与法令。其中专门适用于新闻事业的法律主要有《大清印刷物件专律》、《报章应守规则》、《报馆暂行条规》、《大清报律》（后修订为《钦定报律》）等，含有调整与规范新闻事业条款、与新闻事业相关的

① 戈公振：《中国报学史》，40—42页。

② 同上书，40页。

③ 1910年5月15日清廷颁行的《清现行刑律》，但仍保留了“造妖书妖言”罪。《清现行刑律》在《贼盗上》第13条中规定：“凡造妖书妖言及传用惑众者，皆绞，若私有妖书，隐藏不送官者，徒三年。”在《礼制》第19条中甚至还有“收藏禁书”的规定：“凡私家收藏图、徽、应禁之书，及历代帝王图像、金、玉符、玺等物者，处十等罚（即罚银十五两——引者注），并于犯人名下追银一十两，给付告人充赏。”

④ 《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上册，112页，北京，中华书局，1979

法律主要有《钦定宪法大纲》、《违警律》、《清新刑律》、《电报总局传递新闻电报减收半价章程十条》、《重订收发电报办法及减价章程》、《著作权章程》等。

有关新闻出版的专门法律，最早出台的是1906年7月由清政府商部、巡警部和学部共同拟定与公布的《大清印刷物件专律》。该“专律”分为大纲、印刷人等、记载物件等、毁谤、教唆、时限等6章，共41条，对包括报刊在内的印刷物的注册登记、印刷物的禁载事项、毁谤与教唆以及违律行为的惩罚等作了明确的规定。其中《第三章·记载物件等》是有关新闻报刊的专章，该章第1条将新闻报刊界定为记载物件：“所谓记载物件者，或定期出版或不定期出版，即新闻从录等，依本律名目谓之记载物件。”其余各条均为有关新闻报刊的具体规定。但是，由于《大清印刷物件专律》一时无法施行^①，因而巡警部札飭京师巡警总厅，于1906年10月12日颁布《报章应守规则》，令京师及各地报纸一体遵守。^②《报章应守规则》共9条，前8条都是有关防范报刊宣传危及其政治统治的规定，只有最后一条是有关开办报馆的呈报事宜。而且，该规则作为一项新闻法律来说是不完整的，只有禁载事项而无对违禁行为的惩罚规定，为行政执法官吏任意惩处开了方便之门。1907年8月，清廷民政部奏拟定报馆暂行条规折，内云：“查现今风气渐开，京外报馆日渐增益。其开通民智、维持公论者固不乏人，而挟私攻讦、借端诋毁、甚或煽动异议、摇惑人心，如该御史（指御史俾寿——作者注）所奏者，亦在所不免。京城为根本重地，报章论说动系中外瞻听。稽查约束，刻不容缓。”^③鉴此，民政部制定了《报馆暂行条规》10条，于9月5日经清廷批准，在正式《报律》颁布前，作为管制报纸出版事业的法令颁布施行。^④《报馆暂行条规》的基本精神与巡警部制定的《报章应守规则》完全相同，只是其内容更为具体，操作性更强。1908年1月16日，商部、民政部、法部等参考日本的新闻纸法拟订了《大清报律》草案报请清廷审批。接着，清廷将该草案批交宪政编查馆审核议复，并曾发交奕劻、载沣、世续、张之洞、鹿传霖、袁世凯等六大臣“详加修补，悉心改正”。1908年3月14日，《大清报律》奉旨颁行。该报律共45条，除将前些时候制定与颁行的报刊禁载规定全部收入外，还新增了不少限制性条款。1910年，清政府民政部再次修订《大清报律》，并将修订本

① 据1906年9月12日出版的上海《申报》报道：“日前各报登载印刷件新例一则，兹据确切消息云，所拟之稿尚并非部订专章，颁行时须有变动云。”

② 据1906年10月13日出版的上海《申报》报道：“本馆接警部颁发报律九条专电”，“廿五日（即10月12日——作者注）未刻到”。

③ 《东方杂志》，第5年第1期，1908-02-06。

④ 据1907年9月10日出版的上海《申报》报道：“民政部拟订报律，于前月二十八日具奏奉旨照准。”

交资政院及军机处复议。1911年1月29日,原《大清报律》改称为《钦定报律》经清廷批准后颁行。修订后的“报律”共38条,另有4个附条,保存了原“报律”的主要内容。

在含有调整与规范新闻事业内容的、与新闻事业相关的法律中,《钦定宪法大纲》是近代中国的第一个宪法性文件,1908年8月27日颁发,其中有关新闻事业的条款主要是从国民权利的角度对言论出版问题所作的规定。《著作权章程》于1910年底颁布,沈家本等主持制定。该《章程》共55条,对于著作权(即版权)的概念、作品的范围、作者的权利、取得著作权的程序、著作权的期限和著作权的限制等问题,均作了相应的规定。这一法律引进了资产阶级的著作权观念与法律规定,其立法思想受大陆法系,特别是日本、德国的著作权法的影响较深。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一部著作权法,不仅在当时具有较大的意义、影响与作用,而且对以后的著作权立法也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此外,各级地方政府也在此期间制定与颁发过不少有关新闻事业的地方性法规。1907年1月8日,两广总督周馥颁布自订报律三条,他还曾发布过严禁香港各报入销广东各地的命令。11月23日,天津议事会与当地11家报馆商订出《记者旁听公约》。

有关新闻事业的法律、法令的创制与颁行,特别是《大清报律》等一批专门适用于新闻事业的法律、法令的出台,标志着中国近代新闻法律制度在封建统治的末年初步建成。

二、清末新闻法律制度的内容与特点

清末颁行的新闻法律、法令以及由这些法律、法令构成的新闻法律制度,虽然吸收了不少资本主义法律制度的成分,同《大清律例》等旧法律以及据此构成的旧法制相比,具有十分明显的进步意义。但是,就其本质而言,清末初步建成的中国近代新闻法制,仍然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各种社会条件以及新闻事业的需求的反映,并不是资产阶级性质的近代新闻法制。

(一) 清末新闻法律制度的内容

1. 言论出版及新闻从业人员的自由权利

清廷实行“新政”后,“报禁”开放,国民可自由创办报刊与传递新闻信息,在事实上获得了一定的言论出版自由权利。清廷宣布“预备立宪”后,言论出版自由的尺度进一步放宽。自1905年起,民间报馆被允许现场采访大规模的军事演习。1907年,经清廷民政部批准,司法审判庭特为记者添设旁听专席。1909年,各省谘议局先后成立,均明文规定记者可以旁听议员辩论。1911年资政院

召开首次会议，二十余名记者被允许与会采访。1908年颁发的《钦定宪法大纲》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宪法性文件，在其所附“臣民权利义务”一节中规定：“臣民于法律范围以内，所有言论、著作、出版及集会、结社等事，均准其自由。”这一规定的重要意义是，它第一次在法律性文件中明确做出赋予国民以言论出版自由权利的规定，具有资产阶级法制的色彩。但是，清王朝由其封建专制本质所决定，不可能真正给予国民以言论出版的自由权利，因为国民具有的言论、出版等各项自由权利，首先被限制在法律范围之内，其次还得受皇帝的制约，皇帝具有“当紧急时，得以诏令限制臣民之自由”的权利。

2. 报刊创办的管理制度

关于报刊的创办，清政府最初实行的是批准制。1906年制定的《大清印刷物件专律》规定：“京师特设一印刷注册总局，隶商部、巡警部、学部。所有关涉一切印刷及新闻记载等，均须在该局注册。”^①值得注意的是，《大清印刷物件专律》虽使用“注册”一词，但解读其具体条文后不难发现其“审批”的本质。同年颁行的《报章应守规则》和1907年颁行的《报馆暂行条规》，则都明确地使用“批准”一词。根据《报章应守规则》的规定，“除已开报馆之外，凡欲开设者，皆须来所呈报批准后，再行开设”。《报馆暂行条规》又进一步作了具体的规定：“凡开设报馆者均应向该管巡警官署呈报，俟批准后方准发行。其以前开设之报馆，均应一律补报。”1908年颁行的《大清报律》照抄照搬日本的新闻纸法，因而在报刊的创办这一问题上较前有所进步，由批准制改为注册登记制加保证金制，办理这一手续的部门也由巡警衙门改为行政部门。该《报律》规定：“凡开设报馆发行报纸者，应开具下列各款，于发行二十日以前，呈由该管地方官衙门申报本省督抚，咨明民政部存案：一、名称；二、体例；三、发行人、编辑人及印刷人之姓名、履历及住址；四、发行所及印刷所之名称、地址。”“发行人应于呈报时分别附缴保押费如下：每月发行四回以上者，银五百元；每月发行三回以下者，银二百五十元。其专载学术、艺事、章程、图表及物价报告等项之汇报，免缴保押费。其宣讲及白话等报，确系开通民智，由官鉴定，认为毋庸预缴者，亦同。”清廷将报刊创办的管理制度由批准制改为注册制，是一个很大的进步，但同时又规定缴纳保证金的制度，使批准制的实际进步意义大打折扣。

3. 报刊出版的管理制度

一是报刊出版时须在报刊上标明发行出版人姓名、发行出版所地址的资料。《大清报律》第6条规定：“每号报纸均应载明发行人、编辑人及印刷人之姓名、

^① 刘哲民编：《近现代出版新闻法规汇编》，2页，上海，学林出版社，1992。

住址。”二是报刊样品须送呈有关管理部门查核。《大清报律》明确规定：“每日发行之报纸，应于发行前一日晚十二点钟以前；其月报、旬报、星期报等类，均应于发行前一日午十二点钟以前，送由该管巡警官署或地方官署，随时查核，按律办理。”这一规定的本意是建立新闻事先审查制度，但因条件不成熟而未付诸实践，并为1911年1月修订颁行的《钦定报律》所否定：“每号报纸，应于发行日递送该管官署及本省督抚或民政部各一份存查。”同年10月11日，清廷民政部通咨各省督抚转饬各级地方当局，将当地出版的日报逐日寄送一份到部，备案存查。以上两项规定，完全是为了加强清廷对报业的控制。三是实行更正制。《大清报律》规定：“报纸记载失实，经本人或关系人声请更正，或送登辨误书函，应即于次号照登。如辨误字数过原文二倍以上者，准照该报普通告白例，计字收费。更正及辨误书函，如措词有背法律或未书姓名、住址者，毋庸照登。”“记载失实事项，由他报转抄而来者，如见该报自行更正或登有辨误书函时，应于本报次号照登，不得收费。”这一规定虽然是来自西方的“舶来品”，但仅就载入封建统治下的晚清新闻法典这一点而言，其进步意义就十分明显。

4. 报刊禁载事项

《大清报律》将禁载事项归纳为六条：“诉讼事件，经审判衙门禁止旁听者，报纸不得揭载”；“预审事件，于未经公判以前，报纸不得揭载”；“外交、海陆军事件，凡经该管衙门传谕禁止登载者，报纸不得揭载”；“凡谕旨章奏，未经阁抄、官报公布者，报纸不得揭载”；“下列各款，报纸不得揭载：诋毁宫廷之语，淆乱政体之语，损害公安之语，败坏风俗之语”；“发行人或编辑人，不得受人贿赂，颠倒是非。发行人或编辑人，亦不得挟嫌诬蔑，损人名誉”。1911年清廷对《大清报律》进行修正。军机处在修订原“报律”第12条时，将资政院拟订的“外交陆海军事件及其他政治上秘密事件，经该管官署禁止登载者，报纸不得登载”一条改拟为“外交陆海军事件，及其他政务，经该管官署禁止登载者，报纸不得登载”。清廷最后同意了军机处的提法，即禁止登载的不以政治机密为限，进一步将法网收紧。

（二）清末新闻法律制度的特点

1. 资本主义的形式，封建主义的内容

清末的新闻法律制度，就其形式而言，完全可以列入近代资产阶级法制的范畴。清末颁行的新闻法规，在形式上照抄照搬西方、特别是日本的新闻法规，因而根据这些新闻法规建立起来的新闻法律制度，染有十分浓厚的近代资产阶级法制的色彩。清廷颁布的宪法性文件，也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宪法一样，载有言论出版自由这一近代资产阶级新闻法制的根本原则。在各种新闻法规中，又将这

一原则进一步具体化，如报刊的创办采用注册制等，基本上与当时西方国家同步。对报刊违法行为的惩处，仅就法律条文而言，也是比较宽松的。但是，清廷之所以将新闻立法工作提上议事日程，其目的则完全是为了钳制日益发展的新闻事业及其宣传报道活动，维护清王朝的封建专制统治。因此，《大清印刷物件专律》、《报章应守规则》、《报馆暂行条规》、《大清报律》等新闻法规的内容，无不含有大量的封建文化专制主义的旧货色。而且，由于执法者仍然是头脑里只有“人治”观念的封建旧官吏，因而在实际执法过程中往往以当权者的意志为依归，并不依法办事。1909年，《湖北日报》因刊载学堂学生向炎生所作漫画，讽刺湖广总督陈夔龙、鄂军统制张彪，及发表《中国报纸于官场有特别之利益》一文，被湖北巡警道金鼎查封，经理郑江灏及漫画作者向炎生被捕。1910年春，山西《晋阳公报》因揭露晋抚丁宝铨以禁烟为名，屠杀交城、文水两地百姓百余人的暴行，被丁以“簧鼓革命、动摇人心”等罪名查封，记者张树帜、蒋虎臣被捕，主编王国宾潜逃。1911年2月13日，汉口《夏报》创刊，以“敢言”闻名于时。曾以刊载清军三十一标管带肖国斌兄妹通奸丑事，被肖率兵捣毁，编辑遭到搜捕，旋以“直言”被鄂督瑞澂查封。3月6日，奉天防疫所总办张孝侯指派防疫委员露厚带领军警四五十人捣毁《大公报》，并打伤该报社长杜某、拘捕经理袁昆乔，原因是《大公报》在前一天刊出评论《请问巡警总局防疫所并告国人预备自由行动》，对防疫所陆军及二区巡警无理干涉妇女坐车予以谴责。

2. 无法取信于民，在实践上缺乏全面实施的社会基础

新闻法制是新闻立法、新闻执法和新闻守法的统一。但是，清末的新闻法制，虽然通过新闻立法，在清王朝覆灭前夕初步建成，但在新闻执法、新闻守法方面却缺乏社会基础。当时，推翻清王朝封建专制统治的资产阶级民族民主革命思想已深入人心，清王朝推出的任何挽救颓局的举措都遭到举国反对。因此，清末的新闻法规，往往是刚出台就遭到新闻界内外的强烈抵制，许多报纸发表社论公开表示抗议。1907年3月17日，香港《中国日报》发表社论《清廷之示禁书报》，指责清政府禁锢言论。同年6月11日，上海《神州日报》发表杨笃生所作社论《论报律》，坚决反对清政府制定《报律》：“欲观国家之程度，观其约束报纸之律令”；“国家之以窄迫新闻事业为政策者，其土地人民主权之位置可知”；“然欲用此以为新闻事业之障碍，则吾未见其术之果售也”。1908年《大清报律》公布后，国内各报纷纷评论。上海《神州日报》于4月19日发表论说《监谤政策之争议》，揭露清廷颁布报律的目的是：“欲以极严酷之手段，虏使人民，以钳制舆论，将使舆论一线方萌之生理，因而摧残消歇，然后政府之言语行动，可以猖獗自恣，为所欲为，不复有人承议其后，自以为是而后快其私心。”并斥责该

报律“四十五条之所由来，大率剿袭日本新闻条例之全文，而略变换其一二，不审国情，不究现势，文不对题，药不对症”。

3. 无权制裁在华外报，染有半殖民地的色彩

由于历史的原因，中国新闻事业的中心或主要基地都是西方列强执掌行政权力的租界地区，而在这些地区的报刊，由于西方列强紧紧握住其攫取的在华权益不放，清王朝制定与颁行的新闻法规无法发生作用。在清廷统治地区，外国人主办的报刊也因有“治外法权”作为护身符而可以不执行清廷的法规。1911年（宣统三年）10月8日，两广总督张鸣岐就打着外国人旗号的革命报刊如何处理、是否适用本国“报律”等问题打电报向民政部请示。民政部将电话咨送外务部商议办法。外务部于当日做出答复：“报馆既挂洋旗，则吾国报律不能适用。因吾国领事裁判权尚未收回故也。现在只好电商该外国驻粤领事，请其秉公干涉。”^①

三、国内革命派报刊的出现与“苏报案”

1901年清廷举办“新政”、开放“报禁”后，已经认识到办报宣传之重要的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派，也开始在国内积极开展办报与宣传活动。

1902年12月9日，资产阶级革命派在国内创办的第一份报刊《大陆》在上海创刊。该刊是一份以刊登政论为主的月刊，曾在日本参与过《国民报》编撰工作的革命志士戢元丞担任主编。《国民报》停刊后，戢元丞得到孙中山的支持，回国创办起《大陆》月刊，以倡言革命，但考虑到国内的政治环境，言论比较含蓄。1906年1月出至第47期后停刊。

与之同时，随着资产阶级革命活动在上海的出现与发展，早在第一次国人办报高潮中就在上海问世的《苏报》，在1902年后也开始转向革命立场，并逐步发展成为资产阶级革命派的重要宣传阵地。《苏报》创刊于1896年6月26日，创办人为胡璋，但胡以其日本妻子生驹悦的名义在日本驻上海总领事馆注册，因而以“日商”报纸的招牌出版发行。自创刊至1899年期间，该报虽为胡璋个人经营的商业性报纸，但也受到日本外务省的控制，其内容大多是一些市井琐事和作奸犯科的社会新闻，文字水平低劣，曾因刊登黄色新闻和敲诈勒索之事被人控告，弄得声名狼藉。1899年后，胡璋因其经济难以为继，不得不将《苏报》出售给陈范。陈范，号梦坡，曾任江西铅山知县，因处理教案未合朝廷意而被革职，后移居上海，“愤官场之腐败，思以清议救天下”，但在政治上倾向保皇立宪

^① 《新闻研究资料》，第29辑，205页，北京，中国新闻出版社，1985。

思想。

1902年4月，蔡元培等人在上海成立中国教育会，这实际上是一个革命团体。同年夏天，又在上海成立爱国学社，并以爱国学社为基地，荟集起一批有志革命的青年。陈范与他们频繁接触，并深受影响，其政治立场由改良转向革命。由于陈范在经济上资助爱国学社，因而该校师生也每天轮流为《苏报》撰写论说以作回报。于是，《苏报》实际上成了当时上海资产阶级革命派的言论机关。1903年5月章士钊担任《苏报》主笔后，明确提出了“第一排满，第二排康”的办报方针，决心“扔出一束手榴弹轰开局面，报馆被封在所不惜”。自6月1日起，《苏报》宣布“本报大改良”。6月9日，《苏报》刊文对邹容撰写的宣传小册子《革命军》加以大力介绍和鼓吹。《苏报》发表章士钊署名“爱读革命军者”的论说《读〈革命军〉》，称赞《革命军》是“今日国民教育之第一教科书”，还在《新书介绍》栏内刊登了《革命军》出版的广告。6月10日，《苏报》在《新书介绍》栏向读者介绍新出版的章太炎所撰《驳康有为论革命书》，称“凡我汉种，允宜家置一编，以作警钟棒喝”。6月29日，《苏报》又以《康有为与觉罗君之关系》为题，摘登了章太炎《驳康有为论革命书》的部分文字，不仅痛斥康有为“只可行立宪，不可行革命”的主张，还在文中以轻蔑的口吻直呼光绪皇帝为“载湉小丑”，说他和慈禧太后都是“汉族公仇”。

《苏报》公开大声呐喊革命，当然为清政府所不能容忍。6月30日，清政府经与上海领事团多次密谋，决定由上海租界工部局发出拘票，对陈范、章太炎、邹容等7人实行拘捕，当日章太炎等被捕，邹容闻讯后于翌日自动投案，“苏报案”由此引发。章太炎入狱后，针对上海《新闻报》对章太炎以及革命事业的诋毁与诬蔑，于7月6日在《苏报》上发表《狱中答新闻记者书》，慷慨激昂地表达了反满革命的决心，痛斥上海《新闻报》站在清政府一边的反动行径：“天命方新，来复不远。请看五十年后，铜像巍巍立于云表者，为我为尔，坐以待之，无多聒聒可也。”7月7日，上海租界工部局将《苏报》查封。

章、邹被捕后，清政府通过福开森向租界当局交涉，不惜以出卖沪宁铁路筑路权为交换条件，要求将章、邹交给清廷审判，但遭到了租界当局的拒绝。7月15日，上海租界会审公廨开始会审“苏报案”，一场以清政府为原告，以章、邹等为被告的特殊审讯开始。审讯初期，清政府要求判处章、邹死刑，又遭拒绝。1903年12月中旬，租界会审公廨判处章、邹永远监禁，其余人开释。这一判决遭到国内外舆论的强烈反对后，租界当局不得不于1904年5月21日重新开庭做出判决：章太炎监禁3年，邹容监禁2年，《苏报》永远停刊。这就是中国近代史和中国新闻史上著名的“苏报案”的简要情节。

在“苏报案”中，清政府在中国领土上同自己的臣民打官司，却要由租界当局来审判，在国际上脸面扫地。而章、邹在审讯过程中慷慨陈词，把法庭变成了宣传革命的讲坛。在每次审讯完毕押解回捕房的路上，章太炎在马车上口诵“风吹枷锁满城香，街市争看员外郎”的诗句，把押解路途变成了示威游行的场所，将监狱变成了继续斗争的战场，表现了革命者的崇高气节和英雄气概，赢得了人民群众的爱戴和社会舆论的推崇。章太炎（1869—1936），名炳麟，近代革命家、思想家、报刊评论家和国学大师，浙江余杭人。早年曾在多家报刊担任过撰述和主笔。1900年在唐才常等人发起成立的中国国会上当众剪掉辫子，以示与清廷决裂，立志革命。1902年在日本发起召开“支那亡国二百四十二年纪念会”，轰动一时。1903年在“苏报案”中名扬四海。1906年出狱后到日本东京任同盟会机关报《民报》主编达八年之久。辛亥革命后脱离同盟会，另组统一党，并创办《大共和日报》，鼓吹“革命军兴，革命党亡”。1903年因参与讨袁活动被软禁。五四运动后潜心治学，曾创办《国华》月刊、《国学商兑》、《制言》等刊物，反对新文化运动，思想倒退。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支持抗日救亡。他早期写的政论笔锋犀利，逻辑严密，善于抓住论敌的要害而置之于死地，所以鲁迅说他的文章“所向披靡，令人神往”。但他好用古奥字句和文言语法，传播效果不如梁启超的文章。可惜的是，邹容在临近出狱的1905年4月3日去世，年仅21岁。章太炎在刑满后于1906年6月29日出狱，同盟会立即派人将他接去日本，受到英雄般的热烈欢迎。

“苏报案”发生后，资产阶级革命派在上海的办报宣传活动并未中挫，反而有所发展。

1903年8月7日，《国民日报》在上海创刊，为“苏报案”发生后创办的第一家革命派报纸，由章士钊主编，参与编撰工作的有张继、陈去病、刘师培、陈独秀、苏曼殊等。该报汲取《苏报》被封的教训，比较注意斗争策略，聘请英国人高茂尔（A. Cornall）在英国领事馆注册，在宣传上不作“爆炸性之一击”，但并不讳言其革命立场。在“苏报案”的审讯过程中，该报对章太炎、邹容在法庭上的斗争给予声援。对当时发生在北京的“沈荃案”，该报更是大胆报道，力求详尽。沈荃是湖南人，是一位多次参加反清活动的进步人士，1903年时正在北京担任新闻记者，他探得中俄密约草稿后将其发表在天津英文报纸上，引发全国各阶层和留日学生反对密约的斗争。7月19日，沈荃被捕，后被判斩立决。适逢慈禧万寿庆典，不宜公开杀人，遂改判“立毙杖下”。31日，沈荃被狱吏杖打二百余下，“血肉飞裂，犹未致死”，最后用绳“勒之而死”。《国民日报》的出版，使两江总督魏光燾坐立不安，发了一道《通飭禁阅国民日报令》满街张

贴，结果反而促使该报销量大增。可惜不久后，《国民日报》因内部意见分歧于1903年12月3日停刊。

1903年12月15日，另一份革命报刊《俄事警闻》又在上海问世。参与编撰工作的有蔡元培、林白水、江允宗、刘师培、陈去病、柳亚子等。1904年2月26日，更名为《警钟日报》继续出版。该报将拒俄宣传与反清宣传紧密结合起来，大力抨击清政府的腐败无能和卖国政策，1905年春，因揭露德国企图侵占山东半岛的阴谋，被上海道勾结租界当局以“任意毁谤，淆惑人心”的罪名查封。

这一时期，革命派还深入内地，于1904年10月17日在重庆办起了一份旨在鼓吹革命的报纸《重庆日报》。为避免官府摧残计，该报聘请日本人竹川藤太郎担任社长（称“主干”），但实际主办人是革命志士卞小吾。由于该报敢于攻击清廷腐败、鼓吹民主革命，因而成了四川地方政府的眼中钉。1905年6月1日，卞小吾被地方当局诱捕至巴县衙门软禁，旋奉四川总督锡良之命，解往成都省城监狱拘押。《重庆日报》旋被迫停刊。6月12日，卞小吾在成都狱中被一个受收买的囚犯乱刀捅死，遗体各部有刀伤23处。

为了便于向下层民众宣传革命主张，革命派还在上海等地创办了一批白话报刊。其中主要的有：

《中国白话报》，1903年12月19日创刊于上海，是影响最大的白话报刊，由林白水主编。该报主要是办给那些“种田的，做手艺的、做买卖的，当兵的，以及那十几岁的小孩子阿哥姑娘们”看的，宣称“巴不得我这本白话报变成一枚炸弹，把全国的种种腐败社会炸裂了才好”，具有强烈的民主革命色彩。

《杭州白话报》，创刊于1901年6月20日，最初是月刊，后改为旬刊、周刊、三日刊、日刊。该报初期是一张受改良主义思想影响的报刊，1903年由孙翼中主编后，转向革命，猛烈抨击清政府的黑暗统治和腐败的吏治，多次揭露慈禧太后向洋人献媚的丑态。孙翼中加入光复会后，该报成为光复会的舆论机关和革命党人的秘密联络点，一直办到1910年2月才停刊，是辛亥革命时期寿命最长的白话报刊。

《安徽俗话报》，1904年3月13日在芜湖创刊，主编是陈独秀，其目的“是要用顶浅俗的话说，告诉我们安徽人，教大家好通达学问，明白时事”。该报大声疾呼救亡图存，号召“各人尽心国事”，“人人保卫国家”。还提倡练兵习武，普及国民教育，破除陈规陋习。

四、国内改良主义报刊的再生与发展

清廷宣布举办“新政”后，在政治上倾向改良主义的报刊也乘势而起，重新在国内各地出现。这些倾向改良主义的报刊，其中大多数是由各地君宪派人士创办的，也有少数是流亡海外的康有为领导的保皇党派人回国创办的。

由各地君宪派人士创办的报刊，影响较大的有《大公报》、《京话日报》和《东方杂志》等。

《大公报》于1902年6月17日在天津法租界创刊，报头刊有法文报名“L'Impartial”（意为“无私”）。该报经费主要来自天主教徒资本家柴天宠、朱志尧及王郅隆等人的投资，也有少量法国传教士和法驻华公使的入股，但发起创办并主持报务的是皈依天主教的满族人英华，方守六、刘孟扬、王瀛孙、黄与之、郭定森、樊子熔等先后担任主笔。英华（1866—1926），字敛之，生于北京，家世寒微。信奉天主教，与法国神父来往密切。在维新运动中，他追随康有为，戊戌政变后逃往云南蒙自，曾受聘为法国领事馆雇员。1902年，他在天主教资本家、法国驻华公使馆和天主教神父的支持下，创办起《大公报》，自任社长，也写一些政论文章。1912年2月，英华退隐北京香山，不问报事，潜心从事宗教、教育与慈善事业，1916年后又将报馆卖给王郅隆。该报初创时用竹纸印刷，书版式直排，外加版框，每页版心高21厘米，宽11厘米。日出8页，每页两面，每面17行，每行42字。创刊号共印3800份，赠阅3天，3个月后销至5000份。在上海、济南、青岛、盛京、南昌等国内外40个城市设有代派处。

《大公报》甫创，即明确宣称其办报宗旨“在开风气，牖民智，挹彼欧西学术，启我同胞聪明”。“忘己之为大，无私之谓公”，故取报名为“大公”。声称“断不敢有自是之心，刚愎自用；亦不敢取流俗之悦，颠倒是非；总期有益于国是民依，有裨于人心学术；其他乖缪偏激之言，非所取焉；猥邪琐屑之事，在所摈也。尤望海内有道，时加训诲，匡其不逮，以光吾报章，以开我民智，以化我陋俗，而人文明”^①。在政治上，《大公报》主张变法维新、保皇立宪。对外先是亲法，后转而亲日，和法、日两国的驻华外交人员有密切来往。由于英华有法国公使馆做后台，报纸又在天津租界出版，因此它敢于揭露清政府的黑暗和贪官污吏的罪行。直隶总督袁世凯曾经下令不许《大公报》在租界以外发行，反而提高了该报在读者中的声誉，销量大增。英华出身贫寒，又是个虔诚的天主教徒，对劳动人民的悲惨命运有着天然的同情心，因而《大公报》经常为穷人鸣不平，揭露达官贵人侮辱、压迫劳动人民的罪恶，又多次举办赈济灾民的活动。《论说》

^① 《大公报序》，载《大公报》，1902-06-17。

及《附件》栏刊有不少主张改良社会，兴办公益事业，反对缠足的文章。文字以通俗的文言为主，个别的新闻用京津地区的方言编写。因此，《大公报》以其报风严肃、且具有“敢言”、“替劳苦大众说话”的特点，深受广大读者的欢迎，逐步发展成为华北地区最有影响的报纸之一。

目前，《大公报》仍在香港继续出版，成为中国新闻事业史上出版时间最长的中文日报。纵览其整个发展历程，大致可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自1902年创刊至1916年，由英华主持，1902年前基本上是一张宣传君主立宪的报纸，1902年后在政治上拥护共和。第二阶段，自1916年至1926年，由王郅隆接办，变成一张亲日报纸。第三阶段，自1926年至1949年，由新记公司接办，发展成为有全国影响的大报。第四阶段，自1949年至今，成为一张在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报纸。

《京话日报》是一张以城市居民为主要读者对象、用通俗的北京话出版的报纸，1904年8月16日创刊于北京。创办人兼社长彭翼仲（1864—1921），名诒孙，江苏苏州人，长期居住北京，“赶车拉过水”，因而对底层人民的生活疾苦有所了解 and 同情。他一生办过3张报纸，而以《京话日报》声誉最好，影响最大。1906年著名的南昌教案发生后，该报连续报道事件真相，并将被法国传教士残害致死的南昌知县江召棠遗体的照片公诸报端，揭穿了江是自杀的谎言，激发起读者对帝国主义的极大义愤。该报曾连续揭露清朝王府活埋侍妾的罪行和驻京淮军经常骚扰百姓的事件，敢于在“太岁”头上动土，并与读者保持密切联系，热心为读者服务，因而深受读者的信任和赞许，却得罪了官僚和权贵。1906年9月28日，清廷以“妄议朝政，容留匪人”的罪名将该报查封，彭翼仲被处流放新疆10年。在他离京之日，“市民去送者数千人，赠送程仪者无算”，一位读者还自愿陪他去新疆。1913年彭翼仲从新疆回京后，复刊《京话日报》，但不久又因触怒袁世凯再度被封。袁世凯死后，再度复刊，一直办到1922年。

《东方杂志》1904年3月11日创刊于上海，由商务印书馆编辑出版，以“启导国民、联络东亚”为宗旨，按现代学科分为文学、哲学、工业、商业、理化、博物等门类，“广征名家之撰述，博采东西之论著，萃世界政学文艺之精华，为国民研究讨论之资料”。辛亥革命后，该刊认为西方的道德观念已毁，强调要用中国固有的“精神文明”来救治西方的“物质文明”。五四运动后，《东方杂志》“顺应世界之潮流”，采取兼容并蓄的方针，开辟《世界新潮》、《时论介绍》等专栏，大力评介东西方各种学说和国际形势，面貌焕然一新。抗战爆发后，该刊号召全民抗战，并率先发表一系列论述持久战、运动战、游击战的文章，社会影响不断扩大，销量增至五六万份。1948年12月停刊，历时45年，是中国近

代出版时间最长的大型综合性文摘月刊。

流亡海外的康有为领导的保皇党派人回国创办的报刊，影响最大的有《时报》等。

《时报》是戊戌政变后改良派在国内创办的第一份报纸，1904年6月12日创刊于上海。改良派十分重视国内的这个舆论阵地，先后投资20万元，并派康门得力弟子狄葆贤和罗普分别担任该报经理和主笔，梁启超也潜回上海参与策划。狄葆贤（1873—1941），字楚青，号平子，江苏溧阳人，早年受康有为影响，支持维新运动。戊戌政变后流亡日本，加入保皇会。1900年回国参加自立军勤王活动，事败，再次东渡。1904年奉康有为之命到上海筹办《时报》，主持该报工作17年之久，后信佛，1941年在上海病逝。

《时报》命名取义于《礼记》的“君子而时中”一语，意思是办此报要合于“时”，随“时”而变。故从创刊始，该报就以执中公允的姿态出现，既批评顽固派，又批评革命派。狄葆贤在《时报》创刊之初就明确宣称：“吾办此报，非为革新舆论，乃欲革新代表舆论之报界。”因此，《时报》在政治上并没有造成多大影响，而是在报纸的评论、编辑、出版方面敢于大胆革新，为我国报业的进步和发展做出了贡献：第一，《时报》首先将梁启超在《新民丛报》上创造的“时评”这种新的报章文体移植于日报，开辟了《时评一》、《时评二》、《时评三》三个栏目，聘请陈景韩、包天笑和雷奋分别主持评论国内大事、外埠新闻和本埠新闻。这种应时而发、短小精悍、活泼明快的时评很受读者欢迎。第二，《时报》首创报纸周刊，即在每周固定的日子设立教育、实业、妇女、儿童、英文、图画、文艺等7个专版，分别聘请专家负责编辑。第三，首先采用1至6号铅字排版，新闻标题和评论中的主眼，“皆加圈点以为识别”，版面编排“务求醒目”。第四，最先将一张报纸分为一、二、三、四版，两面印刷，彻底摆脱了书册式报纸的痕迹。《时报》的这些改革，后来各报纷起效法，一直沿袭至今。

这一时期，保皇会出资在国内办的报纸还有《香港商报》和广州的《岭海报》、《国事报》等。倾向于君主立宪的人士还创办了一批白话报刊，如《江苏白话报》、《直隶白话报》、《白话新报》、《预备立宪官话报》等。

五、第二次国人办报高潮的形成

1901年“报禁”、“言禁”开放后，中国民族新闻事业进入了一个蓬勃发展时期。官绅士民自办的报刊纷纷创刊，其数量年年递增。据不完整的统计，这一时期新创办的报刊，1901年为34种，1902年为46种，1903年为53种，1904年为71种，1905年为85种。1906年9月清廷宣布预备立宪后，近代报刊的发

展步子进一步加快，形成了中国新闻事业史上的第二次国人办报高潮。据不完全统计，新创办的报刊，1906年为113种，1907年为110种，1908年为118种，1909年为116种，1910年为136种，1911年为209种。报刊出版地点有北京、天津、西安、太原、三原、保定、开封、上海、南京、镇江、常州、常熟、苏州、无锡、太仓、嘉定、南通、江阴、杭州、宁波、绍兴、福州、厦门、芜湖、安庆、广州、汕头、梅县、海丰、台山、番禺、潮州、梧州、武昌、汉口、宜昌、南昌、赣州、九江、长沙、衡山、宁乡、成都、重庆、贵阳、桂林、昆明、济南、烟台、青岛、奉天、营口、海城、大连、长春、吉林、哈尔滨、齐齐哈尔、黑河、兰州、伊犁、西藏等六十多个城市或地区，几乎遍布全国。

资产阶级革命报刊是第二次国人办报高潮的主流。上海、武汉是资产阶级革命派在国内的两大办报基地。上海经济发达，水陆交通方便，印刷条件先进，又有外国租界可以作为庇护所，因此成为革命派在国内办报的首选之地。自1905年到1911年，革命派在上海创办了16家报刊，其中比较著名的有《中国女报》和于右任主办的《神州日报》、“竖三民”报。《中国女报》创刊于1907年1月，主编是著名女革命家秋瑾。该报以妇女为主要读者对象，以争女权、争独立、争解放为宗旨，出版了两期即被封建统治者查封。于右任主办的《神州日报》和“竖三民”报在1907年后在上海相继问世。于右任（1878—1964），名伯循，陕西三原人，年轻时中过举。1906年东渡日本，加入中国同盟会，翌年4月回上海从事革命办报活动。《神州日报》是于右任创办的第一家报纸，也是革命派在国内创办的第一家大型日报，1907年4月2日在上海创刊。报名“神州”，是为了“唤起中华民族之祖国思想，激发潜伏之民族意识”。该报在“有闻必录”的掩护下，详细报道了秋瑾烈士遇害的经过和各地武装起义的消息，揭发贪官污吏的罪行，披露列强觊觎我国蒙藏边疆和东北地区的阴谋，很受读者欢迎。创刊80天后报馆遭火灾，于右任无力恢复而退出，由杨毓麟等接办。1909年5月15日，于右任重新集资在上海公共租界创办《民呼日报》，自任社长，报名取“大声疾呼，为民请命”之意，内容分为言论、纪事、丛录三部分，除宣传同盟会的纲领和介绍西方社会政治学说外，以大量篇幅揭露贪官污吏的罪行。当时甘肃一带发生灾荒，该报将官吏侵吞救灾赈款的情况披露报端，引起陕甘代理总督毛庆蕃的嫉恨，毛串通上海道和租界当局，反诬于右任贪污赈款，致使报馆于9月8日被查封，于右任被逐出公共租界。1909年10月3日，距《民呼日报》被封仅20天，于右任又在上海法租界创办起《民吁日报》。“民吁”二字有三层含义：一是“呼”字去掉两点便成“吁”，表示即使被挖掉两只眼睛仍然要反映人民疾苦；二是“吁”字由“于”字加“口”字组成，表示出自于右任之口；三是不准

“大声疾呼”，暂且“长吁短叹”罢。《民吁日报》创刊不久，日本前首相伊藤博文到我国东北进行阴谋活动，该报连续发表《伊藤怪物之行踪》、《满洲风云日急》等文章，揭露日本政府企图夺取满洲铁路筑路权并进而控制我国东北的阴谋。伊藤博文在哈尔滨车站被朝鲜爱国志士安重根刺死，该报又发表文章赞扬安的英勇行为，说伊藤之死罪有应得。日本政府恼羞成怒，便串通清政府与上海租界当局，致使该报于11月19日被查封，只出版了48天。1910年10月11日，于右任又创办起《民立报》。该报创刊之初，言论较为温和，但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言论日趋激烈，称清朝官吏为“民贼”，设立专门刊登贪官污吏罪行的《民贼小传》专栏，痛斥清政府为“倒行逆施之政府”，还公开支持四川的保路风潮，详尽报道广州黄花岗起义情况，大胆揭露日、美、俄侵略中国的狼子野心。该报编辑力量雄厚，宋教仁、范鸿仙、景耀月、陈其美、章士钊、叶楚伦、张季鸾、吕志伊、马君武等报界精英均曾担任过编撰工作。其中宋教仁用“渔父”、“桃园渔父”等笔名发表的政论，言豪语壮、笔锋矫健，深受读者欢迎。该报日销两万多份，为当时发行量最大的一家日报。1911年7月，领导长江流域革命斗争的同盟会中部总会成立后，《民立报》成了该总部的机关报和联络机关。由于《民吁日报》、《民吁日报》和《民立报》都是于右任创办，报名都用“民”字打头，创办时间又互相衔接，史称“竖三民”报。

武汉是我国长江流域第二大商埠，又是日知会、共进会、振武学社、文学社和群治学社等革命派组织比较活跃的地区。自1905年到1911年武昌起义前，革命党人创办或被革命党人掌握的报刊有十多家，其中比较重要的有《楚报》、《商务报》和《大江报》。《楚报》创刊于1905年，是武汉地区最早出现的一份具有革命倾向的报纸。为了预防清政府干涉，该报注册于香港，在汉口英租界出版，并由外国人担任名义上的社长，实际主持笔政的是张汉杰和陆费逵。是年冬，该报将湖广总督张之洞向外商借款修铁路所签的草约全文发表，并加按语斥之为“丧权辱国”。张之洞以“鼓吹革命”的罪名勾结英租界将报馆查封，张汉杰被判刑入狱。《商务报》创刊于1909年10月8日，原是一家商业报纸。不久被日知会员宛思演盘进，更名为《商务日报》，改组为群治学社的机关报，由群治学社成员詹大悲任总编辑。群治学社以报馆为秘密联络点，并储存枪支弹药准备起事。后事泄，湖广总督瑞澂函请租界当局将报馆查封。《大江报》，其前身是《大江白话报》，创刊于1911年1月3日，由詹大悲投资创办并自任总经理兼总编辑，湖北著名革命党人宛思演、黄侃、何海鸣、温楚珩等均参与编撰工作，为文学社机关报。《大江报》有两大特色，一是以新军士兵和下级军官为主要读者对象。该报用大量篇幅反映新军士兵的疾苦，维护他们的利益。在《大江报》的宣

传影响下，许多士兵参加了当地的革命团体。二是旗帜鲜明、敢发惊人之语。最使《大江报》享有盛名的，是1911年7月17日发表的时评《亡中国者和平也》（何海鸣撰写）和7月26日发表的评论《大乱者救中国之妙药也》（黄侃撰写，署名“奇谈”）。这两篇短文，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国社会已病入膏肓，非有极大之震动，极烈之改革，不能救中国，认为只有“大乱”（即革命）才是拯救中国的唯一途径。文章发表后，湖广总督瑞澂极为震怒，立即以“淆乱政体，扰乱治安”的罪名，派军警于8月1日查封《大江报》馆，逮捕詹大悲，何海鸣闻讯后自动投案。《大江报》事件发生后，一时舆论哗然，纷纷指责湖广总督摧残言论的暴行，汉口各革命团体和报界公会集会抗议，许多新军士兵来到报馆表示声援。瑞澂原拟对詹、何处以重刑，但慑于民愤，不得不从轻判处詹、何二人18个月徒刑。

除上海、武汉外，革命党人还在国内其他地区创办了不少鼓吹革命的报刊。在广州，革命派先后出版的报刊有18家左右，均为同盟会员自由结合集资创办，不具备机关报性质。其中《时事画报》创刊于1905年9月，是革命派创办的第一份画报，由著名岭南派画家高剑父、潘达微等人编绘出版。该报分为图画和文字两个部分：图画部分大都是配合时事新闻绘制的宣传画，如《钦廉起义图》、《黄冈起义图》、《鉴湖女侠秋瑾像》之类；文字部分有论说、短评、要闻、谈丛、小说、诗界等栏目，曾发表《二十载繁华梦》、《党人碑》等揭露贪官污吏和歌颂革命党人的小说。1907年停刊，翌年迁往香港继续出版，辛亥革命后又迁回广州。《可报》创刊于1911年3月30日。当时广东赌风颇盛，諮议局开会时，一部分议员主张禁赌，另一部分议员则反对，在表决时同意者书“可”字、反对者书“否”字，因而被戏称为“可议员”与“否议员”两派。不久，可议员陈炯明、朱执信等创办《可报》，表示要为禁赌和革命而呐喊。不久，《可报》因报道温生财刺杀广州将军事件被当局查封。在香港，革命派出版的报刊有13家，其中编辑力量最强、影响最大的是老牌革命报刊《中国日报》。该报于1905年10月同盟会香港分会成立后转为该会机关报，1906年秋同盟会南方支部成立后又成为该支部机关报，冯自由、谢英伯和卢信等先后担任社长兼总编辑。《中国日报》不仅是同盟会的言论机关，而且还是革命党人策划起义、筹集经费、储运军火、联络同志的场所，被誉为“革命军之总枢纽”。在北京，最早出现的是《帝国日报》，创刊于1909年12月。接着是《国风日报》，创刊于1911年2月8日。在天津，革命党人相继创办了《忠言报》、《北方日报》、《克服学报》、《民国报》、《民意报》等报刊，其中以京津同盟会副会长李可曾主持的《民意报》影响最大。在河北，1905年在保定出版了《直隶白话报》，主办人是辛亥革命时期著名革命

党人吴樾。在新疆，革命派主办的《伊犁白话报》用汉、满、蒙、维四种文字出版，是我国最早的用少数民族文字出版的报刊。

立宪派报刊的兴起与发展，是第二次国人办报高潮中出现的一个新现象。1906年9月，清廷宣布“预备立宪”后，康有为立即宣布将保皇会改组为国民宪政会，后更名为帝国宪政会，要求所属报刊全力鼓吹君主立宪。此外，国内其他派别的资产阶级也积极创办报刊，形成了一个全国范围的声势浩大的立宪宣传运动。参与立宪宣传活动的报刊有两类：一是立宪派分子个人创办的报刊，如《政论》月刊、《国风报》、《国民公报》等。《政论》月刊，1907年10月由梁启超在日本组建的政闻社创办，为该社的机关报，由蒋智由主编。第1期在东京出版后即随政闻社总部一起迁至上海。该刊明确宣布以“实行国会制度，建设责任政府”为目标，鼓吹立宪。然而清政府并不领情，于1908年3月勾结租界当局，以“纠结党羽，化名研究时务，阴谋煽乱，扰害治安”的罪名查封了政闻社，《政论》也随之停刊，共出版了7期。《国风报》旬刊，1910年2月由梁启超等在上海创办，半数以上的稿件出自梁启超之手，每期稿件均由他在日本编定后寄往上海印刷发行。该报以“忠告政府，指导国民，灌输世界之知识，造成健全之舆论”为宗旨，就实施宪政所涉及的国会、宪法、内阁、官制、财政、实业、外交等问题积极为清廷出谋划策，同时对全国各地的宪政派进行理论上的指导。1911年武昌起义前停刊，共出53期。《国民公报》，1910年7月立宪运动进入高潮后由梁启超支持的密友徐佛苏在北京创办，借以联络各省立宪派人士，指导各地的立宪运动。这个报纸虽然由徐佛苏主编，梁启超“每三四日平均寄文一篇，畅论国民应急谋政治革命之理由”。此外，这类私人创办的立宪派报刊还有：《中国新报》，1907年1月创刊于东京，总编撰是杨度，1908年1月杨度应召入朝做官后停刊。《时事新报》，其前身是上海《时事报》和《舆论日报》，1908年8月合并为《舆论时事报》，1911年5月起更名为《时事新报》，由汪诒年任经理，积极鼓吹保皇立宪。二是立宪团体创办的机关报刊，主要有上海的《预备立宪公会报》、四川宪政会主办的《蜀报》和《蜀风杂志》、贵州宪政预备会主办的《黔报》和《贵州公报》、广东地方自治研究社主办的《广东自治研究录》等。

在第二次国人办报高潮中，清王朝政府主办的官报进一步发展。自1901年实行“新政”后，清王朝地方政府开始创办官报，以控制新闻舆论、抵制民办报刊的社会影响。1902年，直隶总督兼署理北洋大臣袁世凯为鼓吹其新政，并抵制民办报刊的“诡激失中之论”，率先在天津创办了《北洋官报》（双日刊），附带发行《北洋学报》及《北洋政学旬报》。1903年，商约大臣吕海寰、伍廷芳以南方商务日繁，奏请仿《北洋官报》创办《南洋官报》，由江苏总督兼南洋大臣

督办创刊，销行江苏以南沿海及长江各地。清廷在批示伍廷芳的文件中不仅允准《南洋官报》的创办，还进一步要求各省仿行。此后，各省纷纷根据自己的政务繁简和经济力量大办官报，如《山西官报》、《安徽官报》、《四川官报》、《豫省中外官报》、《湖北官报》、《汉口官报》（原为商办）、《江西日日官报》、《山东官报》、《陕西官报》、《甘肃官报》等。其中以张之洞亲自督办的《湖北官报》较有特色。1906年清廷宣布“预备仿行立宪”后，政府官报进一步发展，不仅各地出版的教育官报、政法官报、实业官报大增，中央政府的一些部门也开始创办机关官报，并进入了官报制度化的阶段。这些新创办的官报，一般要经过有关主管部门的审核，经批准出版后又往往是这些主管部门传达政令的耳目与喉舌。1907年4月23日，清廷正式设立官报局，着手筹办中央级的官报。11月5日，宪政编查馆主办的《政治官报》在北京创刊，以作为中央政府的机关报。1911年清政府内阁成立后，《政治官报》于8月24日由内阁印铸局接办，改名《内阁官报》，改组为公布法律、命令的内阁机关报。此外，商务部和学务部也先后创办了《商务官报》和《学务官报》。这些官报的内容主要是公布法律、命令、文案等等，且大多是免费发到各级衙门和学校，与一般读者无缘，并没有起到左右舆论的作用。

此外还值得一提的是，中国人自办的新闻通讯社也在这一时期出现。我国的通讯社事业和近代报业一样，首先是由外国人在中国办的通讯社开始的。1872年，英国路透社在上海设立远东分社，是为外国人在中国办的最早的通讯社。1904年1月17日，广东老报人骆侠挺在广州创办了中兴通讯社，主要向广州和香港的报纸发新闻稿，为中国人办的第一家通讯社。

与维新运动时期形成的第一次办报高潮相较，国人办报的第二次高潮主要有以下几个特点：第一，办报的主角已由资产阶级改良派变成了资产阶级革命派。在戊戌变法前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海内外的舆论阵地基本上被改良派所控制，办报的主角是改良派报人。同盟会成立以后，革命派急起直追，革命报刊在海内外有如雨后春笋般出现，不但在数量上超过改良派报刊，而且在舆论上占居了主导地位。第二，各派报刊在激烈的政治斗争中发展壮大，报刊的战斗作用得到了充分发挥。这一时期，封建顽固派、资产阶级改良派和资产阶级革命派三派政治势力进入决战。资产阶级革命派在发动武装起义的同时，大办革命报刊，力图通过枪杆子和笔杆子推翻清王朝，建立民主共和国。革命派报刊除大力进行反清革命宣传外，大多数报馆还成了革命党人策划武装起义的指挥机关和联络机关。集宣传机关、指挥机关、联络机关于一体，是革命派办报活动的重要特点之一。第三，办报地区有所扩大。维新运动时期，办报活动局限于沿海地区和内地

少数大中城市。这一时期的办报活动先由海外转向国内，再由腹地向东北、西北、西南边疆地区延伸。一些从未办过报刊的省份，如辽宁、吉林、云南、贵州、新疆等省，也办起了革命报刊。第四，读者面大为扩大。维新运动时期，报刊的主要读者对象是政府官吏、士绅和上层知识分子。这一时期，报刊的主要读者对象，虽然仍以“中等社会”和知识分子为主，但已有不少报刊把读者对象扩大到新军、会党、手工业者、小商贩和部分市民。为了适应这些文化程度不高的读者的需要，报刊文字也较维新运动时期的时务文体更加通俗浅显，有的地方还出现了完全用白话文编印的报纸。

第三节 辛亥革命时期新闻理论与业务的发展

一、资产阶级改良派的新闻思想

中国资产阶级的新闻思想，早在维新变法运动时期就已趋于成熟，其主流思想是资产阶级改良派的新闻思想。资产阶级改良派的领袖人物和著名报人康有为、梁启超、严复、谭嗣同等，都在他们撰写的奏折、著作、文章和信件中阐述了自己的办报主张。较之林则徐、王韬、郑观应等早期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想家，他们所论及的问题更广泛，对这些问题的认识也更深刻。

在维新变法运动中，康有为十分重视报纸的宣传作用，并认为报刊是维新变法的最重要的武器之一。康有为在《上清帝第二书》（即“公车上书”）中说，报纸“清议时存，等于乡校；见闻日辟，可通时务……宜纵民开设，并加奖励，庶裨政教”。不久，他又在《上清帝第四书》中进一步提出了“设报达聪”的建议。他认为中国百弊丛生的原因之一是消息闭塞，消除弊病的方法莫如设报以“解蔽达聪”；不但要在“直省要郡开设报馆，州县乡镇亦令续开”，这样才能使“民隐咸达，官愚皆知”。他还认为，“今日要事，在知敌情”，因此主张广泛订阅外报，使“百僚咸通悉敌情，皇上可周知四海”。“百日维新”期间，康有为又上了《奏改时务报为官报折》，他在此折中总结了维新派三年来的办报经验以后说：“臣窃考之，报馆之益，盖有四端：首列论说，指陈时事，常足以匡政府所不逮，备朝廷之采择，其善一也；胪陈各省利弊，民隐得以上达，其善二也；翻译万国近事借鉴敌情，其善三也；或每日一出，或间日一出，或旬日一出，所载皆新政之事，其善四也。”把报纸的作用归纳为匡不逮、达民隐、鉴敌情、知新政四个方面，应该说是比较全面的。

梁启超在总结前人和自己办报经验的基础上，汲取了西方资产阶级的新闻理论，提出了一整套办报主张，形成了比较系统的新闻思想。他一生发表的新闻学

方面的专论在 30 篇以上，内容涉及新闻理论、新闻业务和新闻史三大部类。他的许多新闻观点，对当时的报界起到了很大的指导作用。1896 年，梁启超在《时务报》第 1 册上发表的新闻学处女作《论报馆有益于国事》一文中，把报纸比作耳目喉舌，指出报纸的功能是“去塞求通”。所谓“通”，包括通上下和通中外两个方面：通上下就是“宣德达情”，使“君恩得以下逮”、“民隐得以上达”；通中外就是要尽量掌握外情，做到知己知彼。他认为“中国受辱数十年”就是因为上下不通和内外不通。怎样才能改变因塞受辱的情况呢？他说：“去塞求通，厥道非一，而报馆其导端也……无耳目，无喉舌，是曰废疾。其有助耳目喉舌之用而起天下之废疾者，则报馆之谓也。”那么，报纸怎样才能发挥“去塞求通”的作用呢？梁启超提出了四条要求：广译五洲近事，详录各省新政，博搜交涉要案，旁载政治学艺要书。梁启超早期的办报主张，表达了维新派要求迅速改变国家落后面貌的爱国热情，反映了中国新兴资产阶级急于冲破封建束缚，发展民族经济的迫切愿望。

严复与梁启超的办报主张基本相同。1897 年，严复在《国闻报缘起》一文中指出，报纸的功能在于“通上下之情，通中外之故”，但他强调“尤以通外情为要务”。严复认为，如果一个国家是与外界隔绝的“自立之国”，当然“以通下情为要议”，但当时的中国已经是“与各国并立之国”，因此应该“以通外情为急”。“中外之情通，而后国不自私其治……国不自私其治，则取各国之政教为一国之政教，而吾之国强”。所以报纸“不能不详述外事，不能不广译各国之报”。这也是他创办《国闻报》的目的和做法。

谭嗣同在《湘报后叙》阐述的办报思想主要有两点：一是报纸要“求新”，成为“助新之具”。他认为，中国要想摆脱落后的局面，必须跟上时代的步伐，“昨日之新，至今日已旧；今日之新，至明日而又已旧”，因此报纸应该力求“日新”，成为“助新之具”。他说，助新之具很多，书籍、杂志、学堂、学会都是。但书籍、杂志出版的时间较长，不能适应日新月异的变化；学堂、学会参加的人数有限，影响自然不广；只有报纸才是时效最好、影响最广的助新之具。这就是他发起创办日报《湘报》的初衷。二是报纸要代民立言，成为“民史”、“民口”。他说：“报纸，即民史也。彼夫二十四家之撰述……要不过一姓之谱牒焉耳。”“不有报纸以彰民史，其将长此汶汶暗暗以穷天，而终古为喑哑之民乎！”他又说：“防民之口，甚于防川，此周之所以亡也；不毁乡校，此郑之所以安也；导之使言，谁毁谁誉，此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吾见《湘报》之出，敢以为乡民庆曰：诸君何复忧乎？国有口矣。”由此可见，谭嗣同的办报主张，比康有为、梁启超、严复等人“宣德达情”的主张更为激进。因为康、梁等人的主张还拖着

一条封建主义的尾巴，而谭嗣同的主张则具有明显的反封建的民主主义意识。

此外，陈炽认为，报纸是“国之利器，不可假人”。吴恒炜认为，报纸是“天下之枢铃，万民之喉舌”。这些说法，不仅卓有见地，而且还十分形象生动。

维新变法运动失败后，康有为、梁启超等资产阶级改良派人士流亡海外，接触了更多的西方资产阶级的社会政治学说和新闻理论，同时总结自己的办报经验，比维新运动时期大大前进了一步，提出了许多全新的办报主张。其中见地最深、贡献最大的是梁启超。他是中国资产阶级早期新闻思想的集大成者，为我国资产阶级新闻理论的形成奠定了基础，是我国新闻思想史上承前启后的人物。

梁启超在流亡海外后提出的新观点，一是报纸的“两大天职”说。1902年梁启超在《敬告我同业诸君》（载《新民丛报》第17期）一文中说：“某以为报馆有两大天职：一曰对于政府而为其监督者，二曰对于国民而为其向导者。”他认为，政府没有权力办不成事，但权力过大而又不受监督，就会滥用职权，所以需要作为“国民公意的代表者”的报纸，像父兄对待子弟那样去监督政府，才不至于走向腐败。他还认为，“中国所以不振，由于国民公德缺乏，智慧不开”，因此需要报纸“若孝子之事父母，若良师之诱蒙童”那样去向导他们。

二是衡量报纸好坏的四条标准，即办好报纸的四条原则。梁启超为《清议报》出版第100册而写的《祝辞》中提出的四条标准是：（1）“宗旨定而高”。他说，办一张报纸，“牟利亦宗旨也，媚权贵亦宗旨也，悦市人亦宗旨也”，但都是不可取的。应该“以热诚慧眼，注定一最高之宗旨而守之”，那就是“以国民最多数之公益为目的”。（2）“思想新而正”。他认为，报纸宣传的思想不可不新，但在宣传新思想时必须“校本国之历史，察国民之原质，审今后之时势”，然后才决定是“全力鼓吹之”还是“抛弃之”。（3）“材料富而当”。他认为报纸应该荟萃“全世界之知识”，但在刊登时必须严格选择，使读者“阅一字得一字之益”。（4）“报事确而速”。他认为新闻报道要讲求时效，有时报馆要不惜“费重资以求一新事”，但报道要力求准确，错了要公开纠正。

三是健全舆论的主张。1906年清廷宣布仿行预备立宪以后，梁启超对如何造成健全舆论的问题进行了比较系统的研究。他在《国风报叙例》和《读十月三日上谕感言》等文章中，阐述了什么叫舆论、舆论的形成、舆论的力量、舆论的种类、舆论与报纸的关系以及报刊怎样才能造成健全舆论等问题。他说，舆论是一种天地间最大的“社会制裁之力”，报馆则是体现舆论最有力的机关。报刊要造成健全舆论必须具备“五本”，即持论者必须要有广博的知识；要以维护国家利益为目的；要有不畏强暴的精神；要出自公心，不能怀挟党派思想和以个人的好恶来判断是非；要导之以真理，不能拔之以感情，故作偏至之论。

四是报刊宣传的两种方法，即浸润的方法和煽动的方法。所谓浸润的方法，就是“旦旦而聒之，月月而浸润之”，使读者耳濡目染，潜移默化，逐渐接受论者的观点；所谓煽动的方法，就是要“故作惊人之语，造极端之词”，使读者猛省。

二、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新闻思想

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新闻思想与资产阶级改良派的新闻思想同出一源，均来自西方资产阶级的新闻学说。因此，他们的办报主张不仅在实质上是相同的，在具体表述方面亦有许多相似之处。但是，革命派报人更注意汲取西方新闻学说中反封建的民主主义内涵，因而更具有资产阶级上升时期的革命性和战斗性。在辛亥革命时期，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新闻思想取代资产阶级改良派的新闻思想，成为中国资产阶级的主流新闻思想。

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新闻思想主要有以下几点：

第一，明确提出为革命办报的主张。过去改良派曾提出过报纸是“国之利器”，办报“有益于国事”，以及报纸具有“监督政府，向导国民”的天职等观点。革命派报人认为，改良派所说的“国”是“大清国”，他们要“监督”的政府是大清国政府，这正是革命党所要推翻的。因此，革命派从一开始就明确提出办报的目的是为了革命。《汉帜杂志宣言》说：“此报宗旨，在光复祖国，防护人权，唤起黄帝种魂，扫除白山鞑虏，建二十世纪民国，还五千年神州。”胡汉民在《民报之六大主义》（载《民报》第3号）一文中说：“革命报之工作，所以使人知革命也。盖革命有秘密之举动，而革命之主义，则无当秘密者。非为不当秘密而已，直当普遍之于社会，以斟酌其心理而造成舆论。”即使是在国内出版不便倡言革命的报刊，也巧妙地表达了它们为革命办报的宗旨，如《民呼日报》一再强调的“为民请命”、“吊民伐罪”和作“义师先声”等口号。

第二，公开承认报纸的党派性，明确宣布自己报纸是“党报”和“机关报”，必须大力宣传党的纲领和主张。孙中山早在创建革命政党前，就已经认识到报纸具有党派性这一现实。他在《上李鸿章书》中明确把设“会”与办“报”连在一起，认为有“会”就应该有“会报”。1894年孙中山在檀香山创建革命政党兴中会后，也同时着手将当地华侨创办的《檀山新报》改造为革命党的机关。1900年香港《中国日报》创刊后，孙中山接受该报总编辑陈少白的建议，将《中国日报》办成既是革命宣传机关，也是革命组织机关。1910年2月间，孙中山在旧金山指导当地同盟会（对外以少年学社名义活动）工作。他在谈到该组织及其机关报《美洲少年》时提出了革命党是体、报纸是用的观点：“扩大少年学社，公

开为中国同盟会是体，扩大《美洲少年》，改组为日报是用，有体有用，我们党的宗旨和作用才发挥出来。两件事就是一件事。你们想办法把这两件事办好，这就是我来金山大埠的宗旨。”^①

第二，把报纸视为政治斗争的有力武器。革命派报刊将西方新闻学著作中流行的一家报馆犹如一支军队、报纸的威力胜过四千毛瑟枪等观点加以引进，大肆宣扬。秋瑾把她所办的报纸称为革命队伍中的一个“师团”。1905年8月，郑贯公在香港《有所谓报》上发表的《拒约必须急设机关日报议》一文说：“报纸能宣布公理，激励人心，何异政令？报纸能声罪致讨，以儆效尤，何异裁判定案？报纸能密查侦察，何异侦探暗差？报纸能布其证据，直斥其人，何异警察巡兵？报纸能与人辩诬讼冤，何异律师？报纸能笔战舌战，何异军人？”^②基于这种认识，革命派报刊把揭露清政府的专制腐败、卖国虐民作为其宣传报道的主要内容。

第四，认为报纸应反映民意、影响舆论和指导舆论。因此，革命派创办的报纸，大多以“民”字命名，如“民报”、“国民”、“民呼”、“民吁”、“民立”、“民声”等。他们甚至认为：“记者据最高之地位，代表国民而亦承认其为代表者。”既然如此，“将图国民之事业，不可不造国民之舆论”。制造舆论的最有力者莫如报纸。所谓“一纸之出，可以收全国之视听；一议之发，可以挽全国之倾势”（《国民日报发刊词》）。因此，革命派报刊特别重视政论的作用。

除上述几点外，革命派报人还发表了一些鼓吹言论自由、重视开发“民智”等方面的主张。但总的看来，革命派报人的办报主张都比较零碎，不像梁启超那样长篇大论。

三、新闻业务工作的改进

辛亥革命时期，特别是第二次国人办报高潮兴起后，新闻业务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

在内容上，报纸一般已具备新闻、评论、副刊和广告四大要素。新闻报道成为报纸的主角。中国早期的报刊，由于通讯手段落后，新闻所占比重不大，版面大多以政论和文章为主。第二次国人办报高潮期间，由于通讯设备和印刷技术的改进，加上经济的发展和政局的多变，新闻报道量的大大增加，大型日报每天刊登的新闻稿一般有20至30条，多者在50条以上；新闻报道的面也相应扩大，

^① 《孙中山全集》，第1卷，439页，北京，中华书局，1981。

^② 复旦大学新闻系新闻史教研室编：《中国新闻史文集》，70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

开始划分为政治新闻、经济新闻、社会新闻、国际新闻等不同门类，在固定的版面上刊载。新闻报道的体裁也日益增多，既有简明扼要的短讯，也有夹叙夹议的长篇；既有对某一事件的追踪报道，也有对全局形势的综合分析报道。除消息外，作为新闻新体裁的通讯也开始在报上出现，当时称为“通信”或“纪事”。新闻标题一改过去那种按地区归类、一文一题和题文同一字号的做法，出现了大字题和主题、眉题、副题等多行题。为了提高新闻的时效性，一些报纸对重大的突发事件开始发行“号外”。新闻摄影图片开始被广泛运用。摄影术于19世纪40年代传入中国，1876年上海《格致汇编》最早刊登铜版镂刻照片，1901年《大陆报》和《万国公报》开始刊出影像逼真的铜版印刷的新闻照片。至此，新闻照片作为一种新闻手段登上了报坛。为此，不少报纸建立起了一支专业与业余结合的记者队伍，有的报刊还在外埠聘请通讯员和“特派访员”。

评论工作进一步改进。维新运动时期，报纸的评论形式十分单调，大多只有长篇累牍的“论说”。辛亥革命、特别是第二次国人办报高潮期间，由于政治形势的发展和受到西方报刊的影响，报纸评论的形式日益多了起来，有“社论”、“社说”、“时论”、“代论”、“来论”、“时评”和“编者按”等。“时评”这种形式始于《时报》，就当日某一新闻配发短小精悍、鞭辟入里的言论，深受读者欢迎。后各报纷起效法，著名的有《神州日报》的“时事小言”栏，《民呼日报》的“公言”栏，《天报》的“惟言”、“痛言”栏等。“编者按”在第二次国人办报高潮期间得到了广泛的运用，然而当时大多为一事一议，置于新闻的后面，用“按”、“本馆按”、“记者按”、“记者曰”等字样开头，然后就新闻中的某一事件进行评论。

这一时期，有些报纸分为庄、谐两部，促进了报纸文艺副刊的发展。《中国日报》的《鼓吹录》、《申报》的《自由谈》、《新闻报》的《庄谐丛录》（后改名为《快活林》）等著名的文艺副刊，都是在这一时期诞生的。《申报》的《自由谈》创刊于1911年8月24日，由王钝根首创，初创时其内容多为滑稽小品，如“游戏文章”、“海外奇谈”、“岂有此理”、“博君一粲”等，后不断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在各个历史时期都发挥其无可替代的影响与作用。广告在报纸上也占据了重要地位，广告文字的编写和美术设计也有很大的改进。

在形式上，大多数报纸已由近代形态发展成为现代形态，结束了“报”、“刊”不分时代。在报纸编排方面，早期的报纸仍然沿袭《京报》的书册式，连外国传教士办的中文报刊和维新时期的《时务报》也是如此。19世纪50年代以后，《循环日报》和《上海新报》开始用单张印刷，但仍按中文书写习惯由右到左上下直行编排。1898年《时务日报》为了与《申报》竞争，开始用机制白

报纸两面印刷，分版分栏编排，句读加点，从而揭开了我国报纸版面革新的序幕。1904 年上海《时报》对报纸版式进一步改革，将每天报纸划分为 4 版，根据内容拟定标题，配发时评，字号多样，力求版面醒目活泼。第二次国人办报高潮期间，报纸已完全摆脱了书册式和杂志式的痕迹，成为对开或四开的单张报纸。像《神州日报》、《民立报》等大报，已发展成每天 3 大张 12 个版或 4 大张 16 个版。“综合编辑法”被广泛采用，即将重要新闻放版面的显著位置，并充分利用大字、通栏标题、加框、加花边、设专栏、配图片等编辑手段，使报纸的特点和优势得到充分发挥。

【学习思考题】

1. 《中国日报》的创刊有何意义？它早期的宣传内容与特点是什么？
2. 简述章太炎、郑贯公、于右任的办报活动。
3. 试述“苏报案”的起因、经过、结果和影响。
4. 《民报》与《新民丛报》大论战的内容、结果和意义是什么？
5. 清政府制定了哪些新闻法规？清末新闻法律制度的特点是什么？
6. 第二次国人办报高潮的主要特点是什么？
7. 比较分析资产阶级改良派与革命派新闻思想的异同。



民国初年的新闻事业

第一节 新闻事业的短暂繁荣

一、自由新闻体制的确立

1911年10月10日，武昌新军率先发动起义，打响了辛亥革命的第一枪。接着，各地反清力量纷纷起而响应，加入推翻清朝封建统治的革命洪流。两个月后，在全国24个省（或地区）中，14个省宣告独立。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政府在南京成立，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史称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

自19世纪中叶起成为中国资产阶级的理想的言论出版自由，在推翻清王朝、建立资产阶级共和政体后终于成为现实。1911年武昌起义胜利后，武汉革命党人立即在其所控制的地区，按照言论出版自由的理念，创建自由新闻体制。11月9日，中华民国湖北军政府颁布《鄂州约法》，明确规定：“人民自由言论著作刊行并集会结社”，只有在“有认为增进公益，维持公安之必要，或非常紧急必要时得以法律限制之”^①。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后，以孙中山为首的南京临时政府，立即通过立法手段建立起与西方先进国家接轨的自由新闻体制，保障人民的

^① 转引自陈旭麓编：《宋教仁集》上册，350页，北京，中华书局，1981。

言论出版自由权利。

一是将言论出版自由的原则载入国家的根本大法之中，1912年3月11日颁布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在第2章第6条第4款中规定：“人民有言论、著作、刊行及集会、结社之自由。”第2章第15条规定：人民享有的包括言论、著作、刊行等各项自由权利，只有在“有认为增进公益、维持治安，或非常紧急必要时”，才能“以法律限制之”^①。3月17日，孙中山发布《大总统通令开放墾户惰民等许其一休享有公权私权文》，认为“天赋人权，胥属平等”，并特中令示：前清法律对墾户（即水上居民——引者注）等各类所谓的“贱民”的歧视与限制一律取消，“凡以上所述各种人民，对于国家社会之一切权利，公权若选举、参政等，私权若居住、言论、出版、集会、信教之自由等，均许一体享有，毋稍歧异，以重人权，而彰公理”^②。二是颁布有利于新闻事业发展的法律、法令，促进新闻事业的繁荣。3月17日，孙中山应上海日报公会之请，下令交通部核减新闻邮电费，以利报业的发展。交通部接到孙中山的命令后，拟决“报界之电费，悉照现时价目减轻四分之一，邮费减轻二分之一”。3月27日，孙中山批准了交通部所拟酌减报界邮电费办法，并要求交通部“仰即令行所属知照”，并同时致电袁世凯转饬北京邮电总局知照。^③三是废止亡清限制言论出版自由的旧法规，颁布促进新闻事业发展的新法令。1912年3月2日，南京临时政府内务部通电全国新闻界知照：“查满清行用之报律，军兴以来，未经民国政府明白宣示，自无继续之效力。”^④至于前清的《著作权章程》，因其没有同民国国体相抵触的内容，南京临时政府内务部决定在未颁行新的著作权法前暂时援用。

以孙中山为首的南京临时政府颁行的上述法律、法令，确立了以言论出版自由为本的新闻法制原则，标志着自由新闻体制在中国的建成。这一自由新闻体制与封建文化专制制度是完全对立的，对于强化言论出版自由等资产阶级民主观念，促进中国资产阶级新闻事业的发展，具有不可忽视的进步意义。但是，由于南京临时政府当政时间过短，因而无暇进一步完善这一自由新闻体制。

对于这一新创建的自由新闻体制，以孙中山为代表的新政府领导人在实际行动中也予以高度的尊重与关注。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孙中山始终自居为国民公仆，恪守言论出版自由原则，认真接受报纸和舆论的监督，平易近人地接受记者的采访，并经常参加报界的会议，热情鼓励报刊在共和建设中发挥舆论监督与指

① 《临时政府公报》，第35号，2、3页，1912-03-11。

② 《临时政府公报》，第41号，3、4页，1912-03-17。

③ 参见《临时政府公报》，第49号，5、6页，1912-03-27。

④ 《内务部颁布暂行报律电文》，载《临时政府公报》，第30号，1页，1912-03-06。

导作用。卸任后，他更一再鼓励报界担负起舆论监督的责任，指出：“今民国成立，尤赖报界有言责诸君，示政府以建设之方针，促国民一致之进行，而建设始可收美满之效果。故当革命时代，报界鼓吹不可少；当建设时代，报界鼓吹更不可少。是以今日有言责诸君所荷之责任更重。”^① 独立各省新政权的领导人，尤其是原革命党人掌握政权的地区，也大体上实行言论出版自由的政策，对报刊出版持鼓励态度。老同盟会员陈其美任沪军都督期间，十分尊重当地的报刊出版工作，优礼报馆与报人，在有关呈文的批示中多次表示欢迎报纸对军政府的“箴规”，“庶足以保言论自由，俾为政者得闻其失”。认为“当此民族意识时代，报馆愈多愈好”^②。对上海某些报纸有关都督府的一些明显失实的报道，也未多加指责，只是平和地函请更正。都督府还经常邀请各报开会座谈，“共同讨论，商榷政策之进行”^③。江西军政府及其都督李烈钧也很尊重报界，曾聘请当地革命报纸的主笔任顾问，支持设立“报界俱乐部”，定期与报界接触沟通。即使在一些由立宪派分子和旧官僚掌权的地区，也不得不在表面上尊重新闻界。如大汉四川军政府，在所颁《独立协定》中规定：“巡警不得干涉报馆。”四川都督府政务处每次开会时，还在旁听席上用红布围成一个女记者室，以便于女记者旁听采访。省内外往来电报，可以发表的，也都油印得清清楚楚，分送报馆。

为了恪守言论出版自由的原则，孙中山领导的南京临时政府还合理地解决了因《中华民国暂行报律》的颁布而引发的一场风波。1912年3月2日，南京临时政府内务部次长居正等人，鉴于《大清报律》废止后报刊出版无章可循的状况，由内务部参事林长民草拟了一个简略的法令《中华民国暂行报律》，同新闻界约法三章：“（一）新闻杂志已出版及今后出版者，其发行及编辑人姓名，须向本部呈明注册，或就近地方高级官厅呈明，咨部注册。兹定自令到之日起，截至阴历四月初一日止，在此限期内，其已出版之新闻杂志各社，须将本社发行及编辑员姓名呈明注册，否则不准其发行。（二）流言煽惑，关于共和国体有破坏弊害者，除停止其出版外，其发行人、编辑人并坐以应得之罪。（三）调查失实，污毁个人名誉者，被污毁人得要求其更正。要求更正而不履行时，经被污毁人提出诉讼时，得酌量科罚。”^④ 但是，“暂行报律”的电文发至上海的中国报界俱进会并令其转饬全国报馆遵照执行后，立即遭到了新闻界的一致反对。3月6日，中国报界俱进会和上海《申报》、《新闻报》、《时报》、《时事新报》、《神州日报》、

① 《孙中山全集》，第2卷，245页，北京，中华书局，1982。

② 《民立报》，1911-12-11。

③ 《申报》，1912-06-14。

④ 《临时政府公报》，第30号，1页，1912-03-06。

《民立报》、《天铎报》、《大共和日报》、《启民爱国报》、《民报》等报纸联名致电孙中山并通电全国各地，反对“暂行报律”的颁行。3月7日，章太炎撰写的《却还内务部所定报律议》一文在上海《大共和日报》上作为社论发表；同日，上海各报均破例予以转载。章太炎的文章对“暂行报律”三条逐一加以批驳，且言辞极为尖刻，攻击南京临时政府“钳制舆论”、“欲蹈恶政府之覆辙”；还提出“民主国本无报律”的观点，完全否定了新闻立法的必要性：“观美法诸国，对于杂志新闻，只以条件从事，无所谓报律者。亡清诸吏，自知秕政宏多，遭人指摘，汲汲施行报律，以为壅遏舆论之阶”。对此，孙中山持明智的态度，虚怀若谷地接受了新闻界的反对意见。3月6日，即中国报界俱进会及各报馆致电孙中山并通电全国的当日，孙中山即复电明确表态：“民国一切法律，须经参议院议决发布，乃生效力。此次内务部所布暂行报律三章，未经参议院决议，应作无效。除令该部知照外，特此复闻。”^①3月9日，孙中山发布《大总统令内务部取消暂行报律文》，内云：“案言论自由，各国宪法所重；善从恶改，古人以为常师；自非专制淫威，从无过事摧抑者。该部所布暂行报律，虽出补偏救弊之苦心，实昧先后缓急之要序，使议者疑满清钳制舆论之恶政，复见于今，甚无谓也。又，民国一切法律，皆当由参议院议决宣布，乃为有效。该部所布暂行报律，既未经参议院议决，自无法律之效力，不得以暂行二字，谓可从权办理。寻三章条文，或为出版法所必载，或为国宪所应稽，无取特立报律，反形裂缺。民国此后应否设立报律，及如何订立之处，当俟国民议会决议，勿遽亟亟可也。”^②

从孙中山的上述文电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孙中山对言论出版自由的基本认识和对“暂行报律”的基本态度。首先，言论出版自由是至高无上的原则，“无取特立报律”。清末中国人民追求自由、民主的心路历程，先是效法英国，以王韬等早期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为代表；接着是效法日本，以康有为等维新变法志士为代表；最后是效法美国，以孙中山等资产阶级革命党人为代表。孙中山认为：“中国革命之目的，系欲建立共和政府，效法美国，除此之外，无论何项政体皆不宜于中国。”^③在民主自由权利方面，也以美国为师，赋予国民以较大的自由度。因此，制定报律的行为，与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的基本理念是相违背的。其次，法律的创制须慎重与合乎程序。孙中山在担任临时大总统期间曾多次阐释过这一观点。1912年3月3日，孙中山在咨复参议院弹劾吕志

① 《孙中山全集》，第2卷，191页。

② 《临时政府公报》，第33号，1页，1912-03-09。

③ 《孙中山全集》，第1卷，563页。

伊违法文中说：“惟查法律最重方式，苟方式一有不备，即不能发生效力。”^①“暂行报律”既然未经参议院议决，当然没有法律效力。第三，内务部制定“暂行报律”的本意并非如新闻界所说的那样是为了压制言论出版自由，而是出于“补偏救弊之苦心”。平心而论，内务部颁布的“暂行报律”，从加强政府对报业的管理这一角度来看，应该说是很有必要的。其中关于不得有害共和国体的规定，更有积极的现实意义。内务部作为南京临时政府管理新闻事业的职能部门^②，颁发临时性的行政管理法令，应该说也在其职权范围之内。但是，由于《临时约法》以及其他重要法律均未制定与颁布，制定报律确实也失之草率。而且，“暂行报律”中罪与非罪的界限及量刑的标准含混不清，在实施中易被误解与滥用。因此，由“暂行报律”引发的一场风波，积极的一面是加深了人们对言论出版自由权利不得滥用法律限制之的认识，不得制定钳制新闻事业发展的专门法律已在新闻界内外形成共识。之后，中国报界俱进会、上海日报公会、广州报界公会、湖南报界联合会、北京报界同志会、贵州报界同盟会等新闻团体曾多次代表报界，就报律、报人的权益等问题与政府进行交涉。1912年6月，中国报界俱进会在上海召开的特别大会，还将不承认有报律这一问题列入大会的重要议题之中。在北洋军阀统治时期，袁世凯及其继任者之所以在运用法律手段钳制言论出版自由时不得不有所顾忌，实源于此。消极的一面是放弃了革命政权对新闻事业的必要的管理与约束。在当时国内外反动势力竭力破坏革命、并在新闻出版界拥有相当大的力量和影响的时候，革命政权放弃对新闻事业的管理和约束，其实际结果只能是为敌对的政治力量利用报刊破坏革命提供方便。

二、新闻事业的短暂繁荣与政党报刊的泛滥

自由新闻体制的确立，对中国新闻事业的发展是一个极大的推动力。顷刻之间，新闻事业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繁荣景象，有人把武昌起义后的半年称为“报界的黄金时代”。据戈公振《中国报学史》记录，在武昌起义后的半年内，全国的报纸由100多家猛增至500家，总销数达到4200万份。这两个数字，都超过了历史最高纪录。北京是当时的政治文化中心，新创办的报纸最多，有50家，以下依次是上海（40多家）、天津（35家）、广州（30家）、浙江（20多家）、四川（20多家）、湖南（11家）、武汉（9家）……另据1912年北京政府内务部公布

^① 《孙中山全集》，第2卷，169页。

^② 1912年2月22日，孙中山在批复法制局呈文中指出：“查新闻、杂志、演说会等事，自应归内务部管理，即行查照订定可也。”（《孙中山全集》，第2卷，120页）

的报告说，从2月12日清帝宣布退位到10月22日的8个月内，在内务部注册立案的北京报纸有89家。报纸的急剧增加，反映了在社会大变动期间人们对新闻的渴求。有的报纸为了抢时间，多发稿，还增出午刊、晚刊，有的接电报后立即印发号外。

在新出版的报刊中，绝大多数是政党报刊。民国成立后，在“政党政治”潮流的影响下，短时间内全国出现了大大小小三百多个政党。这些政党有的只是昙花一现，有的有名无实。经过一段时间的分化组合，到第一届国会选举之前，基本上形成了“同盟会—国民党”^①与“共和党—进步党”两大系统。它们为了在国会中争取更多的席位，竞相创办机关报以作自己的宣传工具。

民国初年，“同盟会—国民党”系统的报纸遍布于上海、南京、北京、天津、武汉、广州、长沙、成都等大城市。在上海，除原有的《民立报》、《天铎报》、英文《大陆报》外，新出版的有《太平洋报》、英文《民国西报》、《中华民报》、《民国新闻》、《国民》、《民强报》等。《民立报》在民国初建的一段时间里被确定为国民党的总机关报。由于于右任等人出任临时政府要职，报纸的编辑工作由范鸿仙、徐血儿、邵力子等人主持。“二次革命”失败后，该报受到袁世凯的迫害，不得不于1913年9月4日停刊。《天铎报》由李怀霜担任总主笔，陈布雷、柳亚子等担任编辑工作，在反对袁世凯专制独裁方面发表了不少言辞激烈的文章，其中尤以柳亚子的文章最为脍炙人口。《民国新闻》创刊于1912年7月20日，以“维护共和政体”为宗旨，宣称“非有精确之新闻，无以造正大之舆论；非有正大之舆论，无以扶初步之共和”。《中华民报》创刊于1912年7月，创办人是邓家彦，以“拥护共和，防止专制复活”为宗旨，是同盟会系统中反袁态度最坚决的报纸。

在北京，原来的《国风日报》继续出版，又新创办了《亚东新报》。《国风日报》是同盟会在北京的主要机关报，由景梅九负责，经常批评袁世凯政府，曾多次受到“停刊三日”的处分。《亚东新报》创刊于1912年5月，由宋教仁发起创办，在组建国民党方面起过积极作用，宋教仁还经常以“桃源渔父”的笔名在该报上发表文章，鼓吹政党政治，为社会所重视。在天津，新创办的有《民意报》和《国风报》。《民意报》是京津同盟会的机关报，《国风报》是国民党直隶支部的机关报。两报均持反袁态度，不久被封禁。在武汉，除《大汉报》和《中华民国公报》外，武昌起义前被查封的《大江报》恢复出版，新创刊的报纸有《震旦日报》、《春秋报》、《民心报》和《民国日报》等。其中影响较大的是《震旦日

^① 1912年8月，同盟会联合一些小党派，改组并更名为国民党，成为全国最大的政党。

报》，创刊于1912年4月15日，由共进会员、鄂军都督府军务部长张振武出资创办，宛思演、方觉慧任正副总编辑。该报初创时发表过一些拥护黎元洪的言论，后转而倾向同盟会并成为其机关报，发表过不少指责黎元洪仗势揽权、摧残革命的文章。在长沙，有《长沙日报》和《国民日报》。《长沙日报》原来是清政府的官报，武昌起义后被革命党人接收，成为同盟会的机关报。《国民日报》由原来的《军国日报》和《湖南民报》合并改组而成，是国民党湖南支部的机关报。在广州，有《中国日报》、《中原报》、《平民日报》、《民生报》等。《中国日报》为同盟会南方支部机关报，由香港迁至广州出版，受广东都督府的巨额津贴，为广州最有影响的报纸。此外还有开封的《民立报》，成都的《天民报》、《四川公报》、《四川民报》，重庆的《国民报》、《新中华报》，昆明的《天南新报》，南宁的《民风报》，桂林的《民报》，福州的《福建民报》、《群报》，等等。

在数量上与“同盟会—国民党”报刊相抗衡的，是“共和党—进步党”系统的报刊，除武昌起义前已出版的《国民公报》、《时报》和《时事新报》等原立宪派报纸外，大多数是民国成立以后新创办的。在北京，有《天民报》、《北京时报》、《新纪元》、《京津时报》和《少年中国》周刊等。《少年中国》周刊由黄远生、蓝公武、张君勱等人创办，以“主持正论公理，以廓清腐秽，而养国家元气”为宗旨。该刊的基本态度是拥护袁世凯的，但敢于批评时政、揭露黑幕，因而也颇受读者的欢迎。在天津，有《庸言》杂志等。《庸言》是梁启超主编的一份政治理论性半月刊，1912年12月创刊，在政治上拥护袁世凯。由于梁启超在舆论界享有很高的声望，因而在当时影响甚巨，发行遍及全国。在上海，有《大共和日报》、《民声日报》和《东大陆报》等。《大共和日报》是中华民国联合会的机关报，创办人是从同盟会中分裂出来的章太炎。该报把矛头指向孙中山、黄兴和临时政府，吹捧袁世凯和黎元洪。在武汉，有《共和民报》、《强国报》、《国民新报》等。《共和民报》由原湖北省谘议局副局长张国榕主办，是民主党的言论机关，而《强国报》则是武汉地区共和党的言论机关。在长沙，有《湖南公报》等。《湖南公报》是一份大型日报，创刊于1912年4月，原来接受共和党的津贴，后来被进步党控制。在成都，有《共和日报》、《日日新闻》、《公论日报》、《四川正报》等。《公论日报》创刊于1912年2月，由刘师培、吴虞等主笔，是统一党的言论机关。此外还有济南的《大东日报》，重庆的《正论报》、《益报》，广州的《华国报》、《天职报》，南宁的《指南报》，桂林的《公言报》，等等。

除了“同盟会—国民党”和“共和党—进步党”两大政党系统的报刊外，一些小政党、政治团体和个人也办起了不少报刊。在上海，自由党创办了《民权报》，由戴季陶、何海鸣主编。该报以言论激烈闻名于世，提出“以暴易暴，惨

无人道，欲真共和，重在改造”和“报馆不封门，不是好报馆；主笔不入狱，不是好主笔”等激进主义的口号。《民权报》还与“同盟会—国民党”系统的《中华民报》和《民国新闻》一起，被人们誉之为“横三民”报，成为当时的“邀进派”报纸。中国社会党创办了《社会日报》和《新世界》杂志，因出版时间较短，在读者中影响较小。此外，康有为创办的《不忍》杂志，以君主立宪卫道士的姿态，猛烈抨击民国成立后的政局，竭力为皇室复辟制造舆论。

各政党主办的报刊，无不站在自己政党的立场上讲话，常常引发论争。特别是“同盟会—国民党”与“共和党—进步党”两大政党系统的报刊，对国内外一切事务的主张，无不针锋相对、互相攻击。两党报刊争论的问题主要是：实行中央集权还是地方分权；实行“超然内阁”制、“人才内阁”制还是实行“责任内阁”制；国务院对总统负责还是向国会负责；要不要向外国借款；建都于南京还是建都于北京；实行公元纪年还是实行民国纪年；要不要遣散民军；等等。两党报刊还互揭老底，我骂你是“贼党”、你骂我是“贼报”，甚至发展到殴打报人、捣毁报馆。在北京，《国民公报》因攻击南京临时政府，同盟会方面的《国光新闻》等7家报纸的工作人员数十人便前去捣毁报馆，打伤了该报主笔徐佛苏和蓝公武。在长沙，国民党的《长沙日报》和共和党的《湖南公报》互相敌视，各记者出入时，均备有手枪一支以防不测。上海的国民党系统报纸派遣记者去北京采访时，也发给武器，以便于自卫乃至在必要时用来自杀。在同一政党报纸之间，也经常出现争论。总之，民国初期出版的政党报刊，在中国近代史上并没有起到多少进步作用，反而造成政局的混乱。

此外，民国初年新出版的报刊还有：新政权机构的机关报，如四川都督府的《都督府政报》，云南都督府的《云南政治公报》等；民国新贵和政客出资创办并为自己鼓吹的报纸，如尹昌衡在成都办的《西方报》、谭延闿在武汉办的《国民日报》等；一些知识分子为发表自己主张而创办的报纸，如章士钊在上海办的《独立周报》、黄晦闻在广州办的《天民日报》等；还有“专对女界立言”，争取妇女参政的报纸；一批研究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学术性期刊；商家为了推销自己的商品而创办的纯商业报纸。

这些报刊，无不以天然的“舆论之母”、“舆论的代表”、“四万万民众共有之言论机关”自居，极力宣扬在民主制度下，“报馆与国务院、总统府平等对待，其性质与参议院均同为监督公仆之机关”，“共和国之最高势力在舆论”，新闻记者是“不冠之皇帝，不开庭之最高法官”^①。

^① 《大中华民国杂志》，1913-04-30、1913-06-19。

第二节 袁世凯与北洋军阀统治下的新闻事业

一、袁世凯对自由新闻体制的扭曲与“癸丑报灾”

中华民国成立后不久，袁世凯利用革命形势给清王朝的强大压力和手中的军政大权，以逼迫清帝退位为筹码，为自己谋得了临时大总统的职权，窃取得了辛亥革命的胜利成果。袁世凯上台后，表面上赞成共和，暗地里却用极其狡猾的手段实行专制。他一上台就对孙中山确立的自由新闻体制进行大肆的扭曲与破坏，使新闻事业的短暂繁荣局面戛然而止。

在袁世凯上台之初，由于民主共和思想和言论出版自由理念的深入人心，新闻界十分活跃，“有冠皇帝大限告终，无冠皇帝炙手可热”。袁世凯也不得不故作尊重新闻自由的姿态，甚至推出一些保护新闻自由的举措，如在国务院特设新闻记者接待室，每天由国务院秘书长亲自出面接待。对社会舆论和新闻界的控制，主要采取创办御用报纸和收买报纸报人以为己用等手段。袁世凯创办或接办的御用报刊，在北京主要有新创办的《国权报》、《金刚报》和《亚细亚日报》，在上海主要有接办的《神州日报》，在广州主要有接办的《时敏报》，在长沙主要有新创办的《国民新报》（后改名《大中报》），等等。在这些报纸中，影响较大的是北京的《亚细亚日报》和上海的《神州日报》。《亚细亚日报》于1912年6月在北京创刊，由袁世凯政府出资10万元开办，声名狼藉的帝制分子薛大可担任主编，丁佛言、樊增祥、易实甫等任撰述，日出三大张，是御用报纸中言论最反动、活动最猖獗的一家报纸。“二次革命”期间，该报领衔发表所谓的《讨贼露布》，以后又连续刊登帝制分子劳乃宣和袁世凯的政治顾问古德诺鼓吹复辟帝制的文章，报道筹安会的劝进活动。袁世凯称帝期间，该报带头改用“洪宪”年号，称袁世凯为“今上”，记者署名称“臣记者”。1915年9月，《亚细亚日报》在上海出版分版，遭到革命党人和爱国人民的强烈抵制，报馆接连两次被炸，勉强拖到1916年1月被迫停刊。1916年3月，袁世凯被迫取消帝制后，北京《亚细亚日报》也随之寿终正寝。《神州日报》于1915年被袁党强行接办后，利用它原来在读者中的声誉为袁筹办帝制张目，一时起过蒙骗民众的作用。从表面上看，袁世凯的御用报纸并不多，但实际上为袁世凯控制与收买的报纸为数不少，如袁世凯的御用党——公民党在各地创办的报纸、在复辟帝制阴谋暴露前基本上亲袁世凯的“共和党一进步党”系统的报纸。此外，像北京的《国华报》、《黄钟日报》、《大自由报》和《新社会日报》，上海的《大共和日报》和《时事新报》，长沙的《大公报》，广州的《华国报》等，也曾一度被袁世凯所收买。据不完全

统计，在袁世凯执政期间，直接或间接收买的报纸在125家以上。袁世凯收买报纸和报人的手段，有的是一次付以重金，有的是长期发放津贴，有的是零星施舍，不一而足。

但是，对一批追求民主、革命立场坚定的报刊，袁世凯则毫不留情地进行迫害与摧残。捣毁、查封报馆和殴打、逮捕、驱逐、杀害报人的事件时有发生。1912年6月，袁世凯指使内务部总长赵秉均出面，派出军警200余人，包围、打砸北京《中央新闻》，绑走该报经理、主笔等工作人员11人。8月，袁世凯政府通过法国驻华公使，指令天津租界当局，将《民意报》逐出租界。上行下效，各地反动势力也开始对革命、进步报刊进行迫害与摧残。在武汉，黎元洪在8月8日下令查封武汉《大江报》，罪名是该报馆为“乱党秘密机关”。《大江报》主笔凌大同被扣以“言论专取无政府主义”的罪名，由黎元洪亲自下令逮捕、斩首，并将头颅挂在城门口示众。接着，在不到半年的时间里，黎元洪又查封了《民心报》、《民听报》、《帝民报》、《群报》、《民哭报》等革命报纸。在湖南，长沙《大汉民报》因对军队有所批评，被旧军官率队捣毁；《岳阳日报》因对当地筹饷局“不论贫富，值十抽一”的规定表示了一点异议而被当局查封，主笔被捕。在福建，福州《民心日报》、《群报》只因消息中揭载了当地官吏的不法行为和同情民军，就被强行查封；《民心日报》发行人受通缉；《群报》总编辑被杖责后收押，两名记者遭暗杀。在四川成都，仅仅在1912年一年内，就有《四川公报》、《中华国民报》、《蜀报》、《蜀醒报》等多家拥护共和的报纸被当地军阀查封或唆使军人捣毁；《蜀报》记者朱山竟以“企图炮轰都督府”的莫须有罪名而被斩首。

即使在同盟会——国民党掌权的地区，一些骤升高位的当权者，为维护与发展自己的权势，也动辄封报杀人。原《中国日报》记者、民军总长黄世仲因对遣散民军问题有所不满，被广东代理都督陈炯明杀害。广州《公言报》、《佗城报》为黄世仲被杀鸣不平，陈炯明立即下令查封报馆，发行人陈听香被杀害。浙江绍兴军政分府都督王金发纵容士兵将批评他的《越华日报》砸毁，殴伤该报工作人员17人，其中一人伤重不治而死。

袁世凯在其统治地位稍稍巩固后，又以总统、中央政府及其组成部门、各级地方政府的名义发布具有法律效力的命令，进一步钳制新闻事业。

1912年底至1913年初，在国会参众两院选举中，宋教仁领导下的国民党取得了压倒多数的胜利，袁世凯的独裁统治受到了严重威胁。于是，袁世凯便唆使赵秉钧，派人于1913年3月20日在上海将宋教仁刺杀。为了瞒天欺世，京师警察厅在1913年3月11日，即宋教仁事件发生前夕，就向各报转发了陆军部、内

务部的命令，以防止泄露外交、军事机密为借口，宣告自即日起由陆军部派员对各报拟刊载的新闻稿实行预检，违者军法从事。3月20日宋教仁遇刺后，为防止事件的真相被新闻界揭破，袁世凯又由陆军部出面下令各地报纸：“定二年三月二十一日起，由部派员实行检阅签字办法”。凡登载军事外交事件，不服检阅者，“立即派员究办”，严重者“科以军法”^①。但是，纸终究包不住火。举国上下，輿情哗然。上海《民立报》从宋案发生的第二天起，每天以整版篇幅连续报道宋案的经过，刊登凶手的供词和袁党往来的密电等，用铁一般的事实证明袁世凯就是刺杀宋教仁的元凶。广州创办了《讨袁报》，一些报纸也出版了反袁专刊。即使是在袁世凯巢穴北京出版的国民党报纸，也不顾安危，发表了声讨袁世凯的言论。《民国报》撰文明确指出：“击宋君者非亡命之徒，乃吾人之政敌也。”《国风日报》发表社论猛烈抨击袁政府“谋叛，暗杀，卖国”，是“杀人政府”。一些非国民党报纸，这时也看清了袁世凯的嘴脸，加入了反袁宣传的行列。于是，袁世凯不得不亲自上阵弹压舆论。5月1日，袁世凯发布总统令，规定：凡罪案未经审讯前，报纸不得刊载。同月，内务部通令各地报刊不得使用“万恶政府”、“政府杀人”、“民贼独夫”等字样，违者从严取缔。6月17日，内务部又两次通令全国各报，不得就“宋案”和善后大借款事进行“谩骂”与“泄露机密”，否则按“报律”议惩，公然将已废止的亡清《钦定报律》重新搬回民国的报坛。从此，报馆、报人被警告训斥、传讯罚款、搜查封禁、直至被捕被杀的事件接连不断，北京《国风日报》、天津《新春秋报》和《民意报》、汉口《震旦民报》等一大批国民党系统的报纸遭封禁。为了推翻袁世凯的统治，再造共和，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于7月发起“二次革命”，又称“癸丑之役”，江西、南京、上海、福建、湖南、广东、四川等省市，或宣布独立，或起兵反抗。“二次革命”爆发后，袁世凯政府颁发的新闻禁令更是一个接着一个，并要求全国所有的报刊重新登记注册。

“二次革命”终因敌我力量悬殊而失败。之后，袁世凯政府借军事胜利之淫威，把国民党诬指为“乱党”，对国民党系统的报刊以及其他异己报刊大肆摧残，凡国民党系统的报刊一律扣以“乱党报纸”的罪名而查封。

北京、天津、武汉、广州、长沙、成都、福州、南昌、开封等地的国民党系统的报刊全部被查封。非国民党系统的报刊，只要有碍袁世凯的独裁统治，也被乘机剿灭。一些本来拥袁的报纸也有因“城门失火”被殃及者。在北京，《超然报》本是军阀江朝宗津贴的报纸，因刊登《顺天府中之黑幕》一则消息，被赵秉

^① 《申报》，1913-03-28。

钩指为“诋毁军人名誉”而被查封。政治上相当保守的《正宗爱国报》，因一个编辑写的时评中有“军人为国家卖命，非为个人卖命。若为个人，可谋生之处甚多，何必从军”等语，就被扣上“迹近通匪，煽惑军心”的罪名而被查封，该报社长丁宝臣后来也遭到枪杀。在广州，袁世凯的代理人龙济光在一天之内就查封了《中国日报》、《平民报》、《中原报》、《民生报》、《讨袁报》、《觉醒报》等六家反袁的国民党报纸。教会报纸《震旦报》因言论激烈而被封，发行人康仲萃被杀。一向“拥护中央”的《粤声报》、《民治报》、《公论报》等，因被怀疑与国民党的粤军和民军有关连，也先后被查封。在福州，《福建民报》、《群报》、《共和报》等被封，主笔被捕。在开封，《民立报》编辑敖瘦蝉撰写了一幅悼念宋教仁的挽联：“目中竟无拿破仑，宜公先死；地下如逢张振武，说我就来。”这副对联发表后，敖瘦蝉被袁世凯的爪牙逮捕并枪决。上海的情况稍有不同。《民立报》、《民权报》、《民强报》、《天铎报》、《国民日报》等国民党报纸，因在上海租界内出版，袁世凯政府无权直接查封，但由内务部明令各地“禁止售卖”，致使这些报纸发行受阻，印数骤降至几百份，因经济上难以维持而被迫停刊。《中华民报》则因总编辑邓家彦被袁世凯政府咨请租界当局逮捕、判刑而停刊。据统计，到1913年底，全国继续出版的报纸只剩下139家，较之民国元年的500家锐减300多家，北京的上百家报纸也只剩下20余家。报刊减少三分之一，报人大批被捕被害，因而在中国新闻史上把“二次革命”失败后袁世凯对新闻界的大扫荡称为“癸丑报灾”。

尽管袁世凯滥施淫威，他却从来没有真正控制过新闻界。由于复辟帝制越来越不得人心，大多数报刊都站到了袁世凯的对立面。最先起来反袁的是孙中山重组的中华革命党、老同盟会员和一些民主主义者所办的报刊。1913年“二次革命”失败后，孙中山再次东渡日本，重组“中华革命党”，并在日本东京创办《民国》杂志和《甲寅》杂志，分别由胡汉民和章士钊主持笔政，进行反袁宣传。接着，孙中山领导的中华革命党又在海外其他地区创办革命报刊或将当地的华侨报刊改组为革命报刊，首先在海外建立起反对袁世凯的宣传阵营。海外革命报刊的发展，袁世凯当然视之为洪水猛兽，下令在国内禁售。1913年12月中旬，袁世凯政府发现美国旧金山华侨报纸《中华民国报》在上海发售，立即以该报“语多悖谬，有害治安”为由下令查禁。由于在海外出版的革命报刊对国内的影响毕竟有限，因而中华革命党志士又潜回上海租界等国内地区，创办宣传反袁报刊。1916年1月22日，中华革命党人陈其美等人在上海创办的该党机关报《民国日报》创刊，在国内树起了反对袁世凯的宣传大旗。这些革命报刊无不受到袁世凯政府的迫害，但它们的反袁立场在反迫害的斗争中愈益坚定。袁世凯宣布筹办帝

制后，原先拥袁、亲袁的报纸和报人，在全国人民反对帝制的强烈意志的震撼下，也转而加入了反袁行列。著名报人梁启超写了一篇反对复辟帝制的《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袁派人送去20万元请他不要发表，被梁启超拒绝。这篇文章在《大中华》杂志发表后，各报争相转载，影响很大。一些历来比较保守的老牌资产阶级报纸，如上海《申报》、香港《华字日报》等，也改变态度支持反袁。《申报》曾公开发表声明，拒绝接受袁世凯的贿赂，指责帝制活动是“无端自扰”，“实难赞同”。真正死心塌地为袁世凯称帝作鼓吹的，最后只剩下《亚细亚日报》等几家御用报纸而已。

二、袁世凯统治时期的新闻立法活动

袁世凯上台后，还通过立法手段，逐步建立起一个为其封建军阀独裁统治服务的新闻法律制度。

在1912年袁世凯上台至1914年前，袁世凯虽然还不敢公然制定钳制新闻事业的专门法律，但在制定其他法律时常常夹带一些有关剥夺新闻自由权利、限制新闻事业发展的条款。1912年12月15日，袁世凯政府颁布法律第9号《戒严法》。根据该法第14条的规定，在戒严地区内，驻军司令官有权“停止结会集社，或新闻杂志图书告白等之认为与时机有妨害者”，并“因其执行所生之损害，不得请求赔偿”。1913年，袁世凯政府还加强对邮电的检扣，下令不准报馆用密码拍发新闻。对北京发往上海的新闻电报尤为注意，交通部还派范春光去上海坐镇电报局检查电报，并命令该局“须经该员许可，方准译发”。

进入1914年后，袁世凯随着其统治地位的巩固与加强，开始制定与颁行对新闻界实施全面管制的专门法律。

1914年4月2日，袁世凯政府以清除报界“败类杂种”等理由，以比前清报律“稍严”为主旨，制定与颁布了教令第43号《报纸条例》。这部专门适用于报业的法令，采用以大总统名义发布的教令这一法律形式，与由立法部门制定的法律具有同等的效力。《报纸条例》共35条，不仅把《大清报律》对报刊的禁限条款悉数照抄，还从1909年颁布的日本《新闻纸法》等外国报律中搬来了许多新的禁限措施。一是报纸的创办实行批准兼保证金制，从政治、经济两个方面限制新闻事业的发展。《报纸条例》规定，报纸的发行，“应由发行人开具下列各款呈请该管警察官署认可：一、名称；二、体例；三、发行期间；四、发行人、编辑人、印刷人之姓名、年龄、籍贯、履历、住址；五、发行所、印刷所之名称、地址。警察官署认可后，给予执照，并将发行人原呈及认可原因，呈报本管长官，汇呈内务部备案。”“本国人民年满三十岁以上”，非“在国内无住所或居所

者”、“精神病者”、“褫夺公权尚未复权者”、“海、陆军军人”、“行政司法官吏”和“学校学生”六种人，“得充报纸发行人、编辑人、印刷人”，但“编辑人、印刷人不得以一人兼充”。报纸的发行，经警察官署认可后，发行人还应在“报纸发行二十日前”“缴纳保押费”。有关缴纳保押费的具体规定是：“一、日刊者，三百五十元；二、不定期刊者，三百元；三、周刊者，二百五十元；四、旬刊者，二百元；五、月刊者，一百五十元；六、年刊者，一百元。在京师及其他都会商埠地方发行者，加倍缴纳保押费。专载学术、艺事、统计、官文书、物价、报告之报纸，得免缴保押费。保押费于禁止发行或自行停版后还付之。”对当时大多数报馆来说，上述保押费的数额是一笔沉重的经济负担，无力缴纳这笔保押费的报社也为数不少。尽管如此，有些地方当局甚至还擅自增加数额，如福州增加至 700 元，无力交纳者被勒令停刊。《报纸条例》还规定了如下 8 条禁载事项：“一、淆乱政体者；二、妨害治安者；三、败坏风俗者；四、外交、军事之秘密及其他政务，经该管官署禁止登载者；五、预审未经公判之案件及诉讼之禁止旁听者；六、国会即其他官署会议，按照法令禁止旁听者；七、煽动、曲庇、赞赏、救护犯罪人、刑事被告人，或陷害刑事被告人者；八、攻讦个人阴私损害其名誉者。”据此，几乎所有的政务活动均被划入禁区之内。而且，“淆乱政体”、“妨害治安”等罪名又无明确的含义，可由执法者任意解释，从而使报刊活动处于动辄得咎的境地。实行这一批准兼保证金的制度，不准容易接受新事物的学校学生担任报纸的发行人，禁止报道绝大部分政务活动，使当时的新闻界大为震惊并进行了英勇的抗争，但结果只是袁世凯政府答应各报可暂缓交纳保证金而已。

12 月 5 日，袁世凯政府又颁布了法律第 18 号《出版法》共 23 条，不仅把《报纸条例》中的限禁规定推而广之到所有的文字、图画印刷品，即所有的出版物，而且更为苛刻。在报刊的创办及其条件方面，《出版法》对何为著作人、发行人、印刷人作了明确界定：“著作人以著作者及有著作权者为限”；“发行人以贩卖文书图画为营业者为限，但著作人及著作权承继人得兼充之”；“印刷人以代表印刷所者为限”。在报刊的管理方面，《出版法》对报纸的禁载事项的规定与《报纸条例》基本相同，也同样是 8 款，只是对第 4 至第 8 款作了一些枝节性的修改：“四、煽动曲庇犯罪人、刑事被告人或陷害刑事被告人者；五、轻罪、重罪之预审案件未经公判者；六、诉讼或会议事件之禁止旁听者；七、揭载军事、外交及其他官署机密之文书图画者。但得该官署许可时，不在此限。八、攻讦他人阴私，损害其名誉者。”至于报刊的检查问题，《报纸条例》的规定是“应于发行日递送该管警察署存查”，在表面上较《大清报律》稍为宽松，但“存查”一词语义含糊，实为执法者留下回旋余地。《出版法》则明确规定，所有出版物

“应于发行或散布前，禀报该管警察官署”。由于“禀报”一词语义含糊，因而许多地方在执行过程中对“禀报”一词的含义擅自增益，逐渐演变为出版前的预检制度。例如，杭州警察厅规定，各报每晚9时前须将次日报纸大样送审，由警厅检查员在每条新闻上逐一验迄盖章。如有检扣，还须立即补稿送检。该法还给予警察部门认为必要时没收出版物的权力、禁止违犯《出版法》的境外出版物入境出售或散布。

1915年7月10日，袁世凯政府以大总统的名义公布了《修正报纸条例》。《修正报纸条例》系根据《报纸条例》的执行情况以及后于《报纸条例》颁发的《出版法》等有关法律的规定，作了一些修改，其中大部分为文字性的或枝节性的修改。例如，将“呈请”修正为“禀请”、“原呈”修正为“原禀”、“呈报”修正为“禀报”。又如，将第10条的“四、外交、军事之秘密及其他政务，经该管官署禁止登载者”一款改为“四、外交、军事之秘密”、“五、各项政务经该管官署禁止登载者”两款。

在1915年，袁世凯政府还颁布了《新闻电报章程》、《电信条例》、《著作权法》等法律。《新闻电报章程》虽然规定“电报局由电线传递刊登报纸之新闻消息，准作为新闻电报，减价纳费”，但是又规定了享有这一优惠权的前提条件：一是须先经交通部审核批准并领取执照，二是新闻电报只准用华文、英文及其他准用之文字的明语发报。《电信条例》于4月颁布，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涉及无线电事业的法律。自从清朝末年无线电传入中国后，清政府对待无线电的政策原则是：未经中国政府批准，任何外国人不得在中国设立无线电台，不得私自收发无线电报。中华民国成立后，历届政府仍沿用上述原则。这一《电信条例》继续秉承了上述精神，明确规定，无线电器材属军用品，非经陆军部特别许可不得自由输入中国。同时，未经中国政府有关当局批准，不允许外国在中国境内私自设立无线电台，擅自收发无线电报。但是，无视中国主权的帝国主义列强根本不把这一法令放在眼里，私自输入无线电器材和私建无线电台之事不胜枚举。《著作权法》于11月7日作为法律第8号颁布，翌年2月1日又据此颁布教令第7号《著作权法注册程序及规费施行细则》。

袁世凯政府还在1914年3、4月间制定公布了新的宪法性文件《中华民国约法》，以取代孙中山任临时大总统时期颁行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3月18日，根据袁世凯制定《中华民国约法》的旨意而匆匆组织起来的“约法会议”在北京召开；5月1日，《中华民国约法》公布施行，同时宣告废止《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根据《中华民国约法》第2章第5条第4款的规定，“人民于法律范围内，有言论、著作、刊行，及集会、结社之自由”。这一新规定，改变了《临时约法》

规定的只有在增进公益、维持治安或非常紧急必要等特殊情况下方可对言论出版自由权利予以法律限制的基本精神，使人民的言论出版自由权利在任何情况下均可予以法律限制。

在制定新闻法的同时，袁世凯还继续使用在其统治地位巩固之前一些惯用的法律手段，即在制定他种法律时加入一些钳制新闻事业的规定、发布总统命令以处理一些临时性或局部性的问题等等。含有钳制新闻事业条款的法律主要有《治安警察条例》、《陆军刑事条例》等。《治安警察条例》于1914年3月2日颁行，规定：“行政官署，因维持公共之安宁秩序及保障人民之自由幸福”，有权对“通衢大道及其他公众聚集往来场所粘贴文书、图画、或散布、朗读，又或其他言语形容并一切作为者”，“行使治安警察权”。“警察官吏对于通衢大道及其他公众聚集往来场所，粘贴文书图画，或散布朗读，又或其他言语形容并一切作为，认为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禁止并扣留其印写物品：一、有扰乱安宁秩序之虞者；二、有妨害善良风俗之虞者”。

三、北洋军阀对新闻事业的扭曲与迫害

1916年6月6日袁世凯死后，中国进入了政局多变的北洋军阀统治时期。这一时期的新闻事业，也与政局一样，呈现出变幻、复杂的景象。

1916年6月7日，副总统黎元洪宣布就任大总统职位。黎元洪在上台之初，鉴于反袁护国运动的胜利和拥护共和民主的政治声威，立刻宣布恢复《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恢复国会，被袁世凯破坏的共和制度和政党政治表面上又得以复生。与此同时，黎元洪为首的中央政府还下令废止袁世凯统治时期钳制言论出版自由的一切禁令，使新闻事业一度出现了复苏的局面。6月17日，中央政府令各省取消报纸保证金。6月21日，中央政府通飭停止函件检查。7月，内务部通告取消对《民国》杂志、《爱国报》等21家报刊的禁令。6日和8日，内务部先后两次通咨各省区：“现在时局正宜宣达民意，提携舆论”，对于被袁世凯政府查禁的报刊，“应即准予解禁”，“一律自可行销”。根据这一法令，仅上海一地，就有《时事新报》、《民国日报》、《中华新报》、《民信日报》、《共和日报》、《民意报》等20多种曾被禁邮或查封的报刊恢复出版和邮发。在北京等地，被停报刊纷纷复刊，被捕报人大批获释。7月16日，黎元洪发布大总统申令：“报纸条例应即废止。此令。”7月18日，上海《申报》刊载北京电：“国院拟设新闻记者招待处，凡中外文电有关国计者许录登。”这些法律措施的实施，对新闻事业的发展起了推进的作用。各派政治力量以及其他职业报人，不仅恢复出版被袁世凯停办的报刊，还同时创办起了一批新的报刊，如国民党系统的《甲寅日刊》、《中华新

报》、《东大陆民报》和进步党系统的《晨钟报》等。至1916年底，全国报纸数增至289种，比1915年增加了85%，政党报刊也一度复生。

但是，好景不长，新闻事业的复苏局面，仅仅是昙花一现而已，这些袁世凯的继任者，在本质上同袁世凯一样，他们不可能恢复孙中山领导的南京临时政府时期确立的自由新闻体制，给予新闻界以言论出版的自由权利，而是效法袁世凯的故伎，通过法律手段扭曲自由新闻体制，钳制和迫害新闻事业。据统计，自1916年至1919年五四运动前的四年中，全国至少有29家报纸被封，17名记者遭到枪杀或判刑。至1918年底，全国报刊总数由289种下降到221种。

这一时期，袁世凯统治时期颁行的有关新闻事业的法律、法令仍被大量袭用。袁世凯统治时期的《出版法》仍被继续沿用，并成为北洋军阀政府钳制与迫害进步报刊与报人的主要法律依据，甚至还被帝国主义租界当局用作镇压租界内中国人民反帝宣传活动的工具。^①袁世凯统治时期颁行的其他与新闻事业有关的法律、法令，如《戒严法》、《治安警察条例》、《陆军刑事条例》等，也一体沿用。《戒严法》为各地执政军人所滥加援引，遭其蹂躏的报刊与报人不知凡几。1919年5月，众议员王文璞曾就执政军人滥用《戒严法》问题提出质问：“日来报载北京《益世报》、《五七杂志》、《救国周刊》均被封禁。并阅警厅布告，准京畿警备司令部函，以《益世报》登载鲁军人通电一则，认为妨害时机，依律应行封禁。谨按《临时约法》，大总统得依法律宣告戒严。现在大总统并无宣告戒严明令，何以施行戒严法？又立宪国通例，即已宣告戒严，若国会认为无戒严之必要，必须为解严之宣告。是其慎重宣告戒严，即所以慎重人们之自由也。今该司令竟于未曾宣告戒严之时，而滥用戒严法，谓非破坏约法侵害人民自由，谁其信之！”^②

为了有效控制新闻事业，历届北洋军阀政府还炮制出不少新的钳制性法规。1916年9月，内务部警政司制定《检阅报纸现行办法》10条，规定政府有关部门须每天购买各种报纸检阅，如发现有不实之处则函令该报更正。这一办法，虽较以前的检查办法宽松，但本质上是对新闻事业的钳制与迫害。1917年后，北洋军阀政府的反动本质日益显露，为加强对异己报刊的限制，对新闻出版活动的

^① 1925年“五卅运动”期间，上海《东方杂志》于7月出版《五卅临时增刊》，上海公共租界警务处以文字及图画违反《出版法》、有碍租界治安为由，拘捕了商务印书馆负责人王云五、郭梅生，会审公廨又依据《出版法》第3条、第11条的规定，做出了罚款100元、再交保500元、以后不得再刊登此类文字的判决。这一事件发生后，上海日报公会等新闻出版团体上书北京政府，要求立即废止《出版法》等钳制新闻事业的法律，北京以及全国各地的新闻出版界也群起呼应，将废止《出版法》、争取新闻出版自由的斗争推向高潮。在强大的社会舆论压力下，当时处于倾向进步的冯玉祥统率的国民军控制下的北京政府于1926年1月27日召开国务会议，通过了废止《出版法》的决定。

^② 戈公振：《中国报学史》，256页。

法律钳制也日见增多，且由松转紧。5月26日，北洋军阀政府宣布自即日起恢复邮电检查。张勋复辟失败后，段祺瑞重新上台，专横跋扈，蔑视约法和国会，对言论出版自由的限禁日趋加紧，较袁世凯有过之而无不及。1918年8月，北洋军阀政府设立“新闻检查局”。10月，北洋政府法制局起草的《报纸法案》咨送国会取决。这一《法案》共33条，内容十分苛细，在钳制舆论方面与清末的《大清报律》、袁世凯时期的《报纸条例》如出一辙。特别是《报纸法案》第27条“警察官署认为有重大之危害时得以警察厅令停止其发行”^①的规定，较《大清报律》、《报纸条例》更为严酷。因此，《报纸法案》在交国会众议院议决后，首都新闻界立即集会讨论，并向众议院递交请愿书，“希即将此案咨回政府，不予通过”^②。由于新闻界内外的一致反对，最后众议院议决将《报纸法案》交法制股审查了事，挫败了北洋政府制定报纸法律钳制新闻自由的阴谋。1919年五四运动后，北洋军阀政府发布《查禁俄过激派印刷物函》，以防范共产主义在中国的传播。1919年10月25日，内务部颁布《管理印刷营业规则》，实行印刷业许可证制度，并规定印刷业“承受委托印刷物时，应随时开具印刷物目录，呈送该管警官厅”。《管理印刷营业规则》的颁行，使报刊的创办被纳入许可制的桎梏之中，一切不利于北洋军阀统治的新闻出版物将被扼杀于“产房”之内。1921年4月23日北洋军阀政府悬赏缉拿散发印刷物件的过激党人。1925年4月1日，京师警察厅颁布《管理新闻营业条例》，又推出了取保制度，规定在首都地区“发行报纸、杂志或办理通信社者，均须于呈报时，取具五等捐以上铺保两家，以资负责”；“报纸、杂志之发行所，通信社之社址房屋，均须商得房主允可，出具同意切结，存厅备案”。

由于历届北洋军阀政府实行的都是严厉的新闻统制与言论禁锢政策，加之各派军阀轮番执政，各种政治势力明争暗斗，因而民国初年的新闻界翻云覆雨、光怪陆离。报人与报刊，或从属于某一政治势力，或屈从于统治集团，出现了形形色色的怪现象。报人与报刊的品性日趋堕落。由于当时从中央到地方的大大小小军阀、官僚和政客，以出钱办报和给报刊津贴等方式，贿赂报人、报刊为自己作宣传鼓吹，因而出现了大批报丐，把办报作为自己卖身投靠、政治投机和捞取政治资本以跻身政界的终南捷径，攀龙附凤，以图混得一官半职。许多报纸沦为军阀、官僚和政客的附庸。还有一批报丐则把办报作为其获取经济利益的敲门砖。为当时舆论界所不齿的北京报人朱淇，利用其主办的《北京日报》，先后向北洋

① 《新国会中之报纸法》，载《申报》，1918-10-28。

② 《京报界请否决报纸法》，载《申报》，1918-11-15。

政府的外交部、交通部和安福系政客索取津贴，谁给钱就替谁帮腔。甚至有的报馆为了牟取暴利，竟然为吸毒作掩护，把报馆的部分房屋腾出来开鸦片烟馆，毒害人民。据统计，当时广州的36家报馆中，就有20多家干这种不法勾当。大多数报刊屈服于封建军阀的淫威，言论日益退化。自从“癸丑报灾”以后，报纸、报人生怕因言论贾祸，除了少数报刊偶尔发表一些不痛不痒无关大局的短评外，大多数报刊取消了社论和论说栏目。

值得注意的是“鸳鸯蝴蝶派”文艺副刊的风行和黄色小报泛滥成灾。民国成立以后，不少报纸都设置了文艺副刊，像《申报》的《自由谈》，《新闻报》的《快活林》，《时报》的《余兴》，《北京日报》的《消闲录》，《国风日报》的《四面八方》等。副刊的编辑和撰稿人大多是南社的社员。这个辛亥革命时期曾经为革命作鼓吹的文学团体，民国成立以后组织扩大了，不免鱼龙混杂。在革命成果被篡夺、革命理想逐渐破灭的刺激下，南社的一部分人渐入颓唐，有的成为鸳鸯蝴蝶派文学的作者，有的创办黄色小报赚钱糊口。最先刊登鸳鸯蝴蝶派言情小说的是上海的《民权报》副刊，随后《自由谈》、《快活林》、《余兴》等著名的报纸副刊则成了鸳鸯蝴蝶派作品的大本营。至于黄色小报，各地都有，而以上海最多，有十几家。这类小报专门刊登娼妓、武侠、神怪、公案、黑幕、滑稽等为内容的作品，去迎合读者的低级趣味。其中因此而小有名气的是《晶报》，由袁世凯次子袁克文任主编，曾因刊登极为猥亵的文字而被租界当局多次警告与罚款。

此外，各地还出现了一批稀奇古怪的报刊，如在北京、上海、广州等地出版的一批“有报无馆”的“马路小报”。这些“马路小报”，连“斗室一间”也没有，靠的是剪刀加糨糊，往往在出版之前夕，在旅馆开一房间，作为临时主笔房，发行所则在四马路拐角的报贩摊上。当时，许多报纸的发行量只有几百份或一两千份，最少的只印两三份：一份呈警察局备案，一份在自己的家门口张贴，还有一份送给老板交差。有的报纸是用套版的方法印刷的，即利用另一家报纸的现成版面，仅换一个报头重印几份而已，被人们称为“鬼报”。在广州，这类“鬼报”有好几家。如《南方报》用《民权报》的版面套印，《商权报》用《总商会新报》的版面套印。

四、民国初年新闻法律制度的特点及其反动本质

民国初年新闻法律制度，经袁世凯及其继任者的百般扭曲，形成了以下三个十分显明的特点：

一是在形式上采用自由新闻体制。中华民国成立后，在形式上采用资产阶级民主共和政体，原则承认“主权在民”。中华民国成立后的新闻法律制度也以言

论出版自由为本，在形式上采取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相同的自由新闻体制。袁世凯上台后，由于其统治地位极为虚弱，自己又无政治理念，因而不可能公然抛弃自由新闻体制及其理论依据“主权在民”的原则，而只是对这一体制及其理论依据进行扭曲与破坏，以适用于其反动统治的需要。

二是带有浓重的半封建半殖民地色彩。在立法上，辛亥革命胜利后，由于中华民国的法律一时难以出台，因而只能暂时沿用前清的法律中与民国国体无抵触的内容，使新法制仍带有旧时代的痕迹。至于司法机构，虽然原则上仿效资产阶级国家的形式，但并未真正做到，地方审判厅大多未建立，实际上仍由地方行政机关兼理司法，如初级和地方管辖的案件由县知事兼理。在诉讼过程中，刑讯、体罚手段仍被袭用。因此，触犯北洋军阀的报人，一旦涉讼还有可能肉体上也倍遭摧残。至于半殖民地的色彩，则集中表现在帝国主义在中国建立的租界制度未被废止，“治外法权”原则未被废止，帝国主义列强强加给中国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未被废止。因此，中国人民的反帝爱国宣传报道活动，往往会被扣上“妨害邦交”的罪名，受到北洋军阀政府的法律制裁。在租界地区，这类宣传报道活动，还将受到帝国主义租界当局的直接干预与迫害。

三是滥用军法，惟军阀意志是从。辛亥革命后，地方政权大都为旧封建军阀所窃据。这些旧军人毫无民主观念，横行霸道，鱼肉百姓。袁世凯又颁布了《戒严法》，为北洋军阀政府滥用军法开了方便之门。而且，由于北洋政府统治时期各派军阀混战不休，几乎常年处于战争或戒严时期，因而军事审判在实际上已取代了普通的司法审判。凡反对军阀统治的，将被交付军事法庭审判，依据军法治罪。所谓的普通法院，只不过是军事审判的一种补充手段。

第三节 新闻事业在逆境中的发展

一、新闻报道工作的加强与新闻通讯事业的发展

由于袁世凯和北洋军阀政府实行言论禁锢政策，因而各报都把主要精力集中在搞好新闻报道上，从而使新闻报道工作较前有了很大的进步，促进了新闻业务的发展。

报纸上消息的比重加大，电讯增多，一些重要的电讯还用大号字排出，并在字旁加圈加点以引起读者的注意。夹叙夹议的新闻通讯这种新的报道体裁开始走向成熟，深受读者欢迎。各大报不惜重金聘请有才干、有经验的记者常驻北京，以专电的形式独家报道中央的政治新闻。个别大报还派出了驻国外的记者，加强了国际新闻的报道。此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我国的工商业有了较大发

展，因而有的报纸，特别是商业报纸，还加强了经济新闻的报道。新闻摄影照片在报纸上也得到越来越多的运用，一些报纸还刊出时事性插画或定期出版图画附张。

在上海，《申报》实行不偏不倚、轻言论重新闻的编辑方针。对于重要政治问题，一般只报道、少评论或不评论，用大量北京专电等政治新闻补充言论的不足。还增设《星期增刊》、《常识》等多种专刊、专栏，加重报纸的知识性、趣味性内容。在欧美各国的首都，该报都聘有特约通讯员，以增加报纸的国际新闻报道。《新闻报》以工商界和普通市民为主要发行对象，着重开拓经济新闻，1922年将经济新闻栏扩为专版，重金聘请经济专家主持，报道金融、股票、粮食、花纱布等方面的市场消息，兼及国际经济动态，深受工商界人士欢迎。该报还注意适应市民兴趣，扩大社会新闻报道，设有《快活林》等知识性趣味性副刊、专栏多种。1921年元旦创刊的《商报》，也以经济新闻报道与评论为长，对国内外金融行情详加介绍。同年，《时报》易主，仿效美国大众化报纸，以突出社会新闻、体育新闻和图片新闻取胜。

新闻通讯事业的发展，是民国初年中国新闻事业发展的另一个重要现象。中国的新闻通讯事业，首先是由外国人在中国创办通讯社开始的。民国成立以后，新闻通讯社真正发展起来。1911年，杨实公在广州创办展民通讯社。1912年，李景侨、王道南等人在长沙分别创办湖南通讯社和湖南新闻社，杨公民在广州创办了公民通讯社。从此，中国新闻事业增添了一种新的媒介，改变了报业一统天下的局面。1913年至1918年的五六年内，新创办的通讯社不下20家，计有：北京的民生通讯社、华英亚细亚通讯社、新闻交通通讯社、北京通讯社和新闻编译社，上海的国民第一通讯社，武汉的湖北通讯社和武汉通讯社，长沙的湖南通讯社、大中通讯社和中华通讯社，广州的岭南通讯社，以及日本的东京通讯社等。这些通讯社的规模一般都不大，有的只有一两个访员，用复写或油印方式向有限的几家报刊发稿。在经济上，大多靠官僚政客和资本家的津贴来维持，也有个别是自由撰稿人独力办的。

在这些通讯社中，邵飘萍主办的东京通讯社、新闻编译社办得最为成功。东京通讯社是邵飘萍于1915年7月在日本留学期间创建的，专门为京、沪报纸提供东京通讯。它曾首先向国内读者报道了袁世凯政府和日本政府秘密商议中的“二十一条密约”的详细内容，对国内的反袁斗争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新闻编译社是邵飘萍于1916年8月在北京创办的，以消息迅捷闻名，每天晚上发稿一次，内容有本社采写的消息和翻译的外电两部分，“每日总有一二特殊稿件，颇得各报好评”。

二、黄远生等名记者的出现

由于各报加强新闻报道，记者以获得独家新闻为能，报纸以发表精彩的通讯报道取胜，新闻竞争日益加剧。因此，各大报不惜重金聘请有才干、有经验的记者常驻北京，以专电的形式独家报道中央的政治新闻。个别大报还派出了驻国外的记者，加强了国际新闻的报道。中国新闻事业史上第一批以采写新闻出名的新闻记者在新新闻竞争中应运而生。这些名记者，大都受过良好的教育，有一定的新闻学修养和办报经验，又有较好的中西学问基础和驾驭文字的能力。

黄远生是民国初年出现的名记者中最杰出的代表，戈公振先生在《中国报业史》一书中称之为“报界之奇才”。黄远生（1885—1915），原名基，字远庸，远生是他的笔名，江西九江人。少年勤奋好学，曾在两年内连中秀才、举人、进士三榜而文名大噪。1904年中进士后，获得“知县即用”资格，但他不愿做官，却东渡日本官费留学，专攻法律。1909年回国后，黄远生被清政府任命为邮传部员外郎兼参议院行走、编译局纂修官。但是，他不甘心“以极可爱之青年之光阴，而潦倒于京曹”，便经常为京、沪报刊撰写国际时事评述。辛亥革命后，黄远生全身心地从事新闻工作，先是创办和主编《少年中国》周刊，后又编辑过梁启超主办的《庸言》杂志，并担任上海《时报》、《申报》、《东方日报》驻北京的特约记者和北京《亚细亚日报》的撰述，还经常为《国民公报》、《论衡》和《东方杂志》撰稿。

在新闻业务上，黄远生以擅长写新闻通讯而著称于世，被誉为中国新闻通讯的奠基人。黄远生的新闻通讯，一是题材重大，记载翔实。由于他中过进士，留过学，又在前清做过官，得以周旋于民国总统、内阁总理、各部总长和各政党要人之间，对民初政坛十分熟悉，因而他能采访到许多别人采访不到的重大新闻和内幕新闻。他在《政界内形记》、《最近之秘密政闻》、《借款里面之秘密》等通讯中，披露了袁世凯、唐绍仪、梁士诒、熊希龄等人之间的复杂关系，各政党之间争权夺利的斗争，以及袁政府不惜以领土主权为抵押向六国银行团借款的内幕，对当时的政坛风云作了真实而详尽的记录，既是新闻，又是信史。二是针砭时弊，忧国忧民。作为一个正直的新闻记者，黄远生用他那如椽之笔，对袁世凯的黑暗统治和官僚政客痛加针砭。他大胆抨击袁世凯：“故政局之日趋于险恶者，非他人为之，乃袁总统自为之也。”“袁总统者，在世界历史上虽不失为中国怪杰之资格，而在吾民国史上终将为亡国之罪魁。”对那些“如盗、如丐、如流氓”的官僚，黄远生斥之为“百鬼昼行，万恶皆聚，如囊闾塞，危亡而前而不为动”的行尸走肉。对那些“置多数人民利益于不顾”只热心于党争的政客，他告诫说：“革命派与官僚派所演之剧，诚与土耳其近事无黍禾分秒之不同。吾辈所愿

剖腹泣血，欲为国人告哀者也。”愤世嫉俗、忧国忧民之情溢于言表。三是细致详尽，幽隐毕达。黄远生的通讯善于捕捉各种细节，绘声绘形，嬉笑怒骂，涉笔成趣，鞭辟入里，如《外交部之厨子》一文，通过厨子的形象，写出官场的腐朽，生动具体，入木三分。四是通俗自然，不拘一格。黄远生提倡“以浅近文艺普通四周”，因而他的通讯和文章虽然用半文半白的文体写成，却十分浅近，且不拘一格，有的将背景材料置于篇首而娓娓道来，有的先交待结果后逐渐展开，有的则纵横交错、波澜起伏。因此，邹韬奋曾用“流利、畅达、爽快、诚恳、幽默”^①来评论他的文风。黄远生还发明了“新闻日记”这种体裁，用日记形式报道或评论当日新闻。

黄远生在新闻思想方面也有不少独到的见解。其中最著名的是“四能”说，即“脑筋能想，腿脚能奔走，耳能听，手能写”。他说：“调查研究，有种种素养，是谓能想；交游肆应，能深知各方面势力之所存，以时访接，是谓能奔走；闻一知十，闻此知彼，由显达隐，由旁得通，是谓能听；刻画叙述，不溢不漏，尊重彼此之人格，力守绅士之态度，是谓能写。”^②黄远生本人正是实践这“四能”的模范，所以他虽然从事新闻工作的时间很短，却能成为名记者。

在政治上，黄远生的基本态度是拥袁反孙的，尽管他曾宣布脱离一切政党而独立，也曾对袁世凯的黑暗统治进行过无情的揭露和批评，但始终得不到国民党人的谅解。袁世凯准备复辟帝制的时候，曾对他进行多方拉拢。他为了摆脱袁的纠缠，于1915年9月离京逃至上海，在报纸上刊登启事表明反对帝制的立场，后又流亡美国。然而，“袁氏必欲用之，而仇袁者必欲杀之”。黄远生到达旧金山后不久，即被中华革命党美洲支部派刺客暗杀，年仅31岁。他死后，其友人将他发表过的文章编为《远生遗著》行世。

此外，这一时期负有盛名的新闻记者还有邵飘萍、刘少少，徐彬彬、林白水、胡政之、张季鸾等人。

邵飘萍（1886—1926），原名振青，浙江金华人，13岁就中了秀才。1906年赴杭州，考入浙江高等学堂师范科。当时，改良派和革命派报刊的大辩论引起了他的极大兴趣，读了梁启超在《新民丛报》上的文章，使他萌发出“要做一个新闻记者的动机”和“新闻救国”的思想。于是，他便利用课余时间给上海《申报》投稿，被《申报》聘为通讯员，并参加了南社。1911年浙江宣布独立后，他怀着为民主共和而战的激情奔赴杭州，协助杭辛斋创办《汉民日报》，任主笔，

① 邹韬奋：《经历》，9页，北京，三联书店，1958。

② 黄远生：《忏悔录》，《远生遗著》卷一，上海，商务印书馆，1920。

并兼任《浙江军政府公报》编辑，从此开始了他的职业报人的生涯。1913年初，杭辛斋当选为国会议员赴京上任，《汉民日报》交由他主持。他不畏权势，不受利诱，撰写了大量论说、时评和随笔，抨击袁世凯及军阀的专横跋扈，揭露贪官污吏的罪行。“二次革命”失败后，邵飘萍被反动当局构陷入狱，《汉民日报》也同时被封。1914年出狱后，他东渡日本留学，就读于东京政法学校。在此期间，他与同学潘公弼等创办了东京通讯社。1916年春，邵飘萍回国，受聘于上海《申报》、《时报》和《时事新报》，主要撰写时评。袁世凯死后，《申报》聘他为驻京特派记者，从此北京就成为他进行新闻活动的舞台。为了改变外国通讯社“任意左右我国之政闻”的状况，他于1916年8月在北京创办新闻编译社，并以此为依托开展了有声有色的新闻采访报道活动。他每天都向《申报》发去新闻专电和内容较为详细的《北京特别通信》，对北洋政府的内政、外交及国会的动态做出翔实可靠的报道，成为有口皆碑的著名记者。1918年10月，他又在北京独力创办大型日报《京报》，自任社长，并兼任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讲师。1919年8月《京报》因揭露段祺瑞政府的卖国政策被封，邵飘萍再次流亡日本，出任大阪《朝日新闻》特约记者。1920年回国后恢复《京报》，锐意改革，使该报成为北方很有影响的大报。

邵飘萍自称：“余百无一嗜，惟对新闻事业乃有非常兴趣，愿终身以之。”正是这种对新闻事业的执著追求和献身精神，使他在政治上紧随时代步伐，在业务上精益求精。他最擅长的是新闻采访，常常能够采访到别人所不能的新闻。张季鸾曾称赞他说：“每遇内政外交之大事，感觉最早，而采访必工。北京大官本恶见新闻记者，飘萍独能使之不得不见，见且不得不谈，旁敲侧击，数语已得要领。”^①然而，邵飘萍的才华绝不仅如此而已。他是我国新闻界不可多得的全才。他既办通讯社又办报纸，既精通采写业务又善于经营管理，既从事新闻实践又从事新闻教育，并在这些方面都取得了卓越成就。根据他在北京大学、平民大学、民国大学、法政大学讲授新闻学课程的讲义整理出版的《实际应用新闻学》一书，是我国最早的新闻采访学专著之一。1926年，邵飘萍在北京被反动军阀杀害。

刘少少（1870—1929），原名薰和，字少珊，湖南善化人。青年时代就学于岳麓书院，1905年留学日本，曾协助杨度创办《中国新报》。1909年回国任北京《帝国日报》编辑，开始用“少少”笔名，取“少年中国之少年”之意，撰写政论鼓吹立宪，在新闻界崭露头角，“京国咸知刘少少其人”。武昌起义后，刘少少

^① 《京报特刊》，1929-04-24。

一度回湖南，任《湖南新报》和《公言》杂志编辑，北京《亚细亚日报》初创时，他一度应聘为主笔，但1915年上海《亚细亚日报》聘他为主笔则被他拒绝，因而遭通缉。1918年后，刘少少受聘为北京大学讲师，研究老庄哲学。刘少少一生在政治上趋于保守，无大作为，然其为文独辟蹊径，庄谐杂出，时有新意，为一部分旧知识分子所欣赏，有报界“怪杰”之称。

徐彬彬（1888—1961），名凌霄，笔名彬彬、凌霄汉阁主，江苏宜兴人。他与黄远生、刘少少一起，被誉为“民初三大名记者”。由于徐彬彬的伯父徐致靖、堂兄徐仁铸都是戊戌时期著名的维新派官员，因而他在政治上认同改良，与立宪派、共和党关系密切。1916年起，徐彬彬继黄远生之后任上海《时报》和《申报》驻北京特派记者，长期为两报撰写北京通讯。徐彬彬长于文学，娴于经史，熟悉历史掌故，因而他撰写的通讯文笔优美而又富于情趣，深受读者欢迎。另外，他对京剧颇有研究，所撰剧评多有创见。30年代起，徐彬彬长期担任天津《大公报》副刊主编，在《凌霄随笔》、《凌霄汉阁笔记》等栏目连载文史短文，介绍我国文物、典章制度和历史掌故，如数家珍。

林白水（1876—1926），名瀚，字少泉，笔名白水、白话道人等，福州人。他少有文名，曾中举，1901年任《杭州白话报》主笔，1902年赴上海，加入中国教育会，参与创办《童子世界》，并为《苏报》撰稿。“苏报案”后，林白水避往日本，旋回沪创办《中国白话报》。1906年，他再度赴日留学，专攻法律和新闻，是我国最早学新闻的留学生之一。辛亥革命后，林白水任福建法制局长，投身共和党，被选为国会议员，入京后又受聘为袁世凯总统府秘书。1915年，他参与筹安会活动，并发表过鼓吹帝制的文章，袁垮台后于1916年9月创办《公言报》，充当安福系的喉舌。1921年《公言报》被直系军阀捣毁后，他又在北京创办《新社会报》（不久改名为《社会日报》），面向市民群众，注重社会新闻，反映民众疾苦，颇受欢迎。1926年，林白水因其主办的《社会日报》刊发时评激怒军阀张宗昌的心腹政客，被张宗昌枪杀于北京。林白水撰写的新闻和评论，挥洒自如，辛辣尖刻，“好议个人长短，或揭人隐事”，故积怨于军阀。他的文章通俗浅显，常能“发端于苍蝇臭虫之微，而归结于政局”，颇能吸引读者。

胡政之（1889—1949），名霖，四川成都人。1907年，他自费留学日本，回国后应聘任上海《大共和报》翻译、编辑、主笔，1915年任该报驻京特派记者，以消息快捷受到报界关注。1916年，安福系财阀王郅隆接办天津《大公报》，胡政之受聘为该报经理兼总编辑，曾亲自采访段祺瑞“马厂誓师”等重大新闻，蜚声于时。1918年欧战结束后，以《大公报》记者身份采访巴黎和会，是采访该会的惟一中国记者。后在上海组织国闻通讯社，在天津任新记公司《大公报》经

理兼副总编辑，成为报界名人。

张季鸾（1888—1941），名炽章，笔名一苇、榆民等，陕西榆林人。1905年，他官费留学日本，任《夏声》杂志编辑，开始走上“言论救国”的道路，1910年任上海《民立报》记者。1913年，张季鸾受命北上创办北京《民立报》，最先在报纸上披露袁世凯政府与五国银行团签订的“善后大借款”合同全文，引起轩然大波，并因此而被捕，系狱3月。出狱后，他回上海《大共和日报》主持国际版，后又任《民信日报》总编辑，积极进行反袁宣传。袁死后，张季鸾任上海《新闻报》驻京特派记者和政学系机关报《中华新报》总编辑，1918年因揭露段祺瑞政府卖国借款的消息再次入狱。张季鸾在新闻界享有盛名是在他担任了新记《大公报》总编辑兼副总经理之后，但在辛亥革命前夕和民国初期已崭露头角，有一定影响。

三、报纸的企业化与商业性大报地位的上升

报纸的企业化是民国初年中国新闻事业职业化的一个重要现象。

实行报纸企业化方针的报刊，大多是资产阶级商业性报纸。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西方帝国主义列强一时无暇顾及对中国的侵略，使中国资本主义经济有了发展空间，给中国商业性报纸实行企业化方针提供了有利条件。由于上海是全国金融的中心，再加上租界的特殊环境，因而我国历史悠久的《申报》、《新闻报》等资产阶级商业性大报，率先向现代企业化报业方向迈步。

《申报》在1912年史量才接办初期，销量只有7 000多份，到1922年创刊50周年时，已发展成为平均日销5万份的大报。《申报》在事业上的发展，就是其加强经营管理、推行企业化方针的结果。《申报》在企业化方面，主要采取了以下措施：一是大力开展广告业务。该报聘请张竹平任经理，设广告推广科，派出外勤四处招揽广告，改进广告设计，代客户绘制广告图样，撰写文字说明，直至客户满意，这些服务深受工商界的欢迎。因此，《申报》的广告日增，成为该报赢利的首要来源。广告占报纸版面的面积逐渐由十分之五六增为十分之六七，超过了新闻报道的版面，报纸也由日出对开3大张半扩大为4大张半乃至5大张。二是加强报纸发行。该报抓紧报纸发行这一环节，设立报纸推广科，除大力在本市推广外，并向外埠发展，派人到全国各地征求机关、团体和个人订户。外埠长期订户最多时达1万户。报纸销数由1917年的2万份增加到1920年的3万份，1922年接近5万份。三是加强基础建设，不断更新技术设备。上海《申报》还用70万两白银于1918年建起高五层、拥有百余间房间的报馆大楼，又从美国购进两部最新式的印报机，两小时可印完十多万份报纸，添置配套的制铜版机、铸

字机、压纸版机、浇铅版机、铜字铜模等机器，还自备汽车，加快送报速度。这一切，使《申报》成为当时全国设备最新、最完备的报纸，并为以后进一步企业化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做了充分的准备。

《新闻报》与《申报》并驾齐驱，也向着企业化经营的方向努力发展。汪汉溪任总经理后，精于经营管理，使报纸销量由1914年的2万份增加到1921年的5万份。开始时，资金短缺，汪汉溪借款购进大量纸张，伺机出售，从中发了一笔大财，并由此摸索出一条加快资金周转的生财之道，即“借款—还债—再借再还”。1922年，汪汉溪在国内报界率先在报馆内设置无线电收报台，直接抄收外国通讯社电讯，及时译出，用“本报国外专电”电头，抢先刊发，增强竞争能力。在开拓广告、加强发行和更新技术设备方面，《新闻报》的办法与《申报》相同，但其广告发展速度和篇幅略高于《申报》。为了牟利，广告时时挤占新闻版面，一些低级趣味、黄色下流的广告也不时充斥版面。在言论方面，《新闻报》同样标榜“无党无偏”，设有《新评一》《新评二》《新评三》等小言论栏，用短评代社论。

《申报》、《新闻报》等商业性报纸实行企业化经营方针，突出赢利目的，报纸的编辑方针、新闻业务、经营管理等一切均以是否赢利为转移，虽然如戈公振所指出的那样“商业色彩渐浓，日渐失去舆论指导精神”，但是，它们在经营管理和新闻业务改革方面的经验，却为中国新闻事业的发展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学习思考题】

1. 民国初年报业出现短暂繁荣的表现和原因是什么？
2. 袁世凯及北洋军阀是如何扭曲自由新闻体制的？
3. 简述“癸丑报灾”的前因后果。
4. 民国初年的新闻业务有何变化？出现了哪些知名记者？
5. 黄远生对我国新闻事业有哪些重要贡献？



第六章

“五四”时期的新闻事业

这是一个重要的历史转折时期，伟大的五四运动宣告我国旧民主主义革命的结束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始，而马克思主义报刊的出现也标志着我国新闻事业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

1915年，陈独秀创办《青年杂志》，高举民主与科学的大旗，发动新文化运动，使报刊工作日趋活跃，五四运动后出现迅速发展的局面。1920年，我国首批马克思主义报刊诞生，开拓了新闻事业前进的新道路。

新闻事业在这一时期进行了多方面的改革，其中影响最为深远的是采用白话文和革新副刊。由于报刊上自由讨论的发展，政论文体有显著的进步与创新。新闻教育和新闻研究迈出了可贵的第一步——出现了我国第一个新闻教学与研究机构和国人撰写的第一部新闻学著作。

第一节 《新青年》与新文化运动

一、《新青年》及其主编陈独秀

中华民国成立后不久，袁世凯窃取了国家政权，力图复辟帝制；日本帝国主义提出了“二十一条”，加紧对华侵略。中国社会仍然处于深重的内忧外患之中。

现实的教训引起了当年追随辛亥革命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思考。不少当年叱咤风云的先进人物在思想上倒退了，竭力提倡封建道德和尊孔读经的旧文化，鼓吹复古思想。甚至还有一些人公开宣扬鬼神迷信，阻碍民众的觉醒和社会的进步。这种局面，激起了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对于帝国主义和封建专制的强烈愤恨，使他们深深感到虽然有了宪法、国会、总统而没有解决问题，必须重新找寻解决中国问题的道路和方案。以陈独秀、李大钊等为杰出代表的一部分激进的知识分子直面现实，提出了开展一个广泛的“改造国民性”运动的政治主张。他们认为，要在中国实现民主共和政治，必须首先从思想启蒙着手，用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取代封建主义思想。于是，这一部分知识分子开始不再热衷于政党政治活动，转向展开唤起民众的思想启蒙活动。中国近现代革命史上功勋卓著的《新青年》杂志，就是在这一历史背景和指导思想下创办起来的。

《新青年》，1915年9月15日在上海创刊，初名《青年杂志》，自第2卷起因有重名之嫌而改为本名。16开月刊，每出满6号为一卷，从创刊至1922年7月，共出刊9卷54号。创办人陈独秀（1879—1942），字仲甫，笔名三爱、实庵、只眼等，安徽怀宁（今属安庆市）人。他出生于一个封建官僚地主家庭，早年考中秀才，后到南京考举人、落榜。由于受到康有为、梁启超发动的维新变法的影响，他抛弃了传统的仕宦旧途，转向寻求西方新学，自1901年起还多次东渡日本求学考察。同时，他还在国内外组织进步团体和报刊书社。1903年，协助章士钊等在上海创办《国民日报》，担任编辑。1904年与人合作创办《安徽俗话报》半月刊，并任主编。辛亥革命后，陈独秀面对黑暗的现实，革命的信念弥坚，敏锐地看到中国社会问题的症结，并提出了医治这些症结的药方。1914年，在日本东京协助章士钊编辑《甲寅》月刊，并在报刊上发表时论，传播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反对封建专制，激励国民志气，克服“奴隶根性”。1915年夏，陈独秀在袁世凯复辟帝制的危难时局中，毅然回国筹办《青年杂志》，由上海群益书店印刷发行，作为“救国救民”的舆论基地。

《新青年》的创刊，是中国新文化运动兴起的标志。陈独秀在创刊号上发表带有发刊词性质的《敬告青年》一文，针对封建思想文化的束缚，打出了科学和民主的大旗，向青年读者提出了六个方面的要求：自主的而非奴隶的；进步的而非保守的；进取的而非退隐的；世界而非锁国的；实利的而非虚文的；科学的而非想象的。他大声疾呼：“国人而欲脱蒙昧时代，羞为浅化之民也，则急起直追，当以科学与人权^①并重。”他希望青年“发挥人间国有的智能，抉择人间种的思

^① Democracy，起初译为“人权”，意即人权平等之说，后通译为“民主”。

想——孰为新鲜活泼而适于今世的争存，孰为陈腐朽败而不容留量于脑里——利刃断铁，快刀理麻，决不作迁就依违之想”。作为《新青年》的创办人和主持人，陈独秀还为刊物制定了宣传策略，即以思想启蒙为要务，“批评时政，非其旨也”^①。他还根据不同的情况提出不同的宣传政策与方针，确立了开展思想文化斗争的原则，组织编者、作者和读者队伍。陈独秀又是《新青年》的主要撰稿人，一共撰写了一百多篇政论、专论和杂文，通信专栏署名记者的答疑解难文章也大多出于他之手。他在主持《新青年》的7年中，一次被捕入狱，两次被抄家罚款，平时来自社会封建顽固势力的咒骂与人身攻击更是不计其数，但他始终不为艰难困苦所动，坚持《新青年》的方向，和读者一起前进。

《新青年》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陈独秀主撰阶段（1915年9月至1917年12月），编辑部同人轮流主编阶段（1918年1月至1920年5月），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机关刊物阶段（1920年9月至1922年7月）。它的第1卷影响不大，包括赠送在内每期发行仅千份。经过调整，自1916年9月出版的第2卷起，陈独秀把“改造青年思想，辅导青年修养”的宗旨和现实的社会政治、青年的思想实际逐渐结合起来，影响也日益扩大。1917年初，陈独秀应聘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新青年》随之迁到北京出版，并由个人主办发展为拥有一批进步教授、学者参与编撰的同人刊物。1918年1月第4卷第1号开始，实行轮值主编，主编者有陈独秀、钱玄同、刘半农、胡适、李大钊、沈尹默等，主要编撰人有鲁迅、周作人、高一涵、陶孟和、王星拱、陈大齐、张申府等，形成了一个新文化运动宣传的统一战线。其中，李大钊是《新青年》同人中和陈独秀并肩战斗的一员猛将，胡适、鲁迅、钱玄同、刘半农等也各有建树。

二、新文化运动中的《新青年》

《新青年》一创刊，就高高举起民主与科学的旗帜，发动了一场以反对旧道德提倡新道德，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为主要内容的波澜壮阔的新文化运动，并在这场新文化运动中始终成为主要阵地。它的主要宣传内容有以下三个方面：

（一）提倡自由民主，反对封建礼教，开展批孔运动

《新青年》大力介绍西方的民主、自由、平等、博爱等新思想、新道德，批判中国封建主义的旧思想、旧道德，并针对当时甚嚣尘上的尊孔复辟逆流展开批判孔孟之道的斗争。

《新青年》发表的第一篇批孔文章是易白沙撰写的长篇政论《孔子平议》，它

^① 《答王庸书》，载《青年杂志》，第1卷第1号，1915-09-15。

的上篇发表在第1卷第6号上(1916年2月15日),下篇发表在第2卷第1号(1916年9月10日)。这篇文章论述了尊孔会导致政治专制和思想专制,认为“独夫民贼利用孔子,实大悖孔子的精神”。本文打响了批孔的第一枪。影响最大的是陈独秀、李大钊、鲁迅等人为反对当时盛行的尊孔读经的复古逆流而撰写的一系列文章。1916年9月,鼓吹尊孔、复古的代表人物康有为向北洋军阀政府上书,要求把孔教写为“国教”,以孔孟伦常为立国的精神载入宪法。对此,陈独秀立即在《新青年》上发表了《驳康有为致总统总理书》、《孔子之道与现代生活》、《宪法与孔教》、《袁世凯复活》、《复辟与尊孔》、《再论孔教问题》等多篇评论,以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都打着尊孔旗号这一事实立论,指出:“孔子之道,不适合现代生活”,“主张尊孔,势必立君,主张立君,势必复辟”。陈独秀大力阐述了西方资产阶级的民主思想与自由平等的观念,把思想上反对封建伦理道德和政治上要求实行民主共和结合起来进行宣传。他疾呼:“欲建设西洋式之新国家、组织西洋式之新社会,以求适今世之生存,则根本问题,不可不首先输入西洋式社会国家之基础,所谓平等人权之新信仰,对于与此新社会、新国家、新信仰不可相容之孔教,不可不有彻底之觉悟,勇猛之决心,否则不塞不流,不止不行!”^①这些话集中反映了陈独秀反对封建主义思想道德的坚定意志,也代表了新文化运动前期的指导思想。虽然他所追求的资产阶级共和国的理想在中国是行不通的,但这种民主主义的宣传,对于长期受封建思想束缚的人民却起了振聋发聩的作用。

李大钊也在《新青年》上发表《今》、《新的!旧的!》等文章,反对颂古非今和安于现状的人生态度,反对尊孔复辟。鲁迅给《新青年》写的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②,深刻揭露了封建制度和封建礼教的“吃人”本质,成为不朽的篇章。《狂人日记》是第一篇署名“鲁迅”的文章,也是《新青年》刊载的第一篇白话文小说。此后,鲁迅还以“唐俟”、“俟”的笔名先后写了《我之节烈观》、《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等论文和小说、杂文等五十多篇,鞭挞封建主义思想,痛斥尊孔复辟势力,鼓舞青年投身反封建斗争。

以反孔闻名的吴虞,撰写了《家族制度为专制主义之根据论》、《吃人与礼教》等论文,他深刻地揭露了封建家族制度与君主专制统治的内在联系,认为封建家族制度是专制主义的根据。他坚定地表示,为了反对孔子学说,“虽蒙离经

① 陈独秀:《宪法与孔教》,载《新青年》,第2卷第3号,1916-11。

② 《狂人日记》,载《新青年》,第4卷第5号,1918-05-05。

叛道”之讥，所不恤矣。^①在批孔中，吴虞态度坚决，言辞激烈，被称为只手打“孔家店”的老英雄。

《新青年》还在读者通信栏中开展关于“孔教”的辩难，形成了“打倒孔家店”的强大社会舆论。

（二）提倡科学，反对迷信

《新青年》提倡科学，反对迷信，专门介绍自然科学知识文章不多，主要是倡导用科学的观点来看待社会和人生，反对偶像崇拜、迷信盲从、主观武断和一切黑暗愚昧现象。陈独秀撰写的《偶像破坏论》提出：“宗教上、政治上、道德上，自古相传的虚荣，欺人不合理的信仰，都算是偶像，都应该破坏！”这种科学的精神，显然和政治上道德上反对封建主义的民主精神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当时，封建统治阶级利用一些组织和报刊宣扬鬼神迷信。对此，《新青年》发表了一系列文章，痛斥所谓“灵学”，从多方面论证鬼神为无稽之谈，进行唯物主义的无神论宣传。易白沙在《诸子无鬼论》中针锋相对地指出：“鬼神之势大张，国家之运告终。”

（三）发起文学革命运动

《新青年》提倡新文学反对旧文学，提倡白话文反对文言文，发起了一场意义深远的文学革命运动。

1917年1月1日，《新青年》第2卷第5号上发表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拉开了文学革命的帷幕。

该文提出，文学改良须从人事人手：须言之有物，不模仿古人，讲求文法，不作无病之呻吟，务去滥调套语，不用典，不讲对仗，不避俗语。胡适（1891—1962）是《新青年》倡导新文学和白话文的力主者之一，中国现代著名学者。字适之，安徽绩溪人。1916年在美国留学时，就向《新青年》撰写译著，同陈独秀通信交往。《文学改良刍议》就是他在美国留学时撰写的论文。1917年，胡适回国，任北京大学教授，并参加《新青年》编辑部工作，又撰写了《建设的文学革命论》等文章，主张“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着重提倡白话文。他首先在《新青年》用白话文写诗，后汇集出版《尝试集》，一时被称为“白话圣人”。

1917年2月1日，《新青年》第2卷第6号上发表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旗帜鲜明地提出三大主义：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推

^① 参见吴虞：《家族制度为专制主义的根据论》，载《新青年》，第2卷第5号，1917-01-01。

倒迁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他把革新政治与革新文学联系起来，认为“今欲革新政治，势不得不革新盘踞于运用此政治者精神界的文学”。

鲁迅、钱玄同、刘半农、周作人等是《新青年》发起的文学革命运动的英勇战士。鲁迅继《狂人日记》之后，又在《新青年》发表了《孔乙己》、《药》等小说，并在该刊《随感录》栏发表了二十多篇杂文。鲁迅的白话文学作品，树立了批判现实主义的典范，使文学创作与反封建主义斗争紧密结合，显示了“文学革命”的实绩。钱玄同、刘半农赞同陈独秀“以白话文为文学之正宗”的主张，多次给反对文学革命的言论以有力的回击，其中一次是以“双簧戏”的形式进行的。1918年3月15日，《新青年》第4卷第3号在《文学革命之反响》的总标题下发表了著名的新旧文学论战的两封信。一封是钱玄同化名“王敬轩”写给《新青年》编辑部反对文学革命的来信，汇集了当时反对新文化运动的许多论点，一封是刘半农写的有一万多字的驳论《致王敬轩信》，逐条批驳王的论点，具体论述文学革命的必要性。这两封信的辩驳，推动了文学革命问题的讨论。

同时，《新青年》还从第4卷第1号起大量译介世界近现代文学名著，发表俄、法、英、德、日、挪威、美、丹麦、印度等二十多个国家的百余名作家的作品。第4卷第6号出版《易卜生专号》。同时，对“彻底暴露人生”的写实主义、自然主义和“人的文学”、“平民文学”等文学理论进行了探讨，为新文学的发展提供了有益滋养，也为反封建文化思想提供了武器。

《新青年》发起新文化运动，开展民主与科学的思想启蒙宣传，并旗帜鲜明地反对封建主义，批判孔孟之道，提倡新文学和白话文，好似春雷初动，惊醒了一代青年。广大读者纷纷致信《新青年》杂志，赞扬《新青年》在“公理消沉，邪说横行之时”，能够“独排众议，力挽狂澜”，认为《新青年》是“明灯黑室”，“空谷足音”，开创了中国历史的“新纪元”。广大青年推崇陈独秀是“思想界的明星”。1917年，《新青年》最高销量每期达一万五六千份，1919年，《新青年》又再版第1卷至第5卷，以满足读者的要求。

当然，《新青年》在发起新文化运动时也有着一些形式主义方面的缺点，正如毛泽东在《反对党八股》一文中所指出：“他们对于现状，对于历史，对于外国事物，没有历史唯物主义的批判精神，所谓坏就是绝对的坏，一切皆坏；所谓好就是绝对的好，一切皆好。”总之，《新青年》前期对民主与科学的宣传，没有超出旧民主主义思想的范畴。但是它唤醒青年一代冲破封建思想的牢笼，为五四运动的爆发，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开辟了道路。

三、李大钊揭开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新页

正当中国新文化运动发展到高潮之际，俄国十月革命的炮声给中国人民送来了马克思主义。李大钊等先进的中国知识分子，敏锐地意识到马克思主义也是解决中国社会问题的强大的思想武器，并在《新青年》等报刊上发表介绍马克思主义的文章，揭开了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新的·一页。

李大钊（1889—1927），字守常，笔名明明、孤松、猎犬等，河北乐亭人。他是中国共产党主要创始人之一，是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的卓越宣传家，中国无产阶级新闻活动的先驱。“五四”时期，他曾广泛从事报刊活动，撰写大量政论。1913年，他在天津担任北洋法政学会的《言治》月刊的编辑。1916年春，在日本主编出版留日学生总会机关刊物《民彝》创刊号，并为《甲寅》月刊、《新青年》写稿。他从日本寄给《新青年》的第一篇稿件《青春》，满怀爱国热情地号召青年“冲破历史之桎梏，涤荡历史之积秽，新造民族之生命，挽回民族之青春”，为把白首中华改变为青春中华而努力。1916年4月回国后，担任《新青年》特约撰稿人，1918年初被聘为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参加《新青年》编辑部工作。除积极参与《新青年》编撰工作，他还与陈独秀等创刊《每周评论》；还担任过北京《晨钟报》总编辑、《甲寅》日刊编辑、《少年中国》杂志编辑主任，北京大学学生刊物《国民》杂志社导师和《新潮》杂志社顾问，指导北京《晨报》副刊改革。1920年领导北京共产主义小组出版《劳动音》周刊。中国共产党成立和大革命时期，指导创办《工人周刊》、《政治生活》周刊、《国民新报》等报刊，并为《新青年》季刊、《向导》、北京《晨报》等报刊撰稿。1927年4月28日在北京牺牲。

俄国十月革命，于1917年11月7日爆发。其后第四天，即11月10日，上海《民国日报》要闻版头条以《临时政府已推翻美克齐美（按：即布尔什维克）党占领都城》为题作了报道。11日，北京《晨钟报》、上海《申报》、《时报》、《中华新报》等多家报纸也发了消息。一般报纸刊载这样一条简讯：“8日，伦敦电，俄国公报云，彼得格勒戍军与劳动社会已推倒克伦斯基政府”。随后，各报陆续报道苏维埃政府的政策措施。如，分配土地给农民、工人监督工厂企业、实行普选制等。对于列宁（按：当时译为里墨林、雷林、李宁）的活动，也有所反映。各报把俄国革命作为一件新发生的事情来报道，但也夹杂着一些误传和歪曲，如说“里林氏闻已就逮”；又如，把希尔维党说成是“过激党”、“暴烈党”、“乱党”等。其所以如此，与采用外国通讯社（英国路透社、日本东方社等）的电讯有关。

李大钊最早、最热情地歌颂俄国十月革命。1918年，正当皖系军阀段祺瑞

政府阴谋把我国拉进帝国主义反苏干涉战争中去的时候，李大钊在报刊上连续发表了几篇热情歌颂十月革命的政论，如《法俄革命之比较观》（载1918年7月《言治》季刊）、《庶民的胜利》和《BOLSHEVISM的胜利》（载1918年11月《新青年》月刊）、《新纪元》（载1919年1月1日《每周评论》）等，赞扬十月革命“是世界革命的新纪元，是人类觉醒的新纪元”；指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束是军国主义、资本主义的失败，“是民主主义的胜利，是社会主义的胜利，是BOLSHEVISM的胜利，是赤旗的胜利，是世界劳工阶级的胜利，是二十世纪新潮流的胜利”。他解释什么是布尔什维克主义：“他们的主义，就是革命的社会主义；他们的党，就是革命的社会党；他们是奉德国社会主义经济学家马客士为宗主的。”他满怀信心地预言，十月革命“不过是使天下惊秋的一片桐叶罢了”，“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他鼓舞读者，不要为俄国革命后“一时之乱象”而抱悲观，要“翘首以迎其世界新文明之曙光”，从十月革命中看到新希望。1919年，李大钊把他轮值主编的《新青年》第6卷第5号^①编成《马克思研究》专号，撰发长篇论文《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系统、简明地介绍了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唯物史观和科学社会主义三个组成部分，向读者推荐马克思主义是“世界改造原动的学说”。

在国内外时局变化、新思潮迅速传播的形势下，《新青年》日益倾向社会主义。陈独秀在五四运动前夕开始改变怀疑观望态度而同情十月革命，谈论社会主义。1919年9月他出狱后，12月为《新青年》第7卷第1号写的《本志宣告》一文，强调指出：“我们相信世界上的军国主义和金力主义，已经造成了无穷的罪恶，现在是应该抛弃的了”，这就把批判的矛头初步地指向了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1920年初，陈独秀由北京出走到已是新文化运动中心的上海，《新青年》从第7卷第4号起由他在上海主编出版。他在筹建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的过程中，把第7卷第6号编成《劳动节纪念号》。这是《新青年》宣传马克思主义与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一个里程碑，也是新文化运动发展的“新的集合点”。这期专号的篇幅多达360多页，比平时扩大一倍以上。它发表了陈独秀的《劳动者的觉悟》、李大钊的《MAY DAY运动史》，以及大量全国各地工人劳动、生活状况的调查报告和材料（包括数十幅照片），揭露在资本主义剥削下广大劳工牛马不如的奴隶生活。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材料有相当部分是《新青年》的记者和各地进步学生团体深入工人群众调查得来的，还有几篇就是工人自己写的稿子和多幅工

^① 《新青年》第6卷第5号是李大钊轮值主编的。当时他为避开军阀迫害，赴河北吕黎，编辑工作在该地完成，第6卷第5号延至9月出版，但封面仍署5月。

人题词。这表明《新青年》同人中的激进民主主义者逐渐转向了无产阶级的立场，促使《新青年》的社会主义因素不断增长。这为《新青年》后期转变为社会主义刊物打下了基础。

除《新青年》杂志外，国内其他报刊也出现了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文章。在南方，广东《中华新报》兼职记者杨匏安在该报发表长篇译述性文章《马克思主义》，自1919年11月11日起至12月4日连载19次，详尽介绍了马克思主义产生的历史及其组成部分。文章说：“自马克思氏出，从来之社会主义，于理论及实际上，皆顿失其光辉，所著《资本论》一书，劳动者奉为经典……马氏以唯物史观为经，以革命思想为纬，加之以在英法观察经济状态之所得，遂构成一种以经济的内容为主之世界观，此其所以称科学的社会主义者也。”最后指出：“马氏之言验矣！今日欧美诸国已悟布尔塞维克之不能以武力扫除矣！”这些南北同时发表的言论，标志着我国先进分子开始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来观察世界形势和国家的命运，标志着他们运用报刊阵地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开端。

第二节 新的报刊宣传阵线的形成

一、《每周评论》的创办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中国民众，特别是青年，日益关注国内外时事，对即将召开的关系国家权益的巴黎和会，以及涉及国家前途的国内南北和会的召开等问题尤为注目。这就迫切要求报刊加强时事政治的报道和评论，《新青年》单枪匹马地与整个封建势力斗争显然已不能适应时代的需要了。在新文化运动的思想影响下，一个新的报刊宣传阵线应运而生。《每周评论》是这个新的报刊宣传阵线中最有影响的报纸之一，与《新青年》互相配合，将新文化运动推向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每周评论》，1918年12月22日在北京创刊，为陈独秀、李大钊等《新青年》同人为适应新的形势而创办的一份小型政治时事评论报纸，4开4版。《每周评论》与《新青年》一样，以“输入新思想”、“提倡新文学”为己任，但《新青年》“重在阐明学理”，《每周评论》则“重在批评事实”，把思想文化斗争和政治斗争紧密结合起来。《每周评论》加强反帝反封建军阀的政治时事报道评述，把报道和评论结合起来。陈独秀在发刊词中笼统地提出以“主张公理、反对强权”为宗旨。

《每周评论》不仅政治思想内容丰富，议论精辟，而且在报纸类型上也是一种机关报。这张4开4版的小型报纸，栏目新颖多样，有《国外大事述论》、《国

内大事述评》、《社论》、《文艺时评》、《随感录》、《新文艺》、《国内劳动状况》、《通信》、《评论之评论》、《读者言论》、《新刊批评》、《选论》等。除正张外，有时还抓住重大事件，增出《特别附录》一张，随报赠送，如《对于新旧思潮的舆论》、《对于北京学生运动的舆论》等。《新潮》杂志评价该报说：“读它的人可用最廉的代价最经济的时间，知道世界上最新最重要的事件。”

1919年8月31日，该刊被北洋军阀政府查禁，共出37期。前25期由陈独秀负责主编，李大钊是主要撰稿人，鲜明宣传反帝反封建思想，并倾向社会主义。自第26期起，由胡适接编，改变了革命的政治方向，挑起“问题与主义”的论战，成为宣传实用主义的刊物。

二、报刊对五四运动的宣传报道

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在中国报刊上出现“公理战胜强权”的欢呼声，热闹了一阵子。但是，在1919年1月开始举行的巴黎和会上，作为战胜国的中国却成了列强瓜分的对象。列强拒绝中国收回山东的要求，答应日本接管德国在山东的一切权利。这种屈辱激起全国人民的公愤。于是爆发了五四运动。全国报刊，包括向来保守的报刊，都积极报道和支持这个爱国运动。

北京各报，在5月5日都突出报道了北京学生的爱国行动。《晨报》以《山东问题中的学生界行动》为题，发表两千多字的消息，详细报道学生游行活动。随后又对此进行连续报道，还发表了支持学生的评论，公布了被捕32名学生名字。5月8日至10日，连续3天刊载《购回5、6两日本报》启事称：“本月5日、6日两天，本报因销数骤增而不及加印，现应寄外埠的报顿形不足，读者诸君如能以该两日的报出卖，本馆愿照原价收回。”

天津《大公报》的胡政之是采访巴黎和会的惟一中国记者，他的“巴黎来电”一时成为人们争相阅读、各方关注的内容。

上海各报也作了集中的报道。《申报》、《私国报》、《时报》、《神州日报》、《时事新报》、《中华新报》、《民国日报》等7家报纸联合决定，从5月14日起不收日商广告、船期、记市、商情等。各报还在报上就此发表了通告。

在五四运动期间，《每周评论》发挥了积极的舆论先导作用。五四运动前夕，陈独秀著文痛斥巴黎和会是“分赃会议”。五四运动爆发后，《每周评论》对运动作了连续系统报道，及时评论，给予支持与引导。运动发生当天出版的第20号一版《国内大事述评》栏一面报道巴黎和会上日本帝国主义的狡诈态度，一面披露北洋政府外交部电令和会代表采取对日妥协退让、“对山东问题，不要坚持到底”的消息，吁请读者注意“卖国贼”的阴谋诡计。从5月11日出版的第21号

起，一连5期用全部或大部分篇幅，有时还增出专页，详细报道了五四运动的经过和前因后果，发表评论，引导群众斗争。《每周评论》把这场伟大的群众爱国运动第一次称为“五四运动”；赞扬它是中国学生和中国人民的一个“创举”。它第一次提出学习“五四运动”的精神，即在关系中国民族危亡的时候所表现的“学生牺牲、社会制裁和民族自决”的精神。

在五四运动前后，中国报界出现团结一致的局。1919年4月15日，上海《民国日报》、北京《晨报》等83家报纸，在上海成立了中华全国报界联合会，并宣布它将“外为和会专使的后盾，内作南北代表的指导”。该会积极动员各报拒登日商广告，显示报界一致对外的爱国立场。

三、进步学生报刊的纷起

五四运动前后，适应群众政治斗争蓬勃开展的需要，在《新青年》、《每周评论》的带动下，进步学生报刊如雨后春笋般生长起来，在1919年一年之内就达400种之多。其中影响较大的有毛泽东主编的《湘江评论》、周恩来主编的《天津学生联合会报》。

《湘江评论》1919年7月14日创刊于长沙，湖南学生联合会机关报，毛泽东主编。它是一张4开4版的小型周报，新闻、评论全部用白话文写作，以述评为主。毛泽东不仅精心编辑这张报纸，还发表政论、述论、杂论将近40篇。《湘江评论》在出版启事中宣布：“本报以宣传最新思潮为主旨。”毛泽东执笔的《创刊宣言》是一篇气势磅礴、豪情洋溢的文章。《宣言》指出：《湘江评论》出版的任务就是研究、传播新思潮。毛泽东撰写的长篇政论《民众的大联合》，在该刊的2至4号上连载，分析总结十月革命、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的历史经验，深刻阐述“民众大联合”的思想和策略主张，反映了毛泽东的民主革命统一战线思想的萌芽。当时，上海、北京、成都、浙江的一些报刊相继全文转载或推荐《民众的大联合》一文。

《湘江评论》创刊号初印2000份，当即销售一空，又加印2000份。从第2期起增印5000份，主销湖南外，上海、北京、武汉、广东、四川等地都有它的读者。李大钊评价它是全国最有分量、见解最深的刊物。1919年8月上旬，该刊第5号正付印时，遭到湖南军阀的武力查封。

《天津学生联合会报》，1919年7月21日创刊，天津学生联合会机关报，周恩来任主编。该报为对开大张日报，后改为三日刊，有时还发行号外。以评述为重点，其中周恩来用笔名“飞飞”撰写的许多评论，议论精辟，富有战斗性。创刊前，周恩来写了《天津市中等以上学校学生联合会日刊发行旨趣书》，表明对

报纸作用的重视。他写道：“我们学生联合会在求社会同情的时候，不能不有两个利器：一个是讲演，一个是报纸。讲演、报纸全是我们学生思潮的结晶。”随后，他又为创刊号写了题为《革新、革心》的社论，阐述了革命者既要改造社会、又要在这斗争中自觉改造自己思想的正确主张，并以此作为该报宣传的宗旨。该报还以大量篇幅报道学生运动、工人罢工斗争，并派出“特派员”专程赴山东采访，还发行号外支持山东学生群众代表赴京请愿。广大读者称赞《天津学生联合会报》是天津的“新曙光”，评价它是“全国的学生会报冠”。该报除发行天津外，还行销北京、上海、南京等全国许多地方，平时每日销数4 000多份，最高日销达万份以上。出版仅两个多月后，9月22日就被反动当局以“妨害公共安宁秩序”的罪名查封。后经反复斗争，于10月7日复刊，改出三日刊。周恩来为复刊号写了《本报继续出版的布告》，表示不论反动当局如何阻挠迫害，本报“天天在奋斗里讨生活”，今后仍继续传播学生奋斗的消息。该报第100期特地取名“奋斗号”。直至1920年初停刊，共出刊一百多期。至今只发现17期。

五四运动后，各地青年纷纷组织政治性社团，出版政治报刊。除《湘江评论》、《天津学生联合会报》外，还有：少年中国学生会在北京创办的《少年中国》杂志，北京俄文专修馆瞿秋白等人创办的《新社会》旬刊，湖南湘雅医专的《新湖南》，湖南周南女校的《女界钟》，周恩来、邓颖超在天津创办的《觉悟》杂志，恽代英、林育南等主持或参与的在武汉出版的《武汉时期评论》和《学生周刊》，浙江的《双十》周刊、《浙江新潮》和《钱江评论》，四川的《星期日》周刊和《四川学生潮》，等等。在全国出现了一个创办学生报刊的热潮。

在五四运动的影响下，社会各阶层都有明显的变化，也出版了一些新的报刊。如，孙中山领导下，1919年6月8日在上海创刊的《星期评论》，1919年8月1日在上海创刊的《建设》杂志，1919年9月在北京创刊的《解放与改造》半月刊（新学会主办，1920年9月改名《改造》月刊，由梁启超和蒋方震主编）。

四、新旧思潮在报刊上的大激战

新文化运动的向纵深发展，当然要引起中国封建顽固势力的极度恐慌和仇恨。在1918年下半年至1919年上半年，一场新旧思潮的大激战在报刊上展开。

代表封建顽固势力的重要人物有林纾（琴南）、辜鸿铭、刘师培等。代表封建顽固势力的报刊有《国故》月刊、《新申报》、《东方杂志》、《公言报》等。其中《国故》月刊是刘师培等封建顽固派文人专为抵制新文化运动而创办的，1919年初在北京创刊。该刊以“昌明中国固有之学术”为号召，反对白话文，提倡文

言文，反对新思想，提倡旧思想。《公言报》是接受段祺瑞十余万元拨款开办的反动报纸，1916年9月1日在北京创刊，创办后对段执政阿谀颂扬无所不至，被舆论讥讽为“段氏之影片，段党之留声器”。

这些封建顽固派文人在报刊上发表了一批文章，对新文化运动大肆诬蔑、攻击。他们把《新青年》等宣传新文化运动的报刊视为“洪水猛兽”，把陈独秀等新文化运动的战士称为“过激派”，认为新文化运动是“功利倡而廉耻丧，科学尊而利益亡，以放荡为自由，以攘夺为责任”。五四运动爆发后，《公言报》等代表封建顽固派的报刊攻击五四运动是“铲伦常，覆孔孟”的“恶果”。封建顽固势力中有人主张把“学生事件交付法庭办理”，要学生自首“去遵服判罪”。对此，《每周评论》等报刊立刻予以反击。《每周评论》出版特别附录专页《对于北京学生运动的舆论》，转载选录了《晨报》、《国民公报》、《益世报》等报纸的9篇评论，集中批驳法律制裁的谬论，赞扬学生运动，指出学生风潮激于爱国心，光明磊落，青岛事件为全国人民所注目，学生运动得到各方舆论之同情。这些评论还警告反动当局：如果违反公意，滥用法律制裁，必将酿成全国罢市罢工的更激烈风潮。

林琴南在这批封建顽固派文人中表现的最为突出。1919年2月17日，林琴南在上海的《新申报》上发表文言小说《荆生》，胡诌了一个名叫荆生的“伟丈夫”在北京陶然亭痛打大骂孔子、主张白话文的田其美（隐指陈独秀）、金心异（隐指钱玄同）和狄莫（隐指胡适）的故事，反映了这批封建顽固派痛恨新文化运动的险恶心理，暗示北洋军阀政府像荆生一样来为他们出气。林琴南这篇小说一发表，立刻遭到新文化运动战士的反击。3月9日，李大钊在北京《晨报》上发表《新旧思潮之激战》，正告那些封建顽固派“应该本着你们所言的道理，光明磊落的出来同这新派思想家辩驳、讨论”。3月16日，《每周评论》第12号全文刊出了林琴南的小说并逐段加以批评。3月间，林琴南还在北京《公言报》上发表公开信《至蔡鹤卿太史书》、《再答蔡鹤卿书》，指名道姓地攻击蔡元培等新文化运动战士，攻击白话文是“都下引车卖浆之徒所操之语”。蔡元培在1919年3月18日北京《公言报》上发表《致〈公言报〉并答林琴南君函》，以事实为根据，逐一批驳林纾反对新文化和白话文，维护旧道德和文言文的言论，并提出“对于学说，仿世界各大学通例，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的主张。此后，林琴南又在《新申报》上发表文言小说《妖梦》，其手法之低劣，比《荆生》更等而下之，同样遭到了新文化运动战士的痛斥。

针对封建守旧势力对新文化运动的攻击与责难，《新青年》第6卷第1号（1919年1月15日出版）发表陈独秀撰写的《本志罪案之答辩书》，指出：“追

本溯源，本志同人本来无罪，只因为拥护那德谟克拉西和赛因斯两位先生，才犯了这几条滔天的大罪。要拥护那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孔教、礼法、贞节、旧伦理、旧政治。要拥护那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国粹和旧文学。”这既是回答责难者，也是对新文化运动宣传的总结。这篇答辩书表现了《新青年》的编者与主要撰稿者的义无反顾、一往无前的精神，他们坚定地表示：“我们现在认定只有这两位先生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因此，为了宣扬倡导民主与科学，“一切政府的压迫，社会的攻击笑骂，就是断头流血，都不推辞”。

第三节 中国无产阶级新闻事业的诞生

一、《新青年》的改组和《共产党》月刊的创办

五四运动后，一批激进的民主主义者迅速接受马克思主义，向往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在共产国际帮助下，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开始兴起。1920年5月，首先在上海成立了中国共产党发起组，对外称马克思研究会。接着，北京、武汉、济南、长沙、广州等地的共产主义小组相继成立。在筹建中国共产党的过程中，迫切需要有自己的新闻舆论工具来传播马克思主义和共产党的知识，发动和组织工人运动。于是，我国无产阶级的新闻事业便应运而生。各地共产主义小组创办了一批报刊，其中影响最大的是改组后的《新青年》和《共产党》月刊。

在五四运动期间，陈独秀在北京参加了群众斗争，并于6月11日散发传单时被捕，9月16日出狱。10月5日，他主持《新青年》编辑部会议，决定刊物迁上海。12月1日出版的《新青年》第7卷第1号上发表《本志宣言》，宣布反对“军国主义和金力主义”，基本上确认了社会主义方向。1920年9月，《新青年》从第8卷第1号起迁上海出版，成为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的机关刊物。采用先树旗帜的办法，在第8卷第1号上开辟《俄罗斯研究》专栏，表明刊物性质变化。这时参加《新青年》编辑工作的有陈独秀、李汉俊、沈雁冰等，据沈雁冰（茅盾）回忆：“这一期的封面上有一小小图案，是一东一西，两只大手，在地球上紧紧相握，这暗示中国革命人民和十月革命后的苏维埃俄罗斯必须紧紧团结，也暗示全世界无产阶级团结起来的意思。”^①在印刷与发行方面，从第8卷第1号起，与群益书店脱离关系，成立新青年社，作为独立的机构。

改组后的《新青年》扩充了编者作者队伍，内容上加强了社会主义的宣传，

^① 《矛盾回忆录》（四），载《新文学史料》，1979（4）。

但是它仍然保持原来新文化运动统一战线的面貌，与在北京的编者作者保持联系，照旧采用他们的来稿。这样，既争取了原有民主主义作者读者逐步跟上来，同时也避免反动当局的注目。尽管如此，《新青年》还是受到了胡适的反对。1920年底至1921年初，他写信给陈独秀，指责改组后的《新青年》“色彩过于鲜明”，提出要《新青年》迁回北京编辑出版，发表一个“不谈政治”的声明。他还在北京同人中散布说：“今《新青年》差不多成了 Soviet Russia 的汉译本”，“北京同人抹淡的工夫决赶不上上海同人染浓的手段之神速”^①。这时陈独秀应孙中山邀请去广州工作，《新青年》由陈望道主持编辑工作。胡适又寄明信片给陈望道，反对“把《新青年》作宣传共产主义之用”。胡适的主张受到了陈独秀、李大钊、鲁迅等人的反对，没有实现。《新青年》坚定地走上了新的道路，成为我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报刊之一。

改组后的《新青年》，向广大读者进行了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启蒙教育，激励、团结许多人从民主主义走向马克思主义，在思想上和干部上为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做了积极准备。

为了向革命群众进行共产主义和共产党的教育，推进筹建中国共产党的工作，中共上海发起组于1920年11月7日创办了理论机关刊物《共产党》月刊，李达主编。秘密出版，不标明编辑、印刷、发行的地点，也不署真名。《共产党》月刊主要从三个方面进行了宣传：（1）宣传有关共产党建设的知识，介绍第三国际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实际情况、文献资料，特别是俄国共产党的经验和列宁的著作。（2）论述中国革命的道路和党的纲领策略，论证只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能够救中国，主张无产阶级联合起来，建立俄国布尔什维克式的中国共产党，用革命手段夺取政权。（3）向工农兵群众宣传马克思主义，报道国内工人运动的发展。它刊登了《俄国共产党的历史》、《列宁的历史》、《告劳兵农》等富有鼓动性的传单式的呼吁书。《共产党》月刊至1921年7月止共出6期，每期发行5000份，它不仅是早期共产主义者学习党的基本知识的必读教材，而且是各地共产主义小组交流思想、沟通情况、酝酿建党的一条重要纽带。

改组后的《新青年》和《共产党》月刊，坚持传播马克思主义，继进行反对实用主义的“问题与主义”论战之后，又开展了反对伪社会主义和反对无政府主义的两次思想论战。1920年冬至1921年，资产阶级政党研究系的报刊《时事新报》、《解放与改造》杂志（后改名《改造》），打着研究社会主义思想的幌子，宣

^① 张静主编：《中国现代出版史料》甲编，8页，北京，中华书局，1954。Soviet Russia 即美文《苏俄》杂志，是在美国纽约出版的一家进步刊物。

扬社会改良主义思想，鼓吹发展资本主义。张东荪以《时事新报》记者名义写的《由内地旅行而得之又一教训》挑起了论战。后来，《改造》上又发表他写的《现在与将来》和梁启起的《复张东荪书论社会主义运动》，是他们的代表文章。《新青年》、《共产党》月刊、《民国日报》的《觉悟》副刊等发表了反驳文章，《新青年》第8卷第4号收集有关论战的正反两面文章编成《关于社会主义的讨论》文辑，剥掉论敌研究社会主义的伪装，暴露他们用“曲学阿世的罪恶助成了权门富豪的罪恶”的真面目。无政府主义是一种小资产阶级的政治思潮，作为五四运动前后形形色色的新思潮之一，它在知识分子中有着相当影响，当时无政府主义者出版有《民声》、《进化》、《自由录》、《互助》、《劳动》等报刊，鼓吹绝对自由，反对一切国家政权，也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共产党》月刊发表《无政府主义之解剖》等文，译介了列宁《国家与革命》的部分章节，《新青年》第9卷第4号编了《讨论无政府主义》文辑，开展反驳无政府主义的论战，宣传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政权的学说，帮助青年读者摆脱无政府主义思想的影响。

二、《劳动界》等第一批工人报刊

1920年下半年，各地共产主义小组为了向工人宣传马克思主义，开展工人运动，相继创办了《劳动界》、《劳动音》、《劳动者》、《劳动与妇女》等刊物，这是我国第一批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工人为对象的通俗报刊。

《劳动界》是中共上海发起组于1920年8月15日创办的，32开本周刊，1921年1月23日停刊，共出24期。主编李汉俊。该刊的宗旨是“改良劳动阶级的境遇”。它用浅显的语言，生动的事例，向工人介绍劳动创造价值和资本家剥削剩余价值等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它指出工人之所以受剥削，是由于“资本家生产制”造成的，要解决这个问题，“劳动者非信奉社会主义，实行社会革命把资本家完全铲除不可”。它还以十月革命后的苏俄为榜样，鼓动工人联合起来，结成团体，为改变受压迫的地位团结斗争。它报道国际国内工人运动情况，尤其是国内各地工人成立工会、开展罢工斗争的消息，为工人读者传递自己阶级的信息，促进工人的觉醒。

《劳动音》是北京共产主义小组于1920年11月创办的周刊，版式与《劳动界》相同，1920年12月5日出至第5期停刊，每期销数达2000份。主要编辑人有邓中夏（笔名“心美”）、罗章龙等。它着重反映工人受压迫的悲惨生活，详细报道唐山煤矿瓦斯爆炸五六百工人死难的惨案、南京万余机织工人捣毁省议会的斗争，发表评论，给以支持，并指导工人正确斗争的方法和途径。后来它曾改名

《仁声》，又继续出版了几个月。

《劳动者》周刊是广东共产主义小组于1920年10月3日创办的，1921年1月2日停刊，共出8期。它向工人宣传只有组织起来，推翻现存制度，实现社会主义，才能得到解放。它以《劳动歌》为题最早译载了《国际歌》歌词。由于无政府主义者对刊物编辑的影响，该刊存在无政府主义和工团主义倾向。

《劳动界》等刊物，被工人们看做自己的“喉舌”，工人解放的“明星”。这批刊物把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工人运动初步结合起来，促进了我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开展。

三、中俄通讯社

中俄通讯社于1920年7月在上海创立，简称中俄社，1921年5月5日起，改称华俄通讯社，简称华俄社。社长杨明斋。它是我国第一家无产阶级通讯社。

1920年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等到上海后，即着手建立中俄通讯社作为一个公开活动的机构。中俄社的主要任务是沟通中、俄两国人民的相互了解，向中国人民介绍列宁的革命理论、俄国革命的成果与经验，同时向俄国人民介绍中国革命开展的情况。它一方面根据俄国和共产国际的精神，翻译俄文资料，写成中文消息供中国报纸采用；另一方面将中国报刊资料译成俄文，供苏俄报刊采用。1920年7月2日，上海《民国日报》第一次采用中俄社的稿件（《远东俄国合作社情形》）。

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成立后，中俄社成为它领导的机构之一。《新青年》、上海《民国日报》等都采用了中俄社的稿件。中国共产党成立后，由中共中央宣传部主管，以华俄社名义发稿，断断续续，到1925年8月1日停止工作。

四、中国首批无产阶级新闻事业的特点与意义

俄国十月革命以后，特别是我国五四运动以后，马克思、列宁关于建立无产阶级政党的学说在我国广泛传播开来。建党学说中，包括了创办和利用报刊的问题。新型的报刊与通讯社——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的无产阶级报刊与通讯社在我国出现，既是新文化运动以来宣传新思潮、开展百家争鸣的必然结果，也是我国筹建无产阶级政党的直接需要。我国首批无产阶级新闻事业，在筹建中国共产党的进程中发挥了宣传、鼓动和组织作用，为以后党的新闻事业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开端，在中国新闻事业史上开辟了一个新时代。

我国首批无产阶级新闻事业具有这样的特点：以向工人阶级和其他劳动者宣

传马克思列宁主义为基本任务；有目的、有组织地进行宣传鼓动和新闻报道工作；新闻宣传工作与建党的组织工作紧密结合，相辅而行。

在我国首批无产阶级新闻事业中，多数是新创办的，如《共产党》月刊、《劳动界》等工人报刊、中俄社；也有由原有报刊经过改革、性质发生变化的，如《新青年》。有一些激进的民主报刊，在前进的道路上被反动派扼杀，否则，它们也有可能走上新的轨道。我国首批无产阶级新闻事业是我国新闻史上前所未有的新型新闻事业，但它也继承了我国新闻事业的民主传统，代表了我国新闻事业发展的前进方向。

第四节 新闻工作改革、新闻学研究与新闻教育

一、新闻工作改革

在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的推动下，我国新闻事业有了很大的发展，新闻工作也在多方面进行了重大改革，几乎所有报刊都有不同程度的变化。

（一）开创自由讨论的风气

“五四”时期出现了一个百家争鸣的局面，报刊成为争鸣的主要园地。形形色色的观点展现在人们面前，有些互相辉映，互为补充；更多的是互有矛盾，相互排斥，思想交锋，甚至激烈的思想论战时有出现。但这一切都是在自由讨论的气氛中展开的。当时有三种情况：一是新旧思潮的激战，即拥护与反对新文化运动的双方争论；二是论战，有著名的三大论战（问题与主义、科学社会主义与伪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与无政府主义）；三是学术、文化、思想等各方面具体问题的讨论。三者特点与性质各异，但报刊让各方充分发表看法，还把反映各种观点的材料汇集起来，供读者分析。除了《每周评论》多次出“特别附录”外，陈独秀也曾汇集有关社会主义问题论战双方的文字，以《关于社会主义的讨论》为题，在《新青年》上发表。这样做，收到了真理越辩越明的效果，使马克思主义更加深入人心。

（二）政论传统的恢复与发展

从19世纪70年代末到20世纪初，我国报刊政论得到充分的运用与发展，树立了优良的政论传统。在宣传维新变法时，在革命与改良的论战中，政论都是主要武器，出了不少政论名篇和政论家。而在民国初年，应景的文字充斥报端，有见地的政论少见。到“五四”时期，自由讨论之风兴起，也带来了政论的活跃与繁荣。

《新青年》发起新文化运动后，广泛采用社论、专论、代论、来论、外论等

多种形式，打破民国以来报刊万马齐喑的沉闷局面，政论重新受到重视并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新青年》等宣传新文化的报刊，正是通过政论提倡民主、科学，批判旧思想、旧文化。《新青年》发表大量批判尊孔复辟的文字，有力动摇了封建统治。《每周评论》、《湘江评论》等常用的述评形式，政论和新闻报道相结合，夹叙夹议，及时评论国内大事，是一大发明。《新青年》的《随感录》专栏发表的短小锋利的时评，又称杂文，是一种“匕首”、“投枪”式的评论文体，后来逐渐发展成为常用文体之一。

（三）新文风的出现

《新青年》提倡白话文，反对文言文，使我国报刊文风一新。新文化运动前，我国报刊文字绝大多数是文言文，戊戌维新前后，曾出现少量白话报刊。当时用白话文写作，只是出于通俗宣传维新变法思想的需要，中上层生活中一般还是把白话文看做俯就愚民、不登大雅之堂的粗俗文体。《新青年》出版前后，报刊、教科书、应用文仍然几乎全部是用文言文写作，因而《新青年》第1卷也全部是文言文。自第2卷开始，《新青年》开始发表胡适用白话翻译的小说和他写的白话诗，但只占很少篇幅。在1917年8月1日出版的第3卷第6号《通信栏》中，钱玄同提倡：“我们既然绝对主张用白话体做文章，则自己在《新青年》里做的，便应该渐渐的改用白话。”他带头并建议该刊同人从此以后，不论是写论文还是写通信，“一概用白话”。自第4卷起，白话文迅速增多，至第6卷时几乎完全采用白话。在《新青年》的影响下，五四运动中涌现的数百种报刊纷纷采用白话文，如《每周评论》、《湘江评论》等等。一些全用文言的大报，如《国民公报》、《晨报》、《东方杂志》等也开始部分采用白话，有的办了白话文副刊，有的出现了白话文的短评、通讯，还有的在一部分消息和社论中也采用白话文。在推广白话文的同时，《新青年》还提倡使用新式标点符号。过去报刊上的文字，既不分段落，也不加标点，只在句读处加圈，或者用空一格的办法表示句读。《新青年》突破陈规，从第4卷起带头采用标点符号，1919年2月1日出版的第7卷第1号公布了《本志所用标点符号和行款的说明》，统一所用标点符号共计13种。后来，许多报刊也相继采用。《新青年》进行这些改革时，经历了一番和封建旧势力的斗争。鲁迅把这比作打了一场“大仗”，他说：那时“单是提倡新式标点，就会有一大群人‘如丧考妣’，恨不得‘食肉寝皮’的时候，所以，的确是‘大仗’”^①。他在《新青年》的《随感录》栏撰文，怒斥那些反对白话文的旧文人是“现在的屠杀者”。读者还投书《新青年》，提出了报刊横排的主张。

^① 鲁迅：《忆刘半农君》，《鲁迅全集》，第6卷，7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3。

（四）副刊的革新

“五四”以前，我国报纸副刊一般多是消闲性的读物，多数格调不高，不少副刊还充斥低级趣味的、黄色的内容。在新文化运动的冲击下，重视副刊成为报界的普遍现象，有的报纸副刊比正刊更出名。报纸副刊革新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上海的《时事新报》最先对副刊进行改革。1918年3月4日，该报创办起《学灯》副刊，初为周刊，因大受读者欢迎而不断扩版，由周二刊、三日刊最后于1919年12月改出日刊，由不足一版扩为两版，1922年改出4开4版。《学灯》主要接受西方国家的学术文化，也曾刊登过讨论社会主义的征文，李大钊、陈望道的文章和郭沫若早期的诗作，在读者中有一定影响。初由张东荪主编，后继逐步有俞松华、宗白华等。后来该刊向右转，脱离了进步文化的潮流。北京《晨报》具有副刊性质的第7版，自1919年2月7日起，在李大钊的指导和帮助下进行改革，主要是增加了介绍“新修养、新知识、新思想”的《自由讨论》和《马克思研究》等栏目，刷新了原有的《译丛》等栏，使《晨报》第7版变成为积极参加新文化运动，传播社会主义思潮的新园地。其中，《马克思研究》专栏从1919年5月5日至11月坚持了半年之久。李大钊为《晨报》第7版撰写了《现代青年活动的方向》等数十篇文字，并指导它出版1919年《劳动节纪念》专号。1921年10月2日起，《晨报》第7版改成4开4版的单张出版，刊名《晨报副镌》，每日一张，每月合订一册，由孙伏园主编。鲁迅积极撰稿支持，将《阿Q正传》（署名巴人）付该刊连载。这一副刊在思想文艺界有着广泛影响，为发展新文学做出了贡献。1919年6月6日起，上海的《民国日报》取消了格调不高的《国民闲话》和《民国小说》两个副刊，另办《觉悟》副刊，由邵力子主编，大力宣扬反封建的民族主义思想，并开始介绍社会主义思潮。1920年5月20日起改出8开4页单张随报附送，后每月汇成一册，单独发行。1920年中共上海发起组成立后，它的成员邵力子、陈望道等继续主持《觉悟》的编撰，使这个副刊变成宣传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一个阵地。1925年12月《民国日报》被国民党右派掌握后，《觉悟》也失去了进步作用。

“五四”时期副刊的改革，为办好报纸副刊提供了有益经验，其意义源远流长。“五四”以后，创刊于1924年12月5日的《京报》副刊，继承《晨报》副刊、《学灯》、《觉悟》等的传统，宣传反帝反封建思想，支持群众爱国运动，提倡新文化，曾与“甲寅派”、“现代评论派”展开论争，影响广泛。该刊由孙伏园主编，鲁迅是它的经常撰稿人。1926年4月下旬因邵飘萍被捕杀，《京报》被封闭而停刊，共出版477期。

（五）报纸版面编排和新闻采写业务的改进

在报纸版面编排方面，头版头条已是最新发生的国内外重大新闻，原先作为头版头条的“大总统命令”已被排在不重要的位置，甚至当做补白性材料来充填版面。报纸版面分为4栏、5栏、6栏、7栏、8栏等多种形式，专栏增多，且注意创新，如各种时事述评专栏、《要闻》、《社论》、《随感录》、《新文艺》、《通信》、《译丛》、《国内劳动状况》、《新刊批评》等比较新鲜的栏目。标题的制作努力做到醒目引人。

在新闻采写方面，不少报纸聘设特派记者，开辟国内外新闻来源，重视直接采访报道，使国内外消息、通讯比重增加，并出现了一批有价值的新闻作品。如邵飘萍在担任《申报》驻北京特派记者期间采写的大量独家新闻和北京通讯，在当时具有广泛的影响。有些报纸还聘请国外兼职通讯员、特派员，从而丰富了报纸的国际新闻通讯。1918年12月《大公报》经理兼总编辑胡政之以该报记者名义与出席巴黎和会的政府代表团部分随员一起赴法国，为该报发回一批专电、通讯，是采访巴黎和会消息的惟一中国职业记者。1920年秋，北京《晨报》和上海《时事新报》合筹经费，向美、英、法、德、俄等欧美5国一次派7名特派员。其中派往俄国的瞿秋白、俞颂华、李宗武等人，于1920年10月离京，次年1月到莫斯科，成为我国采访报道列宁领导的苏维埃俄国实际情况的第一批新闻记者。

瞿秋白于1917年9月考入北京俄文专修馆学习，1919年积极参加五四运动，同年11月，他和郑振铎等创办《新社会》旬刊，宣传民主主义思想，并日益倾向社会主义，向往十月革命的苏俄。从1921年初到1922年底，他坚持在苏俄采访活动两年，采写《共产主义之人间化》等数十篇新闻、通讯，发表在两报上的有五十多篇，他还写了著名的通讯报告集《饿乡纪程》、《赤都心史》等书。瞿秋白的作品如实地、深刻地报道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初期的状况，增进了中国人民对十月革命、苏维埃政权、马克思主义、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的了解，在一代青年读者中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瞿秋白在苏俄期间，于1922年2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于同年8月终断了与《晨报》、《时事新报》的关系。^①

周恩来采写的旅欧通信，为这个时期报纸的国际新闻通讯增添了光彩。他于1920年11月动身到法国勤工俭学，开展革命活动，应天津《益世报》之约，担任该报特约通讯员，为它撰写海外通信。从1921年2月到1922年2月的整一年

^① 瞿秋白还是我国最早的无产阶级新闻记者。1923年回国后，成为中共中央领导人之一，中共早期新闻事业的缔造人，先后主编《新青年》季刊、《前锋》月刊、《向导》周报和《热血日报》。1927年10月主编《布尔什维克》杂志。30年代在上海发起劳动左翼文化运动，指导《文艺新闻》的出版和中国左翼记者联盟的成立。1934年主编《红色中华》报。1935年6月18日在福建长汀遇难。

中，周恩来连续在《益世报》上发表 56 篇通信，深刻反映了当时欧洲的革命形势、旅欧华人的斗争和中国留学生的艰苦生活。

二、新闻研究与新闻教育的开端

新文化运动兴起后，随着新闻事业的发展，新闻学研究上了一个新的台阶。1918 年 10 月 4 日成立的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是中国将新闻学作为一门学科进行研究的开端。该研究会以“研究新闻学理，增长新闻经验，以谋新闻事业之发展”为宗旨，由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兼任会长，北京大学文科教授徐宝璜任副会长，徐宝璜和《京报》社长邵飘萍是专任导师。徐宝璜（1894—1930），字伯轩，江西九江人。1912 年赴美国留学，学习经济和新闻学。1916 年回国，任北京大学教授、北京《晨报》编辑。1920 年起，先后在北京民国大学、朝阳大学、中国大学、平民大学等校任教，主讲新闻、经济方面的课程。1930 年 6 月 1 日在北平病逝。

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还出版《新闻周刊》，为我国第一个新闻学研究刊物，徐宝璜任编辑主任。该刊采用横排的先进编排形式，但仅出版 3 期。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一直活动到 1920 年 12 月。

新闻学专著的出版，是这一时期新闻学研究发展的一个重要表现。徐宝璜的《新闻学》（初名《新闻学大意》），1919 年 12 月由北京大学出版部以新闻学研究会名义出版，为中国学者撰写的第一本新闻学专著。学界泰斗蔡元培为该书作序，称赞它“在我国新闻界实为‘破天荒’之作”。正如徐宝璜在该书的《自序》中所说，该书“取材于西籍者不少”，但“对于新闻学的重要问题，则皆有系统的说明；而讨论新闻纸的性质与其职务，及新闻之定义与其价值，自信所言，颇多西方学者所未言及者”。

随着新闻学研究的发展，中国的新闻学教育也应运而生。中国的新闻教育，在中华民国成立之初已有人建议，但一直未能实现。我国第一个新闻学教育团体应数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的创建，不仅是中国新闻学研究发展到一个更高阶段的标志，也是中国新闻教育事业起步的标志。该研究会向校内外公开招收会员，举办了两期研究班，培养会员百余人，为新闻界输送了优秀人才。徐宝璜为研究班讲授新闻学概论，并指导编辑新闻的练习。他的名著《新闻学》，就是将其在新闻学研究班上使用的讲义整理改写而成。邵飘萍在研究班上主讲新闻采访，并指导会员的实习活动，他的名著《实际应用新闻学》也是将其讲课时的讲义整理改写而成。他们为我国新闻教育事业做出了开拓性贡献。当时，青年毛泽东正任职北京大学图书馆助理员，探求革命真理，他参加新闻学会，并取得了听讲半年的证书。北大新闻学研究会的有些会员，如高君宇、罗章

龙等，后来都曾担任中共早期报刊《劳动音》、《向导》周报、《工人周刊》、劳动通讯社等的记者和编辑。

这一时期，中国新闻界与国际新闻界交往开始增多。仅 1921 年到 1922 年间，来华访问的西方新闻界知名人士就有：英国《泰晤士报》社长北岩，美国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院长威廉，美国新闻出版界协会会长格立士，《纽约时报》名记者麦高森，美联社社长诺伊斯等人。他们在各地进行讲学、发表演讲，介绍西方新闻学和办报经验，影响广泛。1921 年 10 月，中国新闻界代表 6 人参加檀香山世界报界第二次大会，这是中国第一次出席国际新闻界会议。1923 年美商控股的上海《新闻报》创刊 30 周年，出版纪念册本，其中收有西方新闻界头面人物的祝词、论文多篇，用中英文对照刊出，促进了中西报纸经验交流。

【学习思考题】

1. 简要评述《新青年》创办经过、在新文化运动中的贡献和陈独秀、胡适、李大钊、鲁迅等的作用。
2. 简要评述《每周评论》创办经过、特点及其在五四运动中的作用。
3. 简要评述李大钊的报刊活动及其贡献。
4. 简要评述毛泽东、周恩来、瞿秋白在“五四”时期的报刊活动。
5. 我国无产阶级新闻事业是在什么历史条件下产生的？有哪些具有代表性的刊物？
6. 我国新闻工作在“五四”时期有何重大改革？



第七章

中国共产党成立和大革命时期的新闻事业

这是革命新闻事业迅速壮大、中间报也缓慢发展的历史时期。首先是中国共产机关报刊的诞生，党领导的工人、农民、妇女、青年、军队报刊的出现，从而初步形成了党的报刊网络。其次，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的合作实现后，出现了以国民党名义创办的统一战线性质的报刊。再次，在北洋军阀统治的广大地区，一些以中间面貌出现的报刊在着力办出自己的特色，而进步报刊与革命新闻工作者深受迫害。就整体而言，新闻传媒的社会影响在扩大，开始越出政界、学界的圈子，走向广大民众，在工人运动、农民运动、工商学联合的爱国运动和北伐战争中发挥了积极作用。新闻业务也有所改进，主要在新闻报道的采访与写作上有明显的进步。此外，我国新闻教育有了初步发展，新闻学研究取得了有价值的成果。

第一节 中国共产党的报刊

一、中共中央机关报刊

1921年7月，伟大的中国共产党诞生。当时，中共中央尚未创办机关报刊，只是将原来的《新青年》作为党的理论刊物继续出版。直到1922年7月党的第

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开过以后，才筹办《向导》。

《向导》是中共中央第一个政治机关报，时事政治评论性的周报，16开本。1922年9月13日在上海创刊，1927年5月迁武汉，7月停刊，共出版201期。蔡和森、彭述之、瞿秋白先后担任主编，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罗章龙、赵世炎等是主要撰稿人，有的还参加了编辑工作。

《向导》一创刊，就集中宣传党的“二大”制定的民主革命纲领——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封建军阀，统一中国为真正的民主共和国。

20世纪20年代初期的中国，军阀专制，政客弄权，帝国主义或背后操纵，或公开干涉，局势黑暗混乱。《向导》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为指导，分析形势，评论时政，指出帝国主义侵略和军阀统治是造成中国混乱局面的根源，也是导致中国贫穷落后的根源。通过《向导》及其他革命报刊的宣传，反对“帝国主义”和“打倒封建军阀”很快成为广大群众的行动口号。

《向导》同为帝国主义服务的宣传工具进行了激烈的舆论斗争。日本人办的中文《顺天时报》和英国人办的英文《字林西报》、《京津泰晤士报》等，攻击中国人民的反帝斗争，甚至鼓吹对中国进行“惩罚战争”。《向导》发表文章痛斥这类言论，并从第54期起开辟了《外患日志》专栏，逐日记载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罪行。

《向导》还批驳了各种错误思想与主张，针对《努力周刊》宣扬“好人政府”、“联省自治”等言论，《向导》指出改良主义是有害的幻想，“中国现在需要的是打倒军阀和外国压迫”^①。

《向导》受到读者欢迎，影响日益扩大。发行量从最初的二三千份很快超过万份，最高曾达10万份。除在国内各地发行外，还远销至越南、日本、德国、法国等国家。国内读者赞扬它是“黑暗中国社会的一盏明灯”。

《向导》的首任主编蔡和森，为办好该刊做出了杰出的贡献。蔡和森（1895—1931），湖南湘乡人。1918年同毛泽东等在长沙组织新民学会。五四运动后赴法国勤工俭学，1921年冬回国，加入中国共产党。他担任《向导》主编两年又八个月，在该刊上发表了许多文章。蔡和森有很高的马列主义理论修养，他的文章能抓住重要的实际问题，提到理论高度来分析，具体生动地宣传党的纲领和政策。他于1925年冬赴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会议，1931年在香港被捕后引渡至广州，被反动军阀杀害。

继《向导》之后，中共中央又创办了《新青年》季刊和《前锋》月刊。《新

^① 君宇：《王博士台上生活应给“好人努力”的教训》，载《向导》，第5期，1922-10-11。

青年》季刊，1923年6月15日在广州创刊，瞿秋白主编，1924年12月出版第4期后休刊。1925年4月复刊，原定为月刊，但不能按期出版，实际上成为不定期刊，1926年7月出版第5期后终刊。《新青年》季刊及不定期刊，以宣传马列主义理论为基本任务，基本内容可以概括为三个方面：一是介绍马列主义的有关著作和国际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经验，出版共产国际号、列宁号、世界革命号等专号；二是从理论上论证中国共产党在民主革命中的纲领和主张；三是参加“科学与人生观”的讨论，发表陈独秀、瞿秋白等人的文章，批评唯心主义观点，宣传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

《前锋》于1923年7月1日在上海创刊，为避免当局的注意，假托在广州出版。瞿秋白主编，原定为月刊，实际未能按期出版，1924年2月1日出版第3期后停刊。它的基本任务是，通过对中国与世界政治经济形势的分析，宣传中国共产党的纲领和主张。如它通过对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论证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必要性和可能性等。它重视调查研究材料，采用了许多统计数字，具有鲜明的理论色彩。

但是，《向导》和《前锋》对于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地位宣传不力，甚至有错误的观点。如，把民主革命的成功说成仅仅是资产阶级的胜利，而“幼稚的无产阶级目前只有在此胜利的奋斗中才有获得若干自由及扩大自己能力的机会”^①；“我们在此运动中，不敢说是领袖，更不敢说是先觉，只愿当前锋，只顾打头阵”^②。

二、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刊物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各地共产主义小组在准备建党的同时，开展了建立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活动，上海、北京、广州等地陆续建立团组织。有些地方团组织办起了面向青年群众的报刊，这就是中国最早的团刊。其中有四川成都团组织于1921年1月15日创办的《先驱》半月刊，广东团组织于1922年3月创办的《青年周刊》等。

在首批团刊中，《先驱》是出版时间最长的，也是惟一由地方团刊转为中央团刊的。它的第1期至第3期在北京出版，刘仁静、邓中夏（仲霁）编辑，由于北洋军阀政府的查禁，从第4期起迁上海出版，并成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临时中央局的机关刊物，施存统编辑。1922年5月，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举行第一

① 陈独秀：《资产阶级革命与革命的资产阶级》，载《向导》，第22期，1923-04-25。

② 《本报露布》，载《前锋》创刊号，1923-07。

次全国代表大会，建立团中央机构，《先驱》从此正式成为团中央的第一个机关报。从第9期（1922年6月20日）起，在刊名右边署“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执行委员会印行”字样。先后担任编辑的有施存统、蔡和森、高尚德等。

《先驱》的基本内容是，介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青年运动的状况，评述中国青年思想和青年运动的现状，宣传马列主义理论和中国共产党的主张，批评各种错误思想，报道团的活动和刊载团的文件等。《先驱》出版第25期（1923年8月15日）后停刊。

1923年8月，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决定，创办《中国青年》作为团中央机关刊物。同年10月20日，《中国青年》在上海创刊，周刊，32开本，经常发行1万多份，最多时2万份，出至1927年10月停刊。恽代英、萧楚女、李求实等先后担任主编。《中国青年》在发刊词中表示，它是给青年以“忠实的友谊的刊物”，“要引导一般青年到活动路上”。它的基本内容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帮助青年正确对待工作、学习、生活，引导青年走上革命的道路。它发表了许多关于恋爱、婚姻、家庭等问题的文章和通信，启发青年提高道德修养，正确处理现实生活中的各种具体问题。

二是评述时事政治，帮助青年正确认识国内外形势，提高觉悟。它对国内外重大事件都加以分析，观点中肯，态度明朗。特别是在它的后期，当时革命处于危机关头，《向导》受到“左”倾错误的严重影响，而《中国青年》在一些重大问题上仍然坚持从实际出发进行宣传，发挥了很好的作用。

三是宣传马列主义理论，同各种反动的错误的思想做斗争。

重视青年的要求，从内容到形式适合青年的需求，是《中国青年》的特色。第4期（1923年11月10日）发表《我们的希望》一文，征求读者对该刊的意见，需要“有益而有味的稿子”。既注重“益”，也不忽略“味”，因而内容扎实、形式活泼，能吸引读者。它在一段时间里每期都有《本期研究题目》，启发读者思考。每当寒暑假开始时，它就对学生们提出建议——回家做些什么事，看些什么书，思考什么问题，等等。它同读者建立了直接联系，组织读报组，开会讨论。许多青年就是从阅读《中国青年》开始走上革命道路的，他们称《中国青年》为“良师益友”。

《中国青年》曾以最受欢迎的作者是谁为题，征求读者意见，读者的回答是：恽代英、萧楚女。

恽代英（1895—1931），江苏武进人。1915年在武昌中华大学读书，“五四”后在武汉创办工人补习学校，开设利群书社，编辑《学生周刊》和《武汉星期评

论》。1921年参加中国共产党，1923年赴上海担任团中央宣传部部长兼《中国青年》主编。1924年国共合作后担任国民党上海市执行部工农部秘书，曾领导上海《民国日报》副刊部工作。1926年赴广州，任黄埔军校政治总教官兼中共党团书记、农民运动讲习所教员。大革命失败后，参加领导南昌起义和广州起义。1928年后，任中共中央宣传部秘书，主编《红旗》。1930年5月被捕，1931年4月29日在南京被杀害。

作为《中国青年》的创办者、首任主编、主要撰稿人，恽代英勤奋写作，精心编辑，还亲自处理读者来信。他和萧楚女的作品代表了《中国青年》的文风，就是热情与说理，既洋溢着革命热情，又有理论分析，深入浅出，亲切感人。

萧楚女（1897—1927），原名树烈，字秋。湖北汉阳人。1920年参加利群书社，192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不久去四川任中学教师兼《新蜀报》主笔。1925年赴上海，任《中国青年》编辑，该刊的《新刊批评》专栏主要由他执笔。他在《中国青年》上发表了许多文章，热情地鼓励青年要有“人世宏愿”，勇于变革现实。1926年赴广州，协助毛泽东编《政治局报》，曾任农民运动讲习所专职教员、黄埔军校政治教官。1927年在广州反革命大屠杀中被害。他写过许多文章和小册子，其中著名的有《显微镜下的醒狮派》、《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等。

三、工人报刊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以领导工人运动作为中心工作，工人报刊也随之迅速发展起来。从1921年下半年到1923年初，在北京、上海、广州、武汉、长沙等地陆续创办了一批工人报刊。其中最著名的是上海《劳动周刊》和北京《工人周刊》。

《劳动周刊》是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的机关报，也是党领导下的第一张全国性的工人报纸。1921年8月20日创刊，4开小型报。它的发刊词宣布：“我们的周刊不是营业的性质，是专门本着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的宗旨，为劳动者说话，并鼓吹劳动组合主义”，希望中国工人“都来维护这唯一的言论机关，扩大解放全人类的声浪，促进解放全人类的事业实现”。它发行到全国许多地方，受到工人们的欢迎。1922年6月19日，被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以“载过激言论”、“鼓吹劳动革命”的罪名勒令停刊，共出刊41期。

《工人周刊》于1921年7月创刊，4开小型报（后改8开）。最初是北京共产主义小组以“工人周刊社”名义刊行，1922年夏改为新成立的中华全国铁路总工会的机关报，并迁郑州出版。1926年迁天津出版，至当年12月约出版150期。因受军阀政府迫害，多次停刊，终刊时间不详。它受到工人欢迎，曾被誉为

“地方劳动界的一颗明星”。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的组织下，各地创办了一批工人报刊，如山东的《山东劳动周刊》，湖南的《长沙劳动周刊》，湖北的《劳动周刊》，香港的《香港劳动周刊》等。在工人运动中，也出现了一批报刊，如陇海铁路总工会在1922年2月创办的《陇海路总罢工》，京汉铁路总工会在1922年初创办的《京汉铁路日刊》，唐山工会创办的《唐山潮声》等。

工人报刊的宣传报道中心是，向工人群众通俗地介绍马列主义理论，反映工人群众的生活和工会组织的活动，号召工人阶级团结起来，进行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军阀的斗争。在1921年1月至1923年2月我国第一次罢工运动高潮中，工人报刊发挥了宣传鼓动作用和组织作用。许多报刊及其工作人员在罢工运动中进行了英勇的斗争。如汉口《真报》（1922年10月10日创刊，湖北省工团联合会主办，林育南主编）积极报道与支持工人斗争，在工人中传诵。1923年2月4日京汉铁路全线总罢工开始后，《真报》成为罢工工人的喉舌。2月7日发生镇压工人惨案，8日《真报》被捣毁、查封，封条写的是“扰乱地方，鼓动工潮”8个字。它的编辑之一施洋，7日被捕，15日被军阀杀害。林育南等出走上海，发表《汉口真报馆宣言》，抗议军阀暴行，呼吁全国人民团结起来，打倒封建军阀。

“二七”惨案后，全国工人运动转入低潮，工人报刊中多数被迫停刊或被查封，能够坚持出版的为数极少。

四、中共早期报刊的主要特点

中国共产党的报刊，是在共产国际帮助下，借鉴列宁党报刊思想和俄国党报经验创办起来的。中共“一大”通过的第一个决议中，对于出版党的报刊作了原则的规定，如“应由党员直接经办和编辑”，“不能刊载违背党的方针、政策和决定的文章”等。中共“二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加入第三国际决议案》，完全采纳了共产国际对党的报刊的要求，如规定党的报刊应由“确实忠于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可靠的共产党人来主持”，“应该完全服从党中央委员会”。因此，把党的报刊作为党的事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贯彻党性原则，在党中央和各级党委领导下开展新闻宣传工作，是中共早期报刊的主要特点之一。党的主要负责人陈独秀、李大钊、瞿秋白等，都亲自领导党的报刊工作，经常为党的报刊撰稿。《向导》曾经公开向读者宣布：“《向导》是中国共产党的政治机关报”，“是中国民众的喉舌”，“本报所发表的主张，是有数千同志依着进行的”。

中共早期报刊的又一个主要特点是，继承与发扬“五四”时期报刊的革命精

神，以宣传马列主义和党的纲领、路线、方针、政策，指导革命斗争为基本任务。在《新青年》季刊的创刊号上，发表了瞿秋白执笔的《〈新青年〉之新宣言》，其中指出：“《新青年》的职志，要与社会以正确的指导，要与中国平民以知识的武器，《新青年》乃不得不成为无产阶级革命的罗针。”

在文风上，党的报刊也坚持了“五四”时期倡导白话文的正确方向。

在以广大工人为读者对象的同时，要面向民众，面向社会，扩大影响范围，这也是中共早期报刊的一个主要特点。这个特点，是由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性质所决定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需要实现“民众的大联合”，党的报刊不仅要报道与评论民众所关心的一切方面，而且应争取在社会各阶层中拥有自己的读者。

中国共产党报刊的出现，在中国新闻史上揭开了新的一页，为开拓具有中国特色的新闻事业发展道路迈出了第一步。

第二节 国共合作后的新闻事业

一、统一战线报刊的活跃

争取联合各派革命力量，结成反帝反封建的统一战线，是中国共产党报刊宣传的重要内容之一。1923年6月，中共“二大”确定同中国国民党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政策后，又进一步加强了这方面的言论。1924年1月，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实现了国共合作。

在国民党“一大”前夕，1923年12月30日，孙中山对一些国民党员说：“革命成功极快的方法，宣传要用九成，武力只可用一成。”^①这话表明，孙中山从实践体验中看到了宣传的重要。国民党“一大”后，统一和加强宣传机构成为它的一项重要工作。共产党员毛泽东担任了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一批共产党员参加国民党报刊和通讯社工作。正是在共产党员的主持和帮助下，国民党的宣传工作出现了活跃局面。特别是一些由共产党员主持、用国民党名义出版的报刊，在人民群众中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政治周报》是国民党中央机关报，由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主持出版。1925年12月5日创刊于广州，毛泽东主持筹办工作并担任首任主编，从第5期起，先后继任主编的是共产党员沈雁冰、张秋人。每期销量4万份。现在所见最后一期为1926年5月出版的第14期，它创刊的时候，国民党右派刚刚在北京西山召开

^① 《孙中山选集》下卷，49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

过会议，公开进行反共、反统一战线活动，宣布开除李大钊、毛泽东等共产党员的国民党党籍。帝国主义和一些军阀也公开对聚集在广东的革命势力造谣中伤。针对这种情况，毛泽东在《〈政治周报〉发刊理由》一文中指出：“我们现在不能再放任了。我们要开始向他们反攻。‘向反革命宣传反攻，以打破反革命宣传’，便是《政治周报》的责任。”毛泽东还进一步指出：“我们反攻敌人的方法，并不多用辩论，只是忠实地报告我们革命工作的事实”，“《政治周报》的体裁，十分之九是实际事实之叙述，只有十分之一是对于反革命派宣传的辩论”。毛泽东在这篇文章中提出了“为了革命”办报的理论与方法，是体现毛泽东新闻思想的重要论著之一。

国民党中央农民部主持出版的《中国农民》和《农民运动》两个刊物，也是由共产党员经办的。《中国农民》月刊于1926年1月在广州创刊，经常为它撰稿的有毛泽东、李大钊、林伯渠、李立三、彭湃、阮啸仙等共产党员。毛泽东的《中国农民各阶级的分析及其对于革命的态度》和《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龙胆紫的《土地与农民》、彭湃的《海丰农民运动报告》等文章，都是在《中国农民》上发表的。《农民运动》是一个通俗性的周刊，刊载有关农民运动的论文、宣传材料和报道，1926年8月1日创刊于广州，后迁武汉，终刊时间不详，现在所见最后一期为1927年6月出版的第29期。

在报纸中，《楚光日报》和《汉口民国日报》都是由共产党员主持、用国民党名义出版的。《楚光日报》于1926年3月在汉口创刊，创办人董必武（用化名担任经理），总编辑宛希俨、陈潭秋。报馆工作人员仅四五名，都是共产党员。这家报纸是国民党湖北省党部机关报。1926年9月，北伐军占领汉口。11月25日董必武主持下的《汉口民国日报》创刊，用国民党湖北省党部机关报的名义出版，经理毛泽民，先后担任主编的是宛希俨、高语罕、沈雁冰。《楚光日报》和《汉口民国日报》积极报道工人运动、农民运动和北伐战争的形势，宣传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和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

在上海、广州、南昌都出版了《民国日报》，都是国民党的机关报，也都有共产党员参加工作。但是，它们的情况比《汉口民国日报》复杂得多。上海《民国日报》由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党员共同组成副刊部，主持副刊改革工作，取得显著成绩。它先后出过9个副刊，影响较大的是《觉悟》和《评论之评论》。西山会议后，上海《民国日报》完全为右派所控制。至于南昌《民国日报》，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党员合作，同国民党右派进行了反复争夺，几次改变方向，最终为右派所控制。广州《民国日报》也是先左后右。

此外，国民党湖南省党部机关刊物《新民周报》，1924年4月17日创刊，

共产党员李维汉任主笔。刊行时间不长，但终刊情况不详。1924年4月1日，国民党在广州创办中央通讯社，由中央宣传部直接管理，1926年迁武汉。

二、共产党报刊、共青团报刊初步形成网络

国共合作后，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都独立地出版报刊，公开发行。它们一方面加强中央报刊，使之成为革命舆论的领导者及中坚力量，另一方面建立地方报刊，出现一个粗具规模的从中央到地方的党团报刊网络。

从整体上看，中国共产党是先办中央报刊，然后在加强中央报刊的同时创办地方报刊。《向导》等中共中央机关报刊，面向全国发行，即使在北洋军阀统治中心的北京，李大钊还秘密组织了《向导》的翻印工作。在北京、上海等地的报刊上，有时也出现《向导》出版的广告。1925年1月，中共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高度评价《向导》创刊以来的工作，指出它在全国革命运动中取得了“舆论的指导地位”。然而，党的地方报刊却是在国共合作后革命形势迅速发展的有利条件下陆续创刊的。如中共北京地方党组织主办的《政治生活》周刊，1924年4月27日创刊。中共河南区委机关报《中州评论》，1925年8月在开封创刊，萧楚女主编。中共湖南区委机关报《战士》周报，1925年12月在长沙创刊，初为旬刊，后为周刊。中共广东区委机关报《人民周刊》，1926年2月4日在广州创刊，张太雷主编。中共湖北区委机关报《群众》周报，1926年10月在汉口创刊。此外，有些地区党组织也在此期间创办了自己的报刊，但具体创刊时期不详，如浙江的《火曜》、江西的《红灯》周报、福建的《革命先锋》等。

在党的报刊网络出现的同时，团的报刊网络也形成了。《中国青年》很快就成为全国青年中具有巨大影响的刊物，团中央又在上海创办了面向工农青年的《平民之友》（1924年春创刊）、《青年工人》（1924年初创刊，邓中夏主编）、《劳动青年》（1925年初创刊）等报刊。地方团组织也筹办了一批报刊，如广东的《少年先锋》（1926年9月创刊，李求实主编），北京的《烈火》（1926年创刊，陈毅主编），湖南的《湖南青年》（1926年1月创刊），上海的《少年通讯》（1926年创刊），共青团北方区委在北京出版的《北方青年》等。

在国外，旅欧支部早在1922年8月1日就在法国巴黎筹办了油印的《少年》月刊，赵世炎、周恩来先后任主编，约出30期后停刊。1924年2月1日，改名《赤光》续刊，周恩来任主编。邓小平参与编辑，并负责刻写和油印工作，1925年6月7日出至第33期后停刊。1928年在巴黎复刊，后又迁德国柏林出版，成仿吾等主编，约于1930年初出至第54期后停刊。

三、工农群众运动中的报刊

国共合作后，工农群众运动在全国蓬勃开展，工人、农民、妇女报刊也随之迅速发展起来，成为这一历史时期新闻事业前进的一个重要方向。

工人报刊经过一年左右时间的沉寂，在1924年春开始复兴。新创办了一批工人报刊，如广州的《工人之路特号》等。一些被迫停刊的工人报刊也陆续恢复出版。

在工人报刊中，最重要的是《中国工人》。1924年10月创刊于上海，是中共中央主办的指导职工运动的刊物，1925年5月中华全国总工会成立后改为全总的机关报。起初刊期不定，后为周刊。主要撰稿人有邓中夏、刘少奇、瞿秋白、李立三、任弼时、赵世炎、林伟民等。《中国工人》以指导工人运动的复兴作为自己的首要任务。通过总结我国工人运动经验教训、介绍国际工人斗争经验，帮助工人学习罢工的战略战术，充分做好战斗准备。

农民报刊的兴起，是大革命时期报刊发展的一个突出现象。在中国新闻史上，这也是前所未有的现象。当时正在兴起的农民运动，迫切需要新闻传播与宣传鼓动工具，于是农民报刊便应运而生。1926年1月，在《中国农民》创刊的同时，广东省农民协会创办《犁头》旬刊（后改为周刊）。同年7月，国民革命军誓师北伐，鼓舞和推动了农民运动的蓬勃开展。从1926年下半年至1927年初，涌现出一批报刊，如湖北的《湖北农民》和《湖北农民画报》，江西的《江西农民》、《锄头》和《血潮画报》，湖南的《农友》，山东的《山东农民》和《山东农民画报》，陕西的《耕牛》等。在农民运动活跃的湖南、湖北、广东、江西等省，许多县、区都有油印小报。

农民报刊的特点是通俗、活泼，从内容到标题都适应农民的需求，文字明白如话。

随着妇女运动的开展，妇女报刊也逐渐增多。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不久，上海中华女界联合会创办《妇女声》半月刊（1921年12月创刊），它的宗旨是：“宣传被压迫阶级的解放，提醒女子加入劳动运动。”陈独秀、沈泽民、沈雁冰、邵力子、李达等都为它写过文章。1923年4月，天津女星社主办的《女星》旬刊创刊，是天津《新民意报》的副刊之一。当时担任女星社和女权运动同盟会河北支部负责人的邓颖超，为《女星》写过不少文章。同年8月，作为上海《民国日报》副刊之一的《妇女周报》创刊，当时担任中共中央妇女部部长的向警予任主编，她写了许多文章呼吁妇女“与一切被压迫解决的男子携手”，共同进行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1924年1月，天津《妇女日报》创刊，向警予发表《中国妇女宣传运动的新纪元》一文，欢呼该报的出版“是中国沉沉女界报晓的第一

声”，希望它“成为全国妇女思想改造的养成所”。国共合作后，中国共产党在各地出版了一批妇女报刊，如北京的《妇女钟》和《妇女之友》（郭隆真主编），武汉的《赤女杂志》（用长江书店名义发行）。有些共青团的地方组织也出版以女青年为对象的报刊，如共青团长沙地委的《青年妇女》。

学生报刊也很快在各地出现。如《北京学生联合会日刊》（1923年2月创刊），广东的《新学生》半月刊（1923年7月创刊）、湖北的《武汉学生》（1925年创刊）、《上海学生》、《湖南学生》、《香港学生》等。1925年8月，中华全国青年总会的机关报《中国学生》创刊。在1926年北伐战争前夕，全国各地学生报刊发展到50种以上，在团结广大学生积极投入革命斗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四、五卅运动中的新闻斗争

1925年5月15日，上海日本纱厂资本家枪杀工人顾正红，打伤工人十多人，激起全市工人、学生、知识分子和市民的愤怒。30日，上海学生两千多人在公共租界内集合声援工人斗争，要求收回租界，英国巡捕逮捕讲演学生一百多人。随即，群众万余人在公共租界南京路巡捕房门前集会，要求释放被捕者。英国巡捕对群众开枪，打死十多人，打伤数十人，逮捕数十人，造成“五卅惨案”。当晚，中共中央举行会议，号召上海人民开展罢工、罢课、罢市，抗议英帝国主义暴行。6月1日，“三罢”开始。为了及时报道运动形势和指导群众斗争，中共中央决定创办《热血日报》。

6月4日，《热血日报》创刊。它是迄今能看到的中共中央出版的第一家日报。铅印4开，设有《社论》、《本埠要闻》、《国内要闻》、《紧要消息》、《国际要闻》、《舆论之制裁》等栏和副刊《呼声》。它发表大量新闻和评论，报道上海工商界群众的斗争，评述运动在全国开展的形势，揭露帝国主义的暴行，传播国际进步势力支持中国人民的信息。它同《向导》周报相配合，特别在时效性上弥补了《向导》的不足，对这场反帝爱国运动起了指导作用。

《热血日报》受到群众的热烈欢迎，出版10天就达到日销30000份，每日收到来稿来信数以百计，许多读者冒着被捕的危险义务推销报纸，还向报馆捐款，它的许多新闻稿件和复刊稿件都来自普通工人、学生、商人，甚至警察。而帝国主义却对它多方迫害，工部局下令通缉主编瞿秋白，一些报贩被捕。6月27日，它出版第24期后被迫停刊。

《热血日报》主编瞿秋白（1899—1935），当时是中共中央委员，五卅运动“行动委员会”的主要成员之一，身体健康情况欠佳，仍坚持担负繁重的领导报纸的任务。在总共24期《热血日报》上，他写的社论有18篇，又写了许多短

文，每天都要编稿、校对，还要全面筹划报纸工作。

在五卅运动中，出现了一批为满足群众斗争需要而创办的报刊。在《热血日报》创刊的同一天，上海学生联合会机关报《血潮日刊》也出版第1期。它和《热血日报》采取一致态度，发行量达到一万多份。为了对外宣传，上海学生联合会还创办了《英文周报》，共出9期。6月11日，上海总工会机关报《上海总工会日刊》创刊。12日，上海工商学联合会主办的《工商学联合会日刊》创刊。知识分子也积极参加了五卅运动，他们组织上海学术界对外联合会，早在6月3日就创办《公理日报》，由叶圣陶、郑振铎、胡愈之主编，得到学生和职工的支持，最高发行量达到20 000份。上海一些大学出版了宣传五卅运动的铅印或油印报刊。上海工商界出版了一些以提倡国货为主要内容的报刊，如《国货周刊》、《国货日报》、《国货评论报》、《爱国报》、《中华国货旬报》等。《东方杂志》也刊载了宣传五卅运动的文章，并出版了《五卅事件临时增刊》。在共同的斗争中，上海新闻界结成了一个广泛的爱国反帝统一战线。

五卅运动在全国引起强烈的反响，北京、南京、天津、广州、汉口、重庆等许多城市的人民群众起来响应，形成全国的反帝怒潮。许多城市在斗争中出版了报刊，其中影响最大的是省港大罢工运动中出版的《工人之路特号》。它的前身是《工人之路》周刊，中华全国总工会机关报，1925年5月31日创刊于广州。省港大罢工爆发后，于6月24日改出《工人之路特号》，成为中华全国总工会省港罢工委员会的机关报，全国总工会宣传部长、省港罢工委员会党团书记邓中夏任主编，4开4版，每日发行从3 000份增至10 000份。它出至“七一五”政变前夕被迫停刊，现存最后一期为第616期，1927年4月14日出版。它是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工人报刊中出版时间最久的一家日报。

在五卅运动中，政治态度不同的各种报刊都受到严峻的考验。上海的《申报》、《新闻报》、《民国日报》、《时事新报》、《商报》、《时报》、《中华新报》、《神州日报》、《新申报》等大报，在运动开始时态度消极，有些报道不真实，有些报道轻描淡写，甚至拒绝刊登进步团体的宣言和声明，却发表了不少主张妥协的言论。出现这种情况，同这些报纸所处的租界环境、政治上和经济上受到约束有一定关系，但从根本上说，是中国资产阶级软弱性的反映。更严重的是，《申报》和《新闻报》7月11日在广告栏内刊登帝国主义宣传品《诚言》的第1期，激起上海新闻界和广大市民的公愤。

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于6月27日成立出版处，30日出版《诚言》。它是一种类似传单的铅印宣传品，不固定篇幅，不具出版机关，出过3期，标题是：第1期《英外长张伯伦演说》，第2期《沙面一役中国学生先放枪》，第3期《苏联

对于中国的野心》。两个月内，共散发和张贴 110 万份。《诚言》的内容是为帝国主义辩护，颠倒是非，恶意攻击中国人民的爱国行动。如第 1 期刊载的英国外长张伯伦 1925 年 6 月 17 日在英国下院的谈话，公然声称：“中国如是扰乱，华盛顿条件皆因此而障碍”，“惟在乱时，不能不施强压”，“以枪击散乱党，乃杀一儆百，辟以止辟”。这完全是强盗逻辑，十足的侵略言论。这个宣传品一露面，就受到上海广大市民强烈反对。他们把“诚言”涂改成“谣言”、“贼言”，把“看《诚言》”涂改成“不看《诚言》”、“不看《谣言》”。

在这种情况下，《申报》、《新闻报》刊登《诚言》事件一出现，社会舆论立即沸腾起来，《血潮日刊》、《中国青年》、《工商学联合会日刊》等载文痛斥，几百群众涌到申报馆门前提出抗议。上海学生联合会等团体派人与《申报》、《新闻报》交涉。在爱国力量的说服下，《申报》在 7 月 17 日刊登《辟〈诚言〉》全文，18 日刊登向社会各界道歉的启事，并印发《〈诚言〉是英国人的谣言》传单 20 万份。这场新闻斗争的结局说明，中国任何报刊都必须坚持反帝、爱国的方向，否则必将为人民群众所唾弃。

五、军队报刊的出现

北伐战争前后，涌现出一批军队报，它同农民报的兴起一样，是这一时期新闻事业发展的一个突出现象，也是中国新闻史上前所未有的现象。1925 年 7 月 1 日，广州国民党政府成立，它设军事部。8 日，国民政府决定统一军队编制，统称国民革命军，建立 6 个军，各军设国民党党代表和政治部。创办报刊，成为军队政治部门的一项重要工作。从 1925 年 7 月国民革命军建立到 1926 年 7 月誓师北伐的一年中，新办的和原有的军队报刊共计约 30 家（不包括油印报、墙报）。

国民革命军的报刊大致有以下各类：一是国民党中央军事机关出版的，如军事委员会政治训练部的《军人日报》，国民党中央军事部的《军人周刊》；二是各军政治部出版的，如第 1 军的《突击》，第 2 军的《革命半月刊》，第 4 军的《军声》；三是黄埔军官学校出版的，有校本部的《黄埔日刊》，特别党部的《革命军》等；四是军人团体出版的，如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的《中国军人》，黄埔同学会的《黄埔潮》周刊。此外，李大钊在北方组织了一批进步青年，参加冯玉祥领导的西北国民革命军，并于 1925 年 10 月创办《西北日报》（后改名《中山日报》）。

许多共产党员参加了军队的政治工作，除周恩来担任黄埔军官学校政治部主任外，各军党代表和政治部主任大多数也是共产党员。在军队报刊的主编和主要撰稿人中，也有不少是共产党员。因此，多数军队报刊都具有正确的政治方向，

能够按照国共合作的宗旨开展工作。其中影响较大的是《中国军人》和《军人日报》。

《中国军人》于1925年2月在广州创刊，初为旬刊，后改月刊。它是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的会刊，而这个联合会是周恩来组织的、以共产党员为骨干的进步军人的群众性组织。《中国军人》主编王一飞，主要撰稿人都是共产党员。这个刊物的宗旨是：“鼓吹革命精神、团结革命军人，唤醒全国军人，促起全国军人的觉悟。”它的文章通俗易懂，配有插图，还结合实际组织读者讨论，引导读者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它在军校师生中发行，还专送各军，在全军范围内都有影响，期发量达两万多份。

《军人日报》是对开大报，国民党中央军事委员会政治部训练部主办，1926年4月1日在广州创刊，宗旨是：“提高军人之政治观念，使军队真正成为拥护人民利益之军队”，“提倡军民合作”，“促进国民革命”。它大量报道国民革命军各军的活动，反映军人的生活和要求，又向军人介绍全国工农运动的形势，揭露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勾结活动，还刊载了关于苏联的消息。同年8月，在湖南衡阳改组为北伐军总政治部主办的《革命军日报》，先后在长沙、南昌、武汉出版，郭沫若、潘汉年、杨贤江继任主编。

《中国军人》等报刊在军队建设和北伐战争中发挥了积极作用，成为官兵欢迎的新闻传播与宣传鼓动工具。也有一些军队报刊，在国民党右派的影响和控制下，打击军内进步势力，反对孙中山的三大政策，以后成为国民党新军阀的宣传工具。

第三节 北洋军阀统治地区的新闻事业

一、北洋军阀对新闻事业的控制与大报的动向

广州的国民政府同北京的北洋军阀政府是对立的两个政权，但后者统治着中国大部分地区，特别是新闻事业较为发达的大城市。北京、上海、天津等城市，既在军阀统治下，又有革命力量，还有外国势力——北京有外国使团，上海、天津有外国租界，所以，这些城市的新闻事业是在复杂的环境中生存与发展的。

北洋军阀政府对于新闻事业采取管制、收买和镇压的办法。出版报刊要向警察部门登记，大样也要送警察部门检查。山东军阀张宗昌曾经召集记者，公开宣布：“今天我请你们大家来，没有别的话说，就是你们的报上登载的消息，只许说我好，不许说我坏。如果哪个说我坏，我就以军法从事。”军阀政府还用直接资助和“津贴”等方式收买报刊与报人。而敢于坚持正义与军阀对抗的，就封报

捕人，直至处死。

但是，在困难重重的环境中，新闻事业仍然缓慢地发展着。1921年全国有日报50家，1926年增加到628家。

北洋军阀政府的军阀、官僚们控制了一些报刊，如曾任司法总长、教育总长的章士钊主编的《甲寅周报》，以张宗昌为后台的《新鲁报》、《黄报》，以孙传芳为后台的《上海报》等。

一些政党和政治团体出版了报刊，如研究系的北京《晨报》与上海《时事新报》，国家主义派的《醒狮》周报等。1925年12月，国民党人在北京创办了《国民新报》。一些宗教团体、社会文化教育团体也出版了报刊，如天主教会在天津、北京分别刊行的《益世报》，中华职业教育社在上海创办的《生活》周刊等。

然而，数量最多的是民间报刊，其中有新办的，也有早就闻名于世的。例如北京的《京报》、《世界日报》、《现代评论》周刊，天津的《大公报》，上海的《申报》、《新闻报》、《时报》、《时事新报》、《商报》以及《创造》、《洪水》等。

北京、天津、上海三个大城市的新闻界，出现了令人瞩目的重要变化。在北京，成舍我开始创立自己的事业——《世界日报》。成舍我（1898—1991），原名成勋，又名成平，笔名舍我，原籍湖南湘乡，曾在上海《民国日报》任校对、助理编辑，在北京《益世报》任编辑、总编辑。他于1924年4月16日创办《世界晚报》，1925年2月10日创办《世界日报》，同年10月1日出版单张《世界画报》。他重视报纸的特色，《世界晚报》标榜“主张公正，消息灵确”；《世界日报》以军事政治新闻为主，兼重教育新闻，还设有多种副刊，曾聘请刘半农为副刊主编，发表过鲁迅的作品；《世界画报》先以时事照片为主，后以美术作品为主。他还重视经营管理，把印刷、发行、广告等工作组织得井井有条。《世界日报》日销量达三万五千多份，居当时北京各报之首位。

在天津，新记公司接办《大公报》。创刊于1902年的《大公报》，1916年安福系财阀王郅隆接办后，亲日色彩浓厚，为读者所厌弃，不得不于1925年11月停刊。这时，吴鼎昌、胡政之、张季鸾三人组成新记公司，接办《大公报》。吴鼎昌当时是“北四行”（金城、中南、大陆、盐业四家银行）的总经理，接办《大公报》后任社长；胡政之（胡霖）当时是国闻通讯社社长，并主持《国闻周报》，接办《大公报》后任总经理；张季鸾曾在多家报纸任职，当时任北京政府陇海铁路会办，接办《大公报》后任总编辑。1926年9月1日，《大公报》复刊，当天发表《本社同人之志趣》，提出“不党、不私、不卖、不盲”的办报方

针，以后长期以此为标榜，形成自己的独特风格。

在上海，《申报》、《新闻报》的发行量都突破10万大关。《新闻报》1920年发行5万份，1924年超过10万份。《申报》1922年发行5万份，1925年超过10万份。《申报》总经理史量才和《新闻报》经理汪汉溪，都致力于经营报业，取得显著成绩。《申报》增辟多种副刊，1924年2月8日创办《本埠增刊》，每日出版，加强了同上海读者的联系。《新闻报》以经济报道、广告业务和经营管理见长，成为在工商界具有广泛影响的报纸。

这几家大报的动向表明，中国报纸在努力创造自己的风格与特色。它们的办报经验可供后人借鉴。

二、邵飘萍、林白水遇害

1926年，著名报人邵飘萍、林白水先后在北京被奉系军阀杀害，成为震动全国的重大事件，也是中国新闻界的重大损失。

邵飘萍和他主持的《京报》由于积极投入五四运动、支持群众的爱国行动而为皖系军阀所不容。1926年3月，他积极投入“三一八”运动，《京报》对运动作了大量报道和宣传。4月18日奉系军阀进入北京，24日以“宣传赤化”的罪名逮捕邵飘萍，26日将他枪杀于天桥，年仅40岁。1949年，浙江金华解放后，当地政府宣布邵飘萍为革命烈士。1986年7月1日，金华市立“邵飘萍烈士纪念碑”。

邵飘萍是忠诚的爱国者。正是在救国救民的战斗中，邵飘萍找到了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共产党。《京报》出版纪念马克思诞生105周年特刊、悼念列宁逝世特刊，发表介绍马克思主义的文章，大量报道工人运动，有力地支持了罢工斗争。1925年，经李大钊、罗章龙介绍，邵飘萍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此后，他除了办报外，还为党做了许多具体工作，如帮助印刷与发行报刊及宣传品，协助党培养新闻工作干部，同孙中山、冯玉祥等著名人士保持联系等。

邵飘萍遇害后不到4个月——1926年8月6日，著名报人林白水也被奉系军阀杀害，陈尸天桥。林白水1916年在北京创办《公言报》后，专心从事报纸工作，1919年在上海创办《和平日报》，1921年又在北京创办《新社会报》，该报一度被北洋军阀勒令停刊，复刊后改名《社会日报》。1926年8月5日，在该报上发表时评《官僚之运气》，辛辣地讽刺了奉系军阀张宗昌的得宠官僚、国务总理潘复，因而遭杀身之祸，终年52岁。1985年7月30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追认林白水为革命烈士。

三、中国广播事业的诞生与通讯社事业的发展

1920年11月2日，美国匹兹堡KDKA广播电台正式开始广播，这是世界上第一座向政府登记的广播电台（公认它是世界上第一座广播电台）。接着，英国、法国、苏联、德国、意大利等国也相继设立广播电台。中国在1923年出现第一座广播电台，在世界各国中也属于较早的。

1923年初，美国人奥斯邦（E.G.Osborn）创办的中国无线电公司与英文《大陆报》合作，办起“大陆报—中国无线电公司广播电台”，同年1月23日晚首次播音。该台呼号XRO，发射功率50瓦，这是外国人在中国设立的第一座广播电台。首次播出为1小时，内容以音乐节目为主，也有新闻，包括本埠新闻、路透社电稿、市场与汇兑信息、《大陆报》刊载的消息等。1月25日，广播了孙中山《和平统一宣言》和他祝贺中国引进广播的消息。但是，由于它没有经过中国政府批准，因而被取缔，当年4月间停止播音。同年5月底，美商新孚洋行也在上海办起广播电台，但因经费拮据很快停办。

1924年5月，美商开洛公司又在上海法租界办起一座广播电台，呼号KRC，发射功率100瓦，这座电台与《申报》合作，在报馆设播音室报告新闻。开洛公司广播电台设的广播节目有汇兑、市价、钱庄兑现价格、新闻、音乐、名人演讲等。这座广播电台是早期外商在上海开办的广播台中时间最长、影响较大的一座，其播音一直持续到1929年10月止。

北洋政府交通部于1924年8月公布了《装用广播无线电接收机暂行规则》，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关于无线电广播的规则。规则中明确规定，允许民间装设收音机，从而改变了原来严加禁止的办法。规则还就收音机装设范围、收听内容、收音机收费等问题作了具体规定。这个规则的颁布，客观上促进了中国广播事业的发展。不久，北洋政府责成东北无线电长途电话监督处在北京、天津、哈尔滨、沈阳等地筹建广播电台。

1926年10月1日，哈尔滨广播电台开始广播，呼号XOH（后改为COHB），发射功率100瓦（后增加到1000瓦），每天播音两小时。内容有新闻、音乐、演讲和物价报告等。这是我国政府自办的第一座广播电台。时隔半年，1927年5月15日，天津广播无线电台开始播音。同年9月1日，北京广播无线电台也开始广播。1928年初，沈阳广播电台正式广播。

与此同时，在上海、北京等地很快出现了几座中国自办的民营广播电台，其中最早的一座是上海新新公司广播电台，创办于1927年3月18日。同年底，北京商办的燕声广播电台也开始播音。

初创时期的广播事业，设备简陋、规模很小，收听范围只限于广播电台所在

地区附近。特别是由于收音机价格昂贵，广播听众大多是政府官员、有钱的商人以及外国人等。当时全国有收音机一万台左右。

通讯事业也有所发展。据统计，1926年全国有通讯社155家。当然，其中有些是持着招牌领津贴，不发稿的。但多数是正常经营的，其中有的还具有一定影响，如国闻通讯社、申时电讯社。

国闻通讯社于1921年9月在上海成立，胡政之任社长。先后在汉口、北京、天津设立分社。总社设有广告部，北京分社设有英文部，向外国报纸提供英文稿。1924年8月3日，胡政之创办《国闻周报》。1926年新记公司成立后，国闻通讯社及《国闻周报》实际上成为《大公报》的附属机构。国闻通讯社至1936年停办；《国闻周报》出至1937年12月停刊。

申时电讯社发起于1925年，时任《申报》总经理的张竹平，联络《申报》、《时事新报》两报部分编辑，在工作之余将两报的各方专电加以编辑，发给一些报纸采用。这种办法受到欢迎，采用者增多，于是在1928年正式成立申时电讯社。1932年，该社与110多家报社签订供稿协议，1934年成立股份有限公司和董事会，在北京、天津、汉口、香港等地设有分社，1937年上海沦陷时停办。

四、新闻教育和新闻学研究的进展

20世纪20年代，是中国高等新闻教育奠定基础的时期，一些大学在这个时期办起了新闻学系科。首先是上海圣约翰大学于1920年在普通文科中增设报学系（后称新闻系），聘请《密勒氏评论报》主笔毕德生（D.D.Patterson）兼职主持系务，利用晚间授课，选读的学生达四五十人，并出版英文《约大周报》。校长见学生对新闻学有兴趣，就函告美国董事会，要求增聘新闻学教授。1924年，美国人武道（M.E.Votaw）来华任系主任。该系用英语授课，设有新闻、编校、社论、广告以及新闻原理、新闻史等课程。

1921年，厦门大学设报学系，学生仅1人，1922年增至6人。但在1923年发生反对校长风潮，该系师生离校，赴上海办大夏大学，厦门大学报学系停办。

1923年，北京平民大学设立报学科，徐宝璜任系主任，京报社长邵飘萍等为教授。学制4年，学生除课堂学习外，还去报馆实习，并成立新闻学研究会，办了刊物。

1924年，北京燕京大学设立报学系（后称新闻系），白瑞华为系主任，蓝序等为教授。学生有专修的，也有选修的，但都是三年级或四年级。曾设燕京通讯社向北京、天津、上海、汉口、香港、东京、纽约等地十多家报纸供稿。

1925年，上海南方大学设立报学系，《申报》协理汪英宾兼任系主任，分设

本科和专修科，开设的必修课程主要有报学原理、广告原理和访事学等。聘请《时报》编辑戈公振讲授访事学。办有南大通讯社，由学生采集新闻，免费供上海各报刊利用。

1926年，南方大学发生反对校长的学潮，报学系停办，大部分师生转入上海国发大学，该校因此增设报学系。戈公振为系主任，并主讲中国报学史，《商报》编辑潘公展主讲编辑法，《时事新报》总编辑潘公弼主讲报馆管理，《商报》总编辑陈布雷主讲社论编写。

此外，复旦大学中文系于1924年秋开设《新闻学讲座》，由陈望道主持；1926年扩大为新闻学组，由邵力子主持；1929年建立新闻系，文学家谢六逸为系主任。北京民国大学、国际大学于1924年分别设立报学系。上海沪江大学、光华大学、大夏大学于1926年分别创办报学系。上海国民大学、光华大学、大夏大学三校报学系学生曾联合组织上海报学社，学习与研究报纸工作的理论与现状。

同新闻教育的发展形势相比较，新闻学研究的进步较为缓慢。这几年出版新闻学著作十多种，其中较有影响的是：任白涛的《应用新闻学》（1922年），邵飘萍的《实际应用新闻学》（1923年）和《新闻学总论》（1924年），戈公振的《中国报学史》（1927年）。

至于新闻学刊物，为数极少。有的大学报学系出过，如1924年出版的《北京平民大学新闻学系级刊》，半月刊，仅出过3期。1927年1月，北京新闻学会成立，同时创办《新闻学刊》，黄天鹏主编，徐宝璜、邵飘萍、戈公振等曾为它写稿，1928年停刊，共出8期。

第四节 北伐战争中的革命报刊

一、革命报刊对于北伐战争的宣传

1926年7月，北伐战争开始。所有革命报刊都对国民革命军北伐作了报道和评论，在舆论上积极支持这场革命战争。北伐军总政治部创办《汉口革命军日报》，它以宣传北伐为基本任务。有些革命报刊还根据形势的变化，针对各种思想认识问题，做了细致的宣传与解释。《中国青年》就是其中较为突出的一家。

在北伐战争刚开始的时候，人们苦于连年战乱，害怕甚至反对任何战争。《中国青年》就向广大群众进行北伐战争的性质和意义的教育。它发表《拥护国民革命军北伐》、《北伐为的什么》等文章，阐明北伐战争的正义性质，指出北伐的目的是打倒奉直两系军阀和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解除工农和全国人民的痛

苦，因此根本不同于过去的军阀混战。《中国青年》还进一步指出：这场战争“不是靠北伐军孤军深入可以实现的，是要各地的浩大民众运动辅助进行的”，它希望人民群众不要袖手旁观，而应认识到自己的责任，积极参加到斗争中去。

1926年9月，北伐军攻占了武汉，人民群众庆祝胜利，革命影响迅速扩大。在欢呼声中，《中国青年》及时分析了形势，认为革命队伍内部情况复杂，民众势力薄弱，封建军阀正在准备反扑，帝国主义也可能干涉与破坏，因此它呼吁革命力量“切不要看轻我们的危机”。《中国青年》还明确指出：蒋介石在北伐期间禁止人民言论集会自由，禁止罢工，向农民勒销公债等，不顾人民的利益，想借此造成个人专制，有投机革命的危险。

在陈独秀和彭述之的影响下，《向导》一度对北伐战争持冷淡态度。但是，从整体上看，《向导》对于北伐战争仍是采取积极宣传的态度，如发表通讯《从广州所闻北伐之胜利与民众》，报道广州人民对北伐战争的支援情景；发表施英（赵世炎）写的通讯《上海总同盟罢工的记录》和《上海工人三月暴动记实》，对上海工人第二次和第三次武装起义作了详细的生动的报道。

二、国民党右派对革命报刊的抵制

从国共合作开始，国民党右派就反对共产党，反对孙中山的三大政策。他们控制了一些报刊作为自己的喉舌，如广州的《青白花》，上海的《革命导报》、《独立旬报》、《革命青年》、《江南晚报》等。他们的活动得到蒋介石的支持。蒋介石又指使黄埔军校学生中的右翼分子，组织孙文主义学会。这个组织在1925年9月创办《国民革命》周刊，与《中国军人》等革命报刊相对立。

1926年2月，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通过《整理党务案》后，一些共产党员被迫离开报刊工作岗位，一些革命报刊被迫停办，其中包括黄埔军校政治部出版的《黄埔潮》半周刊。这个刊物停办后，由蒋介石控制的黄埔同学会仍用原名出版周刊，成为右翼军人的喉舌。

北伐战争开始后，蒋介石和国民党右派在各地抢占舆论阵地，排斥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在蒋介石的大本营所在地南昌，封闭了革命的《贯彻日报》，完全控制了当地的《民国日报》。在蒋介石尚未控制的武汉，由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顾孟余主持，于1927年3月27日创办《中央日报》，与共产党员主持的《汉口民国日报》争夺读者。

蒋介石借军队力量打击革命报刊，引起人们的强烈不满。南昌《民国日报》工人为此罢工，使该报一度不能出版。武汉新闻记者联合会曾通过《质问蒋介石摧残革命舆论》、《肃清新闻界反动分子》等决议。

三、从“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到“七一五”反革命政变之间的革命报刊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屠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共产党的报刊一概被查封；国民党左派报刊，有的被查封，有的被改组。蒋介石和国民党右派用各种办法控制报刊，一些报刊也主动投靠蒋介石。一度停刊的上海《民国日报》，在国民党右派的掌握下恢复出版。《时事新报》派专人去南昌，拿了蒋介石“准予照常出版”的手谕回上海。

但是，上海的革命报刊仍然坚持斗争。上海总工会机关报《平民日报》被查封后，改用《满江红》、《孙逸仙》等化名继续出版，还秘密出版《新世界》杂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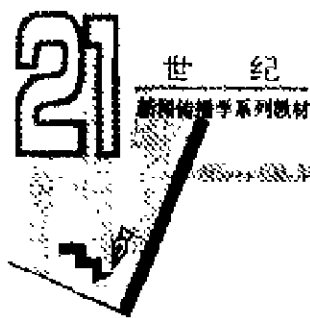
革命报刊的出版中心转向武汉。《向导》、《中国青年》等都迁到了武汉，加上这里原有的《楚光日报》、《汉口民国日报》、《党声》杂志以及工人、农民、青年、妇女等方面的报刊，形成了强大的革命报刊势力。即使国民党左派控制的《中央日报》，它的副刊由孙伏园主编，也保持了一定的进步倾向，曾经转载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郭沫若的著名文章《请看今日之蒋介石》，就是政变前不久在《中央日报副刊》和《革命生活》日刊上发表的。

在陈独秀、彭述之右倾错误控制下的《向导》，宣传了若干错误观点，削弱了它在群众中的影响。而《中国青年》、湖南的《战士》以及许多地方党报，都积极支持工农群众运动，《中国青年》甚至提出“从敌人手中夺取武器来武装自己”的主张。

7月15日，汪精卫在武汉发动了反革命政变。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失败了，革命报刊受到严重的摧残，萧楚女、陈延年、赵世炎等革命报刊活动家、政论家被杀害，《向导》于7月18日出版第201期后停刊，《中国青年》迁回上海，《汉口民国日报》被迫改组。许多革命报刊被查封，或被迫停刊，也有一些转入“地下”，秘密出版。革命报刊繁荣发展的局面遭到了彻底的破坏。

【学习思考题】

1. 简要评述《向导》、《中国青年》等报刊的创办经过及其作用与影响。
2. 中国共产党建立初期党报有何特点？
3. 国共合作后，革命报刊有哪些重要发展？
4. 评述蔡和森、瞿秋白、恽代英、萧楚女、邵飘萍等的报刊活动与贡献。
5. 简要评述新记《大公报》的办报方针。
6. 中国广播事业是怎样产生的？



第八章

十年内战时期的新闻事业

这是新闻事业阵线分明、斗争激烈的历史时期。

大革命失败后，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在全国建立了党办新闻事业网络，控制民营新闻事业，制定了一系列反共反人民的新闻政策法规，推行新闻检查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闻事业被迫转入地下，进行极其艰苦的斗争，但在国民党的残酷镇压和党内三次“左”倾错误的严重影响下，失去了生存条件，几乎被破坏殆尽。

然而，在共产党领导的农村革命根据地，却在人民政权下诞生了新的新闻事业，找到了一条革命事业发展的新道路。

“九一八”事变震动全国，也使新闻界发生剧烈变化，邹韬奋与《生活》周刊、史量才与《申报》，还有许多原先在政治上保守的报刊，都积极投入抗日救亡活动，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呼声迅速传遍全国。这一时期出现的“韬奋精神”和邹韬奋的报刊经验与报刊思想、范长江的旅行通讯作品，都成为中国新闻史上的重要财富。斯诺、史沫特莱等国际友人也运用新闻阵地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

第一节 国民党统治区的新闻事业

一、国民党新闻统制的建立

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和“七一五”反革命政变相继发生后，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失败了。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政权在全国取得统治地位，国民党在全国的新闻统制也随之建立。这种统制表现为：在全国组建国民党新闻事业网络；控制和利用民营新闻事业；制定与实施反共反人民的新闻政策法规；设立新闻控制机构，推行新闻检查制度等。

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利用其统治权力，扩展国民党的新闻事业，在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形成了一个全国性国民党新闻事业网络。这个网络以《中央日报》、“中央社”和“中央广播电台”为核心，集中在南京、上海、北平、汉口等大城市和各省会城市。

《中央日报》，1926年在广州筹办，1927年3月22日在汉口创刊，国民党中央机关报，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顾孟余兼任社长，陈启修（陈豹隐）任总编辑，中文版和英文版各日出一大张。在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的影响下，该报初期曾为国民革命作积极宣传，“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还发表过反对蒋介石和南京政权的文章，但“七一五”反革命政变后，立场骤变，反共拥蒋。不久，国民党中央决定停刊（出至9月14日）。1928年2月1日，在上海出版《中央日报》，国民革命军东路军前敌总指挥部政治部主任潘宜之兼任社长，彭学沛任总编辑。它的发刊词宣布：“本报为代表本党之言论机关，一切言论，自以本党之主义政策为依归。”^①根据国民党中央的决定，上海《中央日报》出至1928年10月31日后停刊，1929年2月1日在南京出版。南京《中央日报》由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叶楚傖兼任社长，严慎予任总编辑。1932年3月，蒋介石委任上海《时事新报》总编辑程沧波为南京《中央日报》社长，并实行社长负责制。程沧波（1903—1990），原名中行，毕业于上海复旦大学，曾任上海《时事新报》总编辑，南京《中央日报》社长，1938年至1941年间任重庆《中央日报》社长时，兼任复旦大学新闻系主任。《中央日报》在形式上成为独立的法人，独立经营，实际上更便于蒋介石直接控制。在编辑、言论、经营管理等方面也进行了革新。

“中央社”（中央通讯社），1924年成立于广州，1927年5月迁南京，由国民

^① 转引自《中国新闻实用大辞典》，300页，北京，新华出版社，1996。

党中央宣传部主管。1932年5月，国民党中央任命萧同兹为社长。萧同兹（1894—1974），原名讳异，号涵虚，湖南长宁人。1927年起在国民党中央党部工作，1932年任“中央社”社长，直至1964年退休。“中央社”实行“工作专业化”、“业务社会化”、“经营企业化”的方针，在各大城市和省会城市设立分社或通讯员办事处，基本上建立了覆盖全国的通讯网，垄断了国内新闻来源。它还“收回”了外国通讯社在华的直接发稿权，同路透社、美联社、哈瓦斯社等外国通讯社签订了交换新闻合同，从而垄断了国际新闻来源。

“中央广播电台”，1928年8月1日开始在南京播音，全称为“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广播无线电台”，呼号为XKM，发射功率500瓦。1932年11月建成新台，呼号改为XGOA，发射功率扩至7500千瓦，为亚洲之冠。

此外，还在几个大城市办了直属国民党中央（由中宣部管理）的报纸：北平的《华北日报》（1929年1月1日创刊），汉口的《武汉日报》（1929年6月10日创刊），天津的《天津民国日报》（1928年6月在北平创刊，年底迁天津），西安的《西京日报》（1933年3月10日创刊），济南的《民国日报》（1928年6月创刊），英文《北平导报》（The Peking Leader，1930年1月10日创刊）等。国民党浙江省党部办的《杭州民国日报》于1934年6月16日更名《东南日报》，成立东南日报股份有限公司，陈果夫、陈立夫分别担任公司的董事长、监事长，该报扩大了发行范围（1946年创办上海版），实际上也成为国民党中央直接控制的报纸。国民党中央还出版了《中央半月刊》（1927年6月17日在上海创刊）。

国民党的地方党报系统、地方广播电台系统和军队报刊系统，也在20年代末、30年代初建立起来了。各省和许多区、县都创办了党报，其中不少是以《民国日报》为名称的，如《安庆民国日报》、《南宁民国日报》、《宁波国民日报》等。“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蒋介石就注意加强其军事宣传机构。1931年3月，在南昌创办了《扫荡三日刊》，1932年6月23日扩版为《扫荡日报》，并附出《扫荡画报》。1935年5月1日迁汉口，改名《扫荡报》，同时刊行《扫荡画报》、《扫荡旬刊》和《扫荡丛书》。

国民党统治区的新闻传媒，大部分是国民党办的，也有一部分是民营的，还有数家外国人在华出版的报刊。对于民营新闻传媒，特别是著名大报，如《申报》、《新闻报》、《大公报》和《世界日报》等，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当局采取的是积极拉拢和严加控制的办法。1929年12月27日，蒋介石致电《大公报》并转全国各报馆，表示尊重民意，欢迎批评，“凡属嘉言，咸当拜纳”。以写评论出名的报人陈布雷，在蒋介石亲自拉拢下，成为他的御用笔杆子。陈布雷（1890—1948），笔名畏垒，浙江慈溪人。1911年任上海《天铎报》主笔。1921

后任上海《商报》编辑主任。1927年2月加入中国国民党，同年10月任上海《时事新报》总主笔。此后，历任国民党政府教育部常务次长、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副部长、蒋介石侍从室二处主任、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副秘书长、“总统府”国策顾问等职。由于对国民党前途失望，于1948年11月13日服药自尽。但是，这只是蒋介石为巩固其统治地位的一种手段，他的根本目的是要建立独裁统治，严格控制新闻宣传。在反共问题上，丝毫没有宽松的余地，在国统区所有公开的传媒上，共产党都被称为“共匪”，而且出现一片“剿匪”声。对于外国人在华的报刊，蒋介石也严密注意，生怕它们捅出中国事态的真相。

为了控制新闻宣传，国民党中央和国民党政府制定了许多专门的政策法规。其中主要的有：1929年1月10日国民党中央公布的《宣传品审查条例》，1930年12月16日国民党政府公布的《出版法》，1931年2月4日国民党政府司法院公布的《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1933年9月21日国民党中央公布的《修正重要都市新闻检查办法》和10月公布的《新闻检查标准》等。还有许多针对广播事业的政策法规，如《广播无线电台条例》（1928年12月）、《限制民营电台暂行办法》（修正案）（1932年1月22日）、《装设无线电收音机登记暂行办法》（1934年1月15日）等。这些政策法规的共同点是，将共产主义和共产党规定为非法，予以严厉取缔。其实质是为了维护国民党的专制统治，剥夺广大人民的言论自由与出版自由。1934年1月24日，国民党第四届第四次中央全会通过的决议案，明确规定国民党的政策是“对全国之新闻界及出版界的有效之统制”^①。

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和国民党政府甚至仿效法西斯主义的做法，实行新闻出版检查制度，由事后追惩改为事先审查，图书杂志要原稿送审。1933年5月起，在南京、上海、北平、天津等城市首先建立新闻检查所，1934年9月10日国民党中央成立新闻检查处，新闻检查逐渐在全国推广。更有甚者，特务、警察横行不法，肆意迫害新闻界、出版界。

二、共产党报刊的艰苦斗争

大革命失败后，共产党成为被捕杀的对象，共产党的报刊一概被取缔。共产党人被迫转入“地下”，冒着生命危险，秘密出版报刊，出版中心仍在上海。

1927年8月21日，中共中央发出通告，要求各级党部努力恢复和加强宣传鼓动工作，积极筹办面向党内和面向党外的报刊。9月、10日间，中共中央由武

^① 荣孟源主编：《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下册，222页，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85。

汉迁回上海后，立即抓报刊出版工作。由于形势的变化，重新出版的报刊不能沿用大革命时期的名称。同年10月24日，《布尔塞维克》创刊，它的《发刊露布》中指出：“谁能解放中国，使中国最大多数的工农贫民自己得到政权，开辟真正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只有布尔塞维克！”^①所以《布尔塞维克》便继《向导》而发刊了。它起初是铅印16开本周刊，曾改出半月刊、32开本月刊，至1932年7月出版第5卷第1期后停刊。中共中央决定，由瞿秋白、罗亦农、邓中夏、王若飞、郑超麟等组成编辑委员会，瞿秋白任主任，后又增加蔡和森、张太雷、毛泽东、周恩来等21人为编委。《中国青年》于1927年7月从武汉迁回上海，10月10日出至第8卷第3期后停刊，11月7日改名《无产青年》续刊，1928年10月22日又改名《列宁青年》，至1932年5月出版第5卷第4期后停刊。

1928年11月20日，中共中央在上海创办《红旗》周刊（后改三日刊），由中央宣传部主编，从第40期起，被指定为“全国政治机关报”，既指导实际斗争，又评述政治形势，而且要面向全国。1930年8月，中共中央决定将《红旗》与《上海报》合并，出版《红旗日报》。《上海报》在当时被称为“全国最好的地方报纸”。它创刊于1929年4月12日，初名《白话日报》，是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办的一张通俗报纸，秘密编印，半公开发行。担任编辑工作的是李求实、谢觉哉、吴永康等。该报以工人大众为主要读者对象，报道工人运动，支持工人斗争，文字通俗易懂，赢得了广大工人群众的信赖。

《红旗日报》于1930年8月15日创刊，在报头旁署有“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机关报”字样，从第162期起改署“中国共产党中央和江苏省委机关报”。1930年10月30日，《红旗日报》又增出独立的副刊《实话》，主要刊载论述党的路线和革命策略的文章，每五天出一期，随《红旗日报》发行。《红旗日报》于1931年3月8日停刊，3月9日中共中央机关报《红旗周报》在上海创刊，出至1934年3月停刊。1932年1月21日，中共中央又在上海创办了一个机关刊物《斗争》，油印，出至1935年7月终刊。

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团体，也秘密出版了一些报刊。1928年12月1日，中华全国总工会在上海秘密复刊《中国工人》，出至1931年停刊。中华全国总工会还出版了《工人宝藏》、《全总通讯》等刊物，存在时间都很短。1930年8月15日，铅印4开报纸《中华苏维埃周报》在上海创刊，是左翼社会科学家联盟等革命团体为准备举行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而出版的，仅见一期。一些地方党组织也出版过“地下”报刊，如湖北省委的《湖北红旗》、《长江》，广东省委

^① 布尔塞维克，俄语 bolshevik 音译，意即多数派。曾以此称呼列宁为首的俄国马克思主义者。

的《红旗》等。

党的“地下”报刊，是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出版的。许多刊物被迫使用伪装封面，如《布尔塞维克》曾用《中央半月刊》、《新时代国语教科书》、《中国文化史》、《少女怀春》等伪装封面；《中国工人》曾用《爱的丛书》、《红拂夜奔》等伪装封面。《上海报》曾改用《沪江日报》、《海上日报》、《天声》等名称刊行。至于工作人员，更是每时每刻都处在危险的环境之中，一些革命者为此献出了生命，如李求实。李求实（1903—1931），又名伟森，湖北武昌人。曾积极参加五四运动。192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3年在江西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编辑《安源月刊》。1924年赴苏联学习，1926年任两广团区委宣传部长，主编《少年先锋》。1927年任共青团中央宣传部长，1929年任《上海报》主编，1930年任《实话》主编。1931年1月在上海租界被捕，2月7日牺牲于龙华，是“左联五烈士”之一。

特别值得提出的是，党的“地下”报刊介绍了列宁的党报思想。《布尔塞维克》第2卷第10期（1929年9月1日）刊载了列宁《从何着手？》一文的有关党报部分，还在多篇文章中介绍列宁关于“集体的组织者”和党报任务的论述。^①中共中央直接领导党报工作，一再强调党报的重要。《红旗日报》的发刊词写道：“在现在阶级社会里，报纸只是一种阶级斗争的工具。”在中国新闻史上，这是对“报纸是阶级斗争工具”观点的最早的明确表述。在党报建设的具体工作中，积累不少有益的经验，其中主要有：

（1）建立党报委员会，全面负责党对报刊的领导。1929年6月25日，中共六届二中全会通过的《宣传工作决议案》中，关于“宣传工作的组织问题”部分有一项决定：“自中央、省委以至有党报的地方党部，都应将党报委员会与宣传部在组织上划分清白。党报委员会在中央以政治局全体委员充当，在省委及地方党部应当以全体常委充当”，“宣传部应与党报委员会发生最密切的关系，但宣传部不能代替党报委员会”^②。

（2）发展通讯员，加强同群众的联系。中共六届二中全会决议案决定：“建立与训练工农通讯员，是地方党部与支部共同应负的责任。”^③1929年下半年和1930年上半年，中共中央两次公布中共党报通讯员条例，从制度上完善通讯员

^① 参见《布尔塞维克党的组织路线——列宁论“党的组织”》，载《布尔塞维克》，第2卷第10期，1929-09-01。

^② 《中共六届二中全会宣传工作决议案》（1929年6月25日），见《中国共产党新闻工作文件汇编》上册，41~61页，北京，新华出版社，1980。

^③ 同上书，53页。

工作。党的报刊将发展通讯员作为联系群众的日常的基础工作，不仅与通讯员建立经常的联系，而且注重培训通讯员，帮助通讯员提高政治素质和业务能力。如《上海报》将《采访须知》发给通讯员，还召集通讯员讨论写稿问题。

(3) 建立发行网，扩大党报影响。中共中央曾采取多种措施，建立自己的党报发行网。如，通过党和革命团体的组织系统发行；动员全体党员担当发行工作责任；把通讯员工作和发行工作结合起来；组建出版部作为专门的发行机构等等。尽管局势险恶多变，发行工作还是取得了成绩的。

由于党内出现三次“左”倾错误路线，对党的工作造成了巨大的损失。在宣传内容上，“左”的错误主要表现为：错误地分析革命形势，鼓吹“直接革命”进攻大城市；否定“中间营垒”的存在，错误地批判中间力量；宣传了错误的斗争策略和口号，如“武装保卫苏联”等。在办报策略上，不注意隐蔽精干，在条件不具备的情况下一味强调公开发行，结果招致更大的损失。在1933年1月，中共临时中央被迫从上海迁至中央革命根据地以后，党的“地下”报刊除一两家偶尔出过一两期以外，可以说基本损失殆尽。

三、革命文化运动中的报刊和鲁迅的报刊活动

在国民党统治区，共产党人和思想文化界的进步人士联合开展了革命文化运动。这个运动的中心在上海，主要阵地是报刊，最早的倡导者是创造社、太阳社和鲁迅支持的社团与刊物。

创造社（1928—1929）是一个文学社团，曾出版《创造季刊》、《创造周报》、《创造日》、《洪水》、《创造月刊》等刊物，提倡“新文学的建设”。1928年1月15日，创造社主办的《文化批判》在上海创刊。它是一个综合性月刊，有社会科学论文，也有文学作品。《文化批判》出至第5期改名《文化》，不久停刊，创造社又先后创办《思想》、《新思潮》等刊物，内容相似。

太阳社（1928—1930）也是一个文学社团，1929年1月在上海创办《太阳月刊》，提倡无产阶级革命文学。

鲁迅支持的社团与刊物主要有：《朝花》，1928年12月6日在上海创刊，鲁迅、柔石主编，后改名《朝花旬刊》，1929年9月末停刊；《未名》半月刊，1928年1月10日创办于北京，1929年5月停刊；《萌芽月刊》，1930年1月1日在上海创刊，鲁迅主编，自第3期改为“左联”机关刊物，第6期改名《新地》，仅出一期即停刊；《奔流》，1928年6月5日在上海创刊，月刊，鲁迅、郁达夫主编，1929年12月出至第2卷第5期停刊；《语丝》，1924年11月17日在北京创刊，1927年10月被查封，1927年12月在上海复刊并由鲁迅主编，1928年12

月改由柔石主编，1930年3月出至第5卷第52期停刊。

为了加强革命文化队伍的团结，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简称“左联”）于1930年3月2日在上海成立，随后中国左翼社会科学家联盟、社会科学研究会、新闻记者联盟、世界语联盟、戏剧家联盟等团体相继成立。

“左联”是影响最大的革命文化团体，它先后出版了《萌芽》、《拓荒者》、《北斗》、《文学导报》、《巴尔底山》、《前哨》、《十字街头》等机关报刊。其他革命文化团体也出版了报刊，如《文化月报》、《文学月报》、《社会科学战线》、《新文化》等。此外，还有一些革命文化团体支持的外围报刊，如《文艺新闻》等。

革命文化团体的报刊，坚持宣传革命的思想文化，但有严重的“左”倾色彩，在国民党专制统治的文化“围剿”下难以生存，大多数只出一两期就遭查禁。只有《文艺新闻》坚持了一年又三个月，是出版时间最长的。

《文艺新闻》是一张4开4版报纸，周刊，1931年3月16日在上海创刊，袁殊^①创办并主编。“这张小报内容五花八门，引人入胜，以中立公正有闻必录的面貌出现，却为‘左联’做了大量的宣传工作”^②。它以读者来信的形式，最早披露“左联”五烈士遇害的消息。发行量从3 000份增至10 000份。1932年6月20日被国民党政府勒令停刊，共出30期。

在革命文化运动中，新闻界是积极的参与者。1931年10月21日，在上海成立中国新闻研究会，“致力于以社会主义为根据的科学的新闻之理论的阐扬”^③。1932年4月12日，该会发表《檄全国新闻记者》，号召全国新闻界要“从研究到行动，负起新闻界对社会所应负的任务”^④。1932年春，该会在《文艺新闻》上出版《集纳》专页。^⑤在此基础上，于1932年3月20日在上海成立中国左翼新闻记者联盟（简称“左翼记联”）。联盟在国内及海外南洋等地发展盟员，并在上海法租界内创办国际新闻社，向国内外报刊供稿，报道的主要内容为抗日活动和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的消息。1934年，联盟曾出版小型报纸《华报》，但刊行时间很短；又出版过刊物《集纳批判》，也仅出4期。1935年，创办中华新闻社，公开发稿。1936年5月，“左翼记联”同各个左翼文化团体一样，为适应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需要而宣告结束。

① 袁殊（1911—1987），原名袁学易，曾用名曾达斋，笔名碧泉。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② 矛盾：《“左联”前期》，载《新文学史料》，1981（3）。

③④ 中国新闻学研究会：《檄全国新闻记者》（1932年4月12日），载《文艺新闻》，第51号，1932-04-18

⑤ 集纳，为英文 Journalism（新闻学）的音译。

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在对革命根据地和工农红军进行军事“围剿”的同时，在国统区进行了文化“围剿”。鲁迅在粉碎文化“围剿”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他是1927年10月3日从广州抵达上海的，由此直至逝世，他始终在上海率领文化大军进行坚苦卓绝的斗争。报刊是他的主要阵地。他主编或支持了多种刊物，其中有公开出版的大型刊物，如《奔流》、《太白》等，而更多的是秘密的或半公开的“左联”机关刊物，如《前哨》、《十字街头》等。他不仅自己写文章，还担任具体编辑、校对工作，甚至为刊物设计封面、安排目录、题写刊名，为刊物写“补白”稿件。所有这些工作，他都认真去做，“补白”文章也是精心之作（如《太白》的《掇簸两》专栏、《中流》的《立此存照》专栏）。他大力支持黎烈文主编的《申报》副刊《自由谈》的革新，支持聂绀弩主编的《中华日报》副刊《动向》。他撰写了大量的杂文，其中不少是传世名篇。他不仅造就独特的杂文风格，而且提出了对杂文的精辟的理论见解，使杂文在中国报刊上不可缺少的重要地位得以牢固确立。

第二节 革命根据地的新闻事业

一、中央革命根据地的新闻事业

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力量被迫从城市向农村转移，在农村开辟根据地，组建工农红军。这是一条新的革命道路，即在农村积聚与发展革命力量，走农村包围城市、夺取全国胜利的道路。革命新闻事业也在这条道路上开始了新的征程，为中国新闻史谱写了新的篇章。

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新闻宣传工作，即使在农村极其困难的条件下，也因地制宜地采取标语、传单、布告、壁报等多种形式，扩大政治影响，争取广大群众。1929年12月，在毛泽东为红军第四军第九次党的代表大会写的决议（即“古田会议”决议）中指出：“宣传工作是红军第一个重大的工作”。决议具体分析了红军宣传工作的现状，对于此后的宣传内容和宣传技术作了详细规定，其中一项是各军及纵队必须办一壁报，名称均为《时事简报》，内容是国际国内政治消息、游击地区群众斗争情形、红军工作情形。要求每周至少出一次，用大张纸写，字要稍大点、清楚点。^①1931年3月，毛泽东以总政治部主任的名义，为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撰写了在红色区域普遍地举办《时事简报》的通令和怎样办《时事简报》的小册子。通令指出，“《时事简报》是苏维埃区域中提高群

^① 参见《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15-22页，北京，新华出版社，1983。

众斗争情绪、打破群众保守观念的重要武器，在新争取的区域对于推动群众斗争更有伟大的作用。因此，本部决定要红军和当地政府普遍地举办起来。”小册子对于《时事简报》的作用、内容和编写方法作了全面的阐释。其中提出，《时事简报》“不做文章，只登消息”，次序应由近及远，数量为本军、本地、近地消息占十分之七，国内、国际消息占十分之三。^①

由于这些指令的贯彻，《时事简报》成为根据地和红军初创阶段的主要新闻宣传阵地。1931年9月，中央红军取得第三次反“围剿”的胜利，赣西南、闽西根据地连成一片，形成以江西瑞金为中心的中央根据地。11月7日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即中央工农民主政府）。由此至1934年9月红军长征前夕的三年中，中央根据地迅速创建与发展新闻事业，初步形成了人民政权下的新闻事业系统，其主要机构是红色中华通讯社、《红色中华》报、《青年实话》和《红星报》等。

红色中华通讯社，简称“红中社”，是临时中央政府机关通讯社，1931年11月7日在瑞金成立，广播呼号为CSR（Chinese Soviet Radio），每日发稿一二千字，主要为临时中央政府文告、宣言、红军战报和根据地建设消息。还利用红军电台抄收国民党“中央社”电讯和外国通讯社英文稿，经编辑后油印为“参考消息”（曾用名《无线电材料》、《每日电讯》），供中央机关参阅。1934年10月随红军长征，途中新闻广播中断，但抄报未停，1935年11月在陕西瓦窑堡恢复新闻广播。

《红色中华》报，1931年12月11日在瑞金创刊，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机关报^②，也是我国在人民政权下创办的第一份中央报纸。铅印4开，一般为4至6版，有时增至8至10版。初为周刊，第149期起改为双日刊，1934年10月3日出版第240期后，随红军长征暂告停刊。^③史称这一时期该报为《红色中华》瑞金版。瑞金版发行量初期为数千份，后来超过1万份，最多时达4万份。《红色中华》报和红色中华通讯社是一家，即同一个机构，担负出版和通讯工作两重任务。负责人先后有周以栗、王观澜、杨尚昆、李一氓、沙可夫（陈微明）、瞿秋白等。

《青年实话》，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苏区中央局机关刊物，1931年7月1日

^① 参见《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26～33页。

^② 《红色中华》从第150期（1934年2月16日）起，删去“临时中央政府”的“临时”二字。

^③ 1984年江西瑞金革命纪念馆发现一期《红色中华》报，为1935年1月21日出版的第264期。此时该报在赣南出版，由中共中央分局和苏维埃中央办事处主办，中央分局宣传部长瞿秋白主编。如称此时为赣南版，该版至少已出24期。

在江西永丰创刊，总编辑部设在江西于都，总发行所设在福建长汀，1934年5月都迁至瑞金。陆定一、魏廷群先后任主编。初为半月刊，后改旬刊、周刊、五日刊，初为32开小册子，后为8开4版。发刊词提出：“力求文字作风的青年化大众化。”该刊发行量起初为8000份，后增至20000份，最高达30000多份。红军长征前夕停刊，现在所见最后一期为1934年9月30日出版的第113期。

《红星报》，中国工农红军军事委员会机关报，由红军总政治部主持出版，1931年11月7日在江西瑞金创刊。1933年5月后，邓小平任主编，1935年1月遵义会议后，陆定一接任主编。铅印4开报纸，初定为五日刊，实际有时两天出一期，有时半月出一期，还出过“号外”。一度出过32开本小册子。1933年增出《红星副刊》。发行量曾达到17000份。红军长征后，随军出版，但改为油印，每期印七八百份发至连队。1935年8月3日停刊。

此外，还有《斗争》（1933年2月创刊），中共苏区中央局机关报，主要刊载中共中央决议和中央负责人文章，发表过毛泽东的调查报告和张闻天的文章；《苏区工人》（1933年前后），中华全国总工会苏区中央执行局机关报；《少年先锋》（1932年1月创刊），苏区少年先锋队中央总队部机关刊物；《时刻准备着》（1933年10月创刊），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苏区中央儿童局机关报；等等。

二、其他革命根据地报刊和红军报刊

经过五年多的艰苦斗争，特别是中央根据地粉碎了四次军事“围剿”之后，到1933年下半年，中国共产党领导工农红军先后在14个省的边界地区开辟了十多个革命根据地。各根据地都建立了人民政权，出版了当地党政军机关和群众团体的报刊。但是，这些报刊绝大多数已在战火中被毁或散失，现有材料极少。

湘赣根据地的主要报刊有：中共湘赣省委机关报《湘赣红旗》，半月刊，1931年底创刊，1933年7月改名《湘赣斗争》；省苏维埃政府机关报《红色湘赣》（1933年创刊）和《红色湘赣副刊》（1934年创刊）；省军区政治部的《湘赣红星》；共青团省委机关报《列宁青年》等。

闽浙赣根据地的主要报刊有：省委机关报《突击》；省苏维埃政府机关报《工农报》和《红色东北》；省军区的《红星报》和《前线》；省工会的《工人特刊》；共青团省委的《列宁青年》和《青年实话》；省互济会的《互济生活》等。这些报刊中，《工农报》影响最大，方志敏曾为它写社论。《工农报》、《列宁青年》等曾被列为学校教材。此外，一些地区也出版了报刊，如信江特委的《红旗报》，闽北分区的《红色闽北》等。

湘鄂西根据地的主要报刊有：中共湘鄂西分局机关报《红旗日报》（1931年

创刊)和《布尔什维克》周刊;省苏维埃政府机关报《工农日报》(1931年创刊);共青团省委机关报《列宁青年》等。其中影响最大的是《红旗日报》和《工农日报》,前者为油印4开小报,每期发行两千多份,后者也是4开小报,有时油印,有时石印。

鄂豫皖根据地的主要报刊有:中共鄂豫皖省委机关报《列宁报》(1930年底创刊,周刊);省苏维埃政府机关报《鄂豫皖苏维埃报》(1930年创刊);中共鄂豫皖分局主办机关报《红旗》;共青团鄂豫皖中央分局机关报《少年先锋》及儿童局的《赤色儿童》等。

川陕根据地的主要报刊有:中央川陕省委机关报《共产党》(1933年创刊,三日刊);川陕苏维埃政府机关报《苏维埃》(1933年创刊);川陕省总工会机关报《斧头》等。

琼崖根据地的主要报刊有:中共琼崖特别委员会宣传部主办的《琼崖红旗》(1930年创刊);琼崖苏维埃政府和乐会县苏维埃政府的《工农兵报》(1929年创刊);共青团琼崖特委宣传部主办的《团的生活》(1931年创刊);少年先锋队琼崖总队部的《赤光报》(1931年创刊)等。

红军各部队也出版了一批报刊,主要有:红军第一方面军总司令部主办的《红色战场》(1933年,油印,32开);红四方面军总政治部主办的《红军画报》;红三军团的《红军日报》(1930年7月29日创刊于长沙,8月4日停刊,是红军报刊中惟一的铅印对开日报);红三军团政治部主办的《火线》(1933年1月创刊);红二军团政治部主办的《红星》报;红四军的《红旗》;红五军的《工农兵》报,红七军的《右江日报》;红八军的《工农兵》报;红九军的《不战不休》;红三十军的《赤化全川》;红三十一军的《红星》;红军西北军区政治部的《战场日报》(1933年1月创刊,8月改名《红军》报);湘赣省军区的《湘赣红星》;闽浙赣省军区的《红星报》;鄂豫皖省军区的《红色战士》等。

三、革命根据地新闻事业的特点和意义

革命根据地的新闻事业,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政权下创建的党和人民的新闻事业。它与国民党的官办新闻事业根本对立,与国统区的共产党地下报刊也有所不同。它是党和人民大众的喉舌,是苏区人民用以巩固工农民主政权、争取中华民族解放与人民革命胜利的锐利武器。虽然当时它还处于初生状态,很粗糙很不完整,但它已经形成一些特点,并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它的出现,揭开了中国新闻史的新的一页,具有重大意义。

（一）革命根据地新闻事业的特点

1. 适应实际工作需要，围绕中心工作开展新闻宣传

中央根据地和各根据地争取革命战争胜利，巩固革命政权，扩大根据地，关键是打赢革命战争。因此，“一切为了前线”成为所有新闻传媒的报道与宣传中心。《红色中华》介绍政权建设的情况和经验，号召节省开支，支援前线。红中社的工作人员还带头自己种菜，节约粮食和伙食尾子，捐献衣物和部分津贴，送给前方战士。青年报刊号召男青年踊跃参军，女青年多做军鞋。少年儿童报刊动员读者多积肥，多种南瓜。各种报刊都着眼于指导当前的实际工作，但不是千篇一律，而是各有特色，各有自己的视角。

2. 密切联系群众，依靠群众办报

根据地的新闻机构，工作人员都很少。红中社仅有12个人，一半编报，一半办新闻台。红军总政治部主办的《红星报》编辑部只有三五人，湘鄂西《红旗日报》也只有6个人。依靠群众办报（社），成为根据地新闻事业发展的必由之路。首先是大力发展通讯员。《红星报》有通讯员五百多人，其他各报也都有自己的通讯员队伍。为了培养通讯员，《红色中华》在报上辟有《写给通讯员》专栏，出版《工农通讯员》刊物，还将列宁关于“集体组织者”的名言印在毛巾上，发给通讯员作纪念品。其次，广泛听取读者意见，采纳读者建议。《红色中华》的《读者通讯》专栏和《赤焰》副刊就是根据读者建议开辟的。再次，吸收优秀通讯员参加报纸工作。

3. 开展批评与表扬

《红色中华》有批评专栏《黑报》，也有表扬专栏《红匾》，还有进行社会监督的专栏《突击队》。《青年实话》也有专栏《轻骑队》，该报表扬与批评并重，如扩大红军的宣传报道，既批评“不报名不散会”的做法，又表扬积极支持亲人参军的妇女。

4. 文字通俗，形式活泼

根据地所有的新闻宣传都是用白话文写作，力求工农兵读者能看懂，不识字也能听懂。许多报刊还设有山歌、谜语、游戏、科学知识等专栏。曾任湘鄂西《工农日报》主编的谢觉哉曾说：“以前文告是给知识分子看的，尽可掉文，现在的文章是给工农群众看的（知识分子也在内），许多文语不可再用，要用也要经过工农群众了解或改造之后。”^①

但是，根据地新闻事业也受到“左”倾错误路线的影响，1933年1月中共

^① 《谢觉哉日记》，1943年3月7日，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

临时中央局进入中央根据地后，“左”的色彩更为浓重。如分析形势时，称“国民党惊恐万状”；在干部政策上，报刊用公开点名的办法，打击了一些抵制“左”倾的干部；在文风上，《红色中华》出现“布尔什维克式的春耕”一类提法，《突击队》专栏先后更名《铁棍》、《铁锤》、《无产阶级铁锤》。

（二）革命根据地新闻事业的意义

1. 根据地新闻事业是在人民政权下创建的，是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领导新闻事业的开端

中国共产党主办和管理新闻事业，在实践中积累经验、完善措施、培育干部、准备资财，从此起步，经过二十多年的艰苦奋斗，终于在全国取得胜利。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时，中国共产党已经有执政党办新闻事业的经历，这是俄国十月革命所不具备的条件。

2. 开创一条革命新闻事业发展的新道路，即城市—农村—城市的道路

新闻事业主要在城市发展，这在全世界是普遍现象。中国农村在经济与文化上相当落后，根据地所在的边界地区条件更差。中国共产党的新闻事业在农村中宣传先进的革命思想、传播文化科学知识、沟通当代社会信息，使农村迅速发生深刻变化，这在中国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

3. 继承和发扬了列宁的党报思想

列宁的名言“报纸不仅是集体的宣传员和集体的鼓动员，而且是集体的组织者”成为根据地报刊工作者的行动口号，并在实际工作中得到贯彻实现。根据地的党和政府都重视通过报刊动员、组织人民群众投入革命斗争和做好各项工作。根据地报刊注重用具体事例进行宣传鼓动，大力开展批评与表扬，都体现了列宁的党报思想。

以瑞金为中心的根据地时期，其存在时间仅有三年，又处于战争的环境中，新闻事业开创了一个全新的局面。但这仅仅是开头，有些方面还显现了它的幼稚性^①。

^① 例如：1933年12月11日，《红色中华》第134期刊载郑茂德偷骡子的报道，其中有“回来就与少共中央局的某些同志大吃馆子”一句，与事实不符，《红色中华》在第135期（12月17日）作了“重要更正”。但是，《青年实话》编辑部竟在该刊第3卷第4号（12月17日）上，用四号字称《红色中华的造谣》，指责中央机关报。中共中央宣传部于12月29日做出《关于〈青年实话〉的决定》，指出《青年实话》是“诬蔑中央政府的机关报，企图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局的《青年实话》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的《红色中华》对立起来。中央宣传部认为这是绝不能容许的现象，特给《青年实话》编辑部以严重警告，并于《红色中华》与《青年实话》上公布这一决定”。两报分别于1933年12月31日和1934年1月1日刊载了这一决定。

第三节 抗日救亡运动中的新闻事业

一、共产党的新闻事业积极宣传抗日救亡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加紧侵略中国。中国人民奋起抗日救亡，相继爆发了“一·二八”淞沪抗战、“一二·九”学生运动、“西安事变”等抗日怒潮。中国共产党的新闻事业站在抗日救亡运动的最前列，积极宣传团结御侮，一致对外。

在革命根据地，《红色中华》等报刊及时刊载共产党和苏维埃政府有关抗日的决议、宣言，反映人民群众的抗日呼声。红军长征，《红色中华》停刊。红军到达陕北后，《红色中华》于1935年11月25日在瓦窑堡复刊，史称陕北版，该版为油印4开周三刊。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发生后，蒋介石被迫接受停止内战、联共抗日的条件，中国开始实现从国内战争到抗日战争的转变。为了团结各种力量，形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红色中华》从1937年1月29日起改名《新中华报》。红色中华通讯社也于1937年1月改名新华通讯社（简称新华社），两者同时迁至延安。1937年4月24日，中共中央政治理论机关刊物《解放》在延安创刊，铅印16开本，初为周刊，后改为半月刊。

在国民党统治区，共产党的新闻宣传活动迅速恢复，地下党组织在北平创办了《华北烽火》（1935年12月4日创刊）、《长城》（1936年6月20日创刊）、《国防》（1935年11月创刊）等报刊。共产党积极支持学生组织和救亡团体出版报刊，积极支持进步报刊的抗日救亡宣传。如共产党员恽逸群^①担任上海《救亡情报》编委。

为了开展在海外的宣传工作，共产国际中共代表团根据中共中央指示，创办了《救国报》。该报于1935年5月15日创刊，报头署社址为法国巴黎，实际编辑部设在莫斯科，在莫斯科编辑、排字、打纸型，航空寄往巴黎印刷发行。该报以宣传反法西斯和建立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宗旨，廖焕星（中共代表团秘书）、李立三、陈潭秋先后任主编，吴志坚、饶漱石等先后主持印刷发行。该报初为半月刊，后改为周刊，曾在天津《大公报》上刊登广告称是“唯一铅印的西欧侨胞的喉舌”^②。该报1935年10月1日出版的第10期上，首次发表了中国共

^① 恽逸群（1905—1978），原名钥勋，笔名翊勋，江苏阳湖（后并入武进）人。1926年参加中国共产党，长期从事新闻工作，曾兼任华东新闻学院院长、复旦大学新闻系主任。

^② 天津《大公报》，1935-06-21。

共产党的《八一宣言》。国民党政府要求法国政府停邮该报。11月中旬，该报出版第16期时，接法国政府停邮通知。共产国际中国代表团派吴玉章赴巴黎交涉后，于12月9日改名《救国时报》在巴黎重新创刊，仍为中共在海外办的机关报，面向海外华侨和国内民众，设有《民族出路问题论坛》、《救国阵地》、《侨胞生活》、《祖国消息》等专栏。曾大力报道“一二·九”学生运动和“一二·八”淞沪抗战，还介绍过中央革命根据地和红军长征情况。发行至43个国家与地区，国内的北平、天津、上海、西安等大中城市和东北、新疆等地都有读者。发行量达两万多份。1938年2月10日出至第152期后暂时停刊，同年8月迁往美国纽约，与中共主办的《先锋》周报合并，1939年10月停刊。

二、国民党统治区新闻界的变化

在“九一八”事变之前，日本侵略者在中国国土上屡次挑起事端，已经引起中国舆论界的关注和抗议。如1931年6月和7月，日本侵略者制造“中村事件”和“万宝山惨案”后，邹韬奋在《生活》周刊上连续发表几篇文章指出：这是“日本侵略中国的一部分表现”，“不可视为一时一地的事情”，希望全国人民“众志成城，可寒贼胆，民族惨祸，必可获免”。上海《申报》也谴责了日本的侵略行为。

1931年9月18日，日本侵略者制造柳条湖事件，大举进攻沈阳，全国为之震惊。全国各地的报刊都对事变作了报道，《申报》在时评中提出“应为维护国家维护民族，而作自卫之背水战”的主张。上海《时事新报》连续发表十来篇社论，评述中日关系，反对日本侵略。上海《新闻报》也刊载了主张抗日的报道与言论。

但是，主张抗日的舆论却没有得到国民党当局的支持。在全国人民，特别是青年学生请愿要求抗日的时候，蒋介石要于右任打电报给张季鸾，要《大公报》主张“缓抗”。《大公报》发表了一些评论，主张“镇静应付”，寄希望于国际联盟干预和美苏表态。这类言论引起读者不满，报馆曾被掷炸弹，张季鸾收到过装有炸弹的邮包。然而，《大公报》毕竟看重国家利益，也发了一些要求抗日的消息、通讯和评论。至于国民党的党办报刊，当然是在严密控制之下，口径一致地为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辩解，但也不能全然无视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罪行和全国人民要求抗日的怒涛，只得采取两面照应，一方面七折八扣地报道日本的侵略活动，另一方面又竭力制造舆论，企图把人民的抗日呼声压下去。它们以“诉之国联”，“待公理之裁决”为宣传重点，掩盖对日妥协政策的实质，企图将人们的视线引向“剿共”，结果却反而激起民众的公愤，国民党的《中央日报》就被群众

捣毁过。

“九一八”事变激起中国人民抗日救亡宣传的高潮，四个多月后的淞沪抗战宣传把这个高潮推向了顶峰。1932年1月28日，日本侵略军进攻上海，十九路军在全国人民的声援下奋勇抵抗。上海和全国新闻界全力支持十九路军，报刊除了出版增刊、特刊和画刊进行宣传鼓动外，还做了大量的组织工作，如募集捐款、开办伤兵医院、抚恤阵亡将士家属、救济难民等。声势浩大的抗日救亡宣传冲破了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的舆论沉寂局面，同时也使新闻界自身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其中最为突出、具有重要意义的是邹韬奋和《生活》周刊、史量才和《申报》的变化。

史量才（1880—1934），名家修，原籍江苏江宁，后移居松江（今上海市）。他是一位很有作为的新闻事业家，从1912年接办《申报》后，在企业化经营方面取得引人注目的成效，但在政治上却是保守的。大革命失败后，在史量才主持下的《申报》上也出现了“共匪”一类字眼。但《申报》唱的是低调，史量才在打主意发展他的事业，甚至想建立英美式报业托拉斯。1927年他购进了《时事新报》的部分股票，1929年他又要购进《新闻报》的股票，却受到了强烈的抵制。实际上是国民党当局使他的托拉斯构想失败。但他在事业上的雄心仍在，还要搞改革。就在股票风波后不久，他邀请黄炎培、陶行知、戈公振等参加《申报》工作，共商革新大计。1931年9月1日发表《本报六十周年纪念宣言》，宣布自即日起的一年为纪念年，提出了奋斗目标。但是，十多天后就发生了“九一八”事变，继而又有淞沪抗战。

骤变的形势使《申报》的纪念活动中断了，却深刻地教育了史量才，民族危亡的严酷事实和救亡运动的爱国激情，使他认清了蒋介石对日妥协和“攘外必先安内”政策的危害，毅然赞同团结抗日的主张。史量才和《申报》出现了一些出人意料的果断举动，如1931年12月20日，上海各家日报（除《民国日报》外）在史量才策划下，同时刊载《宋庆龄为邓演达被害宣言》；1932年6月30日发表时评《剿匪》，7月2日和4日又发表两论和三论，矛头直指蒋介石；淞沪抗战期间，史量才带头发起组织上海地方维持会，并被推选为会长，等等。1932年11月30日发表《六十周年革新计划宣言》，宣布12项革新措施，还强调需要“社会大众的伟力”来推进新闻事业。

《申报》纪念六十周年的革新活动，可以归纳为以下各项：一是加强新闻，改进本埠新闻报道，在南京、汉口等29个城市设分馆，增加各地通讯；二是改革副刊《自由谈》，把它办成具有时代性的思想文化园地，这项改革措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特别是推动了杂文的发展，鲁迅用四十多个笔名在该刊上发表了一

百四十多篇杂文；三是改进副刊和增刊，以适应各种类型读者的需要，它的副刊和增刊有综合性的（如《业余周刊》）、文艺性的（如《春秋》）、知识性的（如《医学专刊》）各自特色鲜明；四是出版书刊，有《申报月刊》、《申报年鉴》、《中华民国新地图》等；五是兴办社会文化事业，有流通图书馆、新闻函授学校、业余补习学校、申报服务部等。由于这些措施的实行，申报馆成为一个以报纸为中心的庞大的文化事业群体。

史量才和《申报》的变化为社会所瞩目；而在国民党当局看来，这些变化意味着《申报》脱离它的控制，这是不能容许的。在软硬兼施（包括蒋介石亲自同史量才谈话）都未能奏效的情况下，便下了最后的毒手——1934年11月13日下午，史量才偕夫人、儿子由杭州乘自备汽车回上海，行至海宁县翁家埠附近时，遭特务枪击，史量才当场身亡。

三、抗日救亡宣传的广泛开展

史量才被暗杀，是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当局用极端手段维护其新闻统制、严防失控的一个案例。在此前后还发生过邹韬奋被迫出国流亡、“新生事件”以及多名新闻工作者被捕或被杀的事件（在江苏南通刘煜生被处决^①）。显然，国民党当局的意图是遏制乃至扑灭抗日救亡宣传。

由“九一八”事变激起的抗日救亡宣传，经历了1931年和1932年的迅猛发展而遍及全国。但从1933年至1935年上半年受到压制。“一二·九”运动爆发后，抗日救亡宣传随之出现新高潮。

站在斗争前列的是学生报刊。燕京大学的《燕大周刊》在1935年12月初发表埃德加·斯诺的长达万言的通讯《毛泽东访问记》，使许多青年第一次了解到中国共产党及其领袖的情况。学生运动起来以后，《燕京周刊》增出了十多期《一二·九特刊》。北平市学联出版了《学联日报》，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也出版了报刊。

学生的爱国运动很快从北方传到南方，以至全国各地。邹韬奋主持的上海《大众生活》、香港《生活日报》都以宣传抗日救亡为主旨。一批同邹韬奋、生活书店有密切关系的刊物也在抗日救亡宣传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如1934年创刊的《世界知识》，1936年创刊的《永生》、《现世界》、《新认识》等，都是爱国救亡运动的积极宣传者。这些刊物的具体任务和读者对象各不相同，但在“一二·九”

^① 江苏南通《江声报》经理兼主笔刘煜生，于1933年1月21日被处决，参见《〈江声报〉经理刘煜生被枪决案》，载《生活》周刊，第8卷第5期，1933-02-04。

后都结合自己的特点，以抗日救亡为宣传中心。以李公朴主编的《读书生活》为例，它是以“提倡读书”、“把读书融化在生活中”为目标的，它发表的艾思奇的《哲学讲话》、薛暮桥的《经济常识讲话》、高士其的《科学小品》等，都为广大读者所喜爱。“一二·九”后，它积极支持学生运动，批评胡适要学生关门读书的主张，1936年1月开始在封面上标明：“生活斗争，民族解放，理论指导的半月刊。”同时，把“信箱”专栏改称“救亡信箱”。

全国各地救亡团体创办了不少报刊。如北平的《华北呼声》，上海的《救亡情报》等。这些报刊发表救国会的文件，报道救亡活动情况，反映人民群众强烈的抗日要求。还有一些学术、文艺刊物，如上海的《中国农村》月刊，北平的《盍旦》月刊、《光明》半月刊等，或从理论上、或以艺术形象“尽救亡之责任”。

1935年9月20日，成舍我主办的《立报》在上海创刊。它是一张4开小型报纸，实行精编方针，以较小的篇幅承载较多的内容，售价低廉，力求使读者“能读、必读、爱读”。由于有爱国进步人士和中共地下党员参加工作，《立报》也积极宣传抗日救亡。《申报》在史量才遇害后态度趋向保守，不敢得罪国民党当局，但在“一二·九”运动爆发后的第四天，即12月12日，发展题为《学生运动之复兴》的时评，表示赞同学生的行动。天津《大公报》也发表了主张抗日的言论，从1935年5月10日起刊发范长江的《旅行通讯》，影响深远。有些国民党的地方报纸也同情学生运动。

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发生。西北抗日联军接管了国民党的《西京日报》，利用其资财设备，创办《解放日报》，12月13日创刊，为对开铅印大型报纸。中共地下党组织派韩进、魏文伯参加该报工作。该报真实地报道了“西安事变”的全过程，反映西北抗日联军和各界人士、广大民众的抗日要求，呼吁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1937年2月10日，出至第57期后停刊。“西安事变”震惊全国，全国新闻传媒都作了报道，其中《大公报》12月18日社评《给西安军界的公开信》，颂扬蒋介石，要张学良、杨虎城向蒋介石“谢罪”。这篇社评被国民党当局翻印成传单，用飞机在西安散发。但是，团结抗日的潮流不可阻挡，全国绝大多数新闻传媒都进入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四、邹韬奋的报刊活动与“韬奋精神”

邹韬奋（1895—1944），原名恩润，笔名韬奋。原籍江西余江，生于福建永安。1912年到上海，在南洋公学学习，1919年9月转入上海圣约翰大学文科学习，主修西洋文学，辅修教育等。1921年毕业后，在上海纱布交易所任英文秘书，1922年任中华职业教育社编辑股主任，主编《教育与职业》月刊。该社于

1925年10月11日创办《生活》周刊，王志华主编。1926年10月，邹韬奋接任《生活》周刊主编。由此开始，他毕生从事新闻出版工作。

《生活》周刊初期只印1 000多份，大多数是分赠职教社社员。邹韬奋接编的首期——第2卷第1期（10月24日出版），就新辟了《信箱》专栏，随后不断充实内容，革新版面，第2卷第47期（1927年9月25日）起，开辟《小言论》专栏，1928年发行量达40 000份。

1931年“九一八”事变前后，邹韬奋的思想发生了明显而深刻的变化。他从大学走上工作岗位的最初数年，关心的是“职业教育”和“青年修养”。接编《生活》周刊后，关心社会问题，但目标仅是“力求政治清明”与“实业振兴”^①，“九一八”以后，他迅速走出改良主义幻想的圈子，投入抗日救亡的洪流，而且在胡愈之等进步人士的帮助下开始学习革命理论。他写了大量慷慨激昂的“小言论”，每期《生活》周刊上都有，有时一期登三四篇。1932年1月9日，他宣布《生活》周刊“最近已成为新闻评述性质的周报”^②。“一·二八”淞沪抗战爆发后的第二天，《生活》周刊出版了两期“紧急号外”，报道战地消息，鼓舞军民斗志。1月30日，又出版“临时紧急特刊”，发表《痛告全国同胞书》。《生活》周刊在1932年年底发行量达到155 000份，创当时全国期刊发行的最高纪录。

对于邹韬奋和《生活》周刊的变化，蒋介石和国民党当局大为不满，曾派胡宗南同邹韬奋谈话，要他“拥护政府”。邹韬奋据理反驳，但预感到《生活》周刊可能被扼杀，便于1932年7月建立生活书店，与生活周刊社分开，以保存实力。同年10月，他写了《与读者诸君告别》一文备用。1933年6月18日，民权保障同盟总干事杨杏佛被特务暗杀，邹韬奋也被列入黑名单。他被迫于7月14日离开上海，出国避祸。同年12月8日，国民党政府下令查封《生活》周刊。16日，《生活》出版了最后一期并刊登了邹韬奋在一年前写的告别文章。

1934年2月10日，《新生》周刊在上海创刊，杜重远主编。杜重远（1898—1944），祖籍广东顺德，生于吉林怀德。曾留学日本，回国后创办沈阳肇新窑业公司，任奉天省总商会会长。“九一八”事变后参加抗日救亡运动，被聘为《生活》周刊特约撰述。1934年任《新生》周刊主编。1935年“新生事件”中入狱。1936年9月出狱后，赴西安。1939年任新疆学院院长，1945年6月13日被盛世才虐杀于狱中。该刊在内容上和形式上都是《生活》周刊的继续，只是《小言

① 《本刊与民众》，载《生活》周刊，第2卷第21期，1927-03-27。

② 韬奋：《我们最近思想和态度》，载《生活》周刊，第7卷第1期，1932-01-09。

论》专栏改名为《老实话》。发行量达10万份。《新生》周刊第2卷第15期（1935年5月4日）上，发表易水（艾寒松）的杂文《闲话皇帝》，其中说到日本天皇是个生物学家，做皇帝是为了统治的需要，否则，他在生物学上会有更多成就。日本驻上海总领事借口此文“侮辱天皇，妨害邦交”，要求国民党政府查处。国民党政府接受日本的无理要求，于6月22日查封《新生》周刊，杜重远被判刑一年又两个月。这就是“新生事件”。

从1933年7月至1935年8月，邹韬奋游历和考察了意大利、英国、瑞士、法国、比利时、荷兰、德国、苏联和美国。在英国，他去图书馆看书；在苏联，他去莫斯科大学听课；在美国，他调查了黑人的生活；他还研究了西方的新闻事业。他进行实地考察，又认真读书，还写了30多万字的国外通讯，在《生活》周刊和《新生》周刊上发表，后汇集成《萍踪寄语》。他收集了许多素材，准备回国后撰写成文。

当邹韬奋在国外得知杜重远入狱的消息后，他就急于回国。1935年8月27日，他回到上海，下船后没有回家，就直接去监狱探望杜重远。随后，即着手筹办新刊物。11月16日，《大众生活》在上海创刊，16开周刊。他在创刊号上发表《我们的灯塔》一文，提出以“力求民族解放的实现、封建残余的铲除，个人主义的克服”为三大目标。北平传来“一二·九”运动的消息，他不仅在刊物上立即支持学生的正义运动，还寄了几千份《大众生活》给北平市学联。该刊发行量达20万份，又创全国期刊发行的最高纪录。1936年2月29日，国民党政府查封了《大众生活》周刊。3月7日，生活书店创办《永生》周刊，作为《大众生活》周刊的继续。该刊由金仲华主编，出至6月27日被查封，共出17期。

1936年3月初，邹韬奋被迫出走香港。6月7日，他主办的《生活日报》在香港创刊，这是他一生中主编的惟一一张日报。他在发刊词中宣布：“本报的两大目的是努力促进民族解放，积极推广大众文化，这也是从民众的立场，反映全国民众在现阶段内最迫切的要求。”与该报同时创刊的有《生活日报星期增刊》。该报出至7月31日自动停刊，拟迁上海出版。但国民党政府不予登记，结果只能出版《生活星期刊》，1936年8月23日创刊，周刊，邹韬奋任主编兼发行人。11月23日，邹韬奋和其他6位救国会负责人沈钧儒、李公朴、沙千里、史良、章乃器、王造时等同时被捕，史称“七君子”事件。他们在狱中8个月，邹韬奋除出庭受审外，就致力于读书和写作，完成著译文稿三十多万字。

邹韬奋毕生从事新闻出版工作，主办过7个报刊（包括此后的《抗战》、《全民抗战》、香港《大众生活》），他既担任主编，又是主要作者，还要管经营，积累了丰富的报刊工作经验。他还提出了许多卓有见地的办报主张，特别是主编

《生活》的一系列论述，构成了一套较为完整的报刊思想。他的报刊思想和实践经验有着鲜明的特色，这就是“韬奋精神”。

什么是“韬奋精神”？毛泽东说：“热爱人民，真诚地为人民服务，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就是韬奋先生的精神，这就是他之所以感动人们的地方。”^①这是对“韬奋精神”的精辟诠释。由于体现了这种精神，邹韬奋所办报刊，个个受到人民群众的欢迎。而在他的亲身体验基础上形成的报刊思想，是一种切合中国实际的人民报刊理论。有关论述很多，以下列举的是其中的几个重要的方面。

第一，报刊是人民的耳目喉舌，应该成为实现民族解放大众解放大目标的工具。

1928年，邹韬奋指出：“生活周刊是以读者的利益为中心，以社会的改进为鹄的。”^②那时，他关注的是职业教育和青年修养。“九一八”以后，他积极投入抗日救亡运动，向《大众生活》周刊的读者宣布：“我们不是为本刊而办本刊，只不过把本刊作为努力于我们的大目标的一种工具。”^③这里所说的“大目标”，就是“民族解放大众解放”。1936年，他宣布《生活日报》是“人民的报纸”，“本报的两大目的是努力促进民族解放，积极推广大众文化”^④。他指出：《生活日报》的“新闻要完全作人民的喉舌，新闻要完全作人民的耳目”，“本报可以容纳各种不同甚至相反的主张，但是不能一步离开抗敌救亡的大目标”^⑤。1941年，他在为《新华日报》创刊三周年写的纪念文章中指出：“舆论机关的重要任务一方面在领导社会，一方在能反映社会大众的公意，这两方面是要融合贯通、打成一片的。一个报纸对社会能引起领导作用，绝对不是由于它要怎样便怎样，必须由于它能灵敏地意识到社会大众的真正要求，代表着社会大众的真正利益，在这个立场上，教育大众，指导大众。”^⑥

第二，报刊要成为读者的“好朋友”，真诚地为读者服务。

邹韬奋接编《生活》周刊之初，就提出要“以文会友”，作者读者“精神可以连合为一”，刊物要成为读者“极好的朋友”。尔后多次强调这一主张，直到他的最后遗著《患难余生记》的最后一段，还恳切地要求读者把他主持的新闻出版事业视为“最可靠最亲爱的好朋友”。他自己对此身体力行，同广大读者建立了

① 延安《解放日报》，1944-11-22。

② 《〈生活周刊〉究竟是谁的？》，载《生活》周刊，第4卷第1期，1928-11-18。

③ 《永生》，载《大众生活》，第1卷第4期，1935-12-07。

④ 《创刊词》，载《生活日报》，第1号，1936-06-07。

⑤ 《〈生活日报〉的创办经过和发展计划》，载《生活日报》（香港），第55号，1936-07-31。

⑥ 韬奋：《领导与反映》，载《新华日报》，1941-01-01。

极为亲密的关系，把读者的事看做自己的事，“与读者的悲欢离合、甜酸苦辣打成一片”^①。为读者“竭我智能，尽忠代谋”^②，而读者也以他为良师益友，向他倾诉衷情，同他商量问题，托他代办事情，亲如家人。他一有号召，读者群起响应，他遇到困难，读者群起支援，他受到迫害，读者群起掩护，留下不少动人的故事。在邹韬奋看来，要成为读者的“好朋友”，最重要的是关心读者的需要，办好报刊，同时也要同读者建立经常的联系，努力为读者服务。关于后者，邹韬奋采取的主要方式是：认真处理读者来信——作为主编的邹韬奋，每天都要亲自看信、复信，即使由别人代写的回信，他也要亲自看过，签上名以后才发出；办好《信箱》专栏；热情接待读者来访；读者委托代办的事情尽力办到。

第三，办报刊要有创造精神，造成报刊的个性或特色。

邹韬奋在《经历》一书总结自己办报刊的体验时指出，有几个原则必须掌握，其中“最重要的是要有创造的精神”。他反对雷同和模仿，主张报刊要有自己的风格。他说：“没有个性或特色的刊物，生存已成问题，发展更没有希望了。”他所说的个性或特色，包括内容和形式两个方面。在内容上，他取舍稿件的标准是“有价值与有趣味”，既不赞成“老生常谈”，也反对“滑头面孔”，而是提倡把“有益”与“有趣”统一起来，寓教育于趣味之中。1936年，他曾经就“我们要怎样办《生活日报》”问题作系统的论述，在多方面提出了自己的主张，其中包括：广博的言论（每天发一篇社论、两篇以上专论，内容广博），统一性（言论、新闻、附刊态度一致，硬性文字和软性文字分配均匀），广泛性（在民族独立、解放和繁荣的共同目标下，反映人民大众的多方面的生活），研究化（研究新闻的背景和前因后果，发表有关参考材料），文字大众化（用语体文写作，使初识字的人能看懂），销数（面向全国，包括大城市、农村和边疆，从上层社会到洋车夫、苦力、农夫都能看到），经济公开（经济来源和招股情况在报上公布，请会计师审查），以中国最大多数老百姓为背景（由大多数人投资经营，不希望有大股东，一切公开于大众，内容力求大众化），等等。

第四，文风要“明显畅快”。

邹韬奋把提高人民大众的文化水平、推广大众文化作为报刊的基本任务之一，因而一贯重视报刊文字的通俗易懂。在编《生活》周刊后不久，他就宣布：“本刊力避‘佶屈聱牙’的贵族式文字，采用‘明显畅快’的平民式文字。”^③他

① 韬奋：《光杆编辑兼光杆书记》，载《店务通讯》，第76号，1939-12-02。

② 《新女子最易上当的一件事》，载《生活》周刊，第4卷第10期，1929-01-20。

③ 《本刊与民众》，载《生活》周刊，第2卷第21期，1927-03-27。

写文章，注意用“最生动、最经济的笔法”，短小精悍，亲切感人。对广大读者像老朋友谈心一样，推心置腹，循循善诱。而在批驳国民党当局的错误言行和揭露丑恶的社会现象时，他慷慨陈词，锋芒凌厉，有很强的说服力和号召力。

第五，重视经营管理和社会信用，处理好商业性新闻与广告的关系。

在广告、发行、经营管理和设备现代化等方面，邹韬奋也有实践经验和理论论述，1940年出版了专著《事业管理与职业修养》一书。他认为，“我们这一群的工作者所共同努力的先进的文化事业”，是“引人向上的精神食粮”，“是要能够适应进步时代的需要，是要推动国家民族走上进步的大道”的事业。^①这就是事业性。同时又要靠自己的收入维持生存，这就是商业性。不应把二者对立起来，而是“为着要发展事业，在不违背我们事业性的范围内（我们当然不专为赚钱而做含有毒菌落后的事业），必须尽力赚钱，因为我们所赚的钱都是直接或间接用到事业上面去”^②。他重视广告，认为报刊“对于所登载的广告，也和言论新闻一样，是要对读者负责的”^③，但登载广告需要选择，要从法律和道德上考虑，在版面安排上广告不割裂新闻。邹韬奋所办报刊，都享有很高的社会信用，其原因除报刊本身办得好、读者服务工作做得好以外，还有经济公开（公开收入与支出，有高级会计师审查监督）、准时出版、从不脱期等因素。

第六，新闻工作者应有“视事业如生命”^④的精神、高尚的人格和真才实学。

邹韬奋热爱新闻出版工作，乐此不疲，为新闻事业奋斗终生。在艰难困苦的条件下，他从未失去信心，“一息尚存，决不罢休”^⑤；在威胁、利诱面前毫不动摇，“宁为保全人格报格而决不为义屈”^⑥。1937年1月，他在国民党的监狱中写道：“我在二十年前想要做个新闻记者，在今日要做的还是个新闻记者——不过意识要比二十年前明确些，要在‘新闻记者’这个名词上面，再加上‘永远立于大众立场的’一个形容词。”^⑦他全面主持报刊工作，还亲自编辑、写稿、处理来信、联系作者、接待读者，甚至跑印刷厂、看校样、拉广告。他刻苦钻研业务，“且做且学，且学且做”，对前人的经验和外国的经验都采取分析的态度，引为借鉴。他十分重视发现和培养人才，善于团结同事，共同办好报刊。他曾经提

① 参见韬奋：《事业管理与职业修养》，115～116页，北京，三联书店，1982。

② 同上。

③ 《〈生活日报〉的创办经过和发展计划》，载《生活日报》（香港），第55号，1936-07-31。

④ 《新闻记者是不戴帽子的皇帝》，载《生活》周刊，第4卷第9期，1929-01-13。

⑤ 《永生》，载《大众生活》，第1卷第4期，1935-12-07。

⑥ 韬奋：《与读者诸君告别》，载《生活》周刊，第8卷第50期，1933-12-16。

⑦ 《经历》，《韬奋文集》，第3卷，134页，北京，三联书店，1957。

出，理想的编辑至少应具备四个条件：一是大公无私；二是敏锐的观察和卓越的识见；三是文字畅达；四是至少精通一种外文。他还提出过新闻工作者应该有广博的知识、健全的体格，懂一些自然科学知识。

五、范长江、斯诺等的西北采访活动

（一）范长江和《中国的西北角》、《塞上行》

范长江（1909—1970），原名希天，四川内江人。1927年考入中法大学重庆分校，随后到武汉，入国民革命军第20军（军长贺龙）学生营当兵，参加南昌起义。失败后流浪于社会，1928年考入南京国民党中央党务学校（后改名中央政治学校）。1932年下半年考入北京大学哲学系学习，同时积极参加抗日救亡运动，并向北平的《北平晨报》与《世界日报》、天津的《益世报》与《大公报》投稿。1935年5月1日起，以天津《大公报》特约通讯员名义离津南下，经烟台、青岛到上海，再沿长江西行，赴重庆、成都，沿途写“旅行通信”，5月10日起在该报发表。7月14日，范长江又从成都出发，开始了他的西北之行，至1936年6月结束，历时10个月，西至敦煌，北抵包头，实地考察了四川、陕西、青海、甘肃、内蒙古的许多地方，了解政治、经济、文化、宗教、民族关系等多方面情况和民情风俗。他沿途撰写的旅行通讯陆续在《大公报》上发表。西北之行结束返天津后，范长江成为《大公报》的正式记者。1936年8月，他将这次旅行所写的通讯汇集成《中国的西北角》一书出版，数月内连印7次。这些通讯揭露了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危机，国民党统治的腐败、黑暗与各族人民的痛苦生活。更为可贵的是，该书首次客观而真实地报道了红军长征的行踪和影响。

1936年8月至12月，范长江又赴内蒙古、绥远等地采访，写了多篇通讯。西安事变发生后，他冒险从绥远前线取道宁夏、甘肃，于1937年2月2日到达西安。4日，见到周恩来，5日周恩来同他长谈，6日由博古、罗瑞卿陪同乘车至延安。9日晚间毛泽东同他长谈，向他详细介绍了十年内战的经过，解释中国革命的性质、任务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16日，即范长江到达上海的第二天，上海《大公报》发表他写的时事述评专文《动荡中之西北大局》，介绍了西安事变的真相和中国共产党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在国统区引起巨大震动。随后写了《西北近影》、《陕北之行》等多篇通讯。毛泽东于3月29日写信给范长江说：“你的文章我们都看过了，深致谢意！”^①

范长江的通讯作品，以纪实的方式，谈古论今，既有大量的历史、地理、人

^① 《毛泽东致范长江信》（1937年3月29日），见《塞上行》，北京，新华出版社，1980。

文与自然知识，更透露了重大的政治消息，笔触生动而有感情，刊出后受到广泛欢迎。“长江”名噪一时，《大公报》也销数陡增。这些作品以其特有的风格和深远的影响，为我国新闻通讯写作提供了新经验与新样本，在我国新闻史上有重要地位，其中有些已成为传世名篇。

（二）斯诺和《红星照耀中国》

埃德加·帕克斯·斯诺（Edgar Parks Snow，1905—1972），美国新闻记者、作家，出生于密苏里州堪萨斯城，1926年至1927年在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学习，兼任《堪萨斯星报》校内通讯员。1928年秋来到中国，1928年9月至1930年3月，在美国人鲍威尔办的上海英文报纸《密勒氏评论报》任助理编辑、代理主编等职，兼任美国《芝加哥论坛报》驻远东记者，曾在沪杭、沪宁、津浦、京沈、京绥等铁路沿线采访，发表不少新闻作品，描绘了中国人民的苦难生活。1933年至1935年，任燕京大学新闻系讲师，讲授《新闻特写》、《旅游通讯》等课程，同时兼任美国《纽约太阳报》和英国《每日先驱报》特约记者。“一二·九”运动爆发后，积极支持爱国的学习运动。

1936年6月中旬，斯诺在中国共产党地下组织的联系与协助下，离开北平到达西安，7月初进入陕北革命根据地。从7月至10月，斯诺在陕北根据地进行了广泛的采访，会见了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又到甘肃、宁夏红军前线部队访问彭德怀等军队领导人。毛泽东多次同他长谈，包括他的革命经历和长征的经过等。斯诺还拍摄了许多照片，其中有著名的毛泽东头戴缀有五角红星的八角帽的照片。10月25日，斯诺回到北平。11月14日、21日，上海《密勒氏评论报》发表他采写的长篇通讯《与共产党领袖毛泽东的会见》和毛泽东的照片。1937年1月和2月，北平英文《民主》杂志、上海英文《大美晚报》又先后发表了斯诺的陕北报道，美国《生活》杂志发表他拍摄的70余幅照片。在这些报道的基础上，他写成《红星照耀中国》一书。这部书的英文名称为Red star over China，1937年10月首先由英国伦敦戈兰茨公司出版英文版，1938年1月美国纽约兰登书屋又出版该书英文版。同年2月，在上海“孤岛”（租界）中，胡愈之主持的复社自筹经费，翻译出版《红星照耀中国》一书，为避免检查和发行中的麻烦，中文版书名改为《西行漫记》。由于这部书较早地公开介绍了中国共产党的革命斗争及其领导人的情况，出版后广泛流传，影响巨大，成为传诵一时的名著。

1937年底，斯诺同路易·艾黎等在上海发起中国工业合作社运动（简称“工会”）。1938年至1939年，斯诺在武汉、重庆、成都等地采访，曾会见周恩来、邓颖超、叶挺等。1939年以记者和“工会”国际委员会代表身份到延安参观访

问，毛泽东再次同他进行了深入交谈。1941年1月，他从香港向美国报刊发稿，报道皖南事变真相，2月即被国民党政府取消记者特权，并被迫回到美国。1942年至1946年，担任美国《星期六晚邮报》记者、副主编，在许多国家和地区采访。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斯诺受到美国推行麦卡锡主义的打击，处境困难。1959年移居瑞士。1960年、1964年、1970年三次访问中国，写了很多文章，出版了著作，热情介绍中国的建设成就和新面貌。1972年2月15日，斯诺在瑞士日内瓦病逝。16日，毛泽东在唁电中对他作了高度评价：“斯诺先生是中国人民的朋友，他一生为增进中美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进行了不懈的努力，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他将永远活在中国人民的心中。”根据斯诺的遗愿，他的骨灰一半安葬在北京未名湖畔，一半安葬在美国纽约州哈德森河畔。

第四节 新闻学研究和新闻教育事业的发展

一、新闻学研究

新闻学研究在这一时期得到较全面的开展，有了研究力量，有了学术团体与研究机构，有了专业刊物，出版了一批专著。

研究力量主要是高等学校新闻学科教师、学生和新闻从业人员中有志于研究者。也有的新闻学者虽然以办报或教书为职业，但主要精力用于研究学术上，如黄天鹏。黄天鹏（1909—1982），广东普宁人。曾在日本早稻田大学攻读新闻学。1926年发起成立北京新闻学会，主编会刊《新闻学刊》。1928年主编北平《全民日报》副刊《新闻周刊》。同年到上海，任《申报》主笔，《时事新报》副刊《青光》主编。1930年任复旦大学新闻系教授，兼任沪江大学等校新闻系教授。抗日战争时期，任重庆《时事新报》经理兼中央政治大学新闻系教授，中央印务局总管理处处长。抗战胜利后，在南京从事侨务工作。1949年去台湾，在多所大学任教。曾出版多种新闻论著。这时的新闻研究者有个共同特点就是，对于报纸工作实践有所了解或相当熟悉。如谢六逸在大学任教，同时又兼编报纸副刊；戈公振是富有改革思想的著名报人，同时从事教学与研究工作。因此，新闻学研究同新闻工作实践的关系较为密切。

学术团体主要有：中国新闻学研究会，1931年10月23日在上海成立，是我国第一个研究无产阶级新闻学的学术团体。初期有会员四十余人，主要来自上海《申报》、《新闻报》、《时报》等报社的进步记者、上海民治新闻学院（后改名民治新闻专科学校）和复旦大学新闻系师生，核心是《文艺新闻》的工作人员；

复旦大学新闻学会，1929年9月成立，会员除该系师生外，还吸收已毕业的新闻系学生和其他新闻爱好者参加，曾创办印刷厂，出版书刊，1935年10月举办“世界报纸展览会”，展出来自33个国家的报纸2000多种（本国1500多种，外国500多种），参观者达1万人次；南京新闻学会，1936年6月15日成立；平津新闻学会，1936年元旦成立，会址在北平。

专业刊物主要有：中国新闻学研究会主办的《集纳》（《文艺新闻》副刊，1931）和《集纳批判》杂志（1932）；复旦大学新闻学会主办的《新闻世界》（1930）、《明日的新闻》（1931）、《新闻学期刊》（1934）；燕京大学新闻系主办的《新闻学研究》（1932）；《记者座谈》（上海《大美晚报》专刊，1934）；平津新闻学会主办的《报学》半月刊（《世界日报》副刊，1936）；民治新闻专科学校所属上海新闻记者社的《新闻记者》（1937）；黄天鹏主编的北平《新闻学刊》（1927）和上海《报学杂志》。

新闻学专著主要有：张友渔著《新闻之理论与现象》（1936），黄天鹏著《现代新闻学》（1930）和《新闻学概要》、《新闻学入门》（1934），孙怀仁著《新闻学概论》（1936），胡仲特著《关于报纸的基本知识》（1937），袁殊著《记者道》（1936），谢六逸著《实用新闻学》（1936），梁士纯著《实用新闻学》（1936），黄天鹏著《新闻记者论》（1930），郭步陶著《编辑与评论》（1933）、《本国新闻事业》（1936），蒋国珍著《中国新闻发达史》（1927），马荫良著《中国报纸简史》（1937），吴定九著《新闻事业经营法》（1930），刘党民著《报业管理概论》（1936），钱伯涵、孙恩霖著《报馆管理与组织》（1936），徐润若著《新闻发行学》（1936）。

从上述书名可以看出，这些著作涉及新闻学科的多个领域——新闻理论、中国新闻史、新闻业务、新闻事业经营管理等。对新闻学开始全方位的研究，是这一时期的特点。而更为重要的还在于，马克思列宁主义党报学说在广泛传播并付诸实践，研究也开始了，党的报刊上出现了一些有学术研究价值的文章；张友渔等人的论著也提出了若干重要的基本观点；邹韬奋的人民报刊思想也具有理论研究价值。所有这些，都为建立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新闻学理论体系提供了有利条件。

二、戈公振和《中国报学史》

在新闻学研究中，戈公振做出了重要贡献，他的《中国报学史》一书为中国新闻史研究奠定了扎实的基础。戈公振（1890—1936），原名绍发，江苏东台人，1913年入上海《时报》馆工作，由校对、助理编辑、编辑升至总编辑，前后达

15年之久。1920年创办《图画时报》，为第一个报纸画刊。1925年至1931年间，曾经先后兼任上海国民大学、南方大学、大夏大学和复旦大学等校新闻学教授；曾参与组织上海报学社，从事新闻学研究。1927年，赴英、法、德、意、瑞士、美、日等国考察新闻事业，并应国际联盟邀请，参加在瑞士日内瓦举行的国际新闻专家会议。1928年回国后，应史量才的邀请任《申报》总经理助理，负责为革新报纸业务和改进管理制度作调查研究。1930年任《申报国画周刊》主编，1931年任《申报》总管理设计处副主任。“九一八”事变后，积极参加抗日救亡运动，学习马列著作。1932年以记者身份随国际联盟李顿调查团赴东北地区调查日本侵略中国真相，后又随调查团赴日内瓦参加国际联盟举办的日本侵略中国的特别大会。1933年以中央通讯社特派记者身份赴莫斯科采访，写了不少通讯，后汇集为《从东北到庶联》一书。1935年8月，应邹韬奋、胡愈之的邀请，回国参与筹办《生活日报》，同年10月22日在上海病逝。他的专著有《中国报学史》、《新闻学》、《从东北到庶联》等，还有译作及多篇论文。

戈公振是一位有革新思想的新闻工作者，又是一位大学教授和卓有成就的新闻学专家。1929年，他的挚友邹韬奋参观他的新居，“见其房间陈设之物，益叹先生报迷程度之深”^①。邹韬奋以《迷》为题，在《生活》周刊上发表文章介绍戈公振收集中外报刊原件的事迹。

在戈公振的著作中，《中国报学史》的影响最为深远。这部书写于1925年至1926年，1927年11月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曾多次再版，日本人小野保增译为日文，书名改为《支那新闻学史》，于1943年在东京出版。

《中国报学史》全书共6章，第1章绪论，阐述报学史的定名、报纸的定义以及本书编辑方法。他指出：“所谓报学史者，乃用历史的眼光，研究关于报纸自身发达之经过，及其对于社会文化的影响之学问也。”这个定义，明确认定了本学科的研究对象、研究范围，在学术上具有重要意义。第2章至第6章，分别就官报独占时期、外报创始时期、民报勃兴时期、民国成立以后、报界现状等阶段，全面、系统地评介报纸发展的历史，有明确的历史分期和报刊分类，为中国报刊史提供了一个较为完整的理论框架。本书史料翔实，多为第一手材料，为中国报刊史研究提供了丰富的史料。本书从主要观点与论断到文字表述的字里行间，洋溢着作者的爱国、民主、进步思想和敬业乐业精神，为新闻学研究树立了治学与道德风范。因此，本书被称为“中国新闻史研究开山之作”^②。但限于历

① 心水：《迷》，载《生活》周刊，第4卷第30期，1929-06-23。

② 方汉奇主编：《中国新闻事业通史》，第1卷“序言”，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

史条件，本书有些史料存在差错，后人为它作了补正。

三、新闻教育

我国新闻教育事业在这一时期发展较为稳健，主要表现为高等新闻教育和新闻职业教育都有所发展。

上海复旦大学新闻学组从中文科中独立出来，于1929年秋组建为新闻系，谢六逸为系主任。谢六逸（1898—1945），笔名宏徒、鲁愚。贵州贵阳人。日本早稻田大学毕业。回国后在商务印书馆编译所工作。1926年任复旦大学中文科教授。1929年至1938年任复旦大学新闻系主任。曾主编《立报》副刊《言林》、《国民周刊》、《趣味》周刊、《儿童文学》等，曾任大夏大学文学院院长、贵阳师范学院国文系主任、贵州大学教授。著有《谢六逸文集》等。该系培养目标“在养成本国报纸编辑与经营人才”，课程设置与教学安排参照了美国密苏里大学新闻系的教学计划，贯彻“理论与实验并重”的原则，设立基础知识、专门知识、辅助知识、写作技能、实习与考察5个门类课程，学制4年。1930年，成立新闻研究会，黄天鹏为主任，同时设立印刷所，出版新闻学丛书。1931年成立复新通讯社，作为学生实习机构，并向上海各报发稿。该系除专任教师外，还延聘戈公振、陈布雷、冯列山、黄天鹏、刘炳勋、周孝庵、潘公弼等任兼职教授。

北平燕京大学新闻系，1927年因经济拮据和白瑞华回美国而停办，1929年9月恢复，梁士纯为系主任，与美国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建立了交换教授与研究生的合作关系。该系用英文教学，课程分为主修、辅修、选修三类，其中辅修分为文学、史地、政治、经济四组，学生任选一组。该系每年春季举办“新闻周”，邀请著名报人来校讲演。

这一时期出现的新闻职业教育发展较快，成为新闻教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1928年秋，在广州设立中国新闻学院，后改名为中国新闻学校，是我国最早的新闻专科学校，创办人为谢英伯。同年12月，顾执中创办上海民治新闻学院，1931年改名为民治新闻专科学校。顾执中（1898—1995），上海市人。1923年任上海《时报》记者，1926年任上海《新闻报》记者、采访部主任。1928年创办上海民治新闻学院，任院长（校长）。“九一八”事变后，积极参加抗日新闻报道。1934年至1935年间，出访欧洲及苏联、美国、日本，考察新闻教育。1940年7月被日伪通缉，8月遭日伪特务枪击。1944年在印度加尔各答任华侨《印度日报》社长兼总编辑。1949年后任高等教育出版社编审、民主同盟中央委员等职。著有《西行记》、《到青海去》、《东北行天录》、《战斗的新闻记者》、《余烬集》、《报人生涯》、《报海杂忆》等。1931年，上海沪江大学商学院与《时事

新报》、《大晚报》、《大陆报》、申报电讯社合作，创办新闻训练班，由张竹平主持。同年2月，在山东创办了济南新闻函授学校。1933年1月，上海申报新闻函授学校开办。

民治新闻专科学校是我国历史最长的民办新闻职业学校。它在初期招收学生40多名，夜间上课，以后增办日班，每期招50名学生，最多时招100名，学制二年。有专任教师，也聘请了兼职教师。20世纪40年代，先后在印度加尔各答办训练班，在重庆建校，在香港设立分校。1951年改组为民治新闻学校。1952年，该校一部分并入复旦大学新闻系，一部分招收工农学生，分报业、广播、新闻摄影三科学习，1953年秋停办。1985年，又以民治新闻专科学校校名，在重庆、北京两地复校。

申报函授学校是申报馆主办的事业之一，马荫良、张蕴和主持校务，招收函授学生500多名。在1935年至1936年间，出版17种函授教材：《新闻学概论》（孙怀仁）、《报馆管理与组织》（钱伯涵、孙恩霖）、《实用新闻学》（谢六逸）、《通讯练习》（谢六逸）、《评论作法》（郭步陶）、《新闻储藏研究》（谢六逸）、《记者常识》（王馥泉）、《报纸印刷术》（章先梅）、《新闻发行学》（徐润若）、《广告学》（赵君豪）、《本国新闻事业》（郭步陶）、《国外新闻事业》（谢六逸）、《出版法》（凌其翰）、《时事问题研究》（罗又玄）、《散文研究》（蒋春国）、《国文讲义》（蒋春国）、《报文选读》。该校于1936年停办。

【学习思考题】

1. 国民党新闻统制是如何建立起来的？
2. 中共地下报刊在国统区的出版情况如何？有什么经验教训？
3. 简要评述革命根据地新闻事业的产生与发展情况、特点与意义。
4. “九一八”事变后，中国新闻界有何变化？《申报》是怎样进行改革的？史量才的死说明了什么？
5. 什么是“韬奋精神”？简要评述邹韬奋的报刊活动与报刊思想。
6. 简要评述范长江西北采访的成果与意义。
7. 戈公振著《中国报学史》的基本内容是什么？有何重要学术价值？
8. 简要评述斯诺在中国的新闻活动。



第九章

抗日战争时期的新闻事业

第一节 延安等抗日民主根据地的新闻事业

一、中共党报系统的重建

1937年7月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国共产党根据中日战争的特点和中国的国情，提出了持久战、游击战等争取抗战胜利的战略方针，开辟敌后战场，建立敌后抗日民主根据地。在延安及各抗日民主根据地，党的新闻事业也不断成熟、壮大，中国共产党新闻工作模式基本确立。中共党报系统的重建是中国共产党新闻事业在抗战中走向成熟的一个重要标志。

早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党就致力于建立一个以党的机关报为中心的革命报刊系统。大革命失败后，党的工作重点转向农村开展土地革命，在反动势力的薄弱地区建立革命根据地和人民自己的苏维埃工农政权。在革命根据地里，党致力于创建人民政权下的新闻事业，即以人民政权的名义创建的新闻事业。抗战爆发、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后，中国共产党在其直接领导的抗日民主根据地和国民党统治区创办起一大批以团结、抗战、民主为宗旨的报刊。1939年后，中共中央发出指示，要求各抗日民主根据地建立起一个以党的机关报为中心的抗日民主报刊系统，重点办好党的机关报，使中国共产党的新闻事业走上了成熟发展的

道路。

陕甘宁边区首府延安是抗战时期中共中央的所在地，也是党的新闻事业的中心。1936年12月“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中共中央领导机关于1937年1月由保安县城迁至延安。同月29日，中共中央为团结抗日计，决定将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机关报《红色中华》报改名为《新中华报》，期号续前，为第325期。1937年9月6日陕甘宁边区政府成立后，该报改组为陕甘宁边区政府机关报，版面仍为4开，刊期由三日刊改为五日刊，并由油印改为铅印。1937年4月24日，中共中央党报委员会主办的《解放》周刊创刊，16开铅印，后改为半月刊。该周刊积极宣传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并把争取民主作为自己的宣传中心。

1939年前后，中共中央决定在延安重建一个以中共中央机关报为中心的党报系统，延安的新闻事业由此进入了成熟发展的阶段。1939年2月7日，《新中华报》宣布改组为中共中央机关报，同时兼为陕甘宁边区政府机关报，三日刊，主要在陕甘宁边区和各抗日民主根据地内发行，直至1941年5月15日停刊。该报积极宣传抗战、团结、进步，反对投降、分裂、倒退，发表了大量社论、重要评论和中共中央的通电、文件等，全面、系统地报道了中共领导下的八路军、新四军的战绩以及陕甘宁边区等抗日民主根据地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等方面的成就。毛泽东、朱德、彭德怀的一些有关时局的重要文章，都曾在该报发表。

围绕着《新中华报》这一中心，《共产党人》、《八路军军政杂志》、《中国青年》、《中国妇女》、《中国工人》、《中国文化》、《边区群众报》等一批新报刊纷纷出版，形成了一个中共中央报刊系统。《八路军军政杂志》创刊于1939年1月15日，月刊，24开本，由八路军总政治部出版，肖向荣主编，毛泽东亲自撰写了《〈八路军军政杂志〉发刊词》。该刊于1942年3月停刊，共出39期。《中国工人》创刊于1940年2月7日，由中共中央职工运动委员会主办。毛泽东在为它写的《〈中国工人〉发刊词》一文中指出：“《中国工人》应该成为教育工人、训练工人干部的学校”，“我希望这个报纸好好地办下去，多载些生动的文字，切忌死板、老套，令人看不懂，没味道，不起劲”。他还说：“一个报纸既已办起来，就要当作一件事办，一定要把它办好。这不但是办的人的责任，也是看的人的责任。看的人提出意见，写短信短文寄去，表示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这是很重要的，这样才能使这个报办得好。”《边区群众报》创刊于1940年3月25日，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主办，是一份以农村基层干部和农民为主要对象的通俗小报，1941年改成了中共中央西北局机关报。该报系4开4版的周报，初为石印、油印，后改为铅印。胡绩伟主编。该报颇受群众欢迎，读者称赞它“念着顺

口，听着顺耳”，出至1948年1月10日改名为《群众日报》。《中国青年》（半月刊）创刊于1939年4月16日，由当时全国青年联合会延安办事处宣传部主办。该刊第2期发表了毛泽东的论文《五四运动》，第3期刊载了毛泽东的讲演《青年运动的方向》。1941年3月停刊，共出3卷。《中国妇女》（月刊）创刊于1939年6月1日，由中共中央妇女运动委员会主办，延安“中国妇女社”编辑出版。1941年3月出至2卷10期终刊。《共产党人》创刊于1939年10月20日，是中共中央出版的以党的建设为中心的党内刊物，由洛甫（张闻天）主编，李维汉负责出版工作。毛泽东为它写的《〈共产党人〉发刊词》一文，系统而又深刻地总结了中国共产党过去18年中的宝贵经验，即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并指出：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战胜敌人的三大法宝。该刊出至1941年8月停刊，共出19期。《中国文化》创刊于1940年2月15日，是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的机关刊物。毛泽东在创刊号上发表了重要论著《新民主主义论》。该刊出到1941年8月20日出版的第3卷第2、3期合刊时停刊。此外，新华社出版的刊登新闻电讯稿的《今日新闻》于1940年3月10日由油印改为铅印。

1941年后，抗日战争在经济上进入了最为艰难困苦时期。一方面，日本帝国主义集中了侵华的大部分兵力，对华北、华中敌后抗日根据地实行极为残酷、疯狂的大“扫荡”；另一方面，国民党顽固派掀起第二次反共高潮，用大量兵力包围、进攻八路军、新四军，封锁敌后抗日民主根据地。在日、伪、顽的夹击下，以延安为中心的陕甘宁边区经济发生严重困难，物质奇缺。此外，“皖南事变”后，党在国统区出版的《新华日报》受到国民党当局越来越严重的迫害，使它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及主张受到很大限制。而党中央机关报《新中华报》又是4开4版的三日刊，其时效性和篇幅都已不能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鉴此，中共中央决定将延安《新中华报》和《今日新闻》^①合并，改出大型的《解放日报》，同时将《中国青年》、《中国妇女》、《中国工人》等刊物停刊，以便集中人力物力办好中共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加强和改进党的新闻宣传工作。1941年5月16日，《解放日报》在延安创刊，日出对开半张两个版，自9月16日出版的第124号起，扩大为日出对开一大张4个版。该报第一任社长为博古（秦邦宪），1946年4月8日因飞机失事遇难后由廖承志继任。第一任总编辑为杨松（吴绍镒），1942年因病去世后先后由陆定一、余光生继任。该报是在革命根据地出版的第一个大型的、每日出版的中共中央机关报，也是抗日战争时期及

^① 《今日新闻》于1941年3月31日停刊，1942年12月1日改名为《参考消息》恢复出版，由新华社、解放日报社合编，直至1947年3月党中央搬出延安时才休刊。

解放战争初期革命根据地影响最大的报纸。中共中央对创办《解放日报》是极为重视的。5月15日，即创刊的前一天，毛泽东为中共中央书记处起草了创办《解放日报》的通知，对《解放日报》的工作作了部署和安排。毛泽东还为《解放日报》题写了报头，撰写了发刊词。创刊后，毛泽东经常指导该报的工作，并为它撰写和修改重要的社论、评论、新闻和文章。《解放日报》创刊后不久，苏德战争爆发。该报曾以大量篇幅报道苏德战争的情况，同时发表了不少评论，对国际形势做出了科学的分析，但同时也出现了过多刊载国际新闻、宣传报道脱离根据地群众和工作实际的倾向。《解放日报》创刊数月后，《解放》周刊于8月31日出至134期后停刊，《共产党人》杂志也于同月出至第19期后停刊。由于经济上的原因，以中共中央机关报为中心的报刊系统规模较前有所收缩，但宣传报道的实力、特别是中共中央机关报的宣传报道实力较前更为强大。

在其他敌后抗日民主根据地，中国共产党以及其他爱国力量在抗战初期出版了一批抗日报刊，其中有中国共产党的机关报，也有抗日民主政权主办的以及八路军、新四军系统的报纸。1939年后，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各敌后抗日民主根据地也开始着手建立以当地党委机关报为中心的报刊系统，在经济等条件不够成熟的地区则重点建设一份当地党委机关报。

在华北地区，晋察冀根据地的《抗敌报》于1937年12月11日在河北省阜平县城创刊，为4开4版的油印三日刊，自第13期起改为石印，发行数仅千余份，由晋察冀军区政治部宣传部主办，是敌后抗日根据地出版最早的一份报纸。1938年8月16日，该报改组为晋察冀边区党委的机关报。1940年11月7日，《抗敌报》出至第457期时改名《晋察冀日报》，成为中共中央晋察冀分局机关报，并实行革新，改为日刊，邓拓任社长兼总编辑。在战争环境下，该报社址几度迁徙。抗战胜利后，于1945年9月迁到张家口市出版。在太行根据地，1939年1月1日，中共中央北方局《新华日报》华北版在山西省沁县创刊，为4开4版的铅印两日刊。1943年中共中央北方局撤销、中共中央太行分局建立后，该报于同年10月1日改为《新华日报》太行版，成为中共中央太行分局机关报。何云任为第一任社长兼总编辑。在晋绥根据地，中共晋西区党委机关报《抗战日报》于1940年9月18日在山西省兴县创刊，创办人及总编辑为赵石宾。1942年8月后改为中共中央晋绥分局机关报。初为4开4版的铅印三日刊，后改为两日刊、日刊。1946年7月1日改名为《晋绥日报》。

在华中地区，山东根据地的《大众日报》于1939年1月1日在山东沂水县创刊，初为中共中央山东分局机关报。初创时为4开油印三日刊，后改为铅印对开日刊。刘导生、匡亚明分别任第一任社长和总编辑。1945年冬中共中央华东

局成立后，又成为华东局机关报。抗日战争时期及解放战争时期，该报社址多次迁移，先后在沂蒙山区的沂南、莒南、日照、临朐等县出版。皖南的《抗敌报》于1938年5月1日创刊于安徽泾县，五日刊，铅印对开4版，为新四军军部机关报，以新四军战士为主要读者对象，1941年1月“皖南事变”后被迫停刊。《拂晓报》于1938年9月30日创刊于河南确山县竹沟镇，是新四军第四师的机关报。油印4开4版。开始为不定期出版，后改为3日刊。《拂晓报》虽是油印小报，却以刻印精美而闻名。它不但字迹工整、清晰，而且常有套版与插图，可与铅印报纸媲美。曾寄到重庆、延安、莫斯科、纽约等地展览，受到读者的交口称赞。后部队奉中央军委命令离开河南，转战到达淮北地区。1943年元旦起，《拂晓报》与《人民报》合并，报名仍旧，成为中共淮北区党委机关报，5月起改为铅印，另出《拂晓报》部队版在军中发行。《江淮日报》于1940年12月2日在苏北盐城县创刊，为对开日报，后改为4开一张，是苏北根据地第一张日报。初创时为中共中央中原局机关报，次年5月，中共中央中原局和东南局合并成立华中局，该报成为华中局机关报。社长由中共中央华中局书记刘少奇兼任，副社长兼总编辑王阑西。由于日寇和国民党军队的夹击，办报条件困难，终于在1941年7月22日停刊。

在华南地区，中国共产党领导创办的报刊有：广东东江抗日根据地出版的《新百姓报》（后改为《东江民报》）、东江抗日游击纵队出版的机关报《前进报》、中共海南琼崖特委出版的《抗日新闻》等。在东北地区，中共地下党和东北抗日联军各军部都办有自己的小报，如中共满洲省委办的《满洲红旗》（后改名《东北人民报》）和抗日联军的不定期小报《人民革命军报》、《青年义勇军报》等。

二、新华通讯社的独立发展与人民广播事业的创建

新华社走上独立发展的道路和人民广播事业的诞生，是中国共产党新闻事业走向成熟的另一个重要标志。

1939年后，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新华通讯社也开始日益成熟，走上了独立发展的道路。新华通讯社的前身是1931年创建的红色中华通讯社，与当时的《红色中华》报实际上是同一个机构。1937年1月，为团结抗日计，与《红色中华》报改名为《新中华报》一起，红色中华通讯社也改名为新华通讯社。但是，新华通讯社与《新中华报》还是两块牌子、一套机构，社长由临时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主席博古兼任，实际工作则由向仲华、廖承志等具体负责。抗战爆发后，新华社发稿范围逐渐扩大，如中共中央的文件、《解放》周刊和《新中华报》的评论，都经新华社向外传播。当时各抗日民主根据地都为敌人所封锁，党中央的

方针、政策及有关指示的传达，各抗日民主根据地的情况与信息的交流，在极大程度上都要依靠新华社。新华社每天发稿量也由原来的一两千字增加到四五千字。在抄收电讯方面，新华社编辑部把收到的国外电讯译成中文，编成油印的《每日电讯》参考资料，每期发行约400份，供中央领导及各机关参阅。1938年底，《每日电讯》改名《今日新闻》。1939年初，中共中央决定将新华社与《新中华报》分开，各自成为独立的编辑机构，同属中共中央党报委员会统一领导，结束了报、社一家的历史。新华社改建为独立的新闻通讯机构后，社长由向仲华担任。由于业务的发展，人员增至三十余人，使新华社的组织略具雏形。1941年底，向仲华调离新华社，解放日报社社长博古兼任新华社社长。1946年4月博古遇难后，廖承志继任社长。

除总社不断扩大外，新华社还自1939年起开始在敌后抗日民主根据地建立分社组织，逐渐形成了以一个延安总社为中心的新华通讯社网络。华北分社成立于1939年10月19日，因社址设在晋东南而初称晋东南分社，1941年初改称华北总分社，1943年10月改组为太行分社。晋察冀分社的前身是晋察冀通讯社，成立于1939年5月14日，同年10月改称晋察冀新华分社。各地新华分社的社长一般由该地方党报的社长或总编辑兼任，各地分社的记者也同时是当地党报的记者。至1942年底，新华社已有5个分社组织，较大的分社开始发展为总分社。至抗战胜利之时，新华社除总社外，在各个抗日根据地已建立了9个总分社和40多个分社。总社人员由几十人发展到124人。

1940年底，延安新华广播电台建成并开播。这是我国无产阶级广播事业的开端。从此，中国共产党的新闻事业不但有报纸、通讯社，还有了无线电广播电台这一新生的传播媒介。

早在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前夕，毛泽东就提出要在延安创办无线电广播电台，以打破国民党与日寇对根据地的新闻封锁，让各地人民群众听到中国共产党的声音。1940年3月，周恩来从莫斯科治病回延安时，克服重重困难，从苏联带回一部广播发射机。中共中央为此发出了关于建立广播电台的指示，并成立了筹建广播电台的领导机构——广播委员会，由周恩来亲自担任广播委员会主任，中央军委三局（即通讯局）局长王诤和新华社社长向仲华等为广播委员会成员。周恩来去重庆工作后，朱德继周恩来主持广播电台的筹建工作。为了早日创建人民广播事业，中央军委三局受命后从有关部门抽调了三十多人组成九分队，具体负责电台的施工和安装。当时，延安无线电器材十分缺乏，条件极为艰苦。没有发电的动力，他们就将一部破旧的汽车头改装成发动机，用它带动发电机发电；没有汽油，他们就自己动手烧木炭，用木炭生产煤气，用煤气代替汽油作燃料；

没有发射用的铁塔，他们就将几根大木杆子连接起来，竖立在山顶上，用来代替铁塔，架上天线，保证无线电波的传送。为防止日寇的轰炸及敌人特务的破坏，电台的台址设在延安西北19公里外的偏僻小山村——王皮湾村，播音室设在一孔土窑洞内，机房设在半山腰的两孔石窑洞内。1940年12月30日，延安新华广播电台首次开播，发射功率大约300瓦，波长28米。电台的呼号为“XN-CR”，X为中国无线电台呼号的第一个英文字母，NCR是New Chinese Radio（新中国广播）的缩写。延安新华广播电台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创办的第一座无线电广播电台，因而该台首次开播的日子后被定为中国人民广播创建纪念日。该台的播音时间为每天上、下午各一次，每次一小时左右，后增至每天两次三小时、三次四小时不等，波长也屡有调整。播出内容主要是中共中央重要文件，《新中华报》、《解放》周刊以及后来创办的《解放日报》的重要社论及各类文章，国内外时事新闻，名人讲演，科学常识，革命故事，日语等，另外还有抗日歌曲、音乐戏曲等文艺节目。延安新华广播电台在当时是新华社的一个组成部分，广播稿件由设在清凉山的新华社广播科提供，同新华社的文字广播相配合，向国内外传播根据地军民斗争的实况，宣传中国共产党的各项政策和主张。延安新华广播电台开播后，中共中央多次发出指示，要求各地党组织按时收听延安台的广播。1941年5月15日，中共中央书记处通知要求“各地应注意接收延安的广播”^①。5月25日，中共中央在《关于统一各根据地内对外宣传的指示》中，强调“各地应经常接收延安新华社的广播，没有收音机的应不惜代价设立之”^②。6月20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在《关于党的宣传鼓动工作提纲》中指出：“在现代无线电业发展的情形下，以及在中国交通工具困难的情形下，发展通讯社的事业，无线电广播事业，是非常重要的。应该在党的统一的宣传政策之下，改进现有通讯社及广播事业的工作。”^③

由于当时设备简陋，零配件奇缺，因而延安新华广播电台在创建后时播时停。1943年春，该台因大型电子管被烧坏，不得不暂停播音，直至1945年9月5日才恢复播音。

三、《解放日报》的整风改革与中共新闻理论的发展

自1942年春天起，中国共产党在全党范围内展开了一次整风运动，即反对

① 《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54页。

② 《中国共产党新闻工作文件汇编》上册，99页，北京，新华出版社，1980。

③ 同上书，110—111页。

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核心是反对主观主义，旨在从思想上清算中国共产党成立二十多年来党内发生的历次“左”、“右”倾错误路线及其流毒，在全党范围内进行一次马列主义的教育运动。

1942年2月初，毛泽东在延安先后作了《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的重要报告，揭开了整风运动的序幕。根据党的整风精神，1942年3月16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发出《为改造党报的通知》，要求各地根据整风精神来检查和改造报纸。这是党报改革的纲领性文件。《通知》阐明了一系列极其重要的党报理论，其中包括“全党办报”，党报的内容、版面及主要任务，大力加强党报编辑部的工作，党报的战斗性、通俗化等等。《通知》发出后，从解放日报社到各新闻单位、从延安到各抗日根据地，掀起了整风和检查的热潮。

《解放日报》走在新闻界整风改革的前列。1942年3月31日，毛泽东和解放日报社社长博古在杨家岭中共中央办公厅召集各方面人士七十多人开会座谈，就《解放日报》改版征求各方面的意见。毛泽东最后作了讲话，指出：“为了纠正这些不良作风，我们提出了整顿三风。但要达此目的，非有集体的行动、整齐的步调，不能成功。”因此，“利用《解放日报》，应当是各机关经常的业务之一。经过报纸把一个部门的经验传播出去，就可推动其他部门工作的改造。我们今天来整顿三风，必须好好利用报纸”^①。这种利用报纸来推动中心工作的开展的方法，成为党报的重要经验和传统。

1942年4月1日，《解放日报》在中共中央的指导下实行改版。这一天，《解放日报》登载了中共中央宣传部《为改造党报的通知》，同时发表了改版社论《致读者》。社论首先论述了党报的党性、群众性、战斗性及组织性（指导性）原则。接着，依照以上标准，检查了该报创刊10个月来存在的问题：“我们以最大的篇幅供给了国际新闻，而对于全国人民和各抗日根据地的生活、奋斗，缺乏系统的记载；我们孤立登载着中央的决议指示，领导同志的论文，而没有加以发挥和阐明，对于政策和决议的执行情形、经验检讨则毫无反映；我们以巨大的篇幅登载枯燥乏味的论文和译文，而不能以生动活泼通俗易懂的文字解释迫切的问题，对于敌对思想缺乏应有的批评”；“对于边区中所进行的各种巨大的群众运动，我们至多只记载了一些论断，而没有能够全面地反映，更谈不上推动与倡导”。因此，《解放日报》的工作，要“有一个彻底的改革。改革的目的是要使解放日报能够成为真正战斗的党的机关报。要达到这一目的主要的环节，就是要使我们整个篇幅贯彻党的路线，反映群众情况，加强思想斗争，帮助全党工作

^① 《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90页。

的改进。这样来贯彻我们报纸的党性、群众性、战斗性和组织性”^①。

《解放日报》在改版前，仅就版面编排而言，就可见其受党八股和王明教条主义错误路线影响的、脱离解放区斗争实际和党的中心工作实际的严重倾向。当时，《解放日报》的版面安排几乎有一个公式：一国际、二国内、三边区、四本地（即延安），第一、二版长篇累牍地登载国际新闻，使《解放日报》的内容以刊载国际新闻为主，第三版主要登载国内新闻，第四版才是陕甘宁边区新闻和副刊。《解放日报》改版后，以抗日民主根据地的新闻报道为主，密切联系群众和工作实际，积极配合党的中心工作进行宣传报道。版面安排也焕然一新：第一版是反映各解放区情况的要闻版，第二版是陕甘宁边区版，第三版才是国际新闻版，第四版仍是副刊和各种专论。

当时，整风运动是党的一项中心工作，《解放日报》集中力量报道整风运动的发展情况，发表了大量指导整风运动的文章和社论，同时还办专刊、辟专栏以宣传整风运动。4月9日，《解放日报》又创刊《一得书》杂文专栏，登载短小精悍、生动活泼的杂文和小品文。1942年5月13日，《解放日报》的著名专刊《学习》创刊，专门登载有分量的理论文章。军事宣传报道也大大加强，出现了不少反映部队生活和描绘八路军、新四军战士及民兵英雄形象的通讯和报告文学。与此同时，为了加强报社的领导，4月间，陆定一被中共中央派往解放日报社参加改版工作，8月8日被正式任命为总编辑。

随着整风改革运动的深入，延安《解放日报》又提出了“全党办报”的方针，强调党报必须由全党来办，不是依靠几个报馆同人来办，党报工作者必须认识到自己是整个党组织的一分子，自觉地把自已溶于党的集体之中，不允许与党唱对台戏。如果不是这样，而是按照资产阶级同人办报的思路办报，一切依照个人的意见、性情与兴趣办事，闹独立性，就一定会出乱子。为了在组织上保证“全党办报”方针的贯彻执行，中共中央于1942年9月做出决定，《解放日报》兼为中共中央西北局机关报，以加强其与陕甘宁边区的联系。9月9日，中共中央西北局做出《关于解放日报工作问题的决定》，强调“各级党委要把帮助与利用《解放日报》的工作当做自己经常的重要业务之一”^②，并责成各级党组织在党内进行关于党报的教育，要求全体党员经常看党报，帮助党报发行和组织担负该报的通讯工作，各级党委要定期检查自己对《解放日报》所做的工作并向西北局报告，各分区党委及县委的宣传部长要担任《解放日报》的通讯员并负责组织

^① 《中国共产党新闻工作文件汇编》下册，31～32页。

^② 《中国共产党新闻工作文件汇编》上册，133页。

所属地区的通讯工作。《决定》还规定，中共中央西北局每月讨论一次《解放日报》关于陕甘宁边区问题的宣传方针，吸收报社负责人参加西北局会议，西北局也派人出席报社编辑会议。

延安《解放日报》改版后，各地党委也普遍加强对报纸的领导，《新华日报》华北版、《抗战日报》等也在整风检查工作的基础上，纷纷进行了类似《解放日报》的改版，面貌为之一新，加强了报纸与革命根据地的斗争实际与人民群众的联系。重庆《新华日报》虽然在国民党势力的重重包围下出版，也进行了整风学习，并努力改进报纸工作。1942年5月23日，《新华日报》发表社论《敬告本报读者——请予本报以全面批评》，宣布要在读者的帮助下，“使本报得以肃清主观主义、教条主义与党八股的残余”。9月18日，《新华日报》正式改版，并发表社论《为本报革新敬告读者》。自是日起，《新华日报》改进新闻编辑和版面编排，特设《边鉴》专栏，以加强向国统区人民及时报道边区的改革和建设情况。同时，《新华日报》进一步改善国际新闻的报道，建立了编、译、评等一套完整、健全的国际新闻报道的班子。总之，改版后的《新华日报》想尽办法满足读者的需要，把各阶层的群众团结在党的周围。

在解放区新闻工作的整风改革中，《解放日报》还发表了一系列关于新闻工作的重要文件、社论和理论文章，如毛泽东的《在〈解放日报〉改版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共中央宣传部为改造党报的通知》，《中共西北中央局关于〈解放日报〉工作问题的决定》，《解放日报》社论《致读者》、《党与党报》、《本报创刊一百期》、《提高一步》，胡乔木的《报纸是人民的教科书》，陆定一的《我们对于新闻学的基本观点》，总政宣传部的《苏联的军事宣传与我们的军事宣传》，陶铸的《关于部队的报纸工作》等，对党报的性质和作用、全党办报的思想、新闻工作的党性原则、无产阶级唯物主义新闻观和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新闻观的区别，以及文风等基本问题，作了比较系统的论述，初步奠定了中国无产阶级新闻学理论的基础。《解放日报》还于1942年10月28日起开辟《新闻通讯》专栏，为抗日民主根据地的报纸上最早出现的新闻学研究专刊之一。这些文件、文章所涉及的内容和范围，一是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对新闻学的基本问题进行了初步的探讨；二是在无产阶级党报理论方面，对党报的性质、特征、任务，党与党报的关系及党对党报的领导，党报的工作方针及编辑方针和编排原则，党报的群众路线，党报的文风等重大问题进行了研究和探讨，进一步丰富了马列主义的党报理论，为建立中国共产党的新闻工作理论和模式奠定了基础。具体而言，一是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研究、探讨新闻的本质与特点，重申了党报的性质、特征和任务。1943年9月1日陆定一在《解放日报》上发表的《我们对于新闻学的

基本观点》一文，用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方法，阐述了无产阶级新闻学的有关基本问题，也批判了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新闻学观点。文章论述了“新闻的本源”问题，对“新闻”的定义作了界定：“唯物论者认为，新闻的本源乃是物质的东西，乃是事实，就是人类在与自然斗争中和在社会斗争中所发生的事实。因此，新闻的定义，就是新近发生的事实的报道。”文章还论述了“新闻如何能真实”问题，既基本肯定了资产阶级新闻学中新闻必须具备“五要素”（即时间、地点、人名、事实的过程与结果），又指出仅仅有“五要素”是不够的，还必须把尊重事实与革命立场结合起来，密切联系群众、联系实际，才能写出真实的新闻。二是确立了“全党办报”的思想。三是加强新闻工作者的党性修养，确立“人民公仆”的思想。四是坚持“政治第一，技术第二”的原则，反对“技术第一，政治第二”的观点。五是反对党八股，树立生动活泼的马列主义文风。六是发扬党报理论和实践相结合、和人民群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以及自我批评的三大作风。

四、中外记者对抗日民主根据地的采访

外国新闻记者与作家采写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根据地，始于美国青年记者埃德加·斯诺。之后，在斯诺西北采访活动的影响下，不少外国进步新闻记者抗战爆发前后纷纷来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根据地采访，撰写了一本又一本通讯报道和著作，如海伦·斯诺的《续西行漫记》、贝特兰的《华北前线》、卡尔逊的《中国的双星》、福尔曼的《来自红色中国的报道》、斯坦因的《红色中国的挑战》、爱泼斯坦的《中国未完成的革命》、斯特朗的《中国人征服中国》、贝尔登的《中国震撼世界》等等，及时、详细地向世界介绍了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路线和主张，报道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根据地的欣欣向荣的景象。这些外文著作，大多在当时被译成中文出版。

在这些采访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外国记者中，数艾格妮丝·史沫特莱（Agnes Smedler）、安娜·路易斯·斯特朗（Anna Louise Strong）和汉斯·希伯（Hans Shippe）等人成就最为显著。艾格妮丝·史沫特莱是美国进步女作家、新闻记者，1892年出生，她当过女佣、烟厂工人和书报推销员，并在忍饥挨饿的环境下，经过勤奋不懈的努力而自学成才。1921年，史沫特莱离开美国来到德国柏林，她一面教授英语和美国研究等课，一面攻读印度史博士学位，1927年写成自传体小说《大地的女儿》。1928年底，史沫特莱以德国《法兰克福日报》特派记者和英国《曼彻斯特卫报》特派记者的身份，途经苏联来到中国，开始了她在中国12年的新闻记者生涯。1929年12月27日，史沫特莱与鲁迅见

面，从此结下深厚的友谊。1936年12月，她来到西安，向世界报道了西安事变。1937年3月1日，她来到延安，采访了中共领导人和红军将领毛泽东、朱德、周恩来、任弼时、彭德怀、贺龙和红色妇女领袖邓颖超、康克清等，把众所关注的延安情况不断报告给世界各地的读者。她还曾到新四军中采访。1940年9月，因病取道香港回美国就医。此后，她一面写作朱德传记《伟大的道路》，一面利用一切机会为中国革命作宣传，因此而受到麦卡锡主义者的迫害。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后，史沫特莱感到由衷的高兴，并决定返回中国。但是，在前往伦敦等待签证时，史沫特莱于1950年5月4日因胃溃疡住院接受手术，5月6日逝世。

安娜·路易斯·斯特朗于1885年出生于美国，1908年在芝加哥大学获博士学位。1919年，西雅图爆发了大罢工，斯特朗积极投身于这场斗争，并成为一家工会报纸的编辑。1921年后，她旅居苏联近30年，创办和主编苏联第一家英文报《莫斯科新闻》，并撰写了大量文章。1949年被苏联政府指控为“间谍”而被捕，并被驱逐回美国，1955年被恢复名誉。斯特朗一生中曾先后6次到中国旅行、采访。1925年，她第一次来到中国。在广州，她报道了孙中山领导的民主革命运动和中国人民的反帝运动——省港大罢工。1927年，她第二次到中国，深入湖南农村，报道了毛泽东领导的农民革命运动。1937年，她第三次到中国采访。于年末到山西南部的八路军总部采访，报道了敌后抗日游击战争。1940年末，她第四次来中国，在重庆采访了蒋介石，也采访了周恩来。1946年，她第五次到中国，采访了解放区，最后到达延安。在她采访毛泽东的时候，毛泽东提出并阐述了“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这一著名的论断。1958年8月，72岁高龄的斯特朗第六次来到中国，并在北京定居，1970年3月29日在北京病逝。

汉斯·希伯于1897年出生，是著名的德国籍反法西斯作家、记者。1925年至1927年大革命时期，他第一次来到中国，曾在北伐军总政治部编译处工作，并为上海的《中国周刊》等报刊撰稿。1932年再次来到中国，在上海定居，和《大美晚报》编辑巴林博士（英国人）一起，发起建立上海的第一个国际“马列主义学习小组”，其成员有美国作家及记者史沫特莱、美国医生马海德、新西兰作家路易·艾黎等。同时，他还常在美国《太平洋杂志》、英国的《曼彻斯特卫报》等报刊上发表关于远东和中国问题的报道及评论。抗战爆发后，他积极支持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还筹募医药用品，并冒险送到新四军中。1938年春，希伯从武汉转往延安，采访了毛泽东。1939年初，他采访皖南泾县云岭新四军军部，会见了周恩来和叶挺军长。1941年“皖南事变”发生后，希伯于当年5月

与夫人秋迪一起到苏北新四军中采访，会见了陈毅和粟裕，在苏北解放区完成了8万字的书稿——《中国团结抗战中的八路军和新四军》。同年9月，希伯从苏北进入山东沂蒙山区抗日根据地，采访报道敌后八路军的抗日斗争。1941年10月30日，希伯所随部队与日寇遭遇于沂南县大青山，他在激战中壮烈牺牲。

1938年10月武汉失守、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国民党政府开始采取消极抗日、保存实力、积极反共的政策，动员大批军队进攻陕甘宁边区及其他抗日民主根据地。与此同时，国民党政府还对陕甘宁边区实行严密的新闻封锁，在重庆及国统区查禁有关反映延安等抗日民主根据地真实情况的报道和作品。对于在华外国记者撰写的有关报道和评论，国民党政府也不放过，或责令重写、或不准发稿，严重的甚至吊销执照，引起了在华外国记者的强烈不满。直至1944年，由于国际反法西斯战争取得了重大进展，盟军反攻日军的时机已迫近，国际人士十分关心中国战场、特别是敌后游击战和抗日根据地的情况，因而迫使国民党政府不得不允许中外记者组团采访延安。

为了防止中外记者采访延安可能出现的对国民党政府来说是负面的效果，国民党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手段以严密控制这次采访活动。5月18日，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由重庆出发，首途飞宝鸡，辗转到西安。参观团共计21人，外籍记者有6人：斯坦因（美联社、英国《曼彻斯特卫报》、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记者）、爱泼斯坦（美国《时代》杂志、《纽约时报》、《同盟劳工新闻》记者）、福尔曼（美国合众社、伦敦《泰晤士报》记者）、武道（路透社、《多伦多明星周刊》、《巴尔的摩太阳报》记者）、夏南汉神甫（美国《天主教信号杂志》、《中国通讯》记者）、普金科（塔斯社记者）。参观团中的中国记者有9人：孔昭恺（《大公报》记者）、张文伯（《中央日报》记者）、谢爽秋（《扫荡报》记者）、周本渊（《国民公报》记者）、赵炳琅（《时事新报》记者）、赵超构（《新民报》主笔）、金东平（《商务日报》记者）、徐兆镛（中央社记者）、杨嘉勇（中央社记者）。为了加强对记者团的控制，还特派国民党外事局副局长谢葆樵、新闻局副局长邓友德为正、副团长，还派员充当“陪同人员”。5月30日进入陕甘宁边区，参观八路军359旅的军事训练和生产建设。6月9日，记者团抵达延安，到7月12日清晨告别延安，正式采访延安的时间达一个多月。

中外记者回到重庆后，纷纷把采访的材料撰成专文发表，写成书出版。自7月底开始，重庆各报陆续发表有关访问延安的见闻，除《中央日报》、《商务日报》个别记者作了歪曲、攻击性报道外，大多数记者的报道都比较客观、忠实。如《新民报》主笔赵超构撰写的长篇通讯《延安一月》，在该报上整版连载达一个多月，后汇集成书出版，深受读者欢迎。在外国记者中，美国记者福尔曼写出

了《中国边区的报告》一书出版，斯坦因在英国《时事新闻报》上发表了《毛泽东朱德会见记》；爱泼斯坦在印度《政治家日报》上发表了《我所看到的陕甘宁边区》，他还写了二十多篇出色的通讯，分别发表在《纽约时报》等美、英著名大报刊上。中外记者对延安客观、真实而又生动的报道，对解放区由衷的赞美，打破了国民党的新闻封锁，“全世界对中国的看法却因此改观，中共的前进反映了（国民党）中央政府的无能与落后”^①。

第二节 国统区新闻事业与境外抗日宣传活动

一、抗战初期上海、武汉等地的新闻事业

全面抗战爆发后，上海作为国统区新闻事业的中心，立刻成了我国抗日宣传的中心。一大批抗日救亡报刊在上海纷纷问世，如《救亡日报》、《抗战》（曾改名《抵抗》）、《文化战线》、《战时妇女》、《救亡周刊》、《战时联合旬刊》等。

《救亡日报》创刊于1937年8月24日，是上海市文化界救亡协会的机关报。上海市文化界救亡协会是抗战初期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成立的一个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群众组织，一些国民党人也参加了这个协会。因此，《救亡日报》虽然实际上由中国共产党领导，但在名义上则为国、共两党合作创办的具有统一战线性质的抗日报纸。刚从日本回国不久的郭沫若担任社长，夏衍（代表共产党）、樊仲云（代表国民党）任总编辑，全社工作人员有十余人，开办费也由国、共双方各出500元。《救亡日报》创刊之初，每天出版4开4版一张。上海沦陷后，《救亡日报》于1937年11月21日在上海出版了最后一期后宣告停刊。1938年1月1日，《救亡日报》迁至广州后复刊，至10月21日因日本占领广州而再度停刊。1939年1月10日，《救亡日报》在桂林再度复刊，直至1941年2月28日被国民党有关当局勒令停刊。《抗战》创刊于1937年8月19日，三日刊，由著名新闻出版家邹韬奋创办并主编。《抗战》除出版三日刊外，还同时出版《抗战画报》，六天一期。迫于上海租界当局的压力，《抗战》自9月9日出版的第7号起改名为《抵抗》，11月23日出版的第29号恢复《抗战》原名，并宣布自30号起迁至武汉出版。

1937年11月后，上海、南京相继沦陷。全国抗日宣传中心也随着国民党政府的党、军、政中心一起迁至武汉。最早迁至武汉的著名大报是《大公报》，天津沦陷后迁至武汉，1937年9月18日发刊该报的汉口版，出至次年10月中旬

^① 《曾虚白自传》上集，309页，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2001。

迁往重庆。国民党党、军、政中心迁至武汉后，一大批抗日报刊纷纷在武汉出现。邹韬奋主编的《全面抗战》三日刊于12月16日起在汉口继续出版，翌年7月7日与《全民》月刊合并，改名《全民抗战》三日刊。《全民抗战》由韬奋任总发行人，最高发行量达30万份，1938年10月武汉沦陷前夕再次内迁，自10月15日起在重庆出版，并由三日刊改为五日刊。自1939年5月13日出版的第70号起，《全民抗战》改为周刊，出至1941年2月22日第157期后被查封。上海的《申报》也一度出版汉口版，但不久即停刊。这些从沦陷地区迁来的报刊，加上原有的《武汉日报》、《武汉时报》、《壮报》等地方报纸及1935年5月从南昌迁至汉口出版的《扫荡报》，使武汉地区成为名副其实的全国抗日宣传中心。其中《武汉日报》是国民党在华中地区出版的最大的机关报，1929年6月10日在汉口创刊。武汉沦陷后，该报一部分设备和人员西迁宜昌，于1938年12月1日出刊《武汉日报》宜昌版，1940年11月1日再迁至恩施出版；另一部分则西迁贵阳出版，于1938年12月1日改名为《贵阳中央日报》；同时还在沦陷区的湖北黄冈发行过敌后版。《扫荡报》在抗战初期一度积极宣传抗日，1938年10月迁至重庆出版。

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的《群众》周刊和《新华日报》的创刊，是中国共产党的新闻事业在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首次在全国公开亮相。

1937年12月11日，《群众》周刊在汉口创刊，由中共中央长江局领导，编辑兼发行人为潘梓年，实际主持者为许涤新。该刊以宣传中共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及中共全面抗战路线为宗旨，同时还经常刊载介绍马列主义的译著和论文。1938年10月日军进犯武汉后，《群众》周刊被迫停刊，同年12月迁至重庆复刊，1943年1月改为半月刊。1938年1月11日，《新华日报》又在汉口诞生。该报最初由潘梓年任社长兼总经理，1938年5月后改由熊瑾玎任总经理、华岗任总编辑，章汉夫任编辑部主任，报社工作人员在筹办初期时有三十余人，创刊后增至六十余人。作为中共中央长江局领导的机关报，时任中共中央长江局书记的王明兼任《新华日报》董事长。1938年10月25日凌晨日军侵入武汉市郊，《新华日报》在当天出版第287号后在汉口停刊，第二天（即10月26日）由已迁至重庆的人员接替出版该报的第288号。战事紧张，报馆不得不西迁重庆，但报纸的出版一天不停，充分表现出了只有共产党人才具有的勇敢、顽强的战斗精神。

作为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全国公开发行的唯一一份大型机关报，《新华日报》在汉口出版的九个多月时间里，大力宣传中共中央有关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团结抗战、持久抗战”的战略方针以及毛泽东等提出的游击战争理论，无情地揭露日寇侵华阴谋和罪行，及时报道中国军队的抗日战绩。此外还应该指出的

是,《新华日报》出版之际,正是王明在国统区抛售其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时候,因而也不可能不影响到《新华日报》的宣传工作。

在武汉,中国共产党还在新闻界积极开展统战工作。中国青年新闻记者学会的创建,是党的统战工作取得的重要成果之一。早在上海沦陷前夕,由范长江、夏衍等人发起,中国青年记者协会于1937年11月8日在上海宣告成立。这时,上海正处于危急之际,该协会还没有来得及开展活动,就被迫离沪迁武汉,于1938年1月1日成立武汉分会。3月15日,该协会在汉口开会,决定改名为中国青年新闻记者学会,简称“青记”。3月30日,中国青年新闻记者学会在汉口举行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正式宣告成立。“青记”是抗日战争时期及解放战争初期著名的全国性新闻记者组织,主要发起人和负责人有范长江、陈同生(农菲)、孟秋江、金仲华、恽逸群等,邵力子、王芸生、于右任、叶楚傖、邹韬奋、郭沫若、张季鸾、潘梓年等为名誉理事,范长江、钟期森、徐迈进为常务理事。“青记”除总会外,还在广州、香港、桂林、成都、重庆、延安、兰州等地设有分会,会员曾发展到一千多人。“青记”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新闻界统一战线组织,党通过参加这个组织的中共党员,努力团结国统区广大的进步新闻工作者,积极争取民主、争取新闻自由和开展抗战宣传。1938年9月,在周恩来的指导下,范长江以“青记”骨干为基础,又在汉口筹办合作社性质的通讯社——国际新闻社(简称“国新社”)。同年10月20日,国际新闻社在长沙正式建社并对外发稿,由刘尊棋以中央社战地记者身份兼任社长,范长江任副社长。11月迁至桂林并设立总社。

二、重庆、桂林等内地新闻事业的空前发展

1938年10月武汉失守后,国民党中央党部及军政机关纷纷西迁重庆。重庆作为国民党政府的战时“陪都”,也成了国统区新闻事业和全国抗日宣传的中心。

上海、天津、北平、南京、武汉等地的报刊大批向重庆迁移,加上原有的报刊,战时重庆的报纸最盛时达二十多种。抗战前,在重庆出版的报纸有《新蜀报》、《西南日报》、《商务日报》、《国民公报》等。抗战爆发后,南京的《新民报》、上海的《时事新报》是最早迁至重庆的报纸。武汉沦陷后,《新华日报》、《群众》周刊、《全民抗战》等一大批进步报刊迁至重庆。国民党的中央日报、中央广播电台、中央通讯社、扫荡报等新闻单位先后从南京、武汉、长沙等地迁至重庆。另外,天津的《大公报》、《益世报》,北平的《世界日报》等也先后在重庆复刊。除上述影响较大的报纸外,在战时重庆出版的还有《济川公报》、《大江日报》、《武汉时报》、《群报》、《崇实报》、《南京晚报》、《大陆晚报》、《四川晚

报》、《大汉晚报》、《新蜀夜报》、《壮报》、《武汉晚报》等。

1939年5月3日、4日，日寇飞机接连对重庆实行狂轰滥炸，全城一片瓦砾。报社比较集中的上半城的新街口（《中央日报》、《时事新报》所在地）、铁板街（中央社所在地）、武库街（《国民公报》、《新华日报》所在地），以及下半城（《大公报》、《新蜀报》、《商务日报》所在地）均被炸，致使各报房屋倒塌，水电断绝，损失惨重。鉴于这种困难状况，重庆《中央日报》、《时事新报》、《扫荡报》、《新蜀报》、《商务日报》、《大公报》、《新华日报》、《国民公报》、《新民报》、《西南日报》等10家大报集中人力、物力、财力，不问党派、不分立场，于5月6日合作发刊“重庆各报联合版”，初为日出对开半张两版，后出对开一张4版，在《时事新报》的防空洞中编排印刷。至8月12日结束，共出版了99天。8月13日，重庆各报各自恢复出版。“重庆各报联合版”是我国新闻史上有报纸联合版之始。

除重庆外，桂林在1938年10月至1944年9月大撤退以前，也是大后方进步报刊的一个重要的聚集地，被人们称为抗战时期的“文化城”。

桂林当时是广西省省会，也是国民党桂系军阀统治的中心。由于桂系与蒋介石之间有很深的矛盾，因而周恩来在抗战爆发后曾多次对桂系领导人李宗仁、白崇禧做统战工作，传达中共中央愿与桂系团结抗战的愿望，使桂系答应容纳一部分进步文化人士去广西开展抗日救亡工作。1938年底、1939年初，当上海、武汉、广州等城市相继沦陷后，不少进步文化人士根据党的指示撤退至桂林，在这座西南城市中出版报纸、期刊，开办书店、出版社和印刷厂，使桂林的报纸、杂志及图书出版出现空前的繁荣景象，成为大西南地区进步新闻文化宣传的中心。据统计，抗战时期在桂林出版发行的日报有《救亡日报》、《新华日报》（桂林分馆）、《大公报》（桂林版）、《力报》、《广西日报》、《扫荡报》等6家，晚报有《广西晚报》、《桂林晚报》、《自由晚报》、《大公晚报》等4家。另外还有《民众报》、《小春秋》、《辛报》等小报和《国民公论》等期刊。1944年9月初，日军直逼桂林，桂林实行大撤退，各种报纸、杂志纷纷停刊或迁徙。

《救亡日报》于1939年1月1日由广州迁至桂林复刊，社长与总编辑仍为郭沫若、夏衍，先后参加编辑工作的有廖沫沙、孙师毅、林林、华嘉、陈紫秋、谢加因、高灏和高汾等。桂林时期的《救亡日报》，在夏衍的主持下，比在上海、广州时期有了很大的改进，发行量从开始的2000份增至1万多份。1941年“皖南事变”发生后，《救亡日报》于2月28日出版终刊号后被迫停刊。《新华日报》于1938年12月在桂林设立分馆，并自12月7日起由重庆总馆将该报纸型航寄桂林翻印，发行至广西、广东、湖南等省份。航空版翻印停止后，桂林分馆照常

营业，继续接收订户，千方百计把报纸送到读者手里，直至1944年桂林实行紧急疏散时才停止工作。《大公报》桂林版在胡政之的筹划下，于1941年3月15日创刊，日出对开一大张。初期《大公报》桂林版由《大公报》重庆总管理处领导，王文彬兼发行人及副经理，蒋荫恩任编辑主任。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香港《大公报》人员撤至桂林，使桂林版编辑力量大为加强，原香港版《大公报》总编辑徐铸成任桂林版总编辑，金诚夫任经理。1942年4月1日，《大公报》发刊，4开一张，由杨历樵等负责。1944年6月桂林大疏散，《大公报》于6月27日停刊，《大公报》则延至9月12日停刊。《力报》是一家民营报纸，以“中间偏左”的姿态出现，1940年3月10日在桂林创刊，日出对开一张，是曾任张治中秘书的张稚琴在张治中的支持下办起来的。该报创刊后，张稚琴任总经理，但实际上并不过问报社事情，欧阳敏讷、冯英子等先后担任总编辑，高士林担任经理。中共地下党员邵荃麟以及储安平、杨东莼、宋云彬、傅彬然等进步人士都曾为该报撰写过社论、专论等各类文章。该报副刊《新垦地》先后由聂绀弩、葛琴、彭燕郊、王西彦等人主编，其中聂绀弩、葛琴等人是中共地下党员。《广西日报》是广西省政府的机关报、桂系喉舌，它的前身是南宁《民国日报》。1936年10月，广西省会由南宁迁桂林，南宁《民国日报》遂改名《广西日报》在桂林出版，社长先后由韦永成、韦贻唐等担任。艾青、芦荻、韩百屏等曾参与副刊编辑工作。太平洋战争后，俞颂华、金仲华、傅彬然等先后任总主笔，先后有一些进步的文化界人士及中共地下党员参与编辑工作，使报纸一度起了积极作用。《广西日报》出至1945年1月27日停刊。《扫荡报》是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机关报，桂林版于1938年12月15日发刊。初期发表过一些宣传抗战的文章，以后随着形势的发展，以反共宣传为主要任务。《小春秋》则是《扫荡报》的外围小报，于1941年12月1日创刊，3天出一期，4开一张，以刊登社会新闻及小文章为主，内容反动。这两份报纸都出至1944年9月4日桂林疏散时停刊。《国民公论》于1938年9月11日在武汉创刊，是“救国会”的言论机关。1939年1月1日，《国民公论》迁桂林出版，由胡愈之主持，1941年2月停刊，共出5卷49期，是当时影响较大的综合性时事政治刊物。

战时桂林的通讯社有国际新闻社（“国新社”）、中央通讯社桂林分社、西南新闻社、战时新闻社和中国工商新闻社等数家。其中以国际新闻社影响最大。“国新社”在长沙成立，11月12日长沙大火后迁至桂林。11月21日，桂林、香港两社合并，以桂林为总社，香港为分社，开始正式对国内外发稿，成为全国性通讯社，由范长江担任社长，刘尊棋、孟秋江等担任副社长，黄药眠任总编辑。“国新社”由桂林八路军办事处主任李克农直接领导，社内有中共地下党的支部

组织，发稿对象主要是当时大后方的报纸、刊物和海外华侨报纸。1939年初至1940年夏是“国新社”的全盛时期，桂林总社与香港分社成犄角之势，分工合作：桂林总社及重庆办事处负责国统区的新闻报道工作，香港分社则面向海外、负责国际宣传任务。1941年“皖南事变”后，一部分社员撤往香港和敌后抗日根据地，仅留孟秋江等少数人在桂林坚持工作。5月，桂林、重庆两社均在国民党迫害下关闭。

此外，昆明也是新闻业比较集中的地区，在当时是与国外联系的重要陆、空门户，因而也成了抗战初期中国的文化、政治中心之一。迁到昆明出版的主要有南京的《朝报》、天津的《益世报》等。

三、重庆时期的《新华日报》

《新华日报》自1938年10月26日起，至1947年2月28日被国民党当局封闭，在重庆出版了8年又4个月。重庆时期的《新华日报》，在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南方局的领导下，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反共顽固势力，是国统区人民心中的灯塔。该报敢于斗争、善于斗争，按照“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同国民党顽固派进行了坚决而又顽强的斗争，成为一把插在国民党心脏的尖刀。毛泽东曾赞扬说，《新华日报》如同八路军、新四军一样，是党领导下的一个方面军。

《新华日报》迁至重庆出版后，国民党当局也开始奉行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反动政策，因而对《新华日报》设置重重障碍，从物资条件、出版发行，到言论、新闻报道等各个方面，处处予以钳制乃至迫害。针对国民党当局的罪恶行径，《新华日报》采取针锋相对的态度，运用各种方式进行斗争。

在物资条件方面，《新华日报》遇到的最大困难是纸张问题。当时，纸张供应十分紧张，国民党顽固派采用一推、二拖、三扣的卑劣伎俩，企图用断绝纸张供应来扼杀《新华日报》。对此，《新华日报》运用各种形式的合法或非法的手段进行不屈不挠的斗争。该报一方面向国民党有关当局争取纸张分配的合法权利，义正词严地指出：既然《新华日报》是经过登记的合法报纸，那么就不能歧视它，就应该公平地分配纸张。与此同时，该报还在重庆报业联合会上，公开揭露国民党顽固派企图扼杀《新华日报》的阴谋，争取报界同业的支持，迫使国民党当局不得不分配给《新华日报》一定数量的纸张。另一方面，该报又到市场零星购买纸张、去产纸地区收购纸张，后来还在重庆附近的梁山、岳池以及华蓥山下的丁家坪等地创办小型纸厂，以扩大纸源，从而保证了《新华日报》的用纸，有时当别的报纸发生“纸荒”时还能济人之急。《新华日报》虽然使用的是手工制

作的土纸，但印字清晰，是战时重庆印刷质量最好的报纸，实现了中共中央南方局及周恩来对《新华日报》的要求：“编得好、印得清、出得早、销得多。”在发行方面，国民党有关当局曾对《新华日报》采用一种毒辣的办法，即“只准你办报，不准你出版”。他们通过控制报贩和邮局，阻止《新华日报》的发行。对此，新华日报社雇用了一百多名报童，其中大多数是穷苦人家的孩子，建立起自己的发行队伍。正是这些报童不畏艰险，为《新华日报》的发行立下了不朽的功绩。

在言论、新闻报道方面，《新华日报》始终同国民党的新闻检查制度进行斗争。该报把合法斗争和非法斗争结合起来、把原则的坚定性和策略的灵活性结合起来，在“反检”斗争中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胜利。在重大原则问题上，《新华日报》宁可违犯国民党当局制定的法律规定，必要时甚至不惜冒停刊的危险，全力突破国民党的新闻检查和新闻封锁，直接向国统区人民群众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主张。例如，1941年“皖南事变”发生时，《新华日报》在1月11日晚上得到这一消息，第二天就把这一国民党军队袭击新四军的严重事件在报纸上披露。1月17日，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发布了颠倒黑白的通令与谈话，污蔑新四军“叛变”，宣布撤销新四军番号，继续向新四军进攻。与此同时，国民党有关当局还胁迫重庆所有报纸刊登这一通令和谈话，《中央日报》、《扫荡报》等国民党系统的报纸还配发了社论。对此，《新华日报》在当晚躲开坐镇报社的新闻检查人员的监视，在18日出版的报纸上发表了周恩来为“皖南事变”书写的两个题词：“为江南死国难者致哀！”“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周恩来的题词，向国统区人民透露了“皖南事变”的真相，揭穿了国民党顽固派妄图一手掩尽天下人耳目的阴谋。刊有周恩来题词的《新华日报》，被许多人当做珍贵资料保存，销数剧增五倍。除“拒检”外，《新华日报》还常常采用“暴检”的手段，来揭露国民党新闻检查制度的罪恶。所谓“暴检”，就是在报纸上开“天窗”，将国民党删改言论、新闻报道的行径予以公开暴露（曝光）。所谓“开天窗”，就是在被检查人员删去内容的报纸版面上故意留下空白，或在空白版面上排上“此段遵检”、“被删”、“被略”等字样，以示抗议。

四、香港、澳门与海外的抗日报刊及其宣传活动

从1937年7月抗战开始到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澳门等地区因其所具有的特殊的政治与地理环境，也一度成为抗日办报与宣传活动的重要阵地。

抗战爆发后，香港原有报纸《华侨日报》、《华侨晚报》、《工商日报》、《工商晚报》、《华字日报》等，很快投入了抗日宣传报道。随着平津、沪宁等大城市的

相继失陷，这些地区的部分爱国新闻文化工作者纷纷南下香港，或将内地报纸迁入，或创办新报，或参与当地新闻工作。1937年冬，上海国际宣传委员会最早迁至香港，改名国际新闻社，由恽逸群负责。该社以香港为基地，向海外数十家华侨办的中文报纸发稿，深受欢迎。1938年3月1日，上海《申报》迁香港出版，至1939年7月停刊，在港共出版一年零三个月。1938年4月1日，上海《立报》迁港复刊。该报在复刊后的近半年中，由于得到香港中共组织的政治关怀和经济援助，并经总编辑萨空了等人的努力，积极反映各界民众的抗日呼声和民主进步要求。1938年9月，由于成舍我的干扰，萨空了被迫离去，该报的政治倾向转趋保守，至1941年底停刊。8月13日，《大公报》创办香港版，11月增出《大公晚报》。该报及时、系统地揭露汪精卫叛国投敌的宣传，很受社会关注。它的《文艺》副刊，在女作家杨刚的主编下，成为鼓吹抗战、团结、进步的号角。同年8月，重要国际时事刊物《世界知识》亦迁至香港出版。

在香港新创办的报刊，影响较大的有《保卫中国同盟新闻通讯》和《星岛日报》等。1938年6月，宋庆龄领导的“保卫中国同盟”在香港成立，并出版该同盟的中英文会刊《保卫中国同盟新闻通讯》。该刊的英文版由爱泼斯坦和贝特兰负责编辑，中文版由邹韬奋、金仲华等负责编辑。该刊的任务是宣传团结国际进步人士和海外华侨援助中国抗战，刊登了宋庆龄写的不少文章和致国际友人的信。该刊还大量介绍八路军、新四军、敌后抗日民主根据地和国民党统治区的抗日活动情况，成为世界人民了解中国抗战的一个重要窗口。8月1日，《星岛日报》创刊。该报系著名华侨商人胡文虎创办，聘请进步人士金仲华任总编辑，杨潮（羊枣）为军事评论员，还约请作家夏衍、沙汀等经常为其副刊《星座》写稿。该报由于积极宣传抗日，笔锋犀利，生动活泼，赢得国内外读者赞誉，因而一度成为香港地区宣传团结抗战的进步新闻阵地。1941年6月1日，在国民党特务的干扰破坏下，金仲华、羊枣等进步人士被迫辞去该报职务。

1941年初皖南事变发生后，国统区进步报刊的处境维艰，一些进步的新闻文化界人士纷纷转移到香港办报。他们以香港为基地，既向海外华侨宣传抗日，又积极影响内地的政局。其中最有影响的是《华商报》晚刊、《大众生活》周刊、《光明报》等。《华商报》晚刊创刊于1941年4月8日，日出对开一大张，每日下午5点钟出报，是一份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具有统一战线性质的报纸。该报在廖承志的主持下，由邹韬奋、茅盾、范长江、夏衍、乔冠华、金仲华、胡仲持等7人筹办，著名爱国商人、华比银行经理邓文田及其兄弟邓文钊分任督印人兼正副总经理，范长江也以副总经理的名义主持日常工作，胡仲持担任主编，廖沫沙担任编辑主任，夏衍主持社论及文艺版，后社论版由张友渔主持，茅盾、乔冠

华、金仲华、胡绳等都参与编辑工作，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于12月12日停刊，仅出版了8个月。《华商报》在宣传上以团结抗日为宗旨，创刊开始即连载邹韬奋撰写的长篇纪实报告《抗战以来》。随后，该报还发表了范长江撰写的《祖国十年》等佳作，起了振聋发聩的作用。《大众生活》周刊创刊于1941年5月17日，邹韬奋创办并担任主编，编委会成员有金仲华、沈雁冰、夏衍、胡绳、沈志远、千家驹等，发行数曾高达10万份，出至第30号后因太平洋战争爆发而终刊。其社评几乎都出自邹韬奋之手笔，特点是及时、讲透、有针对性。该刊还设有“信箱”、“大众之声”等栏目，尽量刊登读者来信来稿。邹韬奋亲自主持“简复”专栏，用最大的精力处理读者来信来稿，尽其所能为读者答疑解惑。由于《大众生活》反映和加强了海外侨胞渴望抗战胜利、祖国振兴的愿望与舆论，因而在海外读者中影响巨大，平均每期销数高达10万份。《光明报》于1941年9月18日创刊，为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的机关报，由梁漱溟任社长，萨空了任总经理，俞颂华任总编辑，羊枣任国际新闻编辑，出至12月14日停刊。

在澳门，“七七”事变后，澳门《朝阳日报》、《大众报》同人于1937年9月联合发起成立文化、体育、音乐、戏剧界抗日救国组织“澳门四界救灾会”，每周出版《救灾特刊》，进行抗日救国宣传。使用“救灾”一词，是因为“抗日”一类的词语在当时为澳门当局所禁限。同月，澳门新闻界为加强团结抗战力量，成立澳门新闻记者联合会。该会以致力救亡宣传、鼓舞团结澳门同胞投身抗日救国活动为宗旨，承担起主编《救灾特刊》和每逢“七七”、“八一三”等抗战纪念日增出专刊的任务。同年11月，香港《华侨日报》创办澳门版《华侨报》，积极宣传抗日，销量达1万份。

在海外各地，绝大多数华人华侨主办的华文报刊，不论原有的政治立场和背景如何，在抗日战争爆发后，无不同仇敌忾，积极宣传抗日救国，并发动侨胞捐款捐物、抵制日货，支援祖国抗战。同时，还出现了不少新办的以抗日为主旨的华文报刊。

以新加坡、马来亚为中心的东南亚是海外抗日办报宣传活动最为活跃的地区。自1937年抗战开始至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这一时期，新加坡、马来亚出版的华文报刊有29种，其中以胡愈之、郁达夫等抗日爱国人士主办的报刊影响最大。1940年底，著名新闻出版工作者胡愈之奉中共中央的指派，赴新加坡开辟海外抗日宣传阵地。同年12月1日，胡愈之应聘担任新加坡爱国侨领陈嘉庚创办的《南洋商报》的编辑主任。次年1月1日，他正式接手编辑出版该报，立即推行报纸革新计划。经过仅一年的努力，胡愈之把《南洋商报》办成了“民众喉舌、舆论前驱”，日销数由原来的2万份增至5万份，成为当时东南亚地区最

畅销的报纸。从抗日战争中后期到战后初期，胡愈之在东南亚从事新闻宣传工作七年多，以“华侨新闻界的马前卒”自命，是一位杰出的海外报刊活动家。

另一位华侨领袖胡文虎在新加坡创办的《星洲日报》，也为宣传抗日救国立下了大功。1938年底，著名作家郁达夫应星洲日报社的聘请赴新加坡。次年1月起，他担任该社早报副刊《晨星》和晚报副刊《繁星》的主编，后来又兼编《文艺》、《教育》周刊和《星洲》半月刊，还参与编辑纪念该报创刊十周年的大型年鉴式特刊《星洲十年》。1940年下半年曾代行该报主笔职务三个多月，撰写了不少社论。1941年，郁达夫还兼任新加坡英国当局新闻情报部出版的《华侨周刊》。在1938年底至1942年初的三年中，郁达夫以《星洲日报》等报刊为阵地，以惊人的勤奋撰写发表了大量宣传抗日的政论、短评、杂文和诗词，为祖国的抗日新闻文化事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1942年2月新加坡沦陷后，郁达夫和胡愈之等撤退到苏门答腊。1945年9月17日，郁达夫惨遭日本宪兵杀害。

此外，马来亚的《星槟日报》，菲律宾的《救国导报》，泰国的《华侨日报》，缅甸的《中国新报》、《侨商报》等华文报刊，也都积极报道中国的抗日战争。

在美洲地区，《美洲华侨日报》于1940年7月7日在美国纽约创刊。该报是由梅参天、徐永英等和纽约华侨衣馆联合会的一些会员创办的，首任社长冀贡泉，总编辑唐明照。《美洲华侨日报》创刊后，积极响应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号召，致力于报道祖国正面战场和敌后游击战争的情况，帮助华侨了解祖国和抗战的真相，还发动华侨捐款赠物以支援祖国抗战，深受美国华侨读者的欢迎和支持，销数达5 000份。

在欧洲地区，不少华文报刊在抗战期间积极开展抗日宣传。全欧华侨抗日救国会于法国巴黎创办的《联合战线》、《祖国抗日情报》等报刊，都以宣传抗日救国为自己惟一的使命。

第三节 沦陷区的新闻事业

一、日伪新闻事业的建立与发展

1931年9月18日，日本帝国主义发起蓄谋已久的侵华战争，强占了中国的东北三省。1937年7月7日，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卢沟桥事变”，大举入侵中国的华北、华中和华南地区，强占了中国的半壁江山。在这些沦陷地区，新闻事业遭到了空前的大劫难。日本侵略者及其扶持的汉奸政权、组织及汉奸分子残酷地迫害与镇压一切具有民族气节的报刊、通讯社和广播电台，创办为日本的侵略罪行张目、奴化沦陷区民众的报刊、通讯社和广播电台，使沦陷区的新闻事业日趋

殖民化。

据统计，自1937年抗战爆发至1940年，日伪在我国19个省（不包括东北地区）的大、中城市中创办的报刊，最多时达六七百种，其中稍具规模的大约有200种，较大的杂志有100多种。

以长春、沈阳为中心的东北地区，在1931年“九一八”事件后就沦为日占区。1932年3月1日，在日本关东军的一手操纵下，伪满洲国宣布成立，设伪都于长春，大批日本人出任伪满要职，主宰东北的一切。与之相应，大批日本人担任新闻机构或新闻统制机构的主持人或实际主持人。据统计，伪满地区的报纸，1940年7月时为39种，绝大多数由日本人直接主办。其中，在长春出版的有5种：日文《满洲新闻》，原名《大新京日报》，1935年2月创刊，主办人为日本人和田日出吉；日文《新京日日新闻》，原名《长春实业新闻》，1920年12月创刊，1932年改本名，主办人为日本人城岛德寿；中文《大同报》，主办人为日本人染谷保藏；朝鲜文《满鲜日报》，主办人为李性在；英文《满洲日报》（Manchuria Daily News），主办人为日本人小野敏夫。在沈阳出版的有4种：日文《满洲日日新闻》，曾在大连出版，主办人日本人松本丰三；日文《奉天每日新闻》，1918年7月由日本人松宫干树创办，主办人为日本人松宫琴子；中文《盛京时报》，为日本人在华出版时间最长的中文日报，1906年9月1日由南满铁路株式会社出资创办，日本人菊池贞二（笔名傲霜庵）长期担任总编辑；中文《醒时报》，主办人为张友兰。1942年后，根据1941年伪满颁布的《新闻社法》的规定，伪满当局实行新闻社（即报社——作者注）新体制，建立起由伪满当局直接控制的中文的《康德新闻》、日文的《满洲日日新闻》和《满洲新闻》三大新闻社。《康德新闻》社合并了东北地区18家中文报社，连著名的《盛京时报》也未能幸免，被改组为《康德新闻》社奉天分社。《满洲日日新闻》社合并了3家日文报社，《满洲新闻》合并了4家日文报社。1944年5月，随着战局的变化，《满洲新闻》和《满洲日日新闻》又合并为《满洲日报》。

在华北地区，北平、天津是日伪新闻事业比较集中的两个城市。在北平，日伪报纸主要有《新民报》、《实报》、《晨报》、《华北日报》、《华北新报》等。《新民报》创刊于1938年1月1日，是日伪组织“新民会”劫夺成舍我的《世界日报》资产创办的大型报纸，日出对开两张。抗战爆发后，《世界日报》被日寇没收，初由汉奸魏诚斋主办，不及一年被改组为“新民会”的机关报《新民报》，由日本人武田南阳任社长兼总主笔。《新民报》出至1944年4月30日停刊。《实报》原是我国北方著名小型报，创刊于1928年10月4日，社长管翼贤，发行量最高时曾达10多万份。北平沦陷后，管翼贤沦为汉奸，《实报》随之成为日伪的

宣传工具。《晨报》在“五四”时期就是一份著名的报纸，1937年“七七事变”后一度停刊，1939年6月改组复刊后成为一份附逆报纸。《华北日报》创刊于1929年元旦，原是国民党中央宣部直接创办的中央直辖党报，后被日寇“劫收”，成为敌伪报纸。《华北新报》创刊于1944年5月1日，是日本侵略者因面临经济等种种困难而不得不压缩其新闻事业的结果，系将原《新民报》、《实报》以及天津的《庸报》等所有报纸合并改组而成，由伪华北政务委员会情报局主办。在天津，日伪报纸主要有《庸报》、《东亚晨报》、《救国日报》、《新天津报》等。《庸报》原是华北地区有影响的大型日报，1926年6月由董显光创办，是当时天津仅次于《大公报》、《益世报》的第三大报。天津沦陷后，日本军部派同盟社大矢信彦接管该报，使其成为“北支派遣军”机关报。1944年5月，该报改名为天津《华北新报》继续出版，成为汉奸报纸《华北新报》的天津地方版，并改由伪华北政务委员会情报局领导，直至1945年日本投降后停刊。

在华东地区，上海、南京是日伪新闻事业的中心。在上海，日伪报纸主要有《新申报》、《中华日报》、《平报》、《国民新闻》、《新中国报》等。《新申报》创刊于1937年10月1日，日出对开一张半，内容以刊登日本军部言论、消息为主，是驻沪日军指挥部直接创办的大型日报，社长为日本人坂尾与市，后改组成为日文报纸《大陆新报》的中文版，1945年日本投降后停刊。《中华日报》创刊于1934年4月11日，反映国民党中央汪精卫集团的政治倾向，1937年11月29日停刊，1939年7月10日汪精卫集团投敌后复刊，沦为汉奸报纸，1940年3月汪伪政府正式成立后改组为汪伪南京国民政府的机关报，由汪伪政府宣传部主管，社长初为林柏生，后为许力求。该报日出一张半，详载汪精卫及伪中央大员的言论和伪国民党中央、国民政府的施政方针，社论多由汪精卫亲自撰写或由其秘书代拟，1945年8月21日终刊。《平报》创刊于1940年9月1日，由大汉奸周佛海主办，罗君强、金雄白先后任社长，1945年7月1日自动停刊。《国民新闻》创刊于1940年3月22日，由汉奸大特务李士群主办，黄敬斋任社长，日出一张，多刊电讯及译著。《新中国报》于1940年11月7日创刊，日出一张，社长为严军光（袁殊）^①，1945年8月16日停刊。此外，著名大报《申报》、《新闻报》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也沦为附逆报纸。1942年2月14日，日本侵略者勒令《申报》复刊，并指派汉奸陈彬龢任社长兼总编辑。同时，日本侵略者还把《新闻报》“改组”为日伪的宣传工具，由吴蕴斋任社长兼董事长。在南京，日伪报纸主要有《民国日报》、《新南京报》、《南京晚报》、《中报》等。《民国日报》的前

^① 袁殊系坚持在沦陷区工作的中共秘密党员。

身是《南京新报》，1938年8月改现名，成为汪伪政府宣传部直属报纸之一，社长秦墨晒，多载伪政府的消息。《南京晚报》于1939年1月创刊，社长曹见微。《中报》创刊于1940年3月30日（即汪伪“国民政府”成立之日），周佛海为董事长，罗君强为社长。

在华南地区，日伪报纸主要集中在广州、香港等地。在广州，日伪报纸主要有《中山日报》、《迅报》、《民声报》等。《中山日报》创刊于1940年1月，社长陈伯起，后为林汝衡。日出一张半，积极宣传汪伪的“和平运动”。《迅报》是日本“南支派遣军”司令部机关报，由唐泽信夫任社长。该报最初同时出版中文、日文两个版本，后日文版改组为独立出版的《南支新闻》。太平洋战争前夕，该报还一度出版晚刊。《迅报》一直办到日本投降为止，前后历时7年之久。在香港，日伪报纸有《南华日报》（社长邝启东）、《天演日报》、《香岛日报》、《大光报》、《东南晚报》、《华侨日报》等。

日伪在沦陷区建立的广播电台大约有五六十座。在东北地区，早在1925年7月，日本帝国主义就在中国东北地区建立了大连广播电台——“大连放送局”。该台由“关东州递信局”管辖，呼号为JQOK，发射功率500瓦。这是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设立的第一座广播电台，也是我国东北境内第一座广播电台。“九一八”事变后，日寇先后攫夺中国东北的沈阳、哈尔滨两座广播电台，组成沈阳广播电台，于1931年10月26日开始播音。1932年3月伪“满洲国”在长春成立后，日伪把长春改称“新京”，日本主管通信、广播事务的关东军特殊通信部也迁到长春。该部在其管辖的新京电话局内设立演播室，以奉天放送局新京演奏所的名义开始播音。在此基础上，日伪又于1933年4月成立由关东军司令部直接控制的新京放送局，9月起移交隶属于伪满交通部的电信电话股份有限公司（简称“电电”）接管，1937年“七七事变”后改名为“新京中央放送局”，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又改称“新京放送总局”，作为伪满广播事业的中心。1944年，日伪在东北的广播电台已增加到25座。

在华北地区，北平、天津、太原、青岛等地的广播电台于1937年“七七”事变后相继沦入日军之手，并在日本广播协会的直接掌握下先后恢复播音。1938年1月1日，以汉奸王克敏为首的“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北平宣告成立的同一天，伪北平中央广播电台开播，作为华北地区日伪广播事业的中心。1940年7月，由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改组而成的“华北政务委员会”控制下的华北广播协会成立，下辖广播电台8座，分布于北平、天津、济南、青岛、石家庄、唐山、太原、徐州等地，总发射功率为100千瓦。1939年9月1日成立的伪“蒙疆联合自治政府”也设有蒙疆广播协会，控制绥远、察南、晋北等地广播事业，

先后在张家口、大同、呼和浩特、包头等城市办起了广播电台。

在华东地区，上海、南京是日伪创办广播电台的主要城市。1937年11月上海沦陷后，日本侵略军霸占了国民党在上海的两座广播电台，并利用其设备建立起大上海广播电台，作为日本侵略军当局的喉舌。1938年3月，日伪“上海市广播无线电台监督处”成立，并宣称“取代原国民党中央广播事业指导委员会的全部职权”，强令上海各电台向该处申请登记。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侵略者一进入上海租界，就把所有的民营广播电台一律查封，并强行接收美国人主办的广播电台，使日伪的广播电台一统天下。在南京，日本侵略者在1937年12月13日占领后建立“南京广播电台”，1941年2月汪伪中国广播事业建设协会成立后被改组为“中央广播电台”。与此同时，汪伪中国广播事业建设协会还拟定广播电台的《组织章程》和《广播无线电台计划》，以统一沦陷区的广播事业，不仅控制南京的伪中央台，还控制上海、汉口、杭州、苏州、蚌埠等地的广播电台。

在沦陷区，日伪为了控制新闻来源，还创办了不少的通讯社。在伪满地区，通讯社由日本人直接掌握。1932年12月，日本帝国主义与伪满当局利用日本的通讯机构在东北设立的通讯网，建立起伪“满洲国通讯社”，简称伪“国通社”，总社设在伪满首都“新京”（即长春），伪满所属各省均设立一个支局（即分社）。1937年4月，伪“国通社”与日本同盟社签订了日满通讯一体化的协定，实际上成了日本同盟社的一个分支机构。1942年后，根据1941年伪满当局颁布的《通讯社法》的规定，伪满当局组建新的伪“满洲国通信社”，并赋予政府机关的地位，垄断了东北地区的新闻收集与发布。在华北、华中、华南等地区，日本同盟社的华文部在整个抗战时期成为沦陷区惟一的新闻来源。汪精卫投敌之后，该部又改组成汪伪组织的“中华通讯社”，于1939年11月3日在上海成立。1940年3月30日汪伪“国民政府”在南京成立后，伪宣传部为谋“宣传国策，统一全国新闻通讯事业”，于是年5月1日将汪伪组织在上海设立的“中华通讯社”和原“维新政府”所属的“中华联合通讯社”合并为“中华电讯社”，作为全国新闻通讯事业的最高统制机关，隶属于伪宣传部之下。“中华电讯社”除在南京设立总社外，还先后在东京、香港、上海、广州、武汉、杭州等地设立分社。该社理事长由汪伪政府宣传部长林柏生兼。

二、伪满等早期汉奸政权的新闻立法活动

在沦陷区内，日本侵略者还大力扶植汉奸败类，建立傀儡政权，如1932年3月9日建立的伪“满洲国”、1937年12月14日在北平建立的伪“中华民国临

时政府”、1938年3月28日在南京建立的伪“中华民国维新政府”、1940年3月30日汪精卫叛徒集团以所谓“还都”的形式在南京建立的伪“中华民国国民政府”等，实行其“以华治华”的殖民统治政策。这些在日本侵略者卵翼下的汉奸傀儡政府，为了掩饰其沐猴而冠的非法性质，无不喜欢玩弄法律的武器，为自己的卖国行为披上法制的外衣，在其统治的地区“合法”奴役人民。对于沦陷区内的新闻事业，这些傀儡政府也同样运用法律的手段，制定与颁行殖民新闻统制的法律与法规，建立殖民新闻统制的行政执法机构，实行殖民新闻统制。

在东北，1932年3月伪“满洲国”成立后，伪满当局立即着手制定与颁布实行殖民新闻统制的法律与行政法规。距伪“满洲国”成立仅7个月，由伪满咨询参议府制定的《出版法》于1932年10月24日公布，同年11月1日起施行。1934年3月，《出版法》经修正后重行公布。根据伪满《出版法》的规定，报纸、期刊的创办，实行严格的登记审核制度即批准制度。伪满《出版法》第9条规定：“发行新闻纸或杂志者”，应开具名称，掲載事项之种类，关于时事事项有无掲載，发行之时期，发行所及印刷所之名称及所在地，发行人、编辑人及印刷人之原籍、住所、姓名及生年月日等事项，“由发行人及编辑人连署”，“呈请民政部大臣准许”^①。对于伪满统治地区外出版的报刊，凡拟输入或移入伪满地区出售、散布的，也须由发行人或代售人开具名称，发行所之名称及所在地，发行人及编辑人之住所及姓名，关于时事事项有无掲載、发行之时期，输入或移入之经过路线及出售散布之区域，代售人之住所、姓名、生卒年月日及职业，代售人之名称及所在地等事项，“呈报民政部大臣备案”，并在“每次出售散布前，输入者向其输入地，移入者则向其发行所就近之警察官署及地方检察厅，分别各呈送一份，并呈送二份于民政部警务司备案”^②。关于报刊的禁载事项，根据伪满《出版法》第4、5、6条的规定，主要有以下十项：（1）“不法变革国家组织大纲或危害国家存立之基础”；（2）“外交或军事之机密”；（3）“恐有波及国交上重大影响之事项”；（4）“煽动曲庇犯罪，或赏恤陷害刑事被告人或犯人”；（5）“不公开之诉讼辩论”；（6）“恐有惑乱民心、扰乱财界之事项”；（7）“由检查官或执行警察职务所禁止的事项”；（8）“淆乱安宁秩序或败坏风俗”；（9）“官公署或依法令组织之议会所未公示之文书及不公开会议之议事”；（10）“民政部大臣、军政部大臣或外交部大臣关于外交、军事或财政上认为有障碍，或于治安维持上认为有必

^① 刘哲民编：《近现代出版新闻法规汇编》，641页。

^② 同上书，643页。

要之事项”^①。又据第27条的规定,非伪满地区出版、但在伪满地区销售的报刊也必须遵循上述规定,违者“禁止其出售、散布”^②。

1941年8月,伪“满洲国”又颁布了《通讯社法》、《新闻社法》与《记者法》(时称“弘报三法”),用法律手段强化新闻事业的所谓“国家”垄断政策,使新闻社(即报社)、新闻通讯社以及新闻记者的一切活动,都处于伪满当局的严格管制之下。根据“弘报三法”的规定,伪满的新闻通讯社、新闻社(即报社)均由伪政府直接管制;通讯社理事长、理事、监事由伪国务总理大臣任命;新闻社理事长、监事由国务总理大臣任命,理事由理事长推荐并由国务总理大臣任命;伪满通讯社、新闻社之业务,国务总理大臣可作监督上及公益上的命令;新闻记者须申请登记,由国务总理大臣许可。

在制定与颁布实行法西斯殖民新闻统制的法律与行政法规的同时,伪满当局还设立实行殖民新闻统制的行政执法机构,建立殖民新闻统制制度。1932年,即伪“满洲国”成立之初,伪满当局在中央政府中设立资政局弘法处,以作为其思想舆论的统治机构。1933年,伪满当局决定撤销资政局,另在国务院总务厅内设立情报处,统管东北地区的新闻、出版、广播等大众传播媒介。1935年10月,伪满当局建立东北地区新闻事业的统制机构——满洲弘报协会,将报纸的报道、言论、经营三方面统一起来,实行垄断性的“官制统治”。1937年,经过日伪当局的三次报业“整理”,满洲弘报协会几乎囊括了东北的所有报纸。同年,日伪当局为了进一步控制东北地区的新闻舆论与文化宣传,又将情报处扩大为弘报处,其职能也随之扩大。1940年12月,伪满当局干脆由弘报处出面包揽新闻舆论与文化宣传的一切统制事宜,确立了文化行政一元化的体制,弘报处的机构及职能再次扩大,原执掌这一权力的伪满弘报协会因特殊任务完成而奉命解散。

在华北,新闻事业的统制初由伪北平特别市警察局情报处主持,后由伪华北政务委员会政务厅情报处接管。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为使其新闻统制合法化,用法律手段钳制华北沦陷区人民的言论出版自由,于1938年7月15日公布伪“临时政府”临时第95号《出版法》,并于同日起施行。这一《出版法》共7章57条,虽以伪“临时政府”的名义颁行,实由日本人亲手制定。翌年2月9日,伪“临时政府”又制定出《出版法施行细则》14条。根据伪“临时政府”《出版法》第9条的规定,报纸、期刊的创办,实行实质上是批准制的登记审核制度,“为新闻纸或杂志之发行者,应由发行人于首次发行前,填具登记声明书,

① 刘哲民编:《近现代出版新闻法规汇编》,640页。

② 同上书,644页。

呈由发行所在地之地方主管官署，于十五日内呈转省公署或特别市公署核准后，始得发行”。登记申请书应载明的事项包括“新闻纸或杂志之名称”、“社务组织”、“资本数目及经济状况”、“刊期”（“发行新闻纸者，并应载明其版数”）、“发行所及印刷所之名称及所在地”、“发行人及编辑人之姓名、年龄、经历及住所”等内容。“省公署或特别市公署，接到前项登记申请书后，除特别情形外，应于四周内核定之，并转请行政部发给登记证。”所谓“地方主管官署”，“在省为县公署，在特别市为警察局”^①。《出版法》中规定的禁载事项，以维持其汉奸傀儡统治的条款为主，如“蔑视国家之制度或政府之行为”、“诋毁外国元首或驻在本国之他国外交官”等，但还包括一些从国民党当局的《出版法》中抄来的条款，如“意图颠覆政府或损害中华民国利益”、“意图煽惑他人而宣传共产主义”^②等。其中汉奸傀儡本性表现得最为显明的是不得“诋毁外国元首或驻在本国之他国外交官”这一条。所谓“驻在本国之他国外交官”，自然是指这伙汉奸所依靠的日本主子。

在华北，伪“临时政府”还通过在其直接控制下的华北宣传联盟、华北新闻协会、华北广播协会等专营统制组织，实行新闻事业的垄断政策。日本驻华北派遣军报道部则是凌驾于伪“临时政府”宣传局之上的太上皇，甚至直接出面控制新闻事业。在开封出版的《新河南日报》虽名义上是伪政府的机关报，但实际上由开封日本驻军直接控制，伪政府对该报社的社长及其他内部人员均无权任免。许多在当地有较大影响的报纸，如北平《新民报》、《武德报》等，由日本人出任社长。华北的广播电台，初由日本广播协会直接管制，1940年伪华北广播协会成立后，日本广播协会在名义上把华北各地的广播电台移交伪华北广播协会专营统制，实际上仍由日本人掌握该协会的实权。

在华中，伪“中华民国维新政府”成立后，本着加强新闻统制的目的，在伪政府行政院内设置宣传局，主管文化及新闻宣传事宜。1939年8月后又在全省、市、县组建掌管新闻宣传的权力机关“宣传委员会”。为了使其新闻统制合法化，伪“维新政府”在其成立不满六个月后即颁布法律，通过法律手段钳制华中沦陷区人民的言论出版自由。1938年9月3日，伪“维新政府”第18次立法会议通过了两项有关言论出版的法律。一是《出版法》，共7章54条。伪“维新政府”《出版法》的有关规定与伪满、伪“临时政府”颁行的《出版法》的内容基本相同，报纸、期刊的创办实行严格的批准制度，不同点是最后核准权掌握在伪“维

① 刘哲民编：《近现代出版新闻法规汇编》，626页。

② 同上书，628页。

新政府”的内政部手中，并在关于登记申请书应载明的事项中要求载明报刊“编辑大纲”，意在以此限制报刊的编辑内容。伪“维新政府”的《出版法》中规定的禁载事项，照抄照搬伪满、伪“临时政府”以及国民党当局的《出版法》的有关条款，同样以讨好日本主子、维持其汉奸傀儡统治为主旨。二是《著作权法》，共5章42条。这两项法律均于通过的当日公布施行。《出版法》颁行后，伪“维新政府”以此为依据，要求华中沦陷区内的报刊重新履行登记手续，按照日伪的旨意对报刊进行整顿。此外，华中各地的报纸，其发行出版还须得到当地日军特务机关的批准，并在报头位置标上“本报经XX军事特务班特许发行”的字样。甚至各地伪政府的宣传委员会也须征得当地日本驻军及其他机关的同意方可成立。伪上海特别市宣传委员会，不仅其成立须事先征得日本驻沪总领事馆、特务机关本部、集团司令部、军报道部、兴亚院华中联络部、海军武官府、上海宪兵司令部上海警备司令部等七个日本驻沪机关的审核同意，还特聘日本驻沪特务机关的一名高级官员为总指导，赋予随时指导一切的特权。广播电台则直接由日本驻军管理。

三、汪伪新闻统制制度的建立

1940年以汪精卫为核心的伪“中华民国国民政府”成立后，立即着手制定与颁行新闻法律法规，以确立言论出版统制的基本法律依据。值得注意的是，汪伪制定与颁行的新闻法律法规，凡是与迁至重庆的国民政府颁行的新闻法律法规同名的，均名之为“修正公布”，以图掩盖其伪法统的实质。

汪伪制定与颁行的主要是有关“计划新闻制度”的法律法规。汪伪政府成立后，为了加强宣传活动，同时也为了增添一些“合法”的色彩，在行政院内特增设宣传部，对包括新闻宣传在内的所有宣传活动实行统一管制。汪伪“国民党中央”的宣传部与伪行政院宣传部合署办公。接着，汪伪政府宣传部开始接管与调整原伪“临时政府”、“维新政府”的新闻宣传机构，并通过颁行一系列新闻宣传统制法规，建立一系列与上述法规相关联的新闻宣传统制机构，逐步形成了一个所谓的“代表国家的计划新闻制度”^①。计划新闻制度，是汪伪政府所谓的新闻法制建设的特产。所谓“计划新闻制度”，本质上只是汪伪政府掩盖其法西斯新闻统制性质的一种美称，“计划”实质上就是“统制”。汪伪“计划新闻制度”的具体内容，一是新闻宣传事业的双重管理制度。根据汪伪《宣传部组织法》、《省市（直辖市）宣传处组织规程》等法规的规定，汪伪统制下的新闻宣传事业必须接

^① 《报业旬刊》，第1卷第1号（汪伪政府宣传部中央报业经理处发刊），1941-10-20。

受汪伪中央政府宣传部及地方宣传处或科的双重管理与指导。汪伪政府行政院设宣传部，管理国内国外宣传事宜，下设宣传指导司、宣传事业司、特种宣传司、国际宣传局等部门。在地方，汪伪政府将原伪“维新政府”时期的宣传委员会改组为直属于省市政府的宣传处，主管不直属宣传部之省市宣传事宜。二是直属报社及其管理制度。根据汪伪政府宣传部颁布的《宣传部直属报社管理规则》、《宣传部直属报社分区改进委员会组织通则》、《直属报社组织通则》等法规的规定，直属报社统归汪伪政府宣传部管理，其负责人及总编辑由伪宣传部任命，办事规则、营业状况等须由伪宣传部核定，在业务上根据伪宣传部的宣传计划编排新闻、撰发社论，所出报纸直接送伪宣传部审查。直属报社视篇幅之大小，经费及发行额之多寡，所在地之重要性如何，分为甲乙丙三级。甲级分为甲级中央报、甲级地方报两种，甲级中央报是代表汪伪中央政府的宣传指导报，在汪伪政府首都南京及上海出版，如《中华日报》、《南京新报》。甲级地方报在伪省政府所在地出版，如《杭州新报》、《苏州新报》等。乙级报在上述甲级报出版地点以外的主要都市出版，以产业中心或交通要衢所在地为主。丙级报一般在县政府所在地出版。三是统一的报业经营制和书报发行制。为了加强对直属报社的管理与控制，1940年间，汪伪政府还建立伪中央报业经理处、中央书报发行所，颁布《中央报业经理处组织章程》、《中央书报发行所组织章程》等有关法规。伪中央报业经理处具体负责对伪宣传部直属报社的管理指导业务，对沦陷区内有关报纸的用纸、器材等报业物资和广告业务实行统一经营制。伪中央书报发行所对书报的流通实行书报发行制。伪宣传部还实行分区管理制度，在南京、苏州、杭州、上海等地设立直属报社分区改进委员会，负责督导分区内各直属报社的业务活动。

1941年1月24日，汪伪政府颁布《出版法》，并自公布之日施行。这一《出版法》共7章55条，大部分内容抄袭伪“临时政府”的《出版法》，也沿用一部分战前国民政府于1930年颁行的《出版法》的内容，并特别标明“民国三十年一月二十四日修正公布”的字样。根据这一《出版法》第54条的规定，汪伪政府宣传部、警政部于翌年1月25日又会同修正公布《出版法施行细则》25条，与《出版法》共同施行。1941年5月，汪伪政府宣传部颁布《宣传部直属报社管理规则》，同年8月颁布《宣传部直属报社分区改进委员会通则》，9月颁布《直属报社组织通则》，确立了由汪伪政府宣传部直接管辖的直属报社分区分级管理制度。1942年4月，汪伪政府因警政部的取消而对《出版法》作了一次修正。同年6月，又公布并施行《修正战时出版法》。汪伪《出版法》及其《施行细则》的主要规定有三：一是报纸、期刊等一切出版物均须在发行前申请登记

并经有关部门的审查批准，以前已登记出版的报刊必须重新登记。与蒋介石国民党政府不同之处是，确立了汪伪政府宣传部对报刊的管理权，规定报刊的登记申请须经宣传部核准，改变了国民党政府由内政部核准的做法。二是袭用国民党政府的《出版法》限制对报刊的发行人或编辑人的条件、在各类地区级别出版的报纸申请所需的资本数目等做法，并作了具体的规定。报纸登记申请的资本数目，“在人口百万以上省政府或市政府所在地刊行报纸者，一万元以上；刊行通讯稿者，三千元以上”。“在人口未满百万之省政府或市政府所在地刊行报纸者，六千元以上；刊行通讯稿者，一千元以上”。“在特区行政公署、县政府或设治局所在地刊行报纸者，一千元以上；刊行通讯稿者，二百元以上。但该地向无报社或通讯社之设立，而创刊报纸者，得减低至五百元以上；创刊通讯稿者，得减低至一百元以上”^①。通过资本限制报刊的创办、调整报刊结构与布局，是汪伪政府实行新闻统制的一种软性方法。三是对报刊的禁载事项作了严格的规定。汪伪的《出版法》除了全盘接过上述禁载事项外，还新发明了一条不得为经宣传部命令禁止登载的言论或宣传之记载的规定，为汪伪政府宣传部任意限禁报道与言论提供了法律依据。汪伪的《出版法施行细则》还规定，禁载事项之限制还适用行政院会议关于出版品各项决议。在汪伪政府颁布的法律法规中，有关新闻出版的禁载事项，数1940年10月汪伪政府颁行的《全国重要都市新闻检查暂行办法》规定得最为详尽：“一、关于违反和平反共建国国策，破坏三民主义或其他有反动形迹者；二、关于挑拨离间，企图倾覆政府，危害民国者；三、关于造谣惑众，希图扰乱地方，破坏金融者；四、关于损害中华民国利益者；五、关于破坏邦交者；六、关于泄露政治、军事、外交应守秘密者；七、关于妨害善良风俗者；八、关于破坏公共安宁秩序者；九、关于诉讼事件依法尚未公开及不许登载者；十、其他经宣传部通令禁止发表者。”^②

新闻检查制度是中华民国国民党当政初期即推出的一项钳制新闻事业的重要手段。沦陷初期，日本侵略者接管了国民党政府的新闻检查所，将新闻检查大权掌握在自己手中。日本侵略者决定将新闻检查权交还给汪伪政府后，汪伪政府行政院会议通过了《全国重要都市新闻检查暂行办法》（1940年10月1日）等法规，对沦陷区内的报刊、通讯社稿进行严格的新闻检查。《全国重要都市新闻检查暂行办法》的施行，标志着汪伪政府新闻检查制度的正式确立。该法规对新闻检查的目的、组织、方法、报刊的禁载事项及其处罚规则，均作了十分严格与苛

① 刘哲民编：《近现代出版新闻法规汇编》，616页。

② 同上书，600页。

细的规定。1941年12月9日，伪首都（南京）新闻检查所开始筹设，翌年1月正式成立。至1942年，汪伪政府已在沦陷区各地遍设新闻检查所（室），形成了一个严密的新闻检查系统。新闻检查的内容包括报纸及通讯社所刊布的一切稿件，要求报社、通讯社在发行前将全部新闻、言论、图片、广告等稿件，一次或分次送当地新闻检查所检查。各新闻检查所接受检查的时间，一般为每日自上午十一时至翌晨三时止，必要时也可提前或延长。自1942年起，杂志也被列入新闻检查的范围。不依照《全国重要都市新闻检查暂行办法》规定将稿件送检的、不遵照删改稿件刊登的、对于应缓登或免登之消息仍行披露或私自泄漏的以及其他违反当地新闻检查所之规定或命令的报社、通讯社，各新闻检查所有权予以警告、禁止当日发行、有期停刊或停业、无期停刊或停业或并封闭馆所、没收机器生财等处分，情节严重的“得并将其负责人移送法院依法诉究”，“引起国家重大事件者，应照危害民国论罪”^①。所谓照危害民国论罪，就是说，因言论出版获罪者也有可能被处以极刑。为了防止沦陷区外的抗日报刊的传入，汪伪政府还于1940年6月制定了《全国邮电检查暂行办法》，实行邮电检查，规定各种报纸、刊物，不论何种文字，不分发送人国籍，皆在检查范围之内。

沦陷初期的广播事业由日本侵略者直接掌握。汪伪政府建立广播事业的管理制度，始于1941年2月日本侵略者宣布“交还”广播事业管理权后。根据汪伪政府颁布的《改组广播无线电台计划草案》、《广播无线电台条例草案》、《广播无线电台登记注册规则草案》、《广播无线电台播音节目审查办法草案》等法规的规定，汪伪时期的广播事业管理制度实行统合经营制度。所谓统合经营制度，就是“全国广播无线电台，均集中于一广播事业机构统合经营之。该机构视为公益法人，受宣传部直接监督指导，并有宣传部代表参加。惟鉴于目前情形，华北得设立华北广播事业机构，直隶于华北政务委员会。蒙疆亦准此直隶蒙疆自治政府”^②。这一制度的执行机构主要是伪中国广播事业建设协会和伪宣传部广播无线电台管理处。为了控制广播宣传，汪伪政府还实行无线电收听限制制度。根据汪伪政府颁行的《装设无线电收音机登记暂行办法》、《修正无线电收音机取缔暂行条例》、《无线电收音机取缔暂行条例施行细则》、《各地违禁收音机特许委员会组织办法》、《违禁收音机使用持有特许标准》、《装设收听广播无线电收音机暂行办法》等法规的规定，沦陷区人民装设收音机必须向当地主管官署申请登记、经主管官署核准并发给登记证后方准使用，登记申请书必须写明欲装设的收音机的机

① 刘哲民编：《近现代出版新闻法规汇编》，601—602页。

② 《改组广播无线电台计划草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件种类、真空管数、天线样式、电流供给状况、波长范围、购置或自行配制，不得制造、使用、持有或转让可收听短波或改作发报用的收音机。1943年10月，汪伪政府开始实行收音机装设许可制和收听费用征收制。凡以收听广播为目的而装设无线电收音机者，应按每一收音机为单位，向汪伪政府宣传部提出装设许可申请书，领取许可证，并与中国广播事业建设协会签订《收听契约书》以后方准使用，并试行收听交费制。

四、上海“孤岛”抗日报刊和沦陷地区的抗日宣传活动

1937年11月12日，国民党军队撤离淞沪，日军占领上海华界地区，英、美、法等西方国家控制的上海公共租界、法租界，因其四围均为日军侵占而形同“孤岛”。这一情形一直持续到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进占上海租界才结束。因此，上海“孤岛”是指1937年11月12日至1941年12月8日这段时期的上海租界地区。这一时期，中外各种政治势力，无不利用“孤岛”的特殊环境，在“孤岛”上创办报刊等各类新闻媒体，开展舆论宣传活动。其中中国共产党以及其他爱国政治力量与爱国人士主办的抗日报刊，始终是“孤岛”报业发展的主流，在特殊的环境中发挥了特殊的抗日宣传作用。

1937年11月12日上海租界沦为“孤岛”后，《救亡日报》、《立报》和《抗战》三日刊等报刊纷纷停刊或内迁。11月28日，日本军事当局宣布接管国民党设在上海租界内的新闻检查所，12月14日起迫令各报接受由日军报道部控制的上海新闻检查所的新闻检查。之后，《大公报》、《申报》等又一批抗日报刊被迫停刊或内迁。据1937年版《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年报》统计，30种原在租界出版的报刊停刊，4家通讯社停业。但是，中国共产党及其他抗日爱国党派、爱国政治势力并未全部撤离，而是留下了一部分宣传力量，采用灵活的斗争方式，开辟新的抗日宣传阵地。当时，中国共产党有鉴于上海租界内外文报刊为数甚多，其中不乏有关中国抗战的消息、评论与各类背景资料，决定创办一份纯翻译的小报，利用外报材料报道抗日信息，宣传抗日主张。1937年12月9日，这份纯翻译的抗日小报在上海租界诞生，取名《译报》，日出4开一张，由夏衍主持报务。该报刊登的新闻及言论，全部译自英、美、法等国通讯社稿和上海租界出版的外文报纸，但都经过编者的精心选择与改写，客观地报道了抗战的基本形势，无情地揭露了日军的侵略暴行，并准确地宣传了中国共产党关于实行抗日统一战线政策、坚持持久抗战的政治主张，深受读者欢迎，日销数曾高达两万份。12月20日，《译报》仅出版了12期，即被日军通过租界当局下令取缔。

由于以外商名义出版的中文报纸（时称“洋旗报”，如《华美晚报》、《大美

晚报》等)可以不受日伪的新闻检查,因而在1938年后出现了大办“洋旗报”的热潮。中国共产党等各派政治力量以及民间爱国人士,利用沦陷区大城市中租界的特殊条件,利用英、美、法等帝国主义国家和日寇之间的矛盾,打着“英商”、“美商”的招牌在租界内复刊或创刊“洋旗报”,或聘请外国人担任发行人,或在外国注册,以逃避日寇的新闻检查,报道抗战实况,宣传爱国主张。至1938年冬,在上海租界内出版的这类“洋旗报”达十六七家。其中最为著名的有《每日译报》、《文汇报》、《申报》、《新闻报》等。

《每日译报》创刊于1938年1月21日,其前身是《译报》,聘请英商中华大学图书公司主持人孙特司·裴士(Sander-Bates)和拿门·鲍纳(N. Boone)担任发行人兼总编、经理,但实际负责编务的是中共上海市文化工作委员会负责人梅益及王任叔、林淡秋、杨帆等。《每日译报》初为4开小型日报,内容与《译报》基本相同,自2月20日起改革版面、充实内容,除刊登外报译文外,还刊登自己采编的新闻,5月1日起扩充为4开一张半,6月1日起又扩大为4开两张,至6月28日改出对开一大张、并附副刊4开一小张。《每日译报》常刊登中共中央的文件和负责人的文章、讲话,还采用“特讯”、“专电”等形式报道有关共产党和八路军、新四军的抗战消息,反映抗战前线的战况。1939年5月18日,上海租界当局以《每日译报》所刊文字与维持租界安定有所抵触为借口,迫令其停刊两周。与此同时,日伪组织用金钱将英籍发行人裴士和鲍纳收买,致使《每日译报》在停刊期满后无法复刊。

《文汇报》创刊于1938年1月25日,日出对开4版一大张,系曾任沪宁、沪杭铁路局高级职员严宝礼等几位爱国人上集资创办。该报用高薪雇请英国人克明(H. M. Cumine)担任名义上的董事长兼发行人、总主笔,以避免日寇的新闻检查,但实际主持工作的是经理严宝礼、总编辑胡惠生等。当时,《大公报》迁内地出版,《文汇报》就租赁其原有设备代排代印。2月间,《大公报》负责人胡政之以李子宽、费彝民等人的名义,向《文汇报》投资1万元(实际在代印《文汇报》的劳务费及垫付的纸张费项目下扣除),同时还委派前《大公报》记者、当时正在为《文汇报》撰写社论的徐铸成担任《文汇报》主笔并主持编务。《文汇报》创刊后,义正词严地鞭挞汉奸丑类,揭露伪“上海大道市政府”的罪行;积极宣传抗战,及时报道中国军民奋勇抗战的事迹,十分重视报道、宣扬八路军、新四军的战绩,热情介绍八路军、新四军以及抗日根据地延安的情况;拥护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呼吁国共合作、一致对敌。1939年5月18日,《文汇报》与《每日译报》、《中美日报》、《大美报》一起被租界当局勒令停刊两星期,此后因洋保镖克明为日伪所收买而未能复刊。

《申报》与《新闻报》是上海老牌大报。1937年12月15日，《申报》因不接受日军检查而停刊。1938年10月10日，《申报》在大办“洋旗报”的热潮中，也假托美商名义在上海租界内恢复出版。《新闻报》在上海租界沦为“孤岛”后曾一度屈节接受日伪的新闻检查，1938年9月1日请回原主持者美国人福开森出任监督，以美商太平洋公司承租的名义出版，重新回到抗日宣传阵营中来。《申报》、《新闻报》挂上“洋旗”后，积极宣传抗日，揭露日寇侵略暴行，斥责汉奸叛逆行径，因而为日伪所嫉恨和迫害，报馆多次遭投弹袭击，记者、编辑多人遭暗杀和绑架。1941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申报》、《新闻报》一度被迫停刊，后被日伪改组为附逆报纸并恢复出版。

上海“孤岛”时期的“洋旗报”以及其他抗日爱国报刊，是在极其艰难、险恶的环境下出版发行的。以“洋旗报”为主体的抗日爱国报刊在上海租界内出现后，日伪恨之入骨，一方面通过同上海租界当局交涉设法予以取缔，另一方面采取威胁恫吓、投弹破坏、武装袭击、暗杀绑架等恐怖手段，疯狂迫害、摧残抗日报刊和报人。而抗日爱国报人则针锋相对，不屈不挠地坚持抗日宣传，用自己的鲜血和生命在中国新闻史上写下了悲壮的一页。

首先遭到劫难的是华美晚报馆。1938年1月16日，由于《华美晚报》和《华美晚报晨刊》拒绝刊登伪苏浙皖三省统税局通告，日伪暴徒在当天傍晚就将一枚锤形手榴弹投入报馆，致使设备受损、3位工作人员受伤。1938年2月间，《文汇报》在3日、5日曾用很大篇幅揭露日伪暴行，2月8日又发表社论《告若干上海人》，对上海几个意欲投敌的工商界要人提出严正警告，要他们悬崖勒马，不要当遗臭万年的汉奸。9日，报馆就收到了日伪方面以所谓“正义团”名义写来的恐吓信，扬言“倘再有反日情绪”，将杀害报馆人员。10日下午6时许，日伪方面又指使暴徒向报馆投掷手榴弹，当场炸伤工作人员两名。12日，报馆再次收到匿名恐吓信，该报当天就针锋相对地刊出社论《写在本报遭暴徒袭击之后》，予以反击，痛斥日伪的卑劣行径。此外，华美晚报馆、文汇报馆的主持人还曾收到过血淋淋的死人手臂，并恐吓说如不更改笔调将遭此滋味。其他报馆也同样遭到过类似的恐怖破坏事件。《每日译报》曾收到过十多份恐吓信件，充斥着“满门抄斩”一类的恐吓之词。

1939年至1941年间，日伪方面对上海进步报界的迫害更加残酷，“孤岛”新闻界被笼罩在一片白色恐怖之中。1939年5月，敌伪特务机关——伪“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特务工作总指挥部”（简称“特工总部”）成立。因该部设在沪西极司菲而路76号，故又称“76号”。“特工总部”成立后，日伪方面的恐怖活动更加猖獗，袭击、凶杀事件层出不穷，恐吓、绑架几乎无日不有。

《导报》、《中美日报》、《大美晚报》、《大晚报》、《申报》等报馆先后遭到汪伪特务的武装袭击。1939年6月17日，导报馆首遭袭击；7月22日晚，中美日报馆和大晚报馆遭袭击。申报馆曾连续4次被炸，《大美晚报》的印刷所和《大晚报》的排字房曾被暴徒捣毁。为了防卫，许多报馆只好在门前堆起沙袋，拉上铁丝网，装上铁栅门。《申报》等报馆还自费雇请租界巡捕做门卫，编辑、记者等主要工作人员住进报馆，以防不测。在疯狂袭击报馆的同时，日伪特务还一次又一次地残暴杀害爱国报人，先后被暗杀的有《大美晚报》中文版副刊编辑朱惺公、《大美晚报》中文版主持人张似旭、大光通讯社社长邵虚白、《大美晚报》国际版编辑程振章、《申报》记者金华亭、《大美晚报》广告部主任李骏英等。此外，《译报》主笔钱纳水、编辑唐焕栋，《新闻报》编辑倪澜深等曾被日伪特务绑架，《申报》编辑瞿绍伊、《新闻报》记者顾执中等遭枪击，所幸未遇难。1940年7月1日，汪伪“国民政府”在《中华日报》等汉奸报纸上公布了一份“通缉”名单，被“通缉”的83人中有43人是报界人士，仅申报馆工作人员就有经理马荫良，编辑伍特公、胡仲持等10人。

在沦陷地区，中国共产党和一些爱国志士也曾创办过一些抗日报刊，同日伪展开艰苦卓绝的斗争。天津在沦陷后不久，曾出现过《高仲明纪事》报、《炼铁工》、《抗战》、《匡时》、《中心月刊》、《前哨》月刊、《火线上》、《突击》、《后方》等二十多种小型抗日报刊。这些报刊大部分由爱国知识分子主办，物质条件极差，既无正规编辑记者，又无厂房设备和印刷条件，大多为油印，也有个别为铅印（如《匡时》等）。由于日寇的残酷迫害，这些报刊存在的时间一般都不太长，但其顽强不屈的抗日精神是十分难能可贵的。《高仲明纪事》报创刊于1937年，系秘密出版发行的油印小报，由爱国的职业报人们编辑，至1939年停刊，共出700余期，每期发行数达6000余份，在天津地区普遍流传，曾先后三次遭到敌伪查抄。《炼铁工》则由粗通文墨的工人编辑，流传于天津的大小工厂。在苏南，一份名为《青白报》的抗日小型报刊在1938年间曾在苏州附近一小镇上问世。

【学习思考题】

1. 简述《救亡日报》、《抗战》三日刊等抗日救亡报刊的出版经过与宣传报道特点。
2. 新华通讯社在抗战时期有哪些重大发展？
3. 评述延安《解放日报》在整风运动中进行改革的经过、成效和意义。
4. 延安《解放日报》在改革中提出并解决了哪些新闻理论问题？

5. 创办《新华日报》有何重大意义?《新华日报》有哪些重要经验?
6. 香港和海外有哪些著名的华侨华文报刊与报人?
7. 评述上海“孤岛”时期抗日报刊与爱国报人的艰苦斗争。



第十章

人民解放战争时期的新闻事业

第一节 国统区国民党新闻统制的 重建与新闻界的抗争

一、新闻事业中心的东迁与争夺新闻阵地的斗争

1945年8月抗日战争胜利后，国统区新闻事业的中心随着政治中心由西部向东部转移而重新返回上海、南京一带。

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统治集团，凭借其手中掌握的政权与法统，抢先在收复区扩展他们自己的新闻事业。9月，国民党政府行政院颁布了《管理收复区报纸通讯社杂志电影广播事业暂行办法》，规定：“敌伪机关或私人经营之报纸、通讯社、杂志及电影制片、广播事业一律查封，其财产由宣传部会同当地政府接收管理。”^①随后，国民党的“收复区全国性事业委员会”又拟定了《广播事业接收三原则》。根据这些法令，原沦陷区的敌伪报馆、电台、通讯社等各类新闻机构全部成了国民党的囊中之物。在接收敌伪新闻机构的基础上，一个较战前更为庞大的国民党新闻事业网迅速重建。

^① 刘哲民编：《近现代出版新闻法规汇编》，508页。

日本刚刚宣布投降，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就开始筹划《中央日报》等党营新闻事业的迁移工作，并派出一批专员，随同中央政府的受降人员一起，在美国空军的帮助下乘飞机回到南京、上海等地，抢占新闻阵地。1945年9月4日，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委派陈训愈与重庆《中央日报》副总编辑卜少夫等人，以出席南京受降仪式为名，由重庆乘专机飞回南京，接收了汪伪《中央日报》、《中报》和兴中印刷所，并利用其设备、资财乃至原班人员，在其原址南京新街口重建中央日报馆。9月10日，南京《中央日报》复刊，国民党中央宣传部新闻事业管理处处长马星野出任社长。11月12日，国民党军报《扫荡报》改名为《和平日报》出版南京版，随后总社也由重庆迁至南京。

上海历来是中国新闻事业的中心。战前，《申报》、《新闻报》等民营商业性大报地位巩固、影响广泛，使国民党系统的报纸根本无力与之竞争，这成了国民党当局的一个难愈的心病。战后，国民党抓住《申报》、《新闻报》战时附逆的把柄，对其实行“党化”政策，将它们改造成国民党的准党报。蒋介石亲自审批国民党中央宣传部拟订的《上海敌伪报纸及附逆报纸处置办法》，并对如何处置《申报》、《新闻报》多次做出指示。国民党中央宣传部拟定了《管理申报新闻报办法》和《申报新闻报报务管理委员会组织规程》等文件，同意两报继续沿用《申报》、《新闻报》的名称于11月间恢复出版，但必须组建由国民党要员担任主任的报务管理委员会。据此，《申报》、《新闻报》的报务管理委员会主任分别由潘公展、肖同兹担任。通过这些措施，国民党实际上接管了两报及其附属事业。1946年3月9日，国民党又拟定了两报的改组方案，用加入官股的办法改变两报的纯民营性质，并据此改选董事会，调整报社负责人员。此外，国民党还大力恢复和新办一批党营报纸。1945年8月23日，即日本宣布投降后第九天，国民党上海市党部主任吴绍澍接收、利用伪《平报》的设备资财，恢复出版国民党上海市党部的机关报《正言报》；紧接着，8月30日，安徽屯溪《中央日报》社长冯有真派人回沪接收伪《新中国报》，出版上海《中央日报》；10月6日，《民国日报》在胡朴安主持下复刊；1946年元旦，《和平日报》上海版创刊；6月，国民党人胡健中主办的《东南日报》也跻身上海滩，出版该报的上海版。至此，作为中国新闻事业中心的上海，也成了国民党党报的天下。

在其他地区，国民党统治集团也采用相似的手法，复刊或新办其党营报刊。1945年10月1日，原国民党中央直辖党报《华北日报》，利用接收日伪《华北新报》的设备资财在北平复刊，原报馆的敌伪人员也一律留用，甚至两名日本特务报人也被聘用为该报日文版的主持人。同日，广东的国民党党报《中山日报》由韶关迁往广州出版。据不完全统计，至1946年5月国民党政府宣布还都南京

时，国民党中央直接主办的报纸即中央直辖党报已发展到 23 家，总发行数约 45 万份；省级党部主办的报纸 27 家，总发行数约 14 万份。此外，国民党人士主办的准党报、县市级党部主办的地方党报以及国民党军方主办的报纸为数更多，遍布全国各地。

国民党报团组织的出现，是战后国民党党营新闻事业发展的一个重要现象。抗战胜利后，国民党统治集团重新制定了党报企业化计划，实施企业化政策。《中央日报》社等中央级新闻机构，均按照《公司法》改组为企业组织，并逐步发展为报团组织。《中央日报》发展成一个拥有 12 个分社的报团，在南京、上海、重庆、贵阳、昆明、桂林、长沙、福州、厦门、海口、沈阳、长春 12 个城市同时出版报纸，影响遍及全国。1946 年 5 月，南京《中央日报》还增出《中央晚报》。《和平日报》也拥有 9 个分社，在南京、上海、汉口、重庆、兰州、广州、沈阳、台湾、海口等 9 个城市同时出版报纸。国民党中央直辖党报《武汉日报》除了在汉口出版日、晚两刊外，还将其触角伸入宜昌，出版宜昌分版。另一中央直辖党报《中山日报》也将触角伸出广州，设立梅县分社、出版梅县分版。国民党要人胡健中主持的《东南日报》，也发展为同时在杭州、上海两地的小型报团。

在广播事业方面，国民党“中央广播事业管理处”，在 1945 年 8 月下旬开始派员分赴各地接收日伪电台，并将其改建为国民党的官办电台。1946 年 5 月 5 日，即国民党政府“还都”之日，国民党中央广播电台也由重庆迁回南京。该台在战后除面向全国广播外，还开办了对国外广播，规模也有所扩充。据不完全统计，至 1946 年 5 月，国民党当局接收并改建的广播电台共 21 座，大小广播发射机 41 部，总发射功率为 274 千瓦。国民党的新闻通讯事业也经历了类似的过程。1946 年 4 月，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将其总社迁回南京。

面对国民党集团大肆抢夺新闻阵地的形势，中国共产党采取了针锋相对的方针。1945 年 9 月 14 日，正在重庆同国民党谈判的共产党领导人毛泽东、周恩来致电中共中央并转华中解放区负责人，指示华中解放区尽快派人去上海、南京等地办报。9 月初，中共中央还电告中共广东区党委：迅速派人去广州、香港开辟宣传阵地。根据中共中央的精神，各地区的党组织利用国共合作在形式上仍然存在的历史条件，迅速地在当地创办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的新闻机构，将党和人民的新闻事业扩展到收复区。

在上海，早在 1945 年 8 月 16 日，即日本宣布投降的第三天，中共上海地下组织就领导创办了《新生活报》，在国民党势力返回上海之前就先占上海报坛的一席之地。该报以苏联塔斯社主办的俄文《新生活报》中文版的名义出版，并聘请苏商匝开莫担任发行人，但实际负责人则是中共党员姜椿芳，9 月 1 日后改名

为《时代日报》。在此前后，上海地下党组织还创办了一些以学生名义出版的报刊，如党的“学委”出版的《新生代》、圣约翰大学党组织出版的《约翰呼声》等。毛泽东、周恩来的9月电报发出后，中共中央南方局和华中解放区立即派出一批新闻文化战士赴沪，同沦陷时期留沪坚持斗争的同志一起，又创办了一大批报刊，将党在上海的办报活动推向高潮。9月18日，党的“职委”主办的《人人周刊》创刊。21日，《联合日报》出版。10月9日，《文萃》周刊问世。10日，《救亡日报》改名为《建国日报》复刊。11月5日，党的“教委”领导的中小学教师群众团体“小教联”主办的《教师生活》出版。同日，五金业党组织以益友社五金业干事会名义出版的《五金半月刊》复刊。12日，党的“工委”指导工人运动的刊物《生活知识》创刊。同月，党创办的面向工商界人士的刊物《经济周报》问世。12月，《世界知识》复刊，《文坛月报》创刊。1946年2月，党的“学委”创办《学生新闻》，以新成立的上海市学生团体联合会筹备会名义出版。3月1日，党领导国民党政府财政部系统的中央银行、中央信托局等四行二局职工成立“四行二局员工联谊会”，并以该会名义出版《联讯》。4月7日，《消息》半周刊创刊。5月7日，英文《新华周刊》出版，中共代表团工作人员龚澎任发行人。6月3日，中国共产党在国统区公开出版的机关刊物《群众》，自第11卷第5期起迁上海出版。在此期间，中共上海地下组织还乘民营电台纷纷申请复业之际，秘密创办起党在国统区惟一的一家广播电台——“中联广播电台”，以上海市文化运动促进会的名义开办，1946年3月初开始播音，至7月间被国民党当局借口整顿而查封。

中共在上海出版的报刊中，数《联合日报》、《联合晚报》、《建国日报》、《文萃》周刊、《消息》半周刊、《群众》周刊的影响最大。《联合日报》系根据中共中央南方局提出的争取在上海办一份民间日报的建议而创办，由重庆派至上海的原重庆中外出版社负责人刘尊棋、王纪华等人筹建。为了隐蔽党的面目，名义上由美国新闻处任发行人，并声称“以纯粹民间资本，无党派立场，发挥民间舆论精神”。该报一创刊，就日销20万份，但仅出版了两个月，即于11月30日被国民党当局指令停刊。后经中国共产党的努力，该报又于1946年4月15日恢复出版，改名《联合晚报》，由中共代表团驻沪办事处直接领导。《建国日报》是原《救亡日报》总编辑夏衍根据周恩来的指示于9月22日返沪筹划出版的。该报原拟用《救亡日报》旧名，后经周恩来交代改名《建国日报》，但报头栏标有“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主办，社长郭沫若，总编辑夏衍”一行字样，以示其与抗战初期创刊的《救亡日报》一脉相承。但是，该报仅出版了15天，就于10月24日被国民党上海市党部无理查封。按理说，国民党中宣部曾明文规定，凡在抗战前

或抗战中出版过的报刊可以先出版后登记，《建国日报》前身是《救亡日报》，且在出版前就已提出申请登记，但国民党当局出于嫉恨，不问是非曲直地下令查封。《文萃》周刊系国际新闻社记者孟秋江等创办并主持编务，初为文摘性刊物，以转载重庆、成都等地报刊的进步文字为主，旨在沟通大后方与收复区的民主舆论，将内地民主运动扩展至收复区。1946年6月由黎澍接办并任主编，后又陆续吸收陈子涛等参加刊物工作，并逐步改版为时事政治性刊物，以适应新的斗争需要，揭露国民党当局发动内战、镇压民主运动的真相，反映人民群众要求和平民主的呼声。述评性特稿日渐增加，使“述评”成为《文萃》的特色。《消息》半周刊以报道时事政治新闻为主，姚溱（化名宋明志）、方行（化名丁北城）等主编。该报在形式上独具一格，具有报纸与杂志的双重特点，深受各界读者欢迎，往往一出版就被读者抢购一空。《群众》周刊迁上海出版的过程是：根据毛泽东、周恩来9月电报的精神，新华日报社于1945年底派人至上海、南京两地设立筹备处，筹划上海版和南京版的出版事宜。1946年5月，国民党政府还都南京，中共中央决定将中共代表团迁至南京、上海工作，并将《新华日报》总社迁至上海，出版上海版与南京版，在重庆出版的《新华日报》则改组为中共四川省委机关报。但是，由于国民党当局的百般阻挠与刁难，上海、南京两地的《新华日报》始终未能面世，因面中共中央决定先将《群众》杂志由重庆迁至上海，并由半月刊改为周刊，担负起党在国统区的机关报的宣传重任。

在北平，国共两党于1946年1月签订停战协定，成立军事调处执行部。接着，中国共产党利用在北平可以公开活动的合法地位，立即筹办党的新闻事业。2月22日，中共在华北地区公开出版的机关报《解放报》创刊，初为三日刊，自第27期起改为双日刊，宣称“以致力于和平民主建设为宗旨”，发行量高达5万份，超过天津《大公报》。同日，新华社北平分社也宣告成立。但是，北平《解放报》和新华社北平分社自创建第一天起就开始遭到国民党特务的钳制与破坏，北平《解放报》的报童被殴打、报纸被抢劫、贴报被撕毁等暴行时有发生。4月3日，国民党当局竟以“查户口”为名，逮捕了北平《解放报》和新华社北平分社的39名工作人员，后经全国新闻界的抗议和中国共产党的交涉，才被迫将这些被捕人员释放。5月29日，北平《解放报》和新华社北平分社被国民党当局无理查封。在华南地区，根据9月初中共中央电报的精神，中共广东区党委做出决定，由东江纵队《前进报》派出骨干赴香港办报。两个月后，战后党在香港创办的第一家党报《正报》于1945年11月13日创刊，除了在港澳和华南地区广泛发行外，还远销马来亚等地，在海外华侨中也有巨大影响，最高发行量达2万份，出至1948年11月13日因党在华南地区的工作重点的转移而自动停刊。

1946年1月4日,《华商报》在香港复刊,并由晚报改为早报,是中共领导的统一战线的报纸,自复刊之日起就高举和平民主的旗帜,呼吁停止内战、实现和平,出至1949年10月15日即广州解放翌日停刊,其全体工作人员根据党的指示回广州创办《南方日报》。

在其他地区,中国共产党根据当地的实际情况,也尽可能出版党直接领导的报刊,同时委派一部分党的新闻文化战士渗入各种政治色彩的报刊工作,利用各种机会向人民群众报道真实新闻、发表正确言论。

抗日战争胜利后,其他进步人士和民主党派的报刊也纷纷创刊或复刊,加入国统区争取新闻阵地的斗争行列。在重庆,中国民主同盟先后创办了《民主星期刊》、《民主报》,人民救国会创办了《民主生活》周刊,民主建国会创办了《平民》周刊。《民主星期刊》创刊于1945年10月5日,是中国民主同盟的机关刊物,以“宣扬民主学说,介绍民主生活”为办刊宗旨,由邓初民任主编,陶行知任发行人。《民主报》创刊于1946年2月1日,初为四开小报,后扩版为对开大报,为中国民主同盟总部的机关报,由张澜任发行人,罗隆基任社长,马哲民任总编辑。该报在向国民党当局申请登记时定名为《民主日报》,但当批准文件下达时国民党特务报人已抢先出版了同名报纸,不得不更名为《民主报》。在上海,民主进步力量出版的报刊主要有《文汇报》、《新民报晚刊》以及《周报》、《民主》周刊等。《文汇报》是上海“孤岛”时期创刊的著名抗日报纸,战后于1945年8月18日在严宝礼的主持下恢复出版,日出八开一张,不标刊号,以号外形式出版,至9月6日正式复刊,使用正式刊号,日出四开一张(后扩为对开大报),并发表《复刊词》,声称该报为无党派色彩的纯商业性报纸,以言论自由为最高原则,矢志保持高尚的报格。但实际上该报在政治上倾向国民党,常站在国民党的立场上立言记事。不久后,由于中共党员以及进步人士参加编辑工作,使报纸的政治倾向转向进步。1946年5月1日,上海《新民报晚刊》创刊。作为一家政治上“居中偏左、遇礁即避”的民营报纸,该报在创刊时便确定了一要进步、二要保全的办报方针,新闻报道采取“超党派”的立场,不论要闻版、本埠版,基本上采用本报记者自己采访的新闻稿,而不采用国民党中央通讯社的稿件,偶然在本报稿源不足时也采用一些对外国通讯社发的比较客观公正的稿件。对于一些重要的政治军事消息,大多根据新华社广播稿改编,以本报南京、北平专电形式发表。《周报》、《民主》周刊为时事政治性刊物,分别创刊于1945年9月8日和10月13日。在其他地区,民主党派和进步人士出版的报刊还有在香港(后迁广州)出版的《人民报》、在成都出版的《民众时报》、在桂林出版的《民主星期刊》等。《人民报》原是1946年3月1日农工民主党在香港创办的日报,

4月迁广州出版，改为三日刊，以民主同盟南方总支部机关报的名义发行。《民众时报》创刊于1946年5月1日，日出对开一张，为民主同盟在成都出版的机关报。桂林《民主星期刊》创刊于1946年1月10日，为民主同盟在桂林出版的机关报。

资产阶级民营商业性报刊也有一定程度的发展。战前在上海、北平、天津、南京等大城市出版的一批著名商业性大报，在战后纷纷迁回原地。其中不少报纸也朝着报团方向发展，在其他城市建立分社、出版分版，力谋事业上的发展。《大公报》在战前出有天津版和上海版，抗战爆发后天津总社先迁至汉口，后又迁往重庆，并创办香港、桂林两地分版。抗战胜利后，该报立即派员前往上海、天津筹划复刊事宜。1945年11月1日，《大公报》上海版复刊；12月1日，天津版复刊。1946年1月，该报总管理处迁至上海，统辖上海、天津、重庆三馆，后又恢复香港版，设立台湾办事处，发展成为一个拥有上海、天津、重庆、香港4个分社的报团组织，同时在四地出版分版。陈铭德、邓季惺夫妇主办的《新民报》战前仅在南京一地出版，战时在重庆、成都两地同时出版，战后总管理处迁至南京，发展成为拥有南京、上海、北平、重庆、成都5个分社和日、晚刊8种的报团组织，报纸总销数约12万份。成舍我主办的“世界”报系，战前自1924年起在北平先后出版《世界晚报》、《世界日报》和《世界画报》，1928年在南京创办《民生报》，1935年在上海创办《立报》。在抗战爆发后《世界日报》迁至重庆出版。抗战一胜利，成舍我立即飞回北平，于1945年11月20日同时复刊《世界日报》和《世界晚报》，并继续出版该报的重庆版，还一度恢复出版上海《立报》。在天津出版的天主教报纸《益世报》战后也发展为一个同时在天津、北平、南京、上海、重庆等地出版的报团，报纸总销数达8万份。

资产阶级民营广播电台，则因国民党当局钳制过多而难以获得较大的发展。上海在抗日战争前是中国广播事业的中心，民营商业性广播电台为数甚多，抗战期间遭到日伪的大肆摧残。抗战胜利后，上海的民营商业性广播电台陆续恢复，至1946年初发展到43座。为了遏止民营电台的发展势头，国民党政府交通部于1946年2月14日颁布了《广播无线电台设置规则》，依照《电信条例》的规定，对电台的设置、分布、数量、功率以及广播内容等各个方面都详加限制。国民党交通部上海电信局还奉命自3月起对上海民营电台进行整顿，致使上海54家民营电台被封闭，仅剩的22家民营电台中绝大多数电台也必须同其他电台合用一个频率。

二、“拒检运动”与新闻界争取新闻自由的斗争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集团虽然明抢抗战胜利成果、暗作反共内战准备，但在

口头上还不得不高唱和平曲调、玩弄“和谈”阴谋，以应付国内外要求和平、反对内战的呼声。因此，国统区新闻界抓住一切有利时机，掀起了一次又一次争取新闻自由的浪潮。

国统区新闻界争取新闻出版自由的斗争，以1945年8、9月间发生的“拒检运动”声势最大。8月7日，重庆国讯书店在其他进步出版机构的支持下，不送国民党当局审查而自行出版了黄炎培撰写的《延安归来》一书，揭开了“拒检运动”的序幕。该书是作者应国讯书店之请、将其7月访问延安的见闻整理而成的访问记，翔实地记载了中国共产党各项政策的实施情况和解放区政治、军事、经济等各方面的成就，揭破了国民党多年来对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解放区的种种造谣污蔑。为了免遭国民党书刊检查机构的无理删改，国讯书店在其他进步出版机构的支持下，决定不将此书送检而自行出版。《延安归来》出版后，进步人士张志让、杨卫玉、傅彬然三人又起草了重庆杂志界宣布“拒检”的联合声明，在征得《宪政》月刊、《国讯》杂志、《中华论坛》、《民主世界》、《再生》、《民宪》半月刊、《民主与科学》、《中学生》、《新中华》、《东方杂志》、《文汇报》、《中苏文化》、《现代妇女》、《战时教育》、《国论》、《学生杂志》16家杂志社的签名后，于8月17日正式发表，庄严宣布自9月1日起上述16家杂志社将不再送检，并将这一决定正式函告国民党中宣部、宪政实施协进会和国民参政会。

重庆16家杂志社拒检声明一发表，立即得到了整个文化界的支持与响应。由生活书店、新知书店、读书出版社、国讯书店等19家出版社组成的新出版业联合总处宣布坚决支持重庆杂志界的拒检声明，叶圣陶等进步人士发表了《我们永远不要图书杂志审查制度》等文章。8月27日，重庆杂志界联谊会集会，在拒检声明上签名的杂志社增至33家。与此同时，《宪政》月刊、《国讯》杂志、《中华论坛》、《民主世界》、《民宪》、《再生》、《东方杂志》、《新中华》、《中学生》、《文汇报》10家杂志社还决定出版《联合增刊》，既不向国民党政府办理登记手续，也不将稿件送检。9月15日，上述10家杂志社联合出版、国讯书店发行的四开报纸《联合增刊》第1期问世，内容以民主和团结为中心，刊有张志让撰写的《胜利后的民主与团结问题》等大胆发表国是主张的文章。

中国共产党坚决支持国统区出版界发起的这场争取新闻自由的斗争。9月1日记者节这一天，重庆《新华日报》发表社评《为笔的解放而斗争》，反映国统区新闻文化界的意愿与呼声，抨击国民党当局实施的原稿审查制度，号召新闻文化界为争取新闻出版与言论自由而斗争。9月4日，《新华日报》社论《走向和平的新中国》再次呼吁：“现时的一切束缚人民的言论出版结社集会自由的法令必须立即废除。”9月18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机关刊物《群众》杂志也宣布自

即期起不再送检，并发表社论高度赞扬拒检运动是“一个意义重大的民主运动”，明确指出不合理的法律规章“都是应该立即废除的”。

9月后，由重庆出版界发起的拒检运动扩展到成都、昆明等地，并由出版界扩展到新闻界。在成都，9月8日，《新中国日报》、《成都快报》、《华西晚报》、川康通讯社、自强通讯社、国论社、《大学月刊》、《天风周刊》、《开明少年》、《现代周刊》、《大义周刊》等16家新闻出版机构集会，一致决定以行动响应重庆出版界的拒检斗争，宣布报纸通讯社自即日起、杂志自即期起不再送交任何机关检查，自负言论报道之责，并发表《致重庆杂志界联谊会公开信》予以声援。10日，成都加入拒检斗争行列的新闻出版机构增至22家。17日，成都27家新闻出版机构集会，决定成立成都文化新闻界联谊会，并发表宣言，提出了争取“发表的自由”等7项具体主张，还出版了一份联合刊物《言论自由》。在昆明，《民主周刊》、《大路》杂志、北门出版社、进修出版社等11个新闻出版单位于9月15日集会，宣布一致响应重庆、成都两地的拒检斗争，并决定成立昆明杂志界出版界联谊会。22日，昆明11个新闻出版单位联合致函云南图书杂志审查处，宣布自即日起所有文稿不再送审；同时致函昆明市印刷业同业公会，请该公会转告各会员印刷厂，此后一切付排稿件概由各单位自行负责，无须再受任何方面的限制，以致影响出版时间。桂林、西安等地的新闻出版界也纷纷成立联谊会，集体投入拒检运动。四川大学、燕京大学、复旦大学等高校学生编辑的刊物、壁报也通电响应拒检，不再送交各校训导处检查。

拒检运动的兴起与发展，使正在玩弄“和谈”阴谋的国民党当局陷入被动局面。当时，国共两党正在重庆举行政治谈判，国统区和平民主运动日趋高涨，而蒋介石集团发动内战的时机尚未成熟。在国际上，各国政府纷纷取消战时新闻检查制度，无形中对国民党当局形成了一种国际压力。为了缓和国内外的矛盾，国民党当局被迫做出让步，于9月12日由国民党中宣部部长吴国桢出面向外国记者宣布：“自10月1日起废止战时新闻检查制度。但收复区在军事行动尚未完成以前除外。”这收复区例外的规定，是国民党当局有意留下的一个“尾巴”。9月22日，国民党中央第10次常会通过了废止新闻出版检查制度的决定与办法。至此，国统区新闻文化界为之奋斗多年的取消新闻出版检查制度的斗争，经过为期两个月的拒检运动的洗礼，终于获得了巨大的胜利。

为了巩固和发展拒检运动取得的胜利成果，争取更多的新闻自由权利，国统区进步新闻文化界在欢庆胜利之时，进一步提出了新的斗争目标，将争取新闻出版自由的斗争推向新的高潮。10月1日，即国民党废止新闻出版检查的第一天，重庆《新华日报》发表社论《言论自由初步收获》，指出：“检查制度的废止，是

言论自由的开始；但还不是言论自由的真正实现。首先，检查制度在大后方是废止了，收复区还在继续；其次，报刊杂志的创刊，须经登记核准，这一制度还没有废止；再其次，这是很重要很迫切的，邮电检查制度也还没有废止。”因此，社论号召国统区进步新闻出版界为争取更多的民主自由而继续斗争。10月初，昆明《民主周刊》、《人民周报》、《大路周刊》、天野社、诗与散文社、北门出版社、孩子们社、进修教育出版社等十余家新闻出版团体联名发表宣言，提出了“废除新闻检查制度，必须做到‘彻底’，收复区不能例外”等新的斗争目标。11月，上海91名新闻文化界人士联名发表宣言，反对国民党当局压迫人民自由，要求废止收复区的新闻检查制度，实现言论出版自由。12月，上海30余名新闻记者联名发表宣言，反对上海市政府实行统制新闻的措施。同月，昆明《民主星期刊》等17家杂志社联名提出废止有关限制出版的一切法令等主张，并建议在新闻文化界开展一场拒绝登记的运动。1946年1月8日，重庆生活书店、新知书店、读书出版社、大学印书局、交通书局等35家出版社联名致函即将召开的政治协商会议，提出废止出版法、取消期刊登记办法、撤销收复区检审办法等五项要求。

为了继续玩弄“和谈”阴谋，国民党当局被迫再次摆出让步的姿态。1945年10月10日，蒋介石被迫签订的《国共双方会谈纪要》上不得明确写道：“一致认为政府应保证人民享受一切民主国家人民在平时应享受身体、信仰、言论、出版、集会、结社之自由，现行法令，当依此原则，分别予以废止或修正。”1946年1月10日政治协商会议开幕式上，蒋介石又装腔作势地宣布“人民享有身体、信仰、言论、出版、集会、结社自由”，政协会议通过的《和平建国纲领》更进一步明确规定废止战时实施的新闻出版检查办法、修正《出版法》、“扶助”报刊通讯社的发展等有利于新闻出版事业发展的条文。

但是这些让步只是一纸空文，国民党政府并没有真正放弃其一贯奉行的新闻统制政策。他们在公开宣布给予人民某些新闻出版自由权利的同时，暗中仍在进行镇压进步新闻出版界、剥夺人民新闻言论自由的罪恶勾当。虽然自1945年10月1日起废除了新闻检查制度，但其实施地区仅限于西南、西北等抗战期间的国统区，包括中国大半江山的收复区仍处于其新闻检查的刀斧之下。即使在已废除新闻检查的地区，国民党当局也另谋管制方策。内战期间，国民党经常以中宣部名义，向报刊发出有关宣传工作的指示，对于重大事件的报道、言论的处理方法与尺度做出具体规定。凡是有关国际、国内重大问题的社论，也由国民党中宣部组织撰写，交中央通讯社用密码统一播发。有时还由中宣部单独发稿给某一特定地区或报社。国民党各地党部也经常召集当地国民党新闻机构的负责人开会，传

达有关宣传指示，统一各报言论。重庆、上海等地还专门建立新闻党团聚餐会制度，由国民党宣传要员主持，解决宣传上的种种问题。此外，国民党还制造种种借口，公然查禁进步报刊，如在上海先后查封《建国日报》、《联合日报》、《消息》半周刊等进步报刊，在北平查封《解放报》、新华社北平分社等进步新闻机构。更有甚者，国民党当局还指使特务密探对进步新闻事业进行迫害与捣乱。《新华日报》曾多次遭到国民党特务机关的检扣。《新华日报》、《民主报》营业部在1946年2月22日同时被国民党特务捣毁。成都《华西晚报》曾在5天内收到恐吓信两封，并遭特务袭击。西安《秦风工商日报联合版》曾一夜之间被纵火3次。西安《民主导报》主编李敷仁被特务绑架，险遭暗杀。令人发指的是，正是蒋介石在政协开幕式上宣布保证人民自由、释放政治犯等项政治诺言之时，著名记者、军事评论家羊枣在杭州狱中惨遭杀害。羊枣（1900—1946），原名杨潮，湖北沔阳人。1933年初在上海加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同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抗战爆发后，他积极从事抗日救亡宣传活动，参加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工作，积极支持并协助出版《每日译报》、《译报周刊》、《导报》并为这些报刊撰写社论、专论。1939年流亡香港，香港沦陷后转赴桂林、衡阳、福建永安等地从事新闻工作。1945年7月15日，因与新四军浙东游击队秘密联系，被国民党逮捕，1946年1月11日被秘密处死，时年46岁。

在争取和平民主、反对内战独裁的斗争中，进步报刊还同反动报刊展开过一次又一次的舆论激战。1945年8月28日，中国共产党领袖毛泽东为了粉碎国民党玩弄的和谈阴谋和最后挽救和平，偕周恩来、王若飞等飞抵重庆，同国民党举行了为时43天的政治谈判，最后迫使国民党当局不得不承认和平团结的方针。对于这次事关民族前途的谈判活动，国内代表各种不同政治力量的报刊、电台、通讯社均作了宣传报道。《新华日报》、《新民报》、《秦风工商日报》等进步报刊对此寄予厚望。10月12日，国共两党于10日签署的《国共双方会谈纪要》公布后，《新华日报》、《新民报》等进步报纸均在头版显著位置予以刊载，并发表社论。与《新华日报》等进步报刊的反应相反，国民党系统的《中央日报》、《扫荡报》等报刊则完全从其一党私利出发，在宣传报道上表现得十分拙劣。在蒋介石邀请毛泽东赴重庆共商国事的电报发出后，《中央日报》基于毛泽东绝不会赴渝参加谈判的错误估计，采取“假戏真做”的宣传方针，不惜篇幅，用大字标题刊登蒋介石的电文。毛泽东来到重庆后，《中央日报》立即调整宣传方针，竭力贬低这次国共谈判的意义，缩小其政治影响。毛泽东飞抵重庆的第二天，《中央日报》不发社论，仅采用了中央通讯社编发的两条共几十个字的消息，用两栏的地方夹排在国内要闻版的中间，以应付国内外的舆论。在谈判期间，即使是蒋介石

石与毛泽东会谈的消息，《中央日报》也一反往常不惜篇幅地报道蒋介石政治活动的惯例，仅用两栏标题刊登在国内要闻版的不显眼位置。《国共双方会谈纪要》公布后，《中央日报》仍不做头条信息发布，而排在国内要闻版的次要地位，并发表了一篇题为《政府与中共的会谈》的社论，对《纪要》的内容加以歪曲，重弹“军令”、“政令”统一的老调，为破坏国共谈判的成果、发动反革命内战做舆论准备。至于貌似公正的《大公报》，则采取时阴时阳的报道方针。在蒋介石于8月20日再致毛泽东赴渝电后，《大公报》于翌日发表社评《读蒋介石再致延安电》，支持蒋介石电报的基本观点。毛泽东抵达重庆后，《大公报》的报道则是积极的。但在谈判期间，《大公报》曾邀请毛泽东等中共代表赴宴，席间该报负责人仍公然替国民党政府说话，要共产党“不要另起炉灶”，当即受到毛泽东的驳斥。在国共谈判结果公布后，《大公报》发表社论《团结会谈的初步成功》，态度甚为暧昧。

根据《国共双方会谈纪要》有关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的规定，有国共两党以及其他政党、派别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于1946年1月10日在重庆召开。在政协会议期间，国民党当局在会场内大谈民主、自由，但在会场外却指使特务破坏会议，先后制造了“沧白堂事件”和“较场口事件”，对要求民主的各界人士和群众大打出手。特别是2月10日发生的“较场口事件”，国民党特务的蓄意破坏与捣乱，不仅使重庆各界人民在较场口举行的庆祝政协成功大会完全流产，还使60多位参加会议的民主人士、新闻记者和各界群众被殴打致伤或失踪。这一事件发生后，国民党的中央通讯社施展其造谣故伎，于翌日发布颠倒是非的报道，把特务行凶写成是“民众互相殴打”，把现场指挥这次破坏活动的特务头目刘野樵说成是“临时推举出来的大会主席”。《中央日报》还发表短评《较场口事件》，与中央通讯社沆瀣一气，将这一事件说成是“民众团体互相殴打”。国民党主办或控制的其他报刊如《和平日报》、《民主日报》、《益世报》、《新蜀报》等也随声附和。对此，重庆《新华日报》以及其他进步报刊进行了针锋相对的舆论斗争。事件发生的当天下午，中国民主同盟总部机关报《民主报》就发行号外报道事件真相。翌日，《新华日报》、《民主报》、《新民报》等进步报刊乃至《大公报》、《世界日报》等中间报刊共8种日报、3种晚报均在头版头条或显要位置上详细报道了事件的真相。《新华日报》还在社论《较场口暴行》中愤怒谴责国民党当局。12日，《新华日报》再次发表社论《恳切的忠告》，严肃指出：“前天较场口丑剧演出时，民众到者万余人，政治协商会议代表亲临其境者十余人，谁打人，谁被打，谁是主席，谁抢主席做，谁受伤，谁没受伤，大家看得清楚。然而，中央社的报导，《中央日报》的编者，居然写得出‘公推刘野樵为主席’、‘刘野樵

受伤’，居然写得出‘民众纷纷拥上主席台，秩序大乱，互相殴打’等等。看了中央社的这种报导，请问还能说是真实的么？”这篇社论发表后，中央社居然恬不知耻，致函《新华日报》提出“严正声明”，要《新华日报》“平心检讨，幡然改正”。对此，《新华日报》于13日又发表致中央社的公开信予以揭露，指出其来信所云，“强认己所言为真实，其不同者为造谣”，实为其“夫子自道”。《新华日报》、《新民报》、《民主报》等9家报社还于11日下午联合召开记者会议予以抵制，石西民、浦熙修等42位与会记者签名发出致中央社的公开信，谴责该社“对此事件之报导，颇有失实之处”。接着，陈翰伯、石西民等221位重庆新闻从业人员联名发表《保障人权，忠实报道》的意见书，成都42位记者亦致函中央通讯社怒斥其造谣伎俩。

就国内外十分关注的和平与内战问题，《新华日报》还同《中央日报》、《和平日报》和《大公报》展开多次正面交锋。重庆谈判结束后不久，国民党报刊就公然提出“没有内战，只有内乱”，宣传“戡乱”。以鼓吹内战起家的《和平日报》还解释说：“国家对此乱臣乱民，最后平之以兵，则谓之戡。”为了反驳所谓的“戡乱”谬论，重庆《新华日报》自1945年10月30日起新辟《小论坛》专栏，先后发表《舆论的责任》、《中央日报的企图》、《向中央社同业说几句话》等文章，针锋相对地进行了批驳。1945年12月14日，《新华日报》发表题为《异哉所谓“戡乱”！》的社论，指出：“国民党的政权本是由于篡窃而来”，它“抗战无功，建国无能，残民有勇，毁国有余”，在中国造成一片乱象，只是由于人民的宽大，还不主张对国民党政权“平之以兵”，而希望产生人民自由选举的政府。1946年3月，《新华日报》又先后发表《先生此言差矣》、《谁把国民党办坏了？》、《出尔反尔》等社论，进一步清算国民党的反动政策和《中央日报》等御用报刊的荒谬言论。

由于《中央日报》等国民党喉舌在民众中毫无威信，而《大公报》标榜“不党不私”，以“超党派”、“文人论政”的民间报纸面目出现，在一部分人中影响很大，因而《新华日报》与《大公报》之间的论战最引人注目。1945年10月，国民党表面上接受了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和平团结的政治方针，而实际上对解放区的进攻变本加厉，并无端挑起冲突。对此，《大公报》颠倒是非，把内战的责任强加给中国共产党。11月20日，重庆《大公报》发表题为《质中共》的社评，公开点名指责中国共产党，鼓吹“要政争不要兵争”，“只有国家有兵，人民不得有兵”，攻击共产党“争降争地”，“欲凭武力”造成“南北朝局面”，还说什么“希望共产党放弃军队”，“放弃局部的特殊政权”，“与其争城争地驱民死，何如兵器销为日月光”。对于《大公报》的公开挑战，《新华日报》立刻应战，在《质

中共》发表的次日就发表社论《与大公报论国是》，予以有力的反击。社论列举了蒋介石勾结敌伪对人民军队大张挞伐、破坏国共双方协议的大量事实，证明内战的责任完全在国民党方面，发动内战的正是秘密布置“剿匪”的蒋介石。社论最后一针见血地揭穿了《大公报》“借大公之名，掩大私之实，借人民之名，掩权贵之实”的一贯立场：“在若干次要的问题上批评当局，因而建筑了自己的地位的大公报，在一切首要的问题上却不能不拥护当局。这正是大公报的基本立场。”《新华日报》社论发表后，不少进步报刊转载或用消息的形式向读者介绍《新华日报》的社论，扩大其政治影响。1946年3、4月间，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和国民参政会四届二次会议先后召开，蒋介石在会上公然撕毁政协会议和东北停战协定，重新宣布实行独裁、发动内战的方针。4月7日，延安《解放日报》发表了题为《驳蒋介石》的长篇社论，8日，《新华日报》予以全文转载，在国统区人民面前公开揭露独夫民贼的真面目，使山城重庆一时为之轰动，人人争读社论，拍手称快。不久，为阻止国民党军队对东北的进攻，人民解放军发起自卫还击，解放长春。这时，《大公报》仍站在国民党当局的立场上，发表了恶意攻击中国共产党和人民军队的社评《可耻的长春之战》，于4月16日、17日两天分别刊登在该报的重庆版和上海版上，诬蔑人民的自卫还击是“可耻”，造谣说东北民主联军“进攻的战术，常常是用徒手的老百姓打先锋”，并为国民党破坏停战协定发动内战进行辩护。对此，在周恩来的直接指导下，《新华日报》于4月18日发表社论《可耻的大公报社论》，针锋相对地严加驳斥。这篇社论的内容是根据周恩来的指示精神撰写的，题目也是周恩来拟定的。社论指出，国民党反动派公开破坏和平协议，攻占了东北许多城市，《大公报》不说“可耻”，而当人民还手时，《大公报》就说“可耻”，其反对人民的立场昭然若揭。社论还指出，《大公报》的某些别有用心的人已堕落到搬用国民党特务制造的谣言来作为攻击共产党和人民军队的依据，真是“可耻到极点”。这篇社论发表后，同样轰动了重庆，引起了很大的反响。接着，《新华日报》又选编了一部分群众来信来稿，以《人民皆曰可耻》为题予以发表，继续批驳《大公报》的反共言论。许多进步报刊也纷纷发表文章，抨击和嘲讽《大公报》的所谓“民间立场”和“不偏态度”。

三、新闻统制在内战中强化与民营新闻事业的衰落

1946年6月全面内战爆发后，国民党新闻统制进一步强化。国统区的进步新闻机构以及一切不利于国民党政治统治的新闻机构，无不遭到迫害与摧残。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政府虽然在表面上多次做出给予人民言论出版自由的许

诺，但并不准备将这些许诺付诸实践，而是继续实施其对新闻界实施全面统制的反动政策，制定与颁发新闻统制法规，强化新闻统制制度。在广大的收复区，国民党政府则以“除奸”为名，堂而皇之地实行新闻统制政策，重建新闻统制制度。1946年5月，国民政府制定《维持社会秩序临时办法》，并以此为借口，对坚持进步立场的报刊及出版机构大肆摧残。至8月，全国有263家言论机关被无理查封。1946年内战爆发后，特别是1947年内战发展到最后激战阶段后，国民党当局借口非常时期，颁布了一大批非常法规，将人民的言论出版自由权利剥夺殆尽，将新闻统制制度强化到令人恐怖的程度。5月19日，国民党政府为了镇压南京、上海等地学生掀起的“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运动，公布了修正后的《戒严法》，规定在戒严地区停止集会结社，“取缔言论、讲学、新闻杂志、图画、告白、标语暨其他出版物之认为与军事有妨害者”。6月人民解放军转入反攻后，国民党当局于7月4日由国民政府颁布“国家总动员案”，下达“戡乱动员令”。7月19日，国民政府又颁布了《动员戡乱完成宪政实施纲要》18条，对人民的一切基本权利均严加管制，使一切镇压措施均得以借“戡乱”之名而合法化。其中第17条规定：“为维持安宁秩序，政府对于煽动叛乱之集会及其言论行动，应依法惩处。”7月间，国民党当局还制定与颁布《剿匪总动员宣传计划纲要》，转饬所有的新闻机构遵照执行。9月5日，行政院临时会议通过《新闻纸杂志及书籍用纸节约办法》，以节约纸张为名，限制报刊的出版与登记。该《用纸节约办法》规定各地报纸均须缩减版面，最多不超过两张；杂志的篇幅也同样缩减，周刊不得超过16页，半月刊不得过32页，月刊不得超过64页；对于无充分资金、固定地址的报纸、杂志，严格限制其登记。10月，国民政府国防部下令恢复“戒严地区”的邮电检查，凡认为与审查标准相抵触的书报刊，一律在邮局秘密查扣没收，不准发行。12月25日，国民党政府公布《戡乱时期危害国家紧急治罪条例》12条，其中第6条规定：“以文字、图画或演说为匪徒宣传者，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情节严重的，如“煽惑军人不执行职务或不守纪律或逃叛者”，可“处死刑或无期徒刑或10年以上有期徒刑”。此外，国民党当局还下达不计其数的迫害“密令”，取缔一切对反动统治不利的新闻传播活动。1947年2月4日，国民党政府行政院绥靖区政务委员会密令有关部门“以各种技术打击一切反动刊物之流行及散布”。1948年下半年后，国民党统治的垮台指日可待，国民政府及有关部门又颁发了一批更为严密的新闻统制法规。6月，内政部、国防部共同制定了《军事新闻采访发布实施暂行办法》，后经行政院核准，改名为《动员戡乱期间军事新闻采访发布办法》通令施行。该办法规定：各报社、通讯社及杂志社刊登军事新闻以采用国民政府国防部政工局军事新

闻发布组的稿件为原则，凡各报社、通讯社及杂志社自行采访的军事新闻未得证实者，非经事先查明当地军事新闻发布机构后不得发布。一纸法令垄断了国统区内军事新闻的报道权利。1949年6月，国民政府颁布《惩治叛乱条例》，规定：散布谣言或传播不实的信息，实际上是指一切对国民党统治不利的消息，可判处7年以上的有期徒刑直至无期徒刑。这一时期，有关新闻出版活动的重要法令还有旨在通过纸张供应的控制来扼杀进步新闻活动的《白报纸配给标准》、将书刊印刷行业列入特种行业严加控制的《特种营业管制方法》等。

国民党当局在1946年下半年发动全面内战后，还玩弄了一番“行宪”的闹剧，于11月15日在南京召开“国民代表大会”，12月15日通过《宪法》，明文规定人民有言论自由、出版自由和人身自由等权利，宣称中国已进入“宪政”时期。与“行宪”活动相适应，国民党中央在实行新闻统制活动中退居幕后牵线人的角色，不再以国民党中央的名义颁布具有法律效力的规定或命令。国民政府行政院于1947年6月1日成立新闻局，接替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主管全国新闻事业，规定各地报社、通讯社、杂志社原应寄送中宣部的出版品一律改寄行政院新闻局。有关新闻统制的法律或法令也开始全部由国民政府或其职能部门出面颁布。《出版法》也随之第二次进行修正。1947年10月31日，国民政府公布《出版法修正草案》。《出版法修正草案》不仅集以往新闻统制经验之大成，还增加了“出版品不得妨害本国或友邦之元首名誉之记载”等新规定，禁绝人民对蒋介石的揭露与批评。为了与其实行宪政的骗局相适应，该《草案》将原规定的“出版品不得为意图破坏中国国民党或违反三民主义的言论或宣传之记载”改为“不得为意图颠覆政府或危害中华民国者”的“言论或宣传之记载”。此外，《草案》还删去了原有的罚则，规定出版物违法一律按刑事法规的规定予以处罚。《草案》公布后，包括国民党派系报刊在内的大部分报刊都对此持不同意见，许多报界人士撰文予以批评。王芸生撰写的上海《大公报》社评《由新民报停刊谈出版法》，对国民党政府的出版法的反动性质与作用作了大胆的揭批与清算，明确主张将《出版法》废弃。文章说：“出版法，是个枝节性质的法律，我们敢冒昧的说，其有不如其无。这个法，是袁政府时代的产物，国民政府立法院虽略有修正，而大体仍因其旧，实是一件憾事。因为言论与发表的自由，是人民的基本权利之一，宪法例有保障的规定。出版法的立意，乃在限制言论与发表的自由，这与保障民权的精神是不合的。”^①

国民党政府对新兴的广播事业的统制，在抗战胜利后特别是全面内战爆发

^① 上海《大公报》，1948-07-10。

后，随着有关法规的日趋完备而日趋强化。1946年2月14日国民政府交通部制颁的《广播无线电台设置规则》进行了五次修正。根据国民党政府新颁布的《广播无线电台设置规则》等法律性文件的规定，广播电台分为三类：交通部所办者广播电台为国营台，其他政府机关所办者为公营台，中国公民及完全华人组织、公司、厂矿、学校和团体设立者为民营台。凡欲设置广播电台者均须提出申请、由交通部核准并发给许可证，“凡外籍机关人民、非完全华人组织设置之公司、厂商、学校、团体，依律不准在中国境内设立广播电台”。“广播电台之分布，每省不得超过十座，并以散布各市县为原则；特别市除上海市不得超过十座外，其余每市不得超过六座。民营广播电台在上列各项数目中不得超过半数。”9月7日，国防部会同其他有关部门商讨取缔外国人在华设立的广播电台的实施办法，并拟定了《取缔外国在华设立广播电台决议案》，但美军广播电台则仍准其继续播音。11月21日，交通部电信总局颁发《取缔外国在华设立广播电台决议案》。1948年1月15日，国民政府国防部颁布《军用广播无线电台设置与管理暂行办法》；3月22日，上海电信局公布交通部颁发的《广播无线电收音机取缔规则》；4月5日，交通部公布《广播无线电收音机登记规则》。根据上述法规的规定，中国公民及完全华人组织、公司、厂矿、学校和团体虽经批准可创办广播电台，但严格控制在规定的数额内；外国人及其机关、公司等一律不准在中国境内设立广播电台；广播电台每晚9点至9点30分，所有电台均须转播国民党中央台的新闻节目。在内容上，广播电台播音节目以新闻与教育内容为主，上述内容不得少于日播音时间的十分之四，商业报告不得超过日播音时间的十分之二。广播节目的内容必须经有关部门事先审查。

根据上述反动法令，在1946年下半年全面内战爆发、特别是1947年后，国民党当局动用大批宪兵、特务，捣毁报馆，捕杀报人，在新闻界实行白色恐怖。1947年2月中旬国共和谈决裂前夕，国民党当局决定在北平市对中共地下党员、民主人士及其他“嫌疑分子”实行大逮捕，几天之内就逮捕了两千多人。《新华日报》和《群众》杂志是国民党在全面内战爆发后首先要摧残的对象。国共合作破裂前，国民党当局即散布谣言，说《新华日报》社藏有武器，并多次派军警宪特进行搜查。《新华日报》社所在地重庆化龙桥是一片洼地，国民党军队在四周山上构筑了工事，将报社人员的行动置于严密监视之下。更为卑劣的是，他们还让特务、警官办起了一张报名相近的《新华时报》，以图鱼目混珠。国共合作破裂后，国民党当局于1947年2月28日凌晨派军警宪特包围了《新华日报》馆，宣布“限令”中共人员从当天上午3时起停止一切活动。3月9日，《新华日报》重庆馆和成都营业分处的工作人员乘飞机离渝返回延安。昆明营业分处的工作人

员，则转道上海前往晋鲁豫解放区。同日，南京、上海等地的中共机构也都接到“限令”停止活动的通知。《群众》杂志于3月2日在上海出至第14卷第9期后被迫停刊，其工作人员随后撤回解放区。

民主党派、进步团体与个人主办的报刊也遭到了国民党当局的限制、迫害与摧残。中国民主同盟机关报《民主报》，多次遭国民党特务的袭击和威胁，但它顶住压力，坚持正义立场，并于1946年8月1日起由原来的四开一小张扩版为对开一大张，增加新闻报道与副刊。该报同《新华日报》密切配合，相互支持，不仅为民主运动作宣传鼓动，还多次发起或参与签名、抗议、请愿等进步民主活动。1947年3月1日，《民主报》被国民党当局勒令停刊。在此前后，重庆《民主星期刊》、桂林《民主星期刊》、成都《民众时报》等中国民主同盟主办的报刊也因遭到国民党当局的迫害而停刊。据1947年4月22日重庆《世界日报》报道：各地国民党当局以“登记未准”或“尚未办竣登记手续”为理由而查禁的报刊至少有100种。

素有中国报业中心之称的上海，是民主党派、进步团体与个人主办的报刊荟萃之地，因而遭国民党当局迫害与摧残的报刊为数也最多。马叙伦主编的综合性学术杂志《昌言》，1946年5月4日创刊后一个月即被国民党当局勒令停刊。唐弢、柯灵主编的《周报》，郑振铎主编的《民主》，也分别于1946年8月24日和10月31日被勒令停刊。上海杂志界联谊会为之先后发表《为抗议〈周报〉停刊宣言》和《致政协第三方代表备忘录》，谴责国民党当局的反民主行径。1947年5月24日，上海《文汇报》、《新民报》和《联合日报晚刊》三家报纸在同一天被国民党查封。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部勒令《文汇报》停刊的令文云：“查该报连续登载妨害军事之消息，及意图颠覆政府破坏公共秩序之言论与新闻。本市为戒严地区，应予取缔。依照戒严法规定，着令该报于明日起停刊，毋得违误。此令。”此后，《新民报》于7月30日复刊，但其总编辑一职被国民党派来的人员占据。

1947年6月1日，国民党当局还出动大批军警宪特，在重庆等重要城市对新闻界进行大逮捕。在这一天之内，仅重庆一地的被捕人员就达30多人，其中《国民公报》4人、《商务日报》6人、《新民报》8人、《大公报》8人、《世界日报》4人。《新民报》一家报社的被捕人员为21人，除了重庆分社8人外，还有成都分社3人、南京分社9人、上海分社1人。

为了在国统区坚持进步宣传，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报刊在国共合作破裂后，转入“地下”秘密出版发行。上海《文萃》杂志自1947年3月6日出版了第73期后就改为秘密发行，原来公开的文萃杂志社被撤销，以人人出版社名义出版，

编辑人员分散开展工作。刊物由原来的16开本改为32开本，以每期周刊内的一篇文章的题目作为刊名（如第一期名《论喝倒彩》），并印有“文萃丛刊”4个小字。丛刊第一期《论喝倒彩》在《告读者》中说：“从这期起，《文萃》在形式上有所改变了，这是一种书的形式，而内容则仍旧是一本杂志。这种改变完全是为了适应发行的需要。”为了迷惑敌人，《文萃》还不断变换手法，自第4期起，封面不再印有“文萃”字样，改为印有一个特殊的小标志，使老读者一看便知《文萃》还在坚持战斗。同年7月21日，《文萃丛刊》的“地下”编辑部被国民党特务查获，该刊工作人员吴承德、陈子涛、骆何民三人被捕，后在上海解放前夕惨遭杀害，时称“文萃三烈士”。

国统区反对国民党统治的第二条战线形成后，作为第二条战线上新闻尖兵的北平、上海等地的进步学生报刊成了中国共产党在国统区坚持进步宣传的一支重要力量，其中影响较大的有《中国学生导报》、《学生报》、《燕京新闻》等。

《中国学生导报》是抗战以来国统区出版时间最长的一份学生报纸，1944年12月22日在重庆创刊，复旦大学等大中院校学生主办。抗战胜利后，该报发行上海航空版，自1946年5月起同时出版重庆版和上海版，1947年6月被迫停刊。《学生报》于1947年6月11日在上海创刊，其前身是上海民治新闻专科学校、中国新闻专科学校的实习报纸《学生新闻》。该报是刚成立的上海市学生联合会的机关报，初为三日刊，后改为旬刊，秘密发行，在重大事件发生时还出版“快报”、“号外”以及传单等。《燕京新闻》是燕京大学新闻系出版的实习报纸，前身是1932年创刊的《平西新闻》，后改称《燕京新闻》，抗战时迁至成都出版，1946年回北平复刊，并走向社会，成为一份时事政治性新闻刊物。该报作为学生运动的战斗号角，一直坚持出版到北平解放。1946年12月沈崇事件发生后，《燕京新闻》针对国民党当局的造谣宣传，发表《沈女士访问记》、《重访沈女士》等新闻通讯，报道了事件的真相，在全国各地影响广泛，并为解放区、国统区以及香港报纸所转载。

中国共产党还将新闻阵地转移到香港，同民主党派、民主人士主办的报刊一起，展开反对国民党统治的舆论宣传斗争。1947年1月30日，中共在国统区出版的重要刊物《群众》周刊在香港复刊。为了配合人民解放战争，《群众》集中精力宣传中国共产党的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民主力量以反对三大敌人的政策，宣传解放区土地改革的伟大胜利，揭露美蒋互相勾结、反对人民的罪恶行径。该刊不仅风行境外，还以各种伪装封面大量秘密运进国统区，在上海还有秘密印制的版本。全国解放后，《群众》于1949年10月20日出至第143期后停刊。此外，中国共产党还进一步加强在香港出版的《正报》、《华商报》的宣传工作，使这两

份报纸在国共合作破裂后发挥更大作用。《正报》、《华商报》利用香港报纸言论基本上不受检查的有利条件，向国统区和海外如实报道国内外形势，正确阐释中国共产党的方针和政策。在发行上，两报立足香港，并采取各种措施突破国民党的封锁，扩大到华南广大城乡乃至遥远的内地城市。民主党派、民主人士主办的报刊中影响最大的是中国民主同盟中央机关报《光明报》。该报于1941年9月18日在香港出版，同年12月12日宣告停刊。1946年8月该报复刊，出至1947年7月停刊。1948年3月1日，《光明报》第二次复刊。该报以彻底摧毁南京反动独裁政府，彻底实现民主、和平、独立、统一的新中国为宣传宗旨，及时表达民盟三中全会后确定的政治主张，用事实揭露国民党统治的反动本质，积极报道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解放区生气蓬勃的真实景象。

1948年，国统区鼓吹“第三条道路”的报刊宣传活动出现高潮后，濒临崩溃边缘的国民党当局则采取法西斯高压政策，对其大肆迫害与摧残。

国统区鼓吹“第三条道路”的报刊的出现，是国共两党激战之际新闻界出现的一个重要现象。所谓“第三条道路”，就是既反对国民党的独裁统治，又反对共产党的人民政权，试图在中国实现英美式的资产阶级专政，是一条代表资产阶级和上层小资产阶级利益的道路。早在抗战胜利后不久，国统区就兴起了一股宣传“第三条道路”的潮流，其代表人物中有不少是民主党派成员。1947年2月国共合作破裂后，《观察》、《新路》、《大学评论》、《时与文》、《世纪评论》、《大公报》、《文汇报》等报刊发表了不少鼓吹“第三条道路”的文章，将“第三条道路”运动推向高潮。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观察》周刊。该刊于1946年9月在上海创刊，其前身是1945年11月至1946年4月在重庆出版的《客观》周刊，储安平创办并任主编。该刊从西方自由主义理念出发，对国民党法西斯统治表示失望与不满，发表过不少揭露国民党腐败统治的文章，同时对中国革命运动也缺乏认识，反对共产主义和中国共产党，认为共产党的胜利只是“以暴易暴”。在人民解放军转入反攻之后，美国帝国主义看到国民党政权已呈崩溃之势，便更为积极地扶植“第三种势力”，主张让“自由主义分子”领导中国，因而在1948年间又出现了一轮规模更大的鼓吹“第三条道路”的宣传声势。1948年1月1日，《大公报》发表社论，承认“武力不能解决问题”，希望这一年能成为“人类觉醒之年”。接着，该报陆续发表《自由主义者的信念》、《国际第三方面势力的抬头》等社论，宣传“自由主义”的“中间路线”，强调“自由主义者的信念”，号召“自由分子站起来”，倡议实行多党竞争制，有时还自称民主社会主义者。国民党政府中一部分负责工业生产的官员和一些学者教授，也于1948年3月1日在北平创建“中国社会经济研究会”，并于5月15日创办该组织的机关刊物《新路》。

周刊，宣传走改良主义的“新路”，即“第三条道路”。1948年7月，国民党立法委员刘不同等人在南京创办《大学评论》周刊，也打出了“第三条道路”的招牌。这些刊物既反对共产党的人民革命，也反对国民党的腐败无能，反映了国民党统治集团内部一部分力量借“第三条道路”的幌子来进行政治投机的图谋。

由于“第三条道路”确实反映了当时一部分尚未摆脱个人自由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的要求与情绪，因而在一个时期内影响十分广泛。对此，中国共产党组织国统区进步报刊对这一主张进行驳斥与批判。上海《文萃丛刊》、香港《群众》周刊、《华商报》、《正报》以及其他进步报刊公开批评《大公报》、《新路》等的错误论调。1948年5月22日，新华社发表《旧中国在灭亡，新中国在前进》的社论，明确指出：“在中国人民和人民敌人的生死斗争中间，没有任何‘第三条道路’存在。中国现在只存在着两条道路，或者是继续保存人民敌人的武装和特权，这就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领导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卖国内战独裁路线；或者是消灭人民敌人的武装和特权，这就是工人、农民、独立劳动者、知识分子、自由资产阶级和其他爱国分子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人民民主路线。”

对于鼓吹“第三条道路”的宣传活动，国民党当局始终施行弹压政策。早在1947年下半年人民解放军转入反攻后，国民党当局就于10月下令解散民主同盟，在事实上封杀了“第三条道路”。《中央日报》连续发表陶希圣秉承蒋介石意旨撰写的社论，对《大公报》总编辑王芸生进行指名道姓的人身攻击。在此情势下，王芸生被迫于11月离开上海去香港，1949年3月初奔赴解放区，加入了人民新闻工作者的行列。同时，倡导自由主义新闻理念的《观察》周刊也由于国民党反动真面目的暴露而改变政治立场，不再发表批评共产党的文章，还公开揭露该刊受国民党当局压制的情形，为一些失去舆论阵地的民主人士吴晗、张志让等人提供讲坛。1948年12月，国民党当局下令查封《观察》周刊，主编储安平愤而离沪去解放区，投身于人民新闻工作队伍。至此，美帝国主义者寄予厚望的“第三条道路”彻底破产，其宣传活动也戛然而终。

第二节 解放区新闻事业的发展与新闻工作中两条战线的斗争

一、人民新闻事业的发展与收缩

抗战胜利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区人民新闻事业经历了一个发展、收缩、再发展的历程。

抗战一胜利，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冲破国民党当局的束缚与钳制，对日本侵略者开展全面大反攻，迅速收复了大片国土，解放区迅速扩大。至1946年初，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解放区面积发展到近300万平方公里，占全国总面积的四分之一，人口约1.49亿，占全国总人口的三分之一。在广大的解放区内，人民新闻事业迅猛发展，报刊的出版条件大为改善，绝大多数由油印改为铅印，不少扩版或改版为大型日报。最令人瞩目的是，随着一些城市和工矿区的被解放，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城市报刊和工矿报刊也应运而生。

在华北，原在阜平出版的中共中央晋察冀分局机关报《晋察冀日报》，于1945年9月12日迁至张家口市出版，并改为对开四版，成为解放区第一份在城市出版的大型日报。中共晋冀鲁豫边区中央局机关报《人民日报》，于1946年5月15日在邯郸市创刊，日出对开四版。该报《发刊词》说：“本报的出版，在于发扬晋冀鲁豫边区人民驱逐日寇，热爱民族，热爱和平民主的传统精神”，“我们的口号是毛主席昭示我们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也就是本报的方针和宗旨”。在山西兴县出版的中共中央晋绥分局机关报《抗战日报》于1946年1月改版为《晋绥日报》，发行地区较前大为扩展。在山东，中共中央山东分局机关报《大众日报》，于1945年8月15日由双日刊改为日刊；《烟台日报》、《新威日报》分别在烟台、威海卫两个重要城市出版。在华中，中共中央华中局机关报《新华日报》（华中版），于1945年12月9日在淮阴地区的清江市创刊，初为四开四版小报，1946年3月1日起扩版为对开四版的大型日报。在东北，中共吉林省委机关报《吉林日报》于1945年10月10日在吉林市创刊；中共中央东北局机关报《东北日报》于11月1日在沈阳创刊，但报头所标出版地点为“山海关”，后迁本溪、海龙等地出版，自1946年5月28日起在哈尔滨市出版。

人民广播事业也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人民广播电台网粗具规模。延安新华广播电台在1943年春因电讯设备损坏而停播后，中央军委九分队和延安通信材料厂一直在改装、调试广播发射机和改进发电设备，为重建人民电台做积极准备。1945年8月中旬，延安新华广播电台恢复工作并试验播音。在试播的第一天，该台播出了延安八路军总部8月10日就日寇投降问题向各抗日民主根据地所有武装部队发布的命令，宣读了朱德总司令8月11日给日本侵华军总司令冈村宁次的命令及各路人民武装挺进敌占区收复失地的消息。针对国民党当局污蔑八路军等人民军队收复失地是“唐突非法之行动”的谬论，该台还播出了毛泽东8月13日、16日为新华社写的评论《蒋介石在挑动内战》、《评蒋介石发言人的谈话》等。延安台恢复播音后，其广播稿件由新华社编辑科口播组负责编辑供给。9月11日，延安新华广播电台正式开播。据延安《解放日报》报道：“延安

广播电台，即日起开始中国国语广播。呼号 XNCR，同时用千周7 500与9 625，波长40米与30.8米，时间每日11时30分至12时30分，与18时30分至19时30分（上海时间）。播送节目有时事新闻、解放区消息、时评及名人讲演等。”此外，该台还播出记录新闻供各地抄收。

人民军队收复关内和东北地区的一批中小城市后，这些城市中的人民广播电台在没收、利用日伪广播电台设备的基础上创建。1945年8月20日，哈尔滨广播电台开播。除日常的新闻报道、讲座节目、文艺演播外，该台还经常采用转播群众大会的方式来宣传中共的和平、民主、团结的主张，揭露蒋介石集团内战、独裁、分裂的行为。8月24日，张家口新华广播电台开始播音，每天以中、短波两部发射机播出早、中、晚三次节目，主要内容有新闻、评论、时事解说、政策法规讲座、广播讲演、百科知识和文艺节目等，并转播延安台节目，1946年7月起还增设英语新闻节目。1946年1月16日，大连广播电台开播，除自办节目外，还转播延安台和莫斯科广播电台的节目。至1946年6月，除上述哈尔滨、张家口、大连电台外，长春、安东（今丹东）、鞍山、吉林、齐齐哈尔、承德等地也先后出现了人民的广播电台。

解放战争时期，以延安新华广播电台为代表的人民广播电台，在宣传上的最大特点就是立足解放区，以国统区听众为主要对象，帮助国统区的听众了解中国共产党的政策、主张和解放区的生产建设情况，通过具体、真实的新闻报道和广播讲话来驳斥、揭穿蒋介石集团的造谣和歪曲宣传。延安《解放日报》提出“大家办广播”的方针后，延安台特别播出启事，希望国统区听众把自己在国民党统治下不敢说、没有地方说的话都写给延安台，由延安台代为广播。1946年6月，《语言广播部暂行工作细则》颁布，对编写稿件和节目的要求、稿件处理制度等都做了比较详细、具体的规定。

1946年6月国民党当局发动全面内战后，由于人民解放军不争一城一地的得失，以消灭敌军有生力量为主要目标，主动放弃了一些地方，解放区人民新闻事业由发展转为收缩。许多报刊被迫从城市迁回农村出版，由大报改为小报，由铅印改为油印，由日刊改为双日刊、三日刊、周刊以至不定期刊，发行范围与数量也由大变小，还有一些报刊被迫停刊。1946年6月24日，中共中央中原局机关报《七七日报》发表《停刊启事》；10月11日，解放军撤出张家口市，《晋察冀日报》迁回阜平出版，并由对开一张改为对开半张；12月26日，中共中央华中分局机关报《新华日报》（华中版）被迫停刊。1947年3月后，国民党当局对陕甘宁解放区发动重点进攻。延安《解放日报》于3月9日起由原来的一张四版改为半张二版，3月13日在延安出版了第2 117号后撤离，3月15日起在子长县

史家畔村出版，并改为日出一小张二版。由于版面缩减，长篇文章和副刊都被裁撤，国际新闻报道仅保留《国际一周》专栏。3月27日，延安《解放日报》出至第2130号后终刊。

刚刚发展起来的人民广播事业也被迫收缩，不少电台停播，延安新华广播电台等则被迫迁址。哈尔滨广播电台于1946年下半年转移到佳木斯，并于9月13日起改组为东北新华广播电台，由中共中央东北局领导。张家口新华广播电台于1946年10月转移到阜平山区，并改组为晋察冀新华广播电台，于1947年元旦开播。延安新华广播电台为了保证在战争期间永不中断，自1946年11月下旬起就开始研究与准备转移事项，其中一部分工作人员转移至陕北子长县史家畔村，中央军委三局的通信技术人员也开始在陕北查勘台址，为建立延安台的战备台积极准备。因此，国民党军队进犯延安期间，延安台的电波一天也未中断。在延安工作的电台人员坚持至14日中午，已转移到子长县好坪沟村的战备台工作人员则自14日晚上起接替播音，并于21日起改名为陕北新华广播电台继续播音。此时，中共中央已指示晋冀鲁豫解放区与邯郸新华广播电台迅速筹建一座新的广播电台。自3月29日晚起，这座设在太行山麓涉县境内的新建的电台接替陕北台播音，仍使用“陕北新华广播电台”的呼号。与此同时，陕北台的人员随新华社大部人员一起离开陕北向东转移，第一批人员在4月底到达涉县，第二批人员于7月底抵达。

二、新华社作用的加强与军事宣传报道的发展

抗战胜利后，新华社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在组织建设方面，新华社总社的工作机构较前扩大、充实，分为国内新闻、国际新闻、英文广播、口语广播4个编辑部门。各解放区的总分社、新的解放区和重庆、北平、南京3个大城市的分社也先后建立。至1946年4月，新华社在国内已建成总分社9个、分社40多个。此后，中共中央又提出了“全党办通讯社”的口号，制定了《新华社、解放日报暂行管理规则》，对新华社和解放日报社实行报社合一、以通讯社为主的体制，新华通讯社社长与总编辑，分别兼任解放日报社社长与总编辑。

在业务建设方面，新华社总社提出了提高报道水平、改进新闻写作、加紧业务学习等新的任务与要求，指出：“新华通讯社已经是个全国性的通讯社，过去它的新闻电稿仅仅为着供应解放区报纸，现在……还要争取京、沪、渝、平乃至国外各种报刊采用；过去它的宣传对象是解放区群众，现在……已经扩大到新解放区城市的许多市民，并且还必须照顾到国民党区域的各阶层人士；过去它的任务主要是交流各解放区的情形、工作经验，现在……还要以解放区新闻为基础，

进而组织全国的新闻网，进出于国内新闻舞台，与其他新闻机关相抗衡。如是，我们新闻报道的水准必须提高，内容和技术都要改进，使它更加充实，更加迅速，更加生动，更加简练，使之够得上全国宣传的要求，满足更广大的读者的希望，完成复杂而艰巨的战斗任务。”^①

1947年3月国民党军队对陕甘宁解放区发动全面进攻后，新华社兼解放日报社社长廖承志率领两社大部人员于3月14日撤出延安，少数工作人员则留下坚持工作至18日凌晨与党中央最后一批撤出。3月27日《解放日报》停刊后，中共中央决定进一步加强新华社的工作，使新华社同时担负起党中央机关报、通讯社和广播电台的三重任务，不仅报道新闻，还代表党中央发表时事政治评论。接着，中共中央又把新华社分成两支工作队伍，以适应战时需要。一支队伍由廖承志率领，包括了新华总社大部分人员，于3月20日东渡黄河赴太行山地区，实行战略大转移。另一支队伍由新华社副总编辑范长江率领，由新华总社少数精干人员41人组成，同年11月发展至107人，番号为“四大队”，留在陕北，跟随毛泽东、周恩来率领的中央纵队从事新闻宣传工作，充当党中央的“耳目”与“喉舌”。“四大队”的主要工作任务是：收译国内外通讯社电讯，为党中央及时提供信息；负责党中央同太行新华总社之间的电台联系，传送指示、报告与文稿；抄收新华总社的文字广播，加上外国通讯社的电讯，编印供中央机关阅读的《新闻简报》与《参考消息》；代表总社就近指导新华社西北总分社和西北野战军前线分社的报道工作。

在新华总社向太行山区转移之时，中共中央还紧急指示中共晋冀鲁豫中央局迅速抽调晋冀鲁豫《人民日报》、新华社晋冀鲁豫总分社、太行分社等单位的部分干部，组建新华社临时总社，临时接替在转移中的新华总社的工作。新华社临时总社建立后，每天24小时同陕北党中央保持联系，在范长江的直接指导下，播发中共领导人的讲话和为新华社写的评论或社论、中共中央发言人的谈话，以及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消息。1947年7月上旬，廖承志率领的新华总社大部人员历时3个月，行程2000多公里，胜利抵达河北涉县，在太行山区重建新华总社。新华临时总社的任务完成，其人员除少数参加总社工作外，大部分回到原来的工作单位。

为了适应人民解放军转入反攻时期的宣传报道需要，新华总社编辑部门的建制扩大，将原来的科、组、室调整扩充为部，设立了解放区部、国民党区部、国际部、语言广播部、英文广播部、英译部等。在工作业务方面，7月下旬起抄收

^① 《电讯要简练》，载延安《解放日报》，1946-05-23。

外电工作恢复到延安时期的规模；8月1日起恢复了半月一次国内外的述评性新闻；文字广播增加“新闻情报”项，供中央领导机关及前方部队指挥员参考；口语广播增加了简明新闻，供行动中的野战部队收听；9月11日，新增国内英语口播新闻。

1948年3月，党中央决定东渡黄河，向河北平山县转移。新华总社也分批离开太行向平山转移。5月22日，总社在太行的工作全部结束，自23日起由已抵达平山的新华社人员接替各项工作。6月初，新华社最后一批人员抵达平山。此后，中共中央恢复与加强了对新华社的直接领导，对其组织机构进行了调整与充实，原来的总社社务委员会扩大为管理委员会，由廖承志、胡乔木、范长江等组成，廖为社长，胡为总编辑，下设编辑部和广播管理部，分别由范长江和廖承志（兼）任部长。10月，总社又成立了编委会，由胡乔木负责，处理宣传方针、编辑业务及对各总分社工作的领导。总社工作人员队伍更为壮大，至1948年11月，全社人员共754人，其中编辑人员129人，电务人员215人。各地总分社和分社发展到20个。工作业务及其规模较前扩展。总社每天播发文字广播稿8000至20000字，口语广播稿13000字，英文广播稿约合中文2500字至3500，参考消息稿2500字至3000字；抄收的国内外通讯社电台达30家，抄收各类电稿的总数约14万字；并同国内各总分社、分社建立无线电通报联系，还每日出版《各地来稿》、《电讯清样》、《新华社电讯稿》、《参考消息》等。

在新华总社迁党中央所在地河北平山的同时，陕北新华广播电台也迁至平山，自1948年5月23日起在平山播音。6月15日，中共中央华北局机关报《人民日报》在平山创刊。该报由原《晋察冀日报》和晋冀鲁豫《人民日报》合并改组而成，实际上发挥党的全国性机关报作用。

在解放战争时期，军事宣传报道始终是人民新闻工作的一项基本内容。1946年6月，国民党发动全面内战后，解放日报社、新华社以及其他党和人民的新闻机构就开始将军事宣传报道作为中心工作。6月30日，毛泽东写信给新华社、解放日报社的负责人，指示说：“从现时起，凡各地蒋军向我进攻之消息，均请发表，并广播；因蒋口头说停战，实际在作战，我应发表新闻予以揭穿。”^①

延安《解放日报》加强了形势与任务的宣传，发表了大量的消息和评论，揭露蒋介石集团阻挠中国人民解放军接受日伪军投降、联合日伪军向解放区进攻的真相，反映解放军向城市进军和奋起自卫的正义斗争，帮助读者分析战况，预见事态的发展。早在国民党军进攻陕甘宁解放区之前，延安《解放日报》就用大量

^① 《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133—134页。

事实告诉读者：蒋介石集团将要进攻陕甘宁解放区和延安。1947年2月27日，该报发表题为《粉碎蒋介石进攻边区的阴谋》的社论，分析了战局与蒋军新动向。随后，多次发表消息和评论，分析蒋军新动向。3月11日，在美军观察组撤离延安后仅7个小时，蒋军飞机就来轰炸。翌日，《解放日报》发表消息和新华社记者评论，指出蒋机轰炸是“进攻延安的信号”。13日和14日，蒋军飞机又多次轰炸延安。

当时，国民党占据暂时的优势，又有美帝国主义的支持，人民解放战争能否取得胜利是人们最为关心的问题。对此，新华社等新闻机构不仅加强军事评论工作，通过各种评论、社论和述评性报道分析战局，展望光明前景，还注重运用具体战例说明美蒋反动派的“纸老虎”本质，鼓起军民必胜的信心。延安新华广播电台在广播中大量报道蒋军在美帝国主义支持下不断侵犯解放区的事实，同时也反映了解放区军民奋起自卫反抗的胜利消息。国民党军进占延安后，已撤退到农村出版的《解放日报》于3月15日发表文章指出，蒋军占领延安“这座空城”后，背上了包袱，“以后必然更加困难”。它还告诫蒋军官兵：“若要生还故乡惟有放下武器。”

1947年下半年人民解放军转入反攻后，新华社以及其他新闻机构更以全力投入大反攻的报道与宣传，新华总社编辑部还抽出专人负责撰写军事综合报道与军事评论。7月1日，新华社发表社论《努力奋斗迎接胜利》；7月2日，新华社报道了刘邓大军渡黄河挺进中原的胜利消息。9月12日起，新华社发表《人民解放军大举反攻》的社论，指出：“人民解放军的大举反攻，标志着战争形势的根本转变。蒋介石的全面攻势已被打得粉碎，已经一去不复返了。”陕北新华广播电台自9月12日起，打破惯例、连续4天反复播出新华社这一社论。接着，新华社还播发了《四路大军挥戈南下》等一系列有关大反攻的新闻，及时报道战局的新发展，向全国人民报道人民解放战争胜利的消息。在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和渡江战役期间，新华社以及其他新闻机构作了有声势、有规模、迅速及时的报道，多侧面地充分反映了战役的主要进程、胜利成果和伟大意义，出现了一批优秀的新闻报道与通讯。邯郸台于1947年8月开办对南下人民解放军广播节目，内容包括国内外时事、前方战况、后方参军、支前、生产建设和文化教育情况等。1948年元旦后又开办代播军属家信节目，10个月内播出家信近2000封。解放区广播成为南下部队指战员和后方群众获得消息的重要来源。

为了做好军事宣传报道工作，新华社的军事报道网迅速发展。战争初期，新华社晋察冀、晋冀鲁豫、山东、华中等总分社都派出记者组或记者团，随军进行采访活动，后又在这些记者组或记者团的基础上陆续扩建为前线分社。1946年6

月1日，山东野战军前线分社率先成立；8月，鄂豫皖野战分社、豫陕鄂野战分社亦告成立；1947年1月，山东野战军前线分社与华中野战军前线分社合并成立华东野战军前线分社。6月24日，中共中央军委和中宣部联合发出《关于建立野战兵团新华分社、改进发布战报办法的指示》，要求“各野战兵团均须成立新华分社”。此后，人民解放军各部队普遍建立军事分社或支社，形成了一个强大的军事报道网，在解放战争中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在组织体制上，新华社各野战部队的分社隶属于所在部队政治部，工作业务由总社或总分社指导，负责前线军事报道并兼顾或协助地方报道、建设部队通讯工作、培养部队新闻干部以及开辟地方新闻工作、建立新解放地区的地方报纸与新华社分社组织。1949年3月5日，中央军委、总政治部与新华总社发出《关于野战军各级新华社名称、任务的规定》。据此，第一、二、三、四野战军的新华分社扩充为总分社，各兵团设分社，各军设支社。这些新华社的战地记者，活跃在硝烟弥漫的战场、短兵相接的前线，成功地报道了许多重大战役与战斗场面，产生了不少激动人心的战地报道与通讯。新华社还发表了大批有影响的军事评论，不仅在当时影响巨大，其中不少还成为中国革命史上的珍品而永载史册。

在人民解放战争期间，毛泽东也为新华社撰写了一系列新闻报道与评论，不仅在当时影响巨大，而且至今仍意义深远。毛泽东为新华社撰写的消息有《长春国民党军全部投降》（1948年10月19日）、《我军解放郑州》（1948年10月22日）、《东北我军全线进攻，辽西蒋军五个军被我军包围击溃》（1948年10月27日）、《中原我军占领南阳》（1948年11月5日）、《我三十万大军胜利南渡长江》（1949年4月22日）、《人民解放军百万大军横渡长江》（1949年4月22日）等，其特点是以事实说话，简明生动，特别是一些有关战场情景的描写，巧妙地穿插历史背景，文情并茂。毛泽东撰写的各类评论有《中国军事形势的重大变化》（1948年11月14日）、《将革命进行到底》（1948年12月30日）、《评战犯求和》（1949年1月5日）、《南京政府向何处去》（1949年4月4日）以及为驳斥美国国务院白皮书《美国与中国的关系》而撰写的5篇新华社评论《丢掉幻想，准备斗争》（1949年8月14日）、《别了，司徒雷登》（1949年8月18日）、《为什么要讨论白皮书》（1949年8月28日）、《“友谊”还是侵略》（1949年8月30日）、《唯心历史观的破产》（1949年9月16日）等，不仅对人民解放战争的发展、对中国革命的发展前景作了准确而又深刻的分析，而且笔调豪放，声势夺人，至今读来仍有一股撼人心灵之气。

新华社和新华广播电台还成功地组织瓦解敌军和争取蒋军家属的宣传报道。1946年7月，原国民党上尉刘善本第一个驾机起义飞抵延安后，延安新华广播

电台播发了刘善本对国民党空军官兵的广播演讲《赶快退出内战漩涡》。自1947年1月20日起，延安新华广播电台每天播放下武器、脱离内战的国民党军官的名单。同年9月5日起，陕北新华广播电台正式开办《对蒋军广播节目》，后改称《对国民党军广播节目》，每天播出半小时，是解放区广播电台播出的第一个对象性节目。此后，邯郸、东北等地的广播电台也办过类似的节目。这类节目以蒋军官兵为主要对象，采用多种宣传形式，向他们宣传中国共产党对时局的主张和宽大处理放下武器人员的政策，报道人民解放军不断胜利的形势，揭露国民党当局的造谣欺骗，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号召他们弃暗投明。陕北台主办的《对国民党军广播》节目，除新闻、评论外，还有的放矢地采用了多种多样的宣传办法，如播送放下武器军官名单、释放战俘名单和放下武器的军官书信，向被人民解放军围困的蒋军播送讲话、警告、命令等文件，介绍解放了的蒋军官兵在解放区受到的人道主义待遇和他们的学习、生活情况等。实践证明，这类节目在分化瓦解敌军的作战意志方面，确实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三、反“客里空”运动与新闻工作中两条战线的斗争

土地改革的宣传报道，是解放区人民新闻事业的又一项重要内容。1946年5月4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土地问题的指示》，将抗战时期实行的减租减息政策改变为没收地主土地分配给农民的政策。1947年9月，中共中央召开全国土地会议，进一步制定了《中国土地法大纲》，规定了彻底消灭封建以及半封建剥削的土地制度，实行耕者有其田的制度，土地改革运动在解放区全面展开。

土改运动兴起后，新华社和解放区的其他报刊、电台立即展开有关土改运动的宣传报道活动。一是以满腔的热情宣传中国共产党的土改路线、方针与政策，并把土改与人民解放战争联系起来，指出几千年来长期存在的封建剥削制度是国民党政权的统治基础，推翻地主阶级、实行土地改革为人民解放战争的全面胜利提供了可靠的保证；传播与推广土改工作的典型经验，推动土地改革向前发展。二是大量刊登揭发封建地主阶级剥削罪恶的报道与材料，积极反映农民的呼声，为农民伸张正义。中共晋冀鲁豫边区中央局机关报《人民日报》专门开设了《农民呼声》专栏，“为的是让大家在这里控诉地主的罪恶，揭发工作里面的缺点，发扬那些咱们农民认为好的合适的事情，提出自己的要求和改进工作的意见”。有鉴于农民文化水平低的实际情况，编者平易近人地提出：“大家会写的就自己写。不会写的，可以找报馆的通讯员、记者和当地干部写，要不就亲自来报馆跑一趟。”贫农魏殿花被诬害受到管制，他听人读了《农民呼声》栏后，就怀揣报纸连夜从几百里外偷跑到人民日报社痛诉委屈。报社协同边区政府组成工作组，

配合地方党组织查明了真情，纠正了错误。魏殿花平反的报道，在边区各地引起了强烈反响。不少农民纷纷来信来访，要求报社代写“呼声”，有的甚至说是来“告状”的。农民欢迎《农民呼声》栏说：“咱总算有一个说话的地方了。”此外，解放区各报针对报社的编辑、记者等工作人员大多来自城市，在感情上与农民有一定距离这一实际情况，决定将编辑部的同志们下放到村子参加土改运动，通过亲身体验来缩短报社工作人员同广大农民和农村基层干部的距离，使报社工作人员对实际工作和办报的责任感有了新的理解，使报纸在土改运动中更好地为农民说话，反映农民的意见和要求。

但是，在土改运动初期，实际工作中一度出现右的倾向，土改宣传报道也犯了不少右倾错误。在有的报纸上，过分渲染地主“拥护土改”，自动“献地”，“献地”后马上变成“劳动人民”，受到政府“赞扬”、群众“感激”等，对土改运动这场阶级斗争的激烈性、严重性视而不见，出现一派“和平”土改的虚幻景象。这些宣传报道，不利于发动广大农民投身土改这场严肃的斗争。由于新闻工作者个人主义、主观主义思想作怪，报纸上的失实新闻报道也为数不少，出现了一些凭空制造的“英雄”与“模范”。这一切，不仅妨害了土改运动的展开，还损害了人民新闻事业的形象，广大农民对报纸产生了不信任的情绪。

对此，在中共中央晋绥分局领导下，《晋绥日报》首先认识错误并予以纠正。自1947年6月起，《晋绥日报》认真检查了新闻报道工作中右的倾向和存在的新闻失实问题，采用在报纸上公开进行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方式，发动群众揭露假报道，维护新闻真实性原则，发起了反“客里空”运动。6月15日，《晋绥日报》用第四版整版篇幅刊登苏联剧本《前线》中有关“客里空”的情节。客里空是一个惯于弄虚作假、吹牛拍马的战地特派记者，但从不深入战场，而是呆在总指挥部，根据从总指挥部听到的一星半点材料胡编乱造，最后终于暴露了马脚，被广大红军官兵从前线赶走了。《晋绥日报》在“编者按”中说：“我们的编者作者应该更加警惕，并勇敢地严格地检讨与揭露自己不正确的采访编写的思想作风，更希望我们每一个读者都起来认真、负责、大胆地揭发客里空和比客里空更坏的新闻通讯及其作者，在我们的新闻阵营中肃清客里空。”6月25日至27日，《晋绥日报》又以《不真实新闻与客里空之揭露》为题，将报社自我检查出的或群众揭发检举出的失实报道连续曝光。接着，一些报社工作人员以及通讯员响应报社的号召，对自己采写的报道失实之处作自我检查与自我批评，揭露新闻工作中由于个人主义、主观主义思想和不负责任、粗枝大叶作风而造成的报道失实现象，如编辑人员在编版时不调查研究，毫无根据地任意删改。

许多读者也热情地向报社提供口头的或书面的材料，一些县区的基层政权组

织还帮助报社开展运动，发动群众检举“客里空”。《晋绥日报》勇于自我批评的精神受到了广大读者的赞扬。9月18日，《晋绥日报》在其创刊七周年纪念之际，与新华社晋绥总分社联名发表《关于“客里空”的检查》，连载4天，将检查的重点指向报社的领导人员，提出把肃清“客里空”与检查端正领导作风结合起来。文章指出：“‘客里空’之所以能够出现，又是和戈尔洛夫分不开的；‘客里空’的笔是替戈尔洛夫写的。”戈尔洛夫是《前线》中描述的一个战地总指挥员，居功保守，只许别人赞扬自己，听不得半点批评。《晋绥日报》中层以上的领导干部经过学习后一致认为：“如果没有戈尔洛夫，‘客里空’也吃不开。我们也应当拿这面镜子照照自己。”

《晋绥日报》发起的反“客里空”运动得到了中共中央的肯定，并通过新华社的宣传报道，从晋绥解放区推广到其他解放区。1947年8月28日，新华社发表署名总社编辑部的专论《锻炼我们的立场与作风——学〈晋绥日报〉检查工作》，指出：“《晋绥日报》这次反对‘客里空’运动，在人民新闻事业建设过程中是有历史意义的”，“各解放区的新闻工作单位部门及个人，均应普遍在公开的群众性的方式下，彻底检查自己的立场与作风，要由此开展一个普遍的学习运动”。9月1日，新华社又发表社论《学习〈晋绥日报〉的自我批评》，深刻分析了解放区新闻工作者的立场与作风发生问题的阶级根源与历史根源，强调指出：“《晋绥日报》的自我批评是土地改革中的一个收获，它必将使新闻工作更加向前推进一步。这种自我批评，不仅各解放区的新闻工作者要学习，而且一切工作部门都应当向它学习，以便更加改进自己的工作。”

在新华社的号召下，各个解放区的新闻界自9月起普遍展开反对“客里空”运动。晋冀鲁豫人民日报和新华社晋冀鲁豫总分社、太岳新华日报社和新华社太岳分社、东北日报社和新华社东北总分社等新闻单位都先后做出学习《晋绥日报》自我批评精神的决定，认真检查新闻报道工作和新闻工作者立场作风等问题。反“客里空”运动自身也向纵深发展，由新闻报道失实现象的纠查深入到新闻工作者立场与作风的检查，一直持续到1948年春季才告一段落。

这场由《晋绥日报》发起的解放区新闻战线的反“客里空”运动，其意义是重大而又深远的。一是发扬了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优良传统，检查、纠正了新闻报道失实现象，维护了新闻真实性原则。为了有效地防止新闻报道的失实或偏差，《晋绥日报》创造性地运用了“编者按语”这一编辑手段。在当时的条件下，面对大量的群众来信来稿，报社要一一予以调查核对是十分困难的。为了充分利用来稿，编辑部在处理稿件时采用了加编者按的做法。按语一般加在一篇稿件的前面或后面，更多的是三言五语地插在稿件和行文中间，针对稿件中的某一观点或

疑难不清的问题，或者阐释交代政策，或者表示赞成什么、反对什么，或者提出问题，加以说明或补充，表达编者的意见。许多按语写得尖锐、泼辣，态度鲜明，很受作者、读者欢迎。二是克服了土改宣传中的右的倾向，改造了新闻工作者的立场与作风，提高了新闻工作者的政治素质。

但是，在反“客里空”运动中也存在“左”的偏向，误伤了一些好人。例如，《晋绥日报》编辑部文章《不真实新闻与“客里空”之揭露》批评了该报1946年11月16日刊登的《临县张家湾的抢收》一稿，指责作者艾柏把地主张顺鸿的女儿吹嘘为生产模范是因为艾柏看中了这个地主的女儿，严重丧失了阶级立场，致使艾柏蒙受不白之冤。事实上，张顺鸿并非地主分子，艾柏看中张顺鸿的女儿更是无稽之谈。更为严重的是，在反对右的错误倾向时助长了“左”的错误倾向，致使土改宣传报道在1947年下半年、特别是第四季度犯了严重的“左”的错误。《晋绥日报》等不少报纸宣传了“查三代”来划分阶级成分的错误做法，片面强调“走贫雇农路线”，排斥与打击中农和其他工商业者，对土改运动起了误导作用。所幸的是，这一情况迅即为党中央所察觉。1948年2月11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党内指示《纠正土地改革宣传中的“左”倾错误》，要求各地党的领导机关、新华总社和各地总分社以及各地报纸工作人员，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和中央路线，检查过去几个月的宣传工作，发扬成绩，纠正错误。根据这一指示的精神，解放区新闻机构于1948年春又普遍开展了一次对于政策宣传中“左”倾错误的检查活动。

1948年3月下旬，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离开陕北赴河北平山，途经晋绥地区。4月2日，毛泽东接见了《晋绥日报》编辑部人员，在听取报社工作汇报后发表了重要谈话，即著名的《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话》。毛泽东的讲话，对包括《晋绥日报》在内的解放区新闻工作中经历的“左”、“右”两条战线的斗争作了全面总结。毛泽东指出：“《晋绥日报》在去年六月以后进行的反对右倾的斗争，是完全正确的”，后来出现的缺点“主要是‘左’的偏向”。“总结了反右反‘左’的经验，使头脑清醒起来，你们的工作就会有改进”。毛泽东认为：“在我们纠正偏差的时候”，“应当采取分析的态度，不应当否定一切”^①。

毛泽东的《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话》，还精辟地阐述了无产阶级党报理论的几个基本问题。关于无产阶级党报的作用与任务，毛泽东指出：“报纸的作用和力量，就在于它能使党的纲领路线，方针政策，工作任务和工作方法，最迅速最广泛地同群众见面”。“办好报纸，把报纸办得引人入胜，在报纸上正确地宣

^① 《毛泽东选集》，2版，第4卷，132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传党的方针政策，通过报纸加强党和群众的联系，这是党的工作中的一项不可小看的、有重大原则意义的问题”。关于办报的路线与方针，毛泽东指出：“我们的报纸也要靠大家来办，靠全体人民群众来办，靠全党来办，而不能只靠少数人关起门来办。”关于无产阶级党报的风格，毛泽东指出：“我们党所办的报纸，我们党所进行的一切宣传工作，都应当是生动的，鲜明的，尖锐的，毫不吞吞吐吐。这是我们革命无产阶级应有的战斗风格。”关于党报工作者的学习与修养问题，毛泽东认为：“报纸工作人员为了教育群众，首先要向群众学习”。“要使不懂得变成懂得，就要去做去看，这就是学习。报社的同志应当轮流出去参加一个时期的群众工作，参加一个时期的土地改革工作，这是很必要的。在没有出去参加群众工作的时候，也应当多听多看关于群众运动的材料，并且下功夫研究这些材料”^①。

第三节 中国新闻事业的划时代巨变

一、人民新闻事业的再发展与走向全面胜利

1947年下半年人民解放战争由战略防御阶段转入战略进攻阶段后，解放区人民新闻事业才度过了艰难的岁月，由收缩阶段转入再发展阶段。一批又一批城市、矿山和交通中心的相继解放，使解放区人民新闻事业获得了新的、更大的发展，其中心开始由农村向城市转移。

1947年11月12日，《新石门日报》在新解放的华北重镇石家庄创刊，后改名《石家庄日报》。1948年1月1日，《内蒙古日报》在乌兰浩特市出版。3月15日，《吉林日报》迁回吉林市出版。10月1日，《新民主报》在山东济南市创刊。12月12日，《东北日报》迁回沈阳市出版。此外，在新解放的城市和工矿地区，一批以工人为读者对象的报纸问世，如山东的《新潍坊报》等。

人民广播事业再度进城，出现了大发展的局面。1948年10月，华东新华广播电台在济南解放后迁入该市继续播音。西北新华广播电台也在西安解放后迁入该市，改名西安广播电台。至1949年3月，解放区的广播电台已达25座。陕北新华广播电台于1949年3月迁入北平，改名北平新华广播电台，成为全国性的广播宣传中枢。新华社也开始加强了关于城市工作的报道业务。

人民新闻事业由农村转移到城市后，如何办好城市报纸和开展城市新闻宣传工作问题被提上了议事日程。中国共产党虽然已有二十多年的新闻工作经验，但

^① 《毛泽东选集》，2版，第4卷，1318~1322页。

这一问题则是一个全新的问题。在农村解放区办报，由于那里的社会经济构成比较简单，人们的文化水平也较低，有些知识而又不甘附敌的人士大多参加革命工作，因而报纸一般是以干部为读者对象。进城后，社会经济结构比农村复杂得多，工商业者和知识分子习惯于订阅报纸，因此城市报纸也应顺应读者对象的变化而变化。对此，中国共产党及时提出了城市新闻工作的方针、政策。

进城之初，由于当时农村土改中“左”的错误思潮的影响，城市新闻宣传工作也出现了“左”的倾向，主要表现为在宣传工商业政策和工人运动方针时照搬农村做法，在城市中发动清算斗争。如《石家庄日报》，该报社长兼总编辑张春桥在报纸上公开提出“贫民会、贫雇农会和其他革命组织进行翻身斗争”的口号，宣传了一整套照搬农村清算斗争的“左”的错误政策，严重地破坏了城市工商业，违反了城市工作应依靠工人阶级的基本原则。在“左”的错误被纠正后，又一度出现了右的错误倾向，主要表现为宣传无产阶级和工人运动不够、过高地估计工商业资本家在恢复生产中的作用，新闻宣传工作存在无组织、无纪律的现象。

因此，自1948年下半年起，中共中央、中央宣传部、新华总社在总结党在城市新闻宣传工作中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发出了一系列有关城市新闻工作方针的指示与决定。8月15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发布《关于城市党报方针的指示》，提出了关于城市党报工作的三大注意事项：“（一）虽然，报纸读者是县、区干部、知识分子及工商业者，报纸要为他们服务，但我们的报，主要地是为工人和农民服务……要反对两种倾向，一种倾向是忘记了我们主要是代表工农兵的，另一种倾向是拒绝为工商业者和知识分子服务，与他们格格不入……（二）报纸的主要消息，应来自农村和工厂，其次来自市场、学校等其他地方……（三）副刊在城市是很重要的，必须办。但副刊的原则，应是深入浅出地对读者做教育工作……必须宣传马克思主义的观点。”^① 11月18日，中宣部和新华总社联名发出《关于纠正各地新闻报道中右倾偏向的指示》，在总结城市新闻报道工作的经验与教训的基础上，进一步阐释了党的城市办报方针。

1949年3月5日至13日，中国共产党在河北平山西柏坡召开了七届二中全会，毛泽东在会上代表党中央做了报告，明确指出：“从现在起，开始了由城市到乡村并由城市领导乡村的时期”。“从我们接管城市的第一天起，我们的眼睛就要向着这个城市的生产事业的恢复和发展”，城市中的各项工作，包括报纸、通讯社、广播电台的工作，“都是围绕着生产建设这一个中心工作并为这个中心工

^① 《中国共产党新闻工作文件汇编》上册，201～202页。

作服务的”^①。毛泽东的这一报告，从理论上解决了党的工作重心由农村向城市转移、党在城市斗争中必须依靠工人阶级等重要问题，为进城后党的工作规定了基本方针与任务。这一报告，也为党的城市办报方针提供了理论依据，从而使党的城市办报方针趋于成熟。

加强宣传纪律，改变工作作风，也是改善党的城市新闻工作的一个重要方面，可以防止党报在方针政策方面犯错、保证城市办报方针的贯彻执行。中共中央要求党的各级组织在新的形势下加强对新闻工作的领导。1948年6月3日，毛泽东要求各地领导机关加强对报纸等新闻机构的领导：“中央局（分局）及区党委（省委）对于自己的报纸，必须于每天出版之前，由一个完全懂得党的正确路线和正确政策的同志，将大样看一遍，改正错误观点，然后出版。各地领导同志必须以严肃的科学态度对待宣传工作。”^②6月5日，中共中央做出《关于宣传工作中请示与报告制度的决定》，为统一党的新闻宣传口径，消灭无政府、无纪律状态，规定了一整套建立新闻宣传工作请示与报告制度的具体办法。进城以后，新的问题层出不穷，不少地方的报纸任意提口号、任意向外表示态度，因而中共中央又于1949年1月26日发出《宣传约法三章，不要另提口号》、《勿擅自向外表示态度》两个指示，强调在城市工作中凡事都须重新仔细考虑，一举一动都要合乎城市的情况，处理较重要的新事件，都须事先向上级请示。

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还重视加强新闻工作者的政治与业务修养，开展新闻业务的学习与研究活动，以迎接新闻事业大发展的新形势。1948年9、10月间，中共中央在其所在地河北平山县西柏坡举办由人民日报社、新华社华北总分社的部分记者参加的学习班。10月2日，刘少奇亲自去学习班作长篇讲话，即著名的《对华北记者团的谈话》。刘少奇在讲话中表达了党中央对新闻工作的重视，为新闻工作者适应新的形势、完成新的任务提出了明确的努力方向。一是深刻阐明了新闻工作的作用与任务。刘少奇指出：“我们党要通过千百条线索和群众联系起来，而你们的工作、你们的事业，就是千百条线索中很重要的一条。报纸每天和群众见面，每天把党的政策告诉群众。”“党依靠你们的工作，指导群众，向群众学习。”“人民也是依靠你们的”，“依靠你们把他们的呼声、要求、困难、经验以至我们工作中的错误反映上来，变成新闻、通讯，反映给各级党委，反映给中央。”二是提出了党和人民的新闻工作者必备的四个条件：“（一）马列主义的修养；（二）政策路线的知识；（三）正确的基本态度；（四）独立地做相当艰苦

^① 《毛泽东选集》，2版，第4卷，1427、1428页。

^② 《中国共产党新闻工作文件汇编》上册，184页。

的工作。”^①要有马列主义的理论修养，就是要学习唯物史观、认识论和阶级分析的方法；要熟悉党的路线和政策，就是要经常学习、研究，时刻注意党的各项方针政策的执行情况；要有正确的基本态度，就是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充当党和人民联系的桥梁，如实报道与反映实际情况；要独立地做相当艰苦的工作，就是要到处去看、去问，做许多研究工作，独立地进行思考、分析和判断。

新华社等主要新闻机构，还将新闻业务学习与研究列为一项经常性的工作，提出了改进与加强新闻报道问题。由于解放区长期被分割，范围比较小，且战争频仍，新闻传递工具又严重匮乏，造成了新闻从业人员缺乏时效性观念，新闻报道存在不准确、不及时、报道面狭窄等缺点。随着解放战争的急速发展，上述缺点的存在严重影响了新闻宣传的效果，尤其是不能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因此，中共中央宣传部、新华总社将改进与加强新闻报道问题列为工作重点之一，并多次就此提出具体要求与措施。一是强调新闻报道要有全局观点，在报道上，虽立足于本地区的新闻，还需照顾对全国的意义和影响。1949年2月22日，新华总社发出《关于改进新闻报道的指示》，要求各地分社向总社发稿时“必须从全国范围报纸读者的需要，和实际斗争的需要，来有计划地采写和选择稿件，而不要仅仅根据当地或本部队或记者的主观愿望”。“发给总社的新闻应该有明确的目的性，预想到它的效果和作用”。“需要说明一定的问题，最好进而做到解决一定的问题”^②。二是强调努力扩大报道范围，要大大加强城市报道，特别是城市工人运动和经济建设的报道。新闻报道要有连续性和系统性。1949年2月22日新华总社发出的《关于改进新闻报道的指示》指出：“必须扩大报道范围，并依据事物的发展进行有始有终的连续的报道，使我们的新闻内容更加丰富”。“城市新闻的报道，不要只局限于发布入城命令，接管机关企业，恢复工商业，在入城当时热闹几个月。诸如如何系统的摧毁国民党反动统治，人民如何组织起来，并如何建立人民民主统治，如何兴办与城市人民生活有关的市政建设和公益事业，如何由消费城市转变为生产城市，如何逐渐的改造学校教育，如何密切城乡关系，使城市为市民、农民为解放战争服务；我们干部在入城后思想上、生活上、作风上有何问题并如何解决的，都应进行连续的报道，使能反映出城市的复杂状况和问题，城市中新和旧的斗争，半殖民地城市向新民主主义城市的脱胎换骨的变化过程，以及新的人民的成长发展的经过”^③。三是要求新闻报道必须准确、迅

① 《中国共产党新闻工作文件汇编》下册，248～263页。

② 《中国共产党新闻工作文件汇编》上册，370～371页。

③ 同上书，372～373页。

速、简练。1946年5月，新华总社提出“必须时刻存在一个观念：为了最迅速的报道”。1948年，新华总社提出要准确地宣传党的政策，准确地使用统计数字，号召编辑、记者学习列宁“仔细地检查每一事实、每一数字”的严谨作风。

随着大中城市、特别是新闻事业发达的大城市的陆续解放，清理、接管旧有新闻事业的工作也在1948年后被提上了议事日程，旧有新闻事业的清理与接管，是一项很复杂、政策性很强的工作。为此，中共中央颁发了一系列文件，从清理接管工作的基本原则、政策界限到具体的工作方法，都作了明确的指示与规定。1948年11月8日，中共中央颁布了《关于新解放城市中中外报刊通讯社处理办法的决定》，指出：清理、接管工作的基本出发点是“报纸刊物与通讯社是一定的阶级、党派与社会团体进行阶级斗争的一种工具，不是生产事业，故对于私营报纸、刊物与通讯社，一般地不能采取对私营工商业同样的政策”。清理、接管工作的基本原则是“保护人民的言论、出版自由，和剥夺反人民的言论出版自由”。《决定》对清理、接管工作的政策界限与具体方法也作了明确规定。11月20日，中共中央又颁布了《对新解放城市的原广播电台及其人员的政策的决定》，规定了清理、接管旧有广播事业工作的政策。

根据中共中央的决定与指示，各地党和政府有关部门，以既严肃又慎重的态度，开始着手清理、接管旧有新闻事业，并按照不同的情况，采取不同的处理方法。对于国民党党政军系统和反动党派所主办的报刊、通讯社和广播电台，一律由人民政府接管，没收其一切设备与资财，不准以原名复刊或发稿。对于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主办的报刊与通讯社，不仅允许其向人民政府登记后继续刊行与发稿，并予以保护与支持。对于私人经营的报刊、通讯社与广播电台，既不采取无限放任的政策，以防止它们为反动政治势力所利用，也不采取简单地一律取消的政策，而是根据不同情况，区别对待。对长期坚持进步态度的报刊、通讯社予以保护，准其向人民政府登记后继续营业；对中间的不禁止其依靠自己的力量继续营业，但须依法登记；对反动的则予以没收，停止其继续营业。对于民营广播电台，因其直接联系群众，且可能为敌人作通讯联络之用，故在军管期间一律归军管会统一管理，在军管会管理之下准其继续营业；私营的短波广播电台，则一律停止其播音。

对于外国人在华的新闻事业，人民政府根据不同的情况，采取不同的处理方法。对帝国主义国家在华设立的新闻机构，一律予以封闭。1949年7月，人民政府下令取缔美国新闻处等帝国主义国家在华设立的新闻机构，8月下令外国通讯社停止活动，禁止它们对中国报纸发稿。对外国私商主办的报刊，如上海的《字林西报》、《大美晚报》、《密勒氏评论报》，则准其继续出版。

对于旧有新闻事业的工作人员，采取区别对待、妥善处理的政策。除少数查有实据的特务分子、反革命分子依法处理外，其余均由人民政府安排，明显的进步分子与确有学识的中间分子留用；一般的编辑与记者，其比较容易改造者，应经过短期教育后分别留用，然亦不应轻易使其担任编辑与记者工作，其思想顽固、生活腐化不易改造者，应听其或助其转业；技术人员（出版、经理、广播、电务等方面的技术人员）则按对待一般技术人员的方针办理；私营新闻单位的工作人员，原则上由原单位自行处理。

由于缺乏经验，处理旧有新闻机构工作最初出现过一些偏颇，但迅即为中共中央所纠正。1949年1月14日天津解放后，天津军管会曾发布命令，宣布各报一律停刊。中共中央得知后立即致电中共天津市委，批评了这一错误做法，并提出了一些指导性的意见。根据中共中央电报的精神，天津军管会立即发布新的命令，以社会秩序恢复为理由，允许停刊各报除已可确定封闭者可先行出版，待审查后再补发许可证。之后，各新解放城市在处理旧有新闻事业上均采取审慎的态度，严格执行中共中央制定的有关政策。1月31日，北平宣布和平解放。由于已有天津的经验与教训，北平市军管会采取了审慎的态度，除没收《华北日报》等国民党系统的报纸外，允许其余私营报纸包括政治背景复杂的《世界日报》继续出版。但《世界日报》终因其坚持反动立场、刊登国民党中央通讯社的广播新闻、为国民党的假“和平”作宣传，于2月22日被北平市军管会查封。4月23日南京解放后，南京市军管会对《大刚报》的处理方法充分体现了党的政策。南京《大刚报》原为私营报纸，在解放战争时期为国民党CC系所直接控制。南京军管会在处理时将《大刚报》的资本分为两部分，其中属官僚资本的部分予以没收，而私人资本部分则发还给在解放战争中持进步立场、解放后继续出版的汉口《大刚报》。

1949年是中国人民革命走向全面胜利的一年，也是人民新闻事业走向全面胜利的一年。1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后，中共中央领导的新闻机构陆续迁至北平。2月1日，华北《人民日报》北平版内部试刊，2月2日公开出版。3月15日，华北《人民日报》迁入北平出版。8月，中共中央决定该报为中共中央机关报，胡乔木、范长江先后任社长，邓拓任总编辑。新华通讯社于1949年3月25日随中共中央迁入北平，并根据中央决定，逐步调整全国各地的分社组织，在各大区建立总分社，各省、市、自治区建立分社，在解放军部队中也建立总分社、分社、支社各级组织，努力组建一个统一的集中的国家通讯社。6月24日，新任社委会成立，社长由胡乔木兼任，副社长为范长江、陈克寒（兼任总编辑）。在新华社迁入北平的同一天，陕北新华广播电台也迁入北平，改名为北平新华广

播电台，向全国播音。6月5日，中共中央将原新华社的口语广播部扩充为中央广播事业管理处，廖承志任处长，领导与管理全国的广播事业。此后，广播事业与新华社脱离，进入了独立发展的历史阶段。9月27日，北平新华广播电台再次改名为北京新华广播电台。在此前后，其他全国性报刊也陆续迁北平出版，或在北平创刊，如全国总工会机关报《工人日报》于7月创刊等。此外，还有一件值得一提的大事是，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筹备会于7月13日在北平成立，胡乔木任筹备会主任，胡愈之、廖承志任副主任，萨空了、徐迈进分别任正、副秘书长，解放区和国统区两支进步新闻工作队伍胜利会师。筹备会还推出12名正式代表、2名候补代表，代表国统区和解放区的新闻界参加新政协，共筹建国大计。

二、国民党新闻事业的全面崩溃

全面内战爆发后，国民党当局在大肆摧残国统区的进步新闻事业以及其他一切对国民党统治不利的新闻事业的同时，还不断强化自己的新闻事业。除了从物资上（如配给白报纸）、人员上增加党营新闻机构的实力以外，国民党当局还特别注意新闻宣传方针上的统一。1946年10月25日，即伪“国大”召开前夕，国民党中宣部还专门召集全国党报会议，研究宣传办法。为了以数量弥补质量之低劣，国民党还指使特务、军警以个人身份出面办报，扩大其新闻阵地。其中不少报刊还采取鱼目混珠的手法，如重庆的《新华时报》针对《新华日报》等。至1948年间，国民党系统的新闻事业发展到了顶点，在国统区建立起一个遍布全国的新闻事业网，国统区的新闻事业几为国民党一党所独占。

国民党党政军系统主办的报纸遍布全国。据1947年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的统计，国民党中央直辖党报已发展到23家，总销数为45万份。其中以国民党中央机关报《中央日报》命名的有12家，分布在南京、上海、重庆、贵阳、昆明、桂林、长沙、福州、厦门、广州（后迁海口）、沈阳、长春12个大城市。除中央直辖党报外，尚有国民党各省党部主办的地方党报27家，总销数约14万份。江苏省有6家省级党报，即在吴县出版的《吴报》、在镇江出版的《苏报》、在南通出版的《通报》、在徐州出版的《徐报》、在淮阴出版的《淮报》和在东海出版的《海报》。在省级党报之下，各地县级党部主办的报纸则为数更多，几占全国报纸总数的一半。湖南省所有的县、江苏省三分之二的县都办有县党部机关报。国民党军事系统主办的报纸也为数众多，在1947年已发展到229家，如《党军日报》、《黄埔日报》、《阵中日报》等。老牌军报《和平日报》（原《扫荡报》）此时已发展到9家，分别在南京、重庆、上海、汉口、兰州、广州、沈阳、台湾、海

口9个城市出版。该报虽在抗战胜利前一年宣布改制，名义上不再隶属于国民党军委会，抗战胜利后改名《和平日报》，但在宣传上仍一如既往，继续与人民为敌。1949年7月1日，该报恢复了《扫荡报》原名。此外，国民党在抗战胜利后还通过投资、改组等方式，使一批有影响的民营报纸沦为国民党的准党报，由国民党宣传大员出任要职。如胡健中主持的上海、杭州两地的《东南日报》、潘公展主持的上海《申报》、程沧波主持的上海《新闻报》等。据统计，这类报纸的总销数也大约有40万份，其影响不可低估。抗战时期已经出现的国民党特务主办的“内幕新闻性”刊物这时也十分流行，除原有的《新闻天地》外，尚有新办的《新闻内幕》等多种。这类报刊以透露国民党内部某些派系内幕为诱饵招徕读者，旨在推销其大量刊载的反共反人民的造谣污蔑文字。

国民党的新闻通讯事业在这一时期进入鼎盛时期。国民党中央通讯社的国内分社从战时的18家发展到43家，其中战后新创建的有台北、沈阳、长春、太原、青岛等25家；另有分社下设的办事处9家，如长春分社下设的哈尔滨、吉林两家，沈阳分社下设的承德、大连两家，台北分社下设的高雄、台南、台中、花莲、基隆5家；国外分社和特派员办事处从战时的12家发展到25家，其中战后新建的有旧金山、马尼拉、安卡拉、西贡等13家；全社工作人员人数为2653人，较战前增加一倍。据1947年统计，国民党中央广播事业管理处直辖的广播电台增加到42座。中央广播电台在1947年初使用由重庆迁至南京的7.5千瓦短波发射机播音，6月底新增的两台20千瓦的短波发射机开始播音，增强了该台对外广播的力量。1948年下半年，100千瓦的中波发射机开始试播。

在宣传报道上，颂扬法西斯统治，鼓吹反革命内战，是这些国民党系统的新闻机构的共同特点。它们惯用的宣传手法，可大体归纳为两种。一是颠倒是非，混淆黑白。早在抗战胜利之初，国民党报刊、电台和通讯社就围绕着“受降”、“接收”等问题对中国共产党进行攻击，指责延安八路军总部“擅发伪令”，并诬陷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破坏铁路”，“阻碍交通”，袭击、阻止“国军”收复失地，挑起新的军事冲突，企图把内战的责任推给中国共产党。接着又提出险恶的“政治解决”主张，要求共产党先交出人民军队和解放区，强调“政治统一必须以军事统一为前提”。1946年7月2日，上海《东南日报》发表社论《最后的谰言》：“希望共产党对中央政府之再宽大让步，看作和平统一的最后的时机，而勿认为此乃可增加讨价还价的机会。”10月15日，国民党CC系控制的南京《大刚报》发表社论《中共的出路》，颠倒是非地说：“我们不忍国家长期陷入内战，也替中共的出路着想，所以不惮烦言，再吁请中共毅然决定和平合作，立即放弃武力政策。”社论还恬不知耻地说：“我们一向呼吁和平，反对内战，一向

不赞成中共武力夺取政权，一向主张军队国家化，劝中共交出武力。我们所以作此主张，乃是爱护中共。”在11月国民党当局一手包办的“国民大会”开会期间，《中央日报》发表的一系列社论，处处不忘攻击中国共产党，诬陷中国共产党“醉心于拖延破坏的策略”、“依靠迷信暴力”、“称兵叛乱”，甚至发表《望共产党勿自绝于国人》的社论，要共产党及早回头。1947年7月人民解放军由防御转入进攻、国民党军严重失利之时，国民党政府召开国务会议通过“国家总动员案”，并下达戡乱动员令，开动所有的宣传机器全力以赴进行“戡乱总动员”。因此，国民党系统的报刊、电台和通讯社开始响起了一片“戡乱”的鼓噪之声，宣传只有“戡乱”，没有内战。上海等地的《中央日报》刊登国民党中宣部统一撰发的社论《厉行全国总动员》，指责中国共产党“称兵作乱、蓄意叛国”，把戡乱动员令说成是“一个适于时宜的措施”。接着，国民党中宣部又连续两次下发关于“戡乱总动员”的《宣传计划纲要》，对“戡乱”宣传的要求、内容与形式等方方面面均作了详细规定。国民党政府行政院新闻局还专设一个电台，每日广播供各地电台转发的新闻稿件。

二是歪曲事实，造谣中伤。根据国民党中宣部的指示，国民党系统的报刊、电台和通讯社还进行所谓的“暴露性”宣传，对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解放区竭尽造谣诬蔑之能事。1946年8月23日，国民党中宣部在给中央广播电台的指示中说：“兹拟由本部编制中共祸国殃民之新闻交贵处电台发表，其方式如下：（一）每日十数条；（二）不必特设一栏，可分插于贵台新闻广播节目中；（三）措辞完全客观，不取谩骂……”于是，在国民党的报刊上、电台里，不断出现耸人听闻的解放区报道：共区设立机构，专门贩卖烟毒，甚至卖人肉；中共布告民众，凡毁坏桥梁一座者赏大洋10万块；等等。同时，它们还尽可能装作“客观”的语调，摆出一副忧国忧民的样子。在报道内战新闻时，国民党的新闻机构也歪曲事实，炫耀其“赫赫战功”，声称今天消灭了多少“共军”，明天“国军”又取得了巨大“胜利”。南京《大刚报》在1946年10月15日发表的一组题为《平绥与平汉》的内战报道中，竟不顾事实，编造说中共军队“在空军的铁球的压迫下，不得不抱头鼠窜”。对于在战场上被击毙的国民党军官，国民党报刊总要为他们美化一番。1947年8月13日，《和平日报》在报道被解放军击毙的国民党军整编七十四师师长张灵甫等人时，谎报他们是“最后不屈，即在阵地相率自戕”。甚至有些国民党军官在战场上向人民投降之后，国民党报刊上还会出现悼念他们“为党国捐躯”的文章。在人民解放军发起全面反攻后，国民党军队在战场上节节败退，但国民党新闻机构仍然是一片“胜利”之声。在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中，国民党报刊、电台和通讯社作了一系列的歪曲报道，把丢盔弃甲

的全线溃逃说成是英明果断的“战略转移”。甚至在人民解放军向长江挺进时，国民党报刊还是在重复那一成不变的谎言：“共军节节败退，国军乘胜追击。”直至大势已去，蒋介石“引退”求和时，《中央日报》还在大喊大叫“不迁都”、“打到底”、“安定京沪”、“固若金汤”之类的昏话。

1948年后，随着国民党统治末日的来临，刚刚发展到顶点的国民党新闻事业立刻出现大滑坡，许多新闻机构拆迁设备、遣散人员，为出逃做准备，直至土崩瓦解而不能自休。

国民党“中央”字头的新闻机构陆续迁往台湾。“中央日报社”在1948年开始筹办台北版，1949年总社社长马星野带着一大批工作人员和大部分器材、设备迁至台北，于3月12日在台北出版《中央日报》。南京《中央日报》则利用所剩设备继续出版至南京解放。“中央通讯社”在1948年下半年先后关闭了开封、济南、长春、沈阳等分社，12月初南京总社开始将重要电讯器材运往台北，大部分工作人员也陆续去台北。1949年7月，“中央通讯社”在台北成立总社办事处，12月换上“中央通讯社总社”招牌。但这时的“中央社”已今非昔比，设在台湾以外各地的分支机构已全部关闭，国外分社及办事处也由原来的25家减为10家，工作人员总数由原来的2653人减至350人。“中央广播电台”也在南京解放前夕运走一批设备，迁往台湾。

除上述3家国民党“中央级”新闻机构外，迁往台湾的还有《和平日报》（1949年7月1日起恢复《扫荡报》原名出版）、厦门《中央日报》、军事新闻通讯社、中兴新闻通讯社、空军广播电台等国民党系统的新闻机构以及建中新闻通讯社、远东新闻通讯社、寰宇新闻通讯社、华侨通讯社、民本通讯社、中国新闻摄影社、万里新闻摄影社、中国联合通讯社、益世广播电台、民本广播电台等有国民党背景的或在政治上顽固站在国民党反动派一边的报纸、新闻机构。此外，还有一部分国民党系统的新闻机构迁往香港等地。上海《中央日报》、天津《民国日报》分别在1948至1949年间将一部分器材、设备及工作人员迁至香港，后并入《香港时报》。

但是，由于人民解放战争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节节胜利，国民党新闻事业的全部房屋和大部分器材、设备为人民政府所接收，成为建设人民新闻事业的物质基础。北平《华北日报》的全部房屋及器材、设备被接收后用于出版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南京《中央日报》留存的器材、设备被用来出版中共江苏省委机关报《新华日报》。

【学习思考题】

1. 抗战胜利后中国共产党迅速在上海等地办报有何重要意义？
2. 评述“拒检运动”的经过与结果。
3. 标榜“第三条道路”的报刊是在什么背景下出现的？结局如何？
4. 新华社在解放战争中发挥了哪些重要作用？
5. 评述反“客里空”运动的经过与意义。
6. 毛泽东《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话》和刘少奇《对华北记者团的谈话》阐述了哪些重要问题？对无产阶级新闻学有何贡献？
7. 中共中央是怎样正确处理新解放城市中旧有新闻事业的？制定了哪些原则与政策？



第十一章

基本完成社会主义改造时期的新闻事业

第一节 社会主义新闻事业的创建与初步发展

一、公营新闻事业网的形成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新民主主义性质的新闻事业在中国出现。共产党的新闻机构与非共产党的新闻机构并存，公营新闻机构与私营新闻机构并存，反映了当时新民主主义的社会性质。但是，社会主义是中国社会发展的方向，因而建立一个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公营新闻事业系统，是建国初期新闻事业建设的重点。因此，新中国一成立，中共中央和中央人民政府迅即对在革命战争中发展起来的党的新闻事业进行调整与充实，建立起一个以北京为中心、遍布全国各地的公营新闻事业网。这个公营新闻事业网，包括以《人民日报》为中心、以党报为主体的公营报刊网，以新华通讯社为主体的国家通讯社网和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为中心的国营人民广播电台网。

报刊事业是建国初期最普及也最重要的新闻传播工具。因此，建设一个以《人民日报》为中心、以党报为主体的公营报刊网，是当时党和政府的一项重要历史使命。早在建国前夕，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就已正式出版。建国后，《人民日报》迅即发展成为全国最大的报纸，并向国外发行。该报最初日出

对开6版（有时8版），1951年起改出对开4版，1956年改版后扩充为8版。自1955年1月起，该报先后在上海、武汉、西安、广州、成都、昆明、哈尔滨、乌鲁木齐、南昌等地出版航空版。该报发行量在1949年为9万多份，1950年达17万份，1955年为71万份，1956年将近90万份。作为中共中央的机关报，《人民日报》的主要内容是：报道评论国内外重要时事和重要思想、政策问题；介绍全国各地及首都的情况与中心工作，交流经验，开展各种思想与工作问题的讨论；刊登文艺作品和介绍文艺工作经验；发表读者来信问答。

各大行政区、省、直辖市党委的机关报，也在建国前后随着革命形势的胜利发展而逐步发展起来。有的是由原在本地出版的党报改组而成的报纸，如《大众日报》、《东北日报》等；有的是由以解放区新闻干部为骨干并吸收当地进步知识分子组成编辑队伍新创建的报纸，如《解放日报》、《新华日报》、《浙江日报》等，其中《解放日报》、《新华日报》还沿用历史上著名党报的名称。截至1950年，全国各大行政区、省、直辖市基本上都建立了党委机关报（其中各大行政区党委机关报于1954年随大行政区一起撤销）。与此同时，许多地（市）乃至县的党委机关报也纷纷创建，其中不少是原在本地出版的解放区报纸。由中共中央及各级党委机关报组成的党报系统，是国营报刊系统的主体。据1950年全国新闻工作会议调查统计，当时全国各级党的机关报共151种，约占全国报纸总数的59%，在各类报刊中占优势地位。

此外，建国初期的国营报刊，还包括工会、青年团以及民主党派、社会团体、人民军队、少数民族和人民政府职能部门主办的报纸，如《工人日报》、《光明日报》、《中国青年报》、《健康报》、《解放军报》等。《工人日报》于1949年7月15日在北京创刊，为中华全国总工会机关报，初为4开4版，后改为对开4版。《光明日报》于1949年6月16日在北京创刊，对开4版，初为中国民主同盟中央机关报，1953年1月1日起改组为各民主党派、中华全国工商联和政协无党派人士联合主办的报纸。该报在发刊词中明确表达了它的办报宗旨，并提出了四条言论与新闻报道方针：“负责的态度”、“服务的精神”、“建设的批评”、“忠实的报道”。《中国青年报》于1951年4月27日在北京创刊。《解放军报》于1956年7月1日在北京创刊。

据统计，1950年全国各类铅印报纸有382种，1951年增至475种。其中虽有少数私营报纸，但大多数是国营报纸。后经1952年的整顿和1953年的调整，至1954年10月，全国共有报纸248种，均为国营报纸。按报纸种类分，综合性报纸68种，工人报纸55种，农民报纸84种，青年报纸16种，少数民族文字报纸20种，外国文报纸2种，专业报纸3种。各类报纸的期发行总数比1950年增

加了将近3倍。

在新闻通讯事业建设方面，党和国家对新华通讯社进行了一系列调整，迅速地将新华社组建为国家通讯社。1950年3月28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改新华社为统一集中的国家通讯社的指示》。1950年4月25日，中央人民政府新闻总署通过《关于统一新华通讯社组织和工作的决定》，据此，新闻总署对新华社的组织机构进行调整。新华社在华北、东北、华东、中南、西南、西北六个大行政区建立六个总分社，在各省会城市建立分社，支社一律取消，对一些需要设立相当于支社机构的城市，则派驻记者组或记者；除第三野战军总分社及其所属机构外，其他野战军中的新华社分支机构一律取消，其工作人员则根据需要或留部队政治部门、或转入该大区的新华总分社。各地总分社、分社的人事编制和财务管理完全与地方脱钩，其人员由总社调动和任免，其财务纳入新华社的财政系统。1950年11月21日新华社第一次全国社务会议的召开，标志着新华社改组为一个集中统一的国家通讯社的任务基本完成。

接着，党和国家又提出了新华社要成为“消息总汇”的任务。所谓消息总汇，就是反映各方面有价值的信息的、具有权威性的消息采集与发布中心。1953年3月，新华社召开编委扩大会议，明确提出了新华社要成为“消息总汇”的总任务和国内外并重的方针。经过一个为时不长的业务建设过程，新华社集国内报道、对外报道、国际新闻报道等多种功能于一身，并主办了一系列报刊，如《参考消息》、《参考资料》、《时事手册》、《内部参考》、《新华社电讯稿》、《新闻业务》、《新闻图片》、《摄影业务》、《新华社新闻稿》、《前进报》等。除文字宣传报道工作外，新华社的摄影报道工作也日益加强；通讯技术手段也有了很大的改进；同塔斯社及东欧社会主义国家通讯社的合作也有较大的发展，并同路透社等资本主义国家的通讯社开始建立合作关系。

为了便于向海外华人、华侨介绍新中国，国家决定组建以对外宣传为主要任务的中国新闻社。1952年9月14日，中国新闻社在北京成立，10月1日开始发稿。该社由国内一批热心新闻事业的知名人士发起组织，由33人组成理事会，金仲华任社长。其编辑机构最初附设在新华社内，名华侨广播组（后改为部）。该社以海外华侨、港澳台同胞和外籍华人为对象，在宣传上根据华侨爱国统一战线的基本方针和政策，报道祖国政治、经济、文教、卫生等建设成就和闽粤要闻、侨乡情况，以促进爱国华侨的大团结。每日广播华语记录新闻5000字，后逐渐增至8000字，同时向海外航寄新闻稿《中国新闻》，还发行有关中国风光、文物、建设等内容的照片，以后逐步增加供应文字特稿、摄制电影、制作唱片、出版画报等项业务。中国新闻社成立后，又在广东、福建和上海三地设立分社，

在广西、云南设立记者站，在香港设立办事处。

在广播事业建设方面，一个从中央到地方的国营人民广播电台网，以解放区广播干部为骨干、在没收利用国民党广播电台设备的基础上也迅速建成。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是人民广播电台网的中心。1949年12月5日，北京新华广播电台改名为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其服务对象也扩展为全国人民。自1950年起，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开办了对少数民族语言广播业务，最初仅有蒙、藏两种民族语言，后又增加维吾尔、壮、朝鲜三种民族语言。1954年后又开办台湾广播业务，用普通话、闽南话每天播音两个小时，后又增用客家话播音。至1956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已发展到每天播出5套节目，播音时间累计为38个小时。为了便于对外报道，国家决定建立专台对国外广播，1950年4月10日，北京广播电台正式成立，对外呼号为“Radio Peking”。该台用英语、日语、朝鲜语、越南语、缅甸语、泰语和印度尼西亚语7个外国语种播音，此外用普通话、广州话、厦门话、潮州话和客家话对海外华人华侨播音，每天播音时间为11个小时。与此同时，各地区的人民广播电台也纷纷创建。东北、华东、西北、中南、西南5个大行政区在建国前后均建立了本大区的广播电台，后于1954年随大行政区一起撤销。各省级广播电台则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和全国行政区的划定而逐步建立，至1954年，全国各省除西藏、台湾两地外，均建立起本省的人民广播电台。许多有条件的地（市）也创建起本地区的人民广播电台。

人民广播电台的宣传报道任务，根据新闻总署1950年4月颁布的有关规定，一是发布新闻、传达政令，二是社会教育，三是文化娱乐。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根据这三项任务和中国的国情，陆续开办了《全国各地人民广播电台联播》、《新闻和报纸摘要》、《社会科学讲座》、《部队》、《对少年儿童广播》、《经济生活》、《文化生活》等节目。各地方电台也陆续开办各类新闻性、教育性和文艺性的节目。

根据中国的国情，在党和政府的关心与支持下，有线广播收音网也在全国各地、主要是农村地区普遍建立。“九台式”是建国初期有线广播建设的主要模式。1951年，吉林省九台县县委书记张凤岐偶然听到县城的有线广播线和电话串音，并从中得到启发。他在召集技术人员进行可行性研究后，决定利用已有的电话线路发展农村有线广播网。1952年4月1日，全国第一座利用电话线路播出的九台县广播站建成，为当时经济贫困的农村地区发展有线广播提供了一个可资效法的楷模。同年12月，中央广播事业局主持召开第一次全国广播工作会议，充分肯定了九台县广播站的建站经验，并把这一利用电话线路建立广播站的方式称为“九台式”。会议结束后，“九台式”广播站在全国得到推广，提高了当时我国农

村有线广播站的普及率。至1954年底,全国共有县广播站101座,中小城镇广播站705座,有线广播喇叭49 854个

二、对私营新闻事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党和政府对旧中国遗留下来的新闻事业的清理、整顿与改造工作,由没收国民党以及其他反动势力主办的新闻机构阶段转入改造私营新闻事业阶段。

据1950年3月的统计,全国共有私营报纸58家,私营广播电台34座。私营报纸最多的为华东地区,有24家,其中14家在上海出版,如《大公报》、《文汇报》、《新民报》、《大报》、《亦报》、英文《字林西报》、英文《密勒氏评论报》以及3家俄文报纸等。另有一家公私合营的报纸《新闻日报》,系由旧《新闻报》改组而成。华北与中南地区各有11家私营报纸。北京的私营报纸只有《新民报》一家。私营广播电台则大部分在上海,有26座,占全国私营电台总数的76%。

对于这些私营新闻机构,党和政府最初根据公私兼顾的政策,在经济上予以扶持。1949年11月30日,中共中央宣传部的电报说:“私营报纸及公私合营报纸,在现阶段有其一定的必要,故应有条件予以扶助。”该电报还明确指示华东局宣传部要扶助《大公报》,“拨给适当数目纸张,作为公股投入该报”^①。根据中央的精神,各大城市均采取了一些措施,改善私营报纸的困难处境。

对于私营新闻机构的宣传报道活动,实行言论出版自由的原则,对新闻、言论不实行事前检查的办法,而是采取团结教育的方式,帮助它们改进宣传报道内容,但不得反对或者损害人民的利益。北平解放后,北平市军管会明令各新闻机构“不得有违反本会及人民政府法令的行为”,“不得进行反对人民民主事业的宣传”,“不得泄露国家机密与军事机密”,“不得进行捏造谣言与蓄意诽谤的宣传”^②。上海解放后,上海市军管会在进行私营报刊登记的同时,也对它们的报道内容作了原则规定:(1)禁止利用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及帝国主义国家通讯社电讯稿;(2)在发布军事消息、本市军管会各机关部队和政府一切有关政策及刊发中共中央发布的一切文件著作及有关政府的消息时,必须全文采用新华社消息;(3)不得解释中共及解放军政府的法令政策;(4)各报发布的社会消息,必须遵守新民主主义中国之新闻一般原则,实事求是,崇尚真实,向人民负责。至于广

^① 转引自孙旭培:《解放初期对旧新闻事业的接收与改造》,载《新闻研究资料》,总第43辑,58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

^② 同上书,52页。

播电台播出的节目，则须经有关部门审查，并须按规定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节目。

如果出现错误的或失实的报道，由有关方面函请更正，必要时在党和政府的报纸上予以适当的批评。对于无视人民政府的有关规定、进行反动宣传报道活动的新闻机构，则坚决予以制裁。在北平，《世界日报》在该市解放后继续坚持反动立场，刊登国民党中央社的广播新闻，一个多月后被北平市军管会查封与接管。1949年10月25日，北京3家私营商业电台也因“播送有毒素的节日及骗人广告”而被北京市人民政府新闻处查封。在上海，美商主办的《大美晚报》因造谣惑众受到上海市军管会的警告和报馆内工人的反对，于1949年6月下旬自动终刊。英商主办的英文《字林西报》坚持其敌视中国人民的立场，经常刊载损害中国人民利益、反对中国人民政权的消息与言论，不采用新华社而采用西方通讯社的电讯。1950年11月，上海市人民政府严令《字林西报》不得采用帝国主义国家通讯社的电讯。1951年3月31日，《字林西报》自行终刊。与《大美晚报》、《字林西报》相反，美商主办的《密勒氏评论报》对中国人民革命持同情立场，在朝鲜战争期间还揭露美国使用细菌武器的罪行，为中国人民所敬重。1953年6月，该报因美国政府禁止其在美国发行、失去主要读者而被迫停刊。该报主编约翰·威廉·鲍威尔夫妇返美后，还遭到美国政府的无端陷害，中国人民为此发起声援鲍威尔夫妇的活动，向这位坚持正义、坚持真理的美国新闻工作者予以道义上的支持。

但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私营报纸自身遇到了许多难以克服的困难。首先，办报业务难以适应新的形势。党和政府要求新闻工作联系实际，对工作和生活有指导作用。一般私营报纸缺乏这方面的素质，不熟悉新的办报方式，因而报纸的思想性和群众性较差。当时担任上海《新民报晚刊》编辑的一位老报人回忆那时候的办报情形时说：“‘超党派’立场的新闻没有了，‘内幕新闻’也没有了，‘本报南京专电’和外国通讯社的消息也没有了，怎样才能办好这张报纸，大家一筹莫展。”不少报纸还不时登载低级、庸俗的东西，甚至出现“歪曲党的政策”的报道。例如，天津的《博陵报》、哈尔滨的《建设日报》等就曾因发生这类问题而受到停刊处分。其次，在新中国的读者心目中，党报的威信远远高于私营报纸。私营报纸在采访活动和获得新闻方面的条件较差，获得广告也比较困难，使许多私营报纸在经济上难以维持。此外，私营报馆内部的职工也大多数不愿继续留下工作。因此，私营报纸在新中国虽能继续出版，但不久后发行量不断下降，自行停刊的越来越多。1950年6月底，全国私营报纸已由3月份的58家减至43家，11月底减至39家，12月底减至34家，1951年4月底减至31家，8

月下旬只剩下 25 家。

根据这一新的情况，党和政府又转而采取合并改组、公私合营等措施，对私营报纸实行社会主义改造。1950 年 7 月，《大公报》率先实行公私合营，并在报社内建立中国共产党党组。《大公报》公私合营后，根据当时新闻总署的指示，既不正式对外宣布，也不故意否认。接着，《文汇报》、《新民晚报》也先后实行了公私合营，在经济上除保留私股外，由政府给予适当的投资或贷款作为公股，以扶持报纸发展。至 1953 年，私营报纸除停办者外，全部实行了公私合营。此后，人民政府又逐渐退还私股，进一步将公私合营报纸改造成国营报纸。

私营广播电台的经历也与私营报纸基本相同，至 1953 年，全国各大城市的私营广播电台全部实行公私合营，后又并入当地的国营广播电台。私营电台的改造工作，数上海最具有代表性。上海解放后，经过登记、清理，允许继续播音的私营电台有 22 座，其中有 6 座因违犯军管会和人民政府法令于 1951 年被勒令停业。1952 年，其余 16 座电台因经营不善、长期亏损而向政府提出公私合营的申请。同年 10 月，这 16 家私营电台合并为上海联合广播电台，实行公私合营。1953 年 9 月，根据上海联合广播电台私方代表提出的自愿将私方财产实行转让的要求，人民政府以 9 亿人民币（旧币）收购了属于私方的资产，将该台并入上海人民广播电台。

三、新闻总署的设立与新闻法制的建设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新闻事业是一种崭新的新闻事业，其内容与形式都与以前的新闻事业迥然不同。新闻自由原则被庄严地写入国家的根本大法。1949 年 9 月 21 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一致通过了具有临时宪法性质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其中第 5 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有思想、言论、出版、集会、结社、通讯、人身、居住、迁徙、宗教信仰及示威游行的自由权。”第 49 规定：“保护报道真实新闻的自由。禁止利用新闻以进行诽谤、破坏国家人民的利益和煽动世界战争。发展人民广播事业。发展人民出版事业，并注重出版有益于人民的通俗书报。”这些规定，确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新闻自由的原则，即在报道真实新闻和不进行违法活动的前提下，广大人民享有充分的言论、出版自由；确立了国家积极发展为人民服务的新闻事业的方针。

由于建国初期实行的是新民主主义政策，新闻事业既有公营的也有私营的，因而新闻事业的管理方式由革命战争时期形成的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改变为人民政府通过法律手段实施管理，比较适合当时的社会性质和实际情况。1949 年 10 月 19 日，为了便于对新闻事业的领导与管理，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设置了新闻

总署，作为领导与管理全国各类新闻媒介与新中国新闻工作的行政机构。新闻总署由胡乔木任署长，范长江、萨空了任副署长。下属机构与单位有一厅（办公厅）、一社（新华通讯社）、三局（广播事业局、国际新闻局、新闻摄影局）、一校（北京新闻学校）。与之相应，各大区设新闻出版局，各省、市设置新闻出版处。

为了改变传统的观念与做法，中共中央以及有关部门还就此问题发出专门指示。1949年10月30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和新华通讯社就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后宣传工作中应注意的事项，向新华社各分社和各地党报发出指示：“在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后，凡属政府职权范围的事，应由政府讨论决定，由政府明令颁布实施。”“不要再如过去那样有时以中国共产党名义向人民发布行政性质的决定、决议或通知。”“各地中国共产党报的社论、论文和新闻标语，也要注意不再用行政命令的态度和口气，而应该用号召、建议和商讨的态度和口气。报纸用行政命令的态度和口气，不仅现在是错误的，就是过去也是不对的。”^①12月5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中央政府成立后党的文化教育工作问题的指示》，指出：在中央政府成立以前，党的中央宣传部不得不实际上暂时代替中央政府的文教机关，管理国家的文化教育工作。这在过去的情况下，是完全必要的。现在，中央政府已经成立，管理全国文化教育事务的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及其所属之各部、院、署亦先后成立，因此，全国的文化教育的行政工作，此后均应由中央政府文教部门来管理。各地区有关文化教育行政的工作，此后均应经由各地政府及军管会之文教机关向中央政府文化教育委员会或适当部门转告和请示。所以需要这样做，目的在于使中央政府文化教育委员会及其所属各部门，在党（通过政府党组）的领导和党内外民主人士的参与下负起管理全国文化教育行政的任务，以便党的中央宣传部能够摆脱行政事务，集中注意于党内的思想斗争、党的宣传鼓动工作的领导和党的文化教育政策的制定。有关文化教育方面之重大问题，各地区仍须依照过去中央有关请示报告制度的规定，经过党的系统，向中央报告和请示。^②

新闻总署成立后，为在全国范围内确立新民主主义新闻法制做了大量的工作。第一项、也是最重要的一项工作是，制定与颁布有关新闻事业管理的法律规范性文件，以保证新闻事业正确发挥其社会功能。这些有关新闻事业管理的法律规范性文件，一部分是新闻总署为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起草制定、并由中央人民

^① 《中国共产党新闻工作文件汇编》上册，324页。

^② 参见上书，288~289页。

政府政务院发布的。1949年12月9日，为了保障有关中央人民政府及其所属各机关的新闻的正确性和负责性，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颁布《关于统一发布中央人民政府及其所属各机关重要新闻的暂行办法》。该办法规定，凡须经过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政务院、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署通过或同意的一切公告，以及须上述机构负责首长同意后发布的一切公告性新闻，均由新华社统一发布。1950年间，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进一步颁布《关于中央人民政府所属各机关在〈人民日报〉上发表公告及公告性的文件的办法》；1951年6月13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秘书厅颁布《关于严格遵照统一发布新闻的通知》。此外，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名义颁布的还有1950年间出台的《全国报纸杂志登记暂行办法（草案）》，共12条，从报刊的出版登记到违法惩处，一应俱全，包含了一部普通的新闻法的主要内容；1952年8月16日颁布的《期刊登记暂行办法》、《管理书刊业、出版业、发行业暂行条例》；等等。

以新闻总署的名义颁布的有关法律规范性文件主要有：1950年1月12日颁布的《关于报纸采用新华社电讯的规定》、会同邮电部联合颁布的《关于邮电局发行报纸暂行办法》，4月14日颁布的《关于建立广播收音网的决定》，4月25日颁布的《关于统一新华通讯社组织和工作的决定》，4月25日颁布的《关于省市新闻机关员额暂行编制的决定》，5月1日颁布的《关于改进报纸工作的决定》，9月6日颁布的《关于各报应保守国家秘密的指示》，5月30日会同出版总署颁布的《关于各级新闻出版机关的任务与组织暂行规定》；1951年3月21日会同出版总署颁布的《关于全国报纸期刊均应建立书报评论工作的指示》，3月15日颁布的《关于区、省、市广播电台及新闻行政机构关系问题批复西南新闻出版局》，6月6日发出的《关于各地人民广播电台与新闻行政机构关系的补充与说明》的通知；等等。

作为国家的新闻行政管理机构，新闻总署还对上述有关法规加以贯彻、落实。一是主持了全国各类报纸的社会分工事宜。1950年间，新闻总署对于不同报纸之间的分工合作进行了具体的规定，划定了公、私营报纸面向的不同读者对象以及报道内容的不同侧重面。例如，《人民日报》的主要读者对象应为干部和先进群众，其主要内容应是报道、评论国内国际主要时事、思想、政策情况，介绍交流中心工作经验，开展各种思想与工作的批判，发表代表性文艺作品及文艺工作经验，刊登读者问答等。《光明日报》的读者对象应是各民主党派及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其主要内容应侧重于时事、文化、学术、思想及业务学习等方面，并应特别提倡讨论的风气。《新民报》的读者对象主要是北京的小资产阶级及比较无组织的劳动群众，以通俗文艺为主的副刊是其主要特色。这次分工与调

整,使新中国的报纸各有重点,减少重复,节省财力,专业化报纸增多而综合性报纸减少。由于强调地方报纸地方化、以指导当地实际工作为己任,因而一个市或一个地区所办的向全国发行的报纸也大为减少。

二是推出报纸“企业化经营”与“邮发合一”的新办法。由于长期战争造成物质匮乏、纸价上涨(纸价一般占到报纸总成本的70%),再加上社会购买力低、读者范围不广等原因,建国之初几乎所有的公、私营报纸都发生严重的亏损现象,报业经营管理十分艰难。对此,新闻总署提出了报纸“企业化经营”与“邮发合一”的积极措施。1949年12月17日至26日,新闻总署在北京召开了全国报纸经理会议,决定“全国一切公私营报纸的经营,必须采取与贯彻企业化的方针”,“公营报纸必须把报社真正作为生产事业来经营,逐步实行经济核算制”,“条件较好的公营报纸应争取全部或大部自给,条件较差者亦应在政府定期定额的补贴下,争取最大可能的自给程度”,“私营报纸亦须在已有基础上进一步改善经营方法”。关于报纸的发行工作,这次会议确立了“邮发合一”的方针。会议认为:“报纸发行工作,应学习苏联及我国东北、山东的经验,逐步地全部移交邮政局办理”,即实行“邮发合一”。经邮局发行所花的发行费虽然比自办发行多,但可以扩大发行范围,增加发行量。1950年1月12日,新闻总署会同邮电部联合颁布并自是日起施行《关于邮电局发行报纸暂行办法》,以全面落实“邮发合一”方针。之后,“邮发合一”制在《人民日报》率先实行,1953年1月1日起全面实行。

总之,建国初期党和国家重视新民主主义新闻法制建设,采取了一系列颁行新闻政策法规、建立新闻行政管理机构的有力措施,使新闻事业的管理规范化、法制化,避免主观性、随意性,使实行新民主主义新闻法治、并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新闻法治形成了一个良好的开端。但是,随着对私营新闻机构社会主义改造的成功,新闻法规建设步子日益缓慢乃至停滞,新闻行政管理机构逐渐弱化甚至被撤销。1952年8月7日新闻总署被撤销,接着各大区新闻出版局,各省、市新闻出版处也随之撤销,党中央及各级党委的宣传部门逐步代替政府部门主管新闻事业与新闻宣传工作。

第二节 社会主义新闻工作与新闻业务的探索与改进

一、联系实际、联系群众,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新闻工作与新闻业务怎样适应新时代的特点、满足

新时代的要求，是摆在新闻工作者面前的一个新问题。新闻工作的改进与新闻业务建设，已是一项刻不容缓的历史任务。对此，党和政府首先要求新中国的新闻工作者继承和发扬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战争时期形成的新闻工作与新闻业务的优良传统，联系实际，联系群众，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

1950年3月29日至4月16日，中央人民政府新闻总署主持召开了建国后的第一次全国新闻工作会议，首次提出“改进报纸工作、加强与群众的联系”的问题。在这次会议上，新闻总署署长胡乔木明确指出，改进报纸工作，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联系实际；联系群众；批评与自我批评。此后，中共中央、中宣部、新闻总署、新华总社又颁发过一系列文件，反复强调上述问题，其中比较重要的有：1950年4月19日中共中央发布的《关于在报纸刊物上展开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决定》，5月1日新闻总署颁布的《关于改进报纸工作的决定》，1954年7月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改进报纸工作的决议》。

根据这些文件的精神，新闻工作做出了许多重大的改进，以加强新闻工作与社会实际、人民群众的联系。在新闻体制方面，实行采编合一制与总编负责制。建国之初，报纸编辑部一般只笼统地分设编辑、采访、通讯联络三大部门。1950年5月1日，新闻总署发布《关于改进报纸工作的决定》，指出：为了加强报纸在国家建设事业中的作用，“应当改革报社的组织形式和工作方法，改变现有的妨碍联系实际的编辑采访通讯联络等工作各自为政的状态，建立编辑部门统一集中的领导，并应按照社会生活的不同方面（例如公私营工商业与工人问题、农业与农民问题、军事与军队、思想文化与教育出版等）实行适当的分组，以便各组的编辑采访人员可以获得关于各该方面的专门知识，并将编辑采访的工作联合在一起”^①。按照这一要求，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和各省、市委机关报将采编合而为一，改设国内政治、工商、农村、文教、文艺、国际新闻、理论、群众工作等部、组，并实行编委会领导下的总编辑负责制。

此外，各新闻机构还建立起广泛的通讯员网与群众性的读报小组。1950年5月，《人民日报》在全国组织起读报小组2101个，在报纸版面上开辟了《读报组反映》、《读报组活动》等栏目。1951年，《人民日报》的通讯员由原来的二百多人迅速发展到万人以上。据1952年5月统计，《人民日报》通讯员队伍的构成状况是：工人占6.7%，农民占1.3%，士兵占4.7%，知识分子占4.8%，干部和工作人员占82.5%。《人民日报》还编印出版内部刊物《人民日报通讯》，作为培养通讯员的园地。

^① 《中国共产党新闻工作文件汇编》中册，76页。

在新闻宣传报道方面,《人民日报》等报纸还进行通俗化改革,以冀报纸更好地反映群众、引导群众,从而与读者贴得更近。《人民日报》的《人民园地》栏目按照胡乔木同志的建议改变了编辑方针,从空谈中摆脱出来,只发表群众性的、通俗化的东西,把读者来信、读者服务作为中心。它还通过“报纸述评”及时报道推广各报推出的通俗化举措及其经验。《黑龙江日报》等东北各省报纸最早重视这一改革,《黑龙江日报》提出办报要有充分的群众观点,放下“机关报”架子,“多为读者着想”。《山西农民报》等华北各报创造总结出“活人活事活道理”的生动报道方法。

根据1950年《关于改进报纸工作的决定》的精神,各报确立了全编辑部人员都有责任关心处理读者来信的原则,将党报的读者来信工作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各地的报纸也都纷纷设立了读者来信或专栏,并逐步扩大刊登读者来信的篇幅,许多报纸还把一些比较重要的来信突出地编发在一版或新闻版上,一些报纸的副刊还把读者来信作为主要内容,注意发掘来信中生动丰富的内容。

《人民日报》非常重视读者来信来访,并在编辑上有所创新。该报自1952年起将原《读者来信》专栏扩大为专版,并在这个专版上先后设立《来信摘要》、《来信综述》、《读者来访》、《答读者问》、《对批评建议的反映》、《新人新事》等栏目。1953年上半年,该报逐月在报纸上公布“读者来信来访处理情况”,详细列出了每月读者来信来访的件数、人次以及来信利用件数和其中内容的分类统计数等。1955年,《人民日报》每天收到的来信中,属于批评、建议、控诉和揭发性信件约占总数的三分之一,这表现了读者对党报的信任。

对于那些没能发表的信件,《人民日报》编辑部善于从中寻找线索,将带有普遍性的问题,采用评述、综述、答读者问的《信箱》等多种形式发表。范长江还提出要安排专人24小时接听值班电话,把从读者中传来的声音随时通知相关人员。

广播收音网的普遍建立,是广播工作联系实际、联系群众的重要措施之一。根据新闻总署1950年4月10日发布的《关于建立广播收音网的决定》的精神,全国各县市人民政府、人民解放军各级政治机关以及其他机关、团体、工厂、学校均设有专职或兼职收音员,收听或记录中央和地方人民广播电台广播的新闻报道,向群众介绍广播节目,组织群众收听重要节目。

积极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是建国初期新闻工作的一大特色,也是新闻工作联系实际、联系群众的一个重要方面。1950年4月19日,中共中央颁发了《关于在报纸刊物上展开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决定》。这一决定从政权建设和党的建设的高度阐述了报刊批评的重要意义,指出:“如果我们对于我们党的人民政府的

及所有机关和群众团体的缺点和错误，不能公开地及时地在全党和广大人民中展开批评与自我批评，我们就要被严重的官僚主义所毒害，不能完成新中国的建设任务。”因此，中共中央特决定：“在一切公开的场合，在人民群众中，特别在报纸刊物上展开对于我们工作中一切错误和缺点的批评与自我批评。”实行批评独立与责任独立相统一的原则，把报刊独立进行批评的权利和独立的责任统一起来，指出：“在今后，报纸刊物的人员对于自己不能决定真伪的批评仍然可以而且应当征求有关部门的意见，但是只要报纸刊物确认这种批评在基本上是正确的，即令并未征求或并未征得被批评者的同意，仍然应当负责加以发表”。“凡在报纸刊物上公布的批评，都由报纸刊物的记者和编辑负独立的责任”^①。

在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方面，《人民日报》当时走在最前面。据统计，《人民日报》发表的批评性报道或文章，1949年为347篇，1950年为753篇，1951年为1749篇，1952年为1741篇，1953年为1027篇，其中1951至1953年三年中，日均刊登批评稿超过4篇。

这一时期报纸批评与自我批评工作的最显著的特点是旗帜鲜明、斗争坚决。在1951年底至1952年底“三反”、“五反”运动期间，各报集中揭发和批评一批重大典型事件，其中影响最大的是关于中共天津地委书记刘青山、天津专署专员张子善盗窃国家资财被判死刑案件的连续报道。许多报纸还开设《人人检举贪污浪费》、《人人都来检举贪污行贿》等专栏，形成强大的社会舆论，推动“三反”、“五反”运动的开展。在继起的反官僚主义、反强迫命令、反违法乱纪活动的“新三反”运动中，各报还将报刊批评与当时的整党、整风活动的宣传结合起来，报道了许多有关的典型案例，在社会上引起强烈的反响。对于社会上压制批评的行为，各级党报予以大胆的揭露与抨击。《人民日报》发表了许多与压制批评的现象做斗争的报道与言论。对于华东军政委员会交通部部长兼华东交通专科学校校长黄逸峰打击报复学生、压制批评事件，《人民日报》不仅予以披露，还配发了社论《压制批评的人是党的死敌》，使黄逸峰一案得到严肃的处理，黄被开除出党。《人民日报》作为中共中央机关报，还担负起指导各级党报开展批评的重任，经常刊载评述各级党报开展批评情况的评述文章，直接指出哪些报纸开展得好、哪些不好，并提出改进的方法。在地方报纸开展批评受阻时，《人民日报》又勇为地方报纸撑腰。1953年2月，《人民日报》报道了鞍山《工人生活》报在开展批评中遭到官僚主义严重阻碍的情况，点名批评了阻碍报纸开展批评的中共鞍山市委及市委书记，提出希望中共中央东北局纪律检查委员会负责督促鞍山市

^① 《中国共产党新闻工作文件汇编》中册，5~6页。

委进行检讨，在职工中开展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并望把处理结果写给本报”。在《人民日报》的督促下，有关方面认真处理了这一事件，在社会上产生了良好的影响。

重视自我教育，开展问题讨论，是报纸批评与自我批评工作的另一个特点。在批评干部和群众中的错误思想方面，许多报纸经常采用群众自我教育的方式，通过问题讨论，批评和克服一些错误认识。1951年7月，《新湖南报》刊登了一封长沙县的读者来信，说他们乡里有个干部叫李四喜（化名），土地改革完成后，他认为革命成功了，不愿继续干工作了。对于这个具有普遍性的问题，该报编辑部组织了一次题为《分了田不干革命对不对？》的大讨论，持续五个多月，先后发表了150多篇报道、调查或文章，使广大干部认识到松劲退坡思想对革命事业的危害性，同时认为克服“李四喜思想”的办法在于“加强思想教育，解决实际困难，把乡村干部提高一步”。9月，中共中央通报推广《新湖南报》的经验，认为在党报上开展思想讨论，“是加强思想领导，提高党员和群众的政治水平的有效方法之一”。于是，这类讨论在各省报上普遍展开，如《江西日报》讨论王水盛思想，《河南日报》讨论雷玉思想，《山西日报》讨论梁鸿寿思想等。

当然，建国初期的报刊批评与自我批评工作也出现了一些问题，如批评言辞过于偏激，报道内容失实，甚至出现忽视党性原则的错误倾向。1953年春，广西《宜山农民报》在报上擅自批评中共宜山地委。事后，中共广西省委宣传部对《宜山农民报》进行了批评，并上报中宣部。中宣部的复信提出了“报纸不得批评同级党委”的原则，指出：“不经请示，不能擅自批评党委会，或利用报纸来进行自己同党委会的争论。”^① 1954年7月经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的《关于改进报纸工作的决议》再次对报刊批评与自我批评工作作了指示，提出了报纸批评的三项标准：一是报纸上的批评必须展开，二是批评必须正确，三是批评必须在党委的领导下进行。此后，报纸批评工作进入了有序轨道，报纸批评报道与评论的质量大为提高，但数量有所减少。例如，《人民日报》在1954年发表的批评稿为210篇，仅为1952年的12%，1955年为731篇，也仅为1952年的42%。

二、学习苏联新闻工作经验

学习社会主义苏联的新闻工作经验，是建国初期党和政府对新闻工作者提出的另一个有关新闻工作改进的要求。当时，我国实行“一边倒”的国策，学习苏联新闻工作经验，成为当时我国社会主义新闻事业建设的一个重要指导思想。

^① 转引自孙旭培：《新闻学新论》，277页，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4。

1950年1月4日,《人民日报》开辟《新闻工作》专刊,每两周出版一期,篇幅为一个整版。其创刊号上发表的《编者的话》称:在创建我国人民新闻事业中,有一个便利的条件,这就是可以“大量地利用”苏联的“丰富经验”,“本刊愿在介绍苏联新闻工作经验方面,作有系统的努力”。至1950年12月止,《新闻工作》共出26期,刊登了译介列宁、斯大林论报刊和苏联新闻工作经验的文章近30篇。1950年秋,三联书店推出《新闻工作丛书》,先后出版了《怎样领导党报》、《报纸编辑部的群众工作》等小册子,其内容部分选辑自《人民日报》的专刊《新闻工作》上发表的介绍苏联新闻工作经验的译文,也有一些新发表的译文。

进入1954年后,新闻界出现了学习苏联新闻工作经验的高潮,对口学习蔚然成风。1月,人民日报社总编辑邓拓率领《人民日报》等各报组成的中国新闻工作者代表团访问苏联真理报社,3月初返回北京后,在《人民日报》等报纸上连续发表了多篇关于访苏收获的文章,后由人民出版社汇编为《学习〈真理报〉的经验》一书出版。3月,《人民日报》开始翻译出版内部刊物《真理报文选》,一般每周两期,前后共出版了两百多期。《真理报文选》在一段时间内每期都译介《真理报》的版样,即把《真理报》各版的编排情况画下来、把每一条新闻的标题译出来,有时甚至把整版的《真理报》译成中文,以资学习和模仿。《新民报》晚刊把《莫斯科晚报》的版面全部翻译成中文,参照改版,结果是文化生活内容充实了,但原有的地方性和群众性等特点不见了。7月,中央广播事业局副局长温济泽率领的中央广播事业局代表团赴苏联考察广播事业,回国后编印了《苏联广播工作经验》一书。11月,中央广播事业局召开第二次全国广播工作会议,提出要通过学习苏联广播工作经验来改进我们的广播工作。1954年底,新华社副社长朱穆之率领新华社代表团赴苏联访问塔斯社,回国后也编印了《塔斯社工作经验》上下两册。与此同时,苏联新闻工作者也多次应邀来我国访问,介绍苏联新闻工作经验。1954年10月,苏联报刊工作者代表团应邀访华一个月,多次在北京等地举行专题报告会或座谈会。人民日报社总编室还将报告、座谈纪录汇集,出版了《苏联报刊工作经验》一书。1955年底,苏联广播工作者代表团访华,对中国广播界介绍了苏联广播工作经验。在1954年至1955年,人民出版社又翻译出版了《联共(布)中央直属高级党校新闻班讲义汇编》第一、二集和苏联国家政治书籍出版局编辑的《布尔什维克报刊文集》,作为全国新闻工作人员和大学新闻系学生的学习用书。在学习苏联的热潮中,编辑部的机构设置也向苏联看齐,出现了检查组和第一读者,还加强了群众工作和资料工作等。此外,编辑部每天下午的“飞行集会”、自己编写的稿件也发稿费、编辑部各组改

称为“部”、设立专职的国际问题“评论员”等等，都是从苏联《真理报》学来的。

此外，我国报刊还大量转载苏联报刊的文章。1950年，《人民日报》刊登了三十多篇从苏联报刊上选译的文章，对新华社发的大量苏联动态新闻及其领导人的讲话以及报刊上的重要文章也照登不误。遇到苏联有重大事件时，报纸版面上几乎大部分是苏联的消息。苏共第十九次代表大会期间，《人民日报》除了在第4版刊登了三条“豆腐块式”的国内新闻外，从第1版开始全部是苏共代表大会的消息和苏共中央的报告。对苏联建设成就的报道，各报也不吝篇幅地大登特登。当时，除了新华社和报社自己译载外，苏联驻华大使馆也在苏联的各种节日时为《人民日报》提供文章。《人民日报》除了经常刊登长篇论文以外，又于1952年2月专门开辟了一个名为《苏联报刊论文摘要》的专栏，每期刊登两至三篇摘要。

苏联作为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有着不少可供我国新闻事业借鉴的经验。因此，学习苏联新闻工作经验具有积极的意义。首先，通过学习苏联经验，我国新闻界系统地学习了列宁、斯大林的办报实践、办报思想和苏联新闻工作的传统，加深了对于无产阶级新闻事业党性原则的认识，并在很大程度上成了建设我国新闻事业新体制的指导思想与理论基础。其次，全面学习与借鉴苏联新闻工作的业务经验，包括新闻的编辑、采访、写作以及经营管理和发行等方面的经验，使我国新闻工作者的业务水平普遍得到大的提高。

但是，在学习苏联新闻工作经验中，也出现了脱离中国实际、对苏联经验盲目生搬硬套的教条主义错误，以致束缚了自己的独立思考能力和创造性，从而阻碍了我国新闻事业的发展。这种教条主义的学习在报纸工作中的主要表现：一是片面强调不犯错误。在学习《真理报》的过程中，认为该报从不登“更正”，是一张“没有错误的报纸”，因而《人民日报》也提出了“为没有错误的报纸而奋斗”的口号。显然，这是不可能做到的。二是每天一篇社论。在社论写作上，盲目模仿《真理报》，不论有无必要，硬要每天一篇；无论论题重要与否，写得如何，都得按规格写满2500字，放在一版头条位置。结果出现了不少“无的放矢”的东西。三是业务路子越走越窄。在新闻写作上，学习《真理报》和塔斯社后，新闻越写越枯燥；在标题制作上，由于《真理报》的标题崇尚简单，用清一色的一行题，缺乏文采，甚至多篇文章共用一个标题（如《在列宁旗帜下》）的现象屡见不鲜，因而我国传统的多行题只得废止不用，标题越做越单调，中国报纸标题讲究遣词立意的好传统被干巴巴的文字所代替。《真理报》不刊登广告，于是我们的报纸也不重视广告。四是国际新闻报道片面性严重。各报袭用苏联的国际

报道方法，不客观、全面地反映国际形势。对社会主义国家只说好，对西方帝国主义国家只说坏。至于敌人骂我们的东西，一概不让见报。在广播工作方面的教条主义倾向主要表现有二：一是提出以中央台为基础、地方台为补充的办节目方针。要求地方台用较多的时间转播中央台的节目，其后果是削弱了地方广播联系当地实际的作用，也影响了地方办广播的积极性。二是限制在广播中开展批评。受苏联经验的影响，认为广播不宜于进行批评，只能谈成绩，不能讲缺点。

三、新闻业务的建设与新闻教育的发展

建国初期，我国新闻业务的建设也出现了令人瞩目的发展与变化。新闻界推出了不少有力的建设性措施，以提高新闻工作者的业务水平。

首先，新闻界从最基本的纯洁语言文字、注重语法修辞做起，以端正文风。1951年6月6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毛泽东修改定稿的社论《正确地使用祖国的语言，为语言的纯洁和健康而斗争》，发起了纯洁祖国语言文字的活动。社论指出：“党的组织和政府机关的每一个文件，每一个报告，每一种报纸，每一种出版物，都是为了向群众宣传真理、指示任务和方法而存在的。它们在群众中影响极大，因此必须使任何文件、报告、报纸和出版物都能用正确的语言来表现思想，使思想为群众所正确地掌握，才能产生正确的物质力量。”在《人民日报》带头倡导下，在半年多时间里，新闻文化宣传战线和全国人民开展了认真学习祖国语言的活动，在此期间，新闻战线不仅大力倡导，还身体力行，人民日报社等新闻机构采取请进来或走出去的方式，多次组织编辑记者听取叶圣陶等学者专家的讲课，并开展稿件评比活动，以提高语法修辞写作水平。

为了提高新闻工作者的业务能力，新华社还开展练笔运动。这场运动的酝酿始于1951年1月下旬，其目的是有计划、有组织地把新华社的业务水平提高一步。2月13日，新华社颁布了《开展练笔运动的决定》，成立了练笔运动委员会，对旨在消灭稿件中事实错误、文法错误与文字冗长现象的“练笔”运动作了具体部署。21日，练笔运动正式开始。新华社总编室把练笔运动规定为编辑部的重要任务，指定专人负责指导和解决运动中的日常问题，并制定了全编辑部及各部门消灭错误的目标和进程，规定了检查、登记、统计手续，印制了《技术错误登记表》、《成品错误统计表》，组织评奖与竞赛，加强资料核对制度。练笔运动进行了三个月，对提高记者的写作能力、减少错误起了很大的作用。与此同时，新华社还创办了业务刊物《新闻业务》，作为全社编辑记者探讨业务、交流采写经验的阵地。

接着，新闻界又为促进汉字改革、推广普通话、实现汉语规范化做出了重大努力。1955年1月，国家教育部和文字改革委员会发布汉字简化方案草案后，《人民日报》等全国主要报刊配合各地开展群众讨论的需要，分两批在报纸上刊出141个简化汉字，并首先在报纸上试用。报刊版面编排也由传统的竖排改为横排，完成了我国报刊编排形式的一项前所未有的重大变革。1955年1月1日，《光明日报》的版面由竖排改为横排，为新中国第一份改横排的报纸。接着，《中国青年报》、《中国少年报》、《人民铁道报》、《文汇报》、《河北日报》等9家全国性或省级报纸也实行版面横排。10月，全国文字改革会议做出8条决议，其中提出了“推广报刊书籍横排”、“电台学习使用普通话”等要求。《人民日报》在报道这一消息的同时，配发社论《为促进汉字改革、推广普通话、实现汉语规范化而努力》。1956年元旦开始，《人民日报》、《工人日报》、《大公报》、《健康报》4家全国性报纸和《北京日报》、《天津日报》、《解放日报》、《山西日报》等17家大城市省级报纸实行横排。全国性期刊除一二种外全部改为横排，并由此而带动全国各类图书也纷纷采用横排。至此，我国报刊编排形式的这一重大变革基本完成。

此外，随着报纸摄影采访力量和新华社供稿能力的加强，报纸图片的运用不断得到改进。报纸上的照片数量不断增加，内容和编排形式也日渐多样化。1950年1月，《人民日报》共刊用各类新闻照片50幅，除4期画刊外，单幅照片仅16幅，平均两天1幅见报。其中头版所发7幅照片，仅有一幅为时事照片，其余均为国家领导人的肖像。该报第4、7、8版在一个月内没有一幅照片，全是密密麻麻的铅字；自9日至14日连续6天没有一幅照片，8个版都是文字消息。至1956年，情况有了显著变化，《人民日报》上的照片所占篇幅扩大到整个版面的7%左右，各新闻版几乎每天都有照片。其他报纸的情况也大体相似。据调查统计，1956年4月份《工人日报》、《中国青年报》、《北京日报》、《解放日报》和《辽宁日报》5家日报刊用照片的数量，都比上年同期有所增加，其中4家报纸所刊用的照片都在200幅以上。从内容上来看，题材扩大，文化教育方面的照片增多，并触及一般群众的日常生活，上述5家报纸平均刊用这方面的照片65幅，如向科学进军、改进服装、春天风景、剧照、普通工人的家庭生活、宿舍俱乐部以及演员、作家的近况等。报道面的扩充，初步改变了过去那种要人肖像、生产劳动镜头和外事活动占统治地位的单调状况。报纸上新闻照片的增多，不仅充实了报道的内容，而且也使版面更生动美观，提高了可读性。

除了结合当前形势和任务及时编发画刊和专栏照片，一些报纸还创设了较固定的图片栏目，每期依据一个主题，陆续介绍各方面的情况。1951年1月，《人

民日报》在报头位置增辟《我们伟大的祖国》照片专栏，每天刊出1幅照片，陆续介绍祖国各地有代表性的风光和建筑，不仅开阔了读者的视野，还使读者的爱国主义思想得到陶冶。其他报纸看到这一形式新颖别致，纷纷仿效，有的利用报头位置刊登辟栏照片，如《中国青年报》的《一切为了祖国》，山东《大众日报》的《江山多娇》等，为报纸图片的运用开辟了一条新的渠道。

为了培养大批的新闻业务人才，以适应不断发展的新闻事业的需要，新闻教育工作受到了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

建国初期，党和政府一方面对旧新闻教育体系进行全面改造，对旧新闻教育机构根据不同情况分别处置。凡国民党直属的新闻教育单位，如南京的国民党政治大学新闻系等，实行一律停办的政策；对其他新闻教育单位，如北京的燕京大学新闻系，上海的复旦大学新闻系、圣约翰大学新闻系、暨南大学新闻系、民治新闻专科学校、中国新闻专科学校，苏州的社会教育学院新闻系，广州的国民大学新闻研究班等，实行改造与整顿的政策。在人事管理上，改变和加强这些学校的领导力量，调配党的新闻工作者担任教职，并组织原有教师进行学习和思想改造，用无产阶级新闻观点消除资产阶级新闻观点。在教学上，对新闻学专业课程逐步进行内容改革，取消原有的政治上反动的课程，开设马列主义政治理论课，并组织学生参加政治运动。

另一方面，创办新型的无产阶级新闻学校。1949年11月1日，新华总社在北京办的新闻训练班自第三期起改建为北京新闻学校，隶属于新闻总署，由新闻总署副署长范长江兼任校长。这是建国后创办的第一家新型的新闻专业学校。1951年7月第二期学员毕业后停办，共培训了两期学员500余人。在上海，华东新闻学院于1949年7月19日创建，为中共中央华东局主办的新闻干部学校，恽逸群任院长，先后招收过一期讲习班，两期研究班，一期专修科班，学员合计828人。1952年高等院校实行大规模的院系调整后，上海的华东新闻学院、暨南大学新闻系、圣约翰大学新闻系、中国新闻专科学校等并入复旦大学新闻系。北京的燕京大学新闻系并入北京大学中文系，改为编辑专业（后改名新闻专业）。苏州的社会教育学院新闻系随所属学院一起，并入江苏文化教育学院，不久后停办。1954年，中共中央党校设立新闻班，主要培训相当于省委机关报编委以上的新闻干部，聘有苏联专家讲课，同时开展新闻学研究工作。1955年，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创建，为建国后新创办的第一个大学新闻系。

第三节 新闻宣传报道的成就与过失

一、经济生产宣传报道

在基本完成社会主义改造的七年中，经济宣传报道始终是新闻工作的一个重要内容。

这一时期经济宣传报道的重要成绩，一是紧密配合党和政府的中心工作。建国初期，人民日报社等新闻机构紧密配合恢复国民经济这一中心任务，重点宣传报道统一全国财政工作、调整工商业、精简节约等方面的情况。《人民日报》全文刊登了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三中全会上的报告《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而斗争》，并发表了一批切合实际、解决重大问题的评论和新闻，其中有的是邀请中央主持财经工作的领导同志和专家撰写的，如陈云撰写的《为什么要统一国家财政经济工作》、薄一波撰写的《税收在国家工作中的作用》、李立三撰写的《学会企业管理》等。经济学家薛暮桥不但为《人民日报》组稿，还积极帮助修改稿件，使《人民日报》的经济专栏办得十分充实。也有的文章是报社编辑部人员深入实际采写编发的，如人民日报记者长江采写的《财政工作的新时期——追记二月财经会议》等。这些评论和新闻对实际工作发挥了指导与推动作用，受到中央和读者的好评。1953年后，经济宣传报道开始重视现实问题，宣传质量进一步提高。农业合作化运动兴起后，人民日报社、新华社等新闻机构抓住农业互助合作这一主线，进行了长期持续的报道，通过新闻、评论及时宣传农业合作化运动发展的进程，阐明互助合作运动是土地改革后引导小农经济逐步向社会主义经济过渡的正确道路。同时，人民日报社等新闻机构还注意宣传“积极领导，稳步前进”的方针，努力坚持从小农经济的生产现状和群众觉悟水平出发，遵循自愿互利的原则，反对盲目冒进，引导农业互助合作运动稳步发展。1954年4月，中共中央宣传部召开第二次全国宣传工作会议，在会议期间还举办全国农民报纸展览，专门评价了《山西农民》、《江苏农民》、《黑龙江农民》、《新湖南报》、《延安报》、《南充报》等6家报纸关于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宣传，在肯定成绩的同时，也指出了报纸在报道互助合作发展方面的急躁冒进现象。1956年6月20日，《人民日报》发表著名社论《要反对保守主义，也要反对急躁情绪》。这篇着重批评党内出现的急躁冒进情绪的社论，是刘少奇根据中央一次会议上的意见、授意中宣部同志起草、并经他审定后发表的。但不久后，这篇社论连同总编辑邓拓遭到了毛泽东的指责，以致未能挽回工作中的失误，造成了长期的后遗症。

二是突出报道国家重点建设的成就，展示国家经济建设日新月异的全貌，激

励人们热爱祖国投身建设的热情。自 1953 年起，我国在三年国民经济恢复的基础上，开始实行经济建设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此后，新闻事业担负起动员组织人民投身国家经济建设，尤其是参加支援重点建设的重大任务。人民日报社、新华社等新闻机构通过新闻、评论、通讯、报告，向国内外广大读者展示了一幅幅国家重点工程建设的壮丽景象。在新闻写作上，这些宣传报道努力克服业务技术性强、报道面狭窄等缺点，力求生动、有趣、报道内容的丰富、报道形式与角度的多样化，并较多地采用了新旧历史对比的写作方法。

三是让人民群众充当宣传报道的主角，突出宣传人民群众中的先进人物与先进事迹。新华社、人民日报社等新闻机构，把介绍先进人物和先进经验看做是经济宣传密切联系实际和群众的一个重要报道方针。大批先进人物先进经验在读者心目中留下了光辉的形象，成为推动生产建设的强大的精神力量。青年工人王崇伦事迹的连续报道影响最为深广。王崇伦是鞍山钢铁公司机械总厂的工人，8 次改进生产工具，每月超额完成的劳动定额为原计划的 346.62 %，一年完成了多年的工作量，被誉为“走在时间前面的人”。《人民日报》、《东北日报》、《工人日报》、《中国青年报》等发表了大量的新闻、通讯、评论、图片与文章，全面报道了王崇伦事迹，总结推广王崇伦经验，倡导革新创造和忘我劳动的精神，从而推动了全国工业战线开展技术革新、劳动竞赛的热潮，提高了劳动生产率。

但是，这一时期的经济宣传报道，对其社会作用与服务对象等问题不够明确，因而片面强调报道的指导性与思想性，多从领导角度看问题，指示、教训的口吻多，而从群众的角度提问题、满足群众需要和兴趣的报道少；介绍生产过程多，反映职工生活少。

二、政治外交宣传报道

在政治宣传报道方面，人民日报社、新华社等新闻机构成功地报道了开国盛典、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日内瓦会议和万隆会议等重大的政治、外交活动，为塑造一个人民民主专政制度的新中国的光辉形象做了重要贡献。此外，有关抗美援朝的宣传报道，也是建国初期政治宣传报道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自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会议召开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这一期间进行的有关开国盛典的报道，是新中国新闻事业史上第一次出色的政治活动报道。报刊、通讯社、电台等各种新闻机构第一次大规模地协同作战，发挥各自优势，生动及时地报道了开国的全过程，声势浩大，影响深远。

1949 年 9 月 21 日晚 19 点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以下简称政协）第

一次会议在北平隆重开幕。20点30分，北平新华广播电台以“新华社9月21日北平电”的电头，播发政协开幕的消息。新华社记者采写的政协开幕消息的导语开宗明义地写道：“中国人民所渴望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盛典——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已于今日下午七时在北平开幕。”21点15分又播出毛泽东致开幕词的录音：“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翌日，《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工人日报》、《大公报》、《新闻日报》、《文汇报》、《东北日报》、《大众日报》、《解放日报》、《长江日报》等全国许多报纸在刊登这条新闻稿时，发挥版面和文字传播优势，有的在报头套红或在第一版加印红色大字祝词，有的将报纸整张印成红色版面，还运用大量篇幅、醒目标题、多种专栏和体裁，作了引人注目的重点报道。各报均以醒目的标题点明政协开幕就是开国盛典：“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盛典，中国人民政协开幕。”《人民日报》的报道尤为出色。9月22日，该报第1版上半版以通栏大字标题全文发表毛泽东主席在政协会议上的开幕词和他的半身照片，第2版刊登新华社报道政协开幕的消息，并配发社论《旧中国灭亡了，新中国诞生了！》。这一天，《人民日报》刊发了该报记者采写的政协会议系列通讯特写专稿的第一篇《“中国人从此站起来了”》，后每天发表1篇，连载8天，从多侧面具体真切地描述政协会议的全过程；同时还在第5版开辟《中国人民政协代表访问记》专栏，在短短十余天中，共发表代表专访54篇。自24日起，《人民日报》开始刊登代表在会上的发言，前后共发表95篇。这些发言和访问记，该报还都配有代表本人的半身头像照片。10月1日，《人民日报》还增加两版篇幅，出8个版，突出报道政协胜利闭幕、毛泽东当选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主席、朱德等6人当选副主席的消息，发表政协会议宣言，配发题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的社论。同时，报道世界人民欢庆和支持新中国成立的消息，还刊登了郭沫若热情洋溢的诗：《新华颂》。

在报道开国盛典的全过程中，新华社肩负国家通讯社的职能，统一采写编发有关会议重要新闻的通稿，并受命以国家和人民代言人身份对外发表社论。1949年9月27日，新华社发布的人民政协通过6项决议案、定都北平并改称北京的新闻稿，第一次醒目地把“北平”的电头改为“北京”。1949年9月29日，新华社播发社论《中国人民对全世界的庄严宣告》，宣布由政协选举产生的中央人民政府即将致电联合国大会，“声明中华人民共和国业已成立”，“中央人民政府为唯一能够代表中国人民的政府”。《人民日报》等报纸发挥版面优势和文字传播优势，运用主要版面、大量篇幅、醒目标题、多种专栏和新闻体裁作了引人注目的重点报道。人民广播电台则发挥电波传播快、覆盖面广、感染力强的特点，除大量采编新闻稿件外，还采用讲话录音、实况录音、录音报道等形式，作了强有

力的宣传。

1949年10月1日，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30万人盛会在天安门举行。人民广播电台利用自身优势作了生动强势的宣传。北京新华广播电台用了持续6个半小时，对“十一”天安门庆祝新中国成立的30万人盛会作了现场实况广播，全国各地人民广播电台同时转播。这是中国人民广播史上第一次在天安门城楼进行全国性实况广播。10月2日，《人民日报》第1版用纵贯11栏的大字标题刊发“新华社北京1日电”，报道“十一”首都天安门广场30万人集会、隆重庆祝中央人民政府成立、毛泽东宣读政府公告、朱总司令检阅海陆空三军并宣读人民解放军总部命令的消息，并发表社论《不可战胜的人民国家》，同时还配发天安门广场第一次升起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五星红旗的照片。

在这次大规模的报道新中国诞生的新闻传播活动中，出现了为数甚多的优秀新闻作品，如新华社记者李普采写的新闻《开国大典》、《人民日报》记者李庄采写的系列特写通讯《中国人民从此站立起来了》（共8篇）、上海《大公报》记者杨刚采写的通讯《毛主席和我们在一起》、摄影记者高粮拍摄的新闻照片《东方升起第一面五星红旗》等。

1954年4月至7月，周恩来总理率领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赴日内瓦参加印度支那会议。这是新中国成立后正式参加的第一次重要国际会议，也是我国新闻界第一次采访报道的重大外交活动。为了通过新闻报道加深与扩大新中国在世界上的影响，我国新闻界组织了一个由新华社、人民日报社、光明日报社、大公报社、中国青年报社和世界知识杂志社等新闻机构的三十余人组成的大型记者团前去采访报道。周恩来总理十分关心记者团的工作，对于会议的新闻报道经常给予具体指示，审阅重要稿件，指导记者的采写活动。由于这次会议情况复杂，会议进程曲折多变，周总理告诫记者团“要严守组织纪律，贯彻代表团的意图，记者在报道中要多用事实，少发议论，不要把话说得太满，以免情况变化时陷于被动”。会议结束回国后，周总理代表党和国家充分肯定了记者团的工作。

关于1955年4月万隆亚非会议的报道，是又一次出色的外交活动报道。它着重宣传了这次有29个亚非国家参加、亚非人民自己决定自己命运的会议的强大生命力和重大意义，着重反映了我国代表团本着“求同存异”的方针，为促进会议的成功而做出的重大努力，有助于增强新中国的国际威望，使亚非各国和世界人民对于年轻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有了进一步的了解。为了报道亚非会议，7名中外记者付出了血的代价。会议前夕，1955年4月11日，参加亚非会议代表团工作人员和中外记者11人乘坐我国包用的印度国际航空公司星座式客机“克什米尔公主号”，从香港起飞前往雅加达转赴万隆。由于国民党特务分子在飞机右

翼轮舱处安放了定时炸弹，致使飞机在途中爆炸失事，坠入海中，除3位印度机组人员得救生还外，其余全部遇难。新华社总社记者沈建国、新华社香港分社记者黄作梅、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记者杜宏、新华社兼光明日报社记者李平、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摄影记者郝风格、波兰《人民论坛报》记者斯塔列茨、奥地利《人民之声报》记者严裴德等7人以身殉职。

抗美援朝报道始于1950年下半年。是年6月25日，美国入侵朝鲜，朝鲜战争爆发。朝鲜战争爆发后，为配合全国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运动的开展，新闻战线进行了长达三年多的广泛的宣传报道。

6月26日，即朝鲜战争爆发后的第二天，《人民日报》收到朝鲜半岛发生战事的消息，立即组织稿件编发版面，于27日用第1版整版的篇幅编发了一组9条新闻，并配上“朝鲜共和国军队转入反攻”的大字标题，同时还发表社论《朝鲜人民为击退进犯者而奋斗》、一幅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形势图和揭露美国扶持南朝鲜李承晚集团挑起战争经过的“平壤通讯”等，对朝鲜全面内战爆发这一严重事件作了突出报道。7月开始，《人民日报》第5版《保卫世界和平专刊》（周刊）对朝鲜战争进行集中报道。7月21日，《人民日报》第1版发表署名“本报朝鲜战地特派记者李庄”的第一篇朝鲜战地通讯《美丽的山河，勇敢的人民》。10月25日，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作战。一星期后，《人民日报》开始推出抗美援朝运动的宣传报道，连续一周集中反映全中国人民的正义呼声。11月2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刊出大批读者投书该报的消息，并在标题中首次标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口号。11月5日，该报头版通栏刊出各民主党派联合宣言：拥护全国人民在志愿基础上为着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神圣任务而奋斗。11月8日，《人民日报》以《在中国人民志愿部队参加下，朝鲜人民军获重大胜利》为题，第一次公开报道了志愿军入朝作战的新闻。

与此同时，新华社、人民日报社等新闻单位最先派出记者跨过鸭绿江，奔赴前线采访。1951年1月，新华社中国人民志愿军总分社在朝鲜前线成立，北京、天津、沈阳三城市广播工作者组成了“抗美援朝广播收音工作团”，活跃在战地、火线。北京电影制片厂成立战地新闻摄影队，紧跟前哨部队进行实地拍摄。地处抗美援朝斗争前沿地区的《东北日报》也多次派出随军记者。战争进程中发生的一些重要事件和关键时刻，新闻单位都及时派出了记者或记者团。这批战地记者和志愿军指战员一起经受了战火硝烟的考验，真实地报道了反侵略自卫战争，歌颂了中朝人民的伟大胜利，有的还为之献出了宝贵生命。在国内的新闻工作者以支援抗美援朝为动力，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

在此后两年多时间内，《人民日报》、新华社以及全国各地的所有报刊始终将

抗美援朝作为新闻宣传报道的头等大事。《人民日报》对抗美援朝的时事宣传报道十分重视，抗美援朝的报道始终占据《人民日报》头版和国际版的大量篇幅。自1950年10月至翌年2月，《人民日报》连续发表《为什么我们对美国侵略朝鲜不能置之不理》、《中国人民志愿部队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伟大意义》等社论，同时运用资料、专论、画页、漫画、专刊等多种新闻体裁，针对旧社会遗留下来的部分民众中“崇美”、“恐美”、“亲美”的心态，用生动的形式向全国人民广泛进行“仇视”、“鄙视”、“蔑视”美帝国主义的宣传教育。该报每日刊登的漫画，特别是方成、钟灵合作的诗配画，深受读者喜爱；刊登的歌曲《打败美帝野心狼》一时风行海内外。《人民日报》除了在日常报道中注重这方面内容外，自1950年12月4日起还在第5版开辟《抗美援朝》专刊，辟有《时评》、《简评》、《宣传员讲话》、《杂文》、《时事问答》、《信箱》、《抗美援朝动态》、《在朝鲜前线》、《写给志愿军》等专栏，初为旬刊，后改为周刊、半月刊，至1954年9月止共出190期，同时在《光明日报》刊出，后又编成16开刊物单独印刷发行。《抗美援朝》专刊着重介绍全国各条战线抗美援朝的工作经验，以指导、组织全国各地抗美援朝运动深入发展。该专刊办得丰富多彩，成为反映、指导和组织全国各地抗美援朝运动深入发展的重要园地。

新华社关于抗美援朝斗争的报道活跃、及时，也很有力量。除发表大量消息、通讯之外，还以新华社记者述评的名义或由记者署名发表了一系列说理充分而又尖锐的评论。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配合抗美援朝运动的开展，开办了《美国真相》、《美帝侵华史》讲座节目，揭露美帝国主义外强中干、色厉内荏的真面目，还多次派出记者和播音员奔赴朝鲜前线采访，以广播通讯、录音报道的形式，介绍中国人民志愿军与朝鲜军民并肩作战的英勇事迹和中朝两国人民的战斗友谊。在对国外广播中，自1951年初还专门举办了对侵朝美军的英语广播节目，阐明我国抗美援朝的严正立场和主张，揭露美国的侵略本质和欺骗宣传，至1953年7月朝鲜停战协定签订前夕停播。为协助志愿军归国代表扩大宣传效果，各地广播电台举办了28次广播大会，报道中国人民志愿军归国代表团的活动与演讲，直接听众达1500万人，加上收听录音的人数，听众估计在1亿以上。在朝鲜前线，《人民日报》、《东北日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节目等新闻传播工具成了志愿军指战员在精神上与祖国联结在一起的最好桥梁。志愿军领导把组织收听祖国广播列为政工干部工作的重要项目，收听后立即缮写印发各连队，迅速传播祖国的声音。上海《解放日报》、《新闻日报》、《大公报》和《东北日报》等普遍举办时事问答、读者讨论会等，以解答读者的各种问题。全国各报还广泛采用照片、时事漫画、战役形势图、画刊专页等生动形式进行宣传报道。

在抗美援朝报道中，由于战争环境、交通障碍等条件限制，及时采写消息比较困难，因而战地新闻通讯和报告文学被广泛运用，在当时的报纸上占据大量篇幅。《人民日报》等全国报刊先后发表了数以千计的通讯报告作品，其中不乏至今仍脍炙人口的优秀作品，如《不朽的杨根思英雄排》、《伟大的战士邱少云》、《不朽的国际主义战士》（报道罗盛教烈士的事迹）等。《人民日报》战地特约记者魏巍撰写的《谁是最可爱的人》，刊于1951年4月11日出版的《人民日报》第1版的社论位置，并成为广为传诵的名篇。周恩来总理赞扬这篇作品“感动了千百万读者，鼓舞了前方的战士”^①。此后，“最可爱的人”成了全国人民对志愿军的最亲切、最尊敬的称呼。但是，有些报道运用“合理想像”的手段表现志愿军官兵的斗志与感情，如新华社记者采写的《马特洛索夫式的英雄黄继光》一稿，多处违背了新闻真实性原则，凭事后推测描写黄继光牺牲前的心理活动，造成了一些不良后果。新闻界就“合理想像”问题进行了激烈的争论，最后达成共识：新闻是以全部细节都是事实为特征的，新闻的威力就在于此。因此，新闻报道必须给人以真实的感觉，而记者的“合理想像”只会让人感到虚假。

三、思想文化宣传报道

在思想文化宣传报道方面，建国初期的新闻机构既取得了不少成绩，也出现过一些严重的失误。

建国初期，为了引导广大人民摆脱国内外反动派的思想影响，用无产阶级思想改造旧的意识形态，以巩固和促进社会政治、经济制度的变革，人民日报社、新华社、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等新闻机构根据党中央的指示，加强理论宣传，采取多种形式对马列主义学习作了广泛系统的报道。20世纪50年代初，人民日报社等新闻机构将介绍马列主义经典著作、普及马列主义基本知识作为自己的重要宣传任务。《人民日报》用大量篇幅介绍马列主义经典著作，发表单篇原著，刊登学习和介绍原著的文章，特别是突出宣传了《毛泽东选集》第1至第3卷的出版发行和全国人民学习毛泽东著作的热潮。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自1950年4月起，增辟《社会科学讲座》节目，邀请艾思奇等著名专家学者系统讲授《社会发展史》、《政治经济学》以及《共产党宣言》等经典原著。据统计，当时全国27个省、市有400多个单位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建立联系，及时反映组织干部、知识分子收听的情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还根据听众提出的问题，请主讲人专门作广播解答。

^① 转引自冉淮舟、刘绳：《魏巍创作论》，12页，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5。

组织读者开展思想问题讨论，是各新闻机构普遍采用的一种宣传马列主义的有效形式。1950年春夏之交，《人民日报》在《党的生活》栏里开展了《赵桂兰应不应该扔雷汞》的讨论，部队、机关、工厂、学校、街道一百多位读者来信来稿参加了这场讨论。赵桂兰是大连化工厂青年女工、共产党员，为了维护工厂机器财产，她在工作中晕倒在地时，仍不肯扔出手中的雷汞，宁肯自己被炸伤致残。经过讨论，赵桂兰宁可牺牲自己的先进事迹，使众多读者得到了应该怎样正确处理个人利益与国家利益关系的启示。

但是，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主席在建国初期发动的三次较大规模的学术文化讨论与批判运动，采用政治斗争的方式，造成了严重的失误。

一是关于电影《武训传》的批判。电影《武训传》是描述清末历史人物武训行乞兴学的一部传记故事片，由孙瑜任编导，建国前夕开始编导摄制，1950年底摄制完成，1951年初在京、津、沪等城市公映。该片详尽地描写了武训不惜任人踢、打、鞭、骑以乞资办学的苦操奇行。这部电影上映后的几个月内，各地报刊发表的歌颂性文章多达一二百篇。对此，毛泽东亲自撰写了《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一文，于1951年5月20日作为《人民日报》的社论发表，同日该报还发表专论《共产党员应当参加关于〈武训传〉的批判》。当天，新华社播发了上述两篇文章。接着，《人民日报》一连7天在显著位置报道上海等地文化界开展批判活动的动态新闻。6月，《人民日报》报道了教育部指示全国教育机关讨论《武训传》和“武训精神”的消息，并在报上发表两篇专论，号召全国省级报纸、出版工作者展开《武训传》的讨论。在此期间，《人民日报》发表了一批基本上是赞成批判的“读者来信”。7月下旬，《人民日报》在第3版连续6天刊载了署名“武训历史调查团”的长达4.5万字的《武训历史调查记》。这个调查团在化名李进的江青操纵指挥下，按照主观意图寻找材料，最后得出“武训是一个以‘兴义学’为手段，被当时反动政府赋予特权而为整个地主阶级服务的大流氓、大债主和大地主”的调查结论。这篇调查记发表后，关于《武训传》的讨论结束。

二是关于《红楼梦》研究和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思想的批判。《红楼梦》研究，又称“红学”，是多年来在文学领域形成的一项专门学问。五四运动后，胡适撰写了《红楼梦考证》一书，不赞成“旧红学派”的脱离作品实际、认为《红楼梦》是“影射人事”的索隐方法，对《红楼梦》的作者、版本进行了辨伪存真的有益考证，被称为“新红学派”的代表。俞平伯也是“新红学派”的代表之一，早在1923年时就出版过具有一定影响的“红学”专著《红楼梦辨》。1952年，俞平伯对《红楼梦辨》一书作了修订，并改名《红楼梦研究》再版；1954

年，他又在《新建设》第3号上发表《红楼梦简论》。几个月后，《文艺报》收到了青年学者李希凡、蓝翎批评俞平伯研究观点的来稿和信，但未予以重视。李、蓝两人转而在其母校山东大学学刊《文史哲》1954年第9期上发表了题为《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的文章，同年10月又在《光明日报》的《文学遗产》专刊上发表《评〈红楼梦研究〉》。毛泽东看到这两篇对俞平伯关于红楼梦研究中的错误观点提出批评的文章后，于10月16日给中共中央政治局写了《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并附上李、蓝的两篇文章，称赞“这是三十多年以来向所谓红楼梦研究权威作家的错误观点的第一次认真的开火”，要求由此开展一场“反对在古典文学领域毒害青年三十余年的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斗争”^①。10月下旬，《人民日报》发表署名文章《应该重视对〈红楼梦〉研究中的错误观点的批判》和《质问〈文艺报〉编者》，掀起了又一次自上而下的、以新闻工具为主要阵地的学术思想批判运动。12月上旬，《人民日报》和北京各报报道：中国文联和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团联合召开8次扩大会议，主要批评《文艺报》压制新生力量的错误，决定改组《文艺报》编辑部，同时把对《红楼梦》研究的批判进一步扩展到对胡适思想的全面批判。接着，《人民日报》连续发表了一系列长篇批判文章。

这场批判把政治与学术思想完全等同起来，不恰当地一概抹杀胡适自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作为我国资产阶级著名学者在学术领域的成就，使批判缺乏科学性和说服力。对于爱国的老知识分子俞平伯的红学观点和著作，上纲到“走什么样的路”，指为“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代表，不利于学术和艺术的发展。

三是对“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揭露与批判。胡风，原名张光人，是我国现代著名文艺理论家，长期在国统区从事进步文化活动，政治上拥护中国共产党。但是，胡风在文艺理论上一贯片面宣传作家的“主观战斗精神”，忽视作家深入工农群众的生活和斗争实际。1953年初，《文艺报》发表批评胡风文艺思想的文章，《人民日报》予以转载。1954年7月，胡风撰写了《关于解放以来的文艺实践情况的报告》（即“三十万言书”），呈政务院转交党中央，坚持自己的文艺思想并提出反批评。1955年2月，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团扩大会议决定开展“对于胡风的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文艺思想的批判”，《人民日报》对这一消息作了突出的报道。至5月底，《人民日报》连续发表了批判文章二十余篇，从文学的内容和形式、文学传统到文艺源泉等问题，全面批判胡风的文艺思想及其立场、世界观。有的文章断章取义，无限夸大，一概否定胡风的文艺思想，而被批评者却没

^①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4册，574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

有反批评的可能。在批判活动中，舒芜向中宣部交出胡风解放前写给他的一些私人信件。5月13日，《人民日报》登出了经过分类整理加注的舒芜交出的胡风信件，加了标题《关于胡风反党集团的一些材料》。毛泽东为这批材料写了“编者按”，断言：“从舒芜文章所揭露的材料，读者可以看出，胡风和他所领导的反党反人民的文艺集团是怎样老早就敌对、仇恨和痛恨中国共产党的和非党的进步作家”，责令“一切和胡风混在一起而得有密信的人”，应当都把信交出来。对于胡风文艺思想的批判一下子升级为揭露与批判“胡风反党集团”，5月底再次升级为“胡风反革命集团”。5月16日，公安部拘捕胡风。之后一个月内，《人民日报》又相继公布了有关胡风问题的第二、第三批材料。6月10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必须从胡风事件吸取教训》，提出在社会主义建设中阶级斗争“更加尖锐”的观点，认定“胡风分子”已经混入中国共产党以及某些政、军、教、文、经、工、团等机关，号召全国各地各部门进行肃反清查，并提醒人们“不能和老虎睡在一起，不能把反革命分子认作好人”。社论发表后，一场大规模的清查“胡风反革命集团”的错误斗争在全国范围内展开。

这场批判运动，党中央机关报首先发难，各地报纸、电台、通讯社继起响应，大张旗鼓地进行声讨，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尤其是报纸上的点名批判，严重伤害了一批同志，扩散了社会主义建设时期阶级斗争日趋尖锐的“左”的观点，阻碍了学术文化研究的正常开展。“胡风反革命集团”案直至1980年经中共中央全面复查后得以平反，1988年第6号文件又对胡风的文艺思想、文艺宗派活动诸问题作了澄清和新的说明，撤销了1980年为胡风平反的文件中对胡风文艺思想和宗派活动所作的某些不恰当的指责。

第四节 1956年社会主义新闻工作改革

一、新闻工作改革的历史背景与指导方针

自1949年新中国成立至1956年，社会主义的新闻事业体制基本确立，革命战争时期形成的中国共产党新闻工作的优良传统与作风继续得到发扬光大，苏联新闻工作的经验给中国新闻工作者提供了许多有益的借鉴与启示。但是，社会主义新闻工作仍然存在着不少问题。一是教条主义和党八股严重。由于《人民日报》的编辑记者长期在农村根据地办报，惯于直接代党政机关发言，进行自上而下的指导。而新中国成立后，报纸的功能发生了很大的改变，但报纸没能及时进行深入的分析研究，对新情况提出的新要求显得束手无策。二是对苏联的经验与做法照抄照搬。由于盲目学习《真理报》，报纸脱离本国实际和群众的生活，枯

燥机械，可读性差。新闻少，并有很大片面性；通讯内容贫乏，不能反映国内国际生活的现实；报纸上的批评日益减少，没有不同意见的讨论，新闻机构日趋单一化、新闻宣传日益公式化，是当时新闻界存在的一个最根本的问题。“内容枯燥，讨论缺少，语言生涩，形式呆板。”这是当时山东《大众日报》对自身存在的各种问题的生动概括，也是当时几乎所有的新闻机构的通病。

对于这一现象，广大读者十分厌恶，新闻工作者也深感不安，有的还上书领导，提出批评意见，呼吁新闻改革。1955年12月，毛泽东在《合作社的政治工作》的按语中批评说：“我们的许多同志，在写文章的时候，十分爱好党八股，不生动，不形象，使人看了头痛。”“哪一年能使我们少看一点令人头痛的党八股呢？”^①1956年后，新闻工作改革的时机与条件开始成熟。4月，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宣布了发展科学文化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简称“双百”方针）。4月25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了《论十大关系》的报告，总结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的经验教训，分析了学习苏联经验的过程中出现的弊端，提出了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任务。毛泽东指出：“我们的方针是，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化、艺术的一切真正好的东西都要学。但是，必须有分析有批判地学，不能盲目地学，不能一切照抄，机械搬运。他们的短处、缺点，当然不要学。”“对于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经验，也应当采取这样的态度。过去我们一些人不清楚，人家的短处也去学。”^②毛泽东的这一报告，不仅是社会主义中国在探索中前进的指导方针，也是即将出现的新闻工作改革的指导方针。

5月28日，刘少奇（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长）分别听取了新华社和中央广播事业局负责人的汇报，并作了长篇讲话。6月19日，刘少奇又召集中央分管宣传工作的胡乔木和新华社负责人谈话。在这些谈话中，刘少奇明确提出了反对教条主义和党八股问题，指出：不分好坏，不看条件，一律接收，一律学习，一律照办，就是教条主义，就是盲从，就是迷信。在我们的同志中间要破除迷信。他说：“我们的新闻报道，学习塔斯社的新闻格式，死板得很，毫无活泼……我们不能学这种党八股。”^③刘少奇的几次谈话，不仅为新华社、广播事业的改革提出了一些具体要求，而且更重要的是为即将到来的社会主义新闻改革确定了指导方针。

① 《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180页。

②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册，102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

③ 《中国共产党新闻工作文件汇编》下册，359页。

二、《人民日报》以改版为中心的新闻工作改革

1956年4月后，一场以改版为中心的新闻工作改革运动在人民日报社内兴起。

进入1956年之初，《人民日报》就已经开始酝酿新闻工作改革事宜，中共中央也指示《人民日报》要改进内容、扩大篇幅，以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4月，《人民日报》编辑部召开新闻工作改革动员大会，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胡乔木在会上传达了中央意图，《人民日报》的改版工作开始起步。报社发动全体人员检查工作，并采用派专人进行个别访问、召开小型座谈会、个别写信和发公开信等方式，向各省委、市委、中央有关部门、县以上的报纸编辑部和各界读者征求意见与建议。5月，《人民日报》编委会在向中共中央的报告中提出：“要使人民日报能够多方面地反映客观情况和群众意见，及时地深入地宣传解释党和政府的政策，更多地反映和交流地方工作的经验，对于广大人民迫切关心的工作上、生活上、思想上的问题展开讨论，使人民日报成为群众欢迎的生动活泼的报纸。”报告还提出了报纸扩版、报道范围扩大、开展自由讨论、满足读者需要等具体意见。6月20日，人民日报社制定了报纸改革方案并上报中共中央。

7月1日，《人民日报》经中共中央批准，正式宣告改版。其改版社论《致读者》首先总结了该报创刊八年来的成绩，同时也公开承认《人民日报》的工作“仍然有很多缺点”，仍然存在教条主义和党八股严重等缺点，缺乏生动活泼的作风，不能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因而必须进行一场深入的改革。接着，这篇社论阐述了改版的目的、意见与重点。社论说：“《人民日报》是党的报纸，也是人民的报纸。从它创刊到现在，一直是为党和人民的利益服务的。”“期望全国广大的读者给我们更多的帮助，更多的批评和指示！”社论还把改版的重点内容归纳为三个方面：“第一、扩大报道范围……生活里的重要的新的事物——无论是社会主义阵营的，或者是资本主义国家的，是通都大邑的，或者是穷乡僻壤的，是直接有关于建设的，或者是并不直接有关于建设的，是令人愉快的，或者是并不令人愉快的，人民希望在报纸上多看到一些，我们也应该多采集、多登载一些。”“第二、开展自由讨论……有许多问题需要在群众性的讨论中逐渐得到答案。有部分问题甚至在一个时期的讨论以后暂时也还不能得到确定的答案。有许多问题，虽然已经有了正确的答案，应该在群众中加以广泛的宣传，但是这种宣传也并不排斥适当的有益的讨论。相反，这种讨论可以更好地帮助人们认识答案的正确性……为了便于开展自由讨论，我们希望读者注意：在我们的报纸上发表的文章，虽然是经过编辑部选择的，但是并不一定都代表编辑部的意见。”“第三、改进文风……报纸上的文字应该力求言之有物，言之成理，而且言之成章。”自是

日起,《人民日报》的篇幅由对开4版改为对开8版,版面安排也相应作了调整,第1版仍为要闻版,第2、3版为国内经济版,第4版为国内政治版,第5、6版为国际版,第7版是学术文化版,第8版上、下半部分分别为副刊和广告版。

《人民日报》改版后,面目焕然一新。最大的变化反映在新闻报道上。报纸新闻数量大增。改版前,该报新闻数量少,内容又多半是外交、会议、公告等硬新闻。改版后,新闻数量明显增多。改版后的第一个月,《人民日报》平均每天登出新闻74条,共4万字,占全部版面的40%。为适应经济建设的形势,经济新闻占据主要地位。以1956年7、8两月《人民日报》头版头条新闻为例,共刊登头条新闻61条,其中,经济建设31条,文教5条,人民生活5条,会议新闻和公告性新闻6条,涉外新闻14条。显而易见,经济建设新闻占了50%,居各类新闻的首位。新闻报道的题材变得广泛,开始提倡报道社会生活中的新闻,探讨解决生活中的问题,更加关心和贴近读者的生活,如刊登《沈阳的生活费用为什么高?》、《不要让孩子再在街头游荡》等。7月4日,《人民日报》在头版刊登《着手解决居民生活福利问题》的报道,体现了该报纸已把读者的需要放在首位。7月13日,《人民日报》头版共刊登了13条新闻,不仅有“全国发放农贷17亿元”、“哈尔滨量具刃具厂达到设计生产水平”、“宝成铁路完成铺轨架桥工程”等来自工农业和建设工程的报道,还报道了“阿富汗首相来访”、“全国各地教师开始过暑假”和“欢送埃及文化使团”等教科文和国际新闻。对于波兰波兹南事件和匈牙利事件,《人民日报》也作了如实报道,打破了对社会主义国家只报喜不报忧的框框,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

此外,言论明显改进。《人民日报》的社论以及其他评论文章,题材广泛,大多短小生动,没有空话,出现了一些从实际中提出问题进行批评分析的好文章。特别是关于“百家争鸣”方针的讨论,一扫教条主义的文风,表现了独立思考的自由、发表意见的自由,振奋和鼓舞了广大知识界。副刊与通联工作进一步加强。《人民日报》创办了文学性副刊,刊登活泼、明快、尖锐的短文和文艺作品。《人民日报》还认真编发群众来信,按照其内容性质分别刊登在有关各版上,改变了过去设立读者来信专版、专页集中刊登读者来信来访的做法。改版后第一个月里,《人民日报》平均每天发表读者来信近10篇。《人民日报》改版后,赢得了全国各阶层读者的欢迎,报社不断收到读者的赞扬信。版面处理也十分生动活泼。版式是报纸特有的语言,文章、照片在版面上的排列组合往往能反映报纸的风格。严谨、端庄、朴素是我国报纸版式特有的传统。改版后,《人民日报》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有所创新,新闻、言论、图片有机组合,还时时推出组合式新闻等各种报道形式。尤其是在照片的使用上,或在报眼位置刊登图片新闻,或

将大幅照片改为两幅小照片，或是图片在文章中灵活穿插，时时给人新鲜之感。

为了推广《人民日报》改革的措施与经验，促进新闻工作改革的全面展开，中共中央于1956年8月1日向各省、市、自治区党委批转了《人民日报》编辑委员会向中央呈送的关于《人民日报》改版的报告。为此下达的中共中央文件明确指示：“中央批准这个报告，认为《人民日报》改进工作的办法是可行的。中央还希望各地党委所属的报纸也能够进行同样的检查，以改进报纸的工作。”中共中央文件还就报纸上展开自由讨论作了一番精辟的论述：“为了便于今后在报纸上展开各种意见的讨论，《人民日报》应该强调它是党中央的机关报又是人民的报纸。过去有种论调说：‘《人民日报》的一字一词都必须代表中央’，‘报上发表的言论都必须完全正确，连读者来信也必须完全正确’。这些论调显然是不实际的，因为这不仅在事实上办不到，而且对于我们党的政治影响也不好。今后《人民日报》发表的文章，除了少数的中央负责同志的文章和少数的社论以外，一般地可以不代表党中央的意见；而且可以允许一些作者在《人民日报》上发表同我们共产党人的见解相反的文章。这样做就会使思想界更加活泼，使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愈辩愈明。各级党委今后也要强调地方党报是地方党委的机关报，又是人民的报纸。我们党的各种报纸，都是人民群众的报纸，它们应该发表党的指示，同时尽量反映人民群众的意见；如果片面强调它们是党的机关报，反而容易在宣传上处于被动地位。”^①这一文件体现了党尊重新闻规律的科学态度，表现了党报政策与宪法关于言论、出版自由规定的一致性，标志着党报理论的重大发展。

三、新闻工作改革的全面展开

在《人民日报》进行新闻工作改革的同时或稍后，中央和各地的报纸、通讯社、广播电台也都先后进行改革，掀起了一个规模巨大的新闻工作改革热潮。

新华通讯社以建设世界性通讯社为目标，在提高新闻报道质量、改进国内通讯社工作、加强国外分社工作等多方面进行大胆改革。建国后，新华社经过几年的努力，工作有了很大的进步，新闻报道的质量也有了明显的提高。但是，新华社工作还存在着许多缺点。新闻报道片面性严重，不能经常反映事物的本质，而只抓一些表面现象，没有完全做到认真地、全面地、及时地、生动地反映实际情况，只报喜，不报忧；只报成绩，不报困难和缺点；只反映与领导机关意见相吻合的情况，不反映不同的或相反的情况；只报道已有定论的问题，不报道重要但

^① 《中国共产党新闻工作文件汇编》中册，483页。

还没有定论的问题；只注意完成工作任务，不注意群众的意见和呼声。此外，新华社的国内工作存在严重的机关化的作风，工作效率亟待提高，组织管理与工作方法亟待改进。国外分社工作发展不快。

1955年12月，毛泽东批评新华社在国外业务活动的发展上思想保守、行动迟缓，“驻外记者派得太少，没有自己的消息，有，也太少”。他指出：新华社“应该大发展，尽快做到在世界各地都能派有自己的记者，发出自己的消息，把地球管起来，让全世界都能听到我们的声音”^①。1956年5月28日和6月19日，刘少奇两次同新华社负责人的谈话，对新华社的性质与任务、新闻报道的基本要求与国内和国际报道的改进、记者的工作与作风以及建设世界性通讯社、学习塔斯社等问题提出了更为具体的意见。刘少奇要求新华社“成为世界性通讯社”，并要求新华社不要老是强调官方身份，不要把自己束缚得死死的，还大胆地提出新华社“不做国家通讯社，当老百姓”的问题。他认为，新华社同报纸的关系是合作关系，新华社要为报纸服务，适应报纸的需要、读者的需要，提高报道的质量。新华社的新闻必须是客观的、真实的、公正的、全面的，同时必须是有立场的。他指出：现在的新闻报道有偏向，只讲好的，有片面性。应该是好的要讲，不好的也要讲。他说：“现在我们的国际报道只有一面。骂美国，说我们好。这种片面性的报道，会造成假象，培养主观主义。”^②当然，讲坏的，不是什么都讲。什么都讲是客观主义，是有闻必录，要经过思考和观察，有自己的见解。要做到对当前斗争有利，不被敌人和反动派利用。他还要求新闻报道要讲普遍兴趣，多种多样，简短及时。关于新闻记者的思想与工作作风，刘少奇认为：第一要有老实态度，第二要深入观察问题，对事物要有分析，要克服报道中的片面性，要坚持真理，要有斗争性，头上要长角，不要怕人家报复，不要怕人家把你赶走。应该发挥记者的积极性，除了写新闻外，还要写通讯、评论，写各种文章，并且在稿件上署名，加重记者的责任。刘少奇还提出新华社要学习塔斯社，同时也要学习资产阶级通讯社。对社会主义国家通讯社的经验不要迷信，不要盲从。要克服教条主义，发挥创造性，要创造自己办无产阶级通讯社的经验。

根据刘少奇的指示和国内外形势发展的要求，新华社在认真检查工作中存在的问题的基础上，制定了新华社工作全面改革的规划，并于1956年8月以新华社编委会的名义就若干重大问题向中共中央呈送了请示报告。在建设世界性通讯

① 《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182页。

② 《中国共产党新闻工作文件汇编》下册，360页。

社方面，新华社提出了发展步骤：“第一步在五年到七年内，新华社应首先集中力量建设成为东方（亚非地区）最有权威的世界性通讯社，第二步在十年到十二年内，新华社应建设成为在全世界范围内可以和西方资产阶级各大通讯社相匹敌的世界性通讯社。”1956年，新华社国外分社由原来的9家增加到19家。

关于新华社的国内报道，报告提出了一些全新的观念和改进措施。报告说：“新华社协助党和政府贯彻执行政策，不是简单地宣扬政策的正确，而要反映政策在群众行动中受考验的情况。因此新华社不应仅只反映政策顺利执行的情况，而且要反映政策在执行中所发生的问题和偏差，以及如何解决这些问题和偏差的情况。”“新华社是新闻机关，它是及时反映事物的变化的，因此，新华社不能仅只报道已有正确结论的事实，同时也要报道暂时还不能做出正确结论的事实。新华社应该要求对反映地方事实判断正确，但是完全允许随着情况的改变，修正自己的判断。”此外，各地方分社可以对当地报纸、电台发稿。关于国际报道，报告认为要实行“全面的客观真实的报道方针”，“全面地报道世界各国发生的各种各样的重要事件，而限于只报道对我有利的进步的事件；在报道时立场坚定，但应尽可能赋予我们的新闻以客观的形式，避免宣传化的毛病”。这样做，是因为“通讯社的新闻报道，应不同于政府的外交声明，应该客观地全面地反映世界各国的不同的情况，这不但可以使国内读者能够全面地了解国际生活的真实情况，而且可以使新华社的新闻能够在国际市场上同西方资产阶级通讯社进行竞争”。

关于新华社的性质问题，报告认为：“从新华社作为一个舆论机关来考虑，特别考虑到新华社要成为世界性通讯社，要跟西方资产阶级通讯社竞争，采取民办的形式好处较多。因为民办后，政府在外交上对新华社可以不承担什么责任，而新华社可以更自由地进行活动和报道，同时，这样做也可以减少新华社的报道是官方宣传的印象。如作为民办通讯社，可以考虑采取由中国报纸和广播电台联合经营的办法，成为合作企业。但是对于这个问题，我们目前缺乏经验，因此暂时可以不改变目前国家通讯社的形式，今后应该尽可能少用官方的面孔出现，更多采用民间通讯社的做法，在积累一定经验后，再决定是否改变。”

广播工作改革的全面展开，以1956年7、8月间召开的第四次全国广播工作会议为标志。之前，刘少奇于5月28日听取了中央广播事业局负责人的汇报，并作了长篇讲话。刘少奇指出，人民广播事业要加强同人民日常生活的联系，广播要跟人民思想、人民生活、人民需要有密切的联系。比如说，时装展览会，人民对它有兴趣，应该广播。又比如说，发现大脑炎、猩红热，可以让卫生部门广播一些预防常识。看起来是人民生活琐事，但很重要，这表示人民广播电台很关心人。他说：“跟人民密切联系，就要关心人民生活的事情”，“特别是地方的广

播电台，有关粮食、鱼、肉的问题都可以广播。到百货公司去的人太多，太拥挤了，你们也就可以告诉听众，叫他们慢点去”。刘少奇还提到了广播电台的广告问题。他说：“广播电台为什么不搞广告？人民是喜欢广告的。生活琐事和人民有切身关系，许多人很注意和自己有关的广告。”关于对外广播，刘少奇认为：“以对亚洲和对华侨为重点，这当然是重要的”，但“搞规划要从全世界着眼”，“一定要把对美洲的广播列入计划之内”。刘少奇还要求大力发展农村有线广播。他说：“发展农村有线广播很重要，但是不要因此加重群众的负担”。“发展有线广播主要靠群众，群众要搞才搞，群众不要搞就晚点搞”。关于新闻机构的政治待遇问题，刘少奇认为：“新华社、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各地方报纸一律平等对待，不能说《人民日报》是党报，其他的不是，级高一等，应该一视同仁。”为了培养大批广播工作者，刘少奇提出了办广播大学的建议，“应该有一个大学来训练广播干部”^①。根据上述精神，中央广播事业局于7月25日至8月16日在北京召开了长达二十多天的第四次全国广播工作会议。会议期间，与会人员认真学习了毛泽东《论十大关系》和刘少奇的讲话，讨论了广播事业的体制和改进广播宣传等问题，确立了广播工作改革的主要目标，即改进新闻报道，扩大节目取材范围，办好文艺广播，让听众从收音机里听到更多的节目。

第四次全国广播工作会议结束后，从中央台到地方台，广播工作改革全面展开，广播工作有了显著的改进。

一是改进新闻报道，努力做到又多又快又短又好。各台根据自己的力量，注意增加新闻节目的次数和容量，强调新闻时效。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节目从1949年的每天4次增加到15次，密切配合国家的中心工作和群众最为关心的问题。各地电台着重改进本地的《新闻联播》和《新闻报摘节目》，和中央电台的《全国联播节目》、《新闻报摘节目》一起，组成早晚两次重点节目群，通过录音报道反映各地厂矿、工地、农村、学校、部队等先进单位、先进人物事迹的节目也逐渐增多。同时努力提高节目的质量，力求全面、真实、生动、有兴趣和有立场。各台努力扩大节目选材的范围，使广播节目贴近与体现人民的生活，反映社会主义建设的新面貌，歌颂社会主义先进人物与先进典型。在形式上，力求多样化与生动活泼，语言注意口语化与通俗化。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于1956年11月开办了综合性的专题节目《祖国建设和人民生活》（1957年5月后改为《在祖国各地》），以通讯、特写、录音报道等为主要节目形式，既反映各地城乡建设的新面貌，又介绍各地的名胜古迹，同时还注意报道当地的模范人物。经过多年的努

^① 《中国共产党新闻工作文件汇编》下册，370—376页。

力，该节目成为中央台的名牌节目。在此先后开办的《对家长广播》、《听众服务》和《时事谈话》（后改名为《广播谈话》）等节目，也均以群众普遍关心的问题为选题，既有对国内、国际重大问题进行通俗的阐述和评论，也有涉及人们衣食住行、生老病死等日常生活琐事的娓娓之谈，深受广大听众的欢迎。

二是贯彻“双百”方针，开展自由讨论，特别是纠正广播不得开展批评的错误观念。在学习苏联新闻工作经验后，广播批评被视为新闻工作的禁区。在改革中，广播工作者重新认识了这一问题，认为根据广播的特点，批评可以采取各种方式和方法来进行。中央台和地方台进行批评的方法也应该有所不同。中央台一般不应进行指名的批评，也不要求被批评者的答复，它主要限于对不良现象和不良倾向的批评。省市台可以进行比较具体的批评，特别是市台，由于听众大都在本地，可以进行比较具体的批评。开展自由讨论，主要是指就社会生活中的一般问题的讨论，选择那些多数听众感兴趣和能够接受，同时也有教育意义的问题，邀请有不同见解的人到话筒前发表不同的意见，进行批评和辩论。这种自由讨论，只要是不反对党和政府的既定的根本方针和政策，是应当允许的。在开展自由讨论前，各电台都认真做好准备工作，慎重选择和对待讨论的问题。

三是努力办好文体、知识以及社会群体等各类节目，并力求丰富多彩，满足不同兴趣和爱好的听众的需要。1956年以后，实况广播体育比赛次数明显增加，成为推动群众性体育活动的重要方法。1957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开办的《星期演讲会》节目，每星期日邀请一些部门的负责人和各方面的专家、学者，讲解群众关心的政策、形势，介绍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知识。文艺节目的题材、种类、形式日益丰富，逐步形成了欣赏性、知识性、教育性、服务性四类节目。广播剧和“电影录音剪辑”的数量有所增加，思想性、艺术性有所提高。对少年儿童节目，除了原有的对少先队员的《星星火炬》，1956年又开办了对学龄前儿童的《小喇叭》节目，以向孩子们进行爱国主义、国际主义和社会主义教育为主要内容。

在新闻改革的热潮中，《新民报》等非党报也积极参与改革，提出了不少新观念，推出了不少新举措，特别是重视新闻报道贴近读者、接近生活。“以人为本”这一在现今流行的理念，细心考察1956年的报纸就可见其端倪。《新民报》总编辑赵超构针对过去报纸工作中存在的新闻和文章太长、报道面太窄、文章太硬、有教训人的口气等缺点，提出改进报纸工作的三个口号：“短些，短些，再短些；广些，广些，再广些；软些，软些，再软些。”赵超构还对“软”字作了解释：“思想既要正确，又要把报纸弄得生动一些，通俗一些。深入浅出，对读者亲切一些。”之后约一年时间内，《新民报》上的新闻和文章明显地短了，题材

和体裁广了，深入浅出、生动有趣的东西日渐增多了。特别是在版面上加重社会新闻的报道，有计划地、创造性地编发与人民生活息息相关的社会新闻，诸如道德新闻、灾害新闻、社会治安新闻，都受到读者的欢迎。该报还加强“小言论”栏目，小型评论专栏《随笔》被移至第1版，每天一篇，由赵超构亲自撰写，并以“林放”的笔名发表。

在新闻工作改革中，研究新闻理论与新闻业务的空气也十分浓厚。复旦大学新闻系等新闻教育与研究单位对报纸的性质与任务、读者观念、指导性与趣味性、中国报纸的传统等问题开展了热烈的讨论。复旦大学新闻系主任王中教授，于1956年间精心撰写《新闻学原理大纲》，并于1957年初应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等单位邀请，作了多次学术讲演。王中对报纸的性质与任务等问题作了新的阐释，他认为，报纸的性能是“为人民服务”，在新形势下，报纸有指导工作、指导生活、扶植民主、培植道德等职能，但是不赞成继续照搬列宁的报纸是“集体的组织者”的说法，主张“社会的性质变化了，整个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变化了，那么报纸的性质、办报的方针也应当随着变化”。他还提出，报纸既是政党宣传工具，又是老百姓花钱买的商品，具有工具性和商品性两重性。他认为，“‘办报卖’和‘买报看’两个方面必须结合”，这就要求报纸很好地为读者服务，让读者自愿地去买。王中的见解，尽管引起新闻界很大的争议，但对深入研究问题是十分有益的。

关于中国报纸的传统问题，广大新闻工作者普遍认为要予以全面的继承。中国报纸有着丰富的传统与特色。仅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无产阶级新闻事业而言，既有在解放区办报的经验，也有在国统区办报的经验；既有将解放区某个村庄农民成立“变工队”的消息放在头版头条以指导具体工作的延安《解放日报》，也有按照国统区读者的新闻价值观采编新闻、但能同时表达中国共产党的立场、体现无产阶级党性原则的重庆《新华日报》，还有在国共合作中常以不偏不倚的面目出现、但本质上倾向进步力量的《救亡日报》。对于这些优良传统，理应全面继承，而不能仅仅注重继承解放区党报的传统。不少人还提出，新中国新闻事业还应该借鉴旧中国出版的非共产党的进步报纸、在历史上曾发挥过进步作用的以及其他在业务上有可资借鉴之处的报纸的经验与特色，使社会主义新闻事业风格多样、各有特色。

四、新闻工作改革的收获与意义

1956年兴起的以《人民日报》为典型的我国新闻工作的改革，是建国以来新闻界的一件大事。这次改革历时一年多，从中国实际出发，注重满足人民群

众的需求，为办好我国社会主义新闻事业开辟了道路，具有深远的意义和影响。

首先，广大新闻工作者的新闻观念得到了更新与解放。这次改革冲破了教条主义思想的束缚，破除了盲从迷信，认识到对于苏联新闻工作经验要有分析地加以借鉴，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则不盲从；对于国内外资产阶级的办报经验，不能简单地一概否定，可以批判地接受其中对我们有用的成分。

其次，广大新闻工作者明确了要办好我国社会主义新闻事业，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认真研究总结继承中国新闻事业的优良传统与经验，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创新，使新闻事业的社会主义内容与中国民族形式相结合。正是由此出发，《人民日报》进行了成功的改版，全国各级党报也引以为榜样，相继进行探索与改革。其他非党的人民报纸也进行了有益的探索与尝试。旧中国著名民营报纸《文汇报》在解放后逐步由私营转为公私合营以至公营，以知识分子为主要读者对象，立足上海，面向全国，以宣传党和政府的文教方针、政策为主要内容，于1956年4月至9月间迁往北京，改版为国家教育部的机关报《教师报》，10月1日起又恢复原名迁回上海出版。《文汇报》、《光明日报》、《新民报》、《大公报》等也在如何办成一张社会主义的中国报纸的大目标下，各自肯定和发挥了独有的传统优势，办出了自身应有的特色。各报竞相变革，形成竞赛，呈现出一派百花齐放的盛景。

再次，这次改革受到了广大读者的欢迎与支持。读者欣喜地说，从改革可见，“教条主义之不得人心久矣”。读者对报纸改革的欢迎与支持，带来了报纸发行量、特别是自费订阅部分的大幅度增加。自1956年10月1日开始，机关、团体等单位中私人需要的报刊实行自费订阅后，报刊发行量非但没有减少，反而有所增加。一些报纸超过了预计的发行数。

当然，这次改革也有偏颇之处。在反对教条主义思想时，有的人又走向另一极端，全盘否定建国后学习苏联新闻工作经验的历史必然性和受益的方面。在对待旧中国资产阶级报纸的传统问题上，有些人主张不加分析地学习与继承。正如毛泽东在1957年3月10日同新闻出版界代表谈话时所说：“目前思想偏向有两种：一种是教条主义，一种是右倾机会主义。右倾机会主义的特点是否定一切，教条主义则把凡有怀疑的都一棒子打回去，肯定一切。教条主义和右倾机会主义都是片面性，都是用形而上学的思想方法去片面地孤立地观察问题和了解问题。”^① 1957年下半年反右派斗争开始后，1956年兴起的我国社会主义新闻工作的改革，

^① 《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187页。

因反右扩大化等诸种原因而中途夭折。

【学习思考题】

1. 简述全国新闻事业网的结构与特点。
2. 建国初期强调发扬党的新闻工作优良传统有何作用与意义?
3. 抗美援朝宣传的特点是什么? 有哪些重要作品?
4. 怎样评价新闻工作“学苏联”?
5. 为什么说批判《武训传》、批判胡适、批判胡风是建国初期思想文化宣传报道的失误?
6. 评述 1956 年社会主义新闻工作改革的经过、重点和收获。



第十二章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的新闻传播事业

第一节 新闻传播事业发展的主要背景

1956 年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之后，我国进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新阶段。从 1957 年至 1966 年“文化大革命”爆发的 10 年中，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年轻的共和国在曲折中缓慢前进。共和国的新闻传播事业在疾风暴雨的政治斗争中承受了巨大的考验。在这 10 年中，新闻传播事业既有快速发展的阶段，也有停滞不前甚至后退的时候。在新闻传播实践中，既有一些好的经验值得发扬，又有严重的失误需要总结。在曲折中发展、在摸索中前进，成为这一时期新闻传播事业的主要特点。

在 10 年的时间里，我国在政治上先后发生了 1957 年的整风与反右斗争扩大化以及 1959 年庐山会议之后的反右倾运动。每一次运动之后，“左”倾错误虽然得到一些矫正，但迫于当时的政治形势，并没有得到彻底的根除，反而不断加剧。新闻媒体作为党的重要舆论工具，在整风运动中盲目鼓励大鸣大放，充当“引蛇出洞”的工具，在“大跃进”中推波助澜、大放卫星，鼓吹共产主义穷过渡，给国家与人民造成了无法弥补的损失。“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论调更是传媒宣传的重点。

经过“大跃进”的狂热之后，党和政府主管宣传的领导和新闻界的同志一起对新闻工作进行了反思，在此基础上，重提调查研究的重要性，大兴调查研究之风。1960年冬以后，新闻媒体的宣传报道工作有了一定的改进，传媒的知识性、趣味性得到了加强，新闻工作者与理论工作者都进行了一些有益的探索，试图在实践中拓展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生动活泼的新闻工作道路，但这些探索和1956年新闻界的改革一样来去匆匆，当政治形势发生变化时，不得不让位于现实的政治需要，淹没在阶级斗争的大潮中。

这一时期经济的大起大落直接影响了新闻事业的发展。在“大跃进”时期，报纸数量激增，诞生了大量的县级报纸、企业报、农民报，广播电台也遍地开花，而到了经济紧缩期，由于纸张紧缺，报纸不得不大量停办、合并，报纸数量大减，报纸的版面、印数也随之大量削减，许多广播电台也成了哑巴。从经济调整期到“文化大革命”爆发之前，新闻传播事业已经渡过了凋零期开始复苏，但这种复苏极其短暂，随着国家经济状况的恶化，新闻传播事业的发展重新跌入低谷。

由于党和政府的高层领导对政治、经济形势认识上的偏差，直接造成全国范围内政治、经济、文化等众多领域中的“左”倾路线，新闻传播事业作为意识形态领域的重要组成部分，首当其冲深受其害。全党办报、群众办报、政治家办报的号召使报纸多样性的功能逐渐削弱，这其中除了特殊的国情以及政治形势的原因之外，新闻媒体自身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广大的新闻工作者对于当时的国情缺乏冷静的认识，在各种政治运动中盲目地升温加火，甚至违背基本的新闻规律，以“假、大、空”的新闻报道代替真实的事实报道，“务虚名而得实祸”，教训也是深刻的。

在新闻学研究领域，1956年的新闻改革给正常的学术讨论提供了机会，许多可贵的探索活跃了当时的新闻界，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也使新闻理论工作者与新闻实际工作者共同探讨建国后的新闻传播活动成为可能。只是一切的讨论很快就被“阶级斗争工具论”的大帽子束缚住了手脚，很多研究者在频繁的政治运动和动辄得咎的形势面前，不得不放弃自己的观点，人云亦云，甚至反戈一击成为“阶级斗争工具论”的捍卫者。

新闻事业和其他各行各业一样，在10年中屡次成为政治运动的牺牲品。从1957年反右开始到1966年夏，中国的报纸逐步形成了党报一统天下的格局，一些在解放前创办的有独特传统的报纸不得不改弦更张，和中央步调一致。与此同时，新闻事业也有了一定的发展。新华通讯社逐步奠定了自己成为世界级通讯社的基础，一些脍炙人口的优秀报道影响深远，至今仍是学习的典范。广播和电视

尽管在报道上无法摆脱政治形势的影响，但也得到了较快的发展，形成了一定的规模。尤其是电视，在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高度重视下，从无到有迅速发展。在当时有限的条件下，电视从业人员在电视新闻报道、综合节目制作等方面都进行了初步的有益的探索，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第二节 新闻事业的发展与调整

一、报纸与期刊

从1957年至1966年，我国的报纸与期刊随着政治与经济形势的变化而变化，发展很不稳定，1958年“大跃进”的时候曾不顾经济条件，出现过全国大办县报的局面；在三年经济困难时期，由于纸张供应吃紧，报刊不得不或合并，或停办，或压缩发行量，或减少日常版面。在完成了经济调整之后，报纸与期刊的数量才又缓慢上升。

我国新闻事业在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之后，很快步入了一个大发展的时期。据统计，1957年，我国邮发报纸总数为1 325种，邮发报纸的期发数为1 508万份，全国报纸每年的总印数为24.4亿份。1958年，由于全国上下的“大跃进”，报纸猛增至1 776种，邮发报纸期发数为4 473万份，报纸每年的总印数为39亿份。从1959年开始，邮发报纸总数开始下降，1959年为1 390种，邮发报纸期发数为3 237万份。1960年报纸总数为1 274种，期发数为2 104万份，但报纸每年的总印数却达到50.9亿份，创下最高点。随后由于国民经济遭到严重困难，中央和各地对报刊进行了整顿和精简，到1963年，报纸的种数骤减到289种，报纸的总印数也下降至25.8亿份。经过国民经济的调整与恢复，以后两年稍有回升，到1965年，报纸的种数增至343家，期发数为2 785万份，全国报纸的总印数增加到47.4亿份。但“文化大革命”开始的1966年，报纸总数猛降为49家，报纸的总印数又下降至36.7亿份。这其中的起伏充分说明了新中国报刊的发展和政治经济的发展息息相关。^①

在国民经济三年困难时期，纸张供应非常紧张，中央曾指示压缩报纸用纸，报纸不得不大量合并或停办。《人民日报》从1961年11月开始，每天8版压缩为日出6版，星期一只出4版，发行量由133万份压缩到100万份。《解放军报》的发行份数压缩了10%，《光明日报》的发行数由13万份压至不足8万份。

^① 参见方汉奇主编：《中国新闻事业通史》，第3卷，254～255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

报纸的调整，在一定意义上促进了晚报的发展。各省会城市的市报一律合并到省报或改为晚报。这些晚报一方面承担着丰富读者精神生活的重任，一方面还兼负着原来日报的一部分宣传报道任务。

建国初期，我国主要有两家晚报，一是解放前创办的《新民报晚刊》，解放后继续出版，1958年4月改名为《新民晚报》；一是1949年3月复刊的天津《新生晚报》，1952年改名为《新晚报》，1960年改为《天津晚报》。1957年10月1日，广东省委领导的《羊城晚报》在广州创刊，这是一张对开大型的综合性晚报，作为《南方日报》的辅助和补充。1958年3月15日，中共北京市委领导下的《北京晚报》创刊，这是一张小型的综合性晚报，“面向基层，补日报之不足”。赵超构在任《新民晚报》总编辑期间，倡导“短些，短些，再短些；广些，广些，再广些；软些，软些，再软些”。这一方针使《新民晚报》面貌为之一变，独具特色，销数也因此大增，甚至出现了市民排队买晚报的现象。1961年《新民晚报》的发行量突破30万份，创历史纪录，足以说明当时晚报对于城市居民的重要。这四家晚报各具特色，深受老百姓的喜爱，构成了建国后我国晚报的基本格局。

和党报不同，晚报由于其面对的读者不同，在报道内容和版面安排等方面都更加灵活，更贴近读者，强调知识性与趣味性。1959年5月，全国记协召集以上四家晚报的负责人在北京举行建国后第一次晚报座谈会，讨论了晚报的特点和办报方针。当时大家认为晚报也要宣传党的各项工作，主要是作为当地日报的辅助与补充力量，应该着重从运动的侧面进行报道。1960年4月，全国第二次晚报座谈会在广州举行，参加的仍是这四家报纸，在这次座谈会上大家除强调了晚报应该以更大的热情反映伟大的时代外，提出在“不断加强副刊思想性的同时，还应该适当地注意加强知识性”。

20世纪60年代前半期，农民报、企业报都有不同程度的发展。农民报主要是指省委机关报办的农民版或农村版，有些专区也办有农民报。企业报主要是由一些厂矿自己创办，当时有四十多种，仅1958年一年创办的就有15种。但经济困难时期，企业报发展的速度开始减缓，到“文化大革命”前已所剩不多。

这个时期还创办了一些重要的报刊。1957年8月1日，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委员会主办的时事政治周报《团结报》正式公开向全国发行，它是我国当时惟一的由民主党派创办并公开发行的报纸。

1958年3月4日，《北京周报》英文版创刊，主要向国外及时报道我国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各方面的发展情况，发行到一些国家和地区，后来还增出了法文、西班牙文、日文、德文等多种版本。

1958年9月1日，国家体育运动委员会主办的报纸《体育报》在北京正式创办。毛泽东为它题写了报头，这是我国当时惟一的全国性的体育报纸，特色鲜明，“心怀祖国，放眼世界”，“从零开始”等响亮的体育口号就是由《体育报》最先叫响的。不久，我国体育报的发展进入一个高潮，有十几个省市先后创办了地方性的体育报。

1959年元旦，中国科学院创办了院报《科学报》。1960年，由于纸张缺乏，全国的各家科技报全部停刊。

期刊在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大约有484种，每年的总印数为5.5亿份。在1958年“大跃进”时，这个数字几乎翻了一番，达到851种，其中时事政治期刊在这一时期得到了较大的发展。1958年6月1日，中共中央主办的《红旗》杂志在北京创刊，总编辑是陈伯达，这是中共八届五中全会决定出版的中央理论刊物，旨在加强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宣传，初为半月刊，后改为月刊。在此之后各省、市、自治区也纷纷创办了自己的政治理论刊物。如中共北京市委1958年11月创办的《前线》、上海市委的《解放》、浙江省委的《求是》、河南省委的《中州评论》等等。还有一些市委、地委甚至县委也创办了理论刊物，这样从中央到地方形成了一张组织严密的政治理论宣传网。

在随后的经济困难和经济调整时期，期刊的数量也大幅下降，减少到400种左右，从1962年开始才又有所回升，到1963年猛增至861种，和“大跃进”时期持平，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文化大革命”前，1965年的期刊总数仍高达790种，只是到1966年才跌至191种。

二、新华社

1956年主管新闻宣传工作的国家领导人刘少奇曾对新华社的工作作过具体指示，为新华社的发展确立了方向。作为国家通讯社，在这一时期新华社明确提出了要使自己成为“消息总汇”、成为党和政府以及人民群众的耳目喉舌。1957年，新华社在向中央呈送的一份报告中，对“消息总汇”的具体内容作了说明：（1）在全国和全世界采集和发布有关中国和外国政治、经济、文化和其他一切重要的、引起共同兴趣的新闻（包括文字的和照片的）；（2）在全国和全世界采集和发布一切重要的、不宜于公开报道的情况（包括文字和照片的），提供中央和有关方面参考。从1957年到“文化大革命”爆发之前的10年间，新华社的发展也是在曲折前行的。

（一）新华社在国内外事业的发展

这一时期，新华社用10年的时间基本建成了自己国内和国际的广播通讯网，

为成为世界级的通讯社奠定了基础。早在1955年底，中央就明确指示，新华社应该大发展，尽快做到全世界都派有自己的记者，发出自己的消息。因此1956年便成为新华社驻外分社建立较快的一年。在一年的时间里，先后有10个分社建立。到1961年底，新华社的对外分社达到了四十多个，新华社的国际新闻也由原来的据外电编发为主向以自己的驻外记者发稿为主、外电为辅的格局，标志着新华社向世界性通讯社快步进军。

据统计，到1966年初，新华社的国外分社发展到51个，驻外记者达85人，形成了以亚非拉地区为主的国际报道网。国外的出稿站也达到26个，新华社的新闻稿可以分别用9种文字出版发行到世界近百个国家和地区。对外广播也改变了过去只有英文一种语言的状况，逐步发展到用英、法、俄、西班牙、阿拉伯五种文字对外广播。

和国外新闻事业的发展相比，新华社在对内的新闻报道中与《人民日报》一样，在“大跃进”中犯了同样严重的错误。1957年10月，新华社和人民日报社就两单位加强合作的问题给中央写了报告，得到了中央的批准。这也和当时吴冷西同志既担任《人民日报》的总编辑，又担任新华社的社长有关。根据双方协议，新华社各地分社与人民日报记者站合并后，仍然挂两个牌子，人民日报记者站的原有的各项任务不变。为加强统一指导，《人民日报》和新华社编委会定时举行联席会议，制定统一的宣传报道计划，报社与新华社互相交换内部业务刊物及其他重要情况，同跑一个部委或相同领域的记者之间更要主动通气，加强联系。

这一时期新华社的新闻报道中存在着大量失实、片面、虚夸的现象。一些记者，包括摄影记者，不惜违背客观事实，任意夸大渲染，甚至故意捏造、无中生有，以求达到耸人听闻的效果。也有一些记者思想方法简单，看问题比较片面，缺乏深入的调查研究，人云亦云；还有一些地方记者站的记者主动追风，迎合上级部门的需要。这些都严重损坏了一个国家级通讯社的声誉。

有鉴于此，从1960年开始，新华社开始下大力气纠正在国内宣传报道中出现的“左”倾错误。总社从编辑部门专门抽调一部分业务骨干，探讨新华社新闻工作的基本规律，总结经验教训。经过长期的讨论与修改，到1963年初，先后就国内报道、对外报道和摄影报道形成了三个文件，即：《新华社国内新闻报道中的若干问题》、《国内新闻对外报道中的几个基本问题》和《改进新华社摄影报道工作的意见》。这三个文件集中探讨了新华社工作的一些根本性问题，包括坚决遵守与维护新闻真实性原则、新闻报道必须从政治上权衡利害得失、对外报道的基本原则和形式等等。

新华社进行总结时正好中央也号召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一切从实际出发，因此新华社要求各地分社在采写新闻报道时要加强调查研究工作，做到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经过几年正反两方面经验的总结与学习，新华社的记者在思想和作风方面都发生了可喜的改变，很多记者深入基层，观察生活，调查研究，涌现出大量优秀、成功的新闻报道。雷锋、王杰、大庆、南京路上好八连、焦裕禄等先进人物和先进集体之所以能够在广大读者中产生重大反响，均得益于新华社记者的报道。一批名记者由此诞生，如穆青、郭超人等。通过他们的笔，一大批优秀共产党员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精神气概鼓舞了一代人。

（二）《参考消息》的改版和扩大发行

《参考消息》是新华社编印的一份内部刊物，创办于革命战争年代，它选载当天收到的各国通讯社和国民党中央社播发的消息，以及各国报刊、台湾和香港报刊发表的有参考价值的资料文章编辑出版，建国后为16开本，每期约十几页，仅供党内外的高级干部阅读。1956年12月18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扩大《参考消息》订阅范围的通知，决定从1957年3月1日起，把阅读范围扩大到县委委员以上或相当于他们的级别的党内外干部。1957年1月27日，毛泽东指出：我们决定扩大发行《参考消息》，从2000份扩大到40万份，使党内党外都能看到……从而增强干部和群众在政治上的免疫力。^①毛泽东对《参考消息》的扩大发行一直十分重视，他还形象地把发行《参考消息》说成是“种牛痘”，之所以连那些骂共产党的反动言论也刊登，并不是替帝国主义作宣传，而是要把非马克思主义和反马克思主义的东西摆在大家面前，让人们经受考验和锻炼，一些消息封锁起来反而有危险。

1958年12月，经中共中央批准，《参考消息》的读者范围进一步扩大到机关团体、企业的干部和高等院校的学生。《参考消息》的改版和扩大发行与当时变幻的国际局势紧密相关，是为了便于党内外干部更多地了解国际时事，特别是了解我们的敌人和朋友双方面的情况。

改版后的《参考消息》每天出版一期，4开4版，约2万字，报道面比改版前扩大，不仅仅偏重于政治、军事、外交等硬性的新闻，还增加了经济、科技、教育、体育、文化、社会等方面的内容，从以前单纯地反映国际舆论转变到同时传播信息、增长知识、扩大视野，因而深受读者喜爱。在1957年改版初发行量仅有13万份，到1965年10月已增加到85万份。

^① 参见方汉奇主编：《中国新闻事业通史》，第3卷，249页。

（三）电讯建设的加强

1956年以后，新华社为适应建设世界性通讯社的需要，开始有计划地更新和改进技术设备，建立和完善国内和国际电讯网络。

1958年到1959年，新华社在我国西部建立了转播台，基本上解决了新华社对欧洲和非洲地区的广播问题，同时也改善了对西亚地区的广播质量。1959年7月，新华社还建成了功率强大的北郊收讯台，抄收外国通讯社的电台增多，扩大了国际新闻的来源。截至1960年底，新华社的国内外广播电路发展到24条，其中国内新闻广播电路4条、对外新闻广播电路19条，另有一条业务通报电路。

进入20世纪60年代以后，虽然受国民经济困难和战备的影响，但新华社的对外广播电路建设并未停止，先后又增开了11条专线广播电路和4条分别对东京、香港、伦敦、河内的图片传真电路。为了加强总社与分社之间的稿件传递和业务联系，新华社还建立了自己专用的国际通讯网络和转报站。这样在1966年“文化大革命”之前，新华社专用的国际通讯网络共有4条电路、4个国外转报站。

三、广播与电视

（一）电视

早在第一个五年计划中，中央广播事业局就向国务院提出了创办电视事业的想法，并得到了周恩来等领导人的同意。1957年8月17日，中央广播事业局决定成立北京电视实验台筹备处，1958年5月1日，中央电视台的前身——北京电视台开始试播，向全世界宣告了中国电视事业的诞生。经过4个月的实践，9月2日正式播出，每星期播出4次，每次2至3小时。1959年元旦，节目又增加到每周6次。不久上海电视台和哈尔滨电视台先后建成试播。1958年12月，中央广播事业局在北京召开全国电视台基地工作座谈会，决定从点到面，在全国逐步建立电视台。从1959年到1961年，又先后有19座省市级电视台建成开播。在随后的经济困难时期，许多电视台被迫停办，1962年，全国的电视台和实验台只保留了北京、天津、上海、广州、沈阳5座，1963年又增加了哈尔滨、长春、西安3座；到1966年底，全国的电视台恢复到13座。

1959年11月2日，北京电视台开始口播《简明新闻》每次五分钟，后来成为著名节目主持人的沈力是第一位电视播音员。在早期的电视节目中，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摄制的《新闻简报》是电视台长期的新闻节目来源，新闻片和纪录片则是电视台早期最多的报道方式，因此有人称这一时期为“新闻纪录片时代”。值得注意的是当时中国电视新闻并非完全封闭，它与一些社会主义国家还

是有交流的。但总的来讲，当时电视台播发国际新闻的面相当狭窄，主要选择的是一些政治性新闻，对反映当时西方世界科学发明、技术进步、文化交流、社会变化的节目很少播出。

专题节目中，社会教育性的节目居多，科普类的节目主要是科学和医学两类，知识性与服务性兼备，很受欢迎。儿童节目也很活跃。文艺类的节目，除了电影之外，当时最吸引观众的就是戏曲戏剧节目，北京的观众多次通过电视台欣赏到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梅兰芳、尚小云、荀慧生、马连良、张君秋等人的精彩表演。当时流行的其他舞台剧目，如昆曲《十五贯》、歌剧《洪湖赤卫队》、《江姐》等也都在电视台播出。1958年到1966年还是中国电视剧的初创时期，8年时间，大约产生了200部电视剧，其中北京电视台约占一半。由于中国的电视产生不久我国就进入了三年国民经济困难时期，电视机生产销售的数量极少，在一万台到几万台之间徘徊，所播的电视剧几乎没有对当时的社会产生什么影响。

1959年5月1日，北京电视台第一次在天安门广场转播了首都人民庆祝“五一”节大会和游行的实况，10月1日又直播了庆祝建国十周年的文艺晚会实况。此后每年的国庆节和“五一”节，北京和地方电视台都对一些盛大的晚会进行转播。

（二）广播

由于实行中央和地方并举的方针，1957年以后地方广播事业有了很大的发展，新建了一批中等城市电台。1957年广播电台有61座，到1960年底，全国地方电台发展到135座。1961年在北京举行了第26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这也是首次在我国举行的世界性体育比赛，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第一次转播了九场比赛的实况。

在国民经济困难时期，广播电视适当减少了播音时间，强调精办节目，提高宣传质量。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于1961年停办了对少数民族广播节目，恢复和新办了一批知识性、趣味性和欣赏性的节目。据统计，1962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平均每天播音47小时50分钟，比1961年减少了13小时。地方电台也减少为84座，农村的有线广播站减少了一半左右。1964年以后又恢复与发展起来，并且先后建立了一批中波发射台，扩大了覆盖面积。对农村广播一直是广播工作的重点之一，在“面向农村为农民服务”的宗旨下，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地方台专门开办了为农民服务的科技节目与文艺节目。有28个地方电台开办了《农业科学技术》节目。

这一时期，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着重提高节目质量，强调办好重点节目，一批节目越办越好，受到全国听众的广泛欢迎。如《全国联播》、《新闻报摘》、《国际

时事》、《科学常识》、《在祖国各地》、《阅读与欣赏》、《小喇叭》。新闻性节目依旧是广播电台的主体节目，国际新闻的报道得到了加强，教育性、文艺性、服务性节目的分量有所加重，如节目预告、报时、天气预告等节目坚持办了下来。1965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共有4套节目，两套对国内广播的综合节目，一套文艺节目，一套对台湾的广播节目。到1966年底，我国对外的广播语言增加到33种，并且建立了向各语言节目统一提供国内国际专稿的独立的发稿部门。

四、新闻摄影与新闻纪录片

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报纸版面上的新闻照片很少，到了50年代后期，报纸上的新闻照片才多了起来。如《人民日报》在50年代初期，平均三块版才有两张照片，有74%的版面没有照片，即使刊登照片，尺寸也很小，多为一栏、一栏半宽。50年代末期《人民日报》的版面上照片多了起来，大了起来，逢到党的代表大会开幕闭幕等国家大事，经常刊登通栏、30行高的大照片。一般在头版至少有一张照片，有时多达三四张。1958年至1959年，随着国内“大跃进”运动的开展，报纸的照片数量激增，如《中国青年报》、《北京日报》、《河南日报》、《广西日报》四家报纸1959年平均每月刊用照片都在200幅到300幅之间。

1961年7月，《羊城晚报》在头版开辟了《一周视窗》，用三分之一的版面刊登照片，打破了定期照片专栏不上头版的传统习惯，为报纸增添了生气与特色。1957年，《解放日报》和《北京日报》在“双百方针”的激励下，刊登了少量的批评性照片，令广大读者耳目一新。可惜好景不长，随着反右派运动的发展，批评性照片立刻销声匿迹。

为了扩大图片宣传，全国各地开展了形式多样的摄影展览活动。与此同时，中国的摄影作品开始打入国际摄影界，屡次获奖。1958年9月，在匈牙利举行的社会主义国家新闻图片展览会上，陈勃摄的《雨越大干劲越足》荣获一等奖，这是建国以来我国在国际摄影舞台获得的第一枚奖牌。

不幸的是，生机勃勃的新闻摄影工作在反右等政治运动中也受到了冲击。一批有为的摄影工作者受到批判或撤职、降级等处分。新闻摄影的题材和内容日益狭窄，新闻照片的艺术性、趣味性被置于政治性之后，甚至被忽略。新闻摄影中“组织加工、摆布导演”的风气十分流行。当时新华社发稿的摄影照片中，有80%是经过摄影记者人为的加工与导演的。“政治挂帅，该摆就摆”、“事实为政治服务”的观点深刻地影响了摄影界的工作作风，新闻摄影的真实性原则遭到了严重破坏。在“大跃进”中，为了配合“放卫星”的宣传，一些地方的摄影记者

刻意作假，以达到以假乱真的效果，影响十分恶劣。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文化大革命”中，使中国的新闻摄影走进了死胡同。

随着摄影事业的发展，摄影画报也有了大的发展。1957年到1960年，新创刊的画报有16家。1961年前后，大批画报下马，除中央机关主办的《人民画报》、《解放军画报》、《民族画报》外，省级画报只有《新疆画报》一家。摄影杂志的出版工作也有所发展。1951年3月，中央新闻摄影局创办的《摄影工作》杂志仅出版6期就停刊了，在此后长达6年的时间里，摄影杂志出现空白。1957年4月，中国摄影学会编辑出版了双月刊《新闻摄影》，以介绍摄影作品为主，图文并茂，每期刊登照片三十余幅。1958年7月，《大众摄影》创刊，注重对大众的普及与提高，受到摄影爱好者的欢迎。

新闻纪录片作为记录时代的重要载体，在“大跃进”中也获得了发展。1958年有关部门在全国建立了31个电影制片厂生产新闻纪录片。1958年和1959年两年，新闻纪录片的产量相当于前8年的总和。到1962年前后，绝大多数制片厂下马。在全国上下的“大跃进”中，新闻纪录片的拍摄不可避免地也出现了浮夸现象。

1960年2月，文化部召开第一次全国新闻纪录电影工作会议，较多地讨论了拍摄中的真实性问题，强调了党的实事求是的原则，对制止浮夸与虚假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五、新闻教育与新闻学研究

（一）新闻教育

1958年以后，我国新闻教育事业有一个较大的发展，新创办了一批新闻教育单位。1958年6月，北京大学中文系新闻专业正式并入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壮大了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的教师队伍，该系发展成为我国新闻教育事业的一个重要基地。

1959年9月，北京广播学院成立，它的前身是1958年创办的北京广播专科学校，这是我国第一所培养广播电视各类专门人才的综合性高等学校。创办初期设有新闻、外语、无线电三个系，共11个专业。随后，湖南、福建、山东、上海、江西、吉林、广东、陕西等地也建立了广播学校。

复旦大学新闻系1961年曾招收过两名新闻史专业的研究生。这是当时惟一培养过新闻研究生的大学。

另外1958年至1960年还创办了一些新闻教育单位。如江西大学新闻系、杭州大学新闻系、南京大学中文系新闻专修科、广州暨南大学中文系新闻专业、吉

林大学中文系新闻专业、山东大学中文系新闻专业等。

1961年到1963年，新闻教育事业也进行了调整，许多新闻教育单位纷纷停办或停止招生，只有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复旦大学新闻系和北京广播学院继续开办并坚持一直招生，成为当时最重要的三个新闻教育基地。

（二）新闻学研究

这个时期我国的新闻研究也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但经过1957年的反右扩大化，进行自由的新闻学研究已经困难重重。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和复旦大学新闻系相继编写了一批新闻教材，涉及新闻理论、新闻事业史和新闻业务等方面。1959年中国人民大学出版了内部铅印教材《中国现代报刊史讲义》，这是我国第一部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的中国报刊史。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还编辑出版了一批新闻文集和文选，如《马克思恩格斯论报刊》、《列宁论报刊》、《中国报刊工作文集》、《批判资产阶级新闻学资料》、《外国新闻事业概况参考资料》等。复旦大学则编辑了《中国报刊研究文集》、《中国报刊通讯报告选》、《中国报刊评论文选》等书籍。

1959年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研究室编写的《五四时期期刊介绍》编辑出版，共三集，详细介绍了《新青年》、《每周评论》、《湘江评论》等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发挥重大历史作用的主要期刊及主要内容，并附有这些期刊每期所发表文章的完整目录。上海图书馆编辑的《辛亥革命时期期刊总目》也很有资料价值。

新闻单位也编辑出版了一些类似经验汇编的书刊，如新华社编辑出版了《新华社社论选》、《新华社评论选》、《我们的经验》等，人民日报著名记者田流写了《怎样写通讯报道》。

1957年12月1日，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创办了研究新闻学理论、交流新闻工作经验、探讨新闻业务的刊物《新闻战线》，该刊由人民日报社主办，是当时新闻学研究中的重要刊物，对全国的新闻工作都具有指导意义。该刊1960年7月与新华社的《新闻业务》合并，改名为《新闻业务》，由人民日报社、新华社和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共同主办。

（三）新闻学研究中的“左”倾错误

由于“左”倾错误的影响，新闻研究以及当时出版的书刊中，也不可避免地存在着“左”的错误观点，将“报纸是阶级斗争的工具”这一论点绝对化，而对其他正确的理论、观点进行盲目的批判。这就不能不提到1960年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的“学术批判运动”。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根据教学需要编写了六本讲义。1960年6月，一些思

想较“左”的学生，以这些讲义为“靶子”，掀起了一场揭批“修正主义和资产阶级新闻学”的运动。这些讲义中的基本观点大部分是阐发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观点，如“报纸是人民教科书”、“记者是社会活动家”，然而在极“左”思潮的影响下，一些教师和学生竟然认为这些观点是丧失阶级性的，认为说报纸具有“提供消息、传授知识、交流经验”的功能是修正主义新闻观，“报纸的真实性是新闻工作的根本原则”被扣上了“公然反对党性”的帽子；他们认为记者是党的驯服而又奋发有为的工具，而不是什么社会活动家。甚至连列宁的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报纸是“对群众进行经济教育的工具”等论点也被说成是“否认报纸是阶级斗争的工具”。这是当时新闻教育与新闻学研究中的一次严重的“左”倾错误事件。1961年，中宣部派出调查组到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进行调查，重新组织师生进行讨论，澄清了理论上的一些是与非，为受批判的教师和教材平了反。

第三节 从反右派斗争到“大跃进” 运动中的新闻事业

一、整风运动中的新闻事业

1956年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标志着社会主义制度在新中国已经建立起来。同年4月，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为我国发展科学、繁荣文学艺术的方针。1957年2月毛泽东在第十一次最高国务院扩大会议上作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报告；3月，毛泽东又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再次强调“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一个基本的、长期的方针。

当时参加全国宣传工作会议的有许多新闻界的同志，毛泽东专门召集新闻界的代表开了一次座谈会，着重谈了当时新闻工作中的若干重要问题。后来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记录稿，这次谈话整理为《同新闻出版界代表的谈话》于1982年发表。从发表的文章中我们可以看到，这次谈话涉及的内容非常多，如毛泽东讲“社会主义国家的报纸总比资本主义的报纸好，我们的报纸毒少，对人民有益”；如他专门针对《新民晚报》讲报上的文章“短些，短些，再短些”是对的，“软些，软些，再软些”要考虑一下。他还提出“在阶级消灭之前，不管通讯社或报纸的新闻，都有阶级性”，完全客观的报道是没有的。他还承认，在办报方面，共产党不如党外人士，现在是外行领导内行。

在谈话中毛泽东专门表扬了上海的《文汇报》，说“你们的报纸搞得活泼，

琴棋书画，花鸟虫鱼，应有尽有，我也爱看”^①。复刊不久的《文汇报》因其主要使命是团结知识分子，促进科学文化的繁荣发展，因而在宣传贯彻“双百”方针方面确实比较积极，作为“百家争鸣论坛”，以《电影的锣鼓》为开端，相继开展了尊师重道、马寅初的新人口论、出版工作问题、汉字改革问题的讨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然而在北京，大多数知识分子对于大鸣大放还有各种顾虑。1957年的4月10日，毛泽东召见《人民日报》总编辑邓拓，副总编辑胡绩伟等，严厉批评说，最高国务会议和宣传会议已经开过一个月，共产党的报纸没有声音，你们按兵不动，反而让非党的报纸拿去我们的旗帜整我们。过去说你们是书生办报，不对，应当说是死人办报。你们多半是同中央的方针唱反调，是抵触，反对中央的方针，不赞成中央的方针。^②

这次严厉的批评真实地反映了毛泽东对新闻传媒的看法。毛泽东一向认为新闻界的同志马克思主义修养不够，最易出修正主义。所以一方面，毛泽东把报纸作为实施“阳谋”、“引蛇出洞”和“钓大鱼”的工具，一方面又从新闻界开刀，最后钓上来的“大鱼”和“毒蛇”正是《文汇报》与《光明日报》两家。

（一）整风鸣放中的新闻界

1957年4月13日《人民日报》发表长篇社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等文章，全面地报道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以求能弥补“过失”。从1957年5月起，报纸把整风运动作为一项重大的中心工作来宣传报道。

整风运动开始后，自由“鸣放”的空气热烈起来，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也确实本着“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精神向中国共产党和当时的领导人提出了许多诚恳的意见，各报纸以大量的篇幅客观地报道了各种座谈会上的发言。随着“大鸣大放”的进一步开展，各种各样的声音逐渐混杂在一起，既有善意的批评，也有恶意的攻击，还有一些虽然言辞很尖锐、很逆耳却并非恶意的言论，报纸的编辑人员对于一些偏激的言论显然不知该如何处理。这时中共中央于5月14日和16日连续发出《关于报道党外人士对党政各方面工作批评的指示》，对各级党报的宣传报道方针作了具体的规定：（1）我们党员对党外人士的错误批评，特别是对于右派分子的言论，目前不要反驳，以便使他们畅所欲言，我们各地的报纸应该继续充分报道党外人士的言论，特别是对右倾分子、反共分子的言论，必须原样地、不加粉饰地报道出来，使群众明了他们的面目；（2）对少数有反共情绪

^① 徐铸成：《徐铸成回忆录》，263页，北京，三联书店，1998。

^② 参见顾行、成美：《邓拓传》，89页，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1991。

的人的带有煽动性的言论，应放手让他们发表，并且暂时不要反驳；（3）对于有关市场物价、外交政策和个别肃反案件的消息和言论必须加以领导和控制。

事实上整风运动开始后，毛泽东一直密切关注着在鸣放中出现的各种言论，他曾提醒中央的领导同志要注意看上海的《文汇报》、《解放日报》，北京的《光明日报》、《北京日报》，南京的《新华日报》等。面对众多意见中的过激、片面和错误言论，他认为这是右派分子对社会主义的进攻，应该予以反击。而在反击的方法上，他采取了诱敌深入的办法，要求中央及地方的党报“不登或少登正面意见，对资产阶级右派的猖狂进攻不予回击”，“让魍魅魍魉、牛鬼蛇神‘大鸣大放’，让毒草大长特长”，“等待时机成熟，实行反击”^①。

在“大鸣大放”运动中，表现较为突出和影响较大的是《文汇报》和《光明日报》。

《文汇报》是中共上海市委领导下的以知识分子为主要对象的报纸，不是党的机关报。当时的总编辑是老报人徐铸成。柯灵任副总编辑。此外还聘请了一些社外编委，如上海的周谷城、傅雷、舒新城、罗竹风、王中、陈虞孙等，北京则有夏衍、姚溱、罗列、臧克家、刘思慕、徐盈、彭子冈等。在“大鸣大放”中，《文汇报》大量刊登了各种批评意见，在编排处理上也比较突出，在文化教育界引起强烈反响。反右斗争中，《文汇报》成了被“钓”上来的大鱼，很多人被打成右派，成了政治运动的牺牲品。

《光明日报》当时是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共同主办的一张报纸，以统一战线和文教工作为报道重点。当时的社长由中国民主同盟副主席、农工民主党主席章伯钧兼任，总编辑是九三学社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储安平。作为一个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储安平在新中国成立前就以办《观察》杂志、大胆放言而享有一定声誉。1957年4月，他接任《光明日报》总编辑，正赶上“鸣放”，他派记者分赴九大城市，以《光明日报》的名义，邀请民主党派人士和高级知识分子座谈对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双百方针”以及“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看法与意见，并发表座谈纪录11次，共占了12个版，约13万字。在6月1日中共中央统战部召开的党外人士整风座谈会上，储安平大胆向中国共产党提意见，公然称党的统治为“党天下”，第二天《光明日报》竟全文发表了这篇文章，紧接着《文汇报》全文转载了该文。这自然引起了党中央的警觉，储安平为此遭到了严厉批判，成为这次运动中引出来的最大的“毒蛇”之一。

在报道整风的同时，新闻界也就自身的工作展开了“鸣放”。在当时有两件

^① 《〈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载《人民日报》，1957-07-01。

事影响很大：一是“左叶事件”，一是首都新闻工作者座谈会。

1957年4月17日，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伏罗希洛夫在刘少奇的陪同下参观农业展览会，由当时任农业部部长助理的左叶担任向导，并负责维持秩序。由于去的人较多，放进去的记者也多，因此在采访摄影时发生了拥挤，左叶由于重任在身，变得急躁起来，恰在此时中国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的摄影师韩德福拉了他一把，要他闪开点以便拍照，双方于是发生了争执，左叶出言不逊，引起各报记者反感。第二天，《中国青年报》在场参加摄影采访的记者洪克写了一篇题为《部长助理与摄影师》的小品文，不点名地批评了左叶。《文汇报》发表该报记者的北京专电《新闻记者的苦恼》，报道了这个事件，同时还专门配发了社论《尊重新闻工作者》，对左叶进行了较为尖刻的讽刺。《北京日报》、《光明日报》也报道了这件事，《北京日报》还举行了记者座谈会。当时《人民日报》还发表了《要学会尊重人》的文章和《官僚架子滚开》的诗，并配发了讽刺性的漫画。其他一些报刊也都发表了类似的文章。5月11日，新华社又发了通稿，使这件事的影响进一步扩大，并由此引发了全国新闻界关于新闻工作者地位和反官僚主义的大讨论。

中国新闻工作者第一次会议 1957年3月在北京召开，正式宣布成立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简称全国记协）。5月16日至18日，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研究部、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和北京大学中文系新闻专业联合在北京举行了第一次首都新闻工作者座谈会，二百多位新闻界人士参加了会议。与会者就当时新闻理论和新闻实际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各抒己见，“鸣放”的空气非常热烈。

一些学者、老记者尤其是非党报的编辑记者对于当时党报的现状深为不满，认为当时的中宣部根本不懂办报的一般规律，不讲究宣传艺术，也不重视宣传效果，把报纸办得像“布告牌”、“留声机”、“翻版书”。老报人张友鸾形象地说：报纸有两种姿态，一种是板起面孔正襟危坐的严师，一种是和颜悦色无话不谈的良友，严师有一位就行了，良友却是愈多愈好。复旦大学新闻系主任王中还认为，随着社会的变化，报纸的性质和作用也要有相应的变化。报纸是阶级斗争的宣传工具这种观点已经不适应形势，对于读者，报纸首先是借以获得知识和信息的出版物。读者花钱买报，我们要对得起人家的五分钱。有的与会者谈到了新闻自由与新闻体制，认为我国的新闻自由、言论自由及出版自由非常缺乏，主张多办几家通讯社，允许同人办报，不要党报一统天下。一些与会者还提出，旧中国的民营报纸在编辑、采访、写作、经营管理方面积累了许多经验，形成了很多好的传统，不应全盘否定，有选择地继承这些传统才能办好党报。

当然这次会议并非一边倒，很多人对于上述提到的问题也表达了不同的看法

和意见。

（二）新闻界的反右派斗争

在整风过程中，毛泽东一直认真地关注着新闻报道的动向，1957年6月8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组织力量反击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的党内指示，同一天《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这是为什么》，标志着大规模的反右运动正式开始。次日该报又发表了社论《要有积极的批评也要有正确的反批评》，阐明要对“大鸣大放”中那些错误的破坏性的批评进行反批评。

《人民日报》对于新闻界自身的反右派斗争起了主要的推动作用。14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文汇报在一个时期内的资产阶级方向》，将《文汇报》在“大鸣大放”期间的政治方向定义为“资产阶级方向”和“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方向”，并断定《文汇报》有一个“民盟右派系统”。由《人民日报》公开点名批判另一家报纸，这在全国还是第一次。时隔半月，7月1日，《人民日报》又发表了毛泽东亲自撰写的社论《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文章分析了《文汇报》、《光明日报》、《新民报》三家报纸的表现，认为《光明日报》经过几次批判会后，立场基本转过来了，“像一张社会主义的报纸了”；《新民报》认真改正错误，表现出对人民负责的态度；惟有《文汇报》仍在为自己的资产阶级方向辩护。《文汇报》不得不于6月16日发表自我检讨的社论《明确方向继续前进》，并召开座谈会，揭露自己“在整风运动期间所犯的资产阶级方向错误”，公开承认自己在整风运动期间确实成为了“章罗联盟向无产阶级猖狂进攻的喉舌”。由于反右派斗争，《文汇报》的销数从十多万份跌到两三万份，处境十分艰难。

与此同时《光明日报》也发表文章，检查自己所犯的错误，并揭发总编辑储安平の办报思想。上海《新民晚报》的社长兼总编辑赵超构也不得不检讨自己的资产阶级办报路线。《大公报》、《中国青年报》、《北京日报》也纷纷发表编辑部文章和社论，检讨自己在“鸣放”中的表现，自扣帽子，以求过关。

反右派斗争开始后，从6月24日到8月中旬，在北京又召开了第二次首都新闻工作者座谈会，有四百余人参加了会议，这次会议成为新闻界反右派斗争的一个阵地，重点批判了“新闻界的右派分子”，如《光明日报》社长章伯钧、总编辑储安平，《文汇报》的总编辑徐铸成、驻京办事处主任浦熙修，以及复旦大学新闻系主任王中等。而在第一次座谈会上发言的同志的一些观点也受到了批判。这些批判，大多无限上纲，无中生有，如王中被扣上了“资产阶级右派在人民新闻和文教事业中的代理人”的大帽子，说他的《新闻学原理大纲》是“反党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资产阶级的反动纲领”。陆诒、顾执中、陈铭德等人也受到了大大小小的批判，并都被划为右派分子。

7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对两次新闻工作者座谈会作了完全不同的评价,“一次否定,一次否定之否定”。8月14日《人民日报》又发表了《“左叶事件”报道失实》一文以及社论《对新闻工作的一个教训》,“左叶事件”被说成是“新闻界的右派分子向党的新闻事业发动进攻”,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8月15日《文汇报》也发表了《“左叶事件”的沉痛教训》。《中国青年报》文艺部主任吴一铨因为编发了《部长助理与摄影师》一文而被打成“右派分子”,含冤而死。一些仗义执言的同志被污蔑为受“资产阶级新闻观点”影响,想当“无冕之王”,搞特殊化,被迫一次次检讨。

新闻界的反右派斗争一直持续到1958年。据统计,从1957年6月至9月底,仅在《人民日报》点名批判的新闻界右派分子就达104人,其中不乏总编辑、副总编辑以及著名报人。到1958年2月,上海新闻界被错划为右派分子的达129人之多,其中《文汇报》社就有21人。^①在反右派斗争宣布取得胜利、进行总结的过程中,又在新闻界负责人中补划了右派,如中央广播事业局副局长温济泽因提出改进对外广播的意见,于1958年10月被补打成右派。

(三) 新闻界的教训

整风及反右派斗争的扩大化给建国后中国新闻事业的发展造成了极为严重的后果,“左”倾错误思想的抬头和急剧膨胀使“报纸是阶级斗争工具”的观点片面地得到发展,更为日后新闻界在“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中所犯下的错误埋下了隐患。

一大批有经验的新闻工作者被迫离开了自己热爱的新闻工作岗位,一些正直的新闻工作者的思想观念经过一番“洗礼”,不敢讲真话,人人自危。有的成了进行口诛笔伐的斗士,有的成了打棍子、扣帽子的专家,新闻事业内部的矛盾人为地进一步加剧。

以《人民日报》1956年改版为代表的新闻改革在反右斗争扩大化的过程中也半途而废,一些有益的、积极的建议和探索被当做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想遭到了批判,新闻改革以来初步形成的生动活泼的面貌被“大鸣大放”、“大辩论”等形式所代替,报纸变成了群众大规模阶级斗争的舆论阵地,越来越脱离群众,其固有的其他功能日渐萎缩。

二、“大跃进”与新闻宣传

和政治上的混乱相比,1957年我国在经济建设方面取得了超额完成第一个

^① 参见马光仁:《上海当代新闻史》,195页,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

五年计划的好形势。在这种形势下，党内“左”倾冒进思想进一步发展，将反冒进看成是右倾保守的体现，忽视一般经济规律、急于求成的心理占了上风，很快导致了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特征的“大跃进”运动。

（一）新闻事业与全国“大跃进”

新闻媒介的宣传对于“大跃进”运动的开展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早在1957年10月11日《人民日报》的社论中就提出，我国的农业生产要在五年内赶上和超过富裕中农的生产水平，并称之为一个“大跃进”。

1958年元旦，《人民日报》发表了受到毛主席表扬的社论《乘风破浪》，其中指出：“我们要在15年左右的时间内，在钢铁和其它重要工业产品产量方面赶上和超过英国”，“再用20年到30年的时间在经济上赶上并且超过美国”。“超英赶美”的高指标便成为“大跃进”的战略任务。

2月2日《人民日报》的社论又宣称：“我们国家现在正面临着一个全国大跃进的新形势，工业建设和工业生产要大跃进，农业生产要大跃进，文教卫生事业也要大跃进。”

1958年5月，中共八大二次会议正式提出“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全国各条战线的“大跃进”形势一发不可挡，各新闻单位开始大张旗鼓地宣传总路线，宣传“大跃进”。

“大跃进”时期的宣传主要体现在农业生产宣传中的“浮夸风”与工业生产中的“瞎指挥”。所谓“浮夸风”是指大放农业生产的高产“卫星”。1958年6月7日，新华社郑州分社播发了一条消息《惊人的高产卫星》。第二天《人民日报》在头版居中一个并不显眼的位置刊登了这条消息，标题显然是经过编辑加工的：《卫星社坐上了卫星五亩小麦亩产2105斤》。这条新闻的主角是河南遂平县的卫星农业社。没过几天，河南西平县又爆出了小麦亩产7320斤的大卫星。《人民日报》7月12日的头版头条再次报道了这条假新闻。从此以后全国掀起了“卫星”攀比的浪潮。粮食的亩产最高纪录不断地被刷新，不出半个月，水稻的亩产量已达到几万斤。诸如此类的假报道在全国各地的报刊上可以信手拈来。这些报道明显违反基本的生产常识，而且没有经过调查研究，极大地损害了报纸的形象。

1958年8月，中共中央决定1958年生产钢1070万吨，比1957年翻一番。为了实现这个高指标，当时新闻单位开始大规模地宣传“以钢为纲”和全民炼钢运动。在全民大炼钢铁的基础上，报纸上又开始大放钢铁“卫星”。《破釜沉舟全力以赴，九月破万吨，十月过两万，河北力争生铁扶摇直上》、《首都钢铁星期日，城里城外一片红，七十万人大炼钢》等醒目的标题刊登在报纸上最显眼的位

置。一些报纸还开设了大炼钢铁的“各省进度表”，大家你追我赶，惟恐落后于人，因此只好大搞虚夸。《人民日报》开辟了《比一比》专栏，发表各省的计划数字与实际完成情况，这个专栏无疑给各地也造成很大的压力。到1958年年底，各新闻单位报道说，1 070万吨的钢的生产任务已经胜利完成，而实际上，土法炼钢导致了大量的废铁废钢。

1958年8月，毛泽东视察河北、河南、山东等地，发出“办人民公社好”的指示，同月，在北戴河会议上做出了《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人民公社化运动在全国迅速展开。8月18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人民公社好》的报道，肯定了人民公社有十大优越性，声称“一个由社会主义迈向共产主义的伟大社会改革——建立人民公社的运动，正在河南信阳地区蓬蓬勃勃地展开”。随后各新闻单位围绕这些精神立即展开大力宣传，刮起了一股“共产风”。从报纸上看，共产主义在我国实现确实如中央所说，“已经不是什么遥远将来的事情了”。

与此同时，在理论宣传上，当时的报纸错误地宣传了“唯意志论”，即片面地强调人的主观能动作用，而否认客观条件。“不怕做不到，只怕想不到，只要能想到，一定能做到”；“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等唯心主义色彩浓厚的口号和句子在报刊中随处可见。

当时一些领导者一手拿着高指标，一手拿着右倾的帽子，逼着新闻工作者虚报浮夸。所以有“右倾帽压出高指标”的说法。有的新闻工作者在采访报道中了解到真实的情况，反映了真实的情况，往往被扣上“右倾分子”、“反对三面红旗”的大帽子，轻则受到不公正的待遇，重则家破人亡。

在党报的宣传史上，1958年是极不寻常的一年，大多数的记者头脑发热，满怀着革命浪漫主义的精神认真办报，犯了大错。

（二）新闻事业的“大跃进”

在全国各行各业“大跃进”的形势下，新闻界自然也无法脱离这种环境的影响，也开展了“大跃进”运动。先是制定了“跃进规划”，继而“挑战应战”、“开展评比”。

1958年2月27日，人民日报社举行了动员大会，宣布了《苦战三年工作纲要（草案）》。这个纲要提出的口号是：苦战三月，使报纸面貌焕然一新，苦战三年，使报社面目大大改观。在动员大会后，报社内部开展了热火朝天的群众运动，部门和个人都制定了跃进规划，开展了各种形式的挑战与竞赛活动。报社成

立了报纸研究组，天天评报插红旗，评出好新闻、好标题、好版面、好评论。^①在中央党报的带动下，各省市党报也出现了“大跃进”的局面。这其中以《山西日报》最为突出。各省党报纷纷应战，在新闻界掀起了相互竞赛的热潮。

同年三月，新华社总社也召开国内分社会议，提出新华社国内部苦战三年的工作计划。此后新华社召开了一系列的会议，进一步提出要把新华社建成无产阶级的、以东方新闻为权威的世界级通讯社，并且将苦战三年的计划提前到1958年内完成。

中央广播事业局也于1958年4月召开了第五次全国广播工作会议，制定了广播工作“大跃进”的方针，制定了《苦战三年的工作纲要》，要多快好省地办节目、办事业。在“大跃进”的形势下，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节目从每天的11次增加到每天15次。现场广播大会成为当时经常运用的一种形式。许多广播电台十几天甚至几天就召开一次现场广播大会，听众动辄几百万甚至上千万，造成了极大的人力和物力的浪费，山西省广播电台曾在8个月之内召开了36次现场广播大会，创下了历史纪录。

新闻界的“大跃进”本身并非全无益处，广大的新闻工作者凭着满腔的热情也创造出了一些可贵的经验。比如《山西日报》在向全国省级党报的挑战书中提出“比评论”、“比标题”、“比副刊”、“比花色品种”、“比改进文风”、“比经营管理”等都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许多报社各部门之间开展了竞赛和评比活动，客观上促进了新闻业务的改进，那个时期的版面确实比较生动活泼，标题、图片、图表都运用得很好。

（三）深刻的教训

1960年冬，党中央开始纠正“左”倾错误，“大跃进”运动及有关的宣传报道才停止。

经过“大跃进”运动，新闻工作者对新闻真实性原则的重要性有了新的认识。在“大跃进”中报刊上出现了无数的假新闻，大多数新闻工作者都违反了新闻真实性的原则。这固然和当时不正常的政治环境有关，有着特定的社会历史原因，但这并不能成为借口来逃避对自我的反思。

1958年秋天，毛泽东到河北、河南等地农村视察，看到了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带来的许多混乱现象，受到了很大触动，开始采取措施来纠正“大跃进”运动中的错误。在这一时期毛泽东也对新闻界做过几次重要的指

^① 参见聂眉初：《头脑发热的日子》，见《人民日报回忆录》，146页，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1988。

示。1958年11月，他曾强调：“做报纸工作的，做记者工作的，对遇到的问题要有分析，要有正确的看法，正确的态度。”他要求记者要到下面去，不能人家说什么，你就反映什么，要有冷静的头脑，要作比较。他特别告诫“记者的头脑要冷静，要独立思考，不要人云亦云”。1959年6月，毛泽东看了新华社关于广东水灾的内部参考材料，在上面批示：“广东大雨，要如实公开报道。全国灾情，照样公开报道，唤起人民全力抗争。一点也不要隐瞒。政府救济，人民生产自救，要大力报道提倡。工业方面重大事故灾害，也要报道，讲究对策。”^①

根据毛泽东的指示，新华社、人民日报社等新闻单位开始对“大跃进”的宣传报道进行降温，反省“大跃进”运动中的错误，并试图着手改进。但实际上在当时从中央到地方，相当多的领导并没有真正意识到党的思想路线上的“左”的错误的严重性。

1959年8月召开的庐山会议本来是准备反“左”的，但当彭德怀、周小舟、黄克诚、张闻天等对“大跃进”提出一些意见、表达真实的看法时，立即遭到毛泽东的坚决抵制，并对彭德怀等人进行了无情的批判，随后又以此为由在全党展开了新一轮的反右倾斗争。新闻界也不得不从反“左”转为批右，开始对所谓的“右倾机会主义”进行批判。刚刚降温的浮夸报道又开始抬头。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三年经济困难时期。

1961年，刘少奇在一次总结谈话中指出几年来新闻宣传工作的错误是：在宣传生产建设成就方面的浮夸风；在推广先进经验方面的瞎指挥风；在政策宣传和理论宣传方面的片面性。刘少奇还指出，“大跃进”的错误报道，中央负一半的责任，《人民日报》也要负一半的责任。《人民日报》搞了那么多错误的东西，影响很坏，可以说有报纸的害处，比没有报纸的害处还大。刘少奇的批评虽然严厉了一些，但依旧没有能够敲醒一些人的心灵。

第四节 60年代初期新闻工作的主要经验和教训

一、新闻宣传中“左”倾错误的发展

1962年，毛泽东在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发出了“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号召，强调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以阶级斗争为纲”成为主导意识形态领域的准则，意识形态领域中正常的学术讨论又被火药味十足的政治批判所代替。在这次会议上李建彤的长篇小说《刘志丹》被康生等人诬为“为

^① 《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214页。

高岗翻案的反党大毒草”，毛泽东为此专门指出：“利用写小说搞反党活动是一大发明。凡是要想推翻一个政权，首先是制造舆论，搞意识形态，搞上层建筑。革命如此，反革命也如此。”^① 这部小说当时还是征求意见的样本，只有一部分在《工人日报》曾经连载，结果与之有关的编辑都受到审查，报社的党组也多次进行检查却不能过关。

1963年5月，《文汇报》开始批判孟超创作的昆曲《李慧娘》和廖沫沙在《北京晚报》发表的肯定此戏的评论文章《有鬼无害论》，全国上下遂开始大批“鬼戏”，孟超、廖沫沙被批判为利用厉鬼“向共产党复仇”。第二年，毛泽东肯定了这一批判，而且还批评《人民日报》一直对宣传“有鬼无害论”不作交代。

1964年，毛泽东批评各文艺协会和他们所掌握的刊物大多数都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1964年8月，毛泽东在《中央宣传部关于公开放映和批判影片〈北国江南〉〈早春二月〉的报告》上批示：可能不只这两部影片，还有别的都需要批判，使修正主义材料公布于众。全国的报刊开始批判一些颇有影响的、融思想性艺术性于一体的优秀电影，如《不夜城》、《林家铺子》、《舞台姐妹》、《红日》、《兵临城下》，达10部之多。

这年的下半年，报刊开辟了大批判阵地，在历史学方面展开了对李秀成评价的讨论，批判了翦伯赞、吴晗的“非阶级观点”；在哲学方面则开展了对杨献珍的“合二为一”论的批判；在美学方面批判了周谷城的“时代精神汇合论”，在经济领域批判了孙冶方的价值规律。这种批判几乎波及所有的文学艺术与社会科学领域，动辄将学术观点的讨论提高到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斗争上来。

上海的《文汇报》于1965年11月11日突然抛出了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这枚“重磅炸弹”，从而使新闻宣传中的“左”倾错误不可抑制地向前发展，并在“文化大革命”中达到了顶点。

1959年4月，毛泽东在不同场合提出要学习海瑞精神，时代需要直言敢谏、刚正不阿的忠臣。6月，明史专家吴晗应胡乔木之约，根据毛泽东的精神为《人民日报》写了《海瑞骂皇帝》一文，发表于6月16日的《读书札记》栏目。这都发生在庐山会议之前。庐山会议之后，胡乔木又约吴晗为《人民日报》再写一篇关于海瑞的文章，这便是9月21日发表的《论海瑞》一文。同年北京京剧团请吴晗写一部关于海瑞的戏。吴晗于1960年底将剧本写成，初名《海瑞》，后接受别人的意见改为《海瑞罢官》，1961年正式演出。这出戏公演以后，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得到观众的好评。毛泽东看了《海瑞罢官》的戏后也很喜欢。

^①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注释本》（修订），36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

然而江青等人为了实现个人的野心，多次向毛泽东指出，《海瑞罢官》是替彭德怀翻案，有严重的政治问题，毛泽东接受了这种观点，默许江青组织人写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1965年江青跑到上海，与张春桥、姚文元合谋，由姚文元执笔写了《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经毛主席亲自审定后于11月在上海《文汇报》发表。当时北京的报刊因为搞不清楚这篇文章的来历，而且对于如此突然公开点名批判一名北京市的副市长感到不可思议，都拿不准要不要立即转载。由于这篇文章的出台事先并没有告知主持工作的中央领导人刘少奇和周恩来，中央书记处的同志也没有想到文章有什么大的来头，因而当各大报纸请示要不要转载时，他们认为此文并不代表中央的意见，可以不转载。

11月下旬，毛泽东看到北京没有什么报纸转载姚文，就命令上海把此文印成小册子向全国发行，上海新华书店急电全国的新华书店征求订数。在北京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领导这才告知北京各大报纸迅速转载“姚文”。这时距《文汇报》发表该文已有二十多天。

《人民日报》将此文转载时放在了《学术研究》版，表明了编辑部依然希望能将这个问题限定在学术争鸣的范围。当时还专门配发了编者按，明确指出：“对海瑞和《海瑞罢官》的评价，实际上牵涉到如何对待历史人物和历史剧的问题，用什么样的观点来研究历史和怎样用艺术形式来反映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的问题。我们的方针是，既允许批评的自由，也允许反批评的自由；对于错误的意见，我们也采取说理的方法，实事求是，以理服人。”^①北京的许多家报社以此为方针，在刊登姚文元文章之后，相继发表了许多不同观点的学术文章，其中包括邓拓以向阳生为笔名发表的《从海瑞罢官到道德继承论》、中宣部副部长周扬主持写作的《〈海瑞罢官〉代表一种什么社会思潮》等文章。《人民日报》为了表示自己的倾向，在刊登各种稿件时，还特意将拥护姚文元观点的文章排在最重要的位置，而且尽量少刊登对姚文持反对意见的文章。后来还发表了吴晗写的《关于〈海瑞罢官〉的自我批评》。但“姚文”显然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因而无论《人民日报》及首都多家报纸怎样努力，也无力挽回大局。

林彪在这个时期还通过报刊大造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正是他在1961年提出“解放军报应当经常刊登毛主席的有关语录”。从那年的5月1日起，《解放军报》开始摘登毛泽东语录，这也是在报刊上突出宣传毛泽东的开端。1964年3月，林彪再次指示《解放军报》：“要尽量使用党中央、毛主席提出的全国性的语言，如果来稿没有这种语言，编辑部审稿时要加上去。”另外《红旗》杂志从

^① 《人民日报》，1965-11-30。

1960年11月起，对毛泽东等革命领袖的引文开始使用黑体字，以和正文区别开来，各报纷纷仿效。

对于这些蓄意制造个人崇拜的行为，刘少奇、邓小平以及中宣部的一些同志是有所警觉的，并曾努力加以控制，对于全国各地学习毛泽东著作的活动中存在的简单化、庸俗化和形式主义的倾向也极力进行了纠正。1964年刘少奇指出，现在学大庆、学毛选、学解放军都有形式主义，并批评了新闻宣传中的形式主义，说《人民日报》发表的典型太多，太多了就有可能出现虚假。邓小平也曾指出，典型宣传不要太集中，对典型也要作全面评价。直到1966年2月，吴冷西还向宣传部门传达，中央对林彪提出的“毛泽东思想是当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顶峰，是最高最活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一提法有不同的意见，主张宣传毛泽东思想不要起哄，不要庸俗化、简单化，不要搞形式主义。^①然而以后的事实证明，“左”倾路线的发展在当时就像一匹脱缰的野马，已经不是个别人可以控制的。

二、大兴调查研究之风

1960年底到1961年，毛泽东主席在中央工作会议和八届九中全会上号召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一切从实际出发，让1961年成为实事求是年。

1961年的4、5月份，刘少奇同志深入湖南基层进行调查，先后两次对新闻宣传工作做出重要的指示。他提出记者在大跃进中所犯的错误也有组织上的原因，服从党委领导，依赖党委办报，自己不做调查研究，不敢反映问题也不敢提出意见，他强调新闻工作者要把坚持原则性与坚持纪律性结合起来，一方面要服从党委领导，要坚持纪律性，一方面也要敢于向党委反映问题，提出意见，要坚持原则性。这些都是针对“大跃进”以来新闻工作中存在的严重问题提出来的十分中肯的意见。

根据中央的精神，新闻界进行了关于加强调查研究的宣传报道。当时新闻工作者进行调查研究的方法主要有以下几种：一是蹲点，也叫建立基点，也就是平常我们所说的“解剖麻雀”的方法；二是点面结合，在分析比较的前提下以点带面；三是专题调查，即带着一个或多个问题深入基层进行专门的、有针对性的调查。

应该说在经过“大跃进”那样荒唐的新闻宣传之后，深入实际调查研究让许多记者的头脑变得冷静了，他们开始独立思考问题，不再人云亦云，工作作风也

^① 参见童兵：《主体与喉舌——共和国新闻传播轨迹审视》，101—102页，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

发生了改变，看问题不再绝对化，写文章注意留有余地。报纸上实事求是的报道多了起来，还出现了一些有影响的经得起时间考验的好的新闻报道。

三、全党办报、群众办报

1958年1月12日，毛泽东写了《给刘建勋、韦国清的信》，信中强调“省报问题是一个极重要问题，值得认真研究”，“一张省报，对于全省工作，全体人民，有极大的组织、鼓舞、激励、批判、推动作用”；“精心写作社论是一项极重要任务，你们自己、宣传部长、秘书长、报社总编辑，要共同研究。第一书记挂帅，动手修改一些最重要的社论，是必要的”。这封信的发表，给党报赋予了新的作用与任务，对全党办报提出了新的要求，也掀起了一个全党办报的新的热潮。

1月15日，毛泽东在和当时的新华社社长、人民日报社社长吴冷西谈话中强调，评论“要组织大家写，少数人写不行”，“各部门，各版可以竞赛”，“报社的人应该经常到下边去，下去又做工作，又当记者”^①。

毛泽东的指示传达后，各省委第一书记和省委普遍加强了对省委机关报的领导，许多省的第一书记挂帅，撰写文章，发表讲话，论述党的方针政策以及新闻工作的问题，给新闻工作以重要指导，抓党报的宣传方向，抓社论，抓新闻干部的培养，使党报置于党委的绝对领导之下。有的党委书记甚至亲自到报社办公，一起制定宣传计划、值夜班。许多省委书记亲自抓报纸工作，总结全党的办报经验。

在各级党委的领导下，各地广泛建立和加强了通讯组织，党委通讯组大面积地发展起来，成为有影响的一种通讯形式。

很多新闻单位在贯彻全党办报、群众办报方面进行了有益的尝试。《人民日报》1960年曾同《河北日报》、《解放日报》、《云南日报》等地方报纸的编辑合作，共同写作一些论述地方重要典型经验的评论。《西藏日报》也曾向全国的党报发出电报和信件，请求帮助该报编辑《兄弟省（区）介绍》的专页，结果得到了许多省（区）报纸的积极响应。《解放军报》则形成了全军办报的局面，1962年共收到部队来稿来信近20万件，采用了8000多件，其中头版头条和重要文章达1500多件。来稿的作者从将军到士兵达5000多人。

^① 《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202～204页。

四、先进典型的宣传与报道

宣传先进典型在 20 世纪 60 年代成为新闻宣传报道的主要成绩，关于雷锋、大庆、大寨和焦裕禄的报道，在全国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中国青年报》1960 年 2 月 28 日在头版用整版的篇幅发表了该报记者写的通讯《为了六十一个阶级弟兄》，并配发社论《又一曲共产主义的凯歌》，生动地报道了山西平陆 61 名筑路民工因食物中毒生命垂危时，得到首都军民和当地干部群众全力支援而及时获救的事件，宣传了在社会主义的大家庭中“一人有事，万人相助；一处困难，八方支援”的共产主义精神。次日，《人民日报》全文转载了通讯与社论，并加了编者按予以高度赞扬。接着全国多家报纸和刊物纷纷转载，还据此排成戏，拍成电影，广泛传播。

1960 年 5 月至 6 月间，新华社报道了我国登山队第一次从北坡胜利登上珠穆朗玛峰的辉煌事迹。《人民日报》发表了新华社记者郭超人写的长篇连载通讯《红旗插上了珠穆朗玛峰》和《珠穆朗玛山中的日日夜夜》，报道了登山队不畏艰险勇攀高峰的英雄气概。

从 1963 年起，对于雷锋的宣传报道是这一时期规模最大、影响最大的关于先进人物典型的新闻报道。在雷锋因公殉职后，《辽宁日报》立即开始突出宣传雷锋的先进事迹，《人民日报》于 1963 年 2 月 7 日发表了通讯《毛主席的好战士——雷锋》以及《雷锋日记摘抄》，新华社为此发了通稿。《中国青年报》自 1963 年 3 月至同年 10 月，关于雷锋的宣传达 50 多万字，占这个时期报纸版面的十分之一，可见规模之大。《中国青年》3 月出版学习雷锋的专辑时发表了毛泽东的题词：“向雷锋同志学习”。《人民日报》3 月 5 日在头版发表了这个题词。雷锋事迹的集中大力宣传，使得雷锋精神深入人心，整整影响了一代人的精神世界。

焦裕禄是 20 世纪 60 年代中期新闻报道中另一个影响深远的先进人物。《人民日报》1966 年 2 月 7 日发表新华社记者穆青、冯健、周原采写的通讯《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报道了河南兰考县委书记焦裕禄的感人事迹。这篇几经修改、饱含深情完成的经典通讯不仅感动了成千上万的读者，在中国新闻通讯的写作史上也占有重要的地位。

毛泽东主席 1964 年号召“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以后，全国的新闻单位进一步大力宣传了这两个重要的先进集体典型。《人民日报》记者袁木、范荣康合写的通讯《大庆精神大庆人》是报道大庆的优秀代表作，以“铁人”王进喜为代表的大庆人所体现出来的爱国主义情操，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热情以及无私忘我的奉献精神成为全国各行各业学习的典范。新华社记者莎

荫、范银怀采写的《大寨之路》是报道大寨的代表作之一。

五、杂文的大发展

杂文从“五四”时期以来就是我国报刊的重要文体之一。以鲁迅为代表，我国的报刊杂文在30、40年代曾经达到很高的水准，深受广大读者的欢迎。60年代初期，我国的报刊出现了又一批有影响的杂文专栏和优秀的报刊杂文家。

《燕山夜话》是《北京晚报》1961年3月19日在副刊《五色土》上开辟的一个杂文专栏，由著名报人邓拓执笔，每星期二、四刊登两次，署名马南邨。到1962年9月2日结束时，共发表杂文152篇。这个专栏题材十分广泛，作者旁征博引，议论横生，将知识和思想熔于一炉，写得引人入胜，发人深省，以深刻的思想、丰富的知识和特有的文采赢得了群众的喜爱，不久结集成书出版，当时共计印行30万册之多，广为流传。邓拓写这些杂文时刚刚48岁，正是一个政论家与史学家的黄金时代，虽是短短千字的文章却将其广博的知识、丰富的实践经验、高深的理论修养、精湛的写作技巧融为一体，是真正的厚积薄发。

《三家村札记》是北京市委理论刊物《前线》半月刊从1961年第19期起开辟的一个杂文专栏，到1964年第13期止，共发表杂文67篇。这个专栏由邓拓发起，由他和吴晗、廖沫沙三人负责执笔，故名“三家村”，他们起了一个共用的笔名“吴南星”，三人轮流执笔，每篇千字左右，文责自负，内容也互不干涉，自由选题。执笔人若因故写不出时也可请他人代笔，所以其中有5篇是由其他作者代劳的。

《长短录》是《人民日报》1962年5月4日在副刊上开辟的一个杂文专栏，到同年12月8日止，共发表杂文37篇，主要作者是夏衍、吴晗、孟超、廖沫沙和唐弢五位杂文作家。专栏主持人是人民日报文艺部的陈笑雨。

以上三个报刊的杂文专栏在当时都十分有影响，办得有声有色，针砭时弊不遗余力，谈古论今包罗万象，深受读者的喜爱。不幸的是，后来在“文化大革命”中他们都成为重点被批判的对象，邓拓、吴晗等人还为此付出了生命。

第五节 主要新闻思想评价

从1957年反右到文化大革命爆发前，对新闻事业发展产生影响的新闻思想主要来自当时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人。毛泽东同志从战争年代开始就关心党的新闻事业的发展，不但亲自为报纸写评论、消息，而且对党报的发展提出过许多精辟的指导理论。在这10年中，从党的新闻政策的制定到新闻报道的导向，毛泽

东都亲自参与，他的新闻思想发生的各种变化无一不影响着中国新闻事业的走向。刘少奇作为当时主管新闻宣传的主要领导人，也多次对新闻宣传中存在的问题发表意见，他的思想也是党的新闻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邓拓 20 世纪 30 年代起投身党的新闻事业，作为著名的记者、报刊政论家、杂文家，以及党报《人民日报》的总编辑，在长期的新闻实践中，也初步形成了自己的新闻思想。他们的新闻思想从不同的层次构筑了当时中国新闻思想的大厦。

一、解放后毛泽东新闻思想评价

一般认为毛泽东的新闻思想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解放后，作为中国共产党的领袖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领导核心，同时作为中国新闻事业的掌舵者和意识形态领域的权威领导人，毛泽东有了更广阔的空间架构自己的新闻理论体系。

毛泽东认为报纸属于意识形态，是一种上层建筑，是一定社会经济基础通过新闻手段的反映，在社会主义国家，报纸是社会主义经济即公有制基础上的计划经济通过新闻手段的反映，无论是在社会主义国家还是资本主义国家，通讯社、报纸和广播电台都毫无疑问地具有阶级性，是为一定阶级的利益服务。因而报刊是革命的手段，是阶级斗争的工具，它能够使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最迅速最广泛地同群众见面。

在办报方面，毛泽东一贯主张全党办报和群众办报，而不是少数人关起门来办报。同时毛泽东一向重视宣传的策略与艺术，强调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要有实事求是的态度，他还身体力行倡导生动活泼新鲜有力的文风和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与中国气派。这些思想结合中国的国情，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新闻思想，奠定了我国新闻工作的理论基石。

由于种种原因，毛泽东的新闻思想在建国以后背离了马克思主义的方向，发展出一些致命的错误，严重干扰了中国新闻事业的健康发展，在一定时期内还造成了相当的历史悲剧。正如我们前面所提及的 1957 年反右和“大跃进”，对国家和人民都造成了不可挽回的损失，新闻事业也损失惨重。这一切与毛泽东过分强调报纸是阶级斗争工具是分不开的。同时他片面对待社会主义时期的新闻自由，夸大思想文化领域的阶级斗争，将争取新闻自由看做是“秀才造反”、修正主义。他还常常用“舆论一律”和“舆论不一律”来概括社会主义的新闻自由。所谓舆论一律是对反动派的报纸而言，他主张剥夺反动派的自由，体现了人民在工人阶级和共产党的领导下对反革命的专政；而在人民内部则要实行舆论不一律，给人民批评的自由，允许人民发表各种不同的意见，即贯彻“百花齐放”和“百家争

鸣”的方针。但遗憾的是“百花齐放”和“百家争鸣”最后都变成了一花独放与一家争鸣。

二、刘少奇的新闻思想评价

作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分管新闻工作的领导人，刘少奇曾对新华社、广播事业局以及人民日报社的工作做过许多重要的指示，是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新闻学的重大发展，可以看做对毛泽东新闻思想的重要补充。1961年5月，刘少奇曾对《人民日报》进行了严厉的批评，提出有时“有报纸的害处比没有报纸的害处还大”。刘少奇充分认识到当时在报纸宣传中存在的危险性，在承认报纸联系党和人民群众的重要作用的同时，认为报纸如果给群众以错误的东西，散布错误的思想、理论、政策，把群众中的消极因素、落后因素、破坏因素鼓动起来，就会犯大错误，报纸的宣传不一定总是能起到好的作用。

刘少奇也十分看重调查研究，他多次强调报纸工作人员就是调查研究的专门工作人员，报上的一切文章都应该是调查研究的结果。他对于报纸宣传中存在的表面现象、形式主义、耸人听闻的报道深恶痛绝，认为这是受资产阶级新闻观点的影响。他还说：报纸是阶级斗争最尖锐的工具，几年来报纸在敌我界限方面分得比较清楚，有敌我观念，但是非界限方面就分不清楚，是非不分，什么是不正确的，不应该宣传，还搞不清楚。这些话语是对当时新闻宣传实践的科学总结与归纳，一针见血、一语中的，其深度与广度都远远超过了同时代的人，即使今天对我们的现实仍然有着指导意义。可惜他的这些思想在当时极“左”思潮的影响下根本无法得到贯彻实施，在“文化大革命”中更遭到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恶意攻击，被全盘否定。

三、邓拓新闻思想研究

邓拓1937年起进入革命根据地，从事党的报刊工作并长期担任主要的负责人。1949年起担任《人民日报》总编辑、社长，他亲自主持了1956年《人民日报》的改版工作，在《人民日报》的示范下，全国的新闻事业曾经呈现出欣欣向荣的局面。1957年邓拓当选为全国记协主席，因在宣传报道中跟不上毛泽东的步伐而被批评，1958年他改任中共北京市委分管文教的副书记，负责主编理论刊物《前线》杂志，并为《北京晚报》开辟《燕山夜话》的专栏，撰写知识性杂文，深受读者喜爱。他所写的新闻理论的文章，主要收集在《邓拓文集》第1卷，约有15篇。

邓拓最重视的是报纸的社论工作，在他主持《人民日报》工作期间，社论形成了每月平均篇幅逐年增长的趋势：1948年平均每月8篇，1950年为11篇，1952年为14篇，1954年为22篇，随后则是每天都有社论了。邓拓认为：“一篇社论是一期报纸的旗帜，其他形式的评论文章也都代表报纸的政治见解，因此报纸的评论工作应当看成是思想工作的主要表现形式之一。”^①在担任《人民日报》总编辑的8年间，他亲自撰写或修改的社论和评论，仅经毛泽东审阅的就有46篇，经周恩来审阅的有153篇。

同时邓拓也很重视报纸的理论宣传，提出报纸应当“经常地就党和国家的总任务和实际生活的各项问题，进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解释”。他还强调理论宣传“要从实际出发，以解决实际问题为目的，力戒教条主义倾向，不必要的大量引证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和随便创造不成熟的理论的现象必须停止”^②。

邓拓对办报的任务与目的也有着独特的见解，他认为全国性报纸与地方性报纸是有区别的。全国性报纸的责任是全面地反映全国建设工作的成就，解释全国性的问题与任务，从全国的观点出发并照顾到各地方的特殊条件来反映地方生活，解释地方的成就与经验，并把它们普及到全国去。全国性报纸还负有解释中国的国际状况和中国政府的外交政策、保卫世界和平的任务。而地方报纸应当以大部分的篇幅来发表地方的材料，国内和国际新闻所占的篇幅不应超过二分之一。地方报纸应当从地方的实际情况出发，并按照地方的实际需求发其他地区的经验与材料。

对于群众办报与全党办报的方针，邓拓也非常赞同。他认为我们的党报不同于资产阶级报纸的基本特点就是我们不仅有专业记者，还有与群众关系密切的非专业记者。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用群众的形式表现群众的内容就是全党办报的核心。

邓拓十分重视改进新闻报道，认为报纸上的长篇大论不是新闻，千篇一律枯燥无味的新闻也必须改革。他提出：“新闻必须用事实说话，必须选择全国人民有共同兴趣的事实，必须报道刚刚发生的事实，必须写活的人与人的活动，必须对稿件进行认真检查，保证事实的准确。缺乏以上条件的就不叫做新闻。”邓拓的一生笔耕不止，写了大量的杂文和许多优秀的新闻报道，他亲身实践了他所倡导的“简明的科学的生动的文风”，为我们留下了许多脍炙人口的文章。

毛泽东曾经批评过邓拓在整风期间的表现是“书生办报”、“死人办报”，而

① 《邓拓文集》，第1卷，289页，北京，北京出版社，1986。

② 《邓拓文集》，第1卷，261～263页。

不是“政治家办报”。这样的批评在当时给了邓拓非常大的工作压力，但这并没有妨碍其在进行新闻宣传时保持清醒的头脑，他从不盲目跟风，也很少凑热闹，虽然看起来显得四平八稳，政治敏感不够，但后来的事实证明他当时的选择是正确的。

【学习思考题】

1. 1957 年至 1966 年中国新闻事业发展变化有哪些主要特点？请解释这些特点形成的原因。
2. 通过了解“左叶事件”以及《光明日报》、《文汇报》在整风运动中的命运，分析这十年我国新闻事业发展的背景。
3. 1958 年的“大跃进”给中国的新闻事业带来了哪些影响？“大跃进”之后，新闻事业从哪些方面进行了改进？
4. 请说明邓拓杂文的特点以及 20 世纪 60 年代报纸杂文兴起的主要原因。



第十三章

“文化大革命”时期的新闻传播事业

1966年5月，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通过了毛泽东主持制定的《中共中央通知》，即《五一六通知》，这标志着历时十年的“文化大革命”的全面展开。很快，从中央到地方的重要新闻舆论阵地被夺权，大批新闻从业人员离开了自己的工作岗位，报纸广播电视形成了“千报一面”与“千台同声”的局面。正式出版的报纸种数大量减少，而小报小刊急速增多，泛滥成灾。“新闻为政治服务”的观点成为统治新闻界的主流观点，新闻学术研究和新闻教学处于瘫痪状态。可以说这十年是“左”倾错误严重泛滥的十年，我国的新闻事业成为发动和开展“文化大革命”的舆论工具，也成为两个反革命集团阴谋篡党夺权的工具。党的新闻事业的优良传统被无情地践踏。整个新闻事业失信于民，失信于社会，成为“文化大革命”的重灾区。

第一节 新闻事业的艰难发展

一、报纸与期刊

在“文化大革命”开始前进行的对邓拓、吴晗、廖沫沙即“三家村”的批判中，人民日报社、北京日报社等首都新闻单位由于反应迟钝表现消极，为毛泽东

所不满，成为被夺权的主要对象。《解放军报》、《光明日报》、《文汇报》代替《人民日报》成为制造舆论的旗手。

1966年5月9日，在人民大会堂召开的由首都几家主要报纸负责人参加的会议上，陈伯达宣布成立新的中央文化革命领导小组，并严厉地批评了《人民日报》一个时期以来的各种“错误”，责令人民日报社向中央作书面检查，同时让吴冷西停职反省。吴冷西是1957年6月29日正式担任《人民日报》总编辑的。

1966年5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召开期间，《解放军报》和《光明日报》同时发表题为《邓拓的〈燕山夜话〉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话》的材料以及系列文章，把《北京晚报》发表的《燕山夜话》和《前线》杂志发表的《三家村札记》斥为“猖狂向党向社会主义进攻的毒箭”，把北京市委领导下的《北京日报》、《北京晚报》、《前线》称为“反党工具”，把《燕山夜话》和《三家村札记》的作者说成是“对党和社会主义怀着刻骨仇恨的”阶级敌人。5月10日，上海的《解放日报》与《文汇报》又同时发表姚文元的文章《评“三家村”——燕山夜话、三家村札记的反动本质》，第二天全国各地报刊均转载，邓拓、吴晗等人在一夜之间成为全国上下口诛笔伐的“反党反社会主义黑帮”。1966年5月17日，邓拓含冤去世。

从发表《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到《五一六通知》正式传达，《人民日报》作为党中央机关报，却处处落伍，处处被动，不得不跟在别的报纸后面转载重要的文章，跟在别的报纸后面发表社论，这预示着其被夺权的命运。5月31日下午，中央宣布派陈伯达带工作组进驻人民日报社。当天夜里，陈伯达便率工作组到人民日报社，改组了报社的班子，“掌握报纸每天的版面，同时指导新华社的广播电台的对外新闻”。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毛泽东亲自撰写的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指出“一个势如暴风骤雨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高潮已在我国兴起”，向全国下达了开展“文化大革命”的总动员令。从此《人民日报》的地位大变，不再处处挨批处处被动，一夜之间成为“文化大革命”的发动者、领导者的舆论喉舌和得心应手的御用工具，一篇社论动辄全国各大报纸纷纷转载、电台纷纷转播，可以左右全国的舆论导向。

1967年元旦，《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联合发表社论《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宣布1967年是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社会上的牛鬼蛇神展开总进攻的一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将全文播出8遍。张春桥、姚文元等人闻声而动，率先在上海刮起“一月风暴”。1月3日与4日，上海《文汇报》和《解放日报》先后被造反派夺权接管，次日《文汇报》刊载“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等11个造反组织的《抓革命、促生产，粉碎资产阶级

反动路线的反扑——告上海全市人民书》。《人民日报》于1月9日发表社论《让毛泽东思想占领报纸阵地》，称《文汇报》和《解放日报》的夺权是“文化大革命”史上的一件大事，是我国无产阶级新闻事业发展史上的“一个创举”，号召全国新闻工作者向他们学习。

在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的操纵下，红卫兵造反派以造反夺权为名，肆意冲击国家法律允许出版的报纸期刊，使绝大多数报刊处于瘫痪状态。各地造反派夺取政权，成立了红色政权——革命委员会，到1968年9月全国除台港澳以外的29个省、市、自治区都建立了红色政权，实现了所谓“全国山河一片红”。原省、市、自治区的机关报都改为革命委员会的机关报，有的报纸还改了名或者重新题写了报头，甚至重新编号出版，以示与原来的党委机关报彻底决裂。1967年1月3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报纸问题的通知》，指出省市报纸可以停办闹革命，但是不应当停止代印《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光明日报》。

1968年9月1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以“两报一刊编辑部”的名义发表了《把新闻战线的大革命进行到底》。这篇由陈伯达、姚文元组织炮制的文章，认定建国17年以来的新闻战线是黑线专政，把刘少奇的马克思主义新闻学观点说成是资产阶级新闻路线，把彭真、罗瑞卿、陆定一、周扬、邓拓、吴冷西、梅益等思想、文化界的主要领导人诬蔑为“狐群狗党”、“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指责他们“妄图使新闻事业变成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的工具”。

这篇全面否定建国以来党和人民的新闻事业和新闻队伍的文章发表后，新闻界所遭受的摧残与迫害更进一步加剧。陈伯达将新闻界说成是“反革命独立王国”，新华社的广大干部被诬蔑为“一筐烂西红柿”，人民日报社的干部则被说成有“一股邪气”，红旗杂志社的干部都应该“用铁扫帚扫出去”。老一辈新闻工作者邓拓、孟秋江、金仲华、范长江、章汉夫、潘梓年等先后被迫害致死，还有众多正直、优秀的新闻工作者被迫离开自己心爱的工作岗位。

翻开当时各地的报纸，由本报记者采写的稿件少之又少，从头到尾尽是新华社的通稿，而且一个整版通常只发三四条消息，还经常是经验总结之类的应景文章，根本没有来自生活的鲜活的新闻，因而也无法向读者传递真实的信息。除了重要的政治新闻和重要的外交活动需要及时报道，其他报道大多没有时效，只能称做“旧闻”。反倒是香港的一些报纸如《明报》开辟了“北望神州”之类的中国新闻版，专门报道“文化大革命”中所发生的事情。因此各种关于“文化大革命”的消息总是先发表于香港，再转载至内地，造成小道消息满天飞。由于当时的政治形势十分复杂，报刊又不作详细的报道，广大读者只好根据报纸上有限的

消息和图片来揣度政局的变化，从领导人的排名顺序、接见外国要员的次数到出席国庆或“五一”劳动节庆祝活动的名单都成为研究的资料。

从新闻媒介的数量来看，“文化大革命”期间的报纸、期刊数量骤减。以报纸为例，出版数量是近百年来最少的。到1968年年底，全国报纸总数仅余42种，全国性的报纸只剩下4种，降为历史最低点。1971年稍有增加，达195种，然后又逐年降低，“文化大革命”结束的1976年有182种。^① 各省市的晚报、专业报基本停刊，每个省（直辖市）只剩下一张党报。

但这一时期报纸的种数虽然减少了，但印数并没有明显的降低，反而有很大的上升，说明了当时宣传力度之大。各地方报纸80%以上的版面都用来刊载新华社电讯和《人民日报》等中央级报刊的文章，完全没有了地方报的特色，几乎都成了《人民日报》的翻版，出现了建国以来也是中国新闻史上罕见的“千报一面”的特殊景象。每有重大事件发生，“两报一刊编辑部”的文章便代表中央表态，代表中央的声音，成为统一全国舆论和号令全党全国的指挥棒。它经常披露中央的最新、最高指示和新的运动口号，发布最新的战略部署，因而具有极大的权威性，成为各级干部了解中央精神的最主要渠道。

二、小报的兴衰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随着各种“红卫兵”组织和“造反”组织的出现，社会上涌现出一大批“文革小报”与“红卫兵小报”。这种小报开始是油印，后来大都发展为铅印，先是在学校、机关、工厂内部发送，随后逐渐向社会发行扩散。这些小报印数并不平均，每期几千份、上万份以至十几万份不等，其中多为不定期出版，随出随停，随意性很大，大多没有正式、固定的编辑机构，也没有向有关管理部门申请、登记注册，因此很难对这些小报的种数与期数进行准确的统计和分析。据北京主要图书馆的调查统计，北京地区有确切记载的“文革小报”近1 000种，全国出版的各类“文革小报”超过6 000种。

北京地区近千种的小报大致可以分为几类：一是由大专院校、中等学校以及跨院校的红卫兵组织出版的小报，约有300种；二是各级党政机关群众组织办的报纸，超过100种；三是厂矿企业群众组织、革委会办的报纸，约有30种；四是文化艺术界办的报纸，约有42种；其他各行各业的群众组织也都出版有各类小报，计200多种。这些小报中连续出版超过10期的约有185种，约有700种

^① 《中国报刊出版统计》，载《中国新闻年鉴》（2000年卷），567页，北京，中国新闻年鉴社，2000。

小报出版期数不足10期，出版1期即销声匿迹的小报也有60多种。《新北大》出版200期，清华大学的《井冈山》出版156期，北京地质学院的《东方红报》出版149期，北京航空学院的《红旗》出版118期，这些都是当时在全国颇有影响的小报，曾通过北京市邮局办理过全国发行，订阅和零售兼有。

作为特定历史时期的产物，从1966年夏到1968年秋是小报的活跃时期。1966年8月17日，毛泽东为北京大学“文革筹委会”主办的新校刊题写了刊名，表示了对新报刊的支持。在此期间，《人民日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曾多次转载、摘播小报编辑部、小报记者撰写的文章，以一种特殊的形式肯定了小报的存在，因而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小报的快速发展。这些小报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填充了大批合法报刊停办后留下的新闻空白区，形成了当时特有的由少数几家大报发号施令，指明方向，众多小报呐喊助威的舆论宣传阵势。^①

小报的快速发展导致了一些问题的出现，当群众组织因对领导和运动的形势持有不同观点而形成互相对立的派性组织时，小报便成为党同伐异的工具，互相攻击、恶意谩骂甚至肆意歪曲事实，刊登一些未经核实的小道消息、内幕新闻，混淆视听，扰乱了正常的社会秩序。1967年5月14日，为了加强对小报的引导与控制，中共中央发布了《关于改进革命群众组织的报刊宣传的意见》。文件首先肯定了由革命群众出版的各种小报及传单在宣传战线上所起的重要作用，然后强调小报必须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还对小报宣传作了详细具体的规定，如不准擅自刊登和印发毛主席没有公开发表的文章、讲话、批示，中央的内部文件、会议纪录和内部讲话也不得随意刊登，不得公开发表反对人民解放军的文章，必须严格保守党和国家的机密，不得信谣传谣，不得搞黄色低级和庸俗的东西等等。从公开支持红卫兵和群众组织办小报到发文对小报进行种种规定与限制，反映了中央领导对小报态度的变化。小报兴起的初期，正是“文化大革命”初期党、政、文化组织陷于瘫痪，社会信息渠道不畅、宣传工具缺乏的时候，小报满足了人们了解各种情况的愿望，提供了一种渠道传达从大报和正规报纸不能看到的消息，也是新出现的基层群众扩大自己影响的最得心应手的工具、武器。但小报毕竟是时代的特殊产物，是无政府主义的体现，缺乏最基本的纪律约束，引发了各种各样的混乱，这也是中央不得不对小报进行管理的主要原因。随着各种群众组织的解体和消失、各大学校的停办和学生的上山下乡，“文革小报”慢慢退出了历史舞台。

^① 参见印红标：《“文革”中的群众组织小报》，见《新闻研究资料》，第56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

三、广播电视与其他媒体

“文化大革命”中，广播电视也深受极“左”思潮的影响，成为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手中的舆论工具，为他们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阴谋服务。

（一）广播

1967年1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广播电台问题的通知》，决定对地方人民广播电台实行军事管制，一律停止编辑和播送地方自办节目，全天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节目。1月18日，上海人民广播电台首先被实行军事管制。年底中央广播事业局也被实行军管。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一大批办得有特色的节目在这一时期被迫停办，原来的理论节目被改成《工农兵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深受少年儿童喜爱的《小喇叭》、《星星火炬》被改为《红小兵》、《红卫兵》节目，和其他节目一样，每日照播最高指示和中央“两报一刊”编辑部的大文章。1971年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在许多节目开始时，使用这样的祝福语：“同志们，首先共同祝愿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而一些节目的结尾经常选用《国际歌》为结束音乐。

对台湾广播的节目大部分被停办，保留下的节目同样失去了原来富有人情味的特点，变成了千篇一律的政治说教，张口闭口“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各地广播电台的文化报道和文艺节目中，只能反复地播放八个“样板戏”，排斥古今中外的优秀文化，剥夺广大人民群众正常的精神文化需求，使欣欣向荣的广播事业备受摧残，日渐枯萎。

同样，对外广播也经常充斥着“左”的政治说教，各种语言的对外广播节目，同对内广播一样，经常连续全文播出有关“文化大革命”方针政策的长篇社论、文章以及领导人的讲话，照本宣科地播送毛泽东著作，知识性趣味性的内容少得可怜，对中国优秀文化的介绍也让位于阶级斗争形势的分析。

地方人民广播电台更是遭到了巨大的破坏。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先后成立革命委员会以后，地方电台陆续恢复了少量的自办节目，但是基本没有地方特色，同中央台的节目从内容到形式保持绝对一致。

十年动乱期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长期以来形成的庄重、朴实、亲切、自然的播音风格被破坏，广播节目充满声嘶力竭的大喊大叫，形成了高调门、平淡、空洞的“播音八股”，听众和广播电台建立起来的亲密关系日益疏远，广播节目完全成了自拉自唱，丢掉了和听众进行交流的基础，广播电台收到的听众来信少而又少，在听众中的影响力不断下降。建国后广播战线坚持走民族化、大众化、通俗化、口语化道路，发挥广播所特有的优势，摸索出一条适合广播特点的传播

道路，然而在“文化大革命”中这些有益的探索被一棍子打死，被说成是修正主义路线，遭到全盘否定，建国后发展迅速、一直以“广老大”自居的广播事业第一次停步不前，跌入低谷。

但广播事业也取得了一些意想不到的进展。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对外广播进一步扩大，十年间增加了12种外语广播，对外广播用语达到39种，位居世界对外广播前列。农村的有线广播得到较大发展，基本上建成了以县广播站为中心、以公社广播放大站为基础、联结千家万户的农村有线广播网。

（二）电视

“文化大革命”的爆发也使刚刚起步的中国电视事业遇到暂时的挫折。1967年初，全国13家电视台，除上海和广州电视台外，其他电视台一律停播。

1970年，中央广播事业局会同有关部门，召开了全国电视专业会议，确定了集中主要力量研制彩色电视，同时适当发展黑白电视的发展战略。会后大多数省开始恢复和建立正规电视台。到1971年，全国电视台发展到32座，除了北京与西藏外，中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都有了电视台。

其实早在1959年我国就开始了彩色电视的研制工作，到1960年，我国的彩色电视实验已经取得成效，却由于当时的国民经济严重困难而不得不中止，所以到1970年才重新开始。

国务院批准筹建北京、上海、天津、四川彩色电视试播台，并于1972年派代表团出国考察西方彩色电视的发展状况，决定以PAL为中国彩色电视暂行制式。1973年5月1日，彩色电视开始在北京试验播出。8月1日上海电视台开始试播彩色电视节目。10月1日，北京、上海、天津三大城市进行了彩色电视节目的试传，这标志着中国电视事业和电视工业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在60年代许多地方电台和电视台先后组建了专业的广播电视艺术团体，按照广播电视的艺术特点进行表演和创作，丰富了广播电视文艺节目的内容，但“文化大革命”开始后，这些艺术团体被撤销，电视的文艺节目就更加单调枯燥了。当时观众所能看到的电影长期以来一直是《地道战》、《地雷战》、《南征北战》这三部被观众称为“老三战”的电影。^①

（三）新闻摄影与图片

翻开当时的报纸，你很难找到什么真正意义的新闻摄影照片，除了领袖人物的巨幅照片，就是工农兵认真学习毛主席著作的图片。这些图片没有新闻时效，而且多是经过导演和摆设之后的造假作品。

① 参考郭镇之：《中国电视史》，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

画报和摄影杂志在“文化大革命”中越来越不景气。从1966年10月至1971年6月，全国的摄影画报只有《人民画报》与《解放军画报》两家。到“文化大革命”后期才陆续又出版了几家画报，《新疆画报》、《民族画报》等一些在“文化大革命”初期被迫停刊的画报也相继复刊。《中国摄影》杂志于1966年3月被迫停刊，在以后长达8年的时间中，全国没有一本摄影杂志。直至1974年9月《中国摄影》复刊。

在全国各地电影制片厂相继停止生产的情况下，中国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和八一电影制片厂仍坚持摄制新闻纪录片，为我们留下了关于那一时期的宝贵的历史资料。这其中有《南京长江大桥》、《成昆铁路》、《大庆红旗》、《再次登上珠穆朗玛峰》等记录人民创造历史的影片，也有八一电影制片厂摄制的《欢呼我国发射导弹核武器试验成功》、《我国成功地进行了一次新的氢弹试验》等反映我国军事科学技术发展的影片。随着中国外交活动的开展，新闻记录电影工作者摄制了记录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日本首相田中角荣访华的影片以及记录1973年中国在联合国恢复合法席位这一重要历史事件的《第二十七届联大会议》。1976年1月，周恩来总理逝世，全国人民无比悲痛，中国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的摄影工作者在拍摄指定的正式悼念活动的同时，也拍下了广大群众自发悼念总理的感人镜头，记录了十里长街哭送总理的真实场景。

四、新闻教育与新闻学研究

“文化大革命”爆发后，我国的新闻教育与新闻学研究遭到严重破坏。据统计，从1966年5月到1976年10月，出版的新闻学著作只有43种，基本上都是新闻单位内部编印的小册子，公开出版发行的著作寥寥无几。^①重要的新闻专业刊物《新闻业务》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就被迫停刊，一些新闻团体如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也被迫停止活动。

学校普遍停课闹革命，正常的教学秩序完全被打乱，各高等院校新闻系或新闻专业只好停课，并停止了招生。我国本来一直就有“新闻无学”的论调，再加上“文化大革命”中“开门办报”、“群众办报”、“工农兵办报”等观点的盛行，很多人认为新闻系根本培养不出革命的、战斗的新闻工作者，完全可以不办。1969年，北京广播学院被停办；1971年，中国人民大学停办，该校新闻系也随之被撤销。新闻教育被彻底否定了。

^① 参见童兵：《20世纪中国新闻学与传播学·理论新闻学卷》，361页，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

到1971年9月，北京大学中文系新闻专业才得以恢复。1971年底，复旦大学新闻系招收第一批工农兵学员，1973年北京广播学院被批准复校，次年重新开始招生。此外其他的新闻教育单位也陆续恢复。新闻教育虽然恢复了，但教学秩序混乱。仅有的几门课程，也都充满了极“左”思潮的烙印。

从当时工农兵学员所使用的新闻学教材来看，新闻研究的目的是介绍新闻的业务知识、采访方法和写作技巧，而主要是为了引导学生去学习革命导师的教导，帮助学生更好地掌握新闻报道这一阶级斗争的锐利武器，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服务。当时的新闻写作课程就干脆借用毛泽东的《反对党八股》作为教材。评论写作的依据主要是“革命导师的有关论述”。

第二节 “文化大革命”时期新闻事业的主要特点

一、林彪、“四人帮”的宣传伎俩

在十年动乱中，新闻界既是极“左”思潮的传播者，又是极“左”思潮的受害者。林彪、“四人帮”奉行的新闻观，一言以蔽之，就是报纸是专政的工具，新闻媒介要为路线斗争服务。在这样的新闻观的指导下，新闻严重政治化，新闻报道、报纸评论一切都从政治出发，为政治服务。塑造典型人物可以任意虚构细节，报道新闻事件可以含沙射影，指桑骂槐，对新闻照片可以动手脚，甚至对历史照片也可任意涂改，为我所用。

（一）宣传个人崇拜

林彪、“四人帮”的宣传伎俩中运用最多的就是通过新闻媒介不断宣传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以捞取他们个人的政治资本。“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包括《人民日报》在内的各种报纸都效法《解放军报》的做法，每天在报眼位置选登毛主席语录，并冠以最高指示的栏头。同时在文章和新闻报道中都把毛主席语录排成黑体字，以示突出。毛泽东的大幅照片比比皆是。

报刊的文章，无论是评论还是新闻通常只有一种写法，即毛主席语录加例子，不是引用毛主席的几句诗词作开头，就是以“最最最最敬爱的领袖”或“祝您万寿无疆、万寿无疆、万寿无疆”等语言作结尾。这种简单重复而且损害中国语言文字纯洁的空话套话成为当时最流行的文体，后来被人们称为“文革报刊文体”。1966年毛泽东曾八次在天安门广场接见红卫兵，先后有一千三百多万各地来京的红卫兵受到检阅。对这八次接见，各地的报纸、广播、电视无一例外地都作了突出的宣传，大幅的图片、连篇累牍的报道掀起了一波又一波的个人崇拜狂潮。1966年7月23日，《人民日报》等报刊报道毛泽东不久前在长江的一次游

泳，不仅在头版头条以大字标题予以报道，而且还配发了他横渡长江、在快艇上挥手的大幅照片以及毛泽东在游泳中所讲的语录。第二天，《人民日报》又专门发表社论《跟着毛主席在大风大浪中前进》，把毛泽东在长江中的畅游说成是令全国人民振奋的喜讯，亿万人民为主席的健康同声欢呼。当年8月，当《毛泽东选集》出版时，报纸几乎天天都在报道《毛泽东选集》在全国各地发行的盛况。对毛泽东的崇拜在报纸的推动下形成了狂潮，势不可挡。

将毛泽东从人变成了神，报刊起了很大的作用。大致从1967年11月开始，每逢元旦和其他重要节日，包括政治上有重大事件发生时，《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和《红旗》杂志就联名发表社论、文章，这些社论和文章往往经过毛泽东的亲自审定，而毛泽东的一些最新指示也主要通过这些社论和重要的文章公诸于世。所以每当“两报一刊”发表新的社论，不仅全国各地的报刊要全文转载，广播电台要全文广播，而且全国上下还要认真学习贯彻，甚至连夜要求职工返回单位集体学习、座谈或者游行庆祝。

随着个人崇拜的升温，许多红卫兵对新闻宣传是否忠于毛泽东的监督达到了疑神疑鬼的地步。1966年8月29日，不少省市的报纸刊登了新华社所发的毛泽东站在天安门城楼一端向红卫兵招手的照片，由于照片上屋檐的尖角正对着毛泽东的头部，红卫兵小将便认为这是“反对伟大领袖毛主席”，因而围攻和冲击有关的报纸，一些报纸的编辑和排字人员常常因为不小心排印错毛泽东的名字或语录，而被作为“现行反革命”予以逮捕关押。在这种紧张的气氛下，各种报纸不得不小心翼翼，惟恐发生什么严重的政治错误。很多报纸每天都要和《人民日报》对版面，重要稿件的版面位置、标题的字体与字号、图片摆放的位置及尺寸大小都一一照搬。《人民日报》因难以应付各地的问讯电话，不得不分片分区指定一两家报纸代为相互转达。^①用“千报一面”来形容一点也不为过。

（二）影射文章泛滥报刊

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最擅长的宣传手段之一就是在报刊上发表各种“影射文章”，借刀杀人，他们的这一招在“文化大革命”之前就已经屡试不爽，整垮了一大批老革命、老干部和他们的眼中钉。

1973年5月，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提出批判孔子的问题，7月4日在一次谈话中又提到，林彪和国民党一样，都是“尊孔反法”。毛泽东这番古今对比的话使对孔子、儒家、法家的学术批判带上了很浓的政治色彩，“四人帮”觉得可以借此大做文章。从1973年9月起，“四人帮”组织的批孔文章开始在北京、

^① 参见方汉奇主编：《中国新闻事业通史》，第3卷，367页。

上海及全国各地的报刊上大量发表。这些文章名义上是批林批孔，而实际攻击的目标是周恩来。

1974年10月至11月间，“四人帮”还在报刊上一手导演了“风庆轮事件”的宣传。周恩来主持国务院工作时从我国的基本国情出发，并征得毛泽东的同意，将我国的海洋运输方针定为造船与买船同时并进，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适当买进一些船只，力争在几年之内结束主要依靠租用外国轮船的局面。“四人帮”却将这一方针斥责为“洋奴哲学”、“崇洋卖国”。1974年9月13日，我国自己建造的风庆轮完成远航任务返抵上海吴淞口，“四人帮”为了攻击周恩来，便抓住这个契机大做文章，他们派二十多名记者登轮突击采访，10月12日上海《文汇报》与《解放日报》同时在头版头条以通栏标题发表关于风庆轮的长篇报道，并配发了评论员文章。这些报道将造船与买船人为地对立起来，影射攻击周恩来执行的是一条“孔孟之徒卖国主义路线”、“儒家卖国主义路线”。关于这一事件的报道，在短短一个多月的时间里，上海《文汇报》与《解放日报》共用了三次头版头条，编发了二十多个版面，组织报道近二十万字的文章，此外还利用小说、故事、说唱电影报告会等形式配合宣传，并据此在政治局会议上向以周恩来为首的国务院发难。

1975年8月13日，毛泽东与身边的工作人员谈话时对古典小说《水浒》发表了一些评论，认为《水浒》只反贪官不反皇帝，宋江投降是搞修正主义。姚文元得到这个谈话纪录以后，立即组织《红旗》杂志、《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开展对《水浒》的评论。“四人帮”的写作班子被组织起来写了各种各样的文章发表在报刊上。这些文章以“投降派”、“架空晁盖”来影射攻击在周恩来支持下邓小平同志对全国各行各业所做的“全面整顿”的工作。

从以上几个例子可以看出，影射文章大都从历史人物出发，将古今完全不同背景下发生的事件牵扯到一起，为了达到影射的目的，左右舆论，不得不将现代词汇强加于古人，让古人背上在那个时代根本不可能出现的思想，如“洋奴哲学”、“卖国主义”等等。

（三）根据需要树立各种典型

根据斗争需要树立各种典型是他们擅长的又一重要宣传手段。

“文化大革命”期间的典型报道，有很多都是“四人帮”别有用心地编造出来的，是经不起时间考验和没有生命力的。

关于“六厂两校”的典型报道曾经在报纸上连篇累牍地报道。“六厂”是指北京印刷厂、北京针织厂、北京二七机车车辆厂等运动中的先进单位。“两校”是指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早在1968年10月，毛泽东通过陈伯达传达了他对人

民日报社的指示，要求报社的记者编辑三分一下放劳动，三分之一深入实际调查研究，另外三分之一的人继续在报社工作。而从事调查研究的首选之地就是“六厂两校”。当时新华社等新闻单位把派记者到这些单位蹲点看成是必须完成的重大政治任务。从1968年到1976年长达八年的时间，两大新闻单位几乎接连不断地有人轮流到“六厂两校”接受“工农兵的再教育”，蹲点写稿子。写多写少写好写坏也被看成是“对毛主席的态度问题”，因而关于“六厂两校”的典型报道时常出现在报纸上，动辄便是几千字的大通讯，或者一个整版的专题报道，《人民日报》在半年之内对一个北京针织总厂的报道就达两万多字，关于清华大学的报道一年有十几条，平均每条长4 000字。这样的反复宣传在新闻史上实属罕见，“六厂两校”因而成为样样都好的典型。

在“文化大革命”中突出宣传报道的人物典型也很多，其主要特点是“有路线斗争觉悟”和“无限忠于毛主席革命路线”。这些典型人物有的是假冒伪劣，但也有很多确实是兢兢业业工作的好同志，但当时的宣传者为了达到自己的报道目的，故意上纲上线，夸大渲染一些情节，无中生有地增添一些所谓的思想高度，使典型人物失真。如从1970年1月全国各地报纸普遍刊载的通讯《拉革命车不松懈，一直拉到共产主义》中报道的北京农村郊区干部王国福，本人就是一位好干部，通讯中所描写的其关心群众疾苦、带病坚持工作等事迹基本上是真实的，但通讯中绘声绘色渲染的“路线斗争”、描写王国福与“公社的走资派”当面斗争、反对推广“黑经验”就是记者编辑按照当时的政治需要编造出来的。

“文化大革命”前曾经突出宣传报道过的山西省昔阳县大寨大队在“文化大革命”中继续被当做典型来宣传，只不过是由过去的生产典型变成了政治典型，由一个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的农业典型变成了推行极“左”路线的急先锋。“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大寨大队的负责人以“大寨是毛主席亲自树立的一面红旗”为政治资本，对有关大寨的新闻报道进行控制，由指定的专人负责统一所有对外的口径。那些长期热情宣传大寨的新闻单位也被说成是“歪曲、阉割大寨精神”，不得不按照大寨负责人的宣传口径报道大寨反对“修正主义”的经验。大寨出名后，接受了国家大量的投资贷款，并向企业事业单位无偿征调物资、劳力，再加上大寨广大群众的艰苦奋斗，大寨的面貌发生了很大变化，农业生产也有很大的增长，但这一切在宣传中都说成是积极开展“路线斗争”的结果。大寨在建设出现了许多不讲科学的蛮干行为，也被当做经验来推广。为了维护大寨的形象，在宣传报道中也出现了浮夸风，粮食产量、工作成绩也都掺了水。大寨不仅仅是农业的典型，而且成为文化、卫生、理论学习、水利等各项工作的先进标兵，成为在各方面都一贯正确的万能典型。

在不同的政治背景下，“四人帮”总是根据自己的需要想方设法地找到一些典型，为自己鸣锣开道。1973年邓小平在周恩来总理的支持下进行全面整顿，而阴谋在四届人大会议期间篡权组阁的“四人帮”处心积虑编造了一批典型，鼓吹“批林批孔”，树立“反修正主义回潮”的典型。1973年4月3日，国务院批转了《关于高等学校一九七三年招生工作的意见》，提出要坚持选拔有两年以上实践经验的优秀工农兵上大学，在政治条件合格的基础上重视文化程度，进行文化考查。江青等人诬蔑进行文化考查是“智育第一”、“文化至上”，于是树立了“白卷英雄”张铁生、反对“师道尊严”的小学生黄帅、“不学ABCD，也能当接班人”的初中生张玉勤作为典型大加宣传。

当时的典型报道不但带有政治路线斗争的痕迹，而且存在各种片面性。如写先进人物的崇高思想境界，往往要加上闪光的语言，要十全十美、高大全，这些“万能”的典型一看便是虚假与夸大的；而先进经验的宣传也变得绝对化、模式化。

（四）成立各式各样的写作班子

大型的写作组是“四人帮”在舆论宣传上的一支别动队，他们操纵主持的写作组主要包括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笔名梁效或梁小章），上海市委写作组，中共中央党校写作组（笔名唐晓文）以及江青在文化部的写作班子。其中最著名的便是署名“梁效”的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写作组。这两个写作组中不乏有能力有才干的大学生。

当时这些写作组用的笔名千奇百怪，应有尽有，如柏青、高路、万山红、秦怀文、丁学雷、方泽生、史向辉、伍甫、江天、初澜、史汀等等，不下50种。此外还有各地“革委会”组织的写作组，也以形形色色的笔名，依照梁效等文章的调子撰写类似的文章在当地的报刊上发表，形成“小报抄大报，全国看梁效”的局面。写作组是“四人帮”的御用“笔杆子”，炮制了许多重磅炸弹，置人于死地。“四人帮”往往“透露”一些中央的最新精神给写作组，不时吹吹风，指出要害所在，定出基本的调子。或者直接向这些写作组布置题目，这些写作组撰写了大量的影射文章，对中国历史断章取义，肆意歪曲，牵强附会，假借“批林批孔”，批儒捧法，千方百计为“四人帮”夺取最高领导权制造舆论。^①

二、“四人帮”控制下的党报的彻底堕落

在“文化大革命”后期，“四人帮”加快了篡党夺权的步伐，利用党报控制

^① 参见方汉奇主编：《中国新闻事业通史》，第3卷，371～374页。

舆论也越来越不择手段。党报彻底堕落为他们手中的棋子。

1976年1月8日，周恩来总理因病不幸去世，这一消息一经广播，人民群众无不悲痛万分，“四人帮”却背道而驰，千方百计限制、干扰、破坏媒体关于悼念周恩来总理的报道。对于周总理逝世，《人民日报》只作了程序式报道，1月9日，1版上半版为讣告，下半版为治丧委员会名单，周恩来总理的照片放得很小，当日其他各版均无相关消息。1月12日，整版左中位置配发告别遗体图片一张，只有60字宽32行高。其生平图片只登了两个专版。这种规格显然没有反映出总理在人民心目中的重要位置。全国人民悼念总理的活动未有任何报道，各国政要的唁电也都压缩使用。1月14日是总理追悼大会的前一天，首都群众上百万人到天安门广场以各种形式表达对总理的无限哀思，然而这一天的《人民日报》却在头版头条刊登了一篇《大辩论带来大变化》的文章，说全国人民都在关心清华大学教育革命的大辩论。人民群众对这种违背民意的行径十分愤慨，很多人将报纸撕碎后寄还给报社，报社收到的抗议电话有一百多个。

姚文元除了规定各家报纸上不许发表广大群众悼念总理的来信、来稿，甚至还规定报纸不能出现“敬爱的周总理”的字样。1月11日，周恩来的遗体从北京医院送往八宝山火化时，北京市民肃立在长安街上，在寒风中目送灵车缓缓走过，但这样感人的悼念活动在首都报纸上并没有得到反映。总理的追悼大会开过后，姚文元下令《红旗》杂志不准刊登周恩来的遗像，不准刊登党中央的讣告和悼词，姚文元还对电视下令，不准广播治丧委员会的名单，不准把冰百万群众送灵车的镜头编入电视片。

3月5日，上海《文汇报》在刊登新华社播发的《沈阳部队指战员坚持向雷锋同志学习》时，将人们熟悉的周恩来关于学习雷锋的题词删除掉。3月25日，发表题为《走资派还在走，我们就要同他斗》的通讯出现了恶毒攻击周恩来的词句。南京市民首先起来声讨《文汇报》，指出“四人帮”妄图篡党夺权的野心。结果南京市民的行为被说成是“分裂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转移批邓大方向的政治事件”，受到了追查。

在北京从3月底开始，到天安门广场悼念周总理的群众就络绎不绝，4月4日清明节，又有数十万群众不顾重重禁令涌向天安门。4月5日，一部分革命群众同广场的战士警察发生了冲突，广场变得混乱起来，部分群众被逮捕，这场群众活动竟被定性为“反革命暴乱性质”。在姚文元的策划下，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发了关于“天安门事件”的“现场报道”《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命政治事件》，同时广播了中共中央关于华国锋担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以及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保留党籍以观后效的决定。4月8日，各地报纸都刊发了

这篇颠倒黑白、极尽捏造歪曲之能事的报道与中央的决定。

人民群众对关于“天安门事件”的假报道非常愤慨，从4月8日起，人民日报社便不断接到抗议的电话与信件。有读者寄给《人民日报》的信，信封下面写着：北京《人民日报》总编辑收，背面却是：请戈培尔编辑收。信封里装着4月8日的《人民日报》，但《人民日报》被改为《造谣日报》，里面还写道：“令人震惊！党报堕落了！成了一小撮法西斯野心家、阴谋家的传声筒！”

1976年9月9日凌晨毛泽东与世长辞。下午3点，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向全国播发了这一消息。关于毛泽东逝世的宣传报道，从一般的消息到图片，从电视到影片，姚文元都指令要想方设法突出江青，“四人帮”还伪造了所谓的“按既定方针办”的“临终遗嘱”，并于9月16日通过“两报一刊”社论公之于众。姚文元曾六次指示新华社要反复宣传这个“临终遗嘱”，不要怕重复，处理稿件时都要加进去，要让它覆盖版面。10月4日，《光明日报》在头版头条发表梁效的文章《永远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办》，宣称：“任何修正主义头子胆敢篡改毛主席的既定方针，是绝没好下场的。”“四人帮”篡党夺权的野心昭然若揭。10月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当机立断，一举粉碎了“四人帮”反革命集团的阴谋，结束了“文化大革命”。

十年“文化大革命”中，由于林彪、江青等阴谋家篡夺了党对新闻事业的领导权，党报从头到尾沦落为阴谋家的宣传工具和政治传声筒，对党的失误和错误决策推波助澜，致使党的新闻事业失信于民，权威扫地，达到党报历史上的最低点。

三、“文化大革命”中新闻事业的经验教训

“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晚年的毛泽东对这一全局性的、长时间的“左”倾严重错误负有主要责任。

全党办报、群众办报一直是党的新闻事业的优良传统，但在“文化大革命”中，党对新闻事业的领导被否定。各省市党委机关报普遍被夺了权，报纸的总编社长被当做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一脚踢开，党委机关报成为“四人帮”的“帮报”和“派报”。群众办报被片面地理解为“让工农兵占领上层舞台”；打破新闻界知识分子成堆的状况，变成了“掺沙子”的政策。

更为可怕的是新闻真实性原则在“文化大革命”中被大加践踏。在“文化大革命”中“事实为政治服务”的观点十分流行，成为指导新闻实践的主流新闻思想。新闻政治化，从斗争需要找材料、树典型、编故事、写评论堂而皇之地成为

报刊通行的做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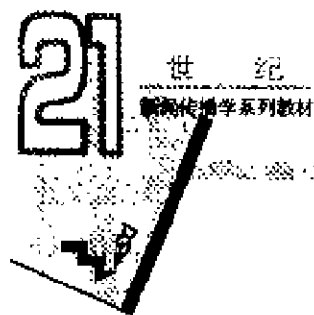
这一时期的报纸版面充斥的都是由语录、口号、文件和革命导师著作中的只言片语组成的拙劣文章，开头是语录，结尾是口号与祝词，中间也是语录或文摘，千篇一律。广播电台的语言也同样高调，同样绝对化，盛气凌人。

应该说党的新闻事业的命运同共和国的命运是紧密相连的。所有的经验与教训也是党和国家的教训。在新闻界，广大新闻工作者的主体地位也被淡化和削弱到了最低点，新闻机构与新闻工作者都被剥夺了独立思考的权力，成为“四人帮”控制下的党的驯服的工具，没有了自己的主体意识。在新闻学术领域，无产阶级新闻观与资产阶级新闻观都没来得及认真研究，对无产阶级新闻事业有哪些好的传统，应如何继承和发展，并没有深入地探讨，而对资产阶级新闻观则一律不分青红皂白一棍子打死，正常的学术讨论无法进行，这些都使得我们的新闻理论严重滞后。

在“文化大革命”中，传媒的性质发生了畸变，它由普通的新闻舆论工具发展为单一的阶级斗争的工具，其他的属性和多样化功能如信息功能、服务功能、娱乐功能、教育功能被一笔勾销。在“四人帮”的压制下，形成了舆论一律，但这样的舆论一律使得全国变得没有一点声音，万马齐喑，在长达十年的时间里，使人民陷入迷津，使国家濒临崩溃的边缘。

【学习思考题】

1. “文化大革命”小报具有哪些特点？它为什么会兴起，又为什么会迅速退出历史舞台？
2. “文化大革命”期间新闻事业有哪些特点？党报在宣传报道方面有哪些特点？
3. 造成“文化大革命”中新闻事业滑坡的主要原因是什么？应如何避免类似的情况再次发生？



第十四章

改革开放以来新闻传播事业的总体变化（上）

第一节 新闻传播观念的变化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新闻传播事业发生的最大变化首先体现在新闻传播观念的变化中。从摒弃“阶级斗争工具论”到继承发展“喉舌论”，从承认新闻是一门科学，承认新闻事业具有其自身的传播规律开始，到引进西方传播学的观念开始舆论学研究、受众研究，在不同的阶段，新闻观念的革新总是与新闻实践密切相连。没有新闻观念的变革，也就谈不上新闻改革的深入，谈不上新闻事业体制的变化。在坚持有中国特色的新闻事业的党性原则与喉舌论的同时，我们也借鉴了许多西方传播学的观点，丰富了我们的思维方式和理论体系。

一、喉舌论的继承与发展

（一）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

1976年10月，“四人帮”被粉碎，标志着长达十年的“文化大革命”的结束，中国告别了噩梦般的癫狂状态，开始步入一个新的历史进程。新闻传播领域作为“文化大革命”重灾区，迫切需要拨乱反正，恢复遭到严重破坏的新闻工作

秩序，而整个国家在经历了长时期的混乱状况后，百废待兴，同样需要拨乱反正，恢复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因此新闻传播领域在建设自身的同时，也责无旁贷地担负起了为国家振兴鼓与呼的重任。

从1976年10月到1978年底，新闻界发表了大量的揭批“四人帮”利用新闻媒介进行篡党夺权活动、制造冤假错案以及塑造假典型的文章，为拨乱反正做出了很大的努力。同时新闻界还开展了对林彪、“四人帮”新闻理论和“帮八股”的反思，并在此基础上逐步恢复中国新闻工作的优良传统，改进作风与文风。当时中央的主要领导人华国锋仍在坚持“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因而在近两年的时间里，拨乱反正的工作难以深入进行。新闻媒介在宣传报道中依然面临着众多的禁区，一些“文化大革命”遗留的错误思想依然禁锢着人们的思想，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势在必行。

在许多有识之士的努力下，新闻界艰难地突破“两个凡是”的藩篱，取得了一些进展。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在1978年2月停办了《毛主席语录》节目。3月22日，《人民日报》在刊登邓小平3月18日《在全国科学大会开幕式上的讲话》时，对他在讲话中所引用的毛泽东的话没有排黑体字，从此报纸上摘引革命领袖的语录不必再像“文化大革命”时期一样用黑体字，并陆续取消了每天登在报纸报眼位置的“毛主席语录”专栏。很多报纸减少了文章中的语录，不再刊登领袖的大幅照片，也改变了对领袖的称呼和有关领袖人物活动的新闻编排方式。这些明显的变化显示了新闻界改革的勇气与力量。1978年3月26日，《人民日报》发表一组理论文章，其中有一篇短文《标准只有一个》，提出“真理的标准只有一个，就是社会实践”，在当时引起较大反响。而1978年5月11日在《光明日报》一版显著位置发表的特约评论员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则真正掀起了轩然大波，由此引发了一场席卷神州大地并对中国历史产生重大影响的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

这篇文章是在《光明日报》收到的南京大学哲学系教师胡福明的文章的基础上，经多位同志反复修改，由当时中央党校副校长胡耀邦同志审定的，5月10日发表在中央党校内部刊物《理论动态》上，第二天《光明日报》全文发表。^①同一天，新华社向全国播发全文，第二天，《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和7家省市报纸均转载了此文。到5月底，全国共有30家报纸转载了这篇文章。该文阐述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重要原则，即“思想理论本身不能成为检验

^① 参见王强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组稿、修改和发表》，见《光明日报与真理标准讨论》，81页，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99。

自身是否符合客观实际的标准，只有千千万万人的社会实践，才能完成检验真理的任务”。文章还对“两个凡是”的思想提出尖锐批评，提出要敢于打破禁区。这是拨乱反正以来影响最大、反映最强烈的一篇文章，是中国进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思想解放的宣言。文章发表后，立即引起两种截然相对的强烈反响。党内外广大干部群众热烈赞扬这篇文章，而坚持“两个凡是”的人则强烈反对。新闻媒体则展开了广泛的争论，使之成为一次广泛深入的思想解放运动。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冲破了“两个凡是”和个人崇拜的长期禁锢，打破了思想僵化、教条主义的沉重枷锁，为重新确立党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实现全党工作重心的转移奠定了理论基础，为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完成了思想理论与舆论上的准备。

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在中国发展的重大的历史关头，新闻工作往往肩负着澄清理论是非、引导社会舆论的重大责任。在这场讨论中广大新闻工作者所表现出的大无畏精神、坚持真理的立场，显示了他们的理论素养与知识水准，改善了新闻界自身的形象，提高了它在人民群众心目中的地位。

（二）党性与人民性的争论

1979年3月，中共中央宣传部召开了全国新闻工作座谈会，会议围绕“文化大革命”中新闻工作所犯的错误展开了热烈的讨论，探讨如何将新闻宣传工作的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方面来。正是在这次会议期间，有的人提出了“党报的党性和人民性”的问题，把党性与人民性割裂开来乃至对立起来，用人民性来否定党性，在新闻界引起了广泛的争论。也有的学者重提私人办报、民间办报，打破党报一统天下的局面。当时的中宣部部长胡耀邦在会议上作了《关于新时期的新闻工作》的报告，重新阐述了党的新闻工作的性质、新时期新闻工作的任务等等。他认为我们的新闻工作有很高的党性，党性和人民性是一致的，离开了人民性就不叫党性，从党的根本性质来说，党性和人民性是一致的。

在这年春天中共中央召开的理论务虚会上，党内一些同志提出了一些“民主”、“自由”、“人权”等口号，否定社会主义、否定人民民主专政。3月30日，邓小平作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重要讲话，受到党内外热烈拥护。1980年9月，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的“四大”被从宪法中取消，中央要求，解放思想不能偏离四项基本原则的轨道。

1980年2月，北京新闻学会成立，胡乔木在会上作了长篇讲话，转达邓小平的要求，希望报刊要成为巩固安定团结、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的思想中心，促

进这个政治局面的发展。^① 1981年1月29日，中共中央颁布了《关于当前报刊新闻广播宣传方针的决定》，这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中央就新闻工作颁布的第一个纲领性文件，决定肯定了新闻媒介在解放思想拨乱反正方面的突出表现，同时也对新闻界没有积极主动、有说服力地宣传四项基本原则，对反四项基本原则的言论没有进行有力的斗争提出了批评，希望新闻界能认真进行关于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宣传，大张旗鼓地宣传建设社会主义的高度精神文明，正确地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决定再次强调报刊、广播电视都是党的舆论机关，要严格按照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进行宣传。

1985年2月8日，胡耀邦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作了题为《关于党的新闻工作》的发言，指出“党的新闻事业是党的喉舌，自然也是党所领导的人民政府的喉舌，同时也是人民自己的喉舌”^②。

1987年3月29日，根据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若干问题的通知精神，中共中央又发出《关于坚决、妥善地做好报纸刊物整顿工作的通知》，指出“端正新闻、舆论阵地的思想政治方向，首先要把有关报刊及出版单位整顿好，这是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一个重要方面，也是保证这场斗争顺利发展的必要条件”。对错误比较严重、在群众中造成了恶劣影响的报刊实行整顿。

在1987年10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会议报告中，提出了“发挥舆论监督的作用”，“重大情况让人民知道，重大问题经人民讨论”，“建立社会协商对话制度”，“抓紧制定新闻出版法”，说明中央在进行经济改革的同时也把新闻改革纳入议事日程。

1989年春夏之交发生了举世瞩目的“六四政治风波”，部分新闻媒介在舆论导向上发生严重错误，给中国新闻界带来严重后果。

“六四政治风波”之后，党中央特别重视全党的思想政治工作，新闻队伍的反思与清理也成为新闻界的主要工作之一。1989年11月，江泽民、李瑞环代表党中央在中宣部举办的新闻工作研讨班上分别发表了《关于党的新闻工作的几个问题》和《坚持正面宣传为主的方针》的重要讲话。江泽民的讲话重点论述了党的新闻工作的性质、地位与基本方针。他再次强调了新闻事业是党、政府和人民的喉舌，它的基本方针是为社会主义服务、为人民服务。新闻工作是党的整个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必须坚持党性，要反对所谓人民性高于党性的主张。新闻宣传必须在政治上与党中央保持一致，新闻宣传必须旗帜鲜明、坚持不懈地反对资

① 参见童兵：《20世纪中国新闻学与传播学·理论新闻学卷》，368页。

② 《中国新闻年鉴》（1985年卷），1页，北京，中国新闻出版社，1985。

产阶级自由化。^①李瑞环则强调新闻报道必须坚持以正面宣传为主的方针，实事求是地反映社会生活的主流，形成鼓舞人民前进的巨大精神力量，营造有利于安定团结的舆论环境。^②

关于党性与人民性的争论就此告一段落，大家基本认同在肯定党性的核心地位的前提下，给予人民性足够的重视，社会主义新闻事业既有鲜明的党性，又有强烈的人民性，反对、淡化或削弱党性是不正确的，否定人民性也是不应当的，应该将两者有机地统一起来。

（三）“喉舌论”的继承与加强

“六四年政治风波”之后，新闻界进行了长达三年的反思，坚持新闻事业的党性、把握正确的舆论导向成为新闻界的共识。新闻的改革暂时让位于思想政治工作的加强。宣传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成为新闻媒介的主旋律。但“左”倾思想有所抬头，在一定程度上禁锢了人们的思想，减缓了改革的步伐。1992年邓小平同志发表南方谈话，强调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要防止“左”。邓小平的南方谈话给新闻界带来了活力，在坚持党性和正确舆论导向的同时出现了活泼生动的局面。

在1995年的全国宣传部长会议上，江泽民提出了要“以科学的理论武装人、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这成为新闻界宣传报道的方向，成为衡量新闻宣传好坏的重要标准。1996年1月2日，江泽民视察解放军报社，在接见师以上领导干部时发表重要讲话，要求新闻工作者要充分认识肩负的重大责任，发扬好传统、好作风，完成好党和人民赋予的光荣使命。同年9月26日，江泽民视察人民日报社，发表重要讲话，强调“舆论导向正确，是党和人民之福；舆论导向错误，是党和人民之祸。党的新闻事业与党休戚与共，是党的生命的一部分”^③。

江泽民同志讲话发表后，新闻单位组织学习讲话，力求按照政治家办报的要求，提高新闻单位领导和编辑记者的政治素质和理论水平。新闻事业行政主管部门和党的宣传部门加强了对新闻媒体政治上的管理力度。

1998年10月7日下午，国务院总理朱镕基在视察中央电视台与《焦点访谈》的编辑记者座谈时赠言：“舆论监督、群众喉舌、政府镜鉴、改革尖兵”。这也是中央领导人第一次明确提出群众喉舌的概念。^④

① 参见《中国新闻年鉴》（1990年卷），1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

② 参见上书，6页。

③ 《中国新闻年鉴》（1997年卷），3页，北京，中国新闻年鉴杂志社，1997。

④ 参见《人民日报》，1998-10-08。

“喉舌论”是马克思主义新闻学的基石，中国共产党一贯坚持对中国新闻事业的领导，从不讳言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新闻事业是党、政府和人民的耳目喉舌。党认为新闻媒介不仅仅是党的耳目喉舌，也是政府与人民的耳目喉舌，也就是说，新闻媒介不仅要使上情下达，也要使下情上达，下情互达。新闻媒介不仅要坚持党性原则，而且要坚持人民性、群众性等原则，对党负责的同时也要对人民负责，对上负责的同时也要对下负责，对领导负责的同时也要对群众负责。

二、新闻本位的回归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遗留给中国新闻界的是一些空洞的政治口号和一些不科学的观点。长期以来，新闻学的绝大部分概念、范畴、原理既没有明确和稳定的质的规定性，又缺乏必要的严密的科学论证，甚至不少人还怀疑新闻学是否是一门独立的学科。什么是新闻？如何看待新闻价值？新闻事业的性质是什么？新闻具有哪些属性？新闻与宣传的关系应该是怎样的？新闻传播有无规律可循？对于这些属于新闻基础理论范围问题的回答无疑会直接关系到新闻实践活动的展开，关系到新闻改革的方向。“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的新闻改革也迫切需要理论界正本清源，澄清是非，为具体的新闻工作提供理论指导。

在进行新闻学基础研究的同时，新闻界首先开始重新认识马克思主义新闻理论，研究列宁、斯大林、毛泽东、刘少奇等人的新闻思想，逐步克服了过去在学习运用马克思列宁的经典著作时形成的教条主义、本本主义、实用主义和形式主义，从研究探讨经典作家新闻思想形成的历史渊源、文化背景入手，阐释其基本观点与重要范畴，了解其本来面目，在此基础上指导新闻实践。

（一）关于新闻的定义及相关问题

怎样的新闻定义才是科学的？在“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的几年中，新闻界在研究、吸收、借鉴英国、美国、德国、日本等国新闻定义的基础上，对我国新闻的发展进行梳理，对不同的新闻定义进行总结。

经过广泛、深入的探讨，新闻界比较认同陆定一在1943年提出的“新闻是新近发生的事实的报道”的定义。

在80年代初对新闻定义的讨论中，新闻与信息关系的问题也成为热点，人们对新闻是一种信息有了越来越多的认同。信息观念对新闻工作的影响也越来越大。增加新闻的信息量成为媒介改革的方向之一。

在关于新闻价值的探讨中，也存在许多不同的见解。但人们已经开始从主观标准的测试转向将其视作新闻事实内涵的客观素质，如有人提出，新闻价值是新闻事实满足、适应社会需要的功能，它是由新闻事实和社会需要两方面决

定的；这里只有当新闻事实与社会需要完全相吻合的时候，才能产生最大的新闻价值。这种看法反映了新闻价值的客观性，也说明了新闻价值的本质含义，是一个值得重视的意见。“渤海二号”沉船事件揭露于众，与广大人民群众的愿望和需要恰恰相吻合，便充分显示了它的价值功能，产生了意想不到的社会影响与效果。

在我国，新闻与宣传有着密切的关系。宣传价值是宣传者的主观意愿适应客观社会发展规律的功能，大多数新闻既有新闻价值又有宣传价值，实现新闻的双重价值，是获得新闻最佳社会效果的根本保证。对新闻定义的重新认识，标志着新闻改革越来越多地遵循新闻自身的规律。

改革开放后，新闻的商品性问题成为新闻界关注的焦点之一。早在 20 世纪 50 年代，复旦大学新闻系王中教授就提出，报纸具有两重性，一重是宣传工具，一重是商品，而且是在商品性的基础上发挥宣传工具作用。但他的理论长期以来一直受到批判。现在旧话重提，人们对于报纸是商品基本上没有分歧，问题集中在新闻是否具有商品性、新闻是否是商品上。有人认为，新闻有了商品性就会降低新闻的质量。在新闻实践中，这种担心并非多余。在新闻市场上，只有具有新闻价值的新闻产品才会受读者欢迎。所以，新闻商品性将促进新闻工作者努力提高自己的素质，深入实际，不断创新，向读者奉献高质量的新闻产品。当然，在新闻的供求关系上，大众对包括低俗的内容在内的社会新闻有很大的需求，新闻媒体一方面要提供雅俗共赏的新闻产品，另一方面，也要对读者进行适当的引导，在精神文明建设中发挥积极作用。随着新闻事业的发展和市场竞争日益激烈，新闻市场将逐渐细分，将出现大众化的市民报纸和严肃报纸，新闻市场也将出现大众化乃至庸俗化倾向。但作为一种特殊商品，新闻具有引导社会舆论的特殊功能，所以它承担的社会责任特别重大。

（二）新闻事业的性质及相关问题

相对于新闻的定义，对新闻事业的性质的认识更为复杂。“报纸是阶级斗争工具”这一论断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已经不适用，取而代之的是“阶级舆论工具”论与“社会舆论工具”论。因为新闻事业在阶级社会，既主要作为反映和引导舆论的工具，又有鲜明的阶级属性，故而用“阶级舆论工具”或“有阶级性的新闻舆论工具”概括较为合适。但也有一部分人认为，新闻事业除了具有阶级性外，还有其共性和本质属性，新闻事业的共性和基本属性就是它的社会舆论性。用社会性更能突出新闻事业广泛的社会功能，因而倾向于用“社会舆论工具”来表述新闻事业的性质。

与对新闻事业性质的认识有关，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报纸要不要继续强调

“灌输作用”与“组织作用”当时也进行过争鸣。长期以来，中国的新闻事业十分注重宣传功能，强调“灌输作用”与“组织作用”，注重新闻及媒介的宣传价值，而对新闻的信息价值、对媒介的其他功能重视不够。在改革中，新闻媒介发布消息、引导舆论、开展批评、沟通情况、传播知识、提供娱乐、刊登广告等功能得到强化，新闻事业的多元化功能得到了认可。

1978年，财政部批准了人民日报社等8家新闻单位试行企业化管理的报告。1987年，国家科委首次将“新闻事业”和“广播电视事业”纳入“中国信息商品化产业”序列，这标志着国家对新闻传播业产业属性的认可。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之后，尤其是中共十三大确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后，关于市场经济条件下新闻的属性以及新闻事业的产业属性的讨论开始见于各种报章。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信息是商品，信息产业被列为第三产业，而新闻也是一种信息，具有商品属性，所以新闻事业也属于第三产业。新闻事业具有意识形态色彩，属于上层建筑，但同时它又为社会提供各种信息和娱乐服务，这就要求新闻媒介在实现良好社会效益的同时搞好产业经营，提高经济效益。

随着大家对于新闻及新闻事业性质的认识的提高，信息观念、服务观念和效益观念越来越深入地影响着人们的新闻实践。传播新闻信息成为新闻事业最主要的特性，为受众服务成为办报的指导思想之一，而重视实际的传播效果也成为办报的出发点之一。

三、西方新闻传播观念对我国新闻事业的影响

西方新闻传播观念对我国新闻事业的影响是方方面面的。西方的新闻价值观、自由主义的新闻思想一直深刻地影响着转型期的中国新闻事业。从80年代开始，传播学尤其是大众传播学的研究在中国新闻理论界渐成风气。在经过引进和起步阶段之后，传播学开始了对中国传媒实践的关注，为新时期中国新闻改革提供了理论支持。

首先是对传统新闻观念的冲击，研究人员开始把新闻机构称为“新闻媒介”、“传播媒介”、“大众传播媒介”，而与之相关的其他概念如“信息源”、“反馈”、“把关人”、“受众”、“传播者”、“传播渠道”、“传播效果”、“意见领袖”、“双向传播”也给新闻学界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冲击，与这些概念相联系的是一套全新的思维模式和研究方法。这套理论显然更接近新闻传播的本来面目，对于中国的新闻改革也更有借鉴意义。

1982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和首都新闻学会调查组共同发起的北京地区读者、观众、听众调查，是我国进行的第一次大规模受众调查。这次调查

规模大、统计规范、权威性强、调查结果发表后在国内外引起很大反响，国外传播学者认为“中国传播学研究者在这方面取得了巨大的进步”。国内新闻界则认为“北京调查”是“我国新闻史上一次突破性的行动”，我国新闻学实证研究由此开始，受众观念、受众理论得以建立并强化，受众研究组织相继问世，系统论、信息论等新的方法也被接纳。

更为关键的是“受众”的概念从此深为广大新闻媒介从业人员所接受，进行读者调查、建立相关的信息库是很多媒介的日常工作，而报纸在进行版面改革时往往都会进行相关的读者调查，电视台也非常注意关注自己的收视率。而与“受众”这个概念相关联的是广告市场、发行量大小、收视率高低、潜在的读者市场等概念。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媒体之间竞争加剧，如何将受众市场这块蛋糕做大成为大家关心的话题。

90年代之后，西方媒介经济学的有关理论开始影响中国新闻界，西方传媒的经营管理模式、发行和营销模式、全球化发展的理念，对于正在成长壮大的中国新闻媒介产业、正在组建的报业集团有着很好的指导作用，但我国自己的媒介经济学研究还很薄弱。

第二节 传播者的角色变化与传播内容的相应改变

一、服务于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宣传主流意识形态

从1979年春天开始，全国各行各业根据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精神，深入全面地拨乱反正，彻底平反冤假错案，坚决纠正建国以来政治运动中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中的“左”的错误。新闻界充分发挥舆论工具的作用，对此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宣传报道，有力地促进了这项工作的深入开展。

新闻界首先着力进行了解放思想的宣传。解放思想是一切工作的基础，也是拨乱反正的一个重要方面。这次思想解放运动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它是由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引发的，是继1919年五四运动和1942年延安整风运动之后的又一次重要的思想革命，在中国历史的重大转折中发挥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党的社会主义理论得到了发挥和发展，新闻界积极宣传了这些新的理论观点：关于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的观点；关于建设社会主义必须根据国情，走自己的路的观点；关于在经济文化落后的条件下，建设社会主义必须有一个很长的初级阶段的观点；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集中力量实现现代化的观点；关于社会主义可以实行市场经济的观点；关于改革是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重要动力，对

外开放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必要条件的观点；关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是社会主义重要特征的观点；关于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同改革开放的总方针这两个基本点相互结合，缺一不可的观点；关于用“一个国家、两种制度”来统一国家的观点；关于执政党的党风关系到党的生死存亡的观点；关于按照独立自主、完全平等、相互尊重、互不干涉内部事务的原则，发展同外国共产党和其他执政党的关系的观点；关于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主题的观点；等等。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开始了大规模的彻底平反冤假错案的工作。新闻界及时报道了党中央为历史上重大冤假错案平反的消息，同时对各地区、各部门和各单位根据党中央指示进行的纠正冤假错案工作也进行了及时的报道和宣传。与此同时，新闻界对“文化大革命”期间为捍卫真理，同林彪、“四人帮”进行英勇斗争的英雄人物的事迹作了突出宣传，其中在全国范围内引起最强烈反响的是关于张志新烈士的宣传。这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第一次相当成功的正面典型宣传。

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多次政治运动中，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中，新闻界存在大量冤假错案。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这些冤假错案得到了平反。“三家村反党集团”是“文化大革命”中新闻界的第一大冤案。1979年7月，经中共中央批准，北京市委决定为“三家村反党集团”冤案彻底平反，恢复邓拓、吴晗、廖沫沙三人的政治名誉。不久，“文化大革命”时期被列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的《人民日报》的副刊杂文专栏《长短录》冤案也获平反。

“文化大革命”期间，一大批著名的新闻工作者遭到林彪、“四人帮”的残酷迫害，其中许多人蒙冤而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他们的冤案得到平反。建国初期就蒙冤入狱的著名新闻工作者恽逸群的冤案，也被平反昭雪。

1979年春，复旦大学改正了1957年对新闻系教授王中的错误处理。王中曾因发表新闻学术演讲而受到批判，并被划为右派分子。改正对王中教授的错误处理，在新闻界产生了很大影响，对于新闻界认真探讨新闻理论问题是一个有力的促进。

1989年春夏之交“六四政治风波”过后，经济领域的治理整顿持续进行，经济发展速度降低，经济的发展出现一些消极现象，同时“左”的思潮有所抬头，对市场经济的指责多起来。1991年春，邓小平在上海发表了一系列谈话。《解放日报》连续发表署名为“皇甫平”的评论，秉承邓小平的谈话精神，认为解决经济问题的最根本办法就是坚持深化改革，作者明确提出了市场经济的新思路，否定了“把计划经济等同于社会主义经济，把市场经济等同于资本主义”的

看法，在社会上引起了巨大震动。

1992年春，邓小平在南方视察，并发表重要讲话，鼓励人们大胆改革。3月31日，《人民日报》发表深圳特区报记者陈锡添的长篇通讯《东方风来满眼春》，报道了邓小平在广东考察的情况和邓小平有关改革开放的指导思想，对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入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1997年9月，党的十五大召开，大会明确提出邓小平理论是党的指导思想，并将其在党章中确立下来。各媒体在中央宣传部和各地宣传主管部门的统一部署下，认真宣传邓小平理论，发表了一批有影响的理论文章。

2000年2月，中国共产党总书记江泽民在广东提出“三个代表”的重要论述，即中国共产党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新闻媒介在宣传主管部门的部署下，开始了有关“三个代表”思想的宣传。

二、宣传促进经济改革与经济发展

随着全党工作的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新闻工作也实行了重点转移，即从过去以宣传政治运动为主转变为以宣传报道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为主。1979年3月，中共中央宣传部召开全国新闻工作者座谈会，对新闻工作的重点转移进行了有力的动员和具体部署。新闻界开展的新闻思想理论方面的讨论，推动了新闻界进一步的思想解放，促进了新闻工作重点的转移。

这以后的二十多年来，新闻事业在经济宣传报道方面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对推进我国经济建设起了积极作用。各新闻媒体发表、播出的经济新闻数量和比重大幅度增加，一批经济类报纸、刊物应运而生；经济报道的范围扩大到生产、流通、分配、交换、消费、服务乃至文化生活等多个领域、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这里选择过去二十多年中突出的经济宣传动作简要介绍。

（一）对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宣传报道

实行农业生产责任制是解放农村生产力、促进商品经济发展的重要决策。

1979年8月，《安徽日报》报道了凤阳县农村实行“大包干”的办法，实际上就是“包产到户”。开始一段时期，新闻界对“包产到户”、“大包干”的宣传报道比较谨慎，但总的来说对农村生产责任制是支持的，因此，《人民日报》等报纸在农村受到农民的欢迎，把它的文章作为工作的依据。

农村改革是我国改革开放的重点和难点之一。在农村改革的宣传报道中，《人民日报》表现最突出。从1979年开始，该报开展了“怎样加快农业发展”的

讨论，1980年转入“农民怎样尽快富起来”的讨论，1981年又开展了“怎样加快商品流通”等讨论。在农村改革的宣传报道中，新闻界改进工作作风，一方面让当事人现身说法，使农村的干部、群众容易受到启发；另一方面深入调查研究，用事实说话，发挥典型事例和典型人物的感召作用。

（二）国有企业改革的报道和宣传

与农村改革的宣传相比，城市经济体制改革难度更大。为了推动以城市为重点的整个经济体制改革，1984年以来，新闻界十分重视对经济体制改革的思想、理论、政策方面的宣传，加强了经济评论。《人民日报》、《经济日报》、《工人日报》等报纸在对社会舆论进行大量调查研究的基础上，经常发表旨在正确引导舆论的重点文章。

对城市经济改革中遇到的经济理论问题，对改革过程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新闻媒介经常展开讨论。在这方面，报纸具有明显的优势。1979年11月起，《人民日报》开展了为期一个多月的“弄清社会主义生产目的”的讨论。讨论引起了全国各地、各方面人士的极大兴趣，最终使人们深刻认识到，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是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的需要。这场讨论直接推动了国民经济的调整工作。《人民日报》还开展了关于生产力标准的讨论，为确立“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提供了有力的支持。

1987年6月至7月，《经济日报》开展了“租赁业究竟姓‘社’还是姓‘资’”的大讨论，这个被称为“关广梅现象”的讨论由于涉及经营权与所有权分离的问题，触及了改革的难点，不仅引起全国各界强烈反响，而且引起许多国家和地区的新闻媒介的关注。

在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宣传报道中，典型报道和深度报道占有重要地位，发挥了推动改革的舆论作用。新闻媒介在坚持正面宣传为主的同时，也运用批评性的典型报道，触及工作中的弊端，发挥了很强的战斗作用。从1983年2月9日起，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发表了关于哈尔滨铁路局双城堡火车站野蛮装卸事件的连续报道，历时三个多月，共发消息、评论、录音报道32篇。后来又连续报道该车站的整顿情况和新班子组成后车站的变化。这次批评报道震动全国，受到中央领导人的重视和社会各界的好评，取得了良好的宣传效果。

在经济体制改革宣传报道中，对以经济特区为代表的典型地区的报道发挥了积极作用。新闻媒体发表的报道中所反映的改革实践纷繁复杂，多种多样，如深圳、珠海，如苏南模式、温州模式等等。这些宣传报道一方面帮助了内地经济改革的发展，另一方面，对经济特区和有关典型地区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宣传报道经济体制改革需要研究问题、解决问题，而新闻报道需要针对有关问题进行认真的分析，从而使深度报道成为改革报道中的有力武器。《人民日报》1987年8月6日发表的《鲁布革冲击》等报道，就是这一时期反映经济体制改革深度报道的代表作，给人以深刻的启示。

（三）消费者权益保护的宣传报道

经济改革涉及每一个人的利益，在维护消费者权益方面，新闻媒体恪尽职守，这在多家新闻媒体联合进行的“中国质量万里行”和每年三月的“3·15”消费者权益日的宣传活动中得到了充分体现。中国大众传媒对于消费者权益运动的建设性作用，在于真实地再现了消费者权益被漠视的现状，并进而唤起中国消费者维护自身权益的现代意识。

（四）金融宣传报道

随着经济改革的深化，金融越来越成为改革的重点和难点。我国的金融报道是伴随着改革开放特别是金融改革的深入推进而发展起来的。1987年，《金融时报》创刊，专业的金融报刊开始出现。

1992年邓小平同志南方谈话之后，全国经济再掀高潮，资金融通的作用更加明显。1993年，《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问世，各地金融类报纸纷纷涌现。这一时期的宏观调控为金融报道提供了丰富的新闻素材，大量有关金融体制改革、汇率、利率等货币政策的报道成为社会热门话题。此时，金融报道已成为各类经济报纸的重头戏。

进入1998年，中国经济从短缺变为过剩的迹象日益明显，金融作为现代经济核心的地位更加突出。加强金融报道成为媒体面向读者、争取读者、加速新闻改革的重要举措。金融报道为广大读者所关注，成为新闻媒体激烈竞争的热点。

（五）对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宣传报道

我国政府刚开始进行加入关贸总协定时的谈判并不为媒体所关注，但到了90年代后期，随着谈判进入关键时期，媒体对谈判进程进行了严密追踪。在进行新闻报道的同时，各媒体对我国为什么要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加入世贸组织对我国经济有何影响、如何应对加入世贸组织之后的竞争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报道。

在经济宣传报道中，媒体采用的方法、技巧逐渐改进，新闻策划逐渐成熟。由于经济的涵盖面非常广，许多记者在自己从事的报道领域成了专才。一批名记者、名主持人、名专栏作家相继涌现，成为备受众人关注的人物。

三、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力量

新闻媒介在大力促进物质文明建设的同时，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方面也发挥了重要作用。新闻媒介对新时期党和政府通过的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文件、法律、法规等，都作了及时而充分的宣传报道。

正面宣传中的典型报道是精神文明建设极其重要的内容。从70年代后期起，在中央和各地宣传部门的部署下，全国推出了一大批优秀典型，如朱伯儒、张海迪、张华、华山抢险集体、蒋筑英、罗健夫、邓稼先、孔繁森、李素丽、徐虎等。在典型报道中，新闻媒体采用通讯、消息、特写、评论等多种体裁，全方位进行集中、持续的报道。

在加强正面报道的同时，新闻媒体也适当开展了批评性报道，对违背社会公德的行为进行讨论或批评。

增强全体公民的遵纪守法意识，是新时期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任务之一。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新闻界法制宣传队伍不断扩大，法制宣传报道空前活跃，促进了法律常识的普及和全民遵纪守法意识的增强。法制类报纸数量增加，许多电台、电视台都增加了法制宣传节目。

科技报道以发布科技新闻为首要任务。对我国成功发射“亚星”、“澳星”的报道；对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工程的报道；对棉花杀虫基因工程的报道；对秦山核电站的报道；对超导研究的报道；对“银河”10亿次巨型计算机的报道等等，都使读者对科学技术的威力和中国科学技术的发展有了进一步的了解。从1978年起，大量的科技人物出现在媒体上，扩大了科学、科学家的影响，提高了科学、科学家的地位，为在全社会形成尊重科学、尊崇科学家的风气做出了很大贡献。

新闻界还加大了反对伪科学、反对封建迷信的报道。有关媒体冲破重重阻力，揭露“神医胡万林”的行为，得到中央有关部门的肯定。在批判“法轮功”的宣传中，新闻媒体通过对事实的报道、揭露“法轮功”的邪恶本质，同时让悔过的原“法轮功”人员现身说法，收到了良好的社会效果。

四、提供信息，满足社会需求

新闻媒介最主要的功能是向受众提供新闻。新中国成立后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前，由于政治运动接连不断，新闻媒体的喉舌功能被凸现，而报道新闻、提供信息的功能被弱化。近二十年来，随着工作重心转向经济建设，新闻传播事业迅速发展，人们对信息的需求量迅速增加，新闻媒体提供信息的功能得到越来越充分

的发挥。除重大的政治新闻外，经济新闻、社会新闻、国际新闻成为媒介的主角，预测信息、动态信息和反馈信息大量出现，单纯反映事件结果的报告式新闻减少，解释性、分析性、评论性新闻得到加强。

（一）提供重大新闻的动态消息

世界每时每刻都在变化，新闻媒体就是要尽快把世界上的重大事件传递出来。以广播电视为例，在改革开放之前，在新闻报道方面，电子媒介一直是以和报纸出版周期一样的频率播发每日新闻，80年代初，广播电视进行改革，要求报道刚刚发生的事件，新闻时事节目大量增加；到80年代中期，广播就开始要求尽量报道正在发生的事件，即随着事件的进展，不断报道最新的消息，而且逢整点报道新闻、逢半点播发简明新闻已经成为广播电视的惯常做法。无论在国内新闻还是重大国际新闻的报道方面都有了显著改善。电视也更加注重新闻的时效性，现场直播已经得到普遍运用，让受众在第一时间内得到完整而又详实的信息。

与广播、电视相比，报纸在新闻的时效性上有一定的弱势，因此，报纸一方面追踪最新消息，尽可能地将新闻反映到版面上，一方面发挥自身优势，将新闻做深、写透，使读者全面、深入地了解新闻的发展及其背景。

在新闻竞争中，独家新闻是媒体竞争的目标之一。1984年7月29日，在第二十三届奥运会上我国选手许海峰获得第一块金牌，实现了中国奥运会历史上“零的突破”。这条震动世界的新闻，是新华社第一个向全世界播发的，这条快讯比东道主的美联社快20分钟，比路透社快15分钟。同时播发的还有新华社记者的述评和新闻特写，以及背景资料介绍及各界人物的反应，形成一组连续报道，被国内外媒体广泛采用。在当年的好新闻评选中获得特等奖。

（二）从硬新闻到软新闻

服务性与娱乐性新闻同样是各种媒介争夺的资源。人们对于新闻的观点已经发生了变化，判断一条信息是否具有新闻价值的标准不断发生变化，不同读者对新闻信息有不同的需求。

改革开放后，晚报逐步复刊，进而发展繁荣。晚报的内容除了硬新闻以外，还有大量百姓关心的身边小事。软新闻市场仍在不断增长之中。90年代中期起，都市报大量出现，它是与晚报类似的市民报纸。而广播电视台的各种非新闻类节目，如文化、科技、交通乃至娱乐节目，也提供大量的软新闻。在都市生活中，报纸、杂志等媒体越来越成为市民生活不可缺少的信息服务工具，大量的软新闻和广告是市民生活的重要指南。

（三）媒体的竞争越来越激烈，受众对新闻的要求越来越高，媒体为受众提供的新闻种类越来越丰富

从 80 年代后期开始，以各种受众调查结果为新闻的报道在一些报刊上频繁出现。《中国青年报》1993 年成立了旨在了解读者需求的社会调查中心，力求通过广泛的读者调查、舆论调查、青年调查、市场调查进行科学的调研和分析。为了反映公众的意见和态度，《北京青年报》“新闻周刊”于 1994 年 1 月创立“公众调查”专版，率先在媒体中以每周一版的周期，向公众公布各种民意调查结果。随后，《中国青年报》和《南方周末》在其“调查观察”和“社会观察”专版上分别刊登了数十篇精确新闻报道。不久，《工人日报》、《光明日报》和《文汇报》等几十家报纸也开始不定期地推出内容多样、方法层次不同的精确新闻报道。

调查新闻、数字新闻、图表式新闻在媒体上层出不穷。例如财经类报纸总是花大篇幅刊载股市行情，电视台也将股市行情在荧屏上滚动播出；在财经类报刊上，图表不仅仅起到装饰作用，它表达新闻要素的功能往往比文字更加清楚明了。而图片报道则是最受欢迎的报道方式。

（四）新闻竞争与新闻大战

新闻媒介之间的竞争加剧。每一次重要的会议或者突发事件的产生，都是一场新闻大战。许多新闻媒介强化开拓意识，打开自我禁锢，在报道内容、报道结构与报道方式上大胆突破，大大拓展了报道面，开辟了新的报道领域。许多地方报纸改变过去“一地方、二国内、三国际”的思维模式，把新闻触角伸展出去，增加国内新闻、国际新闻、国内外经济信息、国际金融贸易新闻、社会经济新闻等，使受众能眼观六路，耳听八方，掌握国内外各种信息、动向、事态、观念。

五、扶正祛邪，实行新闻舆论监督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新闻舆论监督逐步正常化。20 世纪的最后二十多年中，媒体的舆论监督作用有过起伏，而作用日益加强，为扶正祛邪、维护正常的社会秩序起到积极作用。

（一）新闻舆论监督成效显著

批评报道是舆论监督的重要内容之一。从 80 年代初起，批评报道在数量上明显增加，在质量上有所提高。

1980 年 6 月 14 日，新华社报道了山西省昔阳县水利建设中，由于领导人的错误导致劳民伤财的“西水东调”的蠢事。1980 年 7 月 22 日，《人民日报》、《工人日报》同时发表了关于“渤海 2 号”钻井船翻沉事故的消息，《工人日报》

还发表了该报记者采写的《渤海2号钻井船翻沉事故说明什么?》一文，在全国引起强烈反响。这一起石油部海洋石油勘探局严重违章指挥造成的重大责任事故发生后，首都几家新闻单位经过8个月之久的共同努力，终于将事故真相和有关领导的错误态度公之于众。结果，国务院对此事进行了严肃处理。

新闻界对“西水东调”和“渤海2号”事件的报道，实现了批评报道三个方面的突破：一是突破了对重大事故和重大决策失误不公开报道的做法；二是突破了对先进典型的缺点错误不公开批评的做法；三是突破了对高级领导干部的错误不公开批评的做法。

“渤海2号”事件报道后不久，1980年10月，《人民日报》、《中国青年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报道了中纪委对在任的商业部长在饭店吃喝不照付费用的错误进行通报批评的消息，并就此事发表评论。这几起批评报道，在许多人心目中至今记忆犹新。

1989年“六四政治风波”以后，有些人将这场风波归咎为报纸反官倒的报道登得太多。“舆论监督搞多了会诱发动乱，影响社会安定”的似是而非的看法在一部分人心中占了上风。其后几年中批评报道大为减少。在很长的时期内，新闻媒介只打“死老虎”，即将司法机关或纪检部门惩处的案件拿出来亮相，媒介独立行使的揭批腐败分子报道数量很少。

在这种情况下，部分新闻媒体为了满足受众的需求，在舆论监督上采用了一些技巧，使舆论监督在一定程度上得以进行。由于当地报纸在监督当地的事务时会直接受到来自当地最高领导层的阻拦，许多编辑记者将重要的批评稿投递给外地的重要媒体发表，如江苏、浙江等地的记者常把稿件寄给上海的媒体发表，而广东的《南方周末》所登的批评稿件中，80%批评的是发生在全国其他地方的事件，北京的《北京青年报》所发表的批评稿件中，也大都是批评发生在外地的事件。这种方式被称为异地新闻舆论监督。

90年代中后期开始，新闻舆论监督的力度逐渐加大。1994年4月1日，中央电视台在黄金时间开办《焦点访谈》节目，立即引起全国上下广泛关注，收视率迅速上升。同年10月1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也开办了早7点晚7点的《新闻纵横》，这也是一个舆论监督性很强的新闻评论类节目，赢得了众多听众。在此前后，全国各地一批有影响的舆论监督栏目开始涌现。一些栏目成为了全国性或地域性的名牌栏目，成为群众固定阅读、收听、收看的园地，也成为新闻单位联系人民群众的强有力的桥梁和纽带。

新闻媒介的舆论监督近年来已经形成了一套良好的机制。比较大的新闻单位都有专门部门负责处理群众来信，在核实事实的基础上选择一些来信发表，对群

众反映的问题进行调查，通过内参将一些问题向有关部门反映，等等。不必在舆论监督方面表现出色的报纸受到了读者的欢迎。

（二）上下协同，形成舆论监督的良好机制

党的十三大、十四大和十五大政治报告一再强调要发挥舆论监督的作用。中共十五大报告提出了完善民主监督机制的四条途径：党内监督、法律监督、群众监督和舆论监督。

近几年来，党和国家领导人多次强调要加强舆论监督。

1998年春节期间，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看到了山西朔州假酒案的有关报道，立即批示追查原因。人民日报社等新闻单位迅速做出反应，发表了一系列报道，并配发言论，在全国形成了打击假冒伪劣产品的强大社会舆论。同年4月2日，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节目播出《在补碘的名义下》，对山东单县四百多名小学生服用碘钙营养片引起不良反应曝光，江泽民同志看后做出指示，要求全力抢救住院学生，并依法惩处不法之徒。

李鹏、朱镕基多次称赞中央电视台的《焦点访谈》节目。这是对新闻媒介搞好舆论监督的一个促进。朱镕基还赠给这个节目的编辑、记者们四句话：“舆论监督，群众喉舌，政府镜鉴，改革尖兵。”

全国各地各级党政部门都越来越重视和支持舆论监督。

新闻媒介的舆论监督由于尖锐地触及社会现实，损害了一些部门、个人的利益，引起了少数人的报复。与此同时，媒体的舆论监督还经常受到各方面的干扰。在批评报道的采访和制作过程中，经常有人通过关系到媒体说情。面对威胁、利诱和人情，大多数新闻媒体能够恪守新闻工作者的职业道德，不畏强权，不怕威胁，以社会效益为重，以人民群众的利益为重。

（三）新兴媒体在舆论监督方面初显身手

舆论监督是媒体的职责，而新兴媒体在舆论监督方面发挥的作用引人注目。网络媒体在发布新闻方面具有特殊的优势，使他们在舆论监督上也能抢占先机。

2001年7月31日，人民网刊出《人民日报》记者发自南宁的报道《广西南丹矿区事故扑朔迷离》，揭开了当地隐瞒了半个月之久的重大事故。人民网随后的一系列独家报道及评论被各大网站纷纷转载，被网友转贴。人民网的报道对彻底揭开事故的盖子起了重要作用，不仅引起社会的关注，也引起有关领导的重视。此外，网络媒体对一些社会关注的焦点事件，如湛江走私案、远华走私案、胡长清贪污受贿案等，将新闻、评论、背景资料、网友感言等有机结合在一起，进行深刻的分析，发挥了媒体引导舆论的重要作用。

六、新闻从业人员素质、水平逐步提高

新闻传播媒体是新闻传播业的主体，而新闻媒体是由千千万万的新闻工作者组成的。我国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新闻工作者的数量也有巨大增长。粗略统计，截至20世纪末，全国媒体已拥有55万以上的新闻工作者。

新闻工作者的素质是决定新闻媒体质量的重要因素。这里通过两次调查结果粗略介绍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新闻工作者情况的变化。

1985年9月，江苏省记协和省新闻学会对全省新闻专业人员进行了一次普遍的问卷调查。调查显示，具有大专以上学历者占44.6%。在读过大、中专的人员中，学新闻专业的占14.5%。^①

江苏省是我国东部较发达的省份，其经济、文化水平较中西部地区为高，因此，该调查结果应当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中国人民大学舆论研究所和全国记协国内部于1997年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了《中国新闻工作者职业意识和职业道德》大型抽样调查。^②这次调查显示，我国新闻工作者平均年龄为37岁，29以下的记者所占的比例只有24.6%，而香港则为52.0%。我国93.2%的现职新闻工作者拥有大专或大专以上学历，其中拥有大学本科学历的人占53.5%，获硕士、博士或研究生班毕业的人占6.2%，合计59.5%，低于美国的70.1%。高中以下学历的占6.8%。从政治面貌上看，中国共产党党员构成了我国新闻工作者的主体。53.1%的新闻工作者为中共党员，另有19.0%的共青团员和0.6%的民主党派成员。

从新闻工作者年资上看，资深新闻工作者占有较大比例，调查显示，我国新闻工作者平均年资为12年，这在世界各国平均水平来看是比较高的。从专业技术职称看，总体上呈现“中间高，两头低”的正态分布。具有中级职称的占40.7%，具有副高职称和初级职称的分别为18.9%和28.0%，而具有正高职称的占3.2%。

从工作性质看，我国近四分之三的新闻工作者从事编辑或采写工作。从报道领域上看，从事经济新闻报道的人员队伍最为庞大，占19%；居第二位的是文化教育新闻工作者，为15%；而国际上普遍最为人们所重视的时政新闻和国际新闻的报道领域，在我国的人员分配仅分别占第三位（14%）和第七位（6%）。

这次调查还显示，广大新闻工作者对《中国新闻工作者职业道德准则》在提

^① 参见张学洪、弭秀玲：《江苏省新闻队伍初步调查分析》，载《中国新闻年鉴》（1987年卷），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

^② 参见中国人民大学舆论研究所：《中国新闻工作者的职业意识与职业道德》，载《中国新闻年鉴》（1999年卷），北京，中国新闻年鉴社，1999。

高我国新闻职业道德水准方面的作用持相当审慎的态度,认为在新闻职业道德方面至少在以下四个方面存在较为普遍的问题:接受被采访单位或个人的招待用餐,为自己的版面或节目联系赞助,为自己的单位联系广告业务以及接受新闻来源单位赠送的礼品。这一结果表明我们在纠正新闻领域的不正之风方面所面临的形势是严峻的,我们在建立新的道德规范方面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第三节 受众的变化

一、受众的媒介接触与使用

从传播者本位向受众本位的转换,是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我国新闻传播事业发生的巨大变化之一。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迅速提高,尤其是人们文化水平的提高,媒体的受众规模逐渐增大。

受众的媒介占有量是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指标之一。我国受众的媒介占有量在改革开放后的二十多年中变化十分明显。农村电视机迅速普及,在城市一个家庭拥有两台以上电视机已经很常见。1978年,电视机的社会拥有量仅为3万台,现在全国拥有3亿多台电视机,城市居民的电视普及率已达99%,电视观众达11亿人,有线电视用户达8000多万。城市自费订阅报刊的人数不断增加,安装有线电视用户的数量也不断增加。

报纸、广播、电视作为我国传统的三大传媒,其受众在不同时期的使用情况是不同的。80年代初期,我国的农村人口占全国人口的近80%,受经济与文化条件制约,农民普遍以听广播作为获取新闻的首要渠道,接触报纸和电视的很少。1983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听众调查表明,全国受众最先获取新闻的渠道分别是:53%听广播,34%读报纸,13%看电视。但在城市情况则有所不同。1982年的北京受众调查表明,北京通过读报获取新闻的人数超过听广播的人数,但电视也位居第三。

到了80年代中后期,拥有电视机的人数越来越多,以电视作为获取新闻主渠道的受众比例迅速上升。1988年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听众调查显示,电视跃居三大传媒之首,广播退居其次,人们的传受模式变为电视—广播—报纸。

进入90年代后的一个重大变化是,从报纸上获取新闻的受众在数量上超过了广播听众,不仅城市居民如此,全国范围内也是如此(1995年全国调查)。无论是作为第一信息来源还是就重要性面言,报纸都跃居广播之前。从整体上看,电视—报纸—广播的新闻传受模式已成定局。在综合影响力竞争方面,受众接受传媒的模式为报纸—电视—广播。由于不同的传媒各有优势,在相互竞争的同

时，他们还会展现出合作与互补的交叉关系。正是彼此的不可替代性，决定了许多受众多渠道地获取新闻，如早晨收听广播新闻，上午看看报纸，晚上看电视。

二、受众对新闻媒体内容的评价

在受众喜欢的新闻题材方面，国际新闻一直备受青睐。80年代初，国际新闻的主要受众是文化程度较高的知识分子和城镇居民。80年代中后期，国际新闻的受众群体扩大，中央级传媒的国际新闻更受读者喜爱，而且农村受众增加。90年代的多项调查显示，受众对于国际新闻的喜爱有增无减。

其次是国内政治新闻。进入90年代后，受众对国内政治新闻的兴趣显著增长。

80年代以来，受众一直关注批评报道，并对批评报道的现状不满。

此外，受众对社会新闻、经济新闻的兴趣呈增长趋势，而对法制报道的阅读兴趣在80年代中后期上升，到了90年代有所下降。

1997年的观众调查显示，我国电视观众对电视的总体评价是积极的，电视面临着一个较好的社会舆论环境。调查显示，近年来报纸方面一个显著的变化是各地党报阅读率偏低，而形式活泼、内容趣味性强的区域性晚报、各类财经报纸、体育报纸发行量增长很快。

三、媒体对受众的影响

大众传媒的重要功能之一便是推动社会进步，它通过提供信息来改变受众的观念，影响受众的价值判断与行为方式，可以说媒介对受众的影响无处不在。

报纸作为我国的强势媒体，一直拥有稳定的、积极的受众，这些受众的媒介接触时间是相对固定的、持续的，因而报纸对他们的影响也是直接的、长期的。

80年代后期以来，随着电视对社会生活的影响不断扩大，电视文化对人们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的变化产生着一定的影响。

电视除了积极和正面的影响外，也给社会带来了一定程度的负面影响。如人们对“电视节目中的不良情节容易让儿童学坏”这一看法的态度，在1992年的调查中，赞成这一观点的观众比例仅排名第10位，1997年却跃居第2位，赞成度是5年前的2倍多。

舆论监督是新闻媒体的重要职责。观众调查结果表明，在“反映人民呼声”方面，观众的满意度比1992年有所提高，以《焦点访谈》为代表的一些访谈类节目使社会存在的一些焦点问题在电视屏幕上曝光，增强了观众对电视的信

任度。

四、受众对媒体的反馈作用

受众的媒介接触行为对于媒介本身的发展具有很大的制约作用。80年代以来,受众与传媒的互动关系日益密切且变化剧烈。1992年全国观众调查显示,“娱乐消遣”是观众收看电视节目的首要动机,于是广播电视的娱乐节目热遍大江南北。5年之后的1997年,电视在观众心目中的地位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了解国内外时事”已超过“娱乐消遣”、“增长见识”而成为观众收看电视的首要动机。

受众市场是巨大的,媒体在争取现在受众的基础上,还应想方设法开拓潜在受众,这就需要尽可能降低人们获得新闻产品的代价,方便受众。就报纸传播而言,这种努力主要表现在:(1)制定适应读者接受能力的报纸价格;(2)建立方便畅达的订阅发行渠道;(3)创造简洁明快的版面语言;(4)提供促成读者消化信息的转化形态。

对于广播电视来说,方便受众的途径主要是要优化时段安排,强化黄金时段的重点栏目,建构与听众或观众定期见面的“约会意识”,固定播出的栏目与栏目的主持人,同时组合栏目与栏目、内容与内容之间的过渡关系。

五、我国的受众调查

我国受众研究是在改革开放初期起步的。1982年的“北京调查”被视为我国受众调查的真正起点。1986年10月,中国人民大学舆论研究所成立,标志着我国的受众研究有了专门的组织。20年来,许多报刊社、广播电台、电视台都开展过不同规模的受众调查。1995年之后,社会上的调查公司逐渐多了起来,受众调查的广度与深度又有所突破。这些调查一方面帮助传播者更好地了解受众的媒介行为,一方面为广告商在媒体投放广告提供参考,从而使传媒市场的资源配置更加有效,更加合理。

(一) 报纸的受众调查

在开展大规模的受众调查之前,报纸了解读者的方式,一是读者来信、来电、来访,二是定期召开读者座谈会。这两种与读者交流的传统方式,其优点是可以与读者面对面地就某些问题进行比较深入的交流,缺点是受众面较窄,缺乏量化指标,所获得的资料仅能做一般的参考。

随着新闻改革的深化和市场竞争的激烈,越来越多的报纸开始进行读者调

查,想通过科学的抽样方法获取准确的受众信息。通过调查可以了解自己相对稳定的读者群体的人口特征、兴趣口味、阅读模式,也可以了解报纸存在的不足以及读者对报纸的新要求。

此外,报纸为了提高发行量,进行销售代表调查逐渐普遍。所谓销售代表,在公费市场,指的是那些有权决定订阅何种报纸、订阅份数的人;在自费市场,主要指那些报纸零售商。

在我国报纸发行面临着两个市场,即公费订阅市场与自费订阅市场。以国际社会报业发展的一般水准来衡量,我国报纸产业的市场增量和拓展的空间仍然是相当广阔的。我国现阶段日报的千人拥有量仅仅为 50 份,距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于 70 年代中期制定的发展中国家在 20 世纪末的最低限度——日报的千人拥有量 100 份还有相当大的差距,可见中国的自费市场存在着不断扩大的巨大潜力,读者调查大有可为。

(二) 广播电视受众调查

从 80 年代初开始,不少广播电台就开始做听众调查,如 1984 年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河南省广播电视厅分别进行了听众调查,对听众的分布情况、听众结构、收听习惯、兴趣、对广播节目的意见看法等进行分析。同年,中国国际广播电台还向日本 5 000 名听众发了调查信,调查日本听众对中国哪些问题感兴趣以及他们对广播的意见与要求。二十多年间,各广播电台的听众调查未曾间断,调查手段越来越先进,方法更加科学,越来越多的电台为了获得确实可信的听众资料,聘请调查公司或专门的媒体研究机构从事听众调查。

1986 年中央电视台主持进行了一次 28 个城市的观众抽样调查,样本遍及除台湾、西藏以外的 25 个省会城市和 3 个直辖市,这是中国电视发展史上首次大范围的观众调查。1987 年,中央电视台会同各省市电视台一起,进行了第一次全国城乡范围的调查。有全国性汇总资料,也有分省的统计资料,这是一次奠基性调查。至今,每隔 5 年进行一次的全中国城乡电视观众调查已进行了三次,提供了大量有价值的数据和结论。

中央电视台定时地、连续性地坚持组织全国性的受众调查,它的调查记录了我中国电视观众的发展历史,描绘了我中国电视事业发展的轨迹,记录了电视观众收视行为和收视心理的变化轨迹,为电视台的节目安排和节目改革提供了依据。

中国内地的观众调研的主要指标是收视率。新形势要求人们以更加科学的方式了解观众、发现观众。此时,在西方电视业发达国家实施多年的收视率调查开始进入人们视野。

1986 年,中央电视台开始运用计算机进行日常收视率统计,一些地方台也

纷纷开展收视率调查尝试。随着视听市场的发育和壮大,收视率不仅“作为观众意愿的某种表征”而引人注目,更作为调节媒体内部互动以及媒体与广告商之间买卖关系的“货币”而受到推崇和追逐。中央电视台于90年代初开始酝酿自己建立收视率调查网络。全国电视观众调查网的创建工作始于1991年,到1997年底,“全国收视率调查网”已经拥有62个调查站,12200个家庭样本户,覆盖500多个频道。截至2000年底,该网已发展成为世界上最大的观众收视调查网。

观众收视率状况是电视台宏观决策的信息基础,是提高编播制作人员专业水平、改进节目质量的促进因素。收视率被广泛运用于栏目设置、栏目播出时间安排、栏目评议、节目内容选择、电视台管理等许多重要环节,它对广告商的作用也越来越重要,影响到电视台广告定价、编排、播出等方面。为了显示收视率的公开和公正,许多电视台请社会调查公司进行收视率调查,使社会调查业迅速发展。

目前我国收视率调查市场刚刚开始建立,国外一些调查公司也开始进入中国,竞争日益激烈,收视率调查也逐渐形成一个相对独立的新兴行业,规模不断膨胀,年营业额已达1.5亿元上下。

电视台和广告客户都呼吁在中国建立起标准统一的、独立于各电视台之外的电视调查系统。

收视率调查近几年来飞速发展,与电视竞争加剧和境外媒体威胁迫近而大幅产生的市场需求是分不开的。截至2000年,全国所有31家省级电视台已全部开设卫星频道,59.3%的电视家庭通过各级有线电视台接收卫视节目,星网结合、多频道竞争成为电视传播的主流,为在竞争中立于不败,各电视台需要从收视率及其系列指标中了解并发现观众,以便有针对性地满足观众需求和增加与广告商对话的筹码。

与收视率调查的飞速发展几乎同步,以中央电视台为龙头的中国内地电视界开始寻找新的观众调查指标。满意度指标成为中国内地电视界的自觉选择。1999年初,中央电视台开始委托央视调查咨询中心进行全国观众满意度调查,包括节目满意度和频道满意度两部分,每季度一次,样本量大,是目前世界上规模最大的观众满意度调查。

目前中国内地的观众调查已经形成了以收视率调查为主干的调研体系,满意度调查为其补充,并辅以每隔五年进行一次的纵贯式全国观众调查以及各种主题的不定期进行的调查。

第四节 制约因素与传播体制的变化

一、宏观管理体制的变化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新闻传播事业迅速发展的同时,新闻传播体制也相应地不断变化。

由于新闻传播事业的特殊性,它不可能像一般产业那样发展,更多地受到意识形态方面的制约。总的来说,我国的新闻传播事业受到五个方面的调控:(1)政党调控。长期以来,以党委主管新闻媒介,并已形成较为齐全的政策及规定,是我国新闻传播事业的传统。(2)政府调控,即政府通过行政执法、物资分配、广告管理、财政拨款、新闻审读等对新闻传媒进行调控和管制。(3)法律调控。我国虽然还没有专门的新闻法,但监管新闻传播的相关法规已经不少,如《报纸管理条例》(1997-02-01)、《广播电视管理条例》(1997-09-01)等。(4)集团调控。我国新闻媒介业受到各种社会集团的调控监管,如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等。(5)行业调控。目前,新闻媒介的行业管理作用日益显现。全国记协、中国报业协会等机构的协调管理能力逐渐增强。

目前我国对新闻事业实行管理的主要机构有:中共中央宣传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和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

在我国,中共中央和地方各级党委是新闻媒介的最高决策机关。同时,中央宣传部和各地党委宣传部具体领导各级新闻媒介。党委(通过宣传部)批准或直接任命各新闻媒介的主要负责人,制定新闻媒介的工作方针,批准各阶段的工作计划,审查重大的新闻报道和重要评论,监督、审查财务收支状况。自新中国成立,这种机制除了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受到破坏以外,一直延续至今。

我国1949年成立过新闻总署,但到1952年2月就撤销了。在1952年到1987年间,报纸都是由当地各级宣传部门来管。国家由政府部门来对报纸进行管理工作,基本上是从1987年设立国家新闻出版署开始的。它是对新闻出版事业进行宏观管理的重要机构。此后,各省都建立了新闻出版局。一套报刊行政管理制度也建立起来,包括报刊的审批、审读、处罚等。审批分两级,有国家统一刊号的公开报刊和由各省审批的主要用于内部交流的内部报刊。公开报刊的审批程序是,现有主办单位、主管单位向所在地的新闻出版局提出申请,然后再向国家新闻出版署申请批准。内部报刊只要主办单位向省级新闻出版局申请审批即可。对于违规的报刊,新闻出版署行使其管理职能,视具体情况对有关报刊进行警告、罚款、停刊整顿,直至吊销刊号。

除了对报刊内容的管理，报刊经营的管理也是新闻出版署的重要职责。报刊从事经营活动需要办理经营手续，否则不能经营。在这方面，新闻出版署与工商行政管理局联合管理。

新闻出版署成立以来，先后颁布了十多项法规，最重要的是1990年颁布的《报纸管理暂行规定》。管理的原则是依法行政，分级管理。新闻出版署还负责制定中国的新闻出版发展规划；如新闻出版业2000年至2010年发展规划；调整报刊结构、控制总量，提高质量。2000年，新闻出版署改名为新闻出版总署，旨在加强其市场管理职能。

粉碎“四人帮”时，广播电视事业归中央广播事业局领导。该局1977年前为中央直属部门，1977年划归国务院，宣传业务归中宣部领导。1982年5月，中央广播事业局升格为广播电视部，成为国务院的组成部门。其后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分别在政府序列中设立了广播电视（厅）局，地、县两级也成立相应机构。1986年1月，又将电影管理纳入其中，成为广播电影电视部。1998年3月，该部改为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作为国务院直属机构。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职能是：（1）研究并拟定广播电视宣传和影视创作的方针政策，把握舆论导向；指导广播电视宣传和广播影视创作并协调其题材规划；指导广播电影电视管理体制的改革。（2）研究并起草广播电影电视事业管理的法律、法规；制定广播电影电视管理规章和事业的发展规划；监督管理广播电视节目、卫星电视节目收录和通过信息网络向公众传播的视听节目；负责用于广播电台、电视台播出的广播电视节目的进口管理并负责内容审核。（3）审批广播电视机构和单位的建立和撤销；组织审查节目的内容和质量；发放和吊销电影摄制、公映许可证和电视剧制作、发行许可证。（4）管理广播电影电视科技工作，制定有关技术政策和标准。（5）对广播电视专用网进行具体规划并管理，制定政策、规章和技术标准，指导分级建设和开发工作。受信息产业部委托，编制广播电视专用频段的规划，指配广播电视频率（频道）和功率等技术参数，参与制定国家信息网络的总体规划。（6）对其重大宣传进行协调和检查，统一组织和管理其节目的传输覆盖。（7）研究制定广播电影电视系统外事工作的有关规定；管理并指导广播电影电视对外和对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以及台湾地区的交流与合作。

几十年来，我国电视管理体制也曾发生过较大的变化，但基本上试行的是“条块结合”、双重领导的管理体制。所谓“条条”管理，是指从中央到地方的纵向对口领导；“块块”管理则是指各地区党委、政府对同级所属电视台的直接领导。从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作为广播事业的一部分，电视事业基本实行以“条条”为主的垂直统一领导。当时的广播电视机构实际上是行政和事业合一

的体制。1980 年分级管理的体系建立以后，基本改为实行以“块块”为主的分级管理。“条条”领导主要表现为行业管理。

70 年代末，我国电视事业还相当薄弱。应该说，我国电视事业的大发展是在改革开放以来的二十多年间。现在我国电视事业已经具有了相当大的规模，但电视的管理工作还长期处于靠方针政策和行政手段进行领导的状况。到 80 年代中期，电视法制建设才起步，至今法制化管理的水平还很低，很不适应电视事业发展的要求。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主要负责国家政府机关对外发布新闻，同时承担部分新闻事业管理职能。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国际互联网的发展十分迅速，许多报纸、期刊、电台和电视台都建立了自己的互联网站点，一些商业网站也提供新闻，作为自己吸引用户的手段。国家对此的宏观管理由国务院新闻办公室网络新闻管理局负责。

二、新闻媒体内部管理体制的变化

改革开放以来，由于新闻事业改革逐步深化，新闻媒体竞争逐渐加剧，与宏观新闻体制的变革相比，新闻媒体内部的管理和经营工作发生的变化更大。体制变革、竞争加剧、注重经营、注重管理，是新闻媒体最近二十年的显著变化之一。

我国新闻媒体一直被看做事业机构，由国家财政支持和补贴，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按照计划经济的模式进行新闻产品的生产，产品由国家按计划分配，新闻单位既没有自主经营的愿望，也没有自主经营的条件。同时由于长期以阶级斗争为纲，经济发展迟缓，新闻事业的发展也十分缓慢。改革开放之后，这种状况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新闻媒体作为国民经济的特殊行业逐步走上了经营自主和经济独立的轨道。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一些新闻媒体率先走向市场，主动参与市场竞争，在业务领域、用人制度、发行工作、广告创收、扩展经营等方面引入竞争机制，激发了新闻单位员工的工作热情，提高了工作效率，迅速积累了大量资产，为新闻事业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就新闻传播机构的微观管理来说，自新中国成立后，多数新闻媒体实行总编辑负责制、社长负责制、社长领导下的总编负责制等。粉碎“四人帮”后，各新闻媒体的党组织迅速恢复，加强了党对新闻宣传工作的领导。广播电视机构与报社有所不同。除了受党委宣传部领导外，电台、电视台还受各地广播电视局的领导。

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都对新闻事业有过相关的规定。改革开放以来，中共中央宣传部也制定了相应的宣传纪律，国家有关行政主管部门也制定了相应的行政法规，新闻单位根据实际情况重新制定了一系列的规章制度，但到目前为止，我国尚没有专门针对新闻媒介的法律。80年代初期，我国有关部门就开始酝酿《新闻法》，曾起草过多种供立法部门参考的《新闻法》草稿。但立法机关非常谨慎，虽然经过多次讨论，目前尚未定稿。根据有关部门制定的《新闻出版事业2000年至2010年发展规划》，建立以《新闻法》、《出版法》和《著作权法》为主题的新闻出版法律体系预计要到2010年才能实现。

尽管《新闻法》历经二十多年的曲折历程尚未面世，我国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建设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必然影响新闻传播活动，使新闻传播领域的法制建设逐步发展。即使在英国、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其法律体系详尽、完备，也并非都有专门的新闻法，事实上，世界上多数国家都没有专门的《新闻法》，而对新闻传播事业的法制化管理是通过其他相关法律实现的。因此，由于我国《新闻法》尚未出台就认为我国的新闻传播法制建设毫无进展，是没有充分根据的。从1978年至1999年7月，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通过的法律、决定以及国务院发布的行政法规中，许多同新闻活动密切相关，有的法律或法规的某些条款还专门就新闻活动的某些方面做出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等一批法律为新闻法制提供了法律依据和准绳。此外，近年来国家也颁布了若干有关新闻活动和新闻工作的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1981年2月由中共中央和国务院联合发布的《关于处理非法刊物非法组织和有关问题的指示》、1990年12月由新闻出版署发布的《报纸管理暂行规定》、1997年1月由国务院发布的《出版管理条例》、1997年8月由国务院发布的《广播电视管理条例》等都是新闻传播领域的重要法律、法规。

四、新闻工作者的职业道德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的二十多年中，新闻工作者在文化水平、年龄结构、性别比例、技术水平、竞争能力等方面都有了比较明显的提高或改善，但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新闻媒体成为经济主体争夺的对象，许多媒体缺乏完善的管理机制，一些编辑记者在利益面前不能恪守新闻工作者的道德准则。

为了提高新闻工作者的职业道德和人员素质，1981年，中共中央宣传部新闻局和首都各新闻单位共同研究制定了《记者守则》（试行草案），其中含有不少新闻职业道德的内容。1982年后，“新闻职业道德”的概念开始在新闻界广为流行，也成为一些人的研究对象。但80年代初期，由于新闻职业道德问题不甚严

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都对新闻事业有过相关的规定。改革开放以来，中共中央宣传部也制定了相应的宣传纪律，国家有关行政主管部门也制定了相应的行政法规，新闻单位根据实际情况重新制定了一系列的规章制度，但到目前为止，我国尚没有专门针对新闻媒介的法律。80年代初期，我国有关部门就开始酝酿《新闻法》，曾起草过多种供立法部门参考的《新闻法》草稿。但立法机关非常谨慎，虽然经过多次讨论，目前尚未定稿。根据有关部门制定的《新闻出版事业2000年至2010年发展规划》，建立以《新闻法》、《出版法》和《著作权法》为主题的新闻出版法律体系预计要到2010年才能实现。

尽管《新闻法》历经二十多年的曲折历程尚未面世，我国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建设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必然影响新闻传播活动，使新闻传播领域的法制建设逐步发展。即使在英国、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其法律体系详尽、完备，也并非都有专门的新闻法，事实上，世界上多数国家都没有专门的《新闻法》，而对新闻传播事业的法制化管理是通过其他相关法律实现的。因此，由于我国《新闻法》尚未出台就认为我国的新闻传播法制建设毫无进展，是没有充分根据的。从1978年至1999年7月，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通过的法律、决定以及国务院发布的行政法规中，许多同新闻活动密切相关，有的法律或法规的某些条款还专门就新闻活动的某些方面做出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等一批法律为新闻法制提供了法律依据和准绳。此外，近年来国家也颁布了若干有关新闻活动和新闻工作的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1981年2月由中共中央和国务院联合发布的《关于处理非法刊物非法组织和有关问题的指示》、1990年12月由新闻出版署发布的《报纸管理暂行规定》、1997年1月由国务院发布的《出版管理条例》、1997年8月由国务院发布的《广播电视管理条例》等都是新闻传播领域的重要法律、法规。

四、新闻工作者的职业道德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的二十多年中，新闻工作者在文化水平、年龄结构、性别比例、技术水平、竞争能力等方面都有了比较明显的提高或改善，但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新闻媒体成为经济主体争夺的对象，许多媒体缺乏完善的管理机制，一些编辑记者在利益面前不能恪守新闻工作者的道德准则。

为了提高新闻工作者的职业道德和人员素质，1981年，中共中央宣传部新闻局和首都各新闻单位共同研究制定了《记者守则》（试行草案），其中含有不少新闻职业道德的内容。1982年后，“新闻职业道德”的概念开始在新闻界广为流行，也成为一些人的研究对象。但80年代初期，由于新闻职业道德问题不甚严

重，并未引起新闻界的高度重视，新闻职业道德建设并未真正成为新闻工作者的自觉行为。

80年代中期，新闻职业道德成为人们共同关注的话题。由于新闻事业的经营体制和运行机制开始改革，在增强新闻单位活力的同时，也带来了一些新问题。一些企业或团体通过为编辑记者提供物质或金钱的好处，而使一些信息以“经济新闻”为名出现在媒体上。

面对这些情况，一些地方性新闻机构采取措施，进行新闻工作者职业道德建设。1987年9月，中共中央宣传部、国家新闻出版署和中国记协等有关部门推出《中国新闻工作者职业道德准则》（草案）。1991年1月，中国新闻工作者协会第四届理事会第一次全体会议通过了《中国新闻工作者职业道德准则》，此后经过两次修订。《准则》规定：新闻工作者不得以任何名义索要、接受或借用采访报道对象的钱、物、有价证券、信用卡等，参加各种会议和活动不得索取和接受任何形式的礼金；不得在企业单位兼职以获取报酬，不允许个人擅自组团进行采访报道活动，不得利用职务之便谋取私利。新闻报道和经营活动要严格分开，新闻单位不得用新闻形式做广告，不得向编采部门下达“创收”任务。记者编辑不得从事广告或其他经营活动。

1993年，新闻工作者的职业道德问题受到有关部门和新闻界领导前所未有的重视，中共中央宣传部、新闻出版署、全国记协等机构发出通知，要求遏制不正之风。中央和地方新闻单位纷纷制定各项措施，一场大规模的、自上而下的反对有偿新闻的运动在全国展开，新闻界第一次以整体的名义向有偿新闻宣战。

1994年4月，《科技日报》记者孙树光因受贿罪和行贿罪，被判处有期徒刑7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中心记者蔡原江因受贿罪被判处有期徒刑6年。《人民日报》就此发表评论员文章《新闻界也要警钟长鸣》。

1997年1月23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广播电影电视部、新闻出版署、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又联合发出《关于禁止有偿新闻的若干规定》，强调“新闻单位采集、编辑发表新闻，不得以任何形式收取费用”。并指出：“各新闻单位要分别向社会公布举报电话，接受社会监督。”规定发出之后，各省记协纷纷响应，发表公告，建立新闻工作者接受社会监督制度，一些新闻单位也根据各自情况制定出相应的规章制度。

许多新闻单位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着重落实新闻报道与经营活动分开。经过长期教育和治理，有偿新闻得到了一定程度的遏制。

新闻工作者的职业道德问题在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中后期凸现，有其环境历史背景。新闻改革滞后于经济体制改革，经济发展对新闻媒介的需求大于供

给，媒介的权力就成为众多企业追逐的对象，而经济改革带来的观念变革以及媒体管理的疏漏，给有偿新闻提供了土壤。新闻工作者的收入状况客观上也是有偿新闻泛滥的原因之一。

五、传播媒介的产业化发展

传播媒介除了作为宣传工具之外，还具有产业特性。这个特性近年来表现得越来越明显。2000年，我国广告营业额已达712.66亿元，其中一半左右是通过报纸、广播、电视和期刊四种大众传播媒介完成的。^①除了对经济的促进作用外，传媒本身也是巨大的产业，报纸、期刊的印刷、发行，广播电视的节目制作等都具有广阔的市场容量。

（一）严格的市场准入是我国传媒业最基本的特征

在我国，新闻媒介作为党的喉舌，是事业单位，具有垄断经营的性质，享受政府财政税收政策的优惠。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发展，新闻传播事业的产业特性越来越明显地表现出来。1978年，财政部转批《人民日报》等首都几家报社要求试行企业化管理的报告。1979年4月，财政部在颁发《关于报社试行企业基金的管理办法》中，再次明确报社是党的宣传事业单位，在财务管理上实行企业管理的办法。此后，“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的经济管理体制在全国报业迅速推广。

70年代末媒体商业性广告的复苏，标志着新闻媒体经营管理体制的重大变化。1983年3月，第十一次全国广播电视工作会议把“广开财源，提高经济效益”作为广播电视改革的方针之一。1988年，新闻出版署同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联合发布《关于报社、期刊社、出版社开展有偿服务和经营活动的暂行办法》，第一次以政府部门的规范性文件承认了媒介的广告、印刷等经营活动可以独立出来，组建公司。20世纪90年代，新闻媒体经济实力增长很快，一些新闻媒介开始走上集团化道路。

由于市场准入的保护，新闻媒体很快积累了大量财富，形成了一批相当强大的经济实体。他们积极拓展经营范围，采取新的经营方式，对在新形势下新闻媒体的发展壮大进行了有益的探索。

传媒业与一般的传统产业相比，具有相对垄断性。传媒业的文化新闻属性使得它往往要受到相关政策的制约而形成政策性垄断，这使传媒具有相对较强的垄

^① 参见丁水：《1999—2000年中国广告业发展综述》，载《中国新闻年鉴》（2001年卷），北京，中国新闻年鉴社，2001。

断性。此外，传媒业还具有良好的增值性和独特的赢利模式。传媒具有成本低、速度快、影响广泛的特点，使其能迅速形成规模效应和赢利。

由于新闻单位仍属于实行企业化管理的事业单位，而非企业，所以新闻单位的资产仍是全额国有资产。尽管近年来许多新闻单位资产增值很快，有的还有其他资金的介入，但在对新闻媒体进行清产合资的时候，这些资产仍然属于国有资产。

虽然新闻媒体的实际操作有了许多尝试，现实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但新闻媒体作为事业单位，仍由国家拨款维持运营，实行预算管理体制。新闻媒体实行企业化管理后，为了工商财税登记的需要，其原有资产或主办单位首期拨款就有了注册资本金含义，但实际上并未实行严格意义上的资本金制度。新闻单位实行企业化管理的独立核算制是从事业单位的“自收自支”制发展过来的，而至今大多数新闻媒体仍然接受列入国家财政预算的拨款。这样，即使一些企业通过协办、组织理事会、赞助等方式对新闻单位投入资金，这些资金也不能作为资本投入，通常是作为广告费，新闻单位只能以刊登广告作为回报，出资人并不具有投资人的资格，因此也无法享有投资人的权益。

对于外资，1990年国务院批准公布的《外资企业法实施细则》把新闻、出版、广播、电视、电影列为禁止设立外资企业的行业。1991年，经国务院批准，新闻出版署发出通知，申明新闻出版行业禁止设立外资企业，原则上不搞在华中外合资、中外合作企业（包括港、澳、台）。1994年，新闻出版署再次发布《关于禁止在我境内与外资合办报纸期刊出版社的通知》，重申原则上禁止创办中外合资（包括港、澳、台）的报纸、期刊和出版社等传媒机构。同样，在广播电视领域，《广播电视管理条例》明确规定国家禁止设立外资经营、中外合资经营和中外合作经营的广播电台、电视台。

（二）传媒业是资本进入的热点

正是由于传媒业的良好赢利模式和政府对传媒业的严格限制，在20世纪末，这一对矛盾及其变化发展成为传媒业的一道风景。由于作为垄断经营的新闻传播业可以获得较高的利润。在其他行业的竞争越来越激烈、利润越来越低的时候，新闻媒体的业外资本有很强的进入冲动。尽管国家有相关的规定，但业外资本仍以各种形式进行进入传媒领域的尝试。最主要的形式有两种：一是同报刊或它的主办单位合办报刊，另一种是直接承包报刊的版面、专栏或广播电视台节目。按照有关规定，这些做法都是不合法的，有的新闻单位因此受到了相应的处罚。

由于国家对新闻媒体的设立和经营有明确的权限规定，因此在业外资本进入传播媒介后，国家行政管理部门随时可以进行干预。新闻出版署还曾在有关文件

中规定，要严肃查处协办、挂靠等擅自参与报刊出版活动的违规行为，防止国有资产流失。

尽管国家有关规定不允许业外资本进入新闻媒体，但在实际操作中，新闻媒体与业外资金的结合并不鲜见。除了新闻单位与业外资本直接结合的违规操作外，目前两者之间还有多种融通办法，使业外资金通过合法的方式进入传媒领域。主要办法是通过媒体的下属公司与业外资本合作，这是符合现行政策的。

2001年1月，在全国新闻出版局长会议上，有关方面首次明确指出：要着力进行“传媒领域投融资体系创新”，支持试点集团通过“购并和重组的方式兼营、创办多种媒体”，“试点集团要着重在实现多渠道利用社会资金方面取得进展”。2001年4月，中国证监会公布了新的上市公司行业分类，其中取消了原来的“高科技产业”，新增了“传播文化产业”及“信息传播服务业”。前者的范围包括了“书、报、杂志、资料的出版业”，然而并未包括报纸、杂志的编辑业务。自2002年2月1日起，新《出版管理条例》开始施行。该条例在融资政策方面作了一定的调整，《条例》第39条规定，国家允许设立从事图书、报纸、期刊分销业务的中外合资经营企业、中外合作经营企业、外资企业。

报刊领域较为宽松的政策吸引了大量系统外资金介入。当前报刊市场中，地方性报纸以其贴近读者、贴近实际、贴近生活，具有很强的可读性、服务性、实用性等优势压倒全国性大报，是当前中国报业发展最快、市场拓展最迅速的一类群体。例如，2000年媒体100强中，地方性媒体占了78家。而全国性大众类报刊如《人民日报》、《参考消息》等在区域性报纸的强大竞争力下，失去了往日的风采。此外，以信息产业、财经、娱乐类为代表的新兴行业类报纸，受相关新兴行业的带动，成长极其迅猛。

随着我国传媒市场逐步成熟，社会对传媒的品质要求凸显出来，媒介产业开始进入深度开发与规模竞争时期。其特点即高投入，高产出，大量小型媒体日益萎缩，市场逐步集中于一部分强势媒体之中。从2000年平面媒体情况来看，广告收入在亿元以上的报刊媒体有67家，前100强媒体的广告收入合计为192.15亿元，约占全国10 000家报刊市场广告总收入的59.97%。并且，值得注意的是，强势媒体在确立自己的优势之后，正通过强强联合、成立报业集团等方式进一步扩大市场份额。

与报刊相比，电视领域的政策壁垒更严，这主要源于电视传媒巨大的影响力和广泛的覆盖面，以及本身相对稀缺的资源。目前，系统外资金和电视的合作仅仅停留在制播分离和买断单一节目或时段的广告代理资格两方面。节目制作对准入资格并无限制，现在电台、电视台同企业合作制作节目已经司空见惯。就业外

资本进入来说，实际操作的尝试快于政策法规的制定，这在目前的媒介产业中是一种常态。

关于网络媒体，尽管相关政策限制较少，但由于缺乏赢利模式，以及壁垒太低导致竞争过于激烈，目前缺乏良好的投资机会。而对于跨媒体平台，由于涉及各媒体资源之间的整合，与政策面的相关度更高。

资本市场是现代市场经济的核心，兼具资金融通、体制培育和资产重组三大功能，而资金缺乏、体制落后和资源配置不合理正是中国传媒业面临的问题。借助资本市场，通过资本经营，可以使我国传媒业尽快实现市场化和规模经营，同时可使我国传媒企业的运作摆脱旧体制，完善自身治理结构，并借鉴国际模式不断探索经营管理体制的创新。以《南方日报》、《羊城晚报》、《经济日报》、《光明日报》等报业集团的成立为标志，中国的传媒业已开始通过自身重组和外部扩张等多种方式，寻求更强大的资本支持。

在改革开放与信息革命的双重背景之下，中国的传媒业一方面正发生着从事业向“产业”的嬗变，传媒企业在发育过程中同证券市场及民间资本的融合日益密切；另一方面，正在脱离原始积累的增长模式，充分运用资本运营的手段，实现媒介经济的飞跃。

目前我国传媒产业介入资本市场的渠道主要有两种：

第一，传媒企业发行股票上市融资。我国新闻媒体属于事业单位，直接上市显然存在障碍；另一方面，我国的新闻、影视传媒的产业化运作尚处于起步阶段，行业运行规则有待进一步完善与规范。由于政策和发展阶段性的限制，现阶段我国具有传媒概念的上市公司尚无媒体整体上市者，而主要是影视等媒体中的产业化资产上市，如湖南广播电视发展中心改组后的电广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的上市，其业务架构定位在广告代理、策划、制作，电视节目制作、发行、交换和有线电视网络信息传输三大方面。

第二，传媒机构与上市公司相互渗透。由于我国传媒业仍处于高速成长期，各大媒体都急需资金来壮大自身实力，而直接上市又存在多方面的障碍，因此买壳或借壳上市成为媒体介入资本市场的一种捷径。例如，1999年8月，《成都商报》控股的博瑞投资公司受让上市公司“四川电器”的第一大股东成都市国有资产管理局持有的该公司国家股2 000万股，占该公司股权27%，博瑞成为“四川电器”的第一大股东并将公司改名为博瑞传播股份有限公司。

从目前情况来看，除一些大城市的电视台、报纸外，其他媒体的实力均较弱，在国内竞争加剧、国外传媒企业虎视眈眈的时候，利用资本市场的功能，对媒体进行整合、重组，扩大规模，提高效益，是十分必要的。同时，资本市场的

实力机构，如上市公司，早已将敏锐的目光盯上传媒这一朝阳产业。如湖南投资与湖南电视台联合创办湖南卫视财经节目中心等。

随着我国于2001年11月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传媒领域相关政策有所松动，传媒业逐步对内资、外资开放。就目前而言，不同媒体领域依照自身性质与影响的不同，其对系统外资金的开放程度也各不相同。

（三）控制新闻宣传和新业务、适当放开非新闻业务领域、严格管理将是我国传媒发展的趋势

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正逐步将传统上相互分离的电信、有线电视、计算机等产业融合在一起，并促进传媒产业运营模式的深刻变革。顺应这一潮流，国外各大传媒公司纷纷通过一系列购并组建跨媒体集团。我国有关部门也已明确提出，要加快整合现有分散的资源，以广电影视为主业，以宽带网络传输、互联网、电视台、电台、电影制片厂为主体，努力组建一批在国际、国内有竞争力，资源共享、优势互补的大型广播影视传媒集团。一些地区在这方面已有实质性举动。2001年5月，北京广播影视集团正式挂牌宣布成立。新成立的集团包括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电视台、北京广播影视报刊社以及北视、中北两大电视艺术中心等单位，还有歌华文化（歌华有线第一大股东）、歌华有线电视网络、紫禁城影业、北京音像公司等单位。上海东方电视台、东方广播电台、文新集团和东方网也在联合组建新的东方传媒集团。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这两家大型传媒集团在A股市场上均有各自的窗口公司：歌华有线与东方明珠。2001年12月，我国最大的广播电视集团——中国广播电视集团宣告成立，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中央电视台等都成为其成员。

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和各项改革的深入，国家正在对传媒行业进行改革，改革的主要方向就是传媒业将进一步利用资本市场，运用联合、重组、兼并等形式，组建若干大型报业集团、出版集团、发行集团、广电集团、电影集团；有条件的经批准可组建跨地区、多媒体的大型新闻集团，实行多媒体兼营、跨地区经营；在融资方式上，除新闻媒体由国家主办经营外，报业集团、出版集团、广电集团的新闻宣传部门可在新闻出版广播影视部门融资，其经营部门经批准可以组建为有限责任公司或股份有限公司的形式，发行集团、电影集团可以吸收国有资本、非国有资本及境外资本。可以说，传媒业正在渐渐地向产业化、市场化、资本化的方向发展。

面对业外资本对媒体领域的投资冲动和通过各种变通办法的进入，新闻媒体面临着巨大的机遇和挑战。与此同时，我国对外开放也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2000年11月，我国成为世界贸易组织的成员国，尽管我国政府未承诺新闻媒介

将向外资开放，但与国外媒体的竞争是必然的趋势。在新经济时代，世界范围内传媒领域的融合与兼并愈演愈烈，而要与国外媒体进行较量，我国媒体的分散、低效、结构不合理，将会大大影响媒体的竞争力。目前我国正在制定有关业外资本进入传媒领域的新的政策法规，在保证新闻媒介作为党和人民耳目喉舌的基础上，壮大新闻媒体的经济实力，提高经济效益，增强在新闻信息传播及相关领域的竞争力，达到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双丰收。

【学习思考题】

1. 改革开放后，我国新闻事业在新闻观念上有了什么样的变化？这些变化在新闻改革的实践中有何体现？

2. 什么是新闻事业的党性？什么是新闻事业的人民性？应如何理解两者之间的关系？用实例说明喉舌论在现阶段新闻事业中的地位。

3. 用中国新闻事业改革的进程说明新闻的属性和新闻事业的功能。

4. 用事实说明在我国新闻实践中新闻与宣传的关系。

5. 我国新闻事业的舆论监督是如何进行的？它与西方媒体的角色有何不同？你认为我国新闻媒体舆论监督的作用是增强了还是削弱了？在哪些方面应该改进？

6. 我国受众的媒介接触在过去二十多年中发生了怎样的变化？请按报纸、期刊、广播、电视等不同领域进行说明。

7. 媒体对受众的影响体现在哪些方面？请以改革开放过程中之实例说明。我国新闻媒体对受众的态度有怎样的变化？

8. 我国的受众调查是从何时开始的？你了解目前我国从事调查研究的机构主要有哪些？报纸、期刊、广播、电视的效果研究主要有哪些指标？

9. 请介绍我国新闻事业的宏观管理体制并做出评价，对你的评价做出解释。随着科技的进步和新闻事业的发展，我国新闻事业的宏观管理体制应进行怎样的调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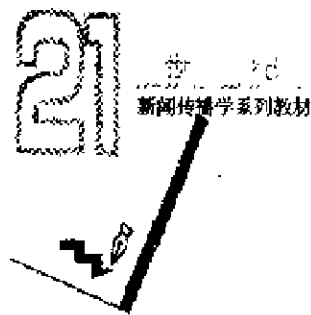
10. 新闻事业是国有资产，是否应使之既承担社会责任，又产生良好的经济效益？在内部管理体制上应如何优化？试以某一媒介领域实际情况加以说明。

11. 请介绍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新闻法制工作的发展历程。《新闻法》是否是我国新闻事业发展所必需的？为什么？请运用有关法律知识，借鉴英、美、法、德、日等西方国家的情况加以说明。

12. 你认为新闻事业是否是产业？它与其他产业有何不同？我国的新闻事业

是不是产业？为什么？如何认识我国新闻事业的产业属性？

13. 我国已经成为世界贸易组织成员，我国是否在开放新闻事业方面对外国做出承诺？面对经济全球化的新形势，我国新闻事业面临哪些挑战和压力？应如何应对？



第十五章

2011.1.10

改革开放以来新闻传播事业的总体变化（下）

第五节 各部类新闻事业的发展状况

一、报纸

（一）报业结构

随着改革开放的迅速发展，报纸的发展也非常迅猛，我国迄今已经发展成为一个约拥有两千家全国统一刊号的报纸市场。报纸市场的竞争越来越激烈，报业技术现代化的步伐加快，报纸的经济实力大增，已形成了一些具有很强实力的报业集团。

1978年，全国只有报纸186种。在1980年、1985年和1992年前后，出现了三次办报高潮。1987年，国家新闻出版署对全国报纸进行重新登记，目的是提高报纸质量，使报纸布局更加合理。当年全国登记公开发行的报纸为1482家。1992年，报纸数量猛增到2200种。经过持续几年的治散治滥后，到2000年初，公开发行报纸仍达2007种。（参见图15—1）其中专业报、晚报、都市报、生活服务类报纸大量增加，报纸品种多样化，从以党委机关报一统天下变为以党委机关报为核心的党报体系占40%左右的多样化报业结构，结构更趋合理。同时，为增加信息量和广告版面，一些报纸不断扩版增期，甚至期发几十个版到上百

个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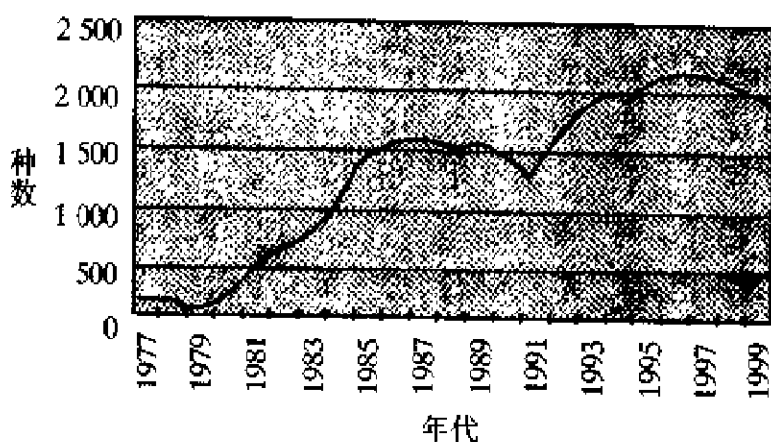


图 15—1 新时期我国报纸种数变化示意图^①

在报纸种数大幅增长的同时，报纸的总发行量也相应提高。1978 年，全国报纸总印数为 127.76 亿份，到 2000 年底，全国统一刊号报纸每期发行总数为 329.29 亿份，是 1978 年的 2.28 倍。但由于报纸种数为原来的 10.79 倍，因此，平均每种报纸的期发行量有大幅度下降，不足 1978 年的四分之一。

在现在的报业结构中，既有党报，也有晚报类、经济类、文化类、生活类、文摘类等报纸，可以说是门类齐全、内容丰富，服务层次多样化；既有全国性大报，也有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地区、县级报纸；既有综合性报纸，也有专业性、对象性报纸。

从宏观背景来说，报业的发展有三个制约条件：一是综合国力的强弱，二是国民整体文化素质的高低，三是城镇人口的多少。作为发展中国家，我国这三个条件都还不算很好。而随着经济的发展，由于政治体制的限制，报业的发展出现了“散”、“滥”现象。主要表现是：

（1）结构失衡，重复办报。从 80 年代初开始的“办报热”，到 90 年代愈演愈烈。以 1997 年为例，我国部委管的报纸 206 家，和部委相对应的各省厅、局所办的行业报有近 700 家，占全国报纸的三分之一。从品种、结构上看，这些报纸不甚合理，造成重复建设、资源浪费。

（2）布局分散，质量不高，形不成规模。多年来，我国批办报纸的思路基本上是计划经济体制下的配给制，有一个一定级别的单位就相应批一份报纸。这样，战线越拉越长，越铺越散。不少部门办起报纸之后，不熟悉报纸的政治性和

^① 根据《中国报刊出版统计》制图，《中国报刊出版统计》载《中国新闻年鉴》（2000 年卷），567 页。

业务性，也没有精力管理，人员素质无法适应办好报纸的要求。报纸质量不高，不受欢迎，发行量小，形不成规模。尽管新闻出版署对各类报纸的最低发行量都有明文规定，如部委报纸最低发行量3万份，1996年年检中发现，达不到要求的占四分之一；厅局报纸发行量应达到2万份，但达不到这个标准的也不少。有的办了多年，仍维持上千份，甚至几百份的发行量，根本无法达到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结合。在我国两千多种报纸中，综合性报纸发行量超过百万的，只有《人民日报》、《参考消息》、《羊城晚报》、《新民晚报》、《扬子晚报》5种，占报纸总数的0.23%，这和世界上综合性大报的发行量差距很大。

(3) 强行摊派，加重群众负担，影响政府威信。由于不少报纸的主管单位在本系统内有制约能力，常常利用手中权力给下面下任务、下指标摊派订报。摊派征订又引起发行大战。近几年每到报纸征订季节，地方报纸和中央报纸抢发行，小报和大报抢发行，形成不正当竞争的恶劣环境。

(4) 违规违法，险情不断。有的报纸卖刊号、卖版面，有的搞一号多报，有的格调低下；有的根本不具备办报条件。从整体上看，违规报纸是少数，但影响很坏。除正式报纸外，我国还有大量的内部报纸，新闻出版署对他们有许多限制，如不准定价、不准登广告、不准征订、不准在社会上发行，等等。但为经济利益所驱动，不少内部报纸严重违规。

针对我国报纸发展的状况，1987年进行报纸重新登记后，对新创办报纸从严控制。1989年10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联合发出《关于压缩整顿报刊和出版社的通知》，对报纸进行压缩。1992年后，我国出现了又一次办报高潮，新办报纸的审批有所放宽，1993年公开发行业报纸已达2039种，1994年达2109种。1993年起，新闻出版管理部门再次强调要对报业实行种数控制，提高质量和社会效益。1995年下半年，新闻出版署未批一张新办报纸。1996年，新闻出版署决定停止批办新的报纸，停止所有报纸的扩版增期和转换主管部门，以遏制报业数量增长的势头。

1996年12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发出的《关于加强新闻出版广播电影电视业管理的通知》，指出：3年内公开发行的报纸总量基本持平，着重提高质量，优化结构；内部报纸改为在本系统、本单位指导工作、交流信息的内部资料，不再列入报纸系列，不得在社会上发行，不得赢利，不得刊登广告。根据上述精神，新闻出版署于1997年3月初又提出关于报业治理工作的具体方案，开始治散治滥。

经过两年多的治理整顿，散滥现象受到遏制，布局结构得到调整。到1999年，中央国家机关还有行业报150种，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还有厅局级报纸

535种。为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政府职能转变的要求,解决“政报分开”,让政府能彻底退出具体出版业务,使报纸出版真正符合出版规律和市场规律,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于1999年8月29日联合发布《关于调整中央国家机关和省、自治区、直辖市厅局报刊结构的通知》,其主要目标就是彻底取消厅局报纸,调整报业结构,加强党报主阵地建设,为党报集约化经营、集团化发展奠定基础,创造条件。到2000年6月底,基本完成了各省的厅局报纸调整工作。同年10月,中央单位的报纸划转工作结束。共压缩报纸24种,期刊14种,划转厅局报纸550种,厅局期刊299种,中央单位报纸有32家划转。^①这次被划转的报纸,绝大部分更名和重新定位,调整了办报宗旨和内容,有利于报刊结构的优化。

（二）报纸发行

从建国初期到现在,“邮发合一”的发行模式已经采用了半个世纪。即使是在今天,以全国各省市读者为主要对象的中央大报依旧需要依赖“邮(政)发(行)”系统,因为多数报社没有足够的人力物力在全国范围内自办发行。1985年前,我国的报纸几乎全部通过邮政渠道发行,自办发行的报纸仅有1家。

随着我国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过渡,“邮发合一”的发行模式日益显出其固有的弊端。在过去的50年,邮局的报刊发行量增长了75倍,而邮路长度只增加了3倍,邮政局的数量几乎没有什么增长,在这一背景下,邮政部门的运输力量和投递力量严重不足,导致报刊邮发质量连年滑坡,邮局投递的报纸总是晚于应该送达的时间,使“新闻”变成“旧闻”。1985年,邮发报刊多达3866种,报刊发行量已经占到邮政业务总量的84%,但邮局的报刊分发处理与运输投递能力却没有相应的改善,越来越不能适应业务发展的需要,在一些城市甚至发生了严重积压报刊邮件的现象。

报纸发行费用是报纸生产成本的重要组成部分,在邮发合一的体制下,邮局的发行费率是相当固定的,最低25%,最高则达45%,这就使许多报纸通过降低成本来增加竞争实力的努力成为空谈。对于邮局来讲,越来越多的报纸都由其来发行也是不可能的;有的报纸不断扩版增期,从十几个版到几十个版乃至上百个版,一方面邮局无法完成投递业务,另一方面,发行费也成为报社与邮局之间争执的焦点。邮局也不得不突出重点,保证各级党报党刊的发行,鼓励那些期发数不足五千份、读者面窄的报刊另想办法,多渠道发行。

在这种情况下,报纸开始了自办发行的尝试。1985年1月1日,《洛阳日

^① 参见《中国新闻年鉴》(2001年卷),51页。

报》率先宣布脱离邮局，挣脱束缚，大胆闯新路，实行自办发行。在实行自办发行的头五年中，《洛阳日报》的年发行量平均增长率超过10%。该报的发行费在降低，而每年的发行量却在上升，与其他报社发行量不断下降形成了明显的反差，该报的举措在许多中小城市引起了不小的震动。

《洛阳日报》自办发行后，由于纸价上扬，邮局的发行费率上调，一些日报与晚报纷纷加入自办发行的行列。进入90年代之后，几乎全部的中等或中等偏大的城市党报、独立核算自负盈亏的广播电视报以及文化、生活、消费类报纸，都纷纷自办发行。到1998年底，全国已有八百多家报纸实行自办发行。目前我国报业采取的邮局发行、自办发行和邮报结合等多种发行方式，扩大了报纸的读者范围和社会影响力，降低了发行成本，增加了报社资金流动，带动了报业经济发展。

自办发行大大缩短了投递时间，明显提高了投递质量，发行费用减少。自办发行的读者对象主要是自费订阅的读者，因此报纸必须把改进内容放在第一位，这促进了报纸质量的提高。《广州日报》通过改革，使新闻业务和经济效益同时大幅度提高，到1999年，自费订阅率高达80%，在所有党报中比例是最高的。

近些年大量出现的都市报、生活类报纸基本上都是通过自办发行，用较短的时间打开局面，站稳脚跟。

1994年，《北京青年报》开始自办发行。1996年7月23日，小红帽报刊发行服务有限公司成立。该公司全面代理《北京青年报》以及在北京发行的四十多家报刊的发行工作，保证在早晨7点钟将《北京青年报》送到报摊，在中午之前将报纸送到订户家里。小红帽公司在北京地区代理发行《广州日报》、《深圳特区报》等地方性党报达21种。在一些大城市中，类似的报刊发行公司越来越多。

尽管诸多报纸在发行上花了很大力气，对许多人来说，报纸发行量却一直是个谜。由于报纸竞争的加剧和争取广告客户的需要，许多报纸虚报发行量，损害了广告客户的利益。1999年1月15日，《中国计算机报》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公证仪式，证明该报1998年每期的邮局订数为18.1万份。会上，北京市公证处的公证员表示，由公证机关来为一家报纸的发行量进行公证，这在我国还是第一次。此后又有一些报纸这样做。而《北京晚报》等报纸则直接在版面上公布自己的发行量。一些报社和广告界人士呼吁建立报纸发行量核查机构，但至今迟迟未有结果。

（三）报业发展与竞争的新格局

在报业发展过程中，有许多引人注目的现象，晚报、经济报纸和都市报十分抢眼。

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的二十多年间，中断了13年之久的中国晚报事业呈

现出勃勃生机，被人们称为“晚报热”。1978年12月到1992年年初，我国晚报界日趋活跃，除一批老晚报纷纷复刊外，还兴起了“文化大革命”后办晚报的第一次高潮。1979年11月，《南昌晚报》率先复刊。1980年1月，云南日报社主办的《春城晚报》创刊。这是“文化大革命”后创办的第一家晚报，也是我国省级报纸创办的第一家晚报。1980年2月15日，《北京晚报》和《羊城晚报》这两家有影响的晚报同时复刊。同年7月1日，《兰州晚报》创刊，这是“文化大革命”后创办的第一家市级晚报。1982年1月1日，被迫停刊逾15年的《新民晚报》复刊。到1982年年底，全国已有晚报19家，超过了“文化大革命”前的规模。

这以后，几乎每年都有晚报创刊和复刊。其中影响比较大的主要有1984年7月1日在天津创刊的《今晚报》、1986年1月1日在南京创刊的《扬子晚报》和1987年1月创刊于杭州的《钱江晚报》。1991年，全国晚报总数达到51家。

1992年邓小平发表南方谈话后，又一次涌起办晚报高潮。1993年，全国晚报已猛增至104家。1997年10月，据中国晚报协会不完全统计，全国共有晚报143家，其中省、直辖市、省会市及特区市的晚报43家，地市、县级市晚报80家。

值得一提的是，1994年11月1日起，《新民晚报》通过卫星传版在美国同步印刷发行，并于1996年11月9日起正式推出《新民晚报·美国版》，这在全国地方报纸中还是第一家。此外，在全国已经成立的报业集团试点单位中，有羊城晚报社、新民晚报社等单独或联合组建的，晚报在新闻改革和对外拓展中的独特地位不容忽视。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我国经济类报纸的发展经历了四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重新创办经济类报纸。1978年在原《大公报》的基础上办了一张《财贸战线》周报，1981年转变为《中国财贸报》，1982年，进一步转变为全国性的经济类报纸《经济日报》。1979年10月，人民日报社创办了彩印报纸《市场》，在初创的几年中，该报报道经济领域的消息，引导人们改变观念，读者众多，尽领风骚。第二阶段，专门的金融类报纸出现。1987年第一张金融类报纸《金融时报》在北京创刊。但是由于金融在经济生活中尚未处于核心地位，普通人尚感觉不到金融与自己有多大关系，因而把这类报纸视为一种专业性很强的报纸。第三阶段，创办证券报纸。在邓小平1992年南方谈话的鼓舞下，出现了第一批证券报纸。随着金融业的发展，普通百姓越来越多地介入证券市场，证券报纸成为读者购买的对象。第四阶段，从90年代末期起，一批新型的财经报纸应运而生，他们采用现代金融理念和媒介操作方式，借鉴国外财经媒体的经验，对财经事件

进行深入分析。《21 世纪经济报道》、《经济观察报》、《财经时报》等作了有益的尝试。

90 年代中期起,报纸行业出现了创办都市报的热潮。都市报一般由各省委机关报主办或主管。由于省委机关报的经济效益、广告收入普遍比省会城市的市委机关报或晚报差,许多省委机关报为抢占市场,增加效益增长点,办起了与晚报相似、定位于城市居民的子报——都市报,作为党委机关报的延伸和补充。都市报以其崭新的办报思路 and 理念,全新的内部机制和营销方式,全方位报道市民都市生活,取得了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良好结合。四川日报社的《华西都市报》、湖北日报社的《楚天都市报》、河南日报社的《大河报》等坚持保持较高的报纸质量,寓指导性于可读性、服务性、实用性之中,为报业发展开拓了新路。

报业的发展使报纸与读者的关系发生了变化,报业市场从卖方市场变成了买方市场。

在北京、上海、广州,“黑马”不断出现,全国发行的《环球时报》,90 年代初创刊,2000 年最高发行量到 195 万份,年平均发行量 120 万份。上海的《新闻报》分为早、中、晚三次出版。广州两大报业集团旗下的各类报纸在珠江三角洲地区展开竞争。90 年代末期,区域性报纸发展迅速。以城市读者为主要对象的综合性报纸,如《南方都市报》、《北京晨报》、辽宁日报社的《半岛晨报》等发行量和广告额均迅速增长。

(四) 报业经济

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发展促进了新闻媒体内部机制和经营管理体制的变革,报业经营从过去的生产型向经营型转变,走上了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的道路。1978 年财政部批准人民日报社等首都几家报社实行“事业单位,企业管理”体制,确立了新闻单位事业法人地位。新闻媒体开始逐步建立竞争机制、激励机制、约束机制。

中国报业的经济效益日益显著。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国新闻媒体的广告经营业务重新起步。1979 年 1 月 4 日《天津日报》率先恢复商业广告。同年 1 月 28 日上海电视台播出了中国电视史上第一条广告。同年 5 月,中宣部发文给上海市委宣传部,肯定了报纸恢复广告的做法,并对刊登广告做出了一些具体规定。从此,报纸和其他新闻媒体的广告业务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并逐渐成为新闻媒体的经济支柱。我国报纸 1983 年广告收入是 0.7 亿元,到 2000 年达 146.47 亿元。有 50 家报社广告经营额超过 1 亿元,合计总量超过 75 亿元,占全部两千多种报纸广告营业额的一半以上。其中,《广州日报》、《新民晚报》、

《北京青年报》、《深圳特区报》、《北京晚报》和《羊城晚报》6家都超过5亿元。^①报业广告收入已成为我国广告收入的重要支柱。许多报社成为重要的利税大户，如广州日报报业集团作为广州市的十大国有企业之一，上交利税居第二名，达1.4亿多元。报社实力的壮大为报业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也为社会创造了巨大财富。

随着我国报业的集团化发展趋势，新闻媒体在经济实力逐渐壮大的同时，也向现代企业制度的方向迈进。中国报业在发展新闻主业的同时，大力开拓媒介经济，并由粗放经营走向集约经营，经营范围也逐渐扩大。如上海文汇新民联合报业集团的新民大酒店、浦东印务中心等项目，已经成为该集团新的经济增长点。

（五）报业集团

“一手抓管理，一手抓繁荣”，是党中央提出的新闻出版管理工作的总方针。治理的目的是让中国报业由规模数量型向优质高效型转移，由粗放经营向集约经营转移。达到这两个转移总的思路是，组建以党报为龙头的报业集团。

关于报纸的兼并，90年代中期已经露出了势头。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我国报纸在报道形式、报纸风格、新闻时效、报业人才、报纸发行和广告方面展开了激烈竞争。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都比较好的报纸实力越来越强，尤其是一些党报、大报，具有政治导向强、队伍业务精、财力雄厚、管理规范的优势；有些小报小刊因为人力财力薄弱、发行量小、质量又低，已到了办不下去的地步。在这种形势下，一些党报、大报开始兼并小报小刊。实践证明，兼并是报业由粗放经营转变为集约经营的必由之路。作为兼并方，壮大了原有实力，为实现报业集团化准备了条件；作为被兼并方，则依托大报扭转颓势，改变了面貌，实现了办报人员和办报设备的合理流动和优化配置，促进了报纸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统一。

新闻出版署提出，目前组建报业集团必须经新闻出版署批准，组建报业集团的报社必须是党报，组建报业集团必须具备五个条件：较有影响的传媒实力，较雄厚的经济实力，较充足的人才实力，较过硬的技术实力、较通畅的发行实力。

1994年国家新闻出版署在杭州举行的全国首次报业集团问题研讨会上，形成了我国关于组建报业集团的指导性文件。通过对10家省报和15家市报的调查，新闻出版署选定广州日报社作为组建报业集团的试点。广州日报集团经新闻出版署批准，于1996年5月29日正式挂牌运行。到2000年底，全国已建立16

^① 参见丁水：《1999—2000年中国广告业发展综述》，载《中国新闻年鉴》（2001年卷），57～59页。

家报业集团，2000年的资产总额已达180多亿元，年广告额达60多亿元，利润总额达16亿元。主流媒体的报刊资源扩大，种类增多。2000年全国有182家报纸纳入各级党委机关报和报业集团，为实现集约化经营创造了条件。

二、期刊

（一）我国期刊业发展迅速

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我国期刊业发展十分迅速。1978年，我国有期刊930种，总印数7.62册，总印张为22.74亿。到2000年，我国期刊总数已达8725种，总印数达29.4亿册，总印张达100亿。

在改革开放初期，《中国青年》是期刊界的一面旗帜。作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机关刊物，1978年9月10日，《中国青年》复刊。它复刊第1期上的《破除迷信掌握科学》和《“句句是真理”为什么是荒谬的》显示出尚未完全走出极“左”时期难得的睿智；不仅如此，《中国青年》在“天安门事件”还没有公开平反的时候，发表了天安门诗抄，导致杂志被扣。《中国青年》经过这次停印停发事件后，受到思想文化界的广泛关注，发行量猛增，很快突破300万大关。进入90年代后，《中国青年》在市场的冲击之下，发行量一路下滑。1990年，其发行量跌破100万，1994年，发行量不足50万，社会影响力不断下降，经济效益锐减。原有的庞大的读者群已经被雨后春笋般涌现出的杂志分流。

从80年代到90年代，和《中国青年》共同繁荣的还有《青年文摘》、《读者文摘》（后改为《读者》）、《辽宁青年》等一批期刊，其中有的在多年之后逐渐销声匿迹，而有的则在竞争中站稳了脚跟。

改革开放之后，广东出现了一大批有影响的期刊，如《南风窗》、《开放时代》、《焦点》等，但这些经济、政治类的期刊虽然影响直达北方，却叫好不叫座，发行量有限，市场零售更是业绩不佳。反倒是益智实用、雅俗共赏、老少咸宜的《家庭》杂志一路扬帆前程似锦。《家庭》具有很强的社会责任感，在追求“有情、有理、有趣、有益”的基础之上，看重警世与育人。从1986年开始，《家庭》的发行量连续10年都保持在200万以上。1998年5月，其发行量突破300万。从1999年1月起，为了增加竞争力，《家庭》变相缩短出版周期，由原来的月刊改为半月刊，增出下半月版，其发行量亦随之上升到400万，再创新高。总部设在伦敦的世界期刊联盟每年都要出版《世界期刊概况》，列出世界期刊行业50强的排行榜，1999年，广东的《家庭》以400万的月发行量跻身全球综合类期刊发行排名十强。如果以一个家庭三口人计算，400万份意味着《家庭》每月至少有1200万次传阅率。

在综合类生活期刊中,《读者》、《知音》、《女友》都是与《家庭》旗鼓相当、极具竞争力的刊物,它们定位不同,但都赢得了读者的信任。

(二) 周刊是新的市场热点

虽然世界期刊联盟每年出版的《世界期刊概况》的50强排行榜中,中国的期刊数量越来越多,但这并不能代表中国的期刊水平已经很高。如在国外做得极为成功、社会影响大、发行遍布全球的多是综合性时事周刊,而在中国,周刊一直做得不够好。

1980年中宣部委托新华社主办的时事政治刊物《半月谈》创刊,面向基层干部群众宣传普及党的方针政策。依托各地党组织,《半月谈》的发行量十分可观,1992年达到718万份,在全国和亚洲各期刊发行量中均居首位,在世界各国期刊的发行量中居第五位。

中国的第一本真正意义的周刊是《瞭望》。由于新华社在信息的占有方面具有最大的优势,《瞭望》周刊的业绩一直不错,有近30万的发行量。

在北京、最具实力和影响力的综合性文化新闻杂志当属《三联生活周刊》。自从1995年开始进入市场后,逐渐在读者和同行中建立起良好品牌与口碑,成为当今中国期刊界新兴力量的一面旗帜。

2000年正式创刊的《新民周刊》凭借其别具一格的市场定位及新民文汇报业集团雄厚的采编实力,在创办伊始就确定为周刊,成为国内继《瞭望》周刊之后,第二家名副其实的新闻时政周刊。由于该刊在刊期上一步到位,在营销方面又技高一筹,其刊期优势很快转化成发行优势,发行量已超过10万,很快占领了上海市场,并延伸到北京和广东。

在广州,时事综合周刊《新周刊》1996年8月18日问世,它其实也是一本双周刊。

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中国期刊市场的“大户”们,正敏锐地捕捉市场需求,再攀新高。16开期刊发行量第一的《读者》杂志,不满足原有400多万忠实读者的市场地盘,针对不同文化程度的读者群,把月刊改为半月刊,每月推出A、B版。同时还不失时机地将视野由城市转向农村市场,创办了《读者·乡村版》。三份杂志都有良好的发展。

发行量不低的《知音》杂志,在《知音·海外版》期发50多万份的基础上,也将《知音》月刊分为上、下月版,以两种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市场定位,对读者进行分流,从中营造出新的市场。曾在90年代初以大16开国际版本引领国内期刊改版潮流的《女友》杂志,也不甘寂寞地使出新招,把月刊一分为二,该刊的读者群随之扩大,同时也增加了广告业务。1988年,《ELLE-世界时装之苑》

创刊。随后,《瑞丽》、《时尚》等一批面向白领的生活时尚类杂志不断涌现。

随着人们生活节奏的加快,人们对信息的渴求“更多,更快,更高”,期刊纷纷缩短出版周期,增强刊物的时效性。

(三) 我国期刊业的现状

过去,与报纸一样,杂志被看做事业单位,经费来自国家拨款或扶持(如行政性订阅)。杂志以社会效益为主要目的,很少刊登广告。近二十年来,随着中国向市场经济迈进,杂志的商业化、市场化属性逐步突出,但总体上说,杂志和其他传媒一样仍属于不能放开的“特种行业”,杂志定价、增张、改名、刊期变化等事项必须征得管理部门同意,申请新办杂志非常困难,主管部门在总量上实行控制,杂志投资不允许非国有化(个别杂志私有化的尝试都是在地下状态下进行的)。杂志积累下来的资产是国有资产。杂志必须接受来自政府方面的调控。

2000年,全国有期刊8 725种,其中综合类期刊556种,哲学、社会科学类2 089种,自然科学、技术类4 449种,文化、教育类913种,文学艺术类529种,少儿类121种,画刊68种。

在8 725种期刊中,月刊2 767种,双月刊2 773种,季刊2 584种。尽管近几年在大城市周刊和半月刊市场很热闹,但在整个期刊中的份额并不大。

大部分的知名杂志是妇女杂志、文摘杂志、娱乐杂志、健康杂志,中国几乎还没有一份真正影响主流阶层的政经、新闻杂志。2000年,我国超过100万份期发量的杂志有23种,其中《半月谈》、《支部生活》、《共产党员》等涉及时事政治的刊物,主要靠行政指令性发行。从2000年期刊发行量统计数据来看,在发行量最大的期刊中,中小学生读物占有很大比重。地方所办期刊中,发行量超过100万份的共有21种,其中中小学生读物就有11种。

国外许多著名的期刊这些年一直在坚忍不拔地拓展中国市场,《财富》、《商业周刊》、《时尚》等杂志早已进入中国市场,美国的《国家地理杂志》将发行中文版。中国的期刊将面对越来越多的挑战。

我国的期刊正处于上升时期,一方面呈现出一派繁荣景象,另一方面有着明显的问题。不少杂志印刷精美而内容错误百出,价格与目标读者的购买力背离。从分类上看,娱乐性杂志偏多,知识类杂志偏少;综合类杂志偏多,新闻类杂志偏少;文学类杂志偏多,财经类商业类杂志偏少。从规模上看,我国相当多的杂志还处于“作坊办刊”的阶段,从几个人到几十个人不等。拥有一百六十多人的《知音》集团已经算是大型的了。

近20年来,我国期刊广告总体呈上升趋势,而且发展速度比较快,但与其他媒体相比,期刊广告的发展速度则比较低。在80年代,期刊广告占广告总营

业额的比例一般都在4%以上,进入90年代后,期刊广告比例都在4%以下,1995年后更低于2%,1997年甚至达到历史最低点1.1%。尽管1999年重上2%,但2000年又回落到1.59%。(参见表15—1)

表 15—1 1983年至2000年期刊广告占总广告营业额的比例

时间	1983	1984	1985	1986	1987	1988	1989	1990	1991
比例	4.6%	3.6%	3.4%	4.2%	4.1%	4.4%	4.3%	3.5%	2.8%
时间	1992	1993	1994	1995	1996	1997	1998	1999	2000
比例	2.5%	1.3%	1.97%	1.4%	1.5%	1.1%	1.3%	2.01%	1.59%

从发行来看,大多数杂志主要依靠邮局。订户先把钱交给邮局,邮局按月和期刊社结算,占用读者订阅款的利息,同时刊社也很难得到自己订户的数据。一些新创办的杂志搞自办发行,零售市场也逐渐扩大,但稳定有效的地域性或全国性的期刊发行网络尚未形成。杂志信誉、订户信誉、支付手段等诸多因素阻碍着发行网络的发展和健全。

由于中国杂志还不是重要的广告媒体,所以目前大多数杂志的广告页数远远少于编辑页数。但最近几年,《时尚》、《世界时装之苑》、《IT 经理世界》等杂志在广告上已经突飞猛进,广告页数可以占杂志页数的三分之一甚至更多。

我国杂志主要的收入来自发行,畅销杂志的零售量一般都大大超过订阅量。零售量大与邮局对订户的分销速度慢很有关系。由于中国杂志的订户得不到什么订阅优惠,订阅吸引力差。而在欧美,订阅杂志往往比零购便宜得多。

在实际操作中,中国杂志的市场化、产业化还将遭受许多困难和波折。比如,跨地区办刊的众多协调问题;很多有意投入杂志的投资公司很难取得广告经营许可证(主管部门进行限制)和发行权;政府的审批和管理政策还不够明晰,刊号作为最重要的发展资源仍未放开。

三、通讯社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通讯社迄今只有新华通讯社(简称新华社)和中国新闻社(简称中新社)两家。

(一) 新华通讯社

新华社在履行国家通讯社职能、强化党和国家耳目喉舌作用、发挥“消息总汇”优势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正确引导国内舆论的权威性和积极影响世界舆论的力度明显加强。

1983年，新华社提出“建设世界性通讯社”的奋斗目标，坚持“在改革中发展，在发展中改革”的方针，不断开拓进取，在新闻业务、经营管理、队伍建设、通信建设等方面都出现了新的局面。1986年初，新华社又提出“把握大局，改进作风，当好党的耳目喉舌”的方针，进一步强化国家通讯社的职能，宣传党和政府的路线、方针、政策。

1998年1月，新华社宣布已基本实现了在20世纪末建成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世界性通讯社的目标。

新华社在世界范围内建立了一个完整的新闻信息采集和发布的网络，形成了面向全球的24小时不间断对外发稿体系。在全国各省市自治区（除台湾外）和解放军部队中，建立了30多个国内分社，还有10多个支社，拥有国内采编人员3000人；在世界五大洲的92个国家和地区设置了100多个总分社、分社和支社，拥有国外工作人员500多人，其中编辑记者约300人。同时，还在35个国家聘用当地记者、编辑及其他工作人员。

新华社已形成了以中国新闻、发展中国家新闻和世界热点难点新闻为重点的多语种、多渠道的新闻发布体系，发稿量不断增加，时效性增强，充分显示了在国际新闻竞争中的实力。对外发稿已形成了以英文通稿为“龙头”，法文、西文、阿文、俄文、葡文和海外中文专线全面发展，以对内中文通稿为依托，各路专线、专稿多层次延伸的完整体系。

2000年，新华社全年公开报道各条线路共发稿13.65万条，总计7859万字。

国内采编业务管理在新闻发稿体制方面进行了一系列积极而稳妥的改革。围绕增加报道的权威性和影响力，对今日新闻的发稿流程实行“倒流水”改革，建立今日新闻“直通车”发稿程序，有效提高了稿件处理时效。开设了“新华视点”专栏，紧紧抓住社会普遍关心和工作中迫切需要解决的难点、热点问题报道，受到社会各界好评，初步形成了自己的报道品牌。

在国际新闻报道方面，新华社报道贯彻我国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路线，及时、准确、客观、全面地反映了国际形势的深刻变化和世界格局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进程。在香港回归祖国、伊拉克核查危机等重大国际新闻的竞争，新华社显示了强大的竞争力。

新华社的摄影报道注意改善通稿结构，积极改进专稿服务，目前已形成黑白通稿、彩色通稿、晚报都市报专线、对外英文专线、对外中文专线、法新专线、体育专线、网络新闻8条线路发稿，实现了多年来多渠道分类发稿的设想。国际新闻、文艺体育新闻比重明显增加，照片的新闻性、形象表现力得到加强。

新华社建立了以卫星和计算机等高科技为主干的通信技术网络,具备了以现代化技术手段不间断发布新闻信息的能力,形成了为全球各种媒体和其他用户有效服务的现代化供稿体系。80年代,新华社对外广播主要用无线短波,现在已改为主要用卫星传输。1997年,无线广播已停止使用。

新华社的经营工作,经过多年来的努力,以广泛有效地发展新闻信息用户为中心,从经营好通讯社主要产品和直接扩大通讯社主体业务的需要出发,初步确立了具有通讯社特色的经营格局和适应市场竞争的运行机制。

新华社始终把新闻信息产品营销放在经营工作的首位,采取一系列有效措施提高新华社新闻信息产品的信誉和在国内外新闻信息市场的竞争力,初步形成了一支专业化的新闻信息营销队伍和一体化的营销体制及协作机制。2000年全社新闻和电子信息用户发展到9 730家,其中国内新闻信息用户达6 523家,基本覆盖了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各类传统新闻媒体,并开始向互联网站等新媒体和各类非媒体用户扩展;国外新闻信息用户达3 207家,美国、西欧等发达国家的一批主流媒体相继成为新华社的用户。^①到2000年,新华社在133个国家和香港、澳门地区设立了136个电传供稿点,有514家主流媒体成为新华社用户。在用户规模和覆盖领域取得的重大突破,成为新华社基本建成世界性通讯社的重要标志。

新华社的信息开发力度不断加强,信息品种增加,先后推出了一系列电子网络信息和文体信息产品。其中电子网络信息占22类。据统计,2000年各类中外文信息日均发稿1 100条,约55万字。文体和电子信息用户达21万多家。信息产品质量进一步提高,各类信息产品宏观分析预测性稿件比例加大。新华社数据库建设取得明显成效,并在为全社新闻报道服务的同时,积极推向国内外市场。图表新闻专线日均发稿量保持在8幅左右,达到了国外大通讯社的发稿水平。

1997年11月7日,新华社网站建立。2000年上半年改名为新华网,并进行全面改版,栏目总数达168个,每天及时更新内容100万字,成为由8个中外文网站、17个社办报刊和部门网站、35个地方分社网站和40家产业报联合网站构成的国内最大的新闻网站群之一。有1 500多家用户从网上下载收费信息和进行数据库检索。由香港分社金鼎集团参股的中华网,1999年在美国纳斯达克成功上市,取得较好的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网络事业的成功为新华社进一步发展多媒体新闻、提供多样化信息服务创造了有利条件。

音像事业快速成长,经过几年的发展,新华社初步形成以总社音像部为龙头、以国内分社音像采编力量为基础的音像采集网络,形成有10套节目、每天

^① 参见《2000年新华社事业概况》,载《中国新闻年鉴》(2001年卷),63—65页。

制作 200 分钟专题新闻的音像新闻信息系列产品；拥有 430 多家电视台用户，建立了国内最大的通过卫星信道传输电视节目的供稿网络，新华社音像中心成为国内惟一以时政为主的音像制品出版单位，产品数量在全国 300 家音像出版社中名列前茅。

（二）中国新闻社

中国新闻社于 1978 年恢复建制（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机构撤销，业务基本停止）。改革开放以来，中新社的报道业务和规模都取得了较大的发展。

中新社的服务对象是中国港澳同胞、台湾同胞、海外华侨以及外籍华人。对港、澳、台胞的报道成为中新社的特色。

到 2000 年，日均播发电讯通稿量已达 67 条，全年电讯通稿发稿量达 24 477 条，约 1 500 万字。全年发传真图片 9 349 张。此外，中新社全年发专稿 904 篇，为海外 10 家华文报纸制作 8 000 多块新闻版面和图文专版。中新社还出版《中国新闻周刊》、《视点》、《中国经济周刊》等期刊，取得良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在与台湾的交流方面，中新社发挥了积极作用。2000 年记者三次到台湾采访，报道反“台独”的声音，在东南亚和其他海外媒体中发挥了重大影响。

四、广播事业^①

建国以后，广播一直是我国新闻媒介中拥有受众量最多的大众传媒，十年动乱结束后，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进入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广播事业也步入全面改革振兴的新阶段。1980 年全国已有电台近 100 座，发射台和转播台 500 座，调频台 90 多座，初步建成了全国范围的广播系统。在 80 年代初期，遍布于中国城乡的两亿多台收音机、八千多万只广播喇叭依然使广播保持着受众规模第一的地位。

在 1985 年之后，电视超过广播，逐渐成为受众规模最大的媒体。广播与电视、报纸的竞争也越来越激烈，由所谓的卖方市场进入买方市场。1986 年珠江经济广播电台的出现标志着中国广播的改革由局部向整体过渡，主持人主持的板块节目、听众大量参与的谈话节目标志着广播的传播方式由单向的灌输式转为双向的交流式。1992 年上海东方广播电台建立，使广播体制的改革浮出水面，随后专业台与系列台的大量出现，显示了广播的受众越来越细分化，广播的节目越来越专业化，广播的服务意识越来越突出。

^① 相关数据均来自每年的《中国新闻年鉴》。

从1995年开始,广播停止批建新台,强调合理配置现有的节目频道。在全部节目中,强化新闻节目的龙头、骨干作用;在全部时段中,集中人力、物力、财力来办好一套节目和黄金时段,确保中央台和省台一套节目的覆盖。到1998年底,一个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为中心、各省级台为依托,遍及全国的广播宣传网逐步形成。1997年,我国颁布了《广播电视管理条例》、《关于加强广播电视广告宣传管理的通知》、《卫星传输广播电视节目管理办法》、《广播电视设施保护条例》等一批重要法律,改变了广播电视管理依据不足的局面。

1998年,国家广电总局提出“本世纪末,基本上实现村村通广播电视”的重大战略,广播抓住了又一个新的发展机遇。到1999年底,全国共有广播电台299座,其中省级台37座,地市级台260座,县市级有线广播(台)站1304个;除汉语普通话外,使用其他38种方言和少数民族语言进行广播;广播在全国的覆盖率达90.35%,广播听众有7亿多人。全国平均每天播出节目的时间为16752小时。我国对外广播的语言达到43种。2000年,全国广播和电视人口覆盖率分别达到90.35%和91.59%。

(一) 中央台的改革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978年11月,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恢复了在“文化大革命”中停止广播的几个有特色的专题栏目,如《对学龄前儿童广播——小喇叭》、《祖国各地》等。从1979年起,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开始增播新华社专供的最新国际新闻。11月,对电台的新闻节目进行改革,提出多播经济新闻、多谈经济、多从群众角度出发考虑问题。1980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开办广告节目,平均每天播出75分钟。

1980年10月7日,第十次全国广播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强调要提高节目的质量,满足人民群众的需要。还提出中央广播要和地方广播,无线广播和有线广播互为补充,构成一个整体,共同发挥广播的巨大作用。12月11日,中共中央宣传部确定1940年12月30日为中国人民广播事业诞生日。

1983年3月底至4月初,广播电视部召开了第十一次全国广播电视工作会议,会议明确了“坚持自己走路,扬独家之优势,汇天下之精华”的方针,提出要从局部改革进入整体改革,以改革新闻节目为突破,带动教育性、文艺性和服务性节目的改革。

在此之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以“缩短战线、精办节目、提高质量、合理布局”为指导思想全面调整改革了原有的广播节目,他们对一些缺乏特色、与其他节目内容交叉重复或者内容陈旧、形式单一的节目实行了关停并转,将一些可以改造的节目改造为融信息、知识、娱乐于一体的综合性节目,倡导办出名牌栏

目,《午间半小时》和《今晚八点半》就是其中的代表。

《午间半小时》是1987年1月1日开办的一个融新闻性、知识性、服务性于一体的板块式主持人节目。每天中午12点到12点半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第一套节目播出。开播后非常受欢迎,听众反响热烈。它的播出风格也成为许多地方台效仿的对象。《今晚八点半》则是一种类似文艺晚会的通俗节目,相声、歌曲、京剧应有尽有,雅俗共赏,突出大众化和娱乐性。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还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对广播的黄金时段进行了划分,根据不同时段人们不同的收听心理进行了节目的合理布局,早晨以新闻节目为主,中午以综合节目为主,而晚间以娱乐节目为主。通过改革,增强了新闻时效,扩大了信息量,如《新闻报摘》节目所摘选的新闻评论来自80多家报纸,而《全国新闻联播》所播的新闻都在30条以上,一些重大事件的报道做到了及时、准确、信息量大。全年的新闻节目发稿12万多条,约1200万字,其中本台的消息占到30%左右。

1988年2、3月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委托中国社会调查所、中国人民大学舆论研究所等组织进行了我国首次全国听众的抽样调查,运用现代统计分析技术科学地考察了我国广播听众的基本情况、行为特点、需求目的以及他们对于广播的意见和评价。调查显示,在城镇居民中,广播已经排在电视和报纸之后,成为人们的第三种选择。广播听众的平均年龄明显高于电视观众和报纸读者,平均的文化程度和平均文化水平则低于电视和报纸受众。调查还表明在我国至少有1.35亿居民收听外国电台的广播,如BBC和美国之音,而且这部分人群的整体素质较高。国外电台已经开始争夺中国广播的受众,这也促使广播进一步加大改革的力度。

1990年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50岁生日”,这一年,该台每天累计播音107个小时,有1300名工作人员,收听其节目的听众有8亿,人口覆盖率达73%。

90年代广播工作全面深化改革以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规律。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大幅度地调整改节目和栏目设置,加强了听众的参与意识,出现了直播节目、热线电话、现场报道、板块节目等新形式。1994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过调整,新闻节目次数增加了近一倍,实现了整点有新闻、半点有经济信息,重要节目由主持人直播。新增设的新闻评论性节目《新闻纵横》在“早七点晚七点”播出,使中央台早晚两块黄金时间得以延长,而且是在《新闻报摘》和《全国联播》的基础上所作的深度与拓展性报道,对重要新闻事件进行深入报道与背景分析,对热点问题作跟踪连续报道,提示来龙去脉、前因后果,释疑解惑,在社会上反应强烈,成为名牌节目,也为广播如何办焦点类节目、进行舆论

监督提供了范例。深度报道、系列报道成为广播宣传中有特色有影响的形式，新闻综述、记者述评、新闻分析等方法在广播上大量应用。

2000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优化广播资源，强化新闻立台意识，在第一套节目早晨黄金时间推出长度为150分钟的大型新闻版块节目《这里是中国》，以报摘为龙头，带动一批各有侧重、内在关联的新闻节目，它们包括《新闻纵横》、《新闻背景》、《世界报道》、《今日中国》、《体育直播室》。通过这次调整，中央台新闻节目的种类、时间和形态都有较大的变化，第一套节目中新闻类节目占总播出时间的比例由调整前的25%提高到35%。

2.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978年5月1日，负责对国外广播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际新闻编辑部改名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广播台，用38种外语和5种汉语（其中4种为方言）播出，每天累计播音136个小时。1983年，国际台首次向日本听众发出调查问卷信，这是我国新闻媒介进行的首次国外受众调查。

1984年元旦，国际台对北京地区的英语广播正式开播，这套节目以在北京生活工作的外国人和临时来京参观访问的外国朋友和旅游者对象。不久上海、广州也转播了这套节目。国际台从只有对外的外语广播发展到对内的外语广播。也是在这一年，经过中央批准，国际台被确认为采访国家领导人外事活动的五家中央新闻单位之一，可以派记者随领导人出访，并在第一时间报道外国元首访华的新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35周年庆典时，国际台第一次用英语在天安门城楼直接播出阅兵和群众游行盛况，在国庆节当天上午直接向北美洲进行了现场直播。

1991年元旦，国际台第一次邀请国家主席杨尚昆向海外听众发表新年讲话，在国外引起强烈反响，从此成为惯例坚持到现在。1991年国际台开始采用微型计算机自动控制切换节目，结束了其四十多年来一直人工切换广播节目的历史。

1998年，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对43种语言节目进行了全面改版，增加了新闻信息量，时效性明显增强。又新增添了日语、西班牙语等9种语言的新闻滚动播出，朝语、蒙语和广东话节目实现了新闻直播。通过卫星向美国新世界电台、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等合作伙伴传送节目。同时43种语言全部实行了数字化制作、传播和节目播出。12月26日，国际台英语、德语、西班牙语以及汉语普通话和粤语5种语言的广播节目正式送上国际互联网。

1999年国际台开办了以在华外国人为对象的第二套对内华语广播，同时调整了第一套对内华语广播，两套节目各播音18小时。

2000年，中国国际广播电台进一步确立了“音、视、网、报一体化发展”

的战略目标，在巩固与加强对内对外广播的同时，开拓电视业务，加大互联网建设力度，推动报纸和音像、图书出版业务的改革与发展。国际台的英语广播分别在伦敦、西雅图、洛杉矶、圣地亚哥等中波电台落地，并通过英国世界广播网对北美和欧洲播出。中国国际广播电台除了兴办自己的广播之外，还拥有网络——汉语新闻网、环球华人网、电视网和英语、西班牙语、德语、葡萄牙语、法语、俄语、朝鲜语、日语等 11 个站点的信息集群网站，国际台的网上广播达到 8 种文字、9 种声音。2000 年 8 月，国际台原有的《世界信息报》在重新定位的基础上全面改版，更名为《世界新闻报》，在版面风格和内容编排上都有创意。加上 1990 年 4 月创刊的英文双月刊《信使》和《信息与回声》，国际台的报刊实力大为增强。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和中国国际广播音像出版社隶属于国际台，多种媒体的有效互动已经使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成为新一轮广播复兴的生力军。

中国的快速发展不仅改变着中国自身，而且吸引着全世界的关注，世界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希望了解中国。近年来，国际台每年都能收到来自近 200 个国家和地区的听众来信 60 多万封，按每封来信代表 300 至 500 名听众的国际通用计算方法，这意味着国际台已经拥有至少 2 亿的听众。

（二）“珠江模式”与地方电台的改革

1986 年 4 月，珠江经济广播电台在广州地区公开招聘节目监制人、主持人、编辑、记者和电脑软件技术人员。12 月 15 日，珠江经济广播电台开播，这标志着广播改革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阶段。该台每天逢整点播出信息，逢半点播出新闻，各 19 次，平均每天播发科技和经济信息 110 条。珠江经济台全部节目都设主持人，以两三个小时为一节，播出综合性内容，即所谓的大板块节目，大部分为直播，使听众能更多地参与节目，大量播出群众来信、讲话录音和点播、提问、发表评论或提出批评意见等。一年中听众来信超过 100 万封，每天打来的听众电话达 300 多次。听众普遍认为经济台内容丰富，形式生动活泼，节目具有时代感。

珠江经济台的这套做法被称为“珠江模式”，而其精髓在于将听众当做主人平等地进行交流，它彻底改变了过去说教式的、单向传播的广播模式，树立了一种全新的双向、多向交流的广播模式，导致了整个广播宣传方式的变化，开拓了广播的社会功能，丰富了广播为人民服务的内容，从而被广播电视界广泛采用。

以广州为中心的珠江三角洲和广东沿海地区出现了“珠江台热”。为了更好地为经济建设服务，广东、上海、天津、辽宁、浙江等省、市、自治区都相继成立了经济台，它们多由原人民广播电台派生而来，打破了过去广播电台“一市一台”或“一省一台”的状况。过去广播电台的覆盖面基本上以行政区来划分，市

台覆盖市区，省台覆盖省区，中央台则覆盖全国，而经济台大多以覆盖经济区为目标，如珠江台覆盖珠江三角洲，天津经济台覆盖华北经济区和环渤海经济区。

1989年11月15日，广东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台正式开播，这是一个以新闻为主的综合性电台，每天播出19小时10分钟，每半小时播出一次新闻，这是我国当时新闻播出次数最多最密的广播电台。1991年12月1日，中国第一家24小时播音的广播电台广州人民广播电台正式开播。

1992年11月，上海只有一家广播电台的局面被打破——上海东方广播电台开播。东方广播电台以现代传播技术进行栏目调配与节目播出方式，24小时播出。同时东方广播电台在管理与经营机制方面进行了大胆的尝试，为广播机制改革提出了新的思路和运作方式。

老牌的上海人民广播电台很快与东方广播电台形成了激烈的竞争。1991年9月30日，上海人民广播电台创建了交通信息台，此系国内大城市首创。1992年又开通了英语台，1993年全国首家专业性市场经济台开播。交通信息台预告市区交通现状、船期、车期、航海信息、出租车应叫情况、公交运行消息等，服务性很强。市场经济台开办有“空中市场热线”、“股市热线”、“劳务热线”、“房地产热线”等专业热线，提供各种信息，沟通购销渠道，接受消费者投诉，为健全和完善市场服务。这样就形成了以新闻综合台为龙头的多个系列台的广播群体新格局。系列台形成群体广播优势，覆盖面超出长江三角洲地区。上海人民广播电台开播的谈话类节目《市民与社会》在中午播出，作为新闻的延伸与扩充。上海市正副市长走进直播室，与市民们对话，在市民与政府之间、市民与社会之间、市民与市民之间架起了沟通的桥梁。

广播节目的多元化与细分化，使各台都加强了对象化节目的分量。随着公众休闲时间的增多，对娱乐的需求也增加，提供娱乐成为各广播电台吸引华人的重要手法。东方广播电台提出了“资讯为主干，音乐为血脉，娱乐为外衣”的编辑方针，将为受众提供娱乐节目置于重要地位。1995年6月该台改版，开设周六特别节目，除新闻外，将周六的各类节目全部改版，用整整一天的时间开设娱乐特别节目。东方广播电台于1995年3月开播了全国首家专业金融台，充分利用先进的卫星传送和计算机网络，及时为听众提供信息、知识和服务，每天以滚动的方式五次播送证券、期货、外汇等国内和世界财经行情信息。

近几年来，上海、广东、北京等几个发达的地区，都形成了多台竞争机制或总台下的系列台竞争机制，给广播界注入了活力，栏目化、板块化、专业化使广播的现代信息服务功能不断增强，内容更加充实，更加贴近生活，贴近群众，贴近实际，主持人直播、热线电话、特邀嘉宾、入户访谈等群众参与双向交流的做

法,使广播更加生动活泼。现在各地的交通广播都很火爆,北京电台交通台2000年的广告收入达8000万元。各地交通广播以交通新闻、交通信息为主体,以综合节目为依托,交通特色鲜明,深受听众、特别是司机的欢迎。

（三）广播技术的革新

珠江广播电台在广播改革中始终能走在前列,除了得益于很强的改革意识外,还得益于非常注重广播新技术的利用。早在1988年国内大多数电台仍然局限于调幅广播时,珠江台就率先推出调频立体声广播;1996年又在亚洲首先实现了数字音频广播(DAB)。

20世纪80年代出现调频广播、卫星广播,90年代全国的广播电台开始了从模拟广播向数字化过渡的进程。数字化技术在广播中的运用,已经成为发展趋势,使广播节目的录制和播出质量有了大幅度提高。在节目传输系统中采用了电缆、光缆,并配有数字微波。广播电台今后可以成为集声音、网络服务、信息咨询、娱乐、教育等多媒体于一身的网络信息中心。

从1986年开始,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利用卫星向全国传送多套广播节目。进入90年代,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采编播一条龙,办公自动化、信息处理自动化提高到了一个崭新层次,还建成了全国广播节目交换中心和粗具规模的大型节目资料库,对节目实行计算机管理。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建成了一座集广播编辑、语言录制、节目传送和播出为一体的现代化广播中心,全台43种语言节目全部实现数字化制作、传输和播出,处于国内数字化技术领先水平;节目通过卫星传输,对外中波、短波广播基本上实现了全球覆盖。

数字技术、网络技术、卫星技术使广播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广为传播”成为可能,目前广播在经历了调幅、调频两个技术发展阶段后,正进入数字音频广播新阶段。数字化技术使得广播的频道资源可以更好地利用与整合,从而使针对各类特定受众的更多频道的出现成为可能。

（四）广播的变化与趋势

2000年初的调查显示,北京与上海等地的广播听众出现了回流的现象。因为人们的流动时间增加,生活方式有所改变,呆在家里坐着看电视的人少了,出门在外、在路上的时间多了,广播在占据流动空间方面有很大的优势,现代人很少全神贯注地听广播,一般都伴随着其他的活动,或开着车,或在散步,这种优势是电视和因特网不能比的。广播的优势在于不受空间限制,可以在动态下收听,对流动听众的开发将是日后相当一个时期争取广播听众的重点。而且广播在这方面的优势是其他媒介无法取代的。

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广播已经发生很大的变化。

首先广播的生存时间发生了变化,广播的黄金时段随着社会生活的变化已经发生了变化。早晨听广播、白天看报纸、晚上看电视成为许多人的习惯。以上海为例,广播一天的收听率最高峰值在早晨,其次为傍晚与中午,再其次为深夜。自从东方电台开设了24小时直播后,收听深夜节目的人越来越多,从零点到凌晨六点的《相伴到黎明》节目就拥有30万相对固定的听众。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星星夜谈》也非常受欢迎。

广播的生存空间也发生了变化,广播的城市化倾向越来越浓烈,商品市场、股票市场、金融市场、文化市场基本上都集中在城市,城市因此成为资讯信息高度密集、文化娱乐高度活跃的地区,市场经济的发育水平越高,对信息量和娱乐欣赏需求量以及传播速度的要求越高,因而广播的地域性概念越来越强化,小规模的城市台与社区台不断崛起,同时广播的分类即对象化越来越清晰,广播变成了某种意义的窄播,各种专业台如音乐台、交通台、谈话台、资讯台应运而生。广播需要依据不同的年龄层来设置栏目。

中国传统的广播模式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并且越来越与世界许多国家的广播模式接近,大板块、主持人、直播运作、热线电话、群众参与,这一切手段都在广播里充分运用。广播主持人的出现使原来广播的播报式改为交谈式聊天式,增强了个性色彩。广播的特性还在于“只闻其声,不见其人”,其独有的“心灵与心灵的呼唤”,使广播听众更愿意和节目主持人进行交流,更容易说心里话。

2001年12月6日中国广播影视集团正式挂牌,这给中国广播提供了一个重要平台,中国广播在这个平台上可以改变过去分散割裂、各自为政的局面,集合自己的优势资源办广播,办出特色、办出新生。广播可以与电影、电视、杂志、互联网、文娱活动及其他所有现实媒体相结合,实现广播节目的高效传播和广播产品的再产品化。未来广播将会在更大范围内拓展与其他媒体的合作,走多层次发展之路。

五、电视与纪录电影

(一) 电视新闻的改革

70年代末期,我国电视事业开始了现代化进程。1978年5月1日,原北京电视台改称中央电视台。中央电视台开始使用便携式摄录机(ENG),大大简化了新闻的采制过程,提高了时效。在我国电视事业中,中央电视台是最重要、规模最大的电视事业单位,中国电视新闻的改革和事业发展在它身上体现的十分清楚。

电视事业的改革从新闻业务入手,在70年代末已经开始了。最初的改革从

国际新闻开始。由于技术上的限制，新闻的时效性比较差。1979年9月1日，中央电视台开始在《新闻联播》中增加一组最新国际要闻简讯的口播新闻，适当配发新闻照片或背景材料。1979年9月，中央电视台与合众独立电视新闻社签订了互购电视新闻协定，互相航寄新闻录像带，但时效性依然无法满足要求。1980年4月，从国外定购的新闻可以通过卫星传送，新闻时效大大提高，从原来的两周左右变成一天。世界上许多突发事件，如埃及总统萨达特遇刺、印度总理英·甘地遇刺、美国航天飞机“挑战者号”失事等，电视观众都很快获知，并看到了栩栩如生的景象。

国内新闻报道也随之开始改进。1980年10月召开的第十次全国广播工作会议确定，地方电视台作为中央电视台的集体记者，中央电视台与地方电视台定期通过微波线路互传新闻。1981年7月1日，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节目改进编排，突破新闻纪录影片的窠臼，内容逐渐丰富，权威性越来越强。

1984年1月1日，中央电视台增加白天播出的综合节目，同时设立《午间新闻》。1985年3月开办《晚间新闻》，1986年开办《英语新闻》，1987年创办《经济新闻》（1989年改为《经济半小时》），1989年增加体育新闻，节目越来越丰富。

90年代初，中央电视台开始向国外派驻记者，在英国、美国等国家设有常驻记者站。

1984年4月，中国正式参加了亚洲太平洋广播联盟A区的新闻交换，同时接受B区、C区部分国家的新闻。1986年后，中央电视台又尝试接收欧洲广播联盟、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和东欧国际广播电视组织的新闻录像，新闻来源大大丰富。

地方电视台是我国电视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1983年9月，广东电视台改新闻节目为半直播（直播口播稿和部分录像解说词），这是对直播的新尝试。1984年4月，上海电视台建成了采、录、编、播一条龙的新闻中心后，口播新闻也改为直接播出。

随着各大经济区的形成，许多省市电视台横向联合，组成了地区性的电视新闻协作网，建立了固定的协作关系。

中央电视台在1986年以后对新闻的时效性有了更加严格的要求，经常播出刚刚发生和正在发生的消息，信息量也大大增加。与此同时，成功推出了一批在深度和现场感上有突破的新闻节目、纪录片和杂志型节目。

在电视新闻改革方面，80年代中期曾有过成绩，比如1986年对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企业破产法”讨论的报道。企业破产在当时是非同寻常的大事，是世

人瞩目的热点，因此这个讨论的电视现场采访录象的剪辑播出，被视为中国电视影响社会政治和社会变革的一个范例。当年的9月26日，中央电视台在《新闻联播》之后播出了长达一小时的特别节目——“六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七次会议采访纪实”，首次全面地展示了《破产法》审议会上代表们的核心发言。节目播出后，各界的反响十分强烈，许多观众来信反映，无论在形式上还是在内容上都开了新闻改革之先河。“以多年来从未见过的真实的声音、生动的画面、纪实采访的形式，消除了人们对立法过程的神秘感和不信任感”。可以说在国家政治民主化的过程中，电视为党和政府决策的科学化和民主化发挥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进入90年代以后，特别是在1992年邓小平同志南方谈话和中共十四大精神的鼓舞下，中国的电视新闻进入了一个高速发展的阶段。

1993年3月起，中央电视台第一套节目新闻播出由4次增加到13次（包括体育新闻），实现了整点播出、新闻直播和重要新闻滚动播出，大大提高了新闻的质量和时效。5月1日，大型杂志性栏目《东方时空》开播，它与20分钟《早间新闻》一起，构成一个小时的新闻节目板块。1994年，中央电视台对晚间节目进行了改造。4月1日起在每晚黄金时间开播《焦点访谈》，与《新闻联播》一起构成黄金时间新闻板块，既有新闻总汇，又有热点聚焦，深受观众欢迎。《世界报道》和改版后的《晚间新闻》同时推出，形成又一个新闻收视高峰。1995年4月，中央电视台又推出了《新闻30分》，有意识组织系列和跟踪报道，抓群众关心的问题，收视率直线上升，使午间时段得到有效开发。^①

1996年1月1日，全国最有影响的电视新闻节目《新闻联播》由录播改为直播。同年5月，国内最长的深度报道《新闻调查》开播，也很快名列晚9点时段各个栏目收视率的榜首。《新闻调查》对群众关心的问题进行深入细致的采访，显示出舆论监督的力度。

1997年是中国电视史上值得纪念的一个年份，这一年被称为“中国电视直播年”。以重大新闻的电视直播为标志，中国电视的新闻传播进入了一个新时代。留在人们记忆中的重要直播有：邓小平同志追悼会、世纪奇观海尔波普彗星与日全食同现苍穹、香港回归、中共十五大召开、长江三峡顺利实现大江截流等等。对三峡大江截流进行了长达14个小时的海陆空现场立体报道，香港回归则是72小时的超长式现场直播，这在中国电视新闻史上都是空前的。

1998年，中央电视台在对重大国际新闻和突发事件的报道中，依托高新技术，不断扩大直播领域，现场直播水平日益提高。张北地区发生强烈地震20分

① 参见时统宇：《电视影响评析》，94页，北京，新华出版社，1999。

钟后,中央电视台新闻节目中即作了报道。中央电视台记者三次赴伊拉克及时报道核查危机与“沙漠之狐”行动,实现了重大国际新闻事件报道的重大突破。首次实现了利用卫星可视电视系统直播极地科学考察情况。

电视对外宣传和服务也取得进展。中央电视台第四套节目在海外落地并不断取得进展。1998年7月1日,全天24小时向日本全境播出。到1998年底,中央电视台与19个国家级地区的38家电视机构签署了正式转播CCTV—4的协议。中央电视台英语频道于2000年9月25日正式开播,面向世界各国英语观众,以新闻和新闻性节目为主,全天24小时不间断播出,成为对外宣传的主力军,为打入西方主流社会开辟了有效渠道。

2000年,中央电视台9套节目播出时间为62 010小时。2000年数字化改造成果显著。将所有频道节目全部改为数字压缩方式,新闻制播系统进行了全面的数字化改造。合理调整节目卫星覆盖,提高卫星节目信号质量。

与80年代相比,我国电视新闻出现了许多变化:一是篇幅缩短,1994年前每条新闻平均长71秒,到1994年,每条新闻约长52秒,缩短了19秒;二是时效加快,80年代中期,时效性在一周内的新闻仅占20%多,90年代中期,当日新闻占36.8%,三日之内的新闻占32%;三是容量增大,80年代中期,30分钟的新闻中,每天新闻条数平均为23条,90年代中期平均每天31条;四是自采新闻增加,80年代中期,中央电视台自己采制的新闻只占新闻总数的8.3%,其中国内新闻占14.8%,国际新闻占4.2%,10年后,由中央电视台自己采制的新闻已达63.8%,其中国内新闻占82.7%,国际新闻占49%;五是现场感增强。^①电视已经成为重要新闻传媒。

目前,我国的电视观众总数为11亿人,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的收视率一直保持在47%左右(包括地方台转播该节目的收视率),这就意味着每天有5亿观众在收看新闻联播;而《焦点访谈》的收视率也保持在30%左右,如此高的收视率不得不让人刮目相看。中央电视台在新闻报道活动中逐渐形成了权威性和影响力。

尽管中央电视台同国外一些电视机构交换节目,自身的时效性大大提高,采访半径也延伸到欧洲、美洲,但对一些突发新闻的报道有时仍然有所不及。2001年11月,中央电视台同美国CNN签订交换新闻节目协议。根据协议,中央电视台和CNN分别在它们的新闻节目中使用对方的新闻内容,在国际重大事件的报道中进行合作和协调。

^① 参见时统宇:《电视影响评析》,97~98页。

电视改革涉及节目内容、节目形式和管理工作等多方面，是全方位配套的改革。中央电视台节目内容的改革，主要是在内容上的创新，最具代表性的是开办了《东方时空》和《焦点访谈》等深受观众欢迎的新闻、文艺和专题节目。节目内容改革的重要结果是初步解决了两个长期没有能够解决的问题：一个是怎样发挥新闻媒介的作用，更生动地宣传党的方针政策，使之易为观众接受；另一个是节目内容更加贴近群众，贴近生活，贴近实际，原来那种居高临下教训人的情况已经改观，代之以亲切、庄重、自然、流畅的风格。

节目形式的改革主要是学习和借鉴国外电视界的一些同行的做法，在各专栏节目中普遍设立节目主持人，并逐步向主编式主持人方向发展，使其对节目起主导作用。节目形式改革的另一内容是大量的采用纪实采访方式，尽可能使新闻人物成为新闻的主体，主要由他们来说话，主要反映他们的思想、感情、语言、行动。

节目改革的深入必然会带来一系列新的问题和矛盾，因此必须同时在节目管理制度、财务制度、人事制度、奖励制度等各方面同时进行配套改革。目前中央电视台的配套改革已经全面扩展到栏目管理实行制片人制、节目经费实行承包制、设备使用实行有偿制等方面。

电视是人们生活中重要的新闻传播媒介和娱乐工具，近年来许多省、市电视台的经济效益大大提高，东部大城市电视台的效益良好，而中央电视台则在众多电视台中遥遥领先。1994年我国电视广告营业额为44.76亿元，占总广告营业额的22.35%；2000年增加到168.91亿元，占23.7%。中央电视台2000年实现总收入61.42亿元。2000年全台固定资产达47.3亿元。

（二）电视事业的发展

1980年，第十次全国广播工作会议召开，提出要在20世纪末建成完整的、自成体系的电视宣传网。

1983年，第十一次全国广播工作会议召开。会议制定了中央、省、市、县“四级办电视、四级混合覆盖”的事业建设方针，彻底改变了原来中央和省（区、市）两级办电视的事业格局，使中国电视事业结构向多级办台转变。目前已建立的电视台中，90%以上是市、县两级开办的。

“四级办电视”的方针对推动中国电视事业发展曾经发挥了重要的历史作用，但也存在着大量的重复建设、重复制作、重复播出、重复覆盖问题，导致重复投资，增加了成本，造成严重的资源浪费。同时，由于各级电视台之间的无序竞争，相互瓜分观众群，使覆盖效益降低。一些小电视台为了维持自身的生存与发展，从音像市场购买廉价的海外影视剧，乱播滥放，对中央电视台和省级电视台

的主导地位形成冲击，“散”、“乱”成为电视事业发展的一个严重问题。办电视台需要大投入，我国有超过3 000个县级以上行政区划，多级办台导致电视台数量急剧膨胀，严重脱离我国经济、文化的实际发展水平。从宏观上看，我国电视事业结构失衡、力量分散、重复建设、效益低下、资源浪费，同时导致无序竞争。地市级电视台一般每天播出节目超过10小时，但自制节目却不足每天1小时，导致粗制滥造、严重侵犯知识产权等一系列问题。这种散乱格局无法适应现代化规模经济的大趋势。此外，我国电视事业结构布局严重失衡，一方面东部富裕地区电视台密度大，必须满足观众的多样化需求；另一方面，中西部地区面临提高电视覆盖率的问题。各地电视台虽然建立起来，但严重缺乏制作节目的能力和人才。这些问题严重制约了中国电视事业的健康发展。

电视事业自建立以来，电视台一直既是节目的制作单位，又是节目的播出单位，缺乏一个竞争的市场环境。90年代后期，中国电视事业的改革聚焦于两个方面：一是撤销地县两级电视台的建制，二是逐步实行制播分离。比起前一阶段的微调，这是具有突破性的改革思路。然而，在整个体制和大环境没有根本改变的情况下，这两项改革措施的实施遇到极大的困难。

近年来，电视界加快了改革和发展的步伐。一方面观众量增大，观众需求多样化，另一方面随着科技的发展，频道资源逐渐丰富，可以提供更多的频道进行更具针对性的新闻报道，越来越多的经济频道、文艺频道、影视频道等出现在电视上。电视系列台的建立是新时期中国电视事业发展上的新事物。其中，大量经济台的开办，是适应中国经济发展和经济体制改革的必然产物。但除了中央电视台等少数制作能力较强的大台的专业频道特色还比较鲜明外，不少地方台频道或出于节目供给跟不上，或出于制作指导思想尚不明确，专业特色不明显。从电视事业的长远发展来看，吸取世界各国的经验，在一定条件下与国际接轨，电视界逐步实行宣传与经营分离、台和网分离、节目制作和播出分离等，从而推进电视业的产业化进程，实现电视运营的市场化和电视节目的商品化，这将成为今后一个时期深化电视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也将成为中国电视事业发展的必然趋势。

90年代中后期，湖南电视台《快乐大本营》、《玫瑰之约》等节目广受观众欢迎，湖南电视台卫星频道在社会上的影响力越来越大。该台推进名牌战略，培育名牌节目，形成培养名牌主持人的良好氛围，进而形成了以名记者、名编辑、名主持人支撑名牌节目、名牌频道的良性机制。此外，上海、广东、北京等地的电视台在节目内容、频道资源、经营管理、节目交换等方面取得长足发展，对中央电视台形成了强有力的竞争。为了吸引观众和广告客户，地方电视台集中财力购买节目。如广东电视台在购买体育节目方面不惜重金，获得英国足球超级联赛

的转播权，而中央电视台却无法转播。面对地方电视台的强力竞争，中央电视台部分节目收视率减少，广告收入增长速度下降。

由于电视事业的特殊性，我国对电视事业的从业资格有严格的限制。电视台是国有事业单位，尽管国内有不少单位和个人想涉足电视领域，但往往在诸多限制面前无功而返。我国电视事业一方面积极向境外扩展，一方面严格限制境外电视节目在我国落地。90年代末期，我国政府开始适当放开境外电视节目在我国境内落地的限制。2001年，英国BBC获得在我国境内涉外宾馆饭店的落地资格；2001年12月，全球传媒巨头新闻集团的全资子公司STAR集团的一个综艺频道获中国政府批准在广东地区落地，这是中国首次将有线电视网落地权授予一个境外频道。STAR集团与中国中央电视台、中国国际电视总公司、广东有线电视网络公司签署了相关协议。根据协议，STAR将于2002年初通过有线系统，向广东地区播放一个包括娱乐、音乐和影视剧的综艺频道，每天24小时播出。作为对等条件，STAR集团的姊妹公司福克斯有线网将安排中央电视台的英语频道CCTV-9在美国播出。此前，STAR集团参股的凤凰卫视中文频道已获准在广东落地。

90年代后期，我国新闻媒介开始了集团化的发展进程。2000年7月，国家广电总局在甘肃召开了全国广电厅局长座谈会，会上明确提出了中国电视体制集团化的要求，在2000年284号文件中，明确规定中国广播电视集团化的具体内容，基本精神是广播、电视、电影三位一体，无线、有线、教育三台合并，省级、地级、县级三级贯通。

2001年5月，北京广播影视集团宣告成立，这是我国第一个广电集团。2001年12月6日，经党中央、国务院批准，中国规模最大的新闻传媒集团——中国广播影视集团在北京正式成立，表明中国广播影视业的改革迈出了新步伐，广播影视业的发展进入了新阶段。中国广播影视集团是国家级的大型传媒集团，是党和国家的重要宣传舆论阵地。该集团争取用五年左右的时间实现“国家主力、亚洲一流、世界前列”的发展目标。中国广播影视集团的主要成员单位有：中央电视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中国电影集团公司、中国广播电视传输网和中国广播电视互联网等，是以事业单位为主体，拥有广播、电视、电影、传输网络、互联网站、报刊出版、影视艺术、节目制作销售、科技开发、广告经营、物业管理的大型国家级综合性传媒集团。现有员工2万多人，固定资产214亿元，年总收入110亿元。

我国广播影视科技事业发展取得了辉煌的成绩，基本建成了世界上覆盖人口最多的广播电视网，特别是“村村通广播电视工程”的实施，使贫困地区的10

万个行政村结束了不能收听收看广播电视的历史。目前,我国基本上形成了卫星、无线、有线等多种传输方式并存,卫星接收、多路微波、无线转播、有线接收等各种接收方式并用、相互补充的广播电视覆盖网络。到2000年底,广播、电视综合覆盖率达到91.5%和92.5%,中央一套广播、电视节目覆盖率达到79.3%和83.3%。有线电视网发展迅速,已由城市逐步向农村延伸,有线电视用户达8000万户,跃居世界第一位。截至2000年6月,全国共有广播电台299座,中、短波广播发射台和转播台738座,调频发射台和转播台9909座;微波站2659座,专用微波线路85792公里;电视台352座,电视发射台和转播台47306座,有线广播电视台236座,县级广播电视台1543座;卫星上行站31座,卫星接收站278792座;有线电视传输网络300多万公里,其中光缆网络40多万公里。

(三) 电影纪录片

1978年前后,中国电视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开始起飞,电视纪录片创作也日趋繁荣。尤其中央电视台在1978年底率先从日本引进ENG设备之后,由便携式摄像机、录像机构成的电子新闻采集方式,很快替代了原先的16毫米电影胶片拍摄,大大解放了电视新闻、电视纪录片的生产力。与此同时,以往处于垄断地位的新闻纪录电影遭遇了新的挑战。80年代中期,随着电影体制改革的深入,计划经济时代长期实行的国产电影“统购包销”的措施被取消了,新闻纪录电影一下子面临生存危机。此后,在中国影视业整合的时代潮流推动下,纪录片又获得了可遇不可求的发展空间。

中国电视业80年代的超常规发展,直接导致新闻纪录片这个片种从电影系统“撤离”,转而成为电视台的节目品种之一。目前随着电视栏目的扩容与规范,纪录片在电视栏目中生存的地盘日益扩大:既有“独门独户”式的专栏,如《纪录片之窗》、《纪录片编辑室》、《纪录》、《地方台30分》等等;又有附属于其他社教类栏目的一方园地,如法制、体育、财经等栏目中播出的纪录短片;至于题材重大的鸿篇巨制,则辟出黄金时段特别播映,如大型电视文献纪录片《毛泽东》、《邓小平》、《新中国》等等。纪录片的地位、作用和影响力越来越大,在观众中已养成观赏纪录片的收视习惯。例如,上海电视台名牌栏目《纪录片编辑室》的收视率在90年代中期曾上冲到30%以上。

1993年9月,建厂40周年的新影厂整建制并入中央电视台,此举意味着中国纪录片驶上了新一轮影视合流的快车道。由于胶转磁设备提供的技术支持,使新影厂自“延安电影团”以来长期积累的胶片资源在电视中又得到二度开发和利用,如《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等大型电视文献纪录片的摄制,都调用

了大量珍贵的电影胶片素材。目前纪录片在中国制作、传播的主渠道无疑是电视,但采用电影胶片摄制纪录片仍有不少高质量的作品,例如荣获电影“金鸡奖”的纪录片《往事歌谣》(1994);《较量——抗美援朝战争实录》(1996)、《周恩来外交风云》(1998)等片公映后产生的轰动效应,也使人们看到纪录片的独特魅力。

六、网络媒体的发展^①

20世纪90年代,随着计算机网络技术、通信技术和多媒体技术的成熟及广泛应用,尤其是国际互联网络(Internet)已成为全球性的信息资源网,电子报刊进入大发展阶段。与传统的纸介和电子媒体不同,这种新的媒介形式采用网络的虚拟形式,因此被称为“第四媒体”。

(一) 网络媒体的起步

互联网络上电子报刊的特点是时效性强、跨国界传播、廉价(很多是免费的)、读者选择性强、打印复制方便,为读者提取阅读提供了多种灵活方式,如将过期报纸或杂志的全部内容存放在服务器中,用户可随时调阅其中任何一期。更重要的是,电子报刊的出现将使任何人进行编辑出版活动成为可能,以往大众传媒业所有权的集中和垄断的局面被打破。

中国国内第一份上网的中文电子刊物是《神州学人》。它由国家教委投资二百多万元,于1995年1月12日正式发刊,但它还不是我国大众媒体的电子化。

在传统媒体中,首先进行电子化尝试的是一家地方报纸——《杭州日报》。1993年12月6日,《杭州日报·下午版》通过该市的联机服务网络进行传输,拉开了中国报纸电子化的序幕。

1995年10月20日,《中国贸易报·电子报》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了开播演示。这是国内第一家正式在国际互联网络上发行的电子日报。它的问世引起了国内外新闻界同行的广泛关注,各种媒体纷纷报道,英国路透社立即前来洽谈,成为该报电子信息的订户。它标志着中国报刊业告别了纸笔编排、邮政发行的传统作业方式,而进入了电子化的新时代。

1996年1月2日,《广州日报》电子版通过新加坡报业控股的服务主站“亚洲一号站”正式进入互联网络。同日,《中国证券报》电子版也正式面世。它不仅以计算机联网方式迅速传递信息,而且专门开设了一个《公众论坛》栏目,使

^① 相关数据见《中国新闻年鉴》,从1997年至2001年,每年年鉴均有闵大洪所写的关于中国网络传播及电子报刊的综合概况。

读者可以随时将自己的信息以最快捷的方式反馈到编辑部。《中国证券报》的重要内容还通过无线寻呼台进行播报,用户使用BP机即可收看到每天的主要新闻。

同年1月13日,《人民日报》综合数据库国际平台开始运转,它把当天《人民日报》、《人民日报·海外版》、《市场报》的全文内容约20万字和部分图片送入互联网络。到1996年底,在互联网络上发行电子版的报纸计有《中国贸易报》、《人民日报》、《经济日报》、《金融时报》、《解放日报》、《新民晚报》、《南方日报》、《广州日报》等三十余种。杂志有《中国集邮》、《大众摄影》等近二十家发行了电子版。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第一次对国内有关情况的调查表明,截至1997年10月31日,我国上网计算机达到29.9万台。从这一年起,具有权威地位及雄厚经济实力的大报开始正式推出网络版。其中有代表性的是《人民日报》。该报于1997年1月1日正式推出网络版,内容包括所出版的系列报刊。为便于用户获取信息,先后推出了多个专辑和资料库,其中深受好评的有可供全文检索的《邓小平文选》以及“香港回归”、中共“十五大”、“历次党代会”、“中美关系大事记”等重大新闻专辑和背景资料库。网络版还可以通过“全文检索”功能,查阅1995年以来人民日报上发表的任何一篇文章。由于其信息量大、权威性高、调阅速度较快,访问人数迅速上升。到1997年11月底,网络版访问人次超过4000万次,每天平均访问人次达到40万左右。由于其影响力的不断扩大,国内外广告客户开始登门,1997年网络版广告收入就突破30万元。

中国新闻社《华声月报》在1997年4月申请了自己的独立域名,随即完全凭借自己的力量制作了五个专栏共10多万字的网络版,正式定名为“《华声报》电子版”,于5月25日在因特网上正式推出。该网站不断打破原印刷月刊在信息服务上受到的种种制约,不仅每天有新闻上网,而且从7月底开始向全球用户提供免费电子邮件传送新闻服务。这是国内首家以电邮方式正规地向用户免费提供新闻服务的新闻网站。

广播电视机构中,中央电视台起步最早,1996年底就开始进行尝试,并在1997年加大投入力度。中央电视台的一些著名栏目,如《东方之子》、《实话实说》、《3·15特别节目》等,也与国内的网络公司合作推上了因特网。中央电视台在1997年重新注册了顶级域名:www.cctv.com。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也于1997年在因特网上设立网址。一些地方广播电视台行动亦十分积极。1996年12月,广东人民广播电台在因特网上建立网站,这是国内第一个上网的广播电台。

新华社在1997年11月7日建社66周年之际正式开通因特网网站。通讯社

具有信息总汇的特点，因此建有庞大的数据库可供各类用户检索利用。新华社数据库利用本社丰富的新闻信息资源，及时、全面地反映国内外各个领域的最新动态，不仅收录了大量的一次文献，而且还有许多经过精心组织和编写的二次文献。新华社网站还开辟了国内新闻网站收费服务的先河。

1999年，广播电视系统加大了网站建设的投入力度。中央电视台网站1月1日正式改版。3月，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网站试开通。广播电视媒体根据自身系统的特点，在11月召开的“广电系统INTERNET网站建设应用研讨会”上，提出了建立“广电站点联盟”的思路，以期形成广电行业网站的总体形象，通过统一、分类的链接及专业搜索引擎、信息动态发布等手段，达到行业信息的系统化、集中化和规模化。

（二）网络媒体向纵深发展

由于新闻媒体网站具有新闻信息、品牌、公信力等优势，它一旦建立就能发挥良好的社会效益，因此在国内网络业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和作用。不少新闻媒体网站也锐意进取，在内容和服务提供方面不断完善，受到广大网友的好评，影响力日增。

新闻媒体在掌握和运用网络传播的规律和特性方面也逐渐进步。如新闻媒体网站以往均未设立BBS（Bulletin Board System 电子公告栏），理由很简单，他们认为对网友的自由放言很难掌控，担心产生负面作用。1999年5月8日，以美国为首的北约轰炸我驻南联盟大使馆，造成三名记者死亡，《人民日报》网络版审时度势，第二天便果断地开设了“强烈抗议北约暴行BBS论坛”。广大网友对《人民日报》网络版能够开设论坛感到兴奋，积极参与其中，传递各种信息，发表自己的意见和看法。6月19日晚，“抗议论坛”改版为“强国论坛”，不长时间网友就贴了9万余条贴子，产生了极大的影响。BBS的开通不仅在于实现网络的交互性，最重要的是为广大网友提供了一个对世界大事、国家大事发表看法的重要场所，而大家的看法、意见可以在相当程度上反映民意、舆情。如今“强国论坛”仍是国内最热门的时政论坛。

互联网在发布新闻上的时效性大大增强。2001年11月15日，北京《财经时报》记者在获得中美WTO谈判将在下午签署协议时，当即与其合作伙伴和讯财经网商定，在网站上开通专栏，向读者提供实时滚动新闻。13时09分，由现场记者利用手机口述发稿的新闻在网站上刊发，这是国内外所有新闻媒体（包括网络媒体）在第一时间的最先报道。

新闻媒体网站尤其是广播电视媒体网站在音频、视频直播、点播方面也有长足进步。1999年中央电视台网站首次直播春节联欢晚会，此后对一系列重大活

动,包括对建国 50 周年庆典,均进行了网上直播。澳门回归祖国的时候,中央电视台网站、《人民日报》网络版、中国互联网新闻中心的网上直播也同步开始。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则用普通话、粤语、英语、葡萄牙语对多场重大仪式和庆典活动进行了网上音频直播。规模空前、时间超长的网上视频及音频直播,反映出国内新闻媒体网站水平的飞速进步。1999 年 9 月 15 日,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开通“风格风”网站。这一网站利用网上多媒体技术,突出音频、视频实时传输的特点,吸纳了全国数十家广播电台电视台加盟,并提供多种服务,标志着由“广播上网”初级阶段向“网上广播”高级阶段的迈进。

在新闻网站建设过程中,不少新闻媒体网站已不是将“母体”内容如报刊印刷版的内容照搬上网,而是在信息内容和形态上办出特色。如一些报纸网站已不再称自己是某报网络版或电子版,而是另取名称。如《广州日报》网站正式名称为《广州日报大洋网》,《深圳商报》网站的名称是《深圳新闻网》等。名称的改变意味着新闻媒体网站经营理念的提升。

新闻媒体网站与商业网站在很多方面也是合作伙伴。如新华社与新浪网合作设立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50 周年的大型专题网站,由新华社提供信息,新浪网进行技术设计。该网站一时间成为热门的专题网站,取得了极佳的效益。再如,《辽沈晚报》与新浪网签约,《辽沈晚报》将向新浪网提供独家新闻,其他网站如需转载、改编,需与新浪网直接联系;而新浪网也保证以其 24 小时滚动方式,在第一时间将该报新闻迅速传播出去。这一“报网联手”的最终获益者无疑是“第四媒体”的读者。

2000 年,北京千龙新闻网、上海东方网、天津北方网的开通,标志着区域内众多主流新闻媒体合力共建大型网络传播平台模式的诞生。

大部分新闻媒体网站目前处在规模尚小、影响力不大的阶段,发展中遇到种种难题和困惑。其中既有机制问题,也有资金、人才问题和市场、竞争等外部因素。

(三) 网络媒体开始规范化发展

随着互联网的迅速发展,网上知识产权问题日益突出。商业网站轻而易举地从别的网站上“扒”新闻,既不打招呼,也不注明出处,更不付分文。新闻媒体网站终于联手做出了强烈反应。1999 年 4 月 16 日,国内 23 家上网新闻媒体首次聚会北京,对商业网站肆意盗用新闻媒体网站新闻的做法表示了不满,呼吁全社会重视和保护网上信息产权,坚决反对和抵制任何侵权行为,建立起网上新闻发布和信息传播的“游戏规则”。会上通过了《中国新闻界网络媒体公约》,各公约单位郑重约定,凡不属于此公约的其他网站,如需引用公约单位的信息,应经过授权,并支付相应的费用,使用时注明出处,建立链接;各网络媒体无论规格

高低，实力大小，实行信息产权面前人人平等。

2000年5月，中宣部、中央外宣办下发《国际互联网新闻宣传事业发展纲要（2000—2002年）》。这一文件提出了互联网新闻宣传事业建设的指导原则和奋斗目标，并确定了首批重点新闻宣传网站：中国互联网新闻中心、《人民日报》、新华社、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和《中国日报》。

互联网在以美国为首的北约轰炸我驻南联盟大使馆事件发生后在传播领域所产生的独特作用，再次引起中央领导的高度关注。1999年10月16日，中共中央办公厅转发《中央宣传部、中央对外宣传办公室关于加强国际互联网络新闻宣传工作的意见》。这是中央关于网络新闻宣传工作的第一个指导性文件。文件从争夺21世纪思想舆论阵地制高点的高度，明确了今后网络新闻宣传工作发展的方向，并对网上新闻信息发布提出了规范原则。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随即发出《关于加强通过信息网络向公众传播广播电影电视类节目管理的通告》，明确规定：在境内通过包括国际互联网络在内的各种信息网络传播广播电影电视类节目，须报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批准；在境内通过信息网络传播广播电影电视类节目，不得擅自使用“网络广播电台”、“网络中心”、“网络电视”等称谓；经批准通过信息网络传播的广播电视新闻类节目（包括新闻和新闻类专题），必须是境内广播电台、电视台制作、播放的节目。由此，一段时间以来商业网站随意转发外国新闻媒体报道的情况得到根本扭转。今后国内新闻媒体网站在新闻发布方面的作用无疑将更加突出。

从1997年起，中央就明确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为网络新闻宣传归口管理机构。2000年4月，国务院新闻办网络新闻管理局成立，负责统筹协调全国互联网络新闻宣传工作。其主要任务是负责规划国家互联网络新闻宣传事业建设的总体布局并实施；组织开展互联网络重大新闻宣传活动与开发重点信息资源；研究互联网络舆情动态，把握互联网络新闻宣传的舆论导向；拟定互联网络新闻宣传管理方针、政策和法律法规；对开办新闻宣传网站或栏目进行资格审核，组织搜索互联网络重要信息，抵御互联网络有害信息的思想文化渗透；组织新闻宣传网站开展国际交流与合作。在国务院新闻办成立网络新闻管理局之后，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新闻办也陆续设立了相应机构，形成了自上而下的管理体制。

第六节 新闻学术研究与新闻教育

一、新闻学术研究

粉碎“四人帮”后，我国的新闻学术研究迎来了春天。1978年建立的中国

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是国家第一所专门的新闻学研究机构。此后，许多省、部的新闻机构都出版了新闻研究刊物。中国新闻学会联合会及各省、各行业新闻学会纷纷建立，开展了各种新闻学术活动。据不完全统计，1979年至1989年10年，全国共出版各种新闻书籍1 080种，是1949年至1978年30年间的10倍。1990年以来，新闻学书籍差不多每年出版100本左右，新闻学研究可谓硕果累累。

改革开放20年以来，中国新闻学研究可分为几个发展阶段。

第一阶段是1979年至1982年，主要是清理“文化大革命”对新闻学的破坏和干扰。“文化大革命”中，新闻学的许多基本原理、范畴都被斥为资产阶级新闻学观点遭到批判，正本清源的工作相当艰巨。那时新闻学的“理论体系”被描述为“两论五性”（“阶级斗争工具论”、“无产阶级专政工具论”和阶级性、思想性、指导性、群众性、战斗性）。人们不得不从“什么是新闻学”开始，对新闻学的基本原理进行讨论，澄清一些常识性问题，如新闻定义、新闻六要素、新闻价值等等。

第二阶段是1983年至1989年，是新闻与传播研究的繁荣季节。西方传播学大量引进，出现了一大批运用传播学的原理分析中国新闻传播现象的文章；新闻研究进入较高层次，许多新的方法被运用到新闻学研究中，出版了许多具有开拓和创新意义的新闻理论、传播理论、新闻史、新闻业务和其他相关学科的著作；各种新闻学术研讨会定期举行，学术争鸣空前活跃，新闻法的制定、党性与人民性的讨论成为这一时期的焦点。

第三阶段是1989年至1992年，是新闻与传播研究的低谷期和反思期。这一阶段虽然也发表和出版了一些论文和著作，但大都缺乏理论锋芒和学术勇气，少有引人注目的新颖观点。

第四阶段是从1992年至今，新闻学研究重新焕发生机，新闻学书籍的出版速度加快。中国丰富的新闻改革实践也为新闻学术研究提供了坚实的土壤，报纸、广播电视等传媒本身也开始重视对新闻学的研究，一系列有特色的、更加务实的新闻研究项目陆续出笼。网络传播作为新生事物成为新的研究热点。

（一）新闻理论研究

1979年以来，从什么是新闻到许多新闻学的基本概念和问题，都出现过程度不同的讨论。其中讨论持久而影响较大的有：“本质真实”论、报纸的“组织作用”论、新闻与宣传“异同论”、媒介“排气阀”论、读者需要论、新闻的商品性、舆论监督、新闻改革与政治体制改革的关系等等。有关这些讨论的大量论文，反映了改革开放以来新旧两种新闻观念的矛盾和冲突。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

济的确立和实施,在新闻学理论中的大量旧观念正被适应当今情况的新观念所代替。

对马克思列宁毛泽东新闻思想的研究历来是我国新闻理论研究的重要内容,80年代以来,在全面、系统研究的基础上,出现了不少论文集和著作,如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主编的《马克思新闻思想研究论文集》、童兵的《马克思主义新闻思想史稿》、夏鼎铭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报刊理论与实践》、陈力丹的《精神交往论——马克思恩格斯的传播观》等。

中国共产党的新闻政策也是新闻理论研究中不可忽视的一个重要部分。毛泽东、刘少奇、胡耀邦、邓小平、江泽民等领导人都曾对新闻工作有过重要指示。江泽民从1989年11月发表关于新闻工作的讲话以后,几乎每年都亲自参加全国宣传工作会议并讲话,还先后亲自到《解放军报》、《人民日报》视察和讲话,这些都为新闻理论研究定了基本的调子。江泽民1994年提出“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的要求以后,关于舆论导向的研究便成为热点,从数量很多的学习体会、表态文章发展到学术性论文和著作。这些论著涉及舆论要素分析,舆论的形成,影响舆论的诸因素分析,舆论场和舆论波,政府、媒介和舆论的协调,适度社会动员,议程设置论与沉默的螺旋理论的运用和有限性等等。

传播学在中国近十年获得了很大的发展,出现了一批有影响的著作,在本土化方面也有很好的表现,详见本章后面的部分。

新闻理论的研究呈现出与其他学科交叉融合的现象,尤其是与法学、社会学的交叉更为普遍。舆论学的研究取得很大的成就。1986刘建明出版了中国第一本舆论学专著《基础舆论学》。自那以后,先后有十多本舆论学著作问世,主要有刘建明的《当代舆论学》、《现代舆论学》,孟小平的《舆论学》等。

据统计,自1982年甘惜分出版第一部新闻理论著作《新闻理论基础》,到现在已有40部以上的新闻理论著作与教材出版,但内容有巨大突破的并不多。发表的新闻理论文章更是多得无从统计,但探讨具体问题的居多,应景性质的研究居多,有理论创建和思想深度的不多,一些新闻理论的基本概念仍然没有统一或权威的定论。在吸纳当代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的最新成果方面,新闻理论也有所欠缺,这也是新闻理论显得有些老化的主要原因。而且我们原来的新闻理论研究大多以报刊为对象,而现在广播电视、网络传播已经和报刊一样成为大众媒介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原有的新闻理论框架需要充实与更新。

(二) 新闻史研究

改革开放到20世纪末的22年中,累计出版的新闻史方面的专著和教材达138种,累计发表的新闻史方面的论文和文章达5 023篇,是前几个阶段研究成

果总数的几倍甚至几十倍。

新闻史研究的领域不断扩大,除原有的报刊史研究外,还开展了对广播史、电视史、通讯社史的研究,出版了一批优秀著作,如赵玉明的《中国现代广播简史》、郭镇之的《中国电视史》等;除中国新闻史的通史、断代史的研究,还开展了对地区新闻史、民族新闻史、专业新闻史的研究;除对新闻事业史的研究外,还开展了对新闻学术思想史、新闻法制史、新闻经营管理史等方面的研究。

新闻史著作层出不穷,从方汉奇教授的《中国近代报刊史》到由方汉奇主编、四十多人参加撰写的《中国新闻事业通史》,中国新闻史的研究内涵不断扩大。《中国新闻事业通史》共有3卷240万字,1987年开始启动,1992年第1卷出版,第2卷1996年出版,第3卷1999年出版,其篇幅之巨大、内容之丰富、材料之厚实,建构之完整,是同类著作中所未有的,它的出版成为中国新闻史研究的新突破,代表了新闻史学研究的总体水平和最高水平。

新闻史料刊物全国出版有很多种。其中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所编的《新闻研究资料》,从1979年创刊到1993年停刊,共出版61期,发表了1000多篇新闻史方面的文章和资料。大型的新闻工具书从80年代初期也相继出版,其中代表性的有1982年起每年出版的《中国新闻年鉴》、1986年起每年出版的《中国广播电视年鉴》和1990年出版的《中国大百科全书新闻出版卷》。对新闻界人物的研究主要有1983年至1987年新华社出版的《新闻界人物》10辑,包括对黄远生、邵飘萍、梁启超、张季鸾、邓拓等一大批新闻界著名人物的介绍。

新闻史的研究队伍不断扩大,仅中国新闻史学会就拥有396名会员。

(三) 新闻实务研究

所谓新闻实务研究是指对新闻生产、流通和消费领域的研究,特别是对新闻的采、写、编的研究。我国仅省、部级新闻单位创办的新闻专业期刊就有60余种,这些期刊发表新闻实务方面的研究成果较多。在出版的新闻学术书籍中,属于新闻实务研究的也占有较大的比例。据不完全统计,仅1979年至1992年,编辑出版的新闻实务研究的专著、编著、译著以及论文、作品集约1200种,其中较有影响的新闻实务研究著作有艾丰的《新闻采访方法论》、《新闻写作方法论》,郑兴东的《报纸编辑学》,兰鸿文的《新闻采访学》等。

进入90年代后,大特写、深度报道、隐性采访、舆论监督、新闻策划等相继成为热点,《中华工商时报》、《北京青年报》等新的版面模式也掀起一轮又一轮的冲击波,新闻实务的研究不得不打破传统的框架,直面不断变化的现实。舆论监督是近年较集中的话题,几乎每家新闻业务和新闻传播学术期刊都发表了这方面的论文,这与腐败现象的增多、需要加强监督力度有关。较多的文章涉及的

是如何有效地实行舆论监督、舆论监督应遵循的原则、舆论监督的法律地位和如何依法监督、司法审判与舆论监督等等。随着舆论监督研究的深入,新闻法的制定又重新提到日程上来。

中国新闻媒介过去不很重视管理和经营,这是由公费办报、公费订报的体制所决定的。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特别是最近几年,媒介的管理、经营和发行越来越受到重视,这方面的研究也就开始了,并出现了一些论文与专著。关于媒介经济的文章日渐增多,内容涉及从宏观到微观的各种问题,如市场经济条件下媒介的可持续发展战略、经济体制改革与媒介经营改革的互动、媒介的无形资产、城市报纸的廉价化、报业产权的重新配置、电视收视率是启动电视改革的杠杆、广告发布行为、媒介广告代理制、网络广告研究、资本运营与媒介改革等等。随着中国入世,媒介的资源整合、兼并重组将进一步加剧,改革的力度也会加大,这方面的文章还会大量出现。

(四) 传播学研究

传播学完全是“舶来品”,其引入到中国可以追溯到20世纪的50年代。当时郑北渭、张隆栋、王中等教授在教学及研究中都曾有过运用传播学相关知识的先例,复旦大学新闻系的《世界新闻译丛》也曾比较系统地介绍了传播学。传播学的再次引入是在70年代末。1978年7月,复旦大学新闻系内部刊物《外国新闻事业资料》发表了郑北渭教授撰写的《公共传播学的研究》和《美国资产阶级新闻学:公众传播学》,在国内新闻界引起较大反响。80年代,传播学在中国基本上属于学习和应用阶段。一批传播学译著相继面世,较有代表性的有:《报刊的四种理论》、《传播学概论》、《传播学的起源、研究与应用》、《大众传播模式论》、《大众传播通论》、《大众传播社会学》。

在经过引进和起步阶段之后,传播学开始了对中国传媒实践的关注,为新时期中国新闻改革提供了理论支持。首先是对传统新闻观念的冲击,新闻机构开始被称为“新闻媒介”、“传播媒介”、“大众传播媒介”,从而回归并突出了媒介本身的特点。“信息”、“反馈”、“把关人”、“受众”、“传播者”、“传播渠道”、“传播效果”、“意见领袖”、“双向传播”等一系列概念的引入,给新闻学界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冲击,以至今天的“新闻学”已逐渐被“新闻传播学”所取代。其次是对媒介功能的重新认识,即从“阶级斗争的工具”转向“传播信息的工具”,强调信息传播是媒介的基本功能,其他功能的实现都必须以此为前提。第三是促使实现由传者本位向受者本位的转变,而这是与传播学的核心理论——受众理论的影响直接相关的。第四是对效果理论的研究,促使新闻界重视与传播效果有关的各个因素,如不同媒介个性特点的研究、对信息本身的研究,受众调查成为媒介

改革的重要举措和依据。所有这些，都对新时期的新闻改革产生了前所未有的深刻影响。

1982年召开了第一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提出“系统了解、分析研究、批判吸收、自主创新”的十六字方针，这对传播学在中国的发展具有战略性指导意义；而1986年召开的第二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更是明确提出了“建立有中国特色的传播学”的目标，此后传播学者本着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态度，运用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对西方传播学理论进行初步的汇集、梳理、分析、运用。与此同时，传播学者还从中国的具体国情和传播实际出发，开展大规模的大众传播效果调查、受众调查、民意调查以及一系列专题调查。尽管如此，20年来中国传播学者研究的主流还是引进和介绍西方传播学的基本理论和方法，传播学的中国化、本土化还远未成熟，在为我所用、自主创新方面做得不够，传播理论与传播实践之间也存在较大距离。

1989年政治风波之后，中国新闻传播学研究的环境发生了一些变化。此前，新闻学者们较多地将注意力集中在与政治相关的新闻体制改革的话题上，随着中国开始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政治不再总是居于中心位置，中国新闻传播学者有了相对比较独立的活动空间进行多样化的学术研究，从传播学的研究对象和基本问题、传播学研究方法、媒介权力到跨文化传播、媒介与文化的同构关系，从儿童媒介需要研究、媒介的使用满足论到传播学批判学派、传播学研究典范分析、符号学、非语言传播、人际传播、世界新闻新秩序等等，琳琅满目。但这些论题比较分散，专题性的论文较多，而专著很少，研究深度还不够。

1995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颁布的学科目录上把新闻学和传播学并列为二级学科；1997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正式将传播学列入博士、硕士专业目录，新闻与传播学成为国家一级学科，学科地位的提升是传播学正式被国家和社会所承认的重要标志。1999年至2000年，一批年轻的传播学研究者翻译了两套较新的外国传播学译著（共20本），使传播学的研究水平有很大提高。

（五）网络传播研究

从90年代中期起，随着网络传播逐渐在中国普及，关于网络传播的研究很快成为新闻学术界的最新热点，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成立了网络传播研究室，传统新闻学的研究人员纷纷涉足网络研究。研究的话题主要集中在网络传播的特点分析和介绍、网络传播对传统媒介的冲击、记者如何在新闻工作中使用网络等方面。

（六）新闻学研究的特点

实行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新闻学研究取得了很大的成果，除了归功于政治

与社会环境发生巨大变化以外，就学科本身而言，是与不断扩大研究领域、采用新的研究方法有关。

1. 从定性研究走向定性、定量研究相结合

中国新闻学研究长期习惯运用定性分析，局限在新闻的性质、作用和阶级性、思想性、指导性、群众性等问题，从虚到虚，绕来绕去，没有精确的数据和相关的事实来证明其论点，从1982年开始的受众调查，打破了新闻研究中定性分析一统天下的局面。此后，浙江、江苏、上海、新疆等地区以及首都一些大的新闻媒介也都进行各种形式的受众调查。定量研究与定性研究成为目前新闻学研究的基本方法。

2. 从经验表述型走向理论思辨型

一个学科必须具有完整的概念系统、严密的逻辑结构和科学的理论体系，而中国的新闻学，尤其是新闻理论研究至今仍然没有形成一个科学的体系。改革开放之前，对于许多基本问题的阐述只停留在经验总结和表层描述上，对一些问题总是根据不同时期的不同任务做出不同的回答，没有升华为理论，这当然是受极“左”思潮的影响。改革开放以来，一些国际公认的新闻学范畴得到肯定，新闻学从传播学、社会学、心理学、哲学、统计学以及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等学科和理论中获得新的知识、新的角度、新的方法，进入更深入的研究，增强了理论思辨性，使新闻学研究与其他社会科学研究差距开始缩小，但真正的体系建设尚需突破。

3. 从单个媒介研究走向重视综合性研究

传统的新闻学实际上就是报学或“新闻纸学”，专门研究报业的运作规律，而对广播、电视、网络等传播媒介近乎视而不见，避而不谈。近几年当电视在诸媒介中占据首要地位以后，对电视的研究火热起来。但对所有媒介进行综合研究，则归功于传播学的引进。有了大众传播这个词汇，可以涵盖以上所有媒介，不同媒介的综合研究和比较研究得以开展起来。大众传播与国家、社会发展有什么关系？报刊、广播、电视三大媒介相互的关系如何？大众传播与人际传播在中国政治传播中各起什么样的作用？应该作什么样的改进？这些综合性题目，现在都是中国新闻传播学界关心和研究的课题，并在中国学者的一系列新闻与传播学研究的著作中得到了充分反映。

4. 新闻学科研究评审日益规范化

新闻学术界重要的刊物有：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主办的《新闻与传播研究》、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主办的《新闻学论集》和《国际新闻界》；复旦大学新闻学院主办的《新闻大学》、北京广播学院主办的《现代传播》、人民

日报社的《新闻战线》、新华社的《中国记者》等。十几年前,中国新闻学术期刊上的一些文章充斥着政治概念,论据没有科学含义,论证缺乏理论前提和逻辑性,数千、上万字的文章没有一条引文或注释,和国际的学术规范相距甚远。1996年和1998年,《新闻与传播研究》和《新闻大学》先后实行匿名审稿制,并要求引证和参考书目的规范,不久《国际新闻界》也紧随其后实行了匿名审稿制。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还完成了“社会科学成果评估体系”课题,为对已发表的学术成果的评估提出了一套较为科学的评估指标体系。这项工作现在仅仅开了个头,在新闻学研究中非学术因素的影响仍然是很大的。

二、新闻教育

随着“文化大革命”的结束,停止12年之久的高考于1978年恢复。1978年8月,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成立,并设立新闻系,招收硕士研究生,首届招收硕士研究生85名。同年9月,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恢复招收本科生,并开始招收硕士研究生,暨南大学新闻系也于这一年成立。

1983年7月,中宣部和教育部首次联合召开新闻教育座谈会,发出《关于加强新闻教育工作的意见》等文件,要求各地有条件的高校创办新闻学系科。中国新闻教育史上出现了第二个办学高潮。1984年11月,中国新闻教育学会成立。到1993年,全国新闻教育办学单位已有66个,在校学生达5000人。1994年,国家教育主管部门召开了第二次新闻教育座谈会,深入探讨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人才的培养问题。目前,除港、澳、台地区外,我国设有新闻学类专业的高等院校有60多所,专业点达200多个。我国新闻教育师资队伍由1977年的百余人增加到今天的近2000人。

可以看出在改革开放二十多年的时间里新闻教育发生了质的飞跃:

新闻学教育从单一的本科教育向多学科多专业多层次方向发展。改革开放前,我国的新闻教育只有新闻、广播、电视等专业和培养方向,现在增加了广告、编辑出版、新闻摄影、国际新闻、体育新闻、播音与主持人等专业和培养方向。“网络媒体热”亦带动了“网络新闻传播教育热”和“网络新闻传播研究热”。1999年4月30日,北京广播学院成立全国首家网络传播学院。从单纯培养报纸采编人员到全面培养广播电视、媒介管理到广告等多种专业人才,形成了多种方向、门类齐全的新闻学教育。

今天我国的新闻教育体系已从单一的本科教育发展到具有博士生、硕士生、本科生、专科生、自学考试、在职培训等多层次、多形式的格局。改革开放之前,只有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北京广播学院等几所大学设有新闻系本科专

业，其中复旦大学新闻系曾招收了两名三年制的研究生，但均不授予学位。自1978年起，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开始招收新闻学研究生。1981年我国正式实行学位制度，同年起上述三个单位及北京广播学院正式招收攻读硕士学位的新闻学研究生。1985年，中国人民大学和复旦大学开始招收新闻学博士研究生。目前全国有新闻学专业和传播学专业硕士点35个，新闻博士点6个，新闻博士后流动站（设在复旦大学）一个，每年培养新闻传播专业学生近万人。

近50年来，我国新闻专业大专以上文化程度的毕业生已有近10万人，如今，从中央到地方，从报纸、通讯社到电台、电视台，活跃在新闻工作一线的大批领导干部和业务骨干，均是新中国自己培养的新闻专业优秀人才。

【学习思考题】

1.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报业结构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它与西方国家报业结构有何不同？请对我国报业结构做出评价，应怎样优化我国的报业结构？
2. 期刊市场是否属于新闻事业？近几年期刊市场有哪些新变化？
3. 新华社作为国家通讯社在新时期有了哪些根本性的变化？
4. 什么是“珠江模式”？以之为例说明我国广播事业的变化发展。近年广播事业发展有哪些新动向？
5. 什么是“四级办电视”？请对它做出评价。如何看待我国部分地区电视台的崛起？
6. 改革开放以来，新闻学研究成果累累，请说出在新闻理论与新闻史研究中所取得的重要成果。



第十六章

1949 年以来的台湾、香港、澳门 新闻传播事业

第一节 1949 年以来的台湾新闻传播事业

一、1949 年以来的台湾报刊

台湾的报刊一直都是台湾的强势媒体。1949 年 12 月 7 日“南京国民政府”迁往台北，一些国民党和接近国民党的报纸和报人相继前往台湾，台湾的报纸陡增到 20 余种。实行报禁前，全台湾共有报纸 30 种。蒋介石集团为了巩固其独裁统治，自 1950 年元月起在台湾全省实行“戒严”，在戒严期间严格控制和限制台湾新闻事业的发展。

1951 年 6 月 10 日台湾“国民政府行政院”以全省报纸、杂志“已达饱和点”和“节约用纸”为理由，宣布对今后新申请创办的报纸、杂志、通讯社“从严限制登记”。第二年 4 月 11 日又以行政命令宣布“停止报纸登记”。上述禁令被台湾新闻界习惯地称为“报禁”。这以后的三十多年中，除了 1952 年 10 月 10 日批准创办了一份由台湾“国防部总政治部”主办的《青年战士报》（后改称《青年日报》）之外，台湾当局没有再批准过任何一份创办新报的申请。

所谓的报禁包括“三限”，除上面的限证外，还包括限张和限印。1955 年 4 月 21 日，台湾当局公布了《战时新闻用纸节约办法》，通令所有的报纸版面一律

限在对开一张半之内，迫于报界要求放宽限张的呼吁，该办法做过多次修改，但到报禁解除之前，一直没有突破三大张。限印是指台湾当局规定每家报纸只能在其登记地点的印刷厂印刷，这一措施给在全省出版发行的大报带来了很多不便。

（一）报禁时期的台湾报业

从1952年到1987年，台湾共有31种报纸。这31种报纸1951年共发行21万份，60年代后期发展到56万份，以后逐年有所增加，1978年突破200万份，1982年增至250万份。1987年据台湾“行政院新闻局”公布的统计数字为370万份，这样全省平均每5至6人拥有一份报纸。^①

这31种报纸，有25家日报，6家晚报；除两家是英文报纸外，其余都用中文出版，大都是综合性报纸。如果按政治背景来划分，国民党党政军机关经营的报纸有12家，如《中央日报》、《中华日报》、《新生报》、《台湾新闻报》、《台湾日报》等。《联合报》、《中国时报》等民营报纸与国民党的关系也十分密切，剩余的几家民营报纸均由台湾的地方人士主办。在20世纪50年代，台湾的民营报纸大都艰难度日，而国民党的三家报纸《中央日报》、《台湾新生报》、《中华日报》却一统天下。70年代后，民营报纸后来居上，发行量最大的《联合报》、《中国时报》均在100万份以上，而《中央日报》仅为55万份。

《中央日报》是“国民党中央委员会”的机关报，1948年迁台，1949年3月12日在台北继续出版。除在台湾发行五个分版外，还在香港和世界几十个城市发行航空版，出版《中央星期杂志》和旧金山的《少年中国晨报》。在台北出版的《大华晚报》实际上是它的晚刊。以《中央日报》为核心的台湾官报报业集团，直接控制了台湾三分之一的报纸，成为当局控制舆论的基本力量。

《新生报》是台湾省政府的机关报，1945年10月25日在台北创刊，是当时台湾各报中读者面最宽、订户最普及的一份报纸，内容多以本省的经济建设和公共服务为重点，1949年成立新生报股份有限公司，并成立高雄分社发行南部版。1961年改组为台湾新生报业股份有限公司，同时将南部版更名为《台湾新闻报》单独发行。《中华日报》是“国民党台湾省党部”的机关报，1946年2月20日创刊于台南，1948年2月20日迁台北出版。《中华日报》从1982年实行改版，在评论上改每天一篇社论为双社论，在新闻报道上加大了“大众文化生活”方面的内容，1986年又强调以消费者和妇女、家庭为主要读者对象，以示自己和《中央日报》分工不同。

《联合报》1951年9月16日创刊于台北，由王惕吾的《民族报》、林顶立的

^① 参见方汉奇主编：《中国新闻事业通史》，第3卷，634页。

《人民日报》、范鹤言的《经济时报》合并而成，自称以“客观报道新闻”、“独立评论时事”、“忠诚服务大众”为办报原则，在言论上一贯主张“反共、民主、团结、进步”，较多地代表和反映台湾大企业家和财团的利益与声音。60年代以后，联合报系有很大的发展，1964年开始出版台湾境外航空版，1967年买下台湾省籍人士李万居等人主办的《公论报》，改名为《经济日报》；1974年创办了“中国经济通讯社”和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78年利用买来的登记证创办了《民生报》，并创办了《中国论坛半月刊》、《联合月刊》两个期刊。在纽约出版了《世界日报》、在巴黎出版了《欧洲日报》两家中文报纸。《联合报》、《经济日报》和《民生报》是整个报系中的主要报纸，王惕吾担任三家报纸的董事长。这三家报纸的总发行量近140万份。

《中国时报》原名《征信新闻》，1950年10月2日创刊于台北，1960年更名为《征信新闻报》，1968年9月1日又改名为《中国时报》，除《中国时报》外还拥有《工商时报》（1978年创刊）、《时报周刊》（1978年创刊）、《时报杂志》（1979年创刊）、《工商时代月刊》（1982年创刊）、时报文化出版公司等报刊企业。还一度出有《中国时报》海外航空版和美洲版（1982年创刊，1984年11月停刊）。《中国时报》的发行量在210万份以上，是台湾销数量最大的日报之一。《中国时报》和《联合报》两大报业集团都是亲国民党的民营报纸，规模与读者定位都差不多，在台湾新闻界的竞争是公开的秘密。

《自立晚报》1947年10月10日创刊于台北。是台湾第一家晚报，也是影响较大的晚报。报头刊有“无党无派、独立经营”八个字，并以“纯民间报纸”和“公正客观、不偏不倚、无隐无讳”为标榜，其言论主张经常代表并反映台湾地方非国民党人士和台南大财团的观点和意见。《自立晚报》的发行量约为12万份，在台湾六家晚报中拥有73%的市场占有率。1987年9月，台湾当局宣布开放民众前往祖国大陆旅行探亲，《自立晚报》在有关条例颁布前夕，特派李永得和徐璐两记者经由东京前往北京、杭州、广州、厦门等地采访，引起极大轰动，报纸的销量激增。

台湾的各种报纸版面安排大体相同，即前面几个版通常用来刊载国内外要闻、社论、短评、通讯、特写、专栏和地方新闻，后面的版面则用来刊载综合性副刊、长篇连载，以及各种体育、文艺、影视、家庭、医药保健方面的文章或广告。各报在国内问题上的言论主张基本上是统一的调子。国民党当局直接控制下的报纸公开宣布它们的言论以“国家、主义、责任”为原则，坚持“国家立场、领袖立场、国军立场”，而其他非官方的报纸大多也以“拥护国策”、“宣扬国策”为基调，强调以“贯彻政府主张和立场”为宗旨。有关祖国大陆情况的报道在台

湾的报纸上也占有一定的份额。在迁台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中，这类宣传以贬抑和丑化为主，共产党工作中的一些失误也经常被台湾报纸当做反共的主要素材。这种一边倒的格局在 80 年代以后有所改变，最先取得突破的是有关体育的报道。祖国大陆的体育健儿在许多国际大赛上都取得了骄人的成绩，尤其是在洛杉矶奥运会上一举夺得 15 枚金牌，在当时台湾的报纸上被广泛报道。改革开放以后，祖国大陆在科学文化事业上所取得的巨大进步也被许多台湾报纸进行了报道，尤其是考古、影视业方面的新闻报道频率很高。1987 年春天以后，台湾的报纸就是否允许台胞到祖国大陆去探亲的问题展开了讨论。不少报纸通过公布民意调查、发表读者投书、开座谈会等形式表示对国民党“三不政策”的不满，一些非党报《联合报》、《中国时报》、《民众日报》、《自立晚报》在讨论中尤其活跃。《中央日报》也发表主张，倡导和祖国大陆“作有节制的民间往来”，呼吁将断掉的民族脐带赶紧连接起来。1987 年 10 月 14 日，国民党中央常委会通过了允许台湾居民到祖国大陆探亲的方案，在此前后，各报有关的报道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潮。

在台湾但凡稍具规模的报纸，除了采用“中央通讯社”和其他国外大通讯社的稿件外，一般都在联合国总部和美、英、日、德等国家和地区派有特别记者。为了增强报纸的可读性，各报设置的专栏品种繁多，这些专栏除个别带有政治色彩，其他均以特定的读者为对象，多由名家主持，讲究知识性与趣味性，追求雅俗共赏。

台湾各报总能随着科技的发展不断更新设备。50 年代初期，一些报纸并没有自己的印厂，只能委托别家报纸代印。但 80 年代以后，几乎所有的报纸都有自己的印厂，而且广泛地使用了专线中文文字传真电报设备、照片传真设备和自动化检字排版设备。《联合报》、《中国时报》等几家大报还购置了中文全自动电脑排铸机，报纸的编排工作向电脑化过渡。印刷方面，多数报纸都装备了每小时可出报 12 万至 15 万份的高速轮转印刷机，发行量较大的几家报纸如果几台印刷机同时开印，上百万份的报纸一两小时就可全部印完。50 年代中期以后，《新生报》率先出版彩色报纸，《中国邮报》与《中国时报》也紧随其后，70 年代后，《联合报》、《中央日报》、《台湾日报》、《自立晚报》等报纸都装备了新式的彩色印刷机。截至 1987 年，台湾共有 14 家报纸使用彩色印刷。

台湾各报一律自办发行，自设营业网点。发行量较大的几家报纸在国内外普遍设有办理发行的分支机构，如《中央日报》在 110 多个国家和地区设有发行点，《联合报》在台湾全省和金门、马祖等地设有 49 个分社和营业处，上千个办事处和分销处，零售处更达上万个。

台湾各报的广告篇幅通常会占到整个版面的三分之一，甚至一半，即五至七个版，各报的头版一般也有半个版用来登广告。70年代随着台湾经济的腾飞，报纸的广告收入增长幅度也随之加快，1977年为近20亿元，1983年为34亿元，1985年又增为64亿元，1986年超过了90亿元，和50年代相比，增长了不止50倍。《联合报》与《中国时报》两家报纸的广告收入一向远远超过其他报纸，其广告收入合计占台湾各报总收入的三分之二以上。《联合报》在1952年广告收入只有900万元，1983年已经达到近14亿元，这期间增长了130余倍。^①

（二）解禁后的台湾报业

1987年初，在解除戒严、开放党禁之后，国民党当局被迫考虑废除报禁的问题。1987年12月1日，台湾“新闻局”正式宣布自1988年1月1日起，开始接受新创办的报纸的登记，报纸的印张也可增加到日出6张24个版，报禁正式解除。

1988年1月21日，《自立早报》在台北创刊，这也是台湾报禁解除后创办的第一份报纸。联合、中时两家大报团则先后出版了《联合晚报》（1988年2月22日）和《中时晚报》（1988年3月7日），如愿以偿地闯入晚报市场。7月12日，时已91岁高龄的老报人成舍我创办《台湾立报》，实现了自己在台湾办报的理想。据统计，报禁解除后，短短三个月之内，33家新办的报纸向台湾“新闻局”办理登记手续。到1993年底，办理登记的报纸有221家，但实际发行的只有139家。1997年底，办理登记的报纸跃升至344家，实际正常出版发行的有76家。

早在解禁之前，台湾的各大报纸已经闻风而动，做了充分的准备工作。从人才的招揽、储备到设备的更新，从现有报纸的重新整合到创办新报纸的计划，可谓紧锣密鼓。纵观所有新创办的报纸，大致有这样几种情况：（1）以旧报为基础滋生出新的报纸。如《联合报》与《经济日报》、《民生报》增设南部版，《中国时报》与《联合报》增办晚报，以《自立晚报》为基础创办《自立早报》。（2）地方企业界人士申请创办新报。1988年至1999年间，不少财团着眼于报业丰厚的广告利润和影响力而纷纷办报，其中包括宏国建设企业支持的《大成报》，东南水泥等企业支持的《太平洋日报》，联邦集团支持的由《自由日报》改名而来的《自由时报》。（3）新组建的政党创办的报纸。党禁解除后，台湾境内曾掀起一场组建新党的高潮，1989年组建的政党达37个，为了宣传自己的政见，他们也创办了许多报纸。

^① 参见方汉奇主编：《中国新闻事业通史》，第3卷，645页。

解禁后的台湾报业与解禁前相比，有了许多明显的变化：

第一，报纸普遍增张，报价随之上调。报禁解除后，各报普遍由原来的3大张12版增加到6大张24个版，《中国时报》与《联合报》出到7大张。各报的售价原为每份5元，解禁后，由于张数与成本增加，经台湾报业协会议定，每份6大张的售价12元，5大张的售价10元，实际无论6大张还是5大张，各报都按10元一份出售。目前，《中国时报》、《联合报》、《自由时报》一天出报13至16大张，约五六十个版，而《中央日报》、《民众日报》和《台湾日报》每天出刊7大张。

在增张的同时，台湾报纸的版面也发生了变化，原来的直式走文逐渐转变为横式走文。《自由日报》于1988年1月1日改名《自由时报》时，把直式报头改为横式，标题改为从左至右，给读者耳目一新的感受。《联合晚报》创刊时，首创台湾中文报纸的横式编排、块状组版的编辑方式，《中时晚报》也随即改为横式编排、块状组版。

彩色化也是报纸加强竞争的另一策略。各报除了把头版和影剧、体育或副刊陆续改为彩色外，1998年4月24日，《大成报》改为全彩印刷，《民生报》也于1999年5月5日改版，大量增加彩色版面。1999年创办的《劲报》更以《今日美国》为师，强调彩色图片、图表和图解新闻，不但为全彩印刷，而且重视视觉效果，为台湾报纸版面编排带来新的示范。

第二，报业市场竞争激烈。报禁开放后，报业市场受到强烈冲击，晚报市场首当其冲，《民族晚报》和《大华晚报》相继停刊，《联合晚报》和《中时晚报》成为新宠。相对于传统报系报纸的稳定生存，新创刊的报纸往往面临更加激烈的竞争，多数开办不久便结束营运，1990年创刊的《大成报》一年下来累计亏损达一亿至两亿元。

《中国时报》与《联合报》两大报系在台湾报界一直处于绝对的霸主地位，两报发行合计一度占台湾各报总发行量的80%以上，广告则占70%以上。报禁解除后，两家报系在竞争中共同发展。有大财团背景的《自由时报》是两大报系在广告、发行市场上的最主要的竞争对手，《自由时报》1995年的营业收入仅及两大报的十分之一，但到1997年却占有报纸广告市场的34%。目前《自由时报》有望成为台湾第三大报纸。

官营、党营报纸大都日薄西山。老牌的《中央日报》曾独步台湾十数载，直到六七十年代《中国时报》与《联合报》才与《中央日报》比肩而立并后来居上。在1985年的统计中，台湾民众每天常看的报纸排行中，《中央日报》名列第四，但1990年时已退为第九，1992年时被淘汰出前十名。

第三,新闻报道与言论逐渐开放。报禁解除后,新闻报道与言论一个声音、一种腔调的局面终于打破,透明度与开放度都有了很大的提高。旧报道禁区逐渐被突破,对当局的批评与指摘逐渐增加;而日趋严重的社会问题更是报纸的重要报道内容,对社会阴暗面的揭露曝光成为报纸竞争的法宝之一。

目前台湾的报业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动荡与变化,不但报业之间的竞争空前激烈,而且新的电子媒体也开始与报纸抢夺读者和广告,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将是三大报鼎足而立,其他小报明争暗斗兼并重组的局面。

(三) 台湾的期刊

国民党政府迁台前,台湾的期刊不足100家,在此之后不到两年,期刊就增加到184家,由于报纸的登记受到限制,不少人便由办报转入办杂志,期刊的出版有了极大的发展。但台湾“内政部”对于杂志的出版也进行了各种限制,如杂志不得发行副刊或增刊,私人不得创办军事杂志,一人不准办两种以上内容雷同的杂志等等。1954年台湾“内政部”发起“文化清洁运动”,一次就停掉10种杂志。

时事政治类刊物在19世纪五六十年代非常畅销,影响也比较大,如由胡适与雷震主办的《自由中国》、张其昀主办的《中国一周》、兰文征主办的《时与潮》、余凌云主办的《民立宪政》以及国民党中央办的《中央月刊》、民主社会党中央办的《民主中国》、青年党中央办的《民主潮》等。

60年代,随着台湾社会逐步稳定,杂志数量开始增加。1961年,期刊数为686家,1966年达到了831家,1968年达1228家。影响较大的有《文星》、《皇冠》、《东方杂志》、《政治评论》等。创刊于1957年11月的《文星》杂志在最初的几年中一直默默无闻,1961年11月,它发表了李敖的《老年人与棒子》,引发了一场“中西文化的大论战”,从而家喻户晓。在此之后,《文星》又发表了李敖的《播种者胡适》和《给谈中西文化的人看病》,使中西文化论战走向高潮。反驳李敖的文章主要刊登在《政治评论》、《民主评论》、《世界评论》上,故有“一星战三论”的戏称。1965年12月,《文星》因李敖在《我们对于国法党限的严正声明》一文中点名批评国民党中央而被查封。^①

70年代中期以后,杂志出版越来越专业化,开始注重营销策略,发行量直线上升,由香港进口的美国《读者文摘》中文版是当时发行量最大的杂志,每月达13万册,本土出版的《皇冠》每月的发行量也在10万册左右。杂志的广告量呈现上升趋势,其成长率甚至超过了报纸,1986年台湾杂志的广告量首次超过

^① 参见辛广伟:《台湾出版史》,202~203页,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

广播成为台湾媒体广告的季军。报纸等其他媒体也纷纷涉足杂志界。《联合报》主办的《中国论坛》、《联合月刊》，《中国时报》主办的《时报周刊》，青年党主办的《醒狮》发行量也都在两万份以上。

1978年台湾的期刊数为1 558家，1979年为1 600家，1982年为2 331家，1986年达到了2 743家，解禁前则超过了3 000家。这些都是在官方办有登记手续的刊物统计数字，看起来吓人，实际能够定期发行并经常和读者见面的不过200余种。90年代中期以后，外国著名杂志纷纷落户台湾，杂志市场开始更多地受到外国杂志的冲击。

1997年台湾登记在册的杂志种数已经超过5 600种，平均每4 000人就拥有一种杂志。平均每天有一种杂志会被注销，但同时又会有两种新杂志创刊。1996年台湾杂志的广告收入约为50亿元，依旧占据第三的位置。从种类上看，以《天下》、《远见》为代表的财经类杂志已经远远超过教育文化类杂志稳居首位，曾经风光一时的政论类杂志、纯文艺杂志、严肃的人文杂志则数量锐减，举步维艰。而电脑、休闲类杂志则成为新的阅读时尚。目前以《时报周刊》、《商业周刊》、《今周刊》、《新新闻周刊》为佼佼者的周刊成为最受欢迎的杂志。

二、1949年以来的台湾新闻通讯事业

1949年12月，国民党的官方通讯社“中央通讯社”从南京经广州、重庆、成都迁至台北，作为总社，负责发布国内外重要新闻。迁台初期，“中央通讯社”设管理委员会主持社务，先后任管理委员会主任委员的有萧同兹和曾虚白，先后任社长的有曾虚白与马星野。1973年4月，“中央通讯社”改组为股份有限公司，由马星野任董事长。1985年7月马星野获准退休，退休前曾应邀赴美接受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颁发的“杰出新闻事业终身服务最高荣誉奖章”。

“中央通讯社”一向以“正确、迅速、客观、公正”为标榜，但实际上仍直接为“国民党中央党部”所掌控，它的大多数稿件都代表着国民党当局的观点。50年代初期“中央通讯社”在基隆、台中、高雄、金门等地设立了办事处，在香港设立分社，同时在国外设有纽约、西欧、东京三个分社和华盛顿、巴黎、马尼拉、新加坡、曼谷、雅加达6个办事处。60年代以后，又在旧金山、伦敦、波恩、罗马、马德里、汉城、悉尼等地增设了分支机构。从这些设置可以看出，“中央通讯社”的工作重点在发布国外新闻。70年代，在台湾当局的代表被逐出联合国，美国、日本等国家相继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的影响下，“中央通讯社”在国外的分支机构有所减少，但仍然保留了24个。“中央通讯社”每天用中文、英文、日文、西班牙文、德文5种文字发稿，其中中文部分每天平均发稿约8万

字，除供台湾各报使用外，还为中国香港以及泰国、韩国、菲律宾、美国等地的中文报纸供稿。“中央通讯社”与世界上的主要通讯社都保持着交换关系，订有交换新闻的合同。

除“中央通讯社”外，台湾还有几十家规模较小的通讯社，大部分是“南京国民党政府”迁台后的几十年间陆续创办的。这些通讯社并非综合性通讯社，而是以发布专业新闻和地方新闻为主，分工比较明确，或偏重于政治，或偏重于军事，或偏重于工商经济。这类通讯社的数量时有消长，多时达44家，少时则为37家。但影响力远不及“中央通讯社”。

台湾报禁解除后，新闻通讯社进入多元化发展时期，1988年1月4日，联美新闻社向台湾当局申请登记，成为最早提出登记申请的通讯社。1998年，台湾的通讯社已经由原来的37家增加到238家，11年间增长了5倍多。但新成立的通讯社资金少开支大，往往入不敷出，加上资讯电子传播科技迅速发展，工商企业对市场资讯的需求趋向专业、精确、迅速、权威，一般小的通讯社是无法满足这些要求的，所以台湾通讯社的起落很大，能经常见到通讯社稿的也不过三四十家。^①

依据台湾出版法，资本达到新台币30万元即可申办通讯社，这也是台湾通讯社得以迅速发展的原因之一。在自由竞争的市场中，除少数几家有官方背景、背靠报系以及有大财团提供财力支持的通讯社外，资本额小的独资通讯社占80%以上。目前台湾党政军机构所办的通讯社数量少，但优势十分明显，主控着台湾对外新闻和军事消息、国际新闻报道，也把持着政令、军令以及重要的采编和发稿权。在二百多家通讯社中，除“中央通讯社”是综合性的通讯社，更多的是地区性的专业通讯社，分工明确，订购对象狭窄。

三、1949年以来的台湾广播电视事业

（一）1949年以来的台湾广播事业

台湾的广播事业始于20世纪20年代末，1928年，台湾第一家广播电台台北放送局建立，到“南京国民政府”迁台前夕，全台湾共有5家11座广播电台，总发射功率为125千瓦。1950年以后，台湾的公营与民营广播电台同步发展，到1966年为止，共有33家60座广播电台。在长达37年的戒严时期，台湾广播电台的设立受到严格控制，到1988年依法登记的仍然保持33家。

1. 台湾的公营广播电台

^① 参见陈飞宏：《台湾近年新闻业概况》，载《中国新闻年鉴》（1999年卷），151页。

台湾的公营广播电台有12家，包括以“中国广播公司”为首的8家党政部门主办的电台和4家军队主办的电台，总发射功率为私营电台的二十多倍。“中国广播公司”原为1928年成立的中央广播电台，迁台后改为此名，是台湾最大的广播机构，受“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和台湾“国民政府行政院”的双重领导，历任董事长与总经理均为国民党要员。1980年蒋氏第三代蒋孝武出任公司总经理。

“中国广播公司”全日24小时播出，主办早晨7时至8时、晚上19时至19时半的“全国联播”节目，“中国广播公司”非常重视对祖国大陆、对海外的广播。1949年春便开始对祖国大陆广播，1954年专门成立了“大陆广播部”，用7个中波、9个短波和普通话、粤语、客家话、藏语、维吾尔语、蒙古语，每天播出的时间在14小时以上，旨在对祖国大陆进行“心战宣传”。对海外的广播主要使用英、法、日、阿拉伯、西班牙、普通话、闽南话、客家话等14种外语和方言，向海外听众及散居各国的华侨和外籍华人广播。1990年台湾“立法院”删减“中国广播公司”海外部的预算，“中国广播公司”顺势将海外部的业务推给“新闻局”，“新闻局”则把海外部并入“中央广播电台”，成立“国家广播电台”，担负新闻传播与台湾当局外宣的责任。

1968年起，台湾广播进入调频时代，“中国广播公司”台北调频电台正式播音，并在台中、高雄、花莲设立调频电台，形成全台调频广播网。1987年元旦，“中国广播公司”开播调频立体广播，实行采编播合一的新闻广播制。1988年，“中国广播公司”实行分网制度，根据不同服务对象，分为“新闻网”、“流行网”、“青春网”、“音乐网”、“体育新闻网”。“新闻网”提出“掌握天下事，促进现代化，服务中国人”的口号，推行主播制，强化现场报道。1990年起更是全面面对祖国大陆播出，并设立“大陆新闻工作组常派记者”到祖国大陆采访，以此争取听众。

“中国广播公司”在台湾长期以来一家独大，不但主导了台湾“军部”以外的整个广播电台事业，而且台湾电台的广告总收入大半都被其囊括。“中国广播公司”还能从当局获得巨额的补贴，仅1992年度，台湾“行政院新闻局”就补贴“中国广播公司”2.54亿元台币。1990年，“中国广播公司”与美国有线卫星公共事务广播网C—SPAN签约，透过C—SPAN将其节目对北美地区广播，美国、加拿大的侨胞由此可以听到最新的台湾资讯。

台湾军队原有11家85个广播电台，主要以台湾的军人为对象，同时通过中波与短波对祖国大陆广播，进行反共宣传。主要的电台有“中央广播电台”、汉声广播电台、复兴广播电台以及正声广播公司的几家电台。1992年迫于民间开

放频道的呼声，台湾“国防部”让出部分频道，由对电台频道资源的垄断转为利用与控制频道资源间接掌控，通过“中央广播电台”、复兴广播电台与财团合作成立广播公司，表面上是民营电台，实际仍由其进行幕后操纵。

2. 民营广播电台

1949年，“民本”、“凤鸣”、“益世”几家民营广播电台从祖国大陆迁到台湾，构成了民营广播电台的基本。到1987年，台湾全省共有21家民营广播电台，多集中于台北，其次是台南。多数民营电台的发射功率只有500瓦到1000瓦，全部民营台加起来也不过40千瓦。在党营与军营电台垄断新闻资源的情况下，1976年起，民营的10家广播电台联合组成民营电台广播网，共同采访共同制作节目，供各电台播放。民营的电台中以正声广播公司为最大，设有全省的广播网，制作统一节目分寄各分台播出。其系统拥有8座分台、5座广播电台，1986年的广告收入达2亿元，占广播广告总收入的18%。1967年以后，受电视事业发展的影响，广播电台的广告来源一度减少，进入70年代以后，由于台湾经济的起飞，电台广告营业额又逐年增加。台湾广播全年广告量约为新台币27亿元到32亿元之间。

解除戒严后，民间自主意识抬头，90年代台湾当局控制的广播频道被迫作部分的释放，民间成立的电台林立，1993年以来，大中小功率新设电台达118家，连同原来的33家电台，公民营的调幅、调频广播电台多达151家，1998年电台登记的有145家，而取得正式执照开播的只有92家。

民间向台湾当局分享广播资源，也导致广播的功能发生质变，形成调幅与调频相结合、大中小功率并存的多层次、多种类、多功能的多元化立体广播网，台湾广播已经由单一的封闭式言论控制转变为容纳不同声音的、开放型的、社会化的现代传播工具。台湾当局曾经实行三十多年的“全国联播”节目，各电台在黄金时间不得不播出由“中国广播公司”制作的新闻节目，近年来，部分电台从自身利益出发，多次要求当局开放民众选择频道的权利，1990年9月，“新闻局”终于宣布台湾各广播电台可以自由参加“全国联播”节目。民营的正声率先退出联播节目，其他民营电台一路跟进，纷纷在这一时段推出新的综合性节目。但小功率电台专业性强、财力薄弱、采编人才缺乏，掌握的资源有限，节目制作能力差，不得不以局部联营、联合制作节目的方式扩大听众群，台湾数十家地方中小功率电台通过合纵联横的方式形成跨地区或全省性电台联播网，极大地冲击了原来的全省性广播网。针对系统电台形成民间广播大集团的倾向，“新闻局”被迫于1997年5月公布“广播电台联合经营及联播相关处理原则”，强行规定，大中小功率电台联播节目比率不得高于50%，小功率电台不得高于70%。

（二）1949 年以来的台湾电视业

台湾电视起始于 20 世纪 60 年代。在长达三十多年的时间里，由“中视”、“台视”、“华视”三家电视台垄断经营电视事业。报禁解除后，只有电视业没有像其他传媒那样出现纷纷攘攘的局面，因为电视并未列入解禁的范畴，而主要原因还在于办电视并非易事，须有相当的财力、人力与物力。1993 年台湾公布《有线电视法》，有线电视集团开始出现。而经历 18 年曲折的非商业性的公共电视台也于 1998 年 7 月 1 日正式开播。目前台湾电视已经形成无线电视与有线电视、卫星商业电视并存的体制。

1. 三大台的垄断

1960 年 5 月，“中国广播公司”与日本电气株式会社合作开始试播电视。1962 年 4 月，台湾第一家电视公司台湾电视公司成立，同年 10 月 10 日开始播送节目，由此揭开了台湾电视事业发展的序幕。

台湾电视公司简称“台视”，由台湾省政府、台湾私人企业与日本富士、日立东芝等厂商联合投资建立，资本总额为 3 000 万台币，日本四家财团占有 40% 的股份。台湾省政府通过所属六行库（华南银行、土地银行、台湾银行、彰化银行、合作金库、第一商银）占有股权 49%。“中央日报社”、“中国广播公司”等国民党党营事业也以民间身份入股。“台视”创办后的前三年，覆盖地区仅限台北一地，1965 年完成了中南部的转播系统后才覆盖全省。当时民间拥有的电视机台数也由 1962 年的 3 334 台增加到 1966 年的 10 万台，1969 年更增至 30 万台。1969 年以后，“台视”的节目由黑白改为彩色播出，并使用卫星传送手段接收和转播重要的国际新闻和体育竞赛消息。^①

1969 年 10 月 31 日“中国电视公司”（“中视”）、1971 年 10 月 31 日“中华电视公司”（“华视”）分别开播。“中视”由“中国广播公司”、全省民营电台和民间企业界人士合资经营，是“国民党文工会”控制下的党营商业电视台，资本额为新台币 1 亿元，其中“中国广播公司”的股份最多，占到 50%。“华视”由台湾“国防部”、“教育部”和部分民间企业合资经营，以官股所占比重最大，官股中又以军方的股份最多，可以说是军方控制的商业电视台。这两家电视公司的出现，打破了“台视”一家独秀的局面，但三家电视台分由国民党当局、台湾省政府、台湾“国防部”控制，电视台的高层人士均为党政军要员，当然自觉地宣传台湾当局的政策、纲领。作为官办的商业电台，三家电视台虽然有时会为利益冲突而出现摩擦，但一旦面对民进党或社会反对运动，便会采取一致立场。

① 参见陈飞宝：《台湾省新闻事业发展概况》，载《中国新闻年鉴》（1989 年卷），47 页。

80年代末,随着台湾产业结构的调整、资讯工业的发展,台湾人均收入达7 518美元,台湾电视机超过每家一台的水准,彩色电视机的普及率达96%。面对社会多元化、观众信息需求量的增加,三台纷纷增辟新闻时段,在提高时效的同时加大信息量。1989年4月17日,台湾当局允许台湾影视人员到祖国大陆拍片、采访,三家电视台争先恐后到祖国大陆拍摄电视剧和专题节目。1990年9月22日,三家电视台现场直播了北京亚运会开幕式的盛况,在观众中引起强烈反响。

80年代末卫星电视和有线电视异军突起,三台均采取了大举措。“中视”成立卫星公司,辟“中视”第二台;“华视”制播第二频道,“台视”启用“台视全球资讯网路”,透过网站输送“台视”的新闻、娱乐、气象等最新资讯。在节目制作方面,也尽量淡化政党色彩,标榜独立性。台湾工商界每年流入电视的广告有200亿元,卫星电视与有线电视虽然对三家电视台构成相当的威胁,但经营了三十多年的三大台,节目制作水准较高,人员素质高出一筹,台湾的大广告商依旧对它们情有独钟,70%的广告流入到老三台的腰包。

1997年5月31日,台湾“立法院”通过公共电视法,1998年7月1日,经过18年的曲曲折折,非商业性的公共电视台正式开播。

2. 有线电视

在台湾台北和高雄等城市,三大台之外,所谓的“第四台”方兴未艾。“第四台”是指那些擅自铺设电缆到订户家,利用录放设备播放录影带节目,并收取费用的地下有线电视台。这些有线电视台的设立并未经合法登记批准,因此没有频道名称、没有台号、甚至没有公开的台址,但它的播放讯号可以在电视频道中出现,民间将之称为老三台之外的“第四台”。台湾当局虽然屡次取缔,但它们总能春风吹又生,愈演愈烈,发展为二百多家,并有公开化的趋势。民进党在申请办理广播电视未果后,便大肆运用“第四台”宣传其政治主张。

“中视”早在1988年就参与投资“台湾电讯网络股份有限公司”的筹划,“台视”也于1989年投入大笔资金经营有线电视。当局鉴于有线电视不可遏止,只好成立“有线电视专案小组”,制定“有线电视法”。1993年8月,台湾公布《有线电视法》,年底618家“第四台”变成合法经营,经过市场的整合,有线电视集团开始出现。和信传播公司、力霸东森传播事业有限公司、邱复生年代国际公司与木乔传播公司四大传播集团脱颖而出,控制62个频道。1998年全台湾有线电视用户为375万,其中东森一家占38%,和信占20%。据台湾报纸报道,经过兼并重组,原来的600多家有线电视台目前只剩下90家。

有线电视的合法化,使台湾电视的频道数达160多个,一般能挤上有有线电视

系统播出的有 76 个频道，其中和信、东森、木乔三家集团就占了 55 个，三家财团还实行“三合一”，网罗无线卫星 TVBS，实行统一定额，区块排列，甚至采取饭店批发或餐厅套餐的“联卖”手段。这种垄断的局面迫使非财团党派经营的 54 家有线电视台组成“全国有线电视系统独立联盟”，提出反财团、反联卖，并请“新闻局”与“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员会”成立“媒体监督委员会”。“立法院”新通过的“有线广播电视法”中有反垄断的规定，限制系统业者垂直及水平经营占有率不得超过三分之一，也不得超过同一行政区系统经营者总数的二分之一。

3. 卫星电视

1988 年 11 月 18 日，台湾“新闻局”宣布开放卫星电视 KU 频道，这使得台湾观众可以直收日本 NHK 卫星电视节目。1990 年底，收看 NHK 的台湾民众即达到 40 万。

1991 年 9 月，香港卫视（STAR TV）通过亚洲卫星一号，开始向亚洲 38 个国家和地区的 27 亿人口全天候播放电视节目，不到一年，在台湾的收视用户即达到 120 万，占台湾总人口的四分之一。台湾全面开放卫星电视市场，使民众受国际卫星的影响日益明显，目前台湾的卫星收视户约占全省人口的三分之一。

如今台湾的民众生活在资讯爆炸的时代，无线电视、有线电视与卫星电视并存，国际性、区域性、邻国的卫星互相交叉、渗透，覆盖台湾有限的天空。这种全方位的、立体的、纵横交错的电视网络使民众的选择余地大大增多。

四、台湾的新闻法与台湾当局的新闻政策

在报禁解除前，管理台湾报业的“婆婆”有四家之多，一是“国民党文化工作委员会”（简称“文工会”），一是按照《戒严法》和《台湾地区出版物管理办法》执行公务的“警备总司令部”（简称“警总”），还有“新闻局”和“法务部”的“调查局”。他们分别代表了台湾国民党的党、政、军、法四大势力，对新闻舆论界进行严密的监控。而涉及管制出版的法律就包括《戒严法》、《出版法》、《妨害军机治罪条例》、《惩治叛乱条例》、《妨害“国家总动员”处罚暂行条例》等等，多如牛毛。

早在 1952 年台湾的立法与行政部门已经制定和颁布了一部《出版法》，其中第二章是专门针对新闻纸及杂志的。规定在“战时或遇有变乱或依宪法为急速处分”的非常时期，政府部门得以命令方式对报刊刊载的内容加以限制，并规定凡是在新闻报道中导致影响民心上气的、揭露军队生活艰苦的、与军方订有供应契约而不履行的，均将受到法律处分。有关报刊将被“警告”、“罚鍰”、“禁售”、“定期停止发行”直至“撤销登记”，而相关的新闻工作者将判处一年以上有期徒

刑直至死刑。

60年代以后,台湾的广播电视事业有了较大的发展,立法与行政部门又在1976年1月8日公布了《广播电视法》,对广播电视节目中的“损害国家利益或民族尊严”、“违背反共复国政策或政府法令”、“散布谣言邪说或淆乱视听”的内容加以限禁,对违反者处以10万元以下的罚款、3日以上的停播处分直至“吊销执照”。

从1949年“南京国民政府”迁台到1988年报禁解除之前的37年间,台湾报刊与报人以莫须有的各种罪名受到迫害的事例不胜枚举,可谓是新时期的“文字狱”。《自立晚报》、《民族报》、《公论报》都曾因发表触怒当局的文章而遭遇勒令停刊的处分。

台湾报禁解除后,当局废除了与戒严令相关的行政命令与政令法规,台湾新闻传播事业步入商业化自由竞争时期,当局对新闻媒介的控制方式有所改变,新闻政策也有所调整,对党营和部分民营的媒介,当局不再直接发号施令,而是通过笼络其负责人的方式间接地控制。1988年,在“国民党第十三届中央委员会”180位中委中,新闻媒介的负责人有17人,约为十分之一,台湾新闻界的头面人物都囊括在内。

报禁解除之后,“行政院新闻局”代替警备部门负责对新闻事业的管理。对于言论和新闻报道,当局强调“依法办事”,即以《刑法》、《特别刑法》、《国家安全法》、《出版法》、《广播电视法》的有关规定进行处理,而不再行政干预。此外当局还利用台湾新闻评议会制定的《新闻道德规范》及解禁前夕台北报业公会、台湾省报纸事业协会制定的《解除报禁后各报应共同遵守的八条规范》,要求新闻媒介加强自律。

“新闻局”对于保持媒体目前的多元化、多层次态势负有重要责任,通过相关政策的制定来鼓励竞争、反对垄断是十分必要的。台湾当局确实也制定了很多的规则来反对垄断行为,但很多法律缺乏权威与公信力,起不到应有的效果,在僧多粥少的情况下,往往无法实现有限的新闻资源的公平合理分配。

第二节 香港的新闻传播事业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香港作为一个自由港,在自由经济政策的刺激下,经济不断繁荣发展,逐步发展为亚太地区的贸易中心、金融中心、航运中心、旅游中心和信息中心,与此相适应,香港的新闻事业也获得了巨大的发展,成为报纸密集、广播电视发达的新闻事业中心。

一、香港的报业

香港是亚洲人均读报最多的地区之一，也是世界上最大的中文刊物出版中心之一。这里的报纸种类繁多，综合性中、英文报纸大行其道，报纸每日的总发行量达180多万份，平均每3人占有一份报纸。香港不少大报还通过航空运销到世界各地的华侨、华人地区，或者在美国、加拿大、英国和澳大利亚印行外地版，影响深远。从太平洋战争结束到1997年香港回归，香港报业在曲折中不断向前。综观其发展历程，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太平洋战争结束到60年代末为第一阶段，70年代到80年代末为第二阶段，香港回归前后为第三阶段。

（一）太平洋战争结束到60年代末的香港报业

香港的新闻事业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逐渐复苏，50年代中期以后得到发展。这一时期政治的因素对香港报业格局的形成起了很大的作用。由于办报人的政治观点不同，其新闻报道与言论立场也大相径庭，香港人将当时的报纸分为“左”“中”“右”三种，所谓“左”，即拥护中华人民共和国态度鲜明的《大公报》、《文汇报》等，而台湾国民党主办与倾向国民党的报纸如《香港时报》属于“右”派报纸，其余的多为中间报纸，在解放后尤其是60年代创刊的报纸大都走中间路线，人们用“两头小中间大”来形容香港的报纸结构。

据1946年的《香港年报》记载，当时香港共有14家中文报纸，4家英文报纸。14家中文报纸包括9家日报，5家晚报，其中占据主要地位的是《华侨日报》、《星岛日报》和《工商日报》，这几家报纸均创刊于二三十年代，当时销量最大的是《华侨日报》，每日销数为38000份。4家英文报纸为《中国邮报》、《星期日先驱报》、《南华早报》、《香港电讯报》，其中《南华早报》创刊于1903年11月7日，是香港现存英文报纸中历史最长、影响最大的一家。1949年星系报业创办人胡文虎创办了英文《虎报》，该报与《南华早报》成为香港最著名的两家英文报纸。

50年代，香港政府加强了对新闻出版事业的管理，1951年通过的《刊物管理综合条例》对刊物的出版、发行、印刷、登记等都作了详细的规定，如规定报社需交1万元保证金（此前一直是3000元），这对于小报无疑是一笔很大的负担，这个条例被认为是香港有史以来最严厉的管理条例，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报业的发展。但整个50年代还是有85家报纸创刊，平均每年新创办8家左右的报纸，不过这些报刊大都短命，能够坚持出版的只有《明报》、《新报》、《晶报》几家。

这一时期“左”派报纸与“右”派报纸都获得了一定的发展。“左”派的报纸主要有《大公报》、《文汇报》、《新晚报》、《晶报》、《香港商报》5种。1948年

3月15日，内地《大公报》的分版香港《大公报》复刊。1948年9月9日，香港《文汇报》创刊。《新晚报》是《大公报》的姊妹报，创办于1950年10月5日。它最早连载梁羽生和金庸的武侠小说，结果一炮打响，开了香港报纸刊载新武侠小说之风气。《新晚报》因此销量大增，一度成为最畅销的晚报之一。这三家报纸坚持爱国民主的立场，政治态度比较鲜明，被称为“红色报纸”。1952年10月创办的《香港商报》与1956年5月5日创办的《晶报》则属于“侧面”爱国报纸，比较中性，走的也是大众化报纸的路线，意在争取处于中间立场的香港同胞。《香港商报》贴近大众、服务大众的办报路线使其销量不断上升，鼎盛时期直逼当时发行量最大的《成报》，故有“《成》《商》成对”之说。《晶报》的统战宣传工作十分出色，在香港、台湾和海外华侨中极有影响，是当时惟一能够在台湾畅通无阻的“左”派报纸。

50年代香港的“右”派报纸也很有竞争力。台湾国民党于1949年8月4日创办了《香港时报》，这也是国民党在台湾以外惟一的一份党报，公开拥护“中华民国政府”，宣扬“三民主义”，反对共产主义和中共政权。《工商日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即为香港举足轻重的报纸，虽标榜为独立的商办报纸，但在言论上一贯亲英亲台反共，因而深得从内地逃至香港的国民党旧部人员的喜欢，该报的言论还经常被台湾的广播电台转播。与之形成三足鼎立之势的《华侨日报》、《星岛日报》也是中间偏“右”的报纸，称台湾为“我国”、“自由中国”，版面上关于台湾的消息也很多。70年代之前出版的报纸中，《红绿日报》、《超然报》、《新闻夜报》、《天下日报》、《真报》也都是“右”派报纸，而且销量不少。

由于港英政府当时的立场是抑“左”护“右”、亲美拥台的，因而“左”派报纸常常与港英当局发生冲突，1952年“三·一”事件中的《大公报》案就是一例。1951年12月，九龙东头村发生一场大火，使16 000多人沦为灾民，因为这一地区的居民多为爱国拥共的工联会会员，他们怀疑大火是有目的的纵火案，遂开展了大规模的群众运动，《大公报》、《文汇报》、《新晚报》也大造反对港英当局的舆论。中共华南分局对此十分支持，决定于1952年3月1日派出慰问团到香港支持灾民的斗争。3月1日这一天港英政府如临大敌，明令禁止慰问团入境，而周恩来总理得知消息后，命令广东有关部门火速拦截慰问团，不准慰问团去香港；同时通知《新晚报》立即刊登慰问团不再来香港的消息。但聚集的群众并不知内情，与港英警察发生了大规模冲突，警察开枪射击造成多人伤亡，史称“三·一”事件。中国政府事后对此提出了抗议，并由《人民日报》发表了社论，香港的《大公报》、《文汇报》、《新晚报》在头版头条转载了这篇评论，遂被指控“刊载有煽动性的文字”，三报的负责人被转解到高等法院审讯。《大公报》首先

被提审，初审判决《大公报》停刊半年，经理及出版人费彝民被判罚款4 000元或囚禁9个月。在上诉期间，合议庭中止执行初审的停刊令，但当时《大公报》实际已经停刊了12天。在我国政府的交涉下，港英政府接到伦敦的指令，才停止执行对《大公报》的判决和对《文汇报》、《新晚报》的指控。《大公报》的停刊成为香港首宗根据出版法强制报纸停刊的个案。

1967年春，香港工人发生大规模的罢工，为了支持工人的罢工，每天都有学生示威游行，港督府外贴满了大字报。群众与政府的冲突最后发展为镇压事件，港英政府甚至宣布戒严；而在国内极“左”路线的错误指导下，斗争进一步升级为要使香港变成“臭港”、“死港”的武装斗争。“左”派报纸与外围报纸也积极配合了这场反英抗暴斗争，最后几家外围报纸《香港夜报》、《新午报》和《田丰日报》以“刊登虚构新闻与煽动性新闻”被起诉，在审讯期间三报又继续刊登“不实报道”，因而被勒令暂时停刊，成为1952年《大公报》案之后又一起停刊案。1967年香港的“反英抗暴”斗争使中英关系陷入空前恶化的状态，更使“左”派报纸遭受巨大挫折，元气大伤。反英抗暴之前，“左”派报纸的销量合起来约占香港中文报纸销量的一半左右，但此事之后，“左”派报纸的销量暴跌，由过去的十万份跌为一两万份，读者大量流失。^①

50年代末到60年代中期，香港集中出现了一批综合性的大报，主要有查良镛、沈宝新创办的《明报》，出版商罗斌出资经营的《新报》，二天堂药厂韦氏兄弟的《天天日报》和胡仙投资的《快报》。

这一时期晚报在香港的发展极为引人注目。1946年香港有5家晚报：《华侨晚报》、《工商晚报》、《星岛晚报》、《新生晚报》、《中英晚报》。1950年香港的晚报多达十几家，为了增强新闻的时效性，《工商晚报》与《华侨晚报》每日出版两次，英文晚报《德臣西报》甚至每日发行3次。《星岛晚报》与《华侨晚报》是战后晚报中销量较大的报纸，前者更是长期雄踞晚报榜首。1960年7月29日，《新闻夜报》成为香港第一张夜报，强调要网罗一天中最后的香港及国际新闻，于是出现了一大批夜报，如《香港夜报》、《世界夜报》等，其实它们争夺的也是晚报的市场。

（二）70年代末到80年代末的香港报业

进入70年代后，香港经济开始起飞，在远东以及世界市场上占有越来越重要的地位，大众化报纸发展飞速，而且经济类报纸开始出现。随着香港成为东南亚的主要股票市场，股票市场与赌博业的兴旺带动了大量马经报的出现。1977

^① 参见陈吕凤：《香港报业纵横》，60-62页，北京，法律出版社，1997。

年，中文报纸总量骤增至128种，创历史纪录，到1978年才降下来。

香港第一家财经专业中文日报《信报》是1973年创刊的，当时正值世界性经济危机爆发，香港股市从高峰下泻，《信报》声称会监察政府及大财团在香港的经济活动，并提醒老百姓要珍惜自己的钱，学会投资，因而深得市民青睐。经过初创时期的艰难，《信报》的销量与广告逐年增长，读者也主要由工商界领导、投资者和知识分子构成，成为较具权威的专业媒体。另一份经济类报纸《远东经济日报》虽不如《信报》权威，却深得中下层读者的厚爱，广告收入也不少。1976年美国财经报纸《华尔街日报》在香港发行英文亚洲版，名为《亚洲华尔街日报》，这也是《华尔街日报》在美国本土以外发行的第一份子报，显示出其对于香港在亚太地区重要地位的认可。

一些大报也将原来的经济新闻开辟为经济专版，增加经济报道的内容与分量，70年代经济版的扩张更使一些报纸延伸出独立的经济附刊。

香港的大众化报纸一直以《成报》办得最为成功，1954到1977长达二十多年销量一直居于香港报纸的榜首，而打破其垄断局面的是1969年1月22日创刊的《东方日报》。《东方日报》注意到香港读者结构发生的变化，精心经营社会新闻，突出香港本地新闻的报道与分析，吸引了大批市民，销量一路攀升，1976年销量达到20万份以上，1977年取代《成报》成为近20年来的新霸主。

大众化报纸虽然销量大、广告多，但实际的公信力、可信度并不高，香港同样需要严肃的高质量大报，《明报》就是其中的代表。《明报》在1959年创刊时经济十分困难，仅靠查良镛（金庸）和沈宝新两人惨淡经营，若不是有金庸的武侠小说连载，将很难支持。《明报》最主要的特色是始终大量报道内地新闻。在创刊的初期就因报道内地三年自然灾害时的出境潮而销量大增，从1965年开始专辟“乡土”专栏，刊登内地报刊上的专稿。“文化大革命”期间《明报》开辟了名为“北望神州”的中国消息版，刊登许多内幕新闻而跃入高销量中文报纸之列。70年代末，由于祖国大陆实行改革开放的新政策，香港市民大量涌回内地探亲，内地与香港的经贸往来也日趋频繁，对于祖国大陆的报道开始成为热点，《明报》也因此而成为仅次于《东方日报》与《成报》两大大众化报纸的香港第三大中文报，在中小资产阶级、尤其是知识分子中拥有相当数量的读者，发行量突破15万份。

《明报》被查良镛认为是自己毕生的事业与名誉，《明报》因查良镛而成功，查良镛因《明报》而成为在香港举足轻重的人物。80年代是香港经济飞速发展的年代，也是决定香港未来的年代。1985年查良镛参加了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员会。1991年查良镛将明报集团有限公司送上股市，公开发售股票，并以12亿元

的资产成为香港华人亿万富翁之一。1993年他将所持股售与于品海，并辞去董事局主席职务，正式引退。

香港的报业上市开始于70年代香港股市疯狂发展的时候，这也标志着报业企业化的发展进入新的阶段。1971年11月23日，英文南华早报有限公司率先公开发售股票，并在证券交易所上市。1972年星岛报业有限公司也公开发售股票。新报社、东方日报社、天天日报社、明报社、成报社等随后相继发售股票，借此集资扩展实力。

一些重要的报纸如《财经日报》、《金融日报》、《工商日报》、《工商晚报》、《星报》、《明报晚报》及战后香港第一家晚报《华侨晚报》由于经济原因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纷纷停刊。《香港时报》自70年代后便开始衰退，其反共的立场、鲜明的政治性使其无法在香港的商业社会立足，该报虽名为《香港时报》，但关于台湾的报道却占了40%，完全是“台湾化”的报纸，是为了办给台湾的国民党看的，因而不得不于1991年2月17日停刊。再加上亲台的《工商日报》、《工商晚报》的停刊，“左”、中“右”鼎立的报业格局终于被打破。

70年代出现的电视对晚报造成很大的冲击，1990年晚报只余下两家，即《星岛晚报》与《新晚报》，电视节目几乎取代了晚报的生存空间。1996年底，《星岛晚报》停刊，1997年7月27日，香港的最后一家晚报《新晚报》宣告关闭，晚报退出了香港报业的历史舞台。

1984年中英正式签署了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香港基本法经过五年的起草，于1990年4月颁布，“一国两制”的方针以法律的形式规定下来。再加上从1984年的两会开始，中国政协和中国人大向港澳记者开放，为港澳记者报道祖国大陆的大政方针提供了便利。“九七新闻”、“前途新闻”、“基本法新闻”几乎成为香港传媒报道不尽的热点与重点，香港传媒围绕香港回归这一重大历史事件所进行的报道持续时间之久、报道范围之大，参与讨论并发表各种意见的人之多、在版面上所占比例之大，在香港新闻史上是前所未有的。

（三）香港回归前后的报业发展

1992年香港市场研究社发表的媒介指数中期报告显示，香港有阅报能力的人约为500万，读报的人数稳定在350万左右，平均每两个香港居民便有一个入阅报。平均每人阅读一份以上的报纸。在全世界十个最爱阅报的地区中，香港位居第二。读者人数超过5万人的报纸有《东方日报》（178万）、《成报》（76万）、《天天日报》（67万）、《明报》（43万）、《南华早报》（29万）、《新报》（23万）、《星岛日报》（18万）。当时香港传媒从业人员总数为7385人，其中报业的人数超过一半，达3844人，杂志社有2821人，电台与电视台有558人，新闻通讯社

有 162 人。^①

1992 年邓小平南方谈话之后，内地经济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发展势头，各省市的招商活动、经贸活动、房地产和商品广告令香港传媒应接不暇。这一时期香港还出现了周刊热，比较著名的有《亚洲周刊》与《壹周刊》。1992 年首创的《壹周刊》每期发行量突破 10 万册，1992 年 10 月由东方集团创办的《东周刊》内容与风格与《壹周刊》极为相似，发行量也突破 10 万册。据业内人士估计，通俗时事周刊的潜在读者在香港约有 40 万。

1995 年新年刚过，香港历史最悠久的中文报纸《华侨日报》因亏损巨大而停刊。随后因成功创办《壹周刊》而对投资媒介信心大增的商人黎智英又投资数亿元于 1995 年 6 月 20 日创办了《苹果日报》。黎智英将《苹果日报》第一个月的销量定为 20 万份，当时香港中文报纸的读者群已呈饱和状态，为了达到 20 万份的销量，黎智英大搞减价噱头，准备先亏损一亿元来提高市场占有率。香港中文报纸多年来统一售价，1994 年调整为每份 5 元，《苹果日报》头一个月实际上是以 2 元的价格售报，一个月便亏损 6 000 万元，但平均日销量为 22 万份，5 个月之后，《苹果日报》的销量达到 31 万份。其他大报只好应战，纷纷降价，这次减价大战一开始便使 7 家上市的报业集团股价下挫，平均跌幅达 10%。出版达 27 年之久的《电视日报》、33 年历史的《快报》以及台湾联合报系的《香港联合报》等报刊关门大吉。这场减价大战一直持续到 1996 年 7 月才平息下来，报价恢复到 5 元一份。

1997 年 7 月 1 日香港回归后，香港传媒业进入一个新纪元，并继续保持着亚洲传媒中心的重要地位。回归前后香港不断有中英文报纸出版，但多无疾而终，来去匆匆。1999 年 3 月，大众化的《太阳报》问世，该报仿效 1995 年《苹果日报》创刊的策略，以低价打入市场，引发减价大战，经过 3 个月的恶斗，主要大众化报纸约投入上亿元来换取市场的占有率。目前大众化报纸的读者占有率有所上升，从过去的不到七成上升到接近八成。

据《香港年鉴》统计，1999 年在香港注册出版的本地和外地报纸，日报达 45 份，期刊达 684 份。其中中文报纸 26 份，英文报 8 份。中文报纸中，专门报道香港和世界新闻的 19 份，另有 3 份是财经类报纸，其余的专门报道娱乐新闻。面向香港的中文日报共 13 份，传统的“左”派爱国报纸 3 份、大众化报纸 6 份、精英报纸 4 份，包括两种财经日报、两种综合报纸；英文报纸两份。这是经过市

^① 参见梁云骥：《1992 年香港传播事业发展概况》，载《中国新闻年鉴》（1993 年卷），40 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

场的不断整合而形成的格局。

香港回归后,香港在世界传媒业所占的分量越来越重。长期以来国际性的通讯社如路透社、美联社、合众国际社及法新社、共同社在香港均设有分处,祖国大陆的新华社和中国新闻社也在香港设有分社,台湾的“中央社”也设有分社。现在一些大的传媒集团纷纷在香港设立办事处,作为拓展中国传媒市场的前哨。

二、香港的广播电视业

(一) 广播事业

目前香港的广播事业由香港电台这家政府电台与香港商业电台、新城两家商业电台构成。香港的广播事业 1949 年以前是“香港电台”独霸天下的时代,该台从 1928 年 6 月开始无线广播,10 年后中英文两台同时播出。1951 年港英政府新闻处公共关系主任负责管理该台,并由政府支付经费,因而长期被认为是官方的喉舌。1980 起香港电台成为全港第一个全日 24 小时广播的电台。

1949 年 3 月 21 日,丽的呼声有限公司开始有线播音,打破了香港电台的垄断地位,这是伦敦“丽的呼声”在香港的分支,初期各有一个中、英文台,1956 年 7 月开设第二个中文台,用粤语、普通话播音。1957 年丽的呼声增设有线电视台,称为“丽的映声”,首次进行有线黑白电视播映,当时不能自制节目,只播映欧洲电视片的原声带,也没有中文配音。1959 年 8 月,香港商业电台开始播音,加入与香港电台、丽的呼声的角逐。

直到 1990 年,港英政府才开始招标经营第二个商业电台,有效期为 12 年,可使用两个超短波频道和一个中波频道。12 月,新城广播电台成为第二家商营电台,并于 1991 年 7 月正式开播,30 年来只有两个商营广播电台的局面被打破。新城电台宣布大众“广”播的时代已经结束,它们将定位于“窄”播,争取特定的听众群。其开播的三个电台为劲歌台、金曲台、新闻台,如劲歌台就是一个纯音乐电台,以 18 岁到 25 岁的青年人为主,而新闻台 24 小时进行英语广播,对象是香港 60 万名使用英语的人士。

(二) 电视事业

1. 无线电视

1966 年,香港电视广播有限公司投得香港第一家无线电视播映权,次年 11 月,该公司的无线电视台(HK—TVB)首次开始彩色播映,刚刚开播时,无线的收视率与丽的映声相比明显处于劣势,但短短几年时间无线便后来居上。1972 年,港英政府签发了 3 份经营新电视台的执照。1973 年 10 月,播映专利权期满的“丽的映声”以“丽的电视(香港)有限公司”(RTV)之名获得开办无线电

视广播的专利权，同年12月，“丽的电视”也开始彩色播映，香港黑白电视的播映历史就此结束。到70年代末，香港的广播、电视业初步形成了一家政府电台、一家商业电台和两家商业电视台的格局。

80年代是香港广播电视业快速发展的重要阶段，也是其最为动荡的年代。无线电视台在80年代初期重创“丽的电视”后一枝独秀，“丽的电视”为求发展，数易其主，1982年远东集团主席邱德根购入50%的股权，入主“丽的”，并将其易名为“亚洲电视”（ATV），1984年邱氏购入其他股权，全权控制亚视。1988年6月，亚视收视率下降，邱氏又不得不出让股权，以郑裕彤和林建岳为首的两大家族以超过4亿港元买下亚视三分之二的股权，同年11月，邱氏因涉嫌“远东银行造假账”一案被廉政公署调查，停止参与对亚视的管理，并于次年5月正式退出亚视。亚视为期五年的邱氏时代告一段落。

无线与亚视各设有中英文两个台，无线的中文台又称为“翡翠台”、英文台称为“明珠台”，亚视的中文台叫“黄金台”、英文台称为“钻石台”。两家电视台的竞争十分激烈，1988年为争夺汉城奥运会的转播权甚至打上法庭。亚视最先宣布取得汉城奥运会的独家播映权，无线控告亚视违背双方的口头协议，暗地取得播映权，经法院审理，无线败诉，无线遂向最高法院上诉庭上诉，结果被宣布胜诉，最后两家电视台不得不平分奥运会的播映权。

2. 有线电视与卫星电视

1985年港英政府采纳广播事业检讨委员会的建议，宣布开办有线电视网络，约有二十多家公司组成四个财团参与竞投，最后香港有线传播有限公司夺标，该公司由九仓、新鸿基地产、美西电讯、比利时高迪公司及邵氏兄弟公司组成，有较强的国际背景。在夺标后宣布投资55亿港元发展有线电视，并打算于1991年下半年开始播送节目，届时会有15个中文台与5个英文台，并预计于1994年覆盖香港。

但1990年4月7日，由香港和记黄埔、中信公司、香港大东电报局合租亚洲卫星公司的“亚洲卫星一号”升空，以和记黄埔为首的和记通讯有限公司还宣布租用“亚洲卫星一号”的转发器发展卫星电视，并计划在香港建立发射基地，向太平洋地区进行卫星电视广播。这无疑对有线电视的前景构成威胁，11月，有线传播以商业决定为理由正式宣布终止有线电视的发展计划。而有线传播的股东之一九仓集团表示仍有兴趣投资有线电视，1993年10月31日，由九仓集团创办的有线电视台正式启播。收费电视最初采用微波传送，在两周年时收费电视的用户已经超过100万个家庭。1995年增至20个频道，其中包括15个收费台、一个另行收费的电影台及四个按次收费的电影频道。

1991年4月香港的卫星电视正式启播，以香港为总部，通过“亚洲卫星一号”向亚洲地区免费传送每日24小时不间断的节目，覆盖38个国家和地区，总人口约为27亿，其中华人约为11亿。卫星电视分5个频道：体育台、音乐台、新闻台、中文台以及合家欢乐台。卫视中文台的华语电视节目在台湾地区的收视总户数增长迅速，1992年用户达119万户。1993年9月，香港电视广播有限公司在台湾开设了卫星频道（TVBS），与香港卫星电视台竞争刚刚开放的台湾有线电视市场。

卫星电视的引进也使香港的广播事业更为国际化。1994年12月，港府行政局批准无线电视台开办卫星电视广播业务，营业期12年。1995年，卫星电视台推出自行经营的电视台频道，提供24小时音乐服务，收费的电影频道也于1994年5月投入使用。到1996年底，香港有44万多个家庭利用卫星电视公共天线系统，收看卫视和其他卫星电视节目。另有7个卫星电视广播机构通过香港国际电讯有限公司的设施传送节目。

1998年香港政府将电视广播全面放开，不再设牌照发放的上限，以增加市场竞争。到2000年，政府为开放收费电视市场，发出5个新收费电视台牌照，连同原有的有线电视及互动电视，仅有线电视台就有7个，可为公众提供149个频道。这次发牌照行动结束了香港有线电视专营权的历史。

无线电视为观众提供普及性节目，有线电视则提供专门性节目，卫星电视则可提供亚洲地区的外语节目，香港的电视业在短短几年之内面貌一新。

三、香港的新闻政策与媒介管理

香港并没有一个明文的新闻法。香港的新闻政策由政务司负责制定，政府通过由新闻处向媒介发布消息、提供服务的方式间接地引导舆论，使政府与传媒之间形成了相互依存、相互监督的关系。新闻处下设有新闻科、公共关系科和宣传科。其中新闻科负责发布港英政府的官方新闻，向各传媒免费提供新闻稿和图片，每天编印中英文版的《新闻公报》供新闻机构选用，并负责组织记者招待会，安排政府官员与记者见面。公共关系科主要负责政府在香港及海外的各种宣传公关活动，改善本部门与记者、市民的关系，其下设媒介研究组，每天编辑出版一份英文的《新闻摘要》，汇集中文报刊发表的社论、重要新闻与电台电视台的意见，帮助港英政府了解舆论动向。

香港的新闻传媒除香港电台以外均为私营，依据市场法则自由竞争，但在其发展过程中港英政府并非任其自由发展，对电台和电视台，港英政府曾经通过招标发牌经营等措施进行总量控制。同时还建有公开的检查机构，对所播节目进行

检查并决定是否进行惩处。1987年9月，广播事务管理局成立，统管无线电视与商营电台的事务。广播事务管理局不对个别节目进行审查，电视台的节目也无需事先送审，但下设投诉委员会，处理市民对电视业的投诉，管理局根据投诉委员会的建议向电视台进行警告或罚款。1989年共有投诉903宗，管理局参照委员会的建议，向两家电视台发出警告34次，罚款2次。

在过渡时期，港英政府修订了《刊物管理综合条例》，撤销了对印刷媒体、采访、报道自由的各种限制。同时还修订了《公安条例》第27条，撤销了“禁止恶意发布虚假新闻”的条款。港英当局早在1988年就宣布撤销要求电视台播放一定时间的英联邦国家制作节目的规定。香港回归后，特别行政区政府鉴于公众对监管色情刊物的呼吁，于2000年4月发表了《淫褻及不雅物品管制条例》咨询文件，提出多项管制色情物品的新建议。2000年6月，立法会通过了《广播条例草案》，重整了以往的广播电视法规管理模式，将电视机构重新分类，并从技术中立的原则出发，将“发送”和“节目”两者分开管理。

近年来香港新闻媒介专业操守下降，低俗的媒体在市场上占主导地位，使传媒的公信力下降。1999年8月下旬，法律改革委员会公布一份传媒的隐私行为咨询文件，批评部分新闻媒介滥用新闻自由，建议设立法定组织，负责处理市民投诉、主动调查、裁决以及处罚违规的报刊负责人。经过广泛讨论，香港记者协会、香港摄影记者协会、新闻工作者联会和新闻行政人员协会4个新闻工作者组织于2000年草拟了《新闻从业人员专业操守守则》。同时，由香港报业公会催生的报业评议会宣布在2000年7月正式成立，由11份报纸和两个新闻工作者团体参加。但销量最大的几家报纸却不响应，影响了这些自律机制的功能和代表性。^①

代表中英文报章的香港报业公会成立于1954年。是香港新闻传媒机构老板的组织，由《南华早报》、《华侨日报》、《星岛日报》、《工商日报》四家报纸负责人倡议成立，并由此四家的负责人轮流担任主席。现在有会员23个，赞助会员5个。

香港记者协会致力于提高新闻界的专业水准。1968年成立，是新闻从业人员的工会组织。香港的专业记者团体有三个：香港体育记者联谊会、香港影剧摄影记者联谊会、香港经济记者协会。

香港的新闻行政人员协会注册于1986年，该协会包括香港中英文报纸、新闻性杂志、广播电台、电视台及通讯社担任有行政职务的高级记者、编辑，基本

^① 参见梁丽娟：《2000年香港传播事业概览》，载《中国新闻年鉴》（2001年卷），136页。

任务是促进同业之间的交流，维护专业的尊严与权利。

总部设在香港的世界中文报业协会为香港新闻从业人员与海外华文报刊人员交流与学习贡献良多。

对香港报刊进行市场调查的组织主要是刊物销数公证会和香港市场研究社。刊物销数公证会由广告客户、广告代理商和出版商三部分组成，主要调查刊物的销量，为广告客户与广告商提供准确的资料。而市场研究社主要集中调查刊物的读者背景，包括知识水平、收入、年龄结构、阅读行为等等。

香港新闻事业的蓬勃发展，使当地的新闻教育也大步前进。香港的新闻从业人员基本是由“中大”、“浸会”、“树仁”和“珠海”四所院校培养出来的。“中大”是指香港中文大学，其新闻与传播系创办于1963年，学制4年，设有新闻传播研究所，招收研究生。浸会学院传理系于1968年成立，为美国基督教浸信会香港分会创办，传理系有新闻、广播电视、广告公共关系和电影4个专业。树仁学院新闻系创办于1971年，学制也是4年，前两年是基础训练为主，后两年着重理论及业务训练。该院还和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合作办有硕士研究生班。珠海书院新闻系创办于1968年，初为夜校，后改为全日制，学制4年，但其毕业文凭未得到香港当局的认可。

第三节 澳门的新闻传播事业

一、澳门报业

1949年后澳门的报纸发展可为两个阶段，即以70年代末中葡建交为分界，报业的发展有明显的变化，报纸的种数增加，内容亦有大的提升。特别是澳门自1999年12月20日回归祖国后，政府希望澳门的传媒能够淡化香港传媒一直以来的强势影响，开拓独立的市场空间，获得更多的发展机会。

新中国成立之前，澳门主要有三家中文报纸和一家葡文报纸，1933年创办的《大众报》是澳门历史最长的中文报纸，1937年创刊的《华侨报》是香港《华侨日报》的澳门版，60年代中期后才与《华侨日报》分开另起炉灶。1944年创刊的《市民日报》是以副刊娱乐新闻为主的日报。葡文报纸《号角报》为周报，创刊于40年代，为澳门天主教会机关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不久，拥护新中国的《新园地》小报出版，是澳门爱国团体新民主协会会刊，于1958年8月15日转变为大型日报《澳门日报》，《新园地》成为该报的综合性副刊。1963年另一份中文报纸《星报》创刊，主要刊登本地新闻、娱乐新闻和狗经，另一份葡文报纸《澳门人报》也于1963年创刊，该报另有中文版周报，内容多摘自内

地和本地中文报纸。

70年代，澳门创办的报纸并不多，只有1978年创刊的《正报》，其最初的报名为《澳门体育会》，是周刊，后易名为《体育日报》，全部内容为澳门的体育新闻，1982年易名为《正报》，成为综合性日报。

1979年中国和葡萄牙建交，两国就澳门主权问题达成谅解。这一历史性的变化，使葡文报刊增加了5家，加上原有的《号角报》和《澳门人报》，达到7家，它们是：《澳门晚报》（1982年10月18日由上生葡人创刊）、《澳门论坛报》（周报，1982年10月30日创刊）、《澳门商业报》（周报，1987年2月17日创刊）、《澳门》（月刊，1987年12月由澳门政府新闻司主办）、《东方快报》（周报，1988年12月16日创刊）。1982年澳门老资格的中文报纸《大众报》出版了葡文版，成为当时惟一一家中葡合璧的报纸。

1987年4月中葡两国政府签署了关于澳门回归祖国的联合声明。在过渡期内，澳门报业曾经出现空前繁荣的局面，澳门人口虽少，但报纸种类却不少，目前全澳门共有8张中文报纸及6张葡文报纸。前者包括《澳门日报》、《华侨报》、《大众报》、《市民日报》、《星报》、《正报》、《现代澳门日报》、《华澳日报》，另有5份中文周报及2份葡文周报。大部分报纸是民营的，小本经营，也有一些是教会所办，它们的发行量很小，仅靠微薄的广告收入生存。众多报纸中以《澳门日报》的发行量最大，且较具影响力，该报号称日销8万份以上，还被允许在珠海、中山等相邻城市发售。香港约有20多份中文报纸每天运往澳门，这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澳门中文报纸的发展。香港的《苹果日报》、《东方日报》、《太阳报》在澳门的报纸市场发行量超过本地的其他报纸，日销3万份以上。为了加强澳门报业的竞争力，《澳门日报》也走向电子化与网络化，它是澳门最早上网的报纸。

二、澳门的广播电视业

澳门的广播电视业已有六十多年的历史。最早的广播电台于1933年8月26日开播。1940年澳葡当局将该台改为官办，正式命名为澳门广播电台，只播放音乐、粤曲，后因经费不足而停办，60年代才又开办。1982年，澳门广播电台组成澳门广播电视公司，简称“澳广视”，分为中文台和葡文台两部分。当时澳门并没有自己的电视台，拥有电视机的家庭都接收香港电视台的节目。1984年5月13日，“澳广视”筹建的电视台正式开播，属澳门葡萄牙政府所有，从而结束了澳门没有电视台的局面。创建之初每周只播40小时，覆盖面仅及本地。由于收视率太低，难以拉到广告，开办第一年就亏损一千多万澳元。经过四年多的经营，“澳广视”接收私人股份，转为私营公司，政府拥有50.5%的股份，同时延

长播放时间，推出新鲜节目，直播大型活动等。但至今尚未扭转亏损局面。

2000年7月8日，由祖国大陆、澳门、葡萄牙三方投资达4.5亿的“澳门有线电视”正式开播，开创了澳门电视的新局面。该台通过微波传送，提供40条包括中、英、葡语频道给居民及商业用户，最多可提供200条频道。该台并不自己制作节目，以转播为主，在运营一年之后，约有上万客户接受其服务。收费的有线电视面临的最大问题是，这里的居民大多喜欢收看香港电视，也习惯了看免费电视，他们不一定愿意出额外的钱来收看有线电视。2000年7月，由祖国大陆、香港、澳门三地投资的“澳门卫星电视亚洲台”开始试播，为亚太区观众提供24小时综合节目，该台行政总部与控制中心位于澳门，并已获得国内批准作有限落地，这也许会有助于提高广告收益。2000年12月，澳门行政特区另向“中华卫星电视有限公司”颁发为期15年的牌照，该公司计划在三年之内为整个亚太地区提供6个卫星电视频道，其中澳门科教台已经于同年12月开通。

澳门电台与澳门电视台在2000年底也开通了网上宽频广播，令观众可以在网络上收看和收听到所有的新闻节目和娱乐节目。

澳门最具规模的国外通讯社是葡萄牙通讯社澳门分社，于1988年设立，用中、葡、英三种文字发稿。1989年该通讯社又将澳门分社改组为亚太区总分社，下辖澳门、香港、北京三个分社。此外一些通讯社在澳门派有驻地记者。澳门本地有5家通讯社，即澳门通讯社、时事新闻社、宇宙新闻社、金星通讯社和时代通讯社，负责向香港报纸提供财经和社会新闻，它们的规模都很小，无法和国外的通讯社形成竞争。实际上担负澳门新闻通讯社任务的是澳门日报社，该报社从香港租用两条新闻专线，通过卫星直接接收新华社和外国主要通讯社的新闻，供本地其他报纸选用。

1987年9月21日，新华社在澳门设立分社。

三、澳门的新闻管理

在回归以前澳门政府惟一与新闻管理有关的机构是隶属于“传播旅游暨文化事务政务司”的“澳门政府新闻司”，其权力很有限，主要为澳门新闻事业提供支援和为政府负责公关工作。回归以后，掌管新闻的职权由新闻局负责，直接隶属于行政长官办公室。针对澳门本土报业竞争力不足的问题，新闻局推出了《鼓励本地报业提升竞争力方案》，希望通过短期有限度的直接资助方式，鼓励澳门报业在新闻传播和组织管理方面优化技术、培养专业人才及提升专业资格，并确保社会多元化声音的存在。

随着澳门有线及卫星电视频道增多，广播事务的管理非常重要。现在牌照的

审理及批准由行政长官办公室直接负责，内容及营支监管由新闻局负责，而电信暨资讯科技办公室负责监管频谱的动用。为了吸引海外媒体到澳门投资，特区政府多次强调对外开放卫星电视业务，只要申请者符合法律规定，妥善利用澳门频谱、保证播放内容符合规定，都会获得发牌经营。这一政策有助于创造就业机会、增加政府税收以及提升澳门的国际形象，而本地居民亦可获得更多资讯。

澳门的新闻团体主要是澳门新闻工作者协会，由六家主要的中文报社（《澳门日报》、《华侨报》、《大众报》、《市民日报》、《星报》、《正报》）联合于1968年1月1日成立。

【学习思考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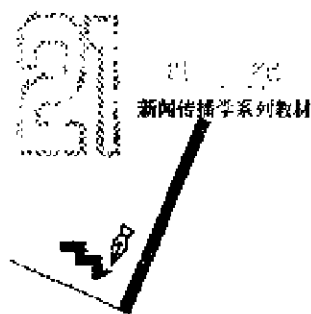
1. 什么叫“报禁”？请说明报禁前后台湾新闻事业的不同特点。
2. 台湾的新闻事业一直存在着公营与民营势力的竞争，试析公营与民营两股势力在报纸、期刊、广播、电视等不同领域的力量对比。
3. 试析不同历史时期，“左”、“中”、“右”三派报刊在香港新闻事业中的变迁。
4. 香港的广播电视事业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出现了哪些新的特点？
5. 澳门的新闻事业最显著的特点是什么？



学习参考书目

1. 戈公振. 中国报学史. 上海: 商务印书馆, 1927
2. 方汉奇主编. 中国新闻事业通史.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2、1996、1999
3. 方汉奇主编. 中国新闻事业编年史. 福州: 福建人民出版社, 2000
4. 李龙牧. 中国新闻事业史稿.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5
5. 丁淦林等. 中国新闻事业史新编. 成都: 四川人民出版社, 1998
6. 黄瑚. 中国新闻事业发展史.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1
7. 方汉奇, 张之华主编. 中国新闻事业简史.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5
8. 复旦大学新闻系新闻史教研室编. 中国新闻史文集.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7
9. 丁淦林主编. 中国新闻图史. 广州: 南方日报出版社, 2002
10. 徐培汀, 裘正义. 中国新闻传播学说史. 重庆: 重庆人民出版社, 1994
11. 李彬. 唐代文明与新闻传播. 北京: 新华出版社, 1999
12. 朱传誉. 宋代新闻史. 台北: 商务印书馆, 1967
13. 尹韵公. 中国明代新闻传播史. 重庆: 重庆出版社, 1990

14. 方汉奇. 中国近代报刊史. 太原: 山西教育出版社, 1981
15. 卓南生. 中国近代报业发展史.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2
16. 胡太春. 中国近代新闻思想史. 太原: 山西人民出版社, 1987
17. 秦绍德. 上海近代报刊史论.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1993
18. 黄瑚. 中国近代新闻法制史论.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1999
19. 方汉奇、陈业劭主编. 中国当代新闻事业史. 北京: 新华出版社, 1992
20. 钟沛璋主编. 当代中国的新闻事业. 北京: 当代中国出版社, 1997
21. 张涛. 中华人民共和国新闻史. 北京: 经济日报出版社, 1992
22. 赵玉明. 中国现代广播简史 (修订本). 北京: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2001
23. 郭镇之. 中国电视史.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1
24. 魏永征. 中国新闻传播法纲要. 上海: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1999
25. 马光仁主编. 上海新闻史.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1996
26. 马光仁主编. 上海当代新闻史.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1
27. 程曼丽. 海外华文传媒研究. 北京: 新华出版社, 2001
28. 陈昌凤. 香港报业纵横. 北京: 法律出版社, 1997
29. 李谷城. 香港报业百年沧桑. 香港: 明报出版社, 2000



后 记

这部《中国新闻传播史》教材由以下四位撰稿人共同完成，他们的简历如下：

方汉奇（1926— ），广东普宁人。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指导教师，中国人民大学新闻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顾问，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京大学等14所大学的课程教授或兼职教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新闻传播学学科评议组召集人，中国新闻史学会会长，吴玉章奖金新闻学奖评审组组长。全国一级优秀新闻工作者，全国优秀教师。著有《中国近代报刊史》、《报史与报人》、《新闻史的奇情壮采》，主编有《中国新闻事业通史》、《中国新闻事业编年史》、《中国新闻事业简史》等书。

丁淦林（1932— ），江西南昌人。曾任复旦大学新闻学院院长、复旦大学新闻研究所所长。1997年被授予复旦大学首席教授称号。现任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复旦大学信息与传播中心名誉主任，温州大学人文政法学院院长，中国新闻史学会副会长。主要著作有《邹韬奋年谱》（合著）、《中国新闻事业史》（主编）、《中国新闻事业史新编》、《中国新闻图史》等。

黄 瑚（1955— ），江苏海门人。复旦大学法学博士。现任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新闻研究所所长、信息与传播研究中心研究员，中国新闻史学会常务

理事兼副秘书长。曾在美国东西方中心和夏威夷大学进修一年、在美国北卡罗莱纳大学做访问学者一年。著有《新闻法规与新闻职业道德》、《中国近代新闻法制史论》、《中国新闻事业发展史》、《新闻伦理学》，参加过《中国新闻事业通史》、《中国新闻图史》、《中国大百科全书·新闻出版卷》、《辞海》等二十多部各类著作的撰稿工作。

薛 飞 (1966—), 江苏睢宁人。中国人民大学法学硕士, 英国斯特林大学理学硕士,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史方向在读博士生。现任《人民日报》国际部编辑。

上列撰稿人撰稿的分工情况为:

第一章, 方汉奇;

第六、七、八章, 丁淦林;

第二、三、四、五、九、十、十一章, 黄瑚;

第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章, 薛飞。

由方汉奇担任主编, 负责全书的组织、策划和整理定稿等事宜。

这部教材在编写过程中, 参考和借鉴了已出版的同类教材的优点, 融汇和吸纳了 20 世纪中国新闻传播史研究的成果, 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二十多年中国新闻传播史的最新研究成果。全书涵盖了中国自先秦两汉以迄当代的各种新闻传播活动的历史, 涉及报刊、广播、电视、网络等新闻媒体和新闻传播学教育、新闻传播学研究等各个方面。所记述的史实和统计数字的下限, 一般截止至 2000 年底, 个别的止于 2001 年底。每章的后面附有学习思考题, 书末开列了学习参考书目, 供读者进一步学习时参考。

编者

2002 年 7 月